

2016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4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本成果受到中国人民大学2016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经费的支持

2016年“中央高校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学科）和特色发展引导专项资金”

北方民族考古

THE ARCHAEOLOGY OF NORTHERN ETHNICITY

第4辑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主办的集刊，每年一辑。第4辑内容包括考古新发现、研究与探索、碑刻考释等栏目，收录论文25篇，以北方地区考古发现与研究为重心，既有最新的考古发现成果报导，也有综合性的考古学探索和个案分析，是文物考古研究方面的重要成果展示。

本书适合文物考古研究工作者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参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北方民族考古. 第4辑 / 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7. 9

ISBN 978-7-03-054372-1

Ⅰ. ①北… Ⅱ. ①中…②中… Ⅲ. ①古代民族–民族考古学–中国–文集 Ⅳ. ①K874-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15830号

责任编辑：王琳玮 / 责任校对：邹慧卿

责任印制：徐晓晨 / 封面设计：张 放 李雨濛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7年9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17年9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5 1/2 插页：2

字数：650 000

定价：16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北方民族考古》编辑委员会

目　录

碑刻考释

彩版目录

辽宁凌源红山文化遗存考古调查报告

凌源市博物馆

（凌源，1225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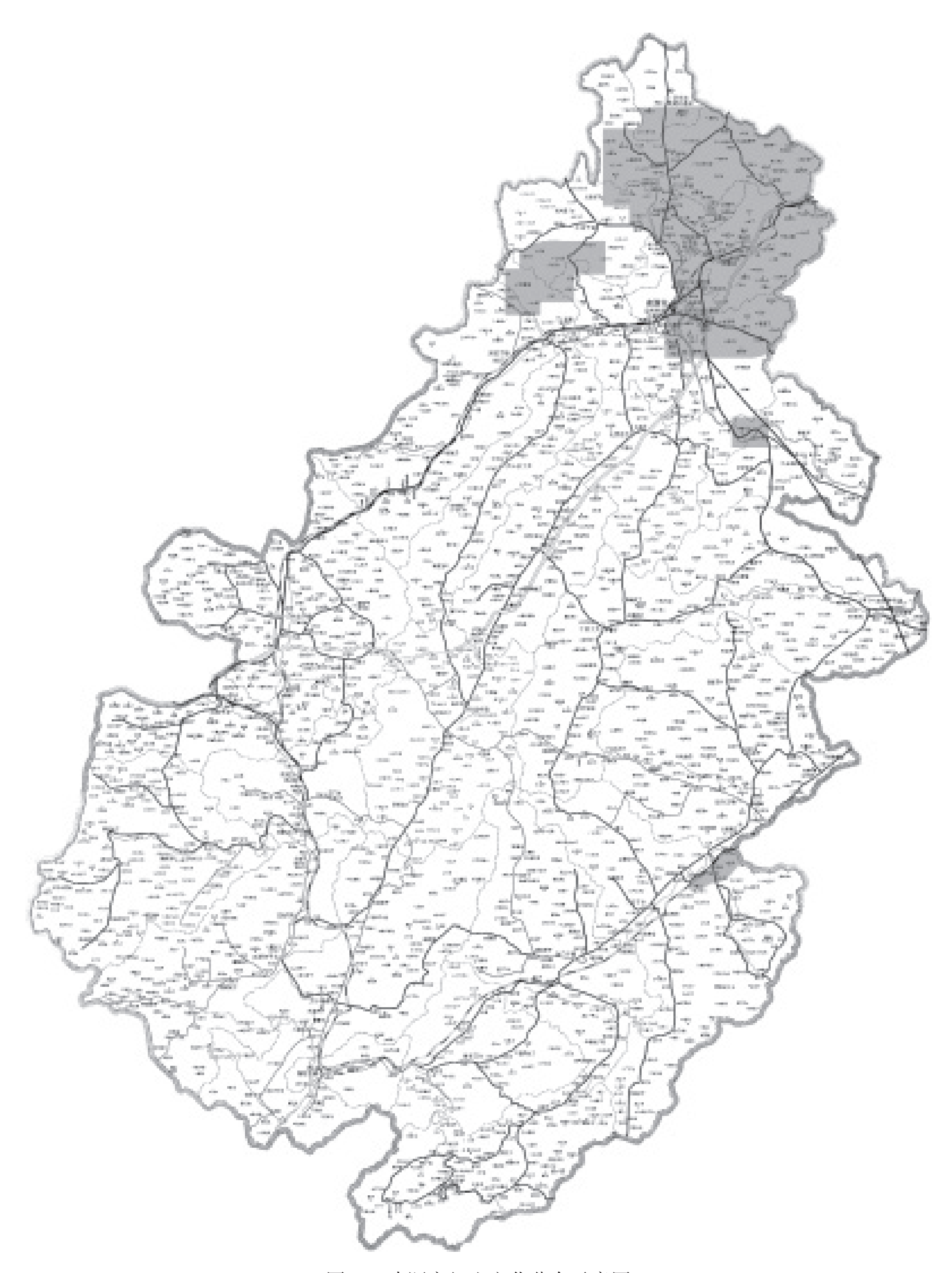
在凌源地区，红山文化遗存的最早发现是20世纪40年代著名考古学家佟柱臣先生曾在牛河梁一带做过考古调查，采集到大块的彩陶片，并于1943年进行过报道[1]。1979年省考古队发掘的三官甸子墓地[2]，1981年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庙坛、冢、遗址群和玉器群的连续发现，使对红山文化的研究进入了突破性发展阶段，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轰动世界。为了搞清红山文化遗址在凌源地区早、中、晚期的分布情况，利用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之机，我们专题对牛河梁保护区及周边地区进行了调查，共发现46处红山文化遗存，其中新发现21处。红山文化遗址包括26处为积石冢性质，19处为聚落址性质，1处为祭祀遗址性质。在之后的调查中我们又在宋杖子镇发现积石冢一处、遗址一处，三家子乡河南村发现4处积石冢。基本摸清了凌源地区红山文化遗址的分布情况，为便于专家学者的进一步研究，现将遗址的基本情况提供，并对其中新发现的15处遗址简要介绍如下：

一、红山文化遗址在凌源分布的情况

红山文化遗址（包括与其他文化性质共存的）主要集中分布在三个区域：第一，牛河梁红山文化保护区内、外，包括万元店镇、红山街道办事处、热水汤街道办事处以及东城街道办事处；第二，东北距牛河梁约20千米的宋杖子行政区内；第三，北距牛河梁约51千米的三家子行政区内。其分布的特点是：基本位于二级台地、山顶或山梁上以及两山之间的平缓台地，周边有充足的水源，遗址主要是在大凌河支流和渗津河岸边（图一）。

（1）牛河梁红山文化保护区内、外，包括万元店镇、红山街道办事处、热水汤街道办事处、凌北街道办事处以及东城街道办事处，共46处。其中复查25处，新发现21处。牛河梁遗址所在辽西努鲁儿虎山山脉，属大凌河西流域。新发现如下：

1）大东山积石冢（凌源与喀喇沁左翼蒙古自治县交界处），两山之间台地上，这里地势较高，南北均为高山，此积石冢呈南北排列，中间最大冢为圆形，用石块堆筑，直径约30米，存高5米；北面小冢为方形，四外边用石块围砌，长1米，宽1.2米，存高



图一　凌源市红山文化分布示意图

0.5米；南面小冢也是碎石堆筑，存高约1米。积石冢上没有封土，碎石内有泥质红陶筒形器残片、筒形器口沿和筒形器颈部等。南、北两侧为高山，东为油松林，西为平缓台地。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6300米（图二）。

2）白土沟山顶积石冢，地表有较明显的碎石堆积隆起，东西长70米，南北宽25米，面积1750平方米，地表散落有夹砂红陶筒形器口沿、筒形器器底和筒形器腹片等残片。一条消防通道从遗址中间穿过，四周为油松林，东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2400米（图三）。



图二　大东山积石冢标本　　图三　白土沟山顶积石冢标本

3）刘家沟南梁东积石冢，北50余米处是刘家沟南梁西积石冢。地势略为高于西积石冢，近圆形，面积约为2900平方米。在断壁处发现有“之”字纹夹砂褐陶残片。积石冢周围是油松林，东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2900米（图四）。

4）三官甸子北山积石冢，中部略微隆起，积石冢高于地表约0.4米，南北长50米，东西宽40米，面积约2000平方米。地表散落有泥质红陶筒形器口沿、泥质彩陶钵口沿等残片。由于常年的农业生产破坏了积石冢结构，有碎石堆积在耕地边。东为油松林，西为耕地，北为耕地，南为现代坟。东50米有一条南北向的季节河，东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6500米（图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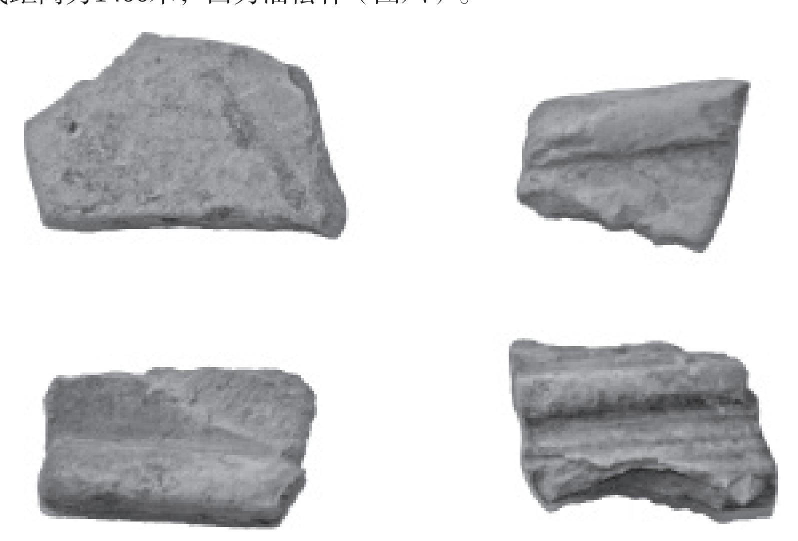


图四　刘家沟南梁东积石冢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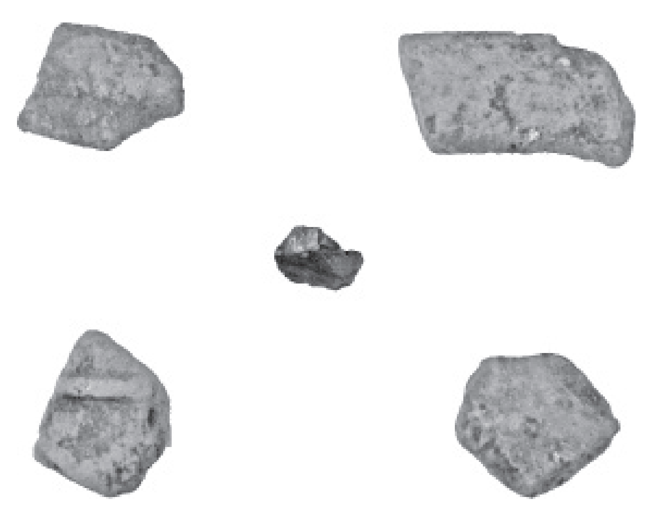
图五　三官甸子北山积石冢标本

5）南营子东梁积石冢，形似一土丘，中部略微隆起。南北长32米，东西宽25米，面积800平方米。地表和土层中夹有泥质红陶筒形器口沿、泥质红陶筒形器腹片等。文化层0.5～1.5米。北为油松林，南1000米为东西向季节河，东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为1400米，西为油松林（图六）。



图六　南营子东梁积石冢标本

6）孙家沟前山东遗址，近长方形，东西长50米，南北宽30米，面积约1500平方米。地表遗物较丰富，主要有夹砂红陶器物腹片、器物口沿和细石器等。遗址文化层厚0.3米，东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约7600米；西为林地；北100米是一条东西向季节河，南为耕地（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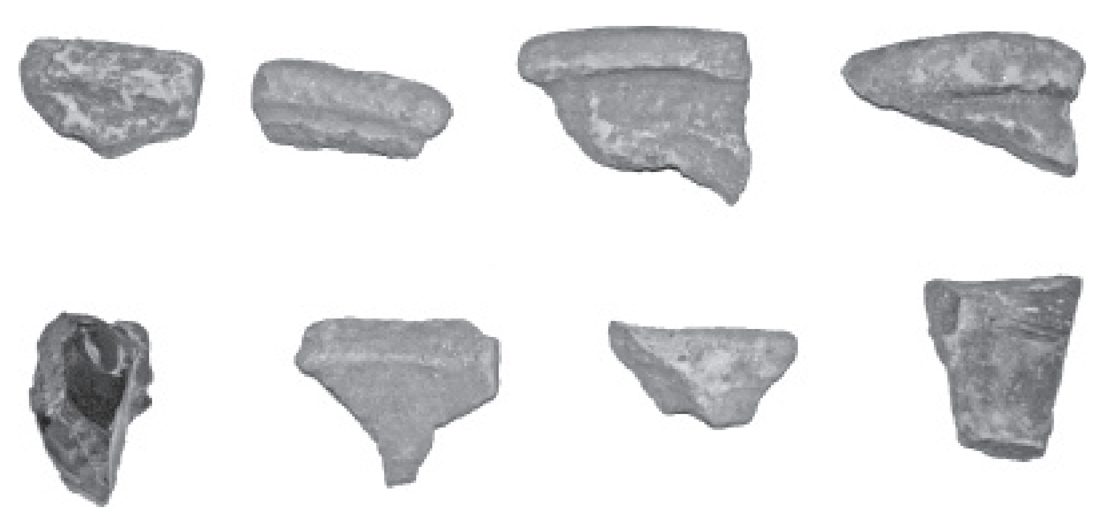
图七　孙家沟前山东遗址标本

7）卧牛石北遗址，东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群第一地点直线距离约12千米。遗址处于两山山之间的平缓台地上，呈长方形，南北长40米，东西宽10米，面积400平方米。遗址文化层厚0.4米，在遗址地表散落有泥质夹砂红陶钵口沿残片，泥质夹砂红陶器物腹片。东临猪山，西约1000米为大凌河支流，北为耕地，南约100米有一东西向季节河。东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12300米（图八）。



图八　卧牛石北遗址标本

8）梁杠子积石冢，地势较平坦，仅是在中央隆起一个小石包，南侧有一碎石垒砌的平台。积石冢呈长方形，南北长40米，东西宽10米，面积400平方米。地表散落有泥质红陶钵口沿、泥质红陶筒形器口沿等残片。东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约11000米，东20米有一南北向季节河；西为一便道；北为住宅；南为高速公路（图九）。



图九　梁杠子积石冢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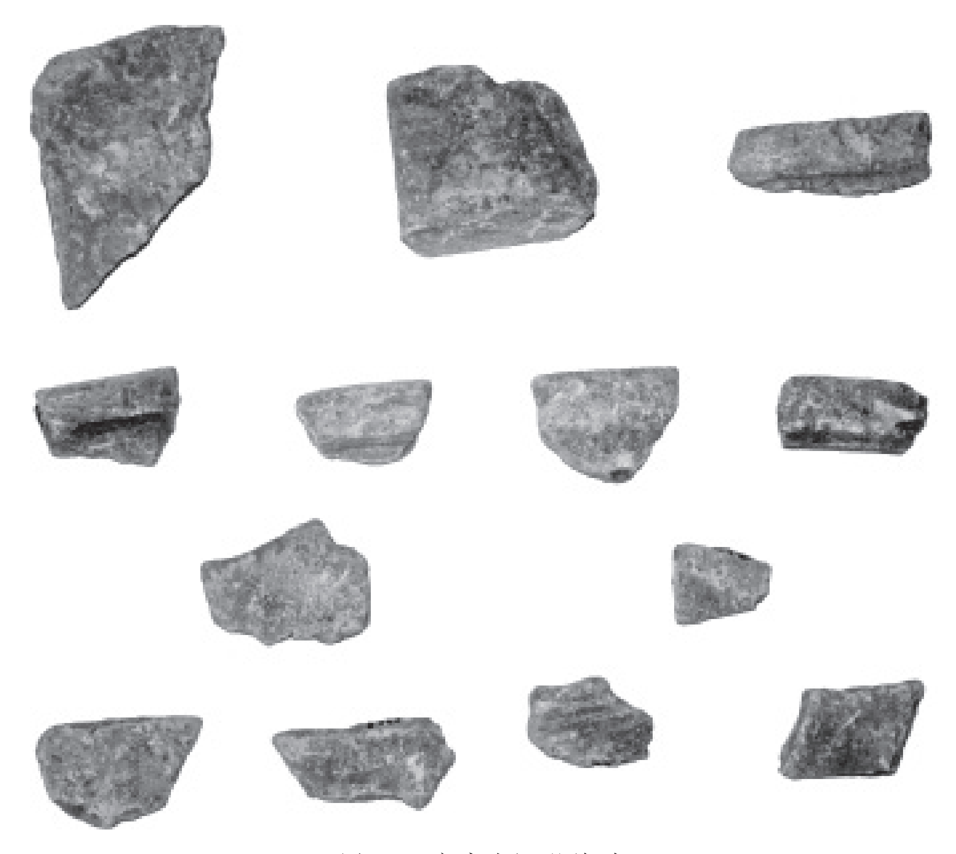
9）建昌沟小北山遗址，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面积3000平方米。地表散落泥质红陶筒形器口沿及泥质红陶筒形器腹片等残片。文化堆积约0.5～1米，未见有碎块堆积迹象。遗址东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第一地点直线距离约10000米；南约100米有一东西向的季节河，并与猪山相望；东200米是101国道；西为林地（图一〇）。



图一〇　建昌沟小北山遗址标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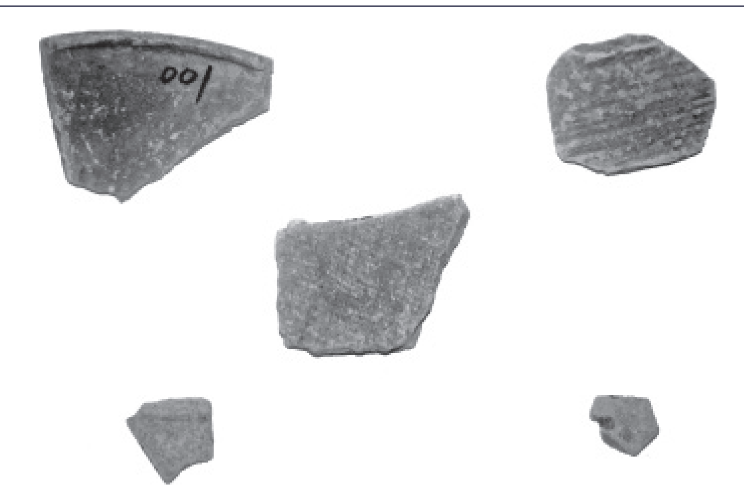
（2）西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保护区直线距离约20千米的宋杖子镇行政区域内新发现2处，一处积石冢，一处遗址。2处均在大凌河流域西支上游左岸，紧邻河北与内蒙古，东为山林，西为大凌河西支流。

1）郭家洼积石冢，积石冢所在山梁较低，三面环山，故百姓称之为“郭家洼”。东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墓葬群第一地点直线距离约20000米。积石冢呈长方形，东西长80米，南北宽50米，面积4000平方米，积石冢中部较四周隆起，地表遗物主要有泥质红陶筒形器口沿、颈部、腹部、底部等残片。东依郭家山，南北两侧坡下皆为冲击沟，沟的南北两侧皆为山梁，西约1600米为大凌河西支流。积石冢地表为耕地，常年种植大田作物（图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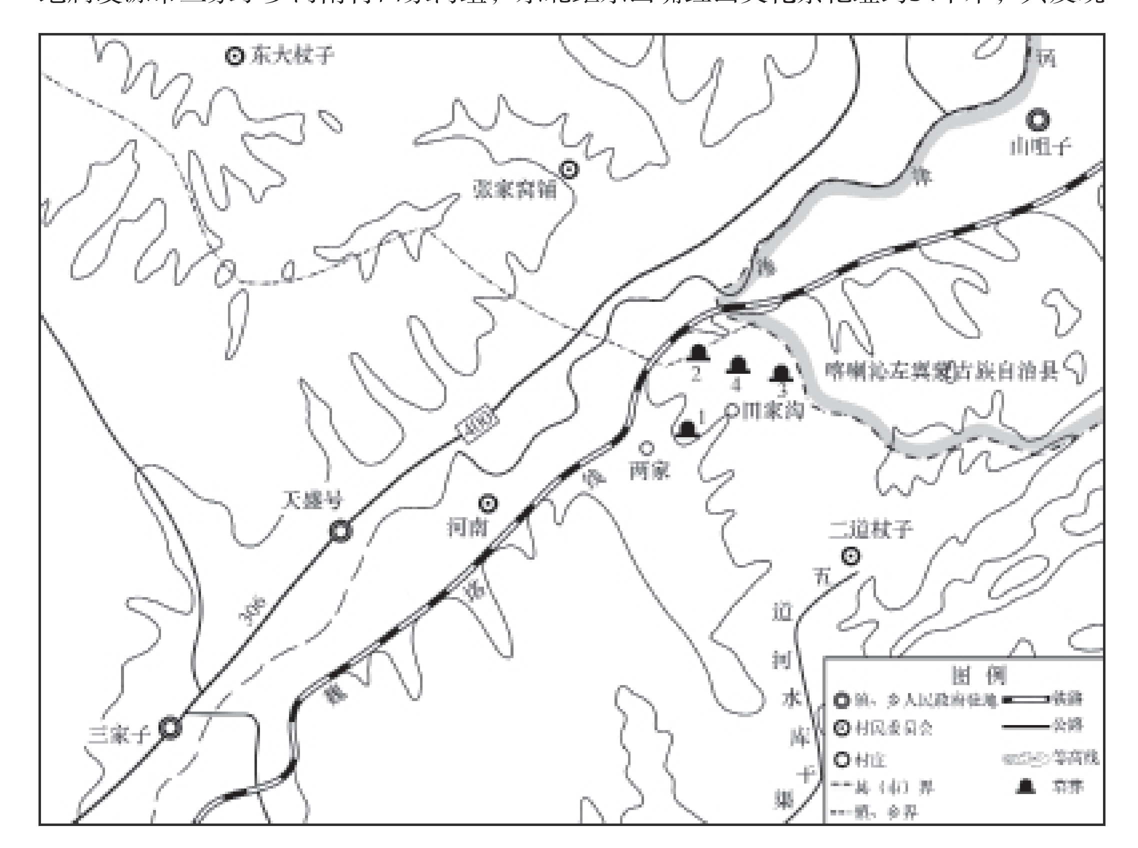
图一一　郭家洼积石冢标本

2）前房申果树趟遗址， 遗址呈长方形，东西长60米，南北宽50米，面积3000平方米。文化堆积约0.1米，由于兴建温室大棚地表被扰乱，仅见少量泥质红陶筒形器器底、颈部、腹片和辽代时期的布纹瓦等残片。东、南两侧为冲击沟；西面是大面积山坡耕地；北面是山梁；东距郭家洼积石冢560米，南距大凌河1000米（图一二）。



图一二　前房申果树趟遗址标本

（3）南距牛河梁红山文化保护区直线距离约51千米的三家子乡行政区域内（图一三）为田家沟积石冢群，也叫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3]。该墓地群位于渗津河左岸，地属凌源市三家子乡河南村田家沟组，东北距东山嘴红山文化祭祀址约34千米，共发现



图一三　田家沟红山文化积石冢群地理位置图

1. 西梁头石棺墓地　2. 夹鼻子梁积石冢墓地　3. 东梁岗积石冢墓地　4. 山弯子积石冢墓地

四个墓地地点。墓地在发现前后的不长时间内均遭到了不法分子的盗掘。2009年秋季，辽宁省文物考古所派人员对第一、第二地点进行了发掘清理；2010年又对第三、第四地点进行了局部清理；2011年5月开始，对第三、第四地点进行全面清理。

田家沟积石冢群主要分为以下四个地点：

1）西梁头积石冢考古发掘为第一地点——西梁头石棺墓地，位于田家沟西南约1200米的簸箕山梁西端，故此得名，发掘面积525平方米。发现呈圆形分布的石棺墓葬7座（编号M1~M7），出土玉器5件，种类有镯、蚕形器、绿松石耳坠三种。计M5出土玉镯、绿松石耳坠各一件，M1出土玉镯一件，M4出土玉镯一件，M2出土蚕形玉器一件。此外，在墓圹的填土内还见有少量陶筒形器碎片出土（图一四）。



图一四　西梁头积石冢出土蚕形玉器

2）东沟里积石冢考古发掘为第二地点——夹鼻子梁积石冢墓地，位于田家沟西北约1000米的形似“鼻子”的山梁上，又夹在卧虎山梁和簸箕山梁之间，故称夹鼻子梁。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发现石棺墓葬8座（编号M1~M8）。由于墓地遭到严重盗掘，墓内随葬品发现较少，仅在墓葬M1、M2各发现陶罐一件，墓葬M8发现玉镯两件（图一五）。



图一五　东沟里积石冢出土玉镯

3）田家沟沟里积石冢考古发掘为第三地点——东梁岗积石冢墓地，位于田家沟东北约900米的簸箕山梁东端梁下的坡岗上，故名。发掘面积500平方米。发现石棺墓葬6座，墓内随葬品发现有骨器2件，彩陶器3件，玉器1件，包括M3发现骨簪一件、M6发现骨锥一件，M4发现彩陶罐三件、玉璧一件。在墓地西南角的第一层垫土面上还发现玉蚕一件。此外，在环形筒形器圈上还见有大量筒形器、少量器座等

陶祭器残片（图一六）。

4）东沟里杏树园积石冢考古发掘为第四地点——直垄地积石冢墓地，位于田家沟西约800米的簸箕山梁中段的梁岗上，地表用于耕作的地垄较直，故此命名。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共发现石棺墓葬10座，墓内出土玉器5件，种类有蛇形耳坠、芯、镯、铲四种，包括M8出土玉镯两件、玉铲一件，M9出土蛇形耳坠、玉芯各一件（图一七）。



图一六　田家沟沟里积石冢出土彩陶罐



图一七　东沟里杏树园积石冢出土蛇形耳坠及玉心

二、三普后陆续发现三处红山文化积石冢

（1）鹤松沟积石冢，在一山顶上，呈长方形，东西宽20米，南北长30米，面积

600平方米。北为林地，南为耕地，东紧邻村路，西为冲积沟。在被盗掘后的碎石中夹杂筒形器口沿、器腹片等残片。

（2）黄土梁子积石冢，位于二级台地上，呈长方形，东西宽80米，南北长100米，面积8000平方米。北距大凌河1000米，南、东紧邻村路，西为耕地。被盗掘的耕地中夹杂有泥质红陶筒形器口沿、器腹片等陶片。

（3）小北山积石冢，在牛河梁红山文化保护区内，距离牛河梁第15地点500米的一个小山顶，呈长方形，东西宽40米，南北长80米，面积3200平方米。经过盗掘后发现泥质红陶筒形器口沿、器底等残片。

三、结　束　语

（1）三普前我市掌握的红山文化遗址，主要集中在我市北部的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保护区及邻近的红山街道办事处、万元店镇区域及东城街道办事处。西北部、东部和南部都没有遗迹发现。三普调查在我市西部的宋杖子镇以及南部距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直线距离51余千米处的三家子乡，发现的田家沟红山积石冢墓群。田家沟红山积石冢墓群经辽宁省考古研究所的初步发掘，揭示了众多的积石冢布局及营造方式的线索。无疑对研究牛河梁红山文化积石冢群的内涵提供了重要的第一手材料，该冢群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遗址群的地理位置关系有待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凌源在两冢群的红山文化遗址分布区域保护中的重要地位。11.26大案的破获发现西北部小城子镇和东部乌兰白镇也有红山文化遗迹的存在，调查工作还有待进一步的深入。

（2）牛河梁积石冢群与三家子乡田家沟积石冢群性质相同，牛河梁积石冢都置于山岗顶部，每个山岗上的积石冢数量有所不同。有的一岗一冢；有的一岗双冢；有的一岗多冢。积石冢内都有中心大墓，都位于冢的中心部位。三家子乡田家沟积石冢群也是在山岗上，在墓上封土，土上积石，从而形成地上建筑如：东沟里积石冢和东沟里杏树园积石冢都有中心大墓，并有夫妻合葬墓。可以推断出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就有一夫一妻制的出现，这是社会私有制的一种体现，也代表了国家的文明程度。与牛河梁红山文化高等级墓地相比，田家沟属于中下等级别的墓地。这些对证明中华文明在5000年前就出现了较稳定的社会制度，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研究价值。

执笔：陈利　李广奇

注　释

［1］ 佟柱臣. 凌源牛河梁彩陶遗址［M］. 建国教育，1943年.

［2］ 李恭笃. 辽宁省凌源县三官甸子城子山遗址试掘报告［J］. 考古，1986（6）.

［3］ 王来柱. 凌源市田家沟红山文化墓地群［J］. 中国考古年鉴，2012.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Hongshan Cultural Heritage in Lingyuan City Liaoning Province

Museum of Lingyuan City

Abstract: An archaeological survey has been carried out in the Niuheliang Preservation Area and surrounding area during the Third Culture Relics Census, in order to gain comprehensive knowledge on the distribution of Hongshan culture sites in the Lingyuan region. Fifteen Hongshan culture sites were reported along with a comparative study between platforms in Niuheliang Preservation Area and surrounding area. This article provides new data on the Hongshan platforms and will benefit future studies on social structures in the Hongshan Period.

Key words: Lingyuan City; Hongshan Culture; Archaeological Survey; Platforms

辽宁锦州锡匠沟遗址发掘简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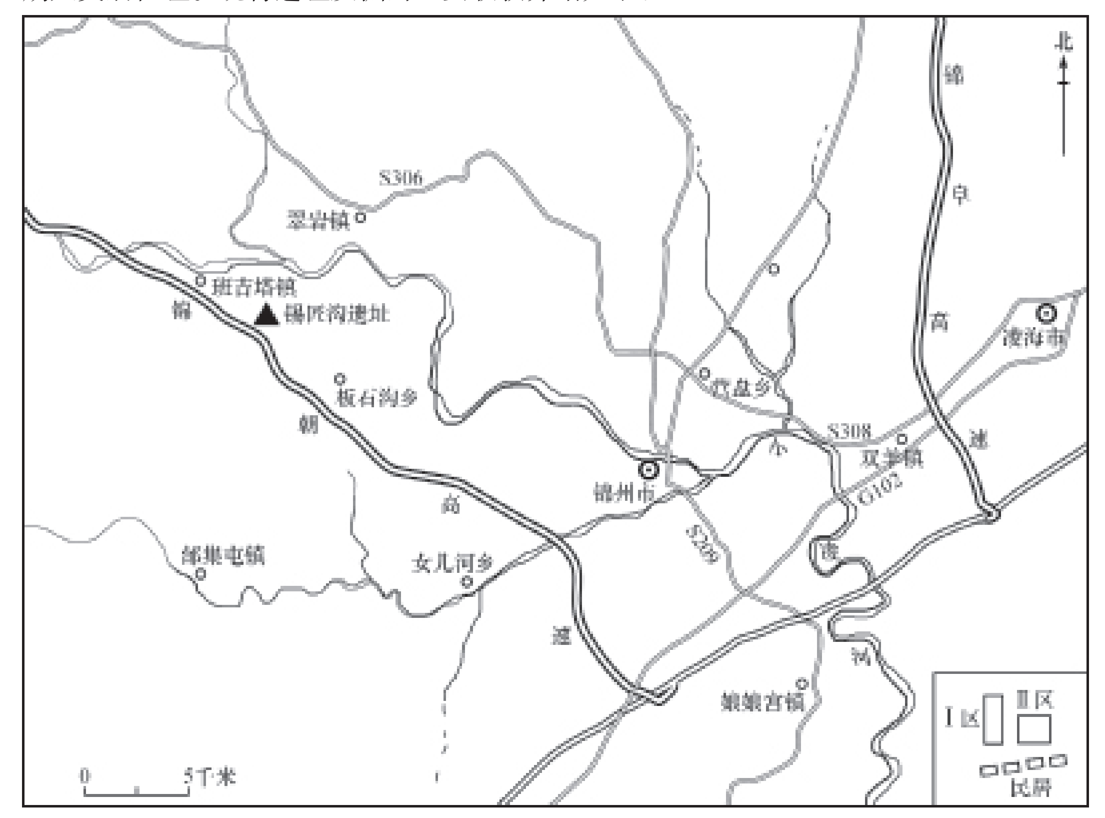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2]

（1. 沈阳，110003；2. 锦州，1210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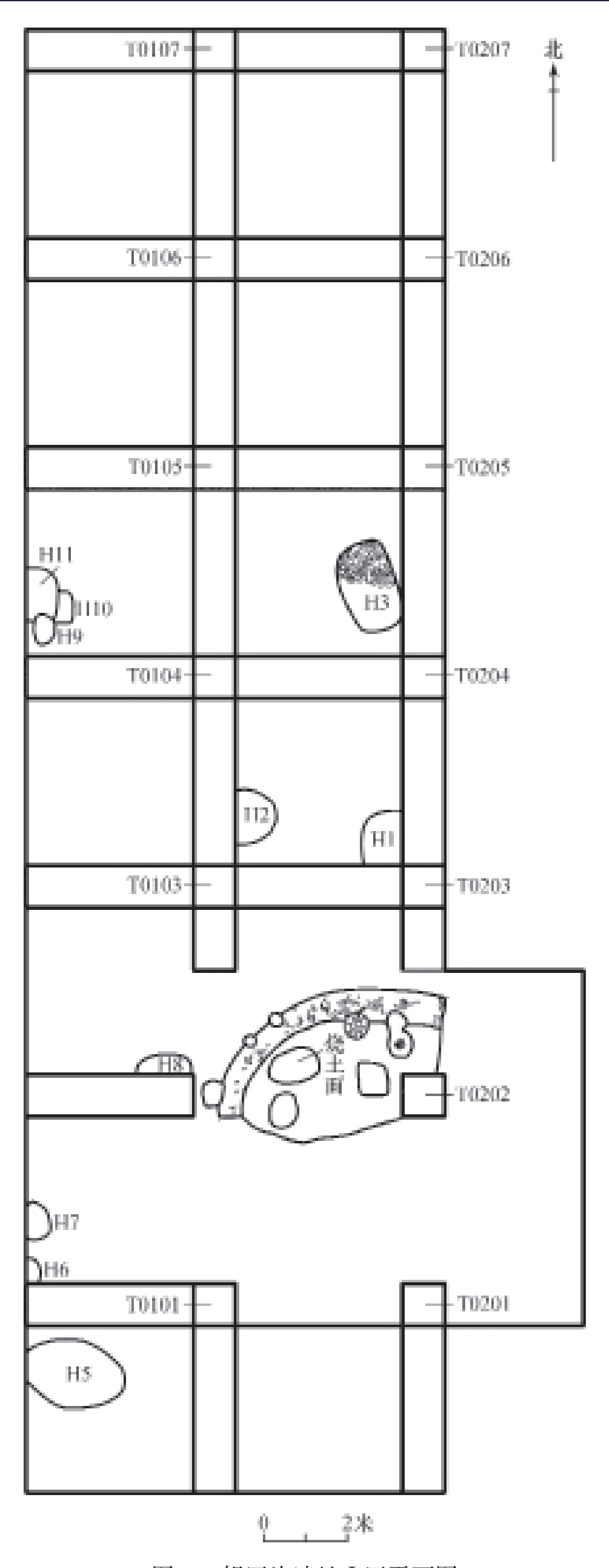
一、地理位置和遗址概况

2011年8月为配合辽宁省锦州市锦凌水库淹没区动迁工程，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对锡匠沟遗址进行了发掘。锡匠沟遗址位于锦州市凌海市板石沟乡锡匠沟村北山阳坡（图一），南侧紧靠村落，东南距锦州市区约22千米。遗址北高南低，落差较大，东西长约100米，南北宽约70米，面积约7000平方米。

本次发掘地点位于遗址西部边缘，发掘面积约680平方米，分两个发掘区，Ⅰ区发掘面积380平方米（图二），Ⅱ区发掘面积300平方米（图三），共发现灰坑22座，房址2座，出土大量的陶、石器。经过发掘及初步整理研究，确定该遗址是一处凌河遗存时期人类居住址。现将遗址发掘的主要收获介绍如下：



图一　锡匠沟遗址位置示意图



图二　锡匠沟遗址Ⅰ区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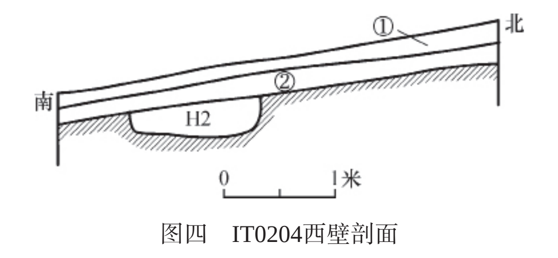
图三　锡匠沟遗址Ⅱ区平面图

二、地层堆积

遗址地层堆积比较简单，分区予以介绍。Ⅰ区以T0204西壁为例（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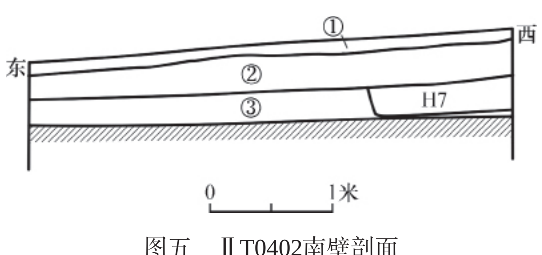
第1层，耕土层，厚10～15厘米，未出土遗物。

第2层，厚15～25厘米，出土少量夹砂红褐陶片，Ⅰ区遗迹多开口于此层下。此层下为基岩。



图四　IT0204西壁剖面

Ⅱ区西距Ⅰ区约30米，以T0402南壁为例（图五）。



图五　ⅡT0402南壁剖面

第1层， 耕土层，厚10～15厘米，未出土遗物。

第2层，厚15～30厘米，出土少量夹砂红褐陶片，Ⅱ区遗迹多开口于此层下。

第3层，厚10～25厘米，出土少量夹砂红褐陶片。此层下为基岩。

三、遗　　迹

1. 房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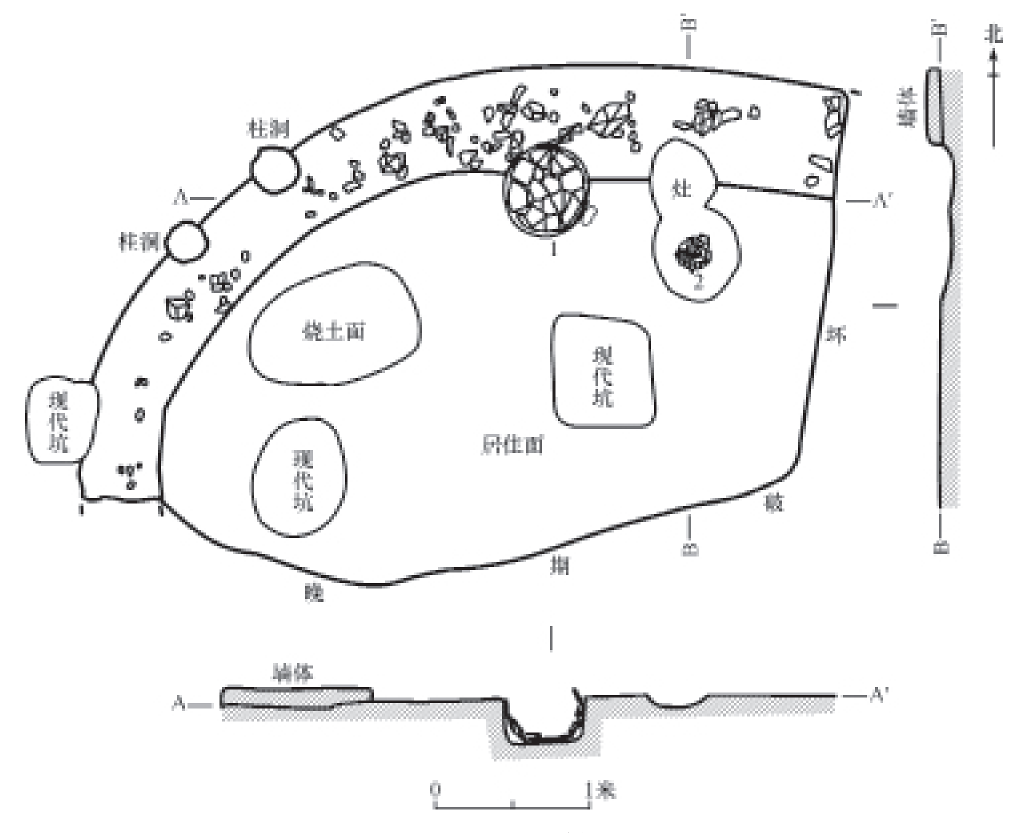
ⅠF1，坐落于基岩上，被第2层土叠压，房址墙体和居住面被三个现代坑打破。房址所处位置北高南低，由于土地平整，仅保存西北侧一角，其余均被破坏。墙体由石块垒砌而成，现仅存部分墙基。房内居住面系在基岩上铺垫一层褐色土，土质不纯净，居住面较平整，西北角保存有红烧土面；北侧正中为灶，灶由火膛和操作面构成，火膛部分深入到北侧墙体中；紧邻灶址西侧深埋一高领罐，高领罐部分嵌入北侧墙体中（图六）。房址保存范围长5.8、宽4米，墙体宽约0.5～0.8米，保存最高处约0.1米；灶长1.17、宽0.48～0.63、深0.14米。

ⅡF1，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第3层，北部被现代坑打破，南部门道处被H4打破。房址保存较差，平面大致呈圆形，门向南。墙体由石块垒砌而成，倒塌严重；房内居住面较平整，灶无存。但据现代坑坑壁发现的大量烧土块，可推测灶应位于房内北侧。房址外南侧近门道处埋有一陶罐，罐已破碎，碎片中发现有婴儿头骨残片及牙齿，可能为居室外瓮棺葬（图七）。房址东西长约3.4米，南北残宽约3米，墙体宽约0.3～0.4米，保存最高处约0.15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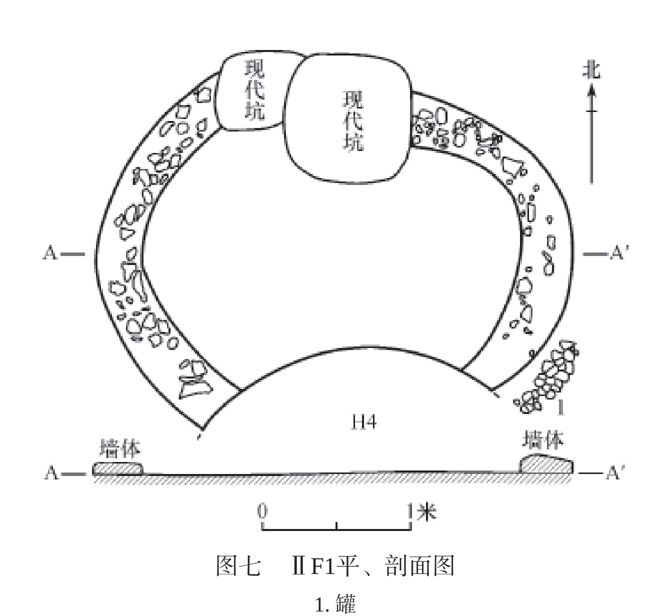
2. 灰坑

发掘灰坑23个，坑口形状多为圆形、椭圆形或不规则形；因遗址所处地势较陡，灰坑底部多直接坐在基岩上，因此坑底多不平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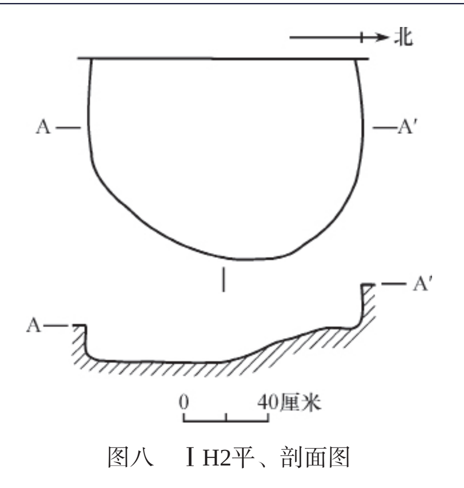
ⅠH2，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基岩。已发掘部分平面呈半圆形，直壁，底部不平（图八）。坑口直径约1.36、深0.38米。



图六 Ⅰ F1平、剖面图
1. 罐 2. 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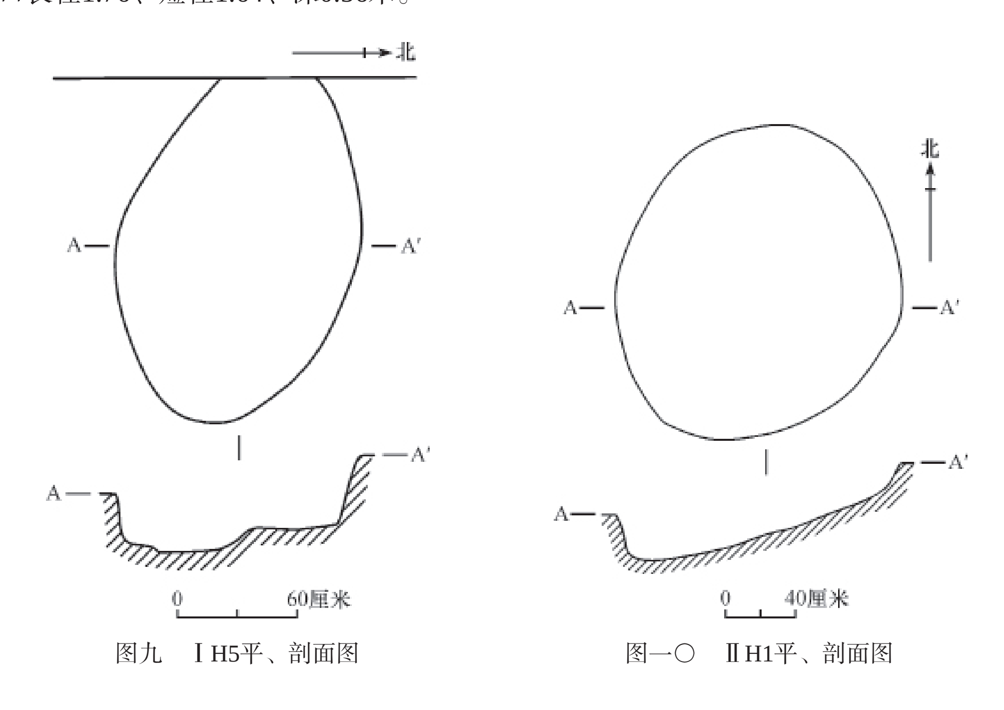
图七 Ⅱ F1平、剖面图
1. 罐



图八　ⅠH2平、剖面图

ⅠH5，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基岩。已发掘部分平面呈椭圆形，斜壁，底部不平（图九）。坑口长径2.42、短径1.64、深0.64米。

ⅡH1，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基岩。平面呈椭圆形，弧壁，底部不平（图一〇）。坑口长径1.76、短径1.64、深0.56米。



图九　ⅠH5平、剖面图

图一〇　ⅡH1平、剖面图

四、遗　　物

出土遗物主要为陶器和石器。

1. 陶器

陶器多为口沿和器身残片，器形可辨有鬲、罐、瓮、钵、甑、豆、纺轮等。陶质以夹砂红褐陶和夹砂黄褐陶为主，纹饰多为素面少量器物饰按窝附加堆纹、绳纹、月牙状贴耳、鸡冠耳等。

鬲　4件，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只见有鬲足和口沿残片，数量较少。ⅡH1：5，鬲足，夹砂红褐陶。素面。残高10.2厘米（图一一，4）。ⅡH1：7，鬲足，夹砂红褐陶。素面。残高11.6厘米（图一一，7）。ⅡT0103③：3，鬲口沿，夹砂黄褐陶。尖唇，直口，高领。领部饰一周按窝附加堆纹。残高5.4、壁厚0.7厘米（图一一，8）。ⅡH1：6，鬲足，夹砂红陶。饰细绳纹，足周被削为七边形。残高12.6厘米（图一一，10）。

罐　7件，以夹砂黄褐陶和夹砂红褐陶为主，均为素面，个别有耳。ⅠF1：2，夹砂黄褐陶。上腹部及口部残，平底。素面。底径9.7、残高23.8、厚0.8厘米（图一一，11）。ⅡF1：1，夹砂红褐陶。方唇，敞口，矮领，束颈，圆肩，鼓腹，平底。腹中部饰两个唇状耳，唇状耳之间饰一鸡冠耳，素面。口径24.3、底径12、高34、厚0.9厘米（图一一，6）。ⅡH8：2，夹砂红褐陶。圆唇，敞口，矮领，束颈。素面。残高10.2、厚0.6厘米（图一一，1）。ⅠH11：1，夹砂黄褐陶。圆唇，侈口，腹部以下残。口径30.7、残高26.4、厚0.9厘米（图一一，5）。ⅡT0201③：2，夹砂红褐陶。仅存底部。素面。底径8.3、残高4.6厘米（图一一，3）。ⅡF1填土：2，夹砂黄褐陶。方唇，侈口，矮领，束颈，肩部以下残。素面，肩部饰一瘤状耳。残高7.4、厚0.6厘米（图一一，9）。ⅡH1：1，夹砂红褐陶。素面。底径9.3、残高7.2、厚1.2厘米（图一一，2）。

瓮　1件。ⅠF1：1，夹砂红褐陶。方唇，直口，高领，溜肩，鼓腹，下腹弧收为小平底。素面。口径34.3、底径10.9、高55.2、厚1.1厘米（图一一，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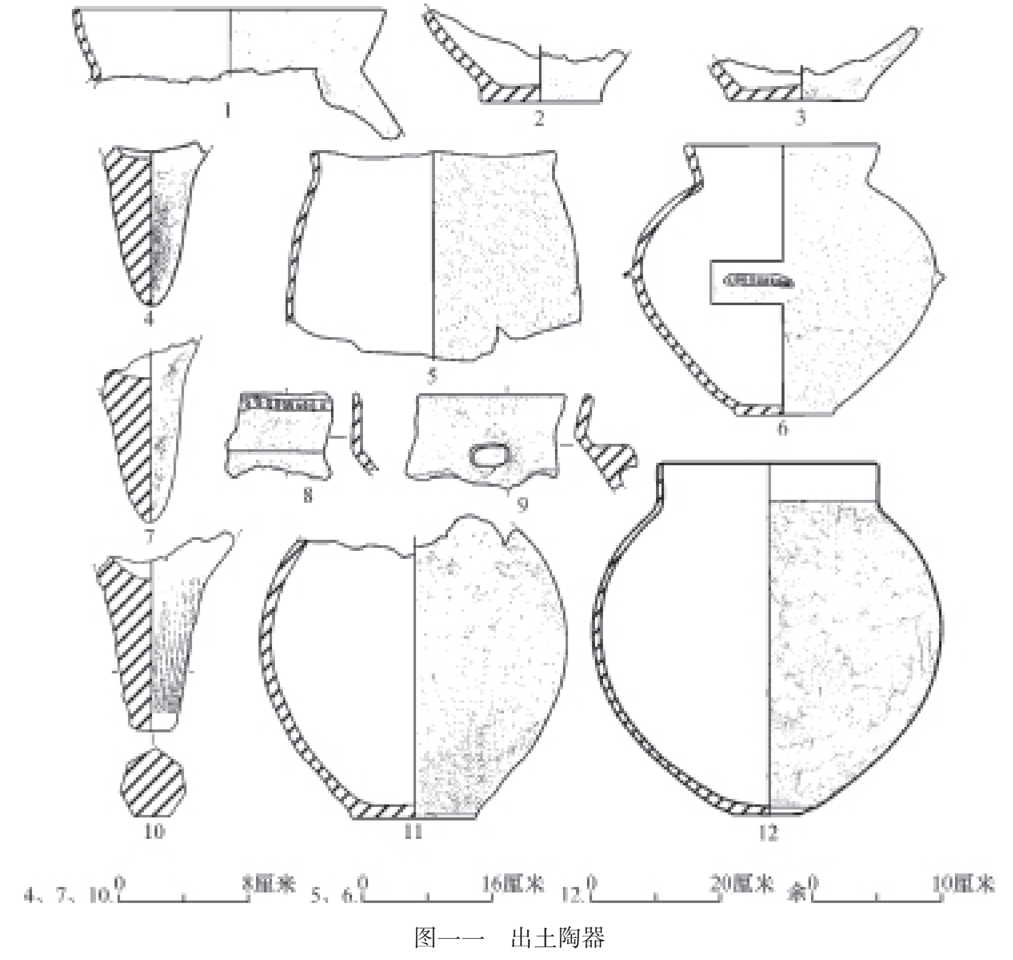
钵　2件，夹砂红褐陶或红褐陶。素面，个别饰有鋬手。ⅡT0301③：1，夹砂红褐陶。方唇，直口。素面，饰一瘤状耳。残高6.3、壁厚0.6厘米（图一二，5）。ⅡT0301③：4，夹砂红褐陶。圆唇，敛口，弧腹微鼓，底残。素面。口径15.9、残高10.4、厚0.6厘米（图一二，15）。

甑　1件。ⅡT0201③：1，夹砂红褐陶。素面，仅残存底部，底部不规则分布六个甑眼。底径10.8、孔径约1.1、残高3厘米（图一二，11）。

豆　1件。ⅡH1：2，夹砂黄褐陶。高圈足。素面。残高4.4、厚0.6厘米（图一二，6）。

纺轮　1件。ⅡT0401②：1，夹砂红褐陶，由残陶片磨制而成。外径约4.8、孔径约0.8、厚约0.5厘米（图一二，14）。

除以上可辨器形的标本外，还有部分不可辨器形的口沿、器腹和器底标本。



图一一　出土陶器

1～3、5、6、9、11. 陶罐（ⅡH8：2、ⅡH1：1、ⅡT0201③：2、ⅠH11：1、ⅡF1：1、ⅡF1填土：2、ⅠF1：2）
4、7、10. 鬲足（ⅡH1：5、ⅡH1：7、ⅡH1：6）　8. 鬲口沿（ⅡT0103③：3）　12. 陶瓮（ⅠF1：1）

ⅡF1填土：1，夹砂黄褐陶。圆唇，敞口。口沿外侧饰一周按窝附加堆纹。残高5.8、壁厚0.8厘米（图一二，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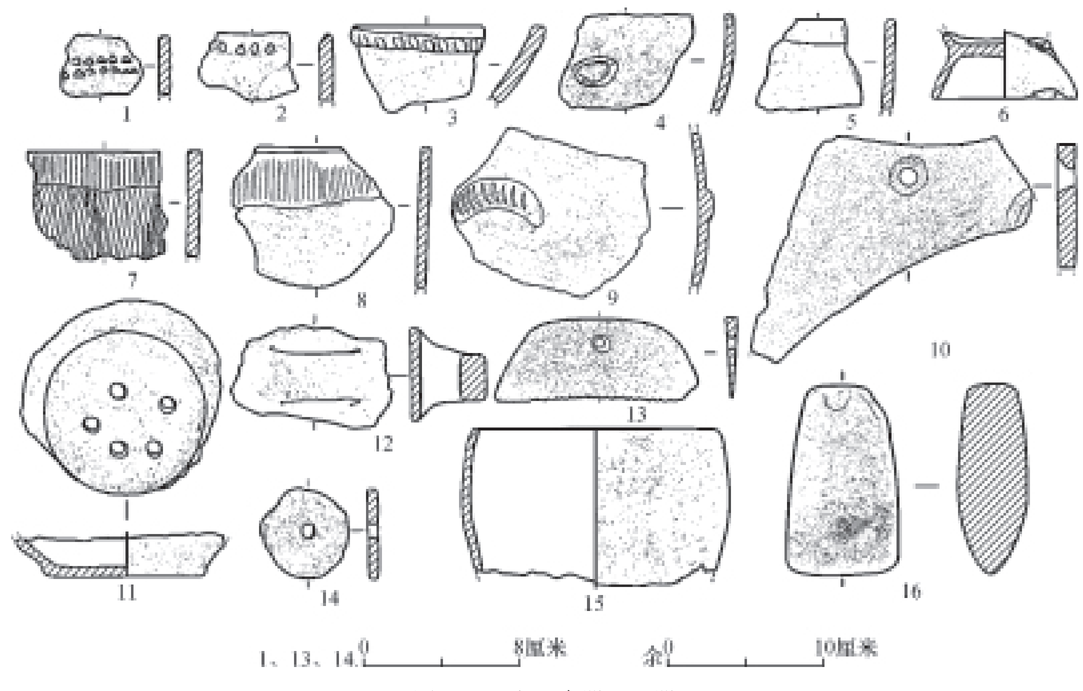
ⅡH1：3，夹砂红褐陶。方唇，外侧叠唇起泥，直口，唇外侧至器腹饰粗绳纹。残高7、厚0.7厘米（图一二，7）。

ⅡH1：4，夹砂红褐陶。方唇，外叠唇，敞口。叠唇部位饰细绳纹。残高9.3、壁厚0.6厘米（图一二，8）。

ⅡH11：2，夹砂红褐陶。圆唇，外叠唇，直口。素面。残高6、厚0.6厘米（图一二，4）。

ⅡT0301③：2，夹砂红褐陶。尖唇，侈口，沿面内斜。唇外侧饰戳印菱形纹。壁厚0.9厘米（图一二，2）。

ⅠT0302②：1，夹砂红褐陶。素面，贴附一饰按窝纹的盲耳。壁厚0.5厘米（图



图一二 出土陶器、石器

1、9. 器腹残片（ⅡT0401③：1、ⅠT0302②：1） 2～4、7、8. 口沿残片（ⅡT0301③：2、ⅡF1填土：1、ⅡH11：2、ⅡH1：3、ⅡH1：4） 5、15. 陶钵（ⅡT0301③：1、ⅡT0301③：4） 6. 豆（ⅡH1：2） 10. 石穿孔器（ⅡH1：8） 11. 甑（ⅡT0201③：1） 12. 器耳（ⅡT0301②：1） 13. 石刀（ⅡT0401③：2） 14. 纺轮（ⅡT0401②：1） 16. 石斧（ⅡH5：1）

一二，9）。

ⅡT0301②：1，夹砂红褐陶。桥形耳。残长10.7、宽6.8、厚1.8厘米（图一二，12）。

ⅡT0401③：1，夹砂红褐陶。外侧饰两周三角形按窝纹。壁厚约0.6厘米（图一二，1）。

2. 石器

石器发现数量较少，器形可见有石刀、石斧等，均为磨制。

石刀，1件。ⅡT0401③：2，周身磨制，弧背，直刃，刃部呈锯齿状。长10.8、宽4.4、厚0.6厘米（图一二，13）。

石穿孔器，1件。ⅡH1：8，由石片打磨而成，直背，刃部残，残长14.9、宽18.6、厚1.2厘米（图一二，10）。

石斧，1件。ⅡH5：1，周身磨制，平背，直刃。长12.5、宽7.4、厚4.6厘米（图一二，16）。

五、结　　语

综上所述，锡匠沟遗址出土遗存性质较为单一，应属于同一文化，其特征可归纳如下：陶器以夹砂红褐陶为主，多为素面，见有少量的附加堆纹、绳纹；器耳发达，有鸡冠耳、桥形耳、唇状耳、瘤状耳；器形有罐、瓮、鬲、钵、甑等；大件陶器如罐和瓮多为高领，小件陶器见有外叠唇。

经过对以往本地区及相邻地区青铜时代考古学遗存的梳理，结合锡匠沟遗址的文化面貌和地理位置，我们认为其与目前学术界所认识的凌河遗存有一定的相似性。凌河遗存主要分布于大、小凌河流域，其文化特征为随葬曲刃青铜短剑的墓葬、陶器口沿多呈外叠唇状。目前所发现的凌河遗存多以墓葬材料为主，居址极少，资料比较零散，见有朝阳袁台子M1[1]、朝阳十二台营子[2]、喀左和尚沟B、C、D点墓葬[3]、喀左南洞沟[4]、喀左南沟门[5]、喀左老爷庙[6]、锦西邰集屯[7]等。根据学界目前对凌河遗存的认识，其墓葬随葬品与遗址出土器物有很大的区别，因此用邰集屯出土的遗物与锡匠沟遗址相比，更为合理。两地直线距离约13千米，锡匠沟遗址出土的钵（ⅡT0103③：4）和罐（ⅡH8：2）与邰集屯小荒地古城出土的钵（T3⑤：4）和壶（T3⑤：8）相似。凌河遗存的年代一般认为是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朱永刚先生将邰集屯小荒地城址凌河遗存的年代界定为春秋至战国早期[8]。据此将锡匠沟遗址的年代界定于春秋至战国早期比较合理。

已发掘的凌河遗存材料显示：其墓葬随葬品受到辽东地区曲刃青铜短剑墓的影响，而遗址却鲜少见到此类因素。此次发掘的锡匠沟遗址表明在凌河遗存遗址中亦能看到曲刃青铜短剑遗存的因素。辽东地区的曲刃青铜短剑墓随葬陶器上可见有各种形态的器耳，如：桥形耳、瘤状耳、唇状耳等。这几种形态的器耳在锡匠沟遗址都可以见到。尤其是唇状耳，在辽西地区之前的考古学文化中几乎未见，而在锡匠沟遗址唇状耳与辽西地区常见的鸡冠耳共存于一件陶器上，从侧面说明了辽东文化与辽西文化在本地区的有机结合。

辽西走廊地处辽西文化核心区东部边缘，在周代以前与燕山以南文化交流较多。从西周中晚期开始，先是受到辽东半岛曲刃青铜短剑文化的影响。到春秋至战国早期，随着燕文化的北上，这一地区最先接受了燕文化的影响。凌河遗存在年代上正好处于西周中晚期至战国早期这一辽西走廊历史巨变的时代。此次锡匠沟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凌河遗存以及燕文化到来之前的辽西地区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考古学材料。

附记：本次参与发掘人员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褚金刚、李霞、马红光，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崔蕾、尹世丹，遗迹和遗物线图由马红光绘制。

执笔：褚金刚* 崔蕾** 苏军强*

注　释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朝阳袁台子［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
［2］ 朱贵. 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J］. 考古学报，1960（1）.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喀左和尚沟墓地［J］. 辽海文物学刊，1991（2）.
［4］ 辽宁省博物馆等. 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椁墓［J］. 考古，1977（6）.
［5］ 郭大顺. 试论魏营子类型［A］. 考古学文化论集［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6］ 刘大志，柴贵明. 喀左老爷庙乡青铜短剑墓［J］. 辽海文物学刊，1993（3）.
［7］ 吉林大学考古学系，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锦西市邰集屯小荒地秦汉古城址试掘简报［J］ 考古学集刊（第11辑），1997.
［8］ 朱永刚. 锦西邰集屯小荒地出土的曲刃青铜短剑与屠何故城［J］. 文物春秋，2000（1）.

The Excavation Report of The Xijianggou Site in Jinzhou Liaoning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of Jinzhou City

Abstract: During August of 2012,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unearthed the Xijianggou Site. The excavated site confirmed Xijianggou as a Linghe Culture period of human residence. The excavation of the site has important significance to the future study the Linghe Culture.

Key words: Liaoning; Xiaoling River Basin; Xijianggou Site; Linghe Cultur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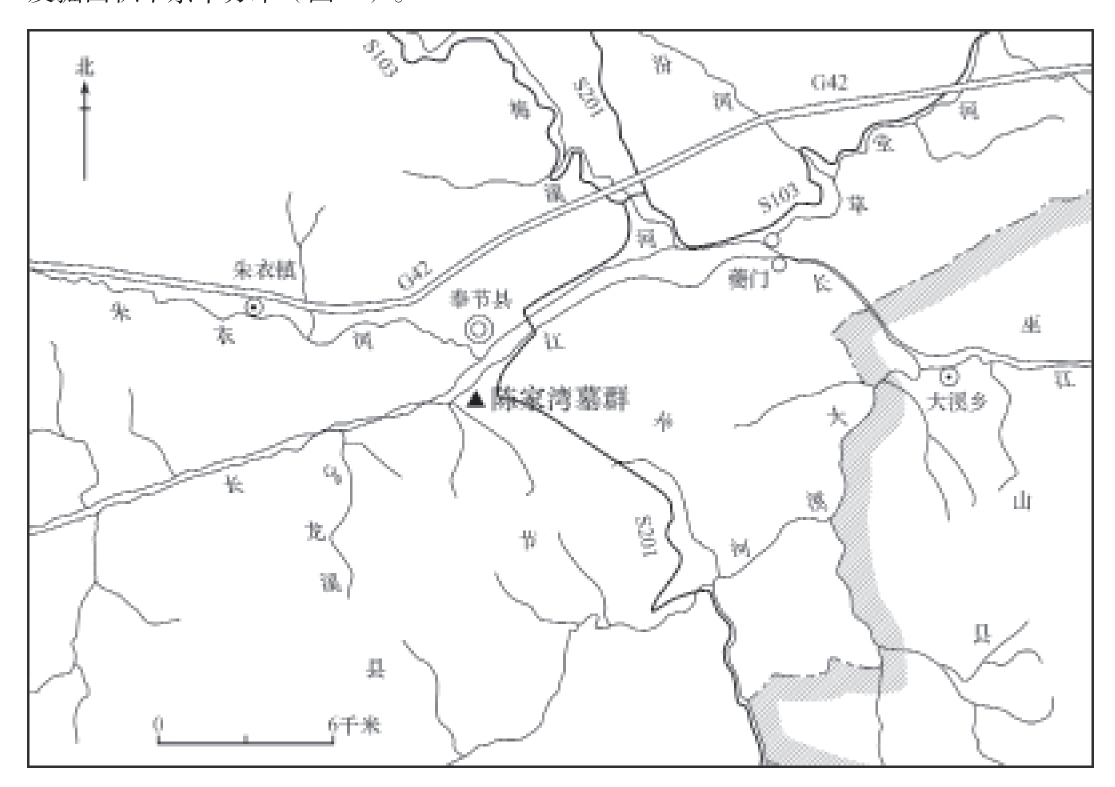
*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 锦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2016重庆奉节陈家湾墓群发掘简报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

（1. 重庆，400013；2. 北京，100872）

陈家湾墓群位于重庆市奉节县永乐镇陈家村2组，分东西二区，东西两区相距约1.9千米，东区位于木瓜溪与长江交汇口南岸，向北与奉节县城隔江相望，相距约1.2千米；西区与2015年奉节赵家湾墓群分别位于长江南北两岸，相距约1千米，向东与陈家村相距约900米，中心坐标为109°28′E，30°0′N，海拔146～160米。2016年7月至9月，为配合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的文物保护工作，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共布正北向20×20平方米探方6个，10×10平方米探方1个，发掘面积千余平方米（图一）。



图一　陈家湾墓群位置图

陈家湾墓群分布于长江南岸的峭壁和坡地上，因长期受江水冲刷，致使大量生土及山体岩石暴露在外，仅在局部残存有淤积的泥沙，并包含有较多的植物根茎、石块以及移民搬迁遗留的现代建筑垃圾。按照其分布特点可分为东西二区，东区为坡地，西区是地势陡峭的悬崖。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6座，其中土洞墓分布于东区，1座；崖墓集中在西区，共15座。出土随葬器物62件，以陶器为主，另有铜钱、铁棺钉（图二）。

现将具体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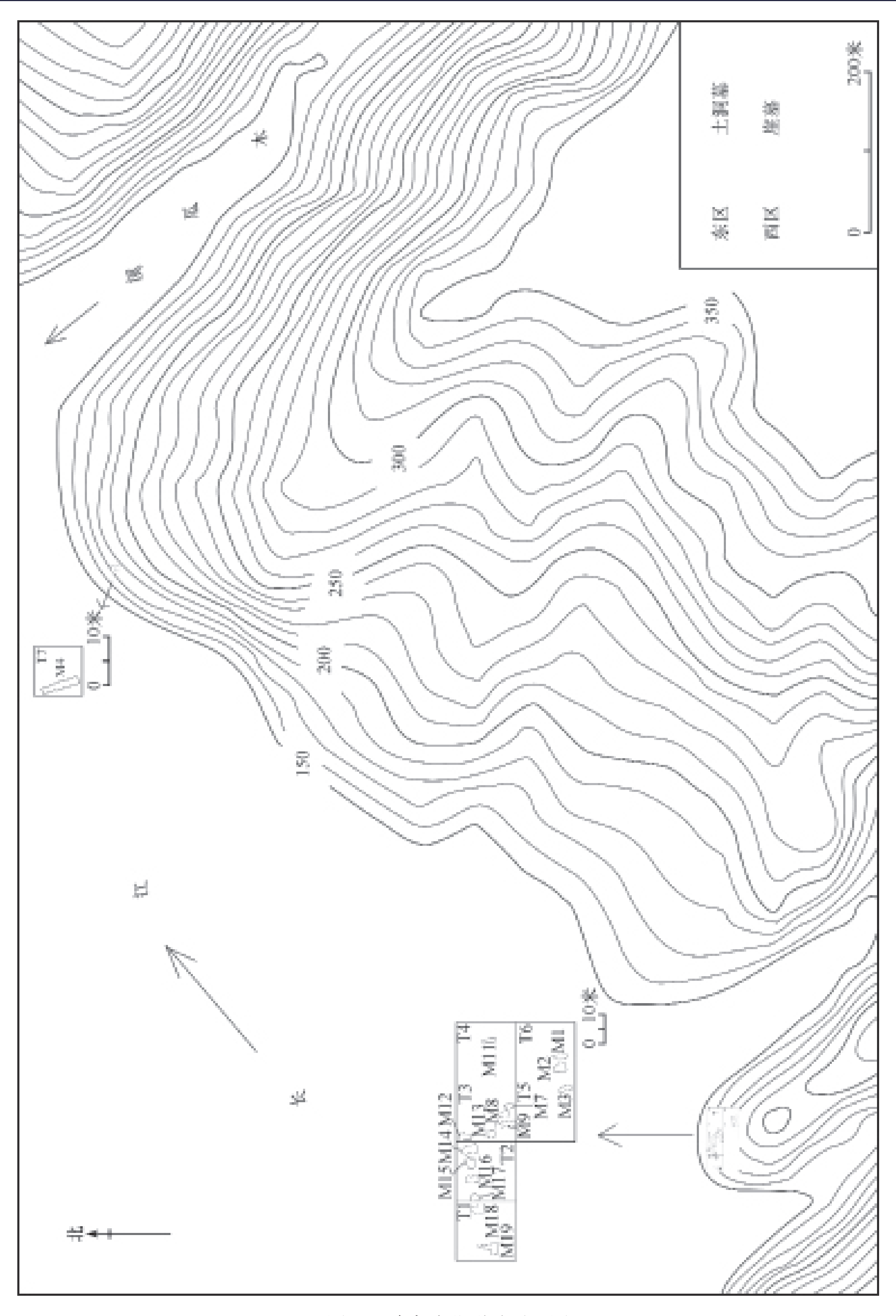
一、土　洞　墓

共1座，为M4。M4已被盗掘，盗洞内遗留有陶片，且由于现代人类种植活动和土石坍塌已将上层扰乱，墓顶遭到破坏。M4为长方形土洞墓，方向342°。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构成，保存较为完整。墓道呈斜坡状，坡度缓，长260、宽114～120、深82厘米。甬道呈斜坡状，坡度较陡，长210、宽158～164、深110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12、宽152～162厘米。墓室为拱顶，底部较平，高110～120厘米。墓室后部西侧残存部分人骨，可辨为股骨、胫骨和尾椎骨。人骨两侧出土少量铜钱，以及陶钵、陶罐残片，可修复陶钵3件，陶罐1件（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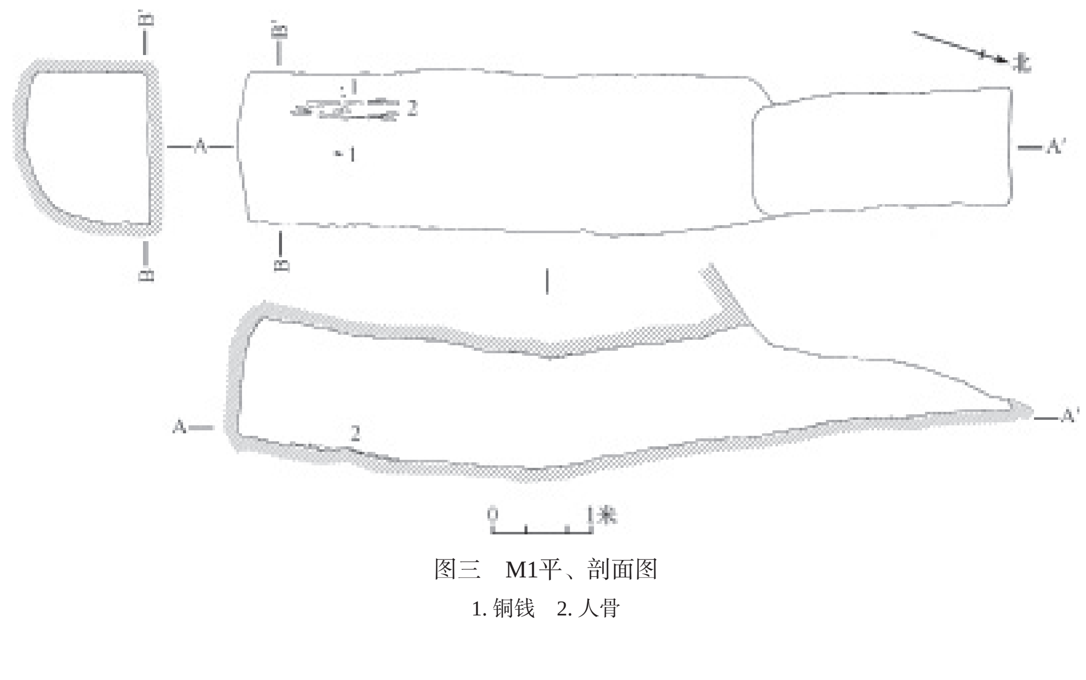
陶钵　3件。M4：2，灰陶。敞口，方唇，弧腹，平底。通高5.5、深4.7、口径15.2、底径6.3、器壁厚0.6厘米（图二〇，2）。M4：3，灰陶。敛口，圆唇，斜弧腹，平底，内部有螺旋状棱。通高6.6、深6、口径15.4、底径6.6、器壁厚0.6厘米（图二〇，3）。M4：4，红陶。直口，方唇，口沿下有一圈凹弦纹，弧腹，下腹部略折，平底，内部施黄褐色釉。通高6.2、深5.6、口径15.7、底径5.3、器壁厚0.7厘米（图二〇，4）。

陶罐　1件。M4：5，灰陶。敞口，方唇，圜肩，斜弧腹，平底。通高8、口径7.5、腹径13.1、底径3.4、器壁厚0.7厘米（图一九，15）。

铜钱　M4：1，共10枚。均为“五铢”。直径2.6、孔径0.9、厚0.1厘米（图二二，10、11）。



图二　陈家湾墓群总平面图



图三　M1平、剖面图
1. 铜钱　2. 人骨

二、崖　　墓

共15座，分别为M1、M2、M3、M7、M8、M9、M11、M12、M13、M14、M15、M16、M17、M18、M19。这批崖墓分布较为密集，位于陡峭的山崖之上，由于岩体剥落，使得多数崖墓墓道不完整，甚至墓室偶有部分缺失。在江水长期冲刷及盗扰下，墓葬保存状况较差。另，M10由于墓顶坍塌严重，为安全考虑中止发掘，仅收集铜钱2枚，均为“五铢”，直径2.6、孔径0.9、厚0.1厘米（图二三，1、2）。

1. M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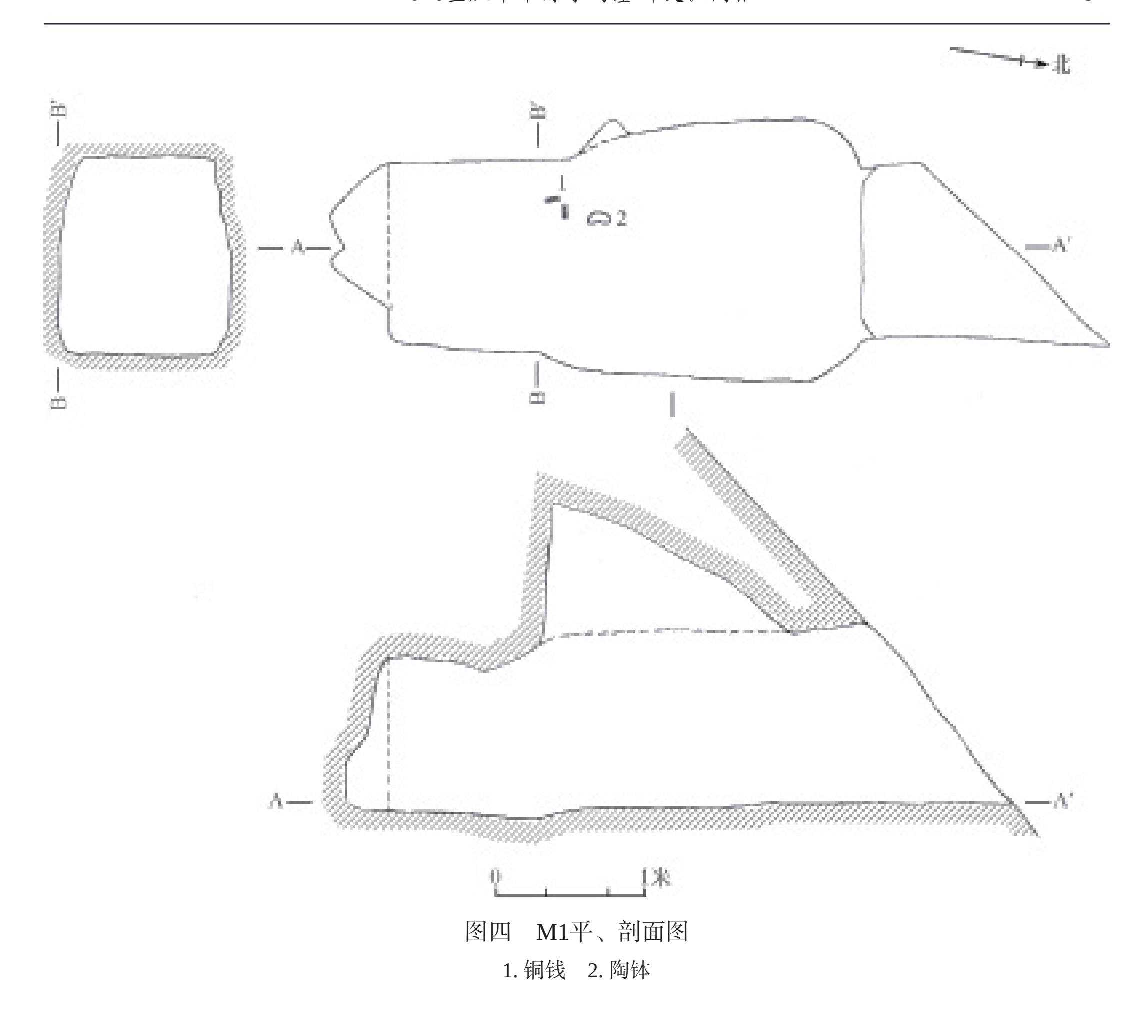
M1为近长方形崖墓，方向35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较平直，长166、宽116～118、深126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60、宽122～18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96～114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墓室中部出土少量铜钱及陶钵残片（图四）。

陶钵　1件。M1：2，灰陶。敞口，折沿尖唇，颈微束，弧腹，平底。通高7.4、深6.4、口径16.8、沿宽1、底径8.1、器壁厚1.2厘米（图一九，23）。

铜钱　M1：1，26枚，均为“五铢”。一种直径2.6、孔径0.9、厚0.2厘米；一种直径2.5、孔径0.9、厚0.2厘米（图二二，1～3）。

2. M2

M2为“凸”字形崖墓，方向345°，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呈斜坡状，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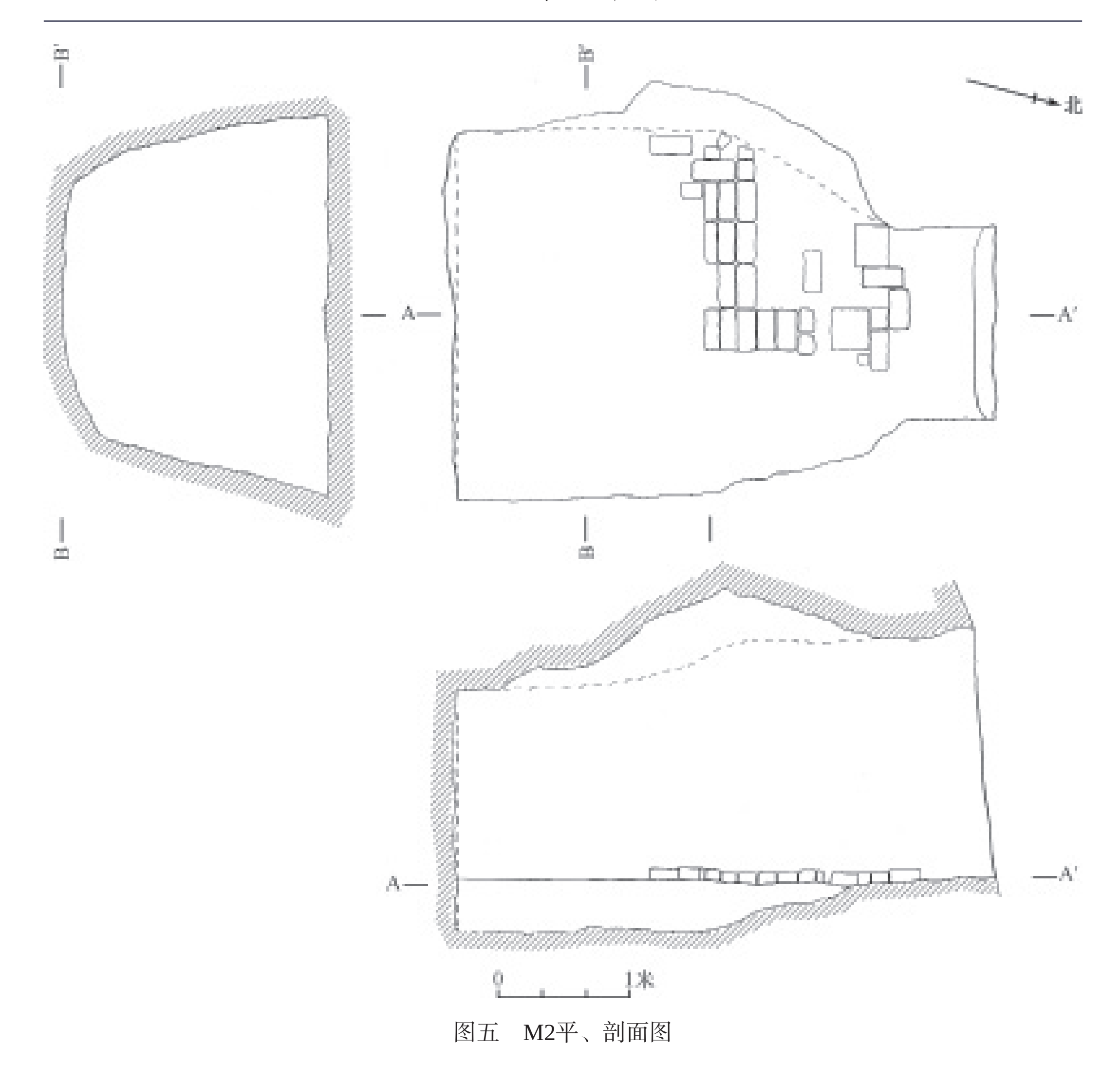
图四　M1平、剖面图
1. 铜钱　2. 陶钵

度缓，长90、宽150、深190厘米。墓室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340、宽260～28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陡，高150～180厘米，墓底中部残余部分墓砖，砖长30、宽14、厚10厘米。墓室后壁开凿痕迹明显。不见葬具及人骨。填土中出土一枚铜钱（图五）。

铜钱　M2：1，1枚，为“宽永通宝”。直径2.3、孔径0.5、厚0.1厘米（图二二，4）。

3. M3

M3为近长方形崖墓，方向35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较平直，长170、宽122～124、深336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00、宽130～144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10～172厘米。墓室中部残存少量人骨，可辨为股骨、尺骨。墓室与墓道相交处西侧随葬6件陶器，包括鼎、壶、罐、灶和陶器盖。人骨西侧随葬少量铜钱。陶灶未能修复（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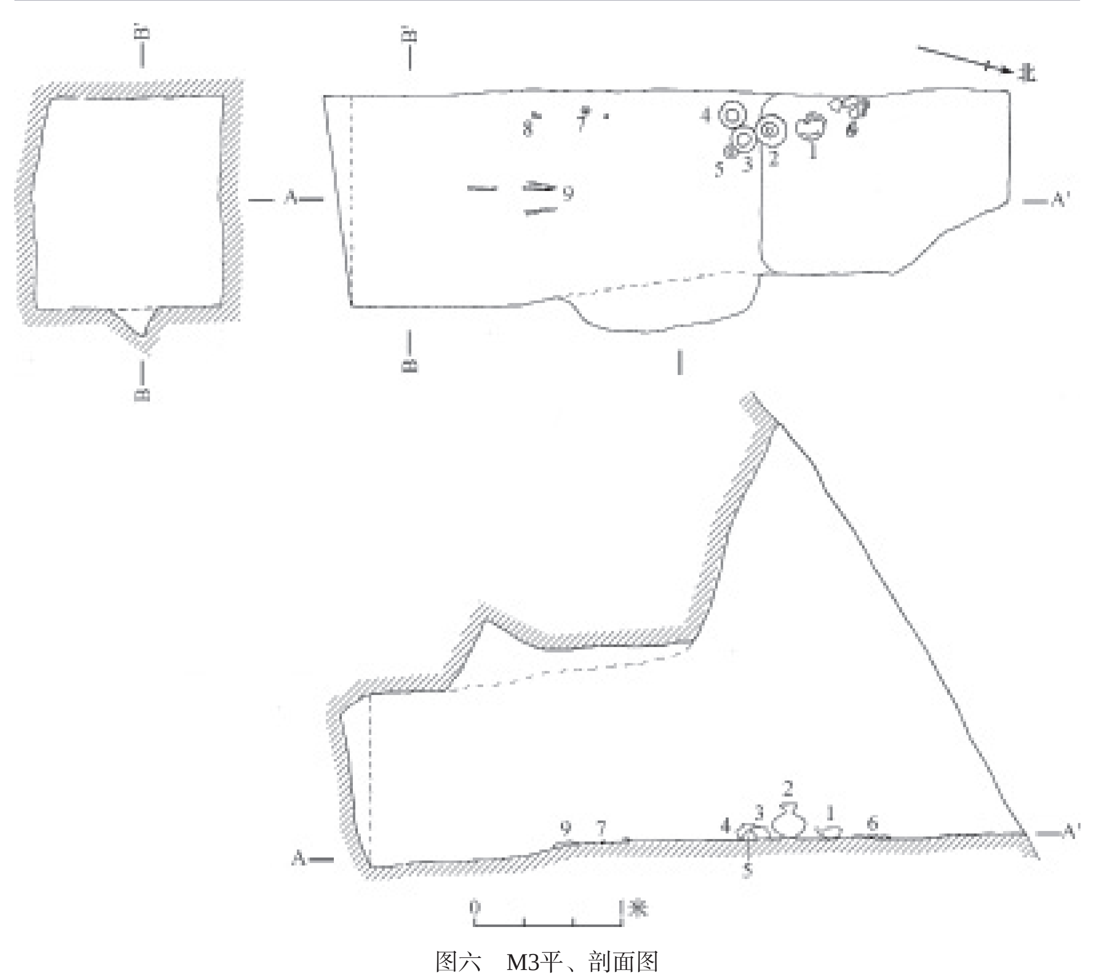


图五　M2平、剖面图

陶鼎　1件。M3∶1，灰陶。子母口，圆唇，弧腹，圜底近平，三足。通高9.2、深7.4、口径15.3/17.8、器壁厚0.7厘米（图一九，21）。

陶壶　2件。M3∶2，灰陶。敞口，尖唇，束颈，圜肩，鼓腹，圜底，高圈足。颈部及肩部各装饰有两道凹弦纹，两侧各有一铺首，腹部饰有一道凹弦纹。通高25.1、深21.9、口径13、腹径23.6、圈足径15.7、圈足深2.6～3.2、圈足厚0.7、器壁厚0.6厘米（图二〇，1）。M3∶5，灰陶。敞口，圆唇，束颈，鼓腹，圜底。通高6.2、深5.6、口径5.3、腹径7.3、器壁厚0.3～0.5厘米（图二一，11）。

陶罐　2件。M3∶3，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圜肩。肩腹部有两道凸弦纹，斜弧腹，平底，底部有一孔。通高10.4、深9.9、口径9.1、腹径15.9、底径6.9、底部孔长0.7、宽0.3、器壁厚0.5厘米（图一九，1）。M3∶4，灰陶。敞口，圆唇，束颈，圜肩，平底。肩部饰有一道凹弦纹，弧腹，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11.6、深10.8、口径



图六　M3平、剖面图

1. 陶鼎　2、5. 陶壶　3、4. 陶罐　6. 陶灶　7. 器盖　8. 铜钱　9. 人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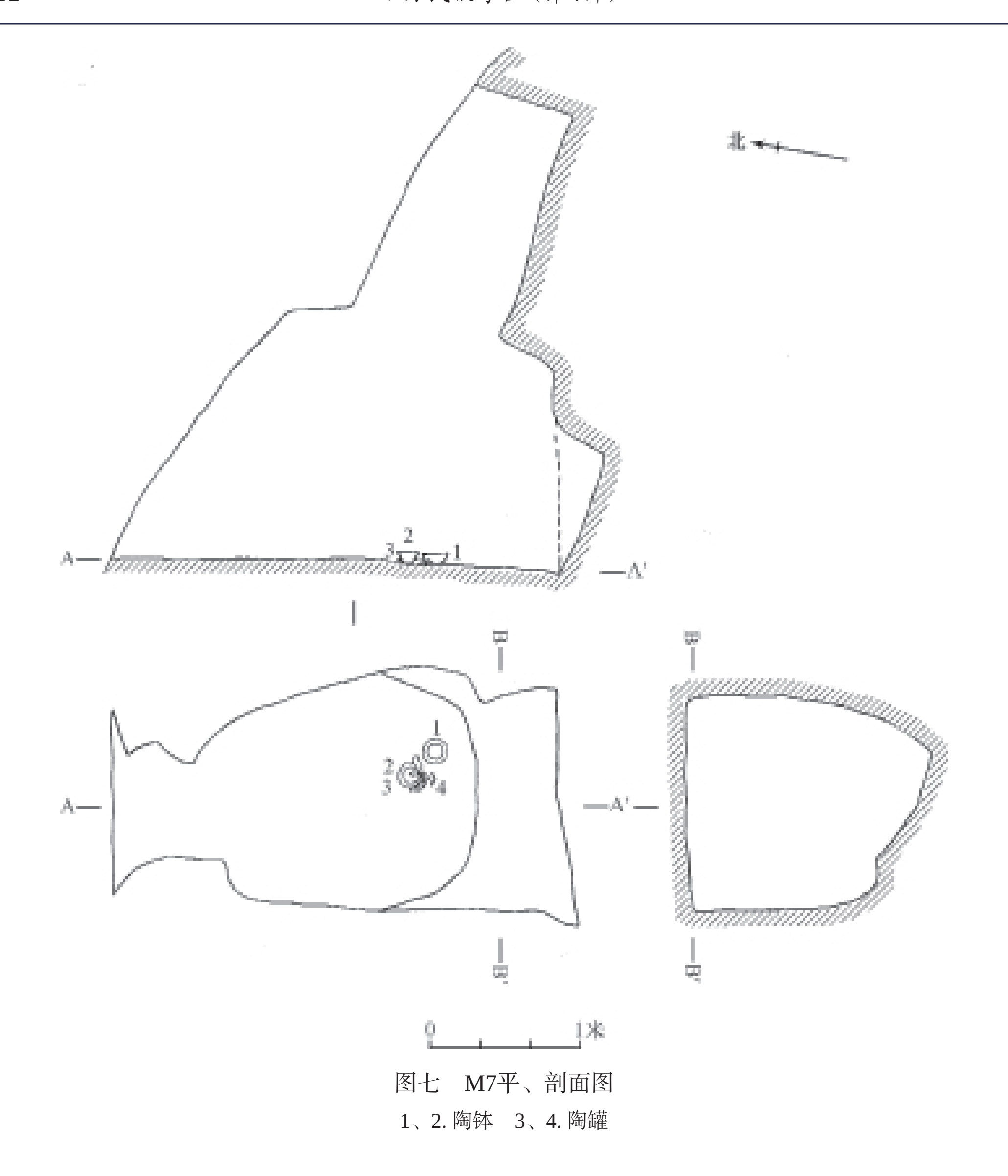
9.5、腹径16.8、底径7.4、器壁厚0.6厘米（图一九，2）。

器盖　1件。M3：7，灰陶。器盖呈弧形，边缘略外撇，盖顶有一菌状纽，底沿为方唇。通高6.8、深3.2、底径12.4、底沿厚0.6厘米（图二一，3）。

铜钱　M3：8，共13枚。一种为“五铢”，直径2.6、孔径0.9、厚0.2厘米；一种为“货泉”，直径2.2、孔径0.9、厚0.1厘米；一种为“大泉五十”，直径2.6、孔径0.9、厚0.2厘米（图二二，5～9）。

4. M7

M7为不规则长方形崖墓，方向35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较平直，长50、宽140～160、深80厘米。墓室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长250、宽62～164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7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墓室中部随葬陶钵2件、陶罐2件（图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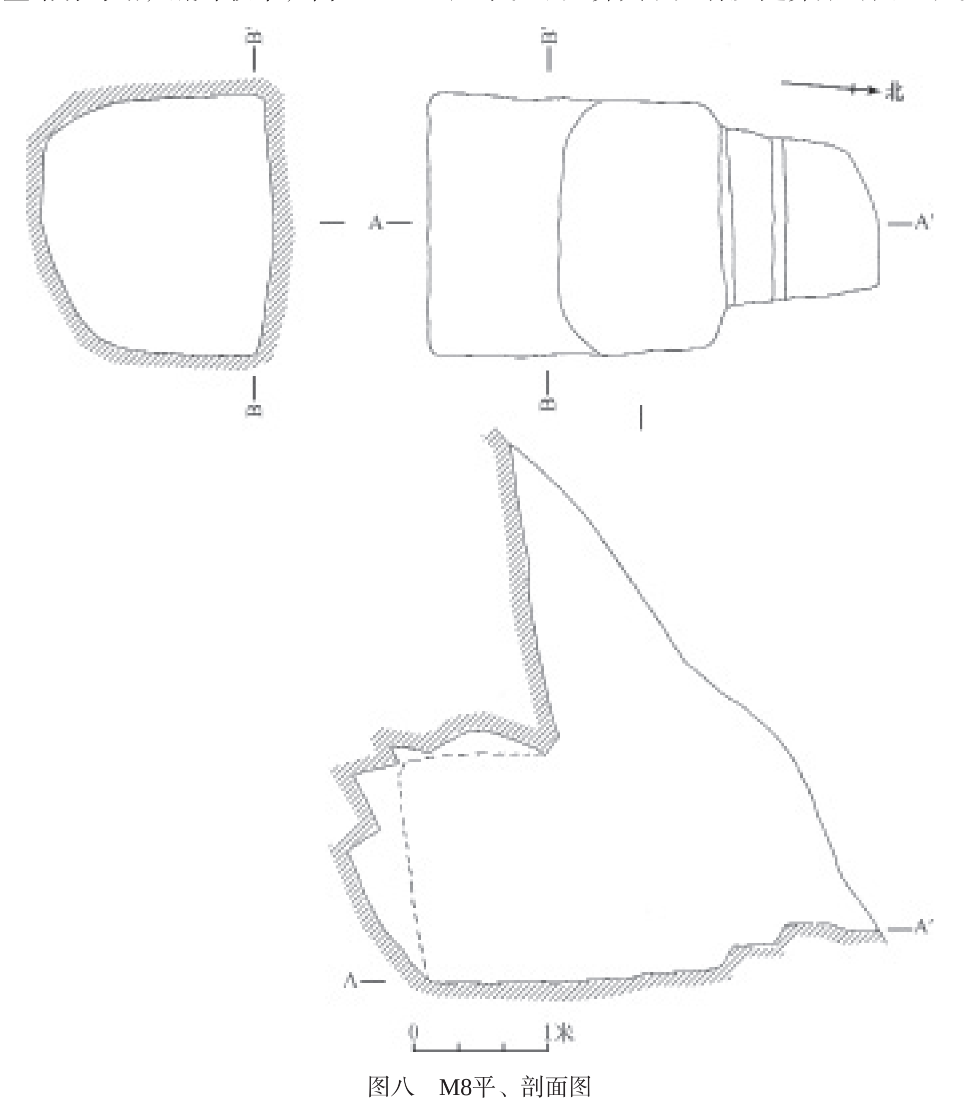
图七　M7平、剖面图
1、2. 陶钵　3、4. 陶罐

陶钵　2件。M7：2，灰陶。敞口，圆唇，折腹，平底略内凹。通高7.7、深7、口径15、底径4.9、器壁厚0.6厘米（图二〇，7）。M7：1，灰陶。敞口，圆唇，折腹，平底略内凹。底部饰一圈凹弦纹。通高6.3、深5.5、口径15.6、底径6.6、器壁厚0.8厘米（图二〇，13）。

陶罐　2件。M7：3，灰陶。直口，高领，方唇，折肩，直腹微鼓，平底。腹部饰网格纹。通高22.4、口径12.9、腹径19.1、底径13.3、器壁厚0.8厘米（图二一，10）。M7：4，灰陶。直口，高领，方唇，圜肩，弧腹，平底。肩腹部饰网格纹。通高19.4、深18.8、口径14.6、腹径22.6、底径12、器壁厚0.6厘米（图二一，12）。

5. M8

M8为“凸”字形崖墓，方向355°，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呈斜坡状，坡度缓，墓口处有两级台阶。墓道长120、宽100～130、深40厘米。台阶长120～123、宽10、高14～16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20、宽180～20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60～190厘米。不见葬具、人骨及随葬品（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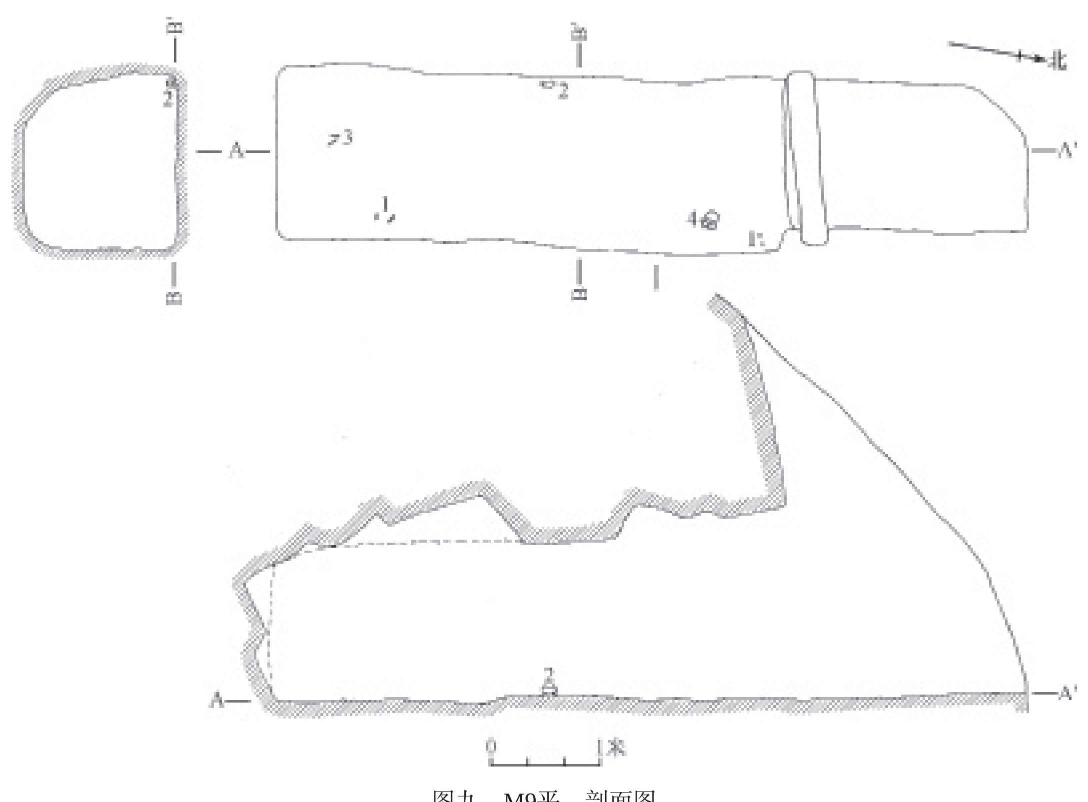


图八　M8平、剖面图

6. M9

M9为近长方形崖墓，方向35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较平直，长190、宽134～140、深350厘米。墓道与墓室连接处有浅凹槽，可能有木质墓门，现已无存。

凹槽长160、宽20、深4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460、宽152～16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46～15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仅残留有铁棺钉4枚。墓室中部西侧随葬陶狗1件，东侧随葬少量铜钱。填土中出土有陶片，可辨器型有陶甑（图九）。



图九　M9平、剖面图
1. 铜钱　2. 陶狗　3. 铁棺钉　4. 陶甑

陶狗　1件。M9：2，呈立姿，张嘴龇牙，双耳竖起，尾巴上卷，腹部封闭。通高9.5、长14.2厘米（图二一，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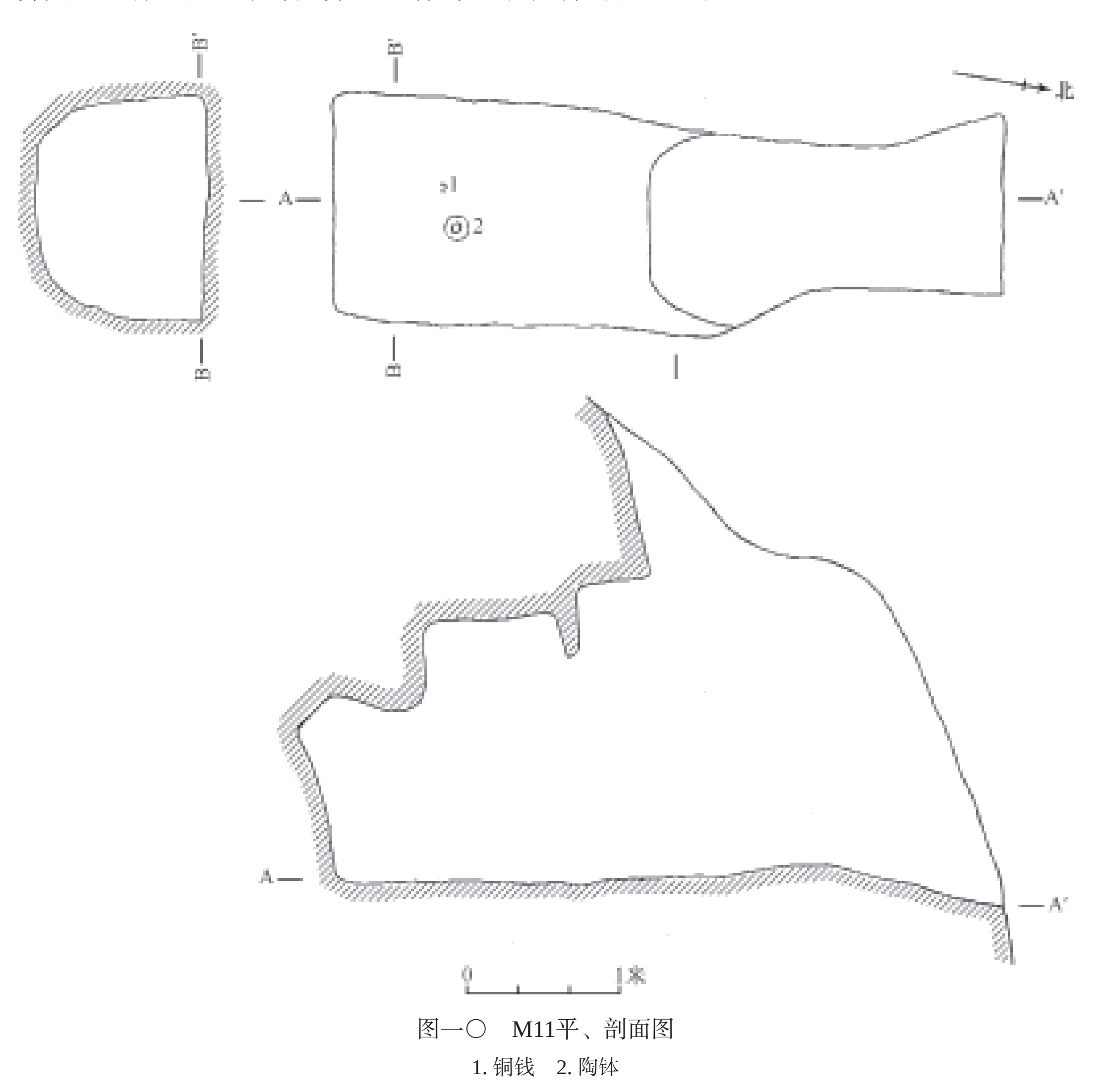
陶甑　1件。M9：4，灰陶。敞口，折沿尖唇，束颈，弧腹，平底。肩腹部有两道凹弦纹，底部有四个甑孔。通高7.4、深6.6、口径15.9、底径4、甑孔孔径0.4、器壁厚0.8厘米（图二一，2）。

铜钱　M9：1，共68枚，均为“五铢”。一种直径2.5、孔径0.9、厚0.1厘米；一种直径2.7、孔径1、厚0.1厘米；一种直径2.2、孔径1、厚0.1厘米（图二二，12～18）。

棺钉　4枚。M9：3，铁制，一枚长18.8、宽1.6、厚0.8厘米；一枚长6.8、宽2、厚0.6厘米；一枚长10.4、宽2.2、厚0.6厘米；一枚长8.7、宽1、厚0.6厘米（图二一，9）。

7. M11

M11为近长方形崖墓，方向35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保存较为完整。墓道呈斜坡状，坡度陡，长190、宽98～118、深320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50、宽124～15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20～18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墓室中部随葬少量铜钱和陶钵1件（图一〇）。



图一〇 M11平、剖面图
1. 铜钱 2. 陶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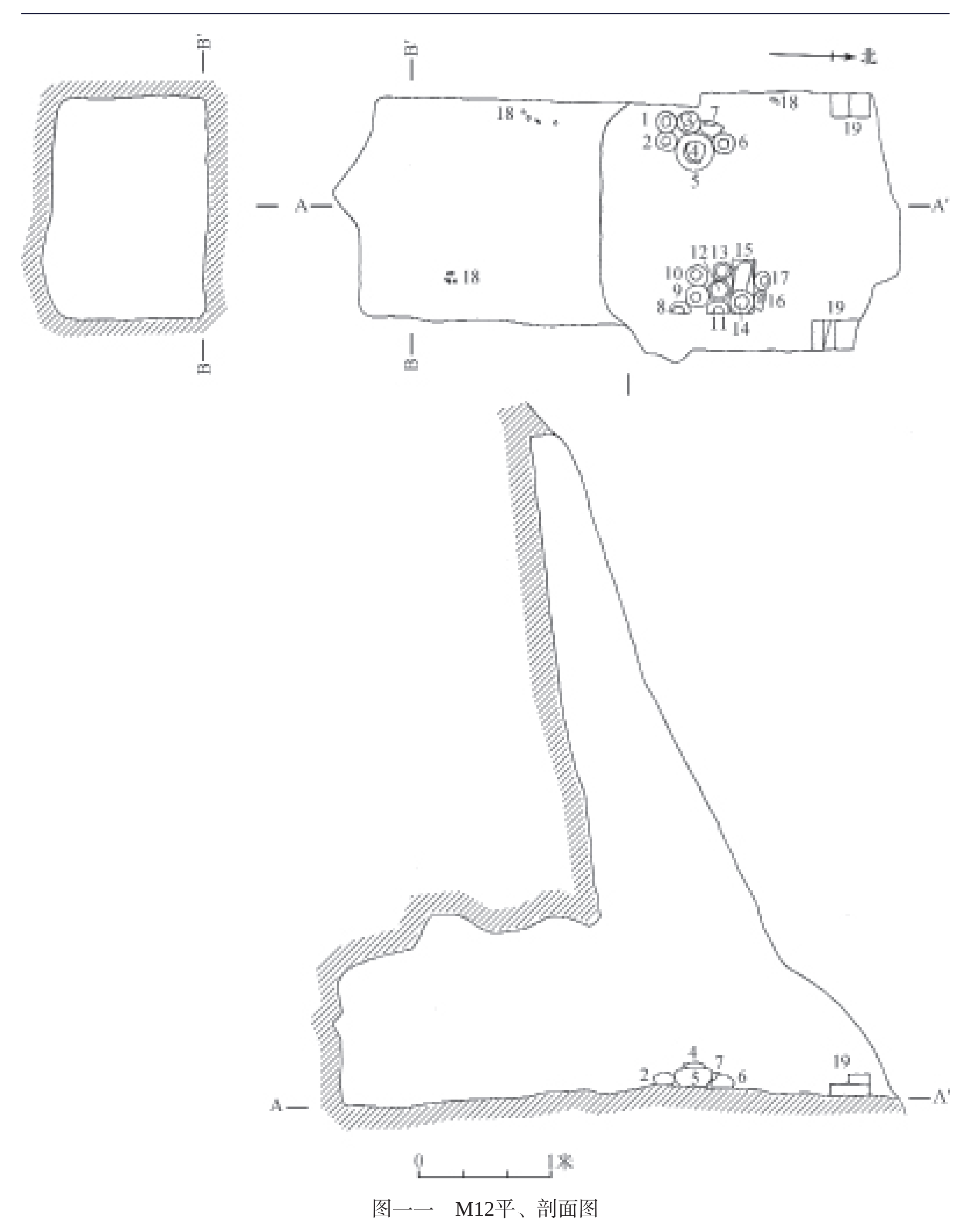
陶钵 1件。M11：2，灰陶。敞口，圆唇，弧腹，下腹略折，平底。下腹部有两道凹弦纹。通高7.5、深7.1、口径15.9、底径5.4、器壁厚0.4厘米（图二〇，6）。

铜钱 M11：1，8枚，均为“五铢”。大小相同。直径2.5、孔径0.9、厚0.1厘米（图二三，3～6）。

8. M12

M12为近长方形崖墓，方向358°，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较平直，长230、宽190～200、深490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184、宽162～170厘米。墓道口东西两侧残存墓砖，厚8厘米，菱形方格纹。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12～132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墓道西侧随葬6件陶罐、1件陶钵，东侧随葬7件陶罐、1件陶钵、1件陶灶、1件陶甑以及少量铜钱，墓室东西两侧也随葬少量铜钱。陶灶未能修复（图一一）。

陶罐　13件。M12：1，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颈部饰一道凸弦纹，肩部饰两道凹弦纹，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11.3、深11、口径9.6、腹径16.4、底径7.4、器壁厚0.4厘米（图一九，3）。M12：2，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11.8、深11.6、口径8.6、腹径15.8、底径7.6、器壁厚0.4厘米（图一九，4）。M12：3，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肩部饰一道凹弦纹，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11.6、深10.6、口径8.8、腹径16.3、底径6、器壁厚0.9厘米（图一九，5）。M12：4，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圜肩，斜弧腹，平底。通高9.7、深9.1、口径9.5、腹径14.3、底径5.8、器壁厚0.6厘米（图一九，12）。M12：5，灰陶。高领，敞口，尖唇，圜肩略折，斜弧腹，圜底。肩部饰间断绳纹，腹部及底部饰绳纹，分为六块区域，相交处交错。通高17.3、深16.5、口径10.3、腹径23.6、器壁厚1.1厘米（图二一，8）。M12：6，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颈部饰一道凹弦纹。通高9.1、深8.7、口径9.2、腹径15.5、底径5.5、器壁厚0.5厘米（图一九，6）。M12：8，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肩部饰一道凹弦纹，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9.7、深9.1、口径8.8、腹径15.5、底径5.4、器壁厚0.7厘米（图一九，7）。M12：9，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11.6、深11.2、口径9.4、腹径16.6、底径6.5、器壁厚0.6厘米（图一九，8）。M12：10，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肩部有一道凹弦纹，下腹部有斜向刮棱，底部有几何形标记。通高11.5、深10.7、口径9.3、腹径16、底径5.7、器壁厚0.8厘米（图二〇，12）。M12：11，灰陶。敞口，方唇，颈微束，圜肩，斜弧腹，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11.5、深11.1、口径9.4、腹径16.8、底径6.4、器壁厚0.5厘米（图一九，9）。M12：13，灰陶。敛口，方唇，圜肩，斜弧腹，圜底。通高7.9、深7.6、口径9.3、腹径14、器壁厚0.3厘米（图一九，20）。M12：14，灰陶。敞口，方唇，圜肩，斜弧腹，平底。肩部有三道凹弦纹，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9.8、深9.4、口径10.4、腹径15.6、底径6.2、器壁厚0.6厘米（图一九，10）。M12：17，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11.3、深10.9、口径8.3、



图一一　M12平、剖面图

1～6、8～11、13、14、17. 陶罐　7、16. 陶钵　12. 陶甑　15. 陶灶　18. 铜钱　19. 墓砖

腹径14.7、底径6、器壁厚0.6厘米（图一九，11）。

陶钵　2件。M12∶7，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斜弧腹，平底。通高7.6、深6.8、口径20.1、底径5.6、器壁厚0.8厘米（图二〇，8）。M12∶16，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斜弧腹，平底略内凹。通高6.7、深5.9、口径15.8、底径5.5、器壁厚0.8厘米（图二〇，9）。

陶甑　1件。M12∶12，灰陶。敞口，折沿，圆唇，颈微束，斜弧腹，平底。底部有15个甑孔。通高7.6、深7、口径18、底径3.6、甑孔直径0.3、器壁厚0.6厘米（图二〇，5）。

铜钱　M12∶18，共18枚，均为“五铢”。大小相同。直径2.6、孔径0.9、厚0.2厘米（图二三，7～10）。

9. M13

M13为长方形崖墓，方向0°，仅存墓室部分，保存不完整。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34、宽232～245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垮塌严重，底部较平，高100～11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少量铜钱（图一二）。

铜钱　M13∶1，共5枚，均为“五铢”。其中两枚直径2.5、孔径0.9、厚0.1厘米；两枚直径2.2、孔径0.9、厚0.1厘米；一枚残，不可测（图二三，11～14）。

10. M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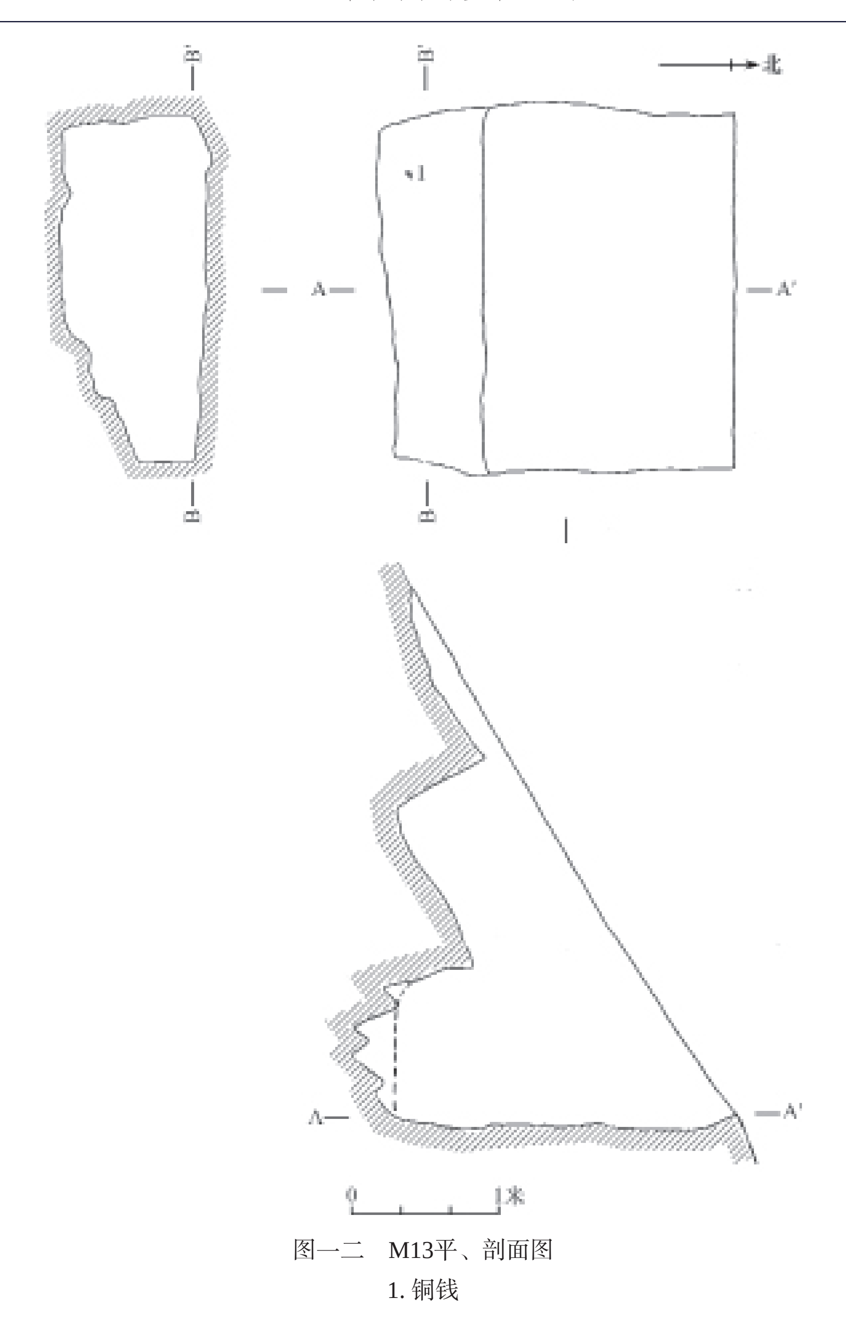
M14为“凸”字形崖墓，方向35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其中墓室保存较为完整。墓道较平直，长80、宽134～160、深216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420、宽290～32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76～20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亦不见随葬品（图一三）。M14和M15墓室之间有一洞相通，但该洞应属于自然坍塌形成，并非人工开凿。

11. M15

M15为“凸”字形崖墓，方向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呈斜坡状，坡度缓，长120、宽130～150、深150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80、宽220～33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70～195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墓口西侧出土随葬陶器4件，其中，陶钵1件、陶灯1件、陶器盖1件、陶勺1件（图一四）。

陶勺　M15∶1，红陶。勺面呈桃形，敞口，圆唇，弧腹，平底。柄部留有指窝纹，器内壁施黄褐色釉。高2.7、长7.1、宽7、底径4、器壁厚0.4厘米（图二一，1）。

陶灯　M15∶2，红陶。灯盘为敞口、圆唇、斜弧腹，短柄，喇叭状灯座，器表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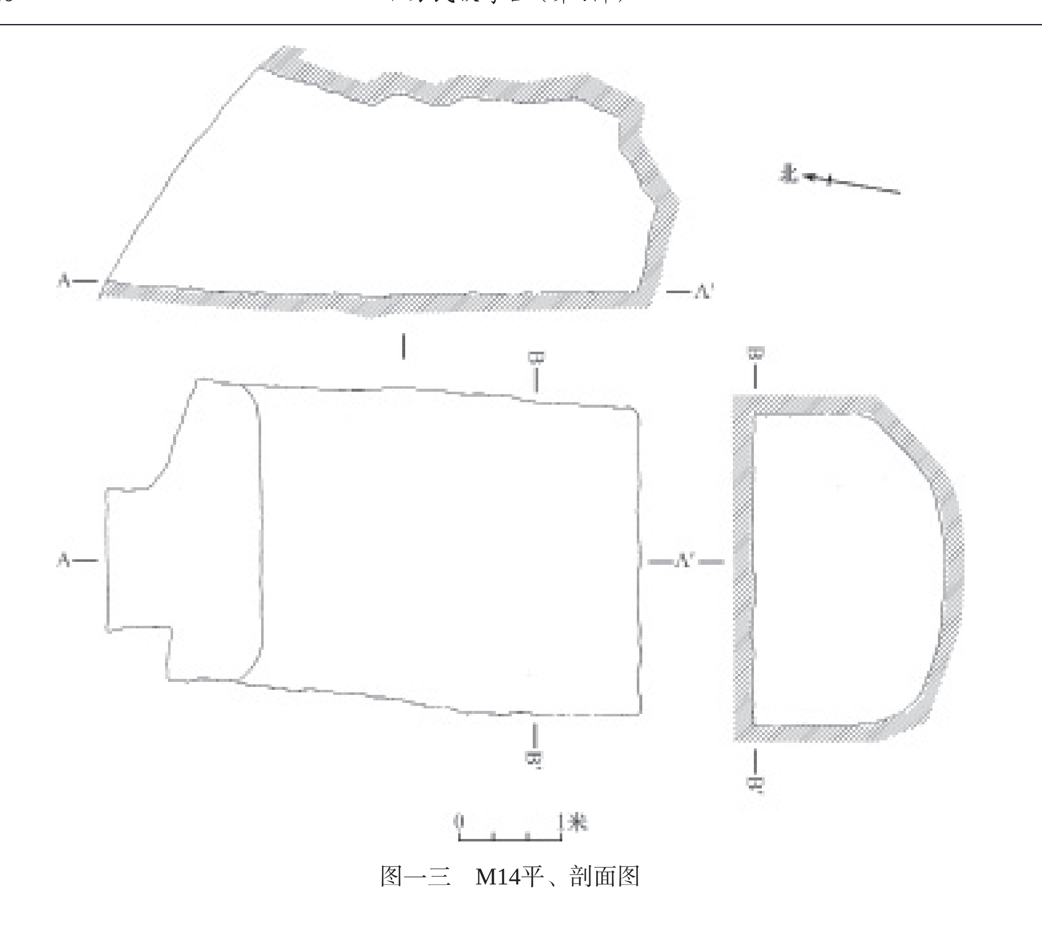


图一二　M13平、剖面图
1. 铜钱

灯盘内施釉。通高10.1、灯盘口径9.1、灯盘深2.9、底座直径11.2、底座深5.9/3.8，内孔直径1.8、口沿厚0.6、底座壁厚0.6厘米（图二〇，14）。

陶钵　M15：3，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弧腹，下腹略折，平底。通高7.2、深6.3、口径16.5、底径5.8、器壁厚0.7厘米（图二〇，10）。

器盖　M15：4，红陶。盖面呈博山状，器盖上有6个气孔，边缘饰有一圈三角纹，器表施黄褐色釉。高5.3、底径11.4、底面壁厚约0.9、底面深4.6厘米（图二一，5）。



图一三　M14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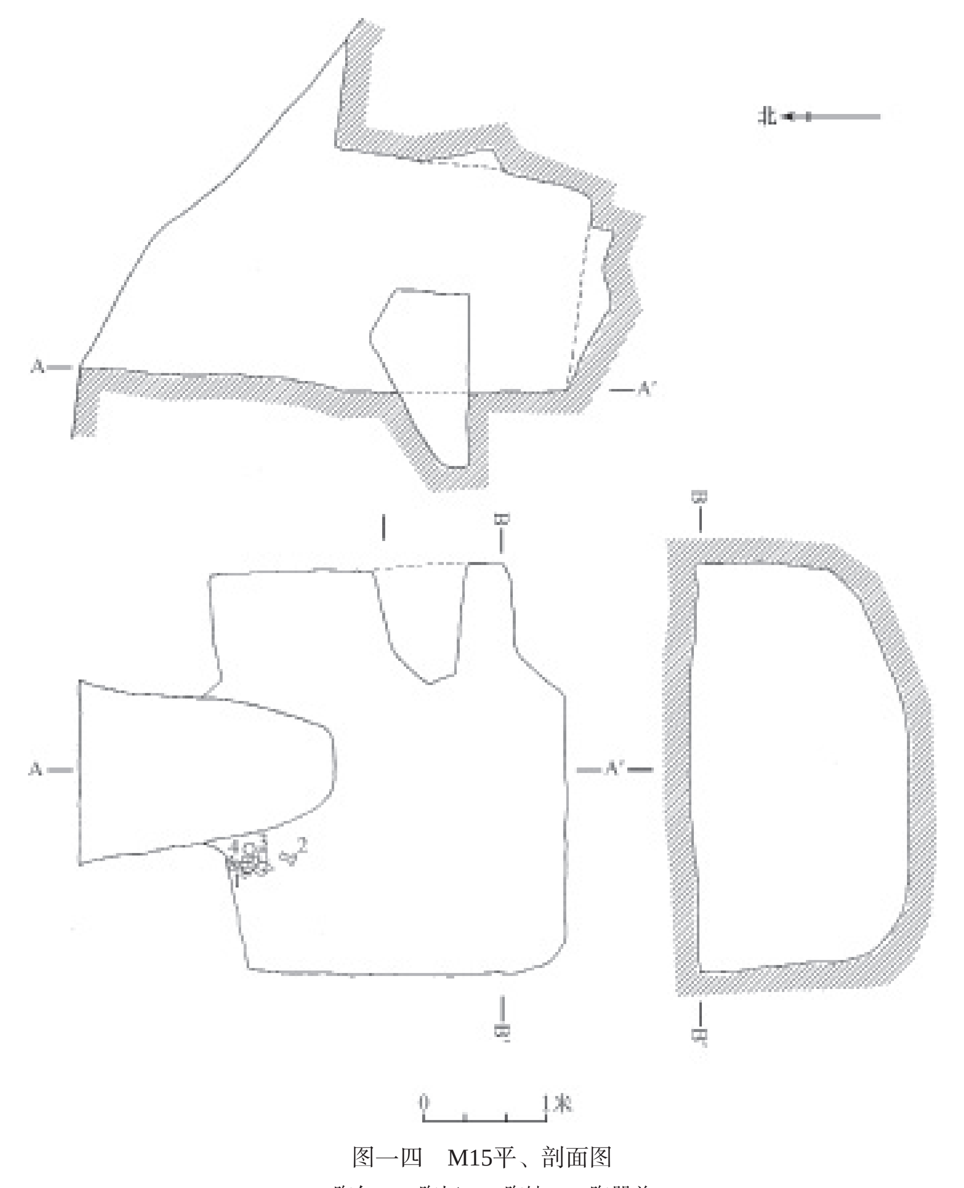
12. M16

M16为“凸”字形崖墓，方向4°，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平直，长210、宽158～174、深430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30、宽240～25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50～183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少量铜钱，在墓道处残留1块墓砖，长44、宽17、高8厘米，带榫卯，榫卯部分朝外，为菱形方格纹（图一五）。

铜钱　M16：1，共17枚，均为“五铢”。一种直径2.6、孔径1、厚0.1厘米；一种直径2.4、孔径1、厚0.1厘米（图二三，15～18）。

13. M17

M17为“凸”字形崖墓，方向0°，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道呈斜坡状，坡度缓，长50、宽90～160、深60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50、宽180～22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10～172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亦不见随葬品（图一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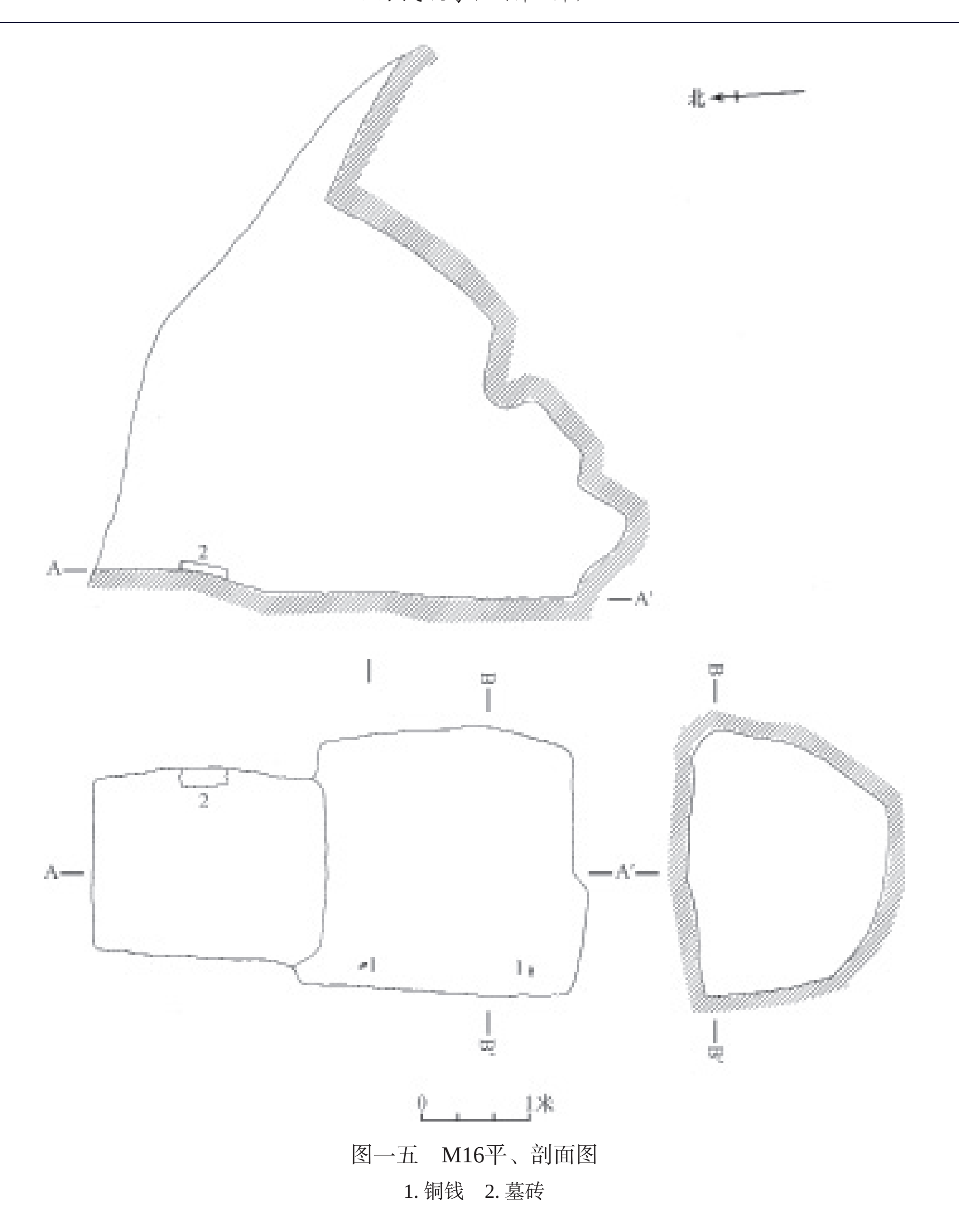
图一四　M15平、剖面图

1. 陶勺　2. 陶灯　3. 陶钵　4. 陶器盖

14. M18

M18为刀把形崖墓，方向5°，由墓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保存较为完整。墓道较平直，长170、宽160～180、深420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52、宽280～300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10～14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墓室近后壁处中部随葬少量铜钱（图一七）。

铜钱　M18：1，8枚，均为“五铢”。一种直径2.5、孔径0.9、厚0.2厘米；一种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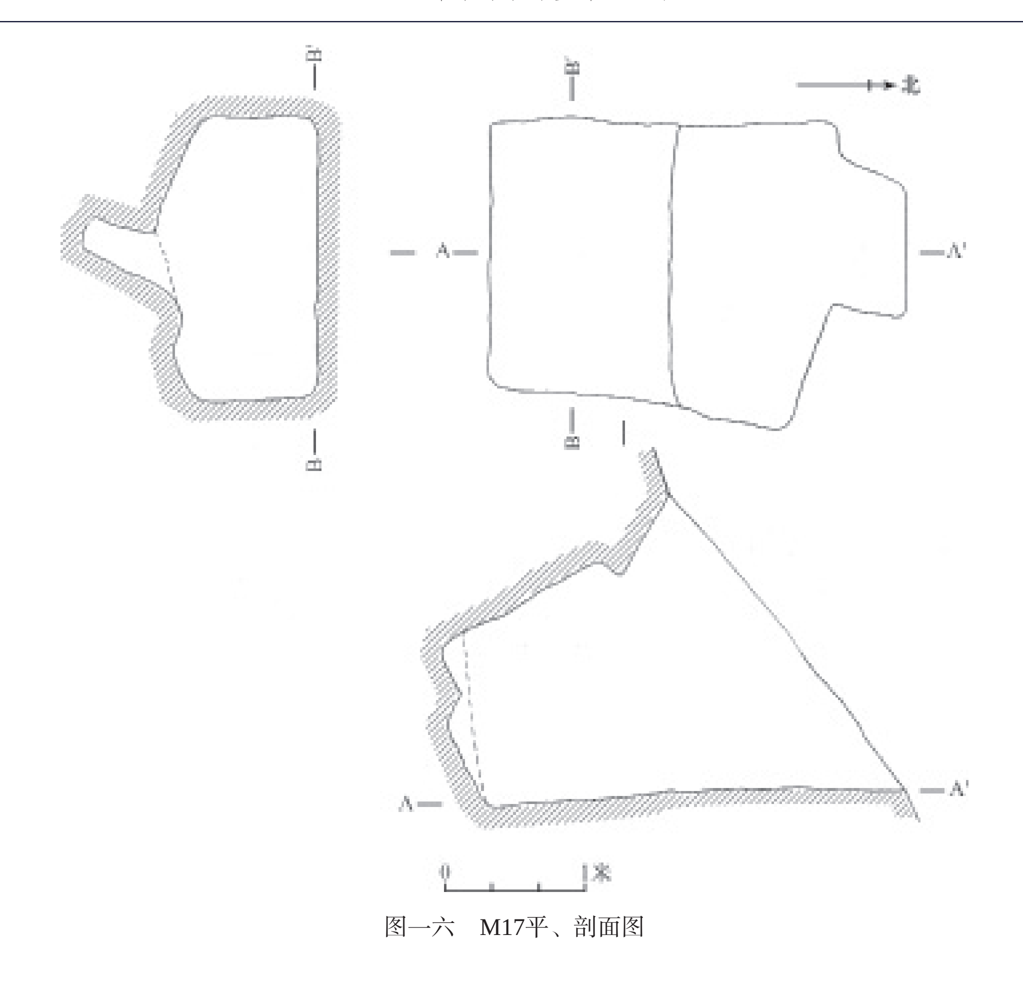


图一五　M16平、剖面图
1. 铜钱　2. 墓砖

径2.2、孔径1、厚0.1厘米（图二四，1～3）。

15. M19

M19为“凸”字形崖墓，方向10°，由墓道、甬道和墓室三部分构成，保存较为完整。墓道呈斜坡状，坡度陡，长232、宽82～90、深360厘米。甬道呈斜坡状，较平直，长210、宽152～160、深154厘米。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40、宽394厘米。墓室为拱顶，顶部和墓壁略有垮塌，底部较平，高120～18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M19甬道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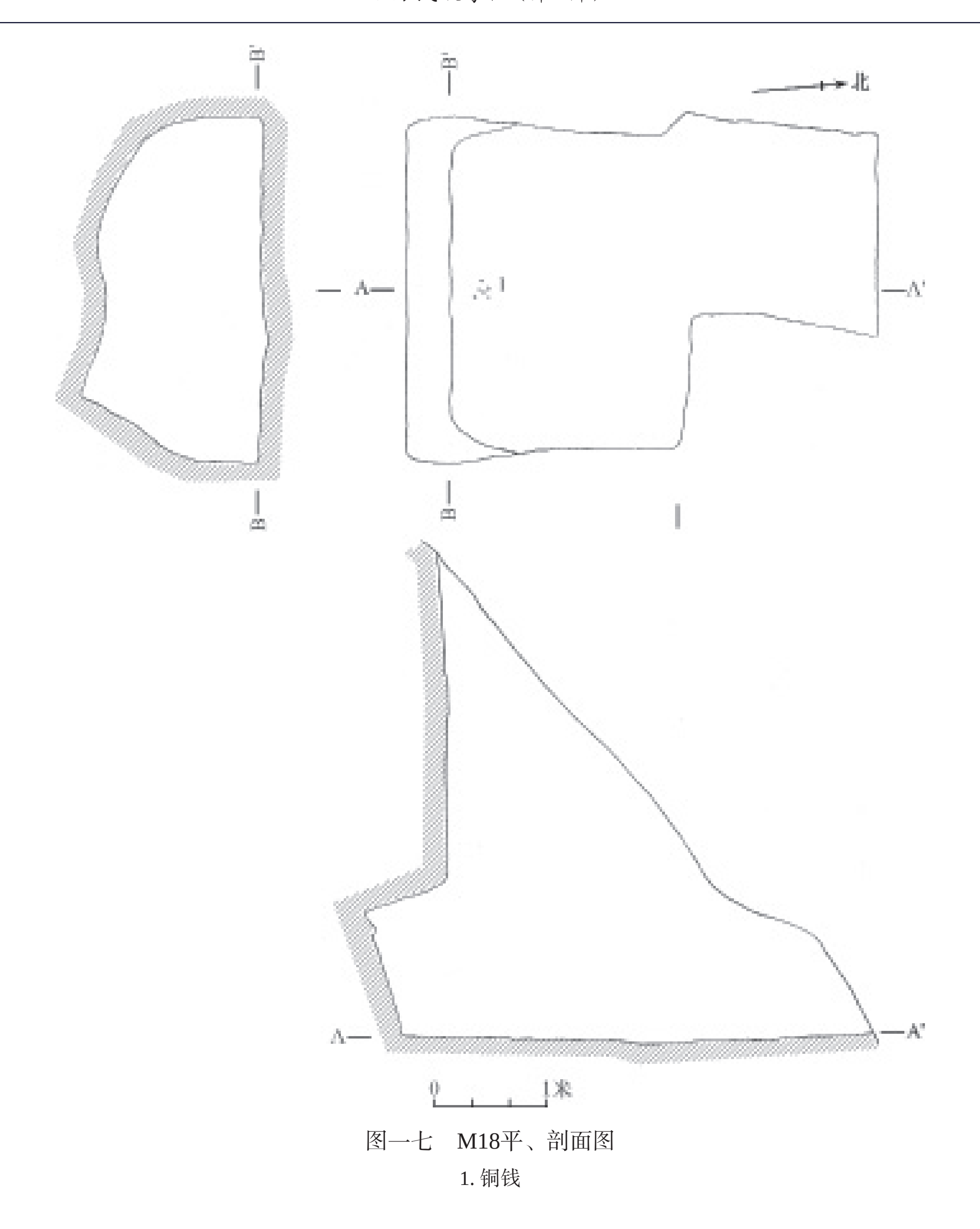


图一六　M17平、剖面图

侧墓室口随葬6件陶罐、1件陶甑，墓室中部随葬1件陶钵，墓室西北角随葬1件陶钵，东北角随葬2件陶钵，墓室东部随葬少量铜钱（图一八）。

陶罐　6件。M19∶1，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圜肩，斜弧腹，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8.1、深7.5、口径7、腹径12.8、底径3.1、器壁厚0.7厘米（图一九，13）。M19∶2，灰陶。直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略内凹。通高7.2、深6.6、口径7、腹径11.9、底径3.8、器壁厚0.8厘米（图一九，16）。M19∶3，灰陶。直口，圆唇，颈微束，圜肩，斜弧腹，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8.9、深8.2、口径6.2、腹径11.2、底径3.8、器壁厚0.6厘米（图一九，17）。M19∶4，灰陶。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平底。通高8.1、深7.1、口径7.5、腹径12.8、底径4、器壁厚0.6厘米（图一九，18）。M19∶5，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圜肩，鼓腹，下腹斜弧，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7.3、深6.9、口径7.5、腹径12.7、底径4.3、器壁厚0.4厘米（图一九，19）。M19∶7，灰陶。敞口，圆唇，颈微束，圜肩，鼓腹，下腹斜弧，平底。通高8、深7.5、口径7.2、腹径11.8、底径3、器壁厚0.5厘米（图一九，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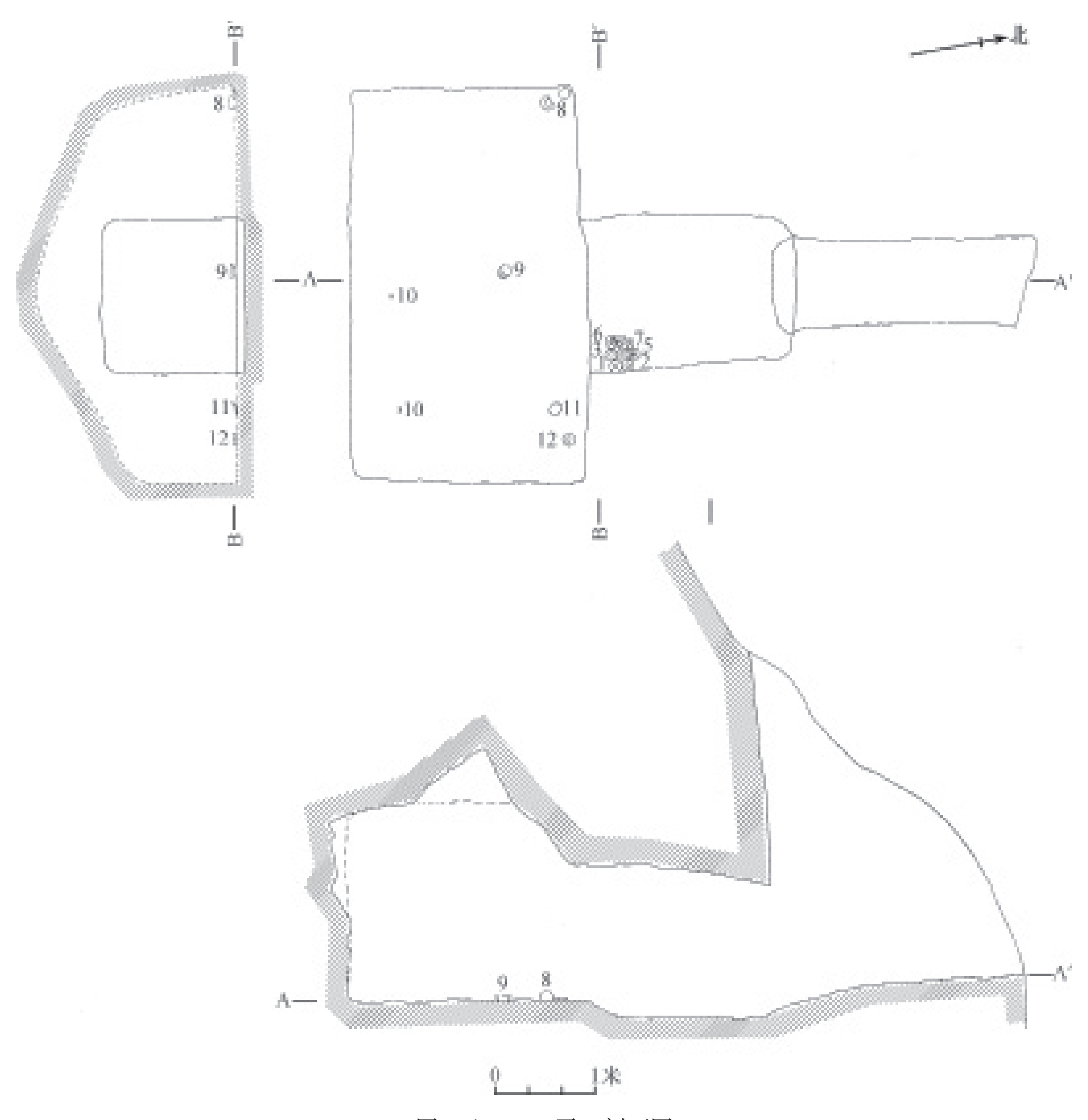
陶甑　1件。M19∶6，灰陶。敞口，折沿，尖唇，颈微束，弧腹，平底，底部有12



图一七　M18平、剖面图
1. 铜钱

个甑孔。通高2.9、深2.7、口径7.1、沿宽0.4、底径2.2、器壁厚0.4厘米，甑孔孔径0.2厘米（图二一，4）。

陶钵　4件。M19：8，灰陶。敞口，折沿，尖唇，颈微束，折腹，平底。通高7.1、深6.5、口径17.8、沿宽0.9、底径4.4、器壁厚0.7厘米（图一九，22）。M19：9，灰陶。敞口，折沿，尖唇，颈微束，弧腹，平底。下腹部有斜向刮棱。通高6.3、深5.8、口径15.6、底径5.6、器壁厚0.5厘米（图二〇，11）。M19：11，灰陶。敞口，圆唇，折腹，平底略内凹。通高7.1、深6.4、口径16.5、底径5.8、器壁厚0.8厘米（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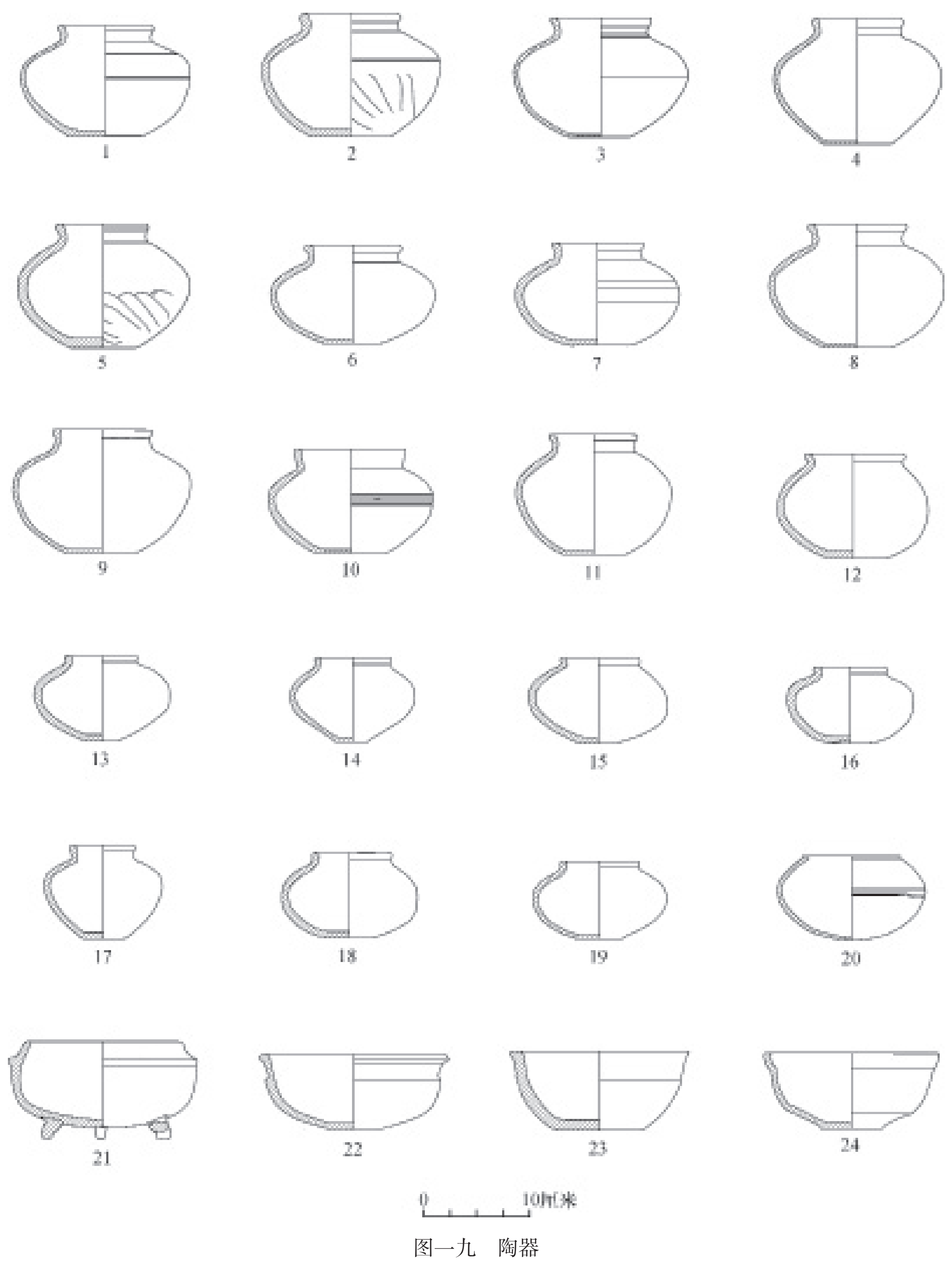


图一八　M19平、剖面图

1～5、7. 陶罐　6. 陶甑　8、9、11、12. 陶钵　10. 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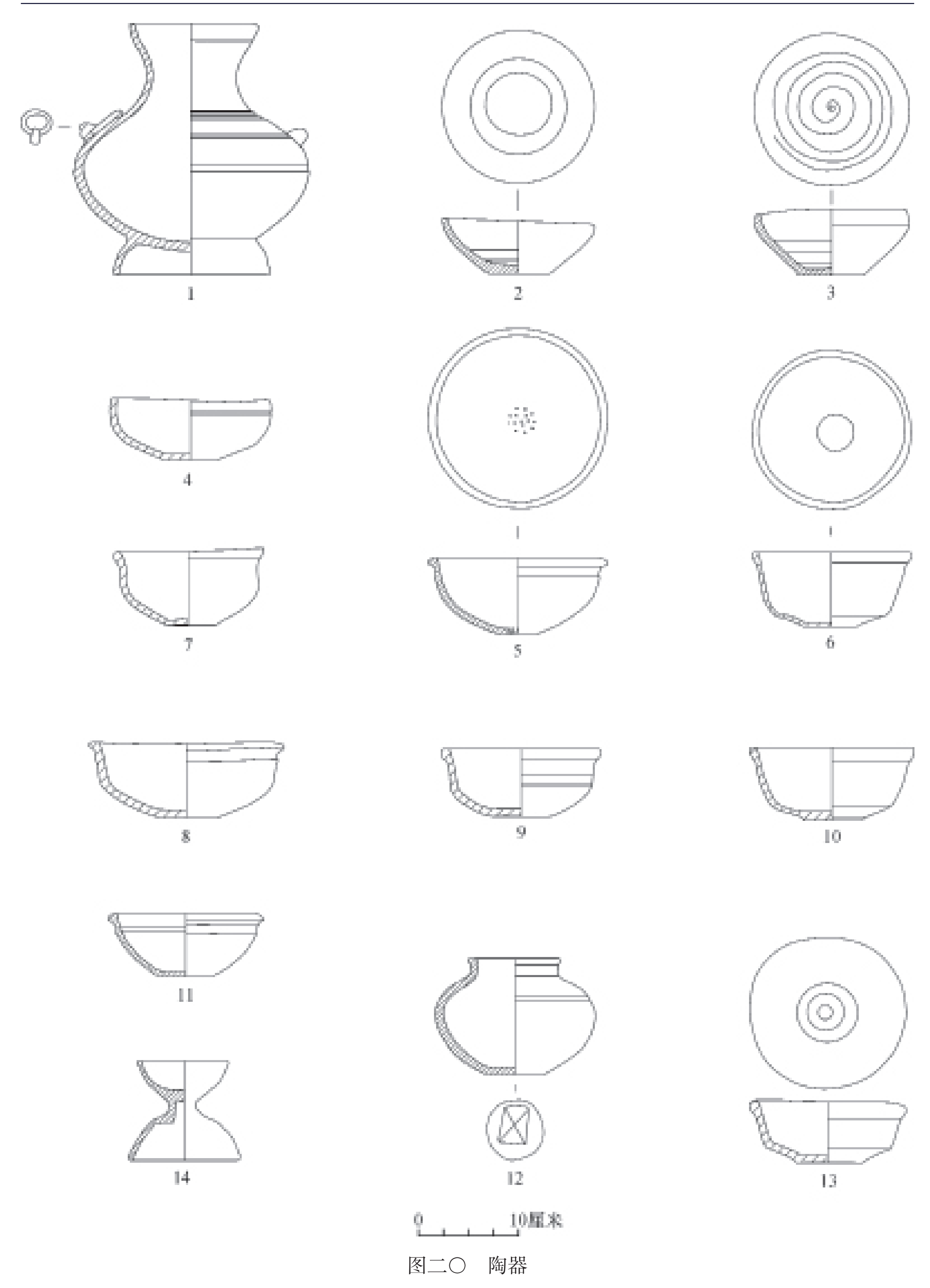
一九，24）。M19：12，灰陶。敞口，圆唇，弧腹，平底。通高5.5、深5、口径13.3、底径3.9、器壁厚0.5厘米（图二一，6）。

铜钱　M19：10，共7枚，均为“五铢”。大小相同，直径2.5、孔径0.9、厚0.2厘米（图二四，4、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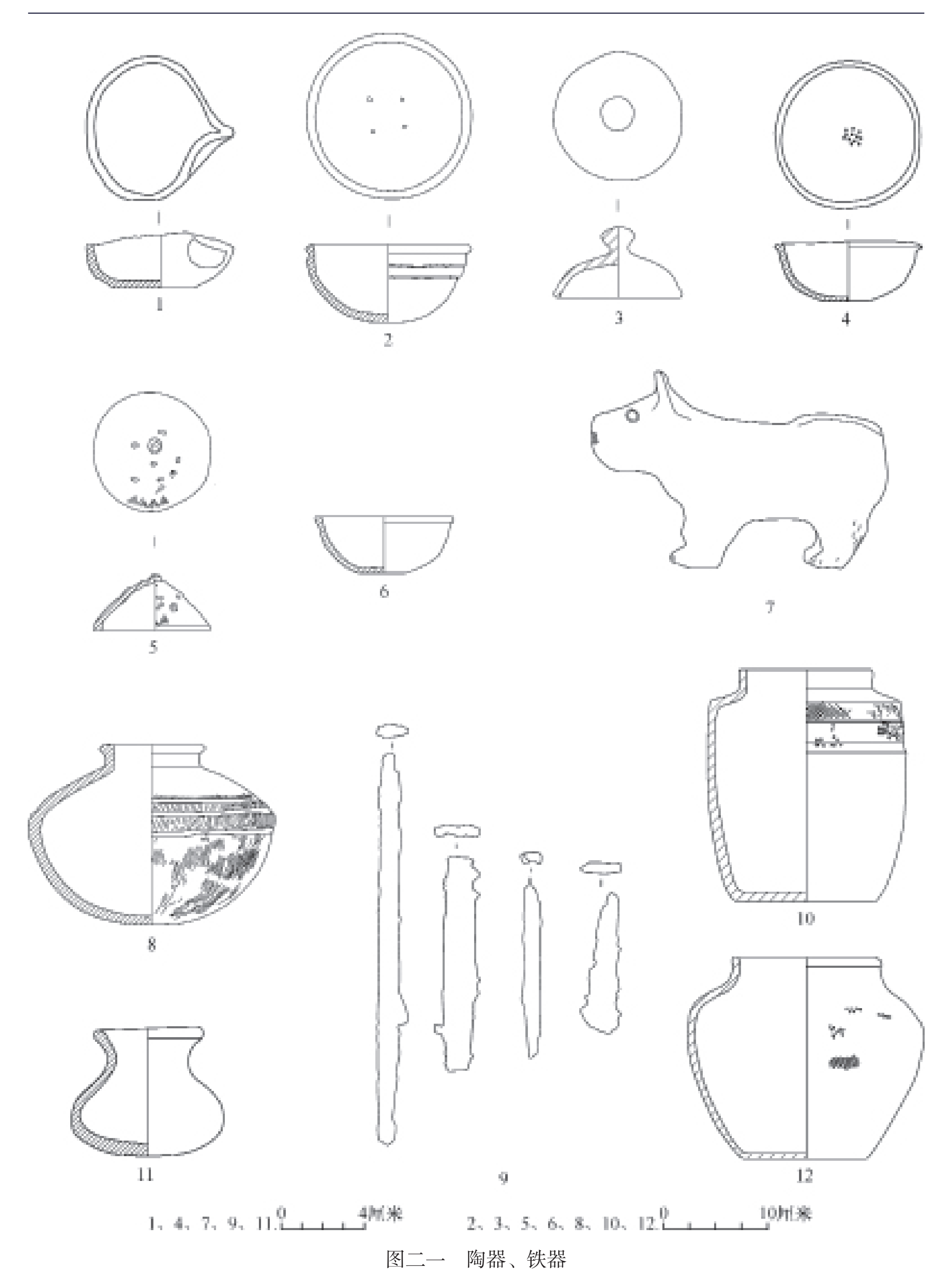
图一九　陶器

1～20. 陶罐（M3：3、M3：4、M12：1、M12：2、M12：3、M12：6、M12：8、M12：9、M12：11、M12：14、M12：17、M12：4、M19：1、M19：7、M4：5、M19：2、M19：3、M19：4、M19：5、M12：13）　21. 陶鼎（M3：1）　22～24. 陶钵（M19：8、M1：2、M19：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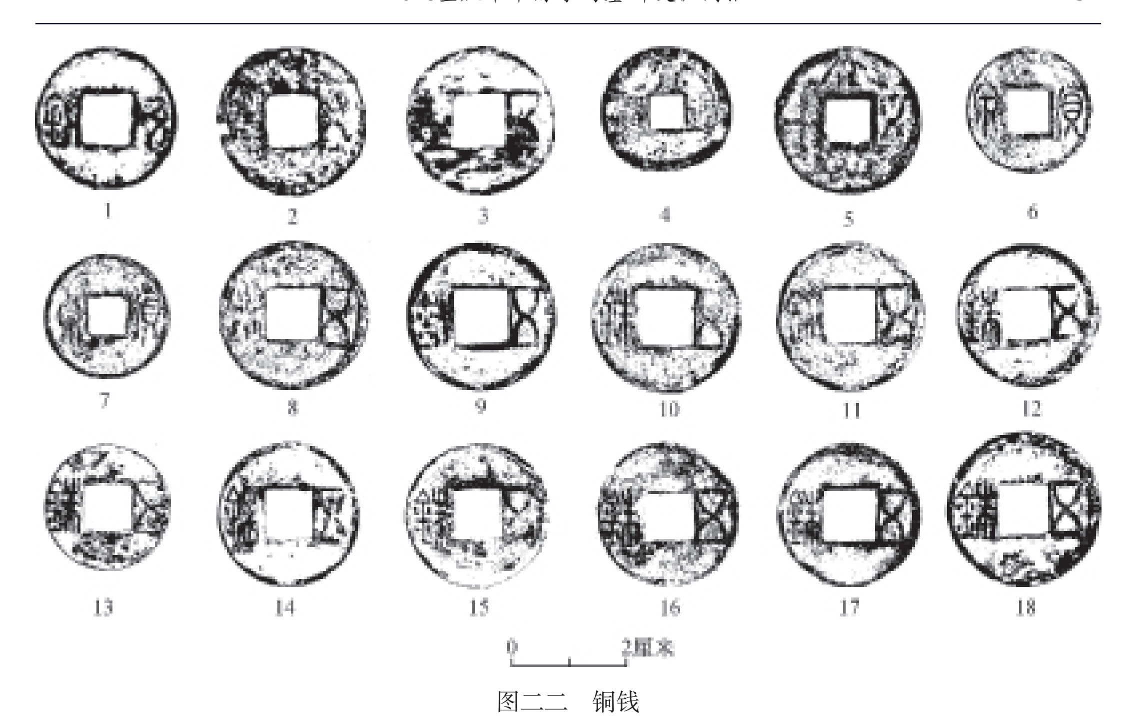
图二〇　陶器

1. 陶壶（M3：2）　2～4、6～11、13.陶钵（M4：2、M4：3、M4：4、M11：2、M7：2、M12：7、M12：16、M15：3、M19：9、M7：1）　5. 陶甑（M12：12）　12. 陶罐（M12：10）　14. 陶灯（M15：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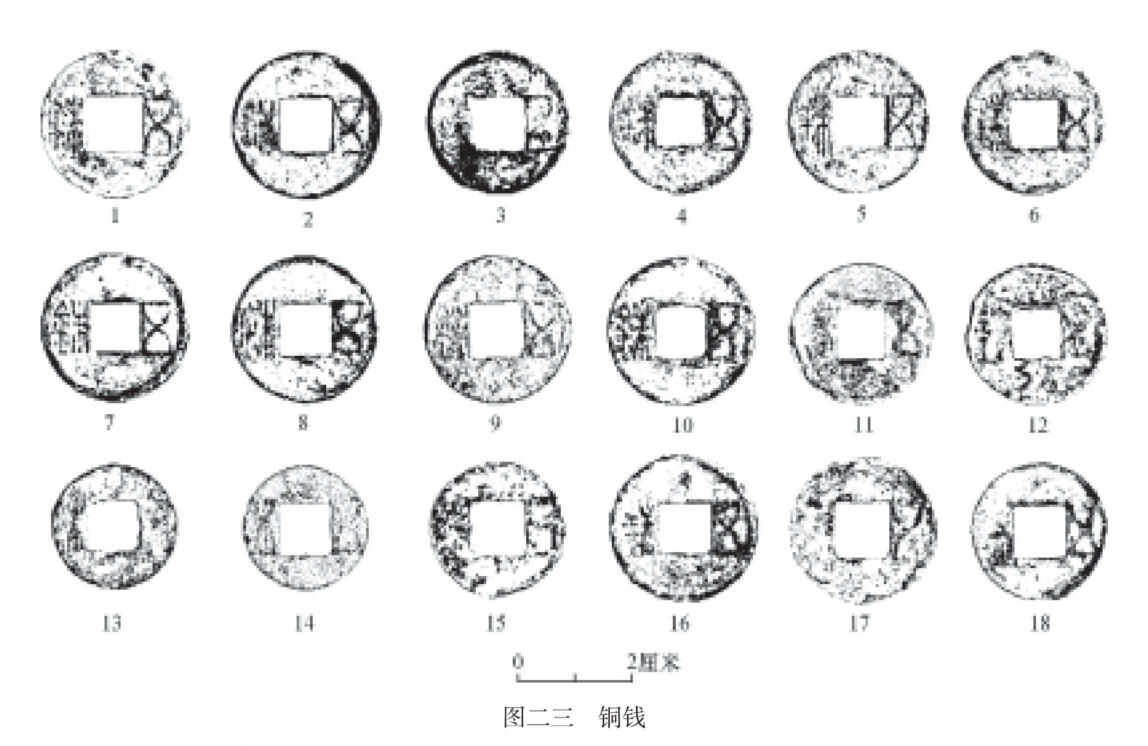
图二一　陶器、铁器

1. 陶勺（M15：1）　2、4. 陶甑（M9：4、M19：6）　3、5. 陶器盖（M3：7、M15：4）　6. 陶钵（M19：12）　7. 陶狗（M9：2）　8、10、12. 陶罐（M12：5、M7：3、M7：4）　9. 铁棺钉（M9：3-1～4）　11. 陶壶（M3：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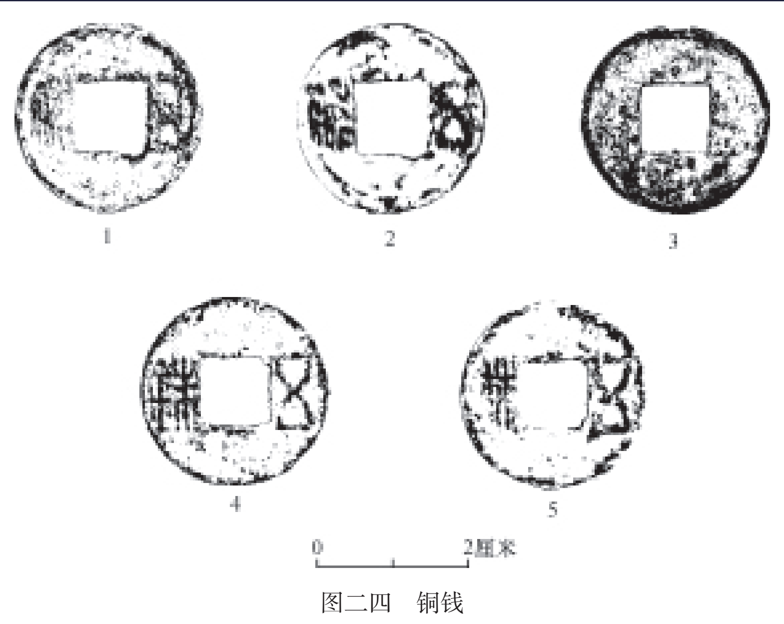
图二二　铜钱

1～3、8～18. 五铢（M1：1-1～3，M3：8-4、5，M4：1-1、2，M9：1-1～7）　4. 宽永通宝（M2：1）　5. 大泉五十（M3：8-1）　6、7. 货泉（M3：8-2、M3：8-3）



图二三　铜钱

1～18. 五铢（M10：1-1、2，M11：1-1～4，M12：18-1～4，M13：1-1～4，M16：1-1～4）



图二四　铜钱

1～5. 五铢（M18：1-1～3，M19：10-1、2）

三、墓葬年代探讨及相关认识

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6座，除M4为土洞墓外，其余均为崖墓，分布较为集中，且墓葬形制较为一致。平面大多为刀把形或凸字形，由墓道、墓室或墓道、甬道、墓室组成，甬道均为平顶略拱，墓室顶部亦为较平的拱顶，表现出较为常见的地区汉六朝崖墓的风格。其中M12、M16均在甬道中发现有砌砖的痕迹。在土坑墓、土洞墓或崖墓中用砖铺地或砌墓壁，但保留原有墓顶，是峡江地区砖室墓的雏形，开始于西汉晚期[1]。

由于江水的长期冲刷，墓葬多破坏严重，保存情况较差。从现有的随葬器物来看，器物组合以及器物风格都较为相似。以陶罐、陶钵等日常用器最多，另有陶勺、陶器盖等。M12所出圜底罐，M3、M12、M19所出束颈小罐，M7所出直腹罐，M11、M7所出下腹部略折的陶钵等均为重庆峡江王莽至东汉早中期较为常见的器物[2]。在罐、钵的器形下腹部留下修整器形时的斜向刮棱是这一地区汉墓中较为常见的做法。M1所出博山形器盖、M5所出桃心形小勺亦常见于峡江地区东汉墓中。仿铜陶礼器仅有M3中所出的陶鼎、陶壶，且制作工艺较粗糙。模型明器有陶甑、陶狗等，数量较少，种类单一。此外也出现了少量釉陶。

此外M3出有“大泉五十”“货泉”，M1、M4、M9、M10、M11、M12、M13、M16、M18、M19所出“五铢”的“铢”字的金字头呈三角形，金字四点较长，朱字圆折，符合《洛阳烧沟汉墓》中第三型“五铢”的特点，大致为王莽至东汉早中期[3]。

需要说明的是M2在位置排列上处于M1与M3之间，且保留有砖砌的部分甬道，在

形制上与其他崖墓并没有明显区别。该墓葬仅在填土中出有一枚“宽永通宝”，于日本宽永三年（1626年）开始铸造，一直沿用至明治初年，这枚铜钱很有可能是随江水冲刷后的淤泥沉积在墓室中的，与墓葬本身并没有关系。

陈家湾墓群位于今奉节县城西南的长江南岸，与其相对的长江北岸曾进行过多次考古发掘。武汉大学分别于2001年、2004年清理发掘汉晋墓20余座[4]，中国人民大学也于2015年在此清理发掘崖墓18座。这些墓葬分布集中，随葬器物组合特征相似，风格相近，尤其是崖墓，开凿方式上也呈现出一致性，均借用山体的坡度向下开凿出一个垂直的平面，再由平面向山体内部横向凿出墓室。由此推测长江两岸的这些墓葬，可能为该地区居民于王莽至东汉早中期的一个集中埋葬区，并且沿用至晋。其中赵家湾M8[5]等墓葬保存较为完好，随葬器物丰富，为研究墓葬布局、墓葬与居址的关系、随葬器物的制作与商品化、崖墓的开凿技术等问题均提供了较为可靠的资料。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袁东山，执行领队为李梅田，参加发掘的人员有乔汉英、郭东珺等，本次发掘工作得到了奉节县文管所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摄影：郭东珺、陈昊雯
绘图：乔汉英、郭东珺、李艳楠
整理：郭东珺、乔峡、李增辉
执笔：乔汉英、乔峡

注　释

［1］蒋晓春. 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M］. 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

［2］重庆市文物局、重庆市移民局. 丰都镇江汉至六朝墓群［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

［3］洛阳区考古发掘队. 洛阳烧沟汉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4］a. 武汉大学考古学系，重庆市文化局三峡办公室. 重庆奉节赵家湾东汉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11（1）：18～28.

b. 武汉大学考古及博物馆系，武汉大学科技考古中心. 重庆奉节赵家湾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09（1）：24～44.

［5］同［4］a。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2016 excavation at the Chenjiawan Cemetery, Fenjie, Chongqing

Chongqing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 Studies

Abstract: In July and August of 2016, an archaeological team from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cavated Chenjiawan Cemetery in Fengjie County, Chongqing City. There is 1 earth cave-tomb and 15 cliff cave-tombs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oblong tombs, knife-shaped and “凸”-shaped tombs. The roofs of aisles and chambers are slightly arched, which is a common type of tomb in the Lower Valley of Yangtze river from Han to Six Dynasties. There are 62 burial objects unearthed consisting of a great quantity of pottery and some copper coins. The pottery is mainly for everyday use, a few examples are used especially for funerals and sacrific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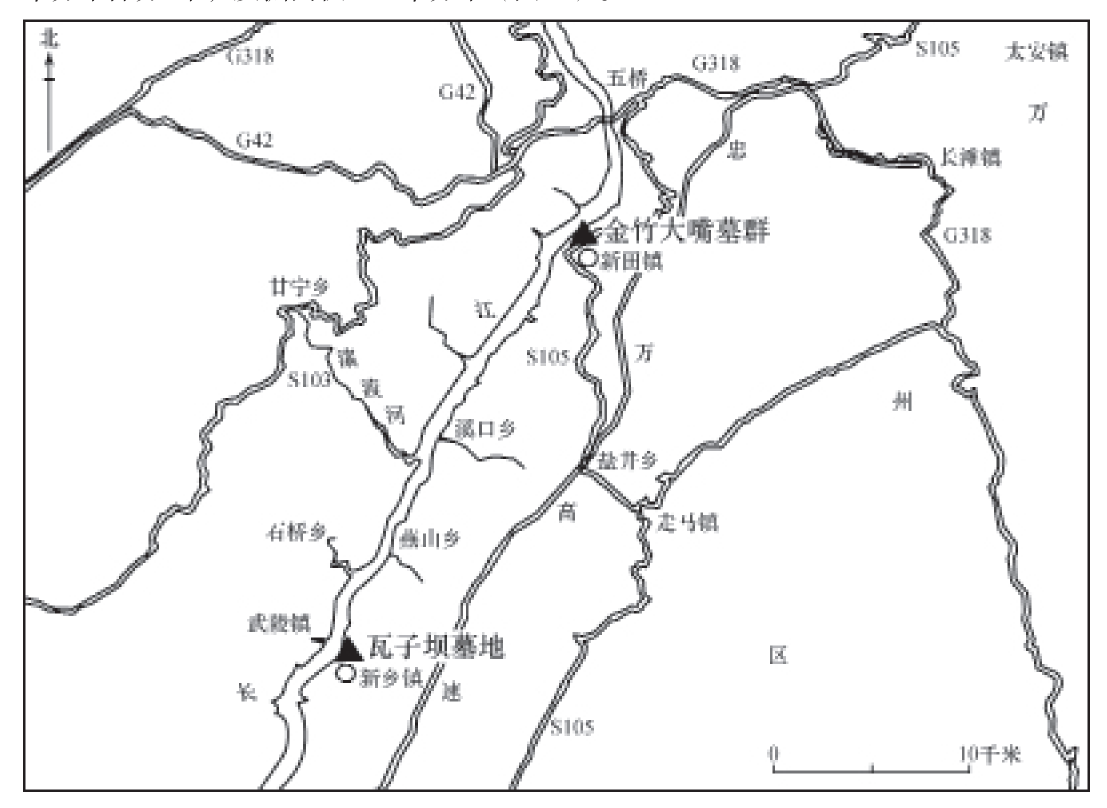
Key words: Chongqing Fengjie; Six dynasties from Han; cliffcave-tombs; earth cave-tombs

2016重庆万州瓦子坝、金竹大嘴墓群发掘简报

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1]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2]
（1. 重庆，400013；2. 北京，100872）

瓦子坝墓地

瓦子坝墓地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新乡镇万顺村3社长江南岸一处缓坡地带，位于新乡镇以西400米，向西北与武陵镇隔江相望，相距约2.7千米。中心坐标为108°16′E，30°49′N，海拔164米。2016年8月至9月，为配合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的文物保护工作，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共布正北向20×20平方米探方4个，发掘面积1600平方米（图一）。



图一　瓦子坝、金竹大嘴墓群区位图

瓦子坝墓地分布于长江南岸的缓坡地带上，因长期受江水涨退影响，在地表淤积大量泥沙，长满杂草，并包含有较多的植物根茎、石块以及移民搬迁遗留的现代建筑垃圾。且由于江水冲刷和现代人类活动，埋藏较浅的墓葬遭受扰乱较多。此次发掘共清理墓葬12座，其中砖室墓1座，竖穴土坑墓11座。出土随葬器物49件、采集1件，以陶器为主，另有青铜剑、铜钱、铁鼎等（图二）。

现将具体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一、砖　室　墓

共1座，为M1。M1为“凸”字形砖室墓，方向56°。M1墓道口处残缺，墓顶已坍塌，墓室东壁、西壁南部有券顶残留。墓室东壁中部打破土坑墓M3。墓道长240、宽146、深100厘米。墓室东、西壁长486厘米，残高100～116厘米，10层墓砖，北壁长234厘米，残高70厘米，7层墓砖。均为平砖错缝顺砌。墓砖有长方形砖和楔形砖两种，楔形砖长36、宽20、厚10厘米，榫卯部位长4、宽4厘米，长方形砖长44、宽20、高10厘米，纹饰皆为菱形点状几何纹。在墓道与墓室转角处，底部向上第7层为楔形砖，花纹朝向墓室，其余皆为长方形砖，花纹朝向墓室。无铺地砖。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器物共10件，其中陶罐2件、陶俑4件、陶钵1件、铜泡（残）1件、铁剑（残）1件和少量铜钱。其中1件陶罐未能修复（图四）。

陶俑　4件。M1：1，红陶，空心。呈站姿，头戴尖顶小帽，面部模糊，双手交叉于胸前，持一棒状物。通高21、宽7.7、厚0.8厘米（图二三，7）。M1：3-1，人俑头，红陶，空心。头戴冠，五官模糊，一手扶耳。通高9.7、宽7.6、厚0.5厘米（图二三，10）。M1：3-2，人俑头，红陶，空心。头戴圆顶小帽，五官清晰。通高9.2、宽6.3、厚0.5厘米（图二三，11）。M1：7，红陶，空心。呈站姿，头戴尖顶小帽，面部模糊，双手交叉于胸前，持一棒状物。通高21.2、宽7.4、厚1厘米（图二三，8）。M1：8，红陶，空心。呈站姿，头戴尖顶小帽，面部模糊，双手交叉于胸前，持一棒状物。通高21、宽7.9、厚1.3厘米（图二三，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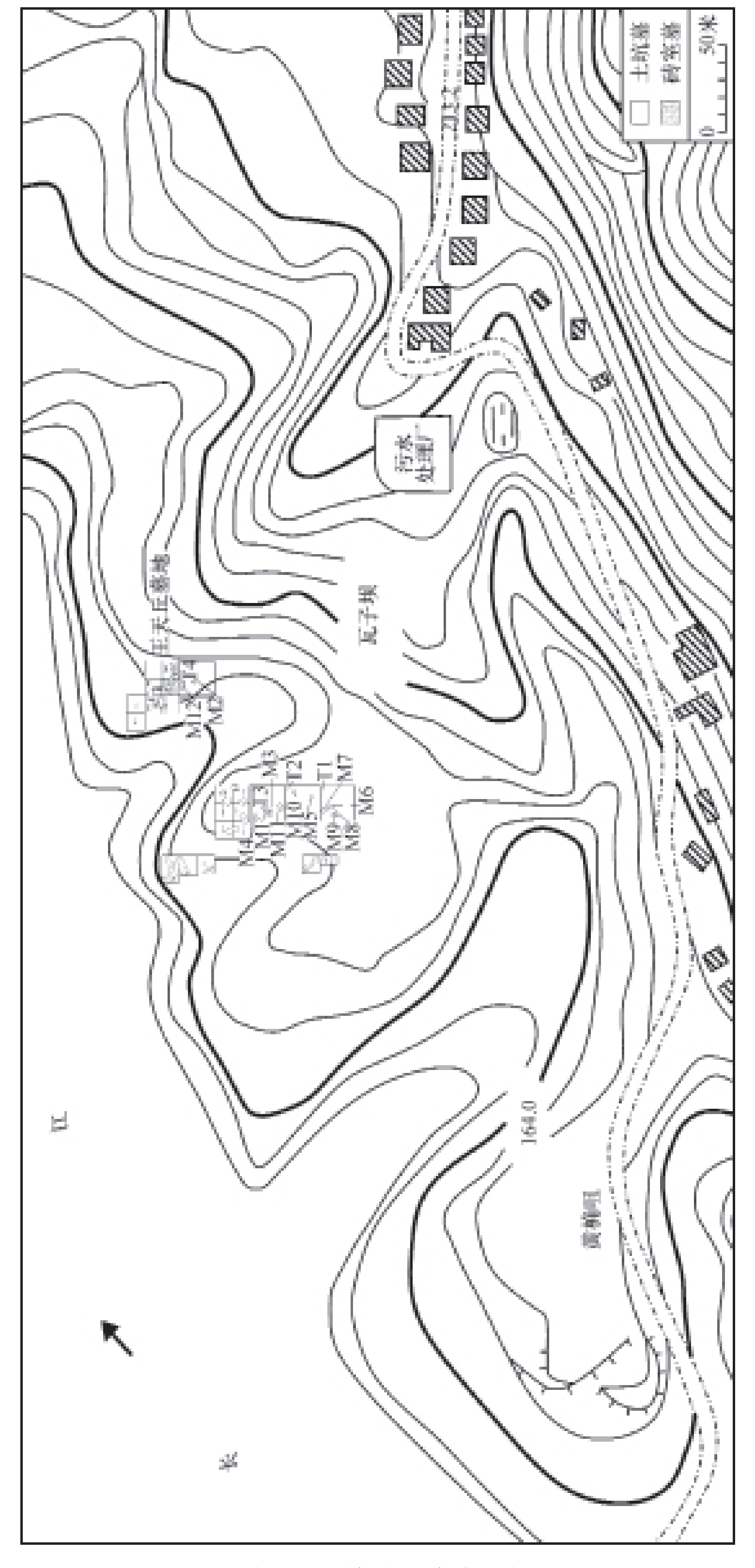
陶罐　1件。M1：5，灰陶。短直颈，敞口，圆唇，圜肩，斜弧腹，圜底。肩部饰两道凹弦纹，肩腹部饰间断绳纹，腹部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9.1、深18.5、口径9.8、腹径28.8、器壁厚0.6厘米（图二一，1）。

陶钵　1件。M1：10，灰陶。敞口，圆唇，弧腹，圈足。通高6.6、深5.3、口径17、圈足径 6.7、圈足厚0.3、圈足深0.8、器壁厚0.6厘米（图二二，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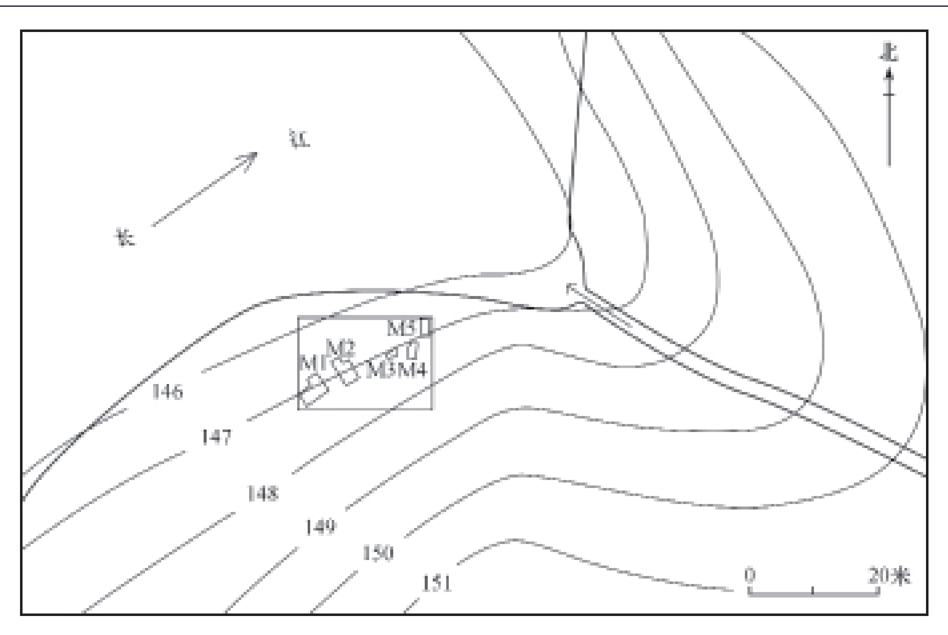
铜泡　1件。M1：6，直径4.1、厚0.2厘米（图二三，15）。

铜钱　M1：2，6枚，均为“五铢”。大小相同。直径2.5、孔径0.9、厚0.1厘米（图二四，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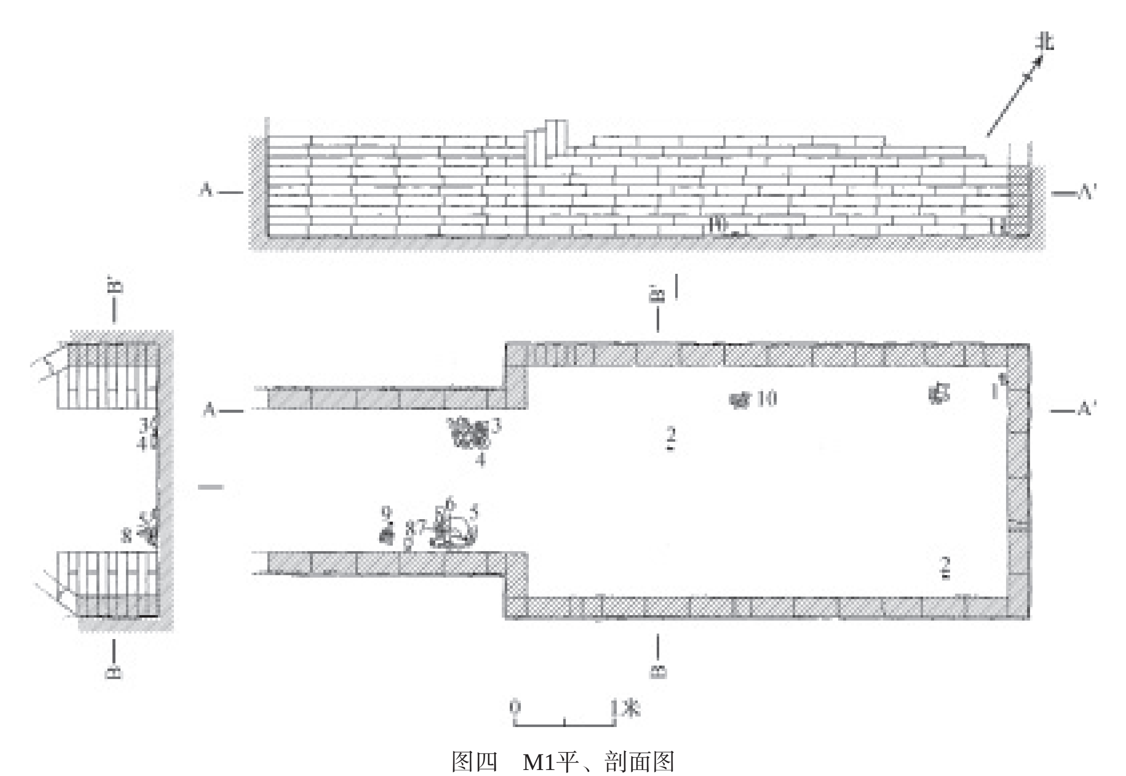
铁剑　1件。M1：9，断为两截，通长26.4、宽5.6厘米（图二二，18）。



图二　瓦子坝墓地总平面图



图三　金竹大嘴墓群总平面图



图四　M1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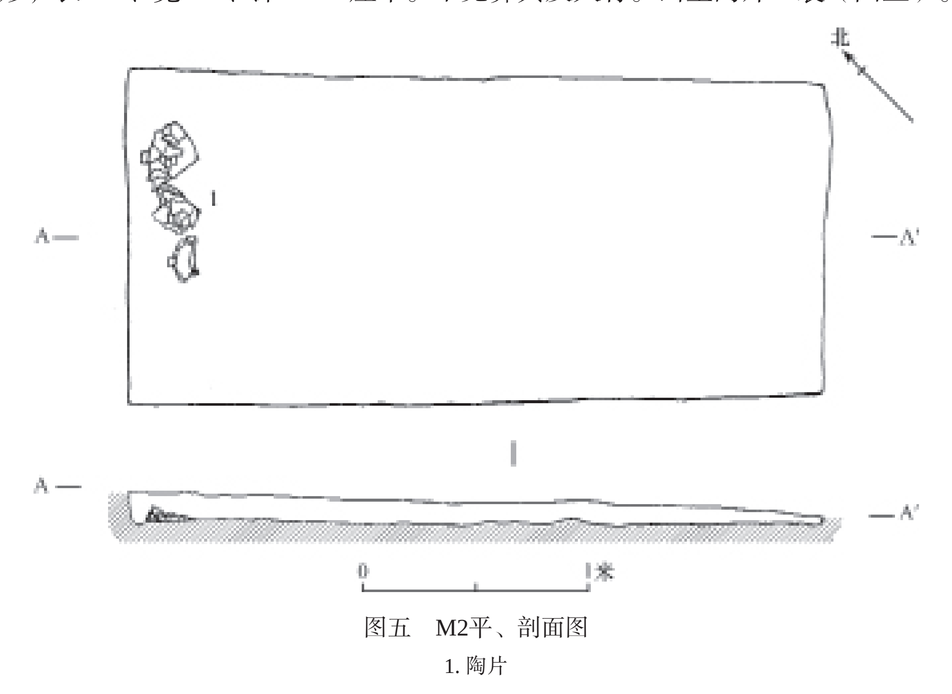
1、7、8. 陶俑　2. 铜钱　3. 人俑头　4、5. 陶罐　6. 铜泡　9. 铁剑　10. 陶钵

二、土坑竖穴墓

共11座，分别为M2、M3、M4、M5、M6、M7、M8、M9、M10、M11、M12，分布于沿江的缓坡地带。其中M3被M1打破，M8打破M9。M3～M11较为集中，M2和M12位于其东北处。

1. M2

M2为长方形土坑墓，方向315°。该墓已被冲刷破坏，仅剩部分墓底。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310、宽148、深4～14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出土陶片一袋（图五）。



图五　M2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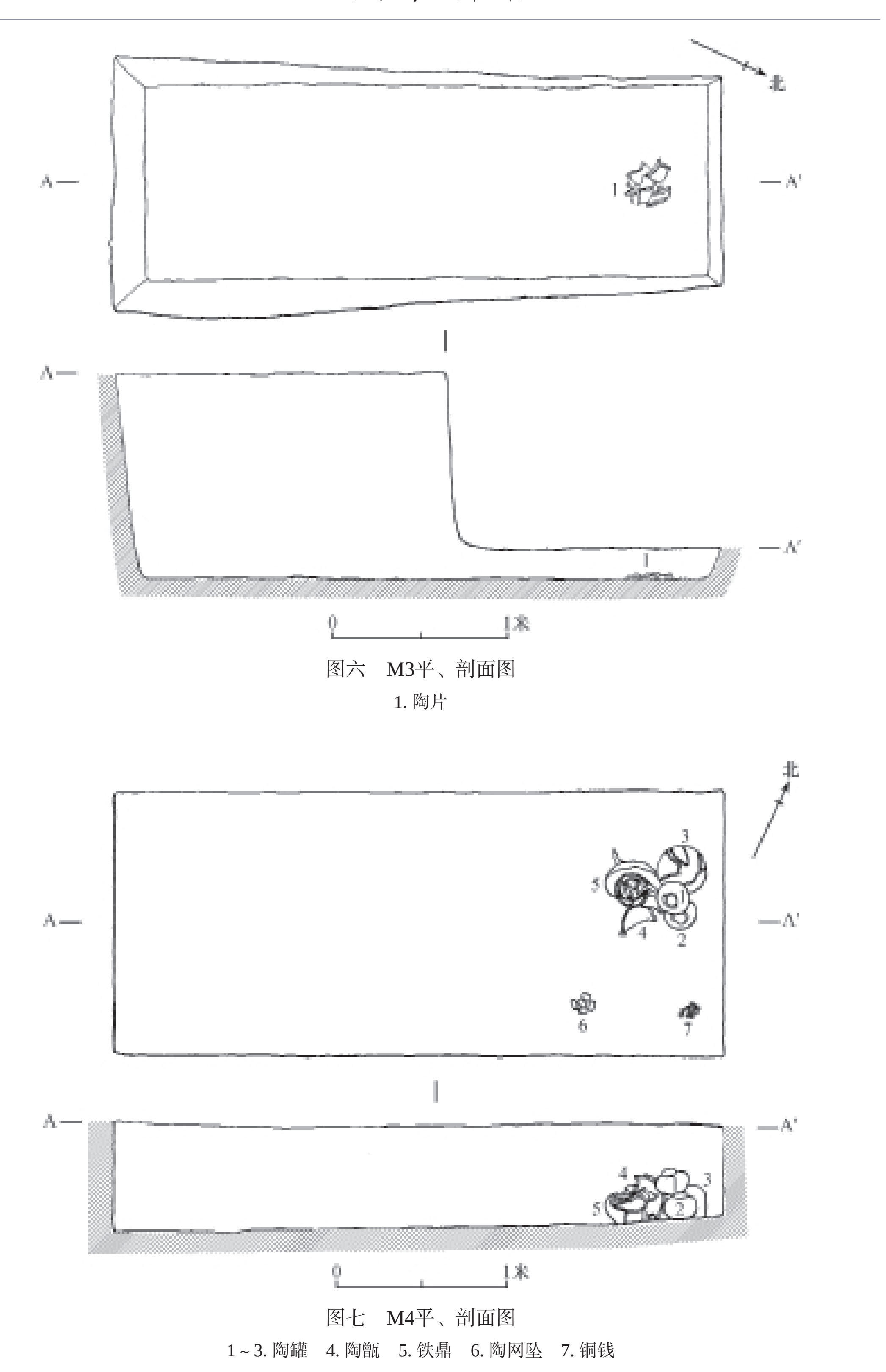
1. 陶片

2. M3

M3为近长方形土坑墓，方向335°。墓室平面呈前窄后宽的长方形，墓口长350、宽120～146、深16～116厘米，墓底长324、宽109～111厘米。墓室被M1打破，近墓底处出土有部分陶片。不见葬具及人骨（图六）。

3. M4

M4为近长方形土坑墓，方向65°。墓室平面呈前窄后宽的长方形，长360、宽154～156、深52～64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品7件，其中，陶罐3件，陶鼎1件，陶甑1件，铁鼎1件，陶网坠5枚和铜钱若干（图七）。



图六　M3平、剖面图
1. 陶片

图七　M4平、剖面图
1～3. 陶罐　4. 陶甑　5. 铁鼎　6. 陶网坠　7. 铜钱

陶罐　3件。M4：1，灰陶。敞口，折沿，方唇，束颈，圜肩，弧腹，圜底近平，底部略内凹。肩腹部饰两道凹弦纹，颈部、肩部及腹部饰绳纹。通高15.6、深15、口径12、沿宽1.6、腹径19.4、器壁厚0.6厘米（图二一，13）。M4：2，灰陶。敞口，折沿，方唇，束颈，圜肩，弧腹，圜底近平，底部略内凹。肩腹部饰两道凹弦纹，颈部、肩部及腹部饰绳纹。通高16.4、深15.6、口径12、沿宽1.8、腹径19.6、器壁厚0.8厘米（图二一，14）。M4：3，灰陶。敞口，折沿，方唇，束颈，圜肩，斜弧腹，圜底。器身饰绳纹，下腹部绳纹相互交错。通高24.4、深23.3、口径13.5、沿宽1.5、腹径27.2、器壁厚0.9厘米（图二一，2）。

陶甑　1件。M4：4，灰陶。敞口，折沿，方唇，颈微束，弧腹，平底。底部有33个甑孔，腹部饰绳纹。通高12.5、深11.8、口径27.6、沿宽2.2、底径14.5、甑孔孔径0.3、器壁厚0.9厘米（图二二，14）。

网坠　5枚，均为红陶。圆柱形，微鼓，仅尺寸略有差异。M4：6-1，通长4.5、宽3.3、孔径1.3/2.5厘米（图二三，17）。M4：6-2，通长4.4、宽3.1、孔径1.3/2.1厘米（图二三，18）。M4：6-3，通长5.1、宽3.3、孔径1.4/2厘米（图二三，19）。M4：6-4，通长4.7、宽2.8、孔径1.2/1.9厘米（图二三，20）。M4：6-5，通长4.7、宽2.9、孔径1.4/1.9厘米（图二三，21）。

铜钱　M4：7，共32枚，为“半两”。一种直径2.4、孔径0.8、厚0.1厘米；一种直径2.7、孔径1、厚0.1厘米（图二四，4～11）。

铁鼎　1件。M4：5，通高21～22、口径24、壁厚2.5、腹部最大径28.2厘米。器物锈蚀严重，但可辨为圆唇折沿斜腹鼎，底部推测有三足，残存一足根部（图二三，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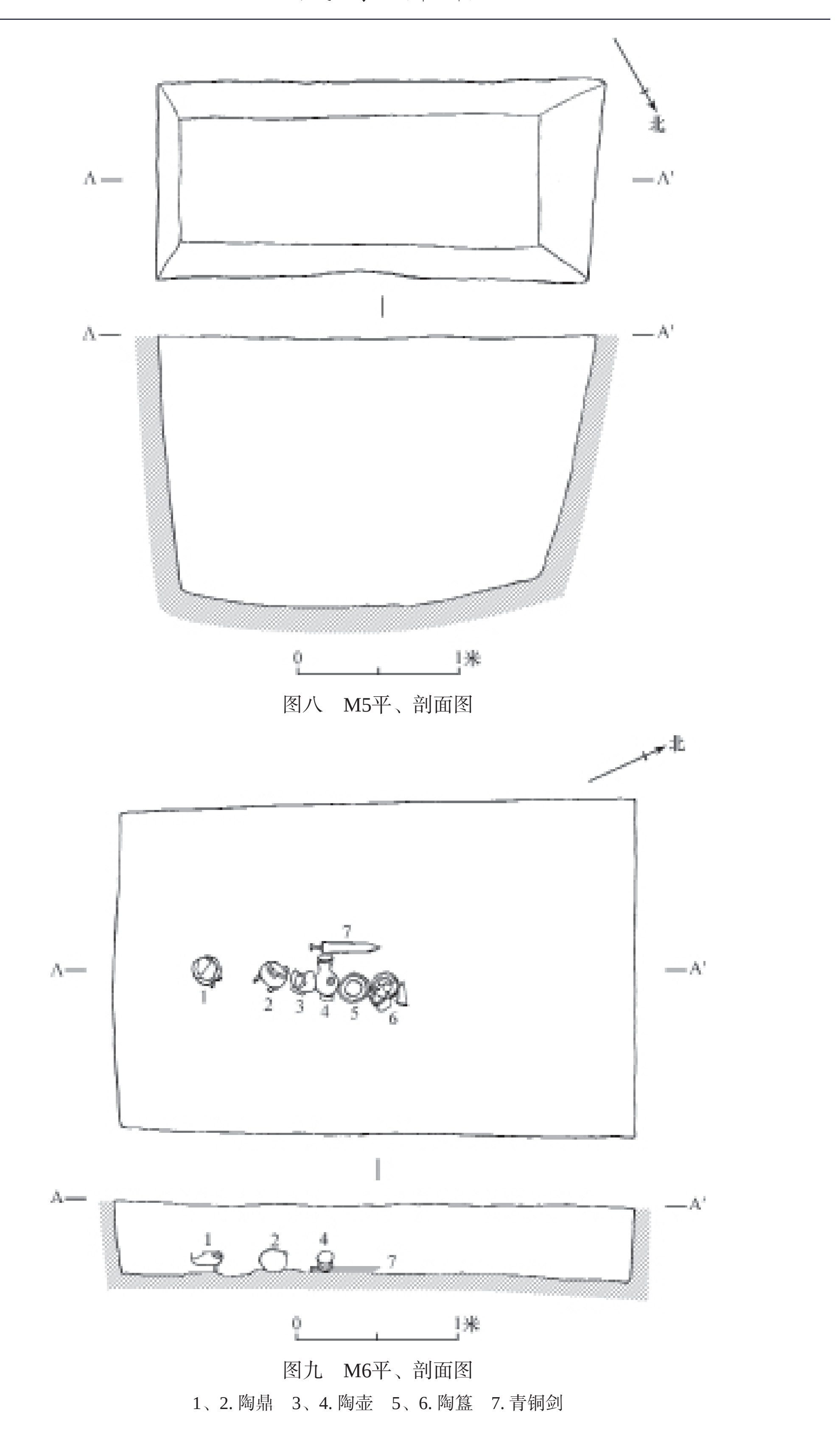
4. M5

M5为近长方形土坑墓，方向300°。墓室平面呈前窄后宽的长方形，墓口长270～280、宽120～124厘米，墓底长224、宽76～82厘米，深146～166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亦无随葬品（图八）。

5. M6

M6为近长方形土坑墓，方向25°。墓室平面呈前窄后宽的长方形，长320、宽192～208、深42～46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品共7件，其中，陶壶2件（带器盖），陶鼎2件，陶簋2件，青铜剑1件（图九；图版一，4）。

陶鼎　2件。M6：1，灰陶。子母口，双耳，方形耳，直腹，平底略圜，三足，蹄形足。盖面鼓起，盖上饰两道凸弦纹。通高15.3/20.2、器腹深7.8、口径12.6/14.6、耳厚1.1、长6.8、宽4.6、耳肩宽19.6、腹径16.8、器壁厚0.7厘米。器盖通高2.8、口径14.6、



图八　M5平、剖面图

图九　M6平、剖面图

1、2. 陶鼎　3、4. 陶壶　5、6. 陶簋　7. 青铜剑

器壁厚0.5厘米（图二二，5；图版一，1）。M6：2，灰陶。子母口 ，双耳，方形耳，直腹，平底略圜，三足，蹄形足。盖面鼓起，盖上饰两道凸弦纹。通高15.4/20.8、器腹深7、口径13.2/16、耳厚1、宽5、长7.5、耳肩宽22、腹径17.1、器壁厚0.7厘米。器盖通高3.5、口径15.6、器壁厚0.7厘米（图二二，4）。

陶壶　2件。M6：3，灰陶。敞口，方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高圈足，腹部饰两个环状首。器盖子母口，盖面微鼓，饰三个长条状纽，已残。通高21.9、深18.8、口径9.1、腹径15.6、圈足径8.9、圈足厚0.6、深2.3、器壁厚0.7厘米。器盖通高2.2、口径5.5/9.1、器壁厚0.8厘米（图二三，1）。M6：4，灰陶。敞口，方唇，束颈，溜肩，鼓腹，平底，高圈足，腹部饰两个环状首。器盖子母口，盖面微鼓，饰三个长条状纽，已残。通高21.9、深19.1、口径9.1、腹径15.7、圈足径8.8、圈足厚0.8、深2、器壁厚1.3厘米。器盖通高2.2、口径7.0/9.1、器壁厚0.6厘米（图二三，2；图版一，2）。

陶簋　2件。M6：5，褐陶。直口，方唇，弧腹，平底，高圈足。器盖，盖面微鼓，盖面有两道凸弦纹。通高8.2、深5.6、口径17.5、圈足径11.2、圈足厚0.8、深1.7、器壁厚0.7厘米。器盖，通高2.9、口径17.5、顶部圆直径8.8、器盖厚0.6厘米（图二三，3）。M6：6，褐陶。直口，方唇，弧腹，平底，高圈足。器盖，盖面微鼓，盖面饰两道凸弦纹，三个条形纽。通高7.3、深4.6、口径17.3、圈足径11.4、圈足厚1、圈足深1.9、器壁厚0.8厘米。器盖，通高3.5、口径17.3、顶部圆直径9.1、器盖厚0.6厘米（图二三，4；图版一，3）。

铜剑　1件。M6：7，剑体长44.1、剑身宽0～3.9、剑首宽3、厚0.3厘米。剑茎长9.5、宽1.5厘米，剑格宽4.4厘米。剑首截面呈椭圆形，剑茎平面呈双曲线形，无剑箍；剑格同剑首形制相似，略大于剑首。剑脊明显，剑从部分无纹饰或铭文，且由于锈迹原因，刃部与锷部分界并不明显，剑锋处略锈钝（图二三，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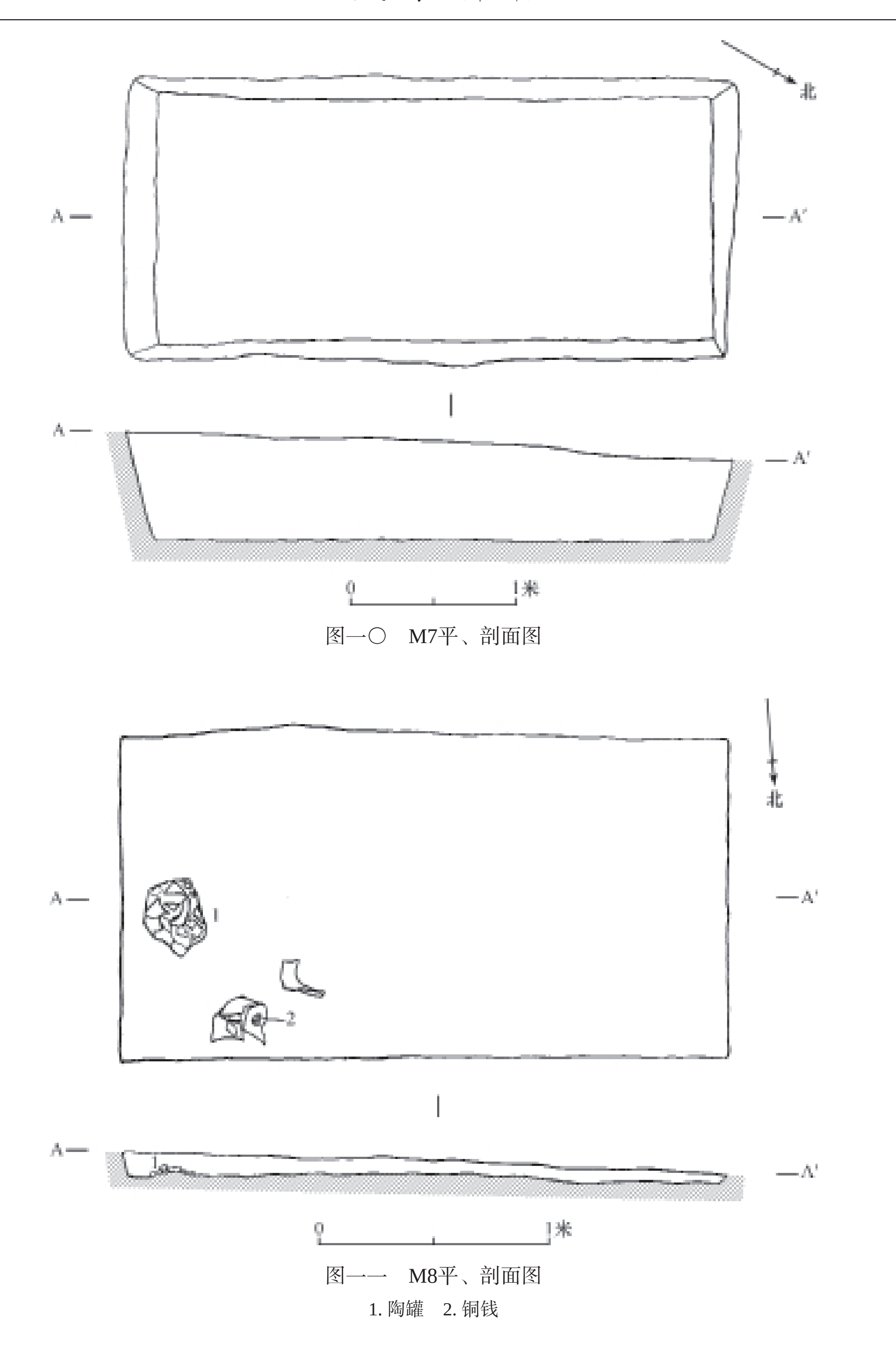
6. M7

M7为长方形土坑墓，方向330°，早已被盗。墓室平面呈长方形，上口长372、宽160～172厘米，底面长336、宽146～152厘米，深48～66厘米。墓室北部有1个袋形盗洞。陶片出自该盗洞，可修复陶器盖1件。不见葬具及人骨（图一〇）。

器盖　1件。M7：1，灰陶。敞口，方唇。盖面微鼓，顶部饰3个凸状纽。通高6.2、深4.5、口沿18.4、器壁厚0.7厘米（图二三，5）。

7. M8

M8为长方形土坑墓，方向275°。该墓已被冲刷破坏，仅剩部分墓底。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66、宽136～140、深4～10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于墓底出土陶片若干和少量铜钱，可修复陶罐1件（图一一）。



图一〇　M7平、剖面图

图一一　M8平、剖面图
1. 陶罐　2. 铜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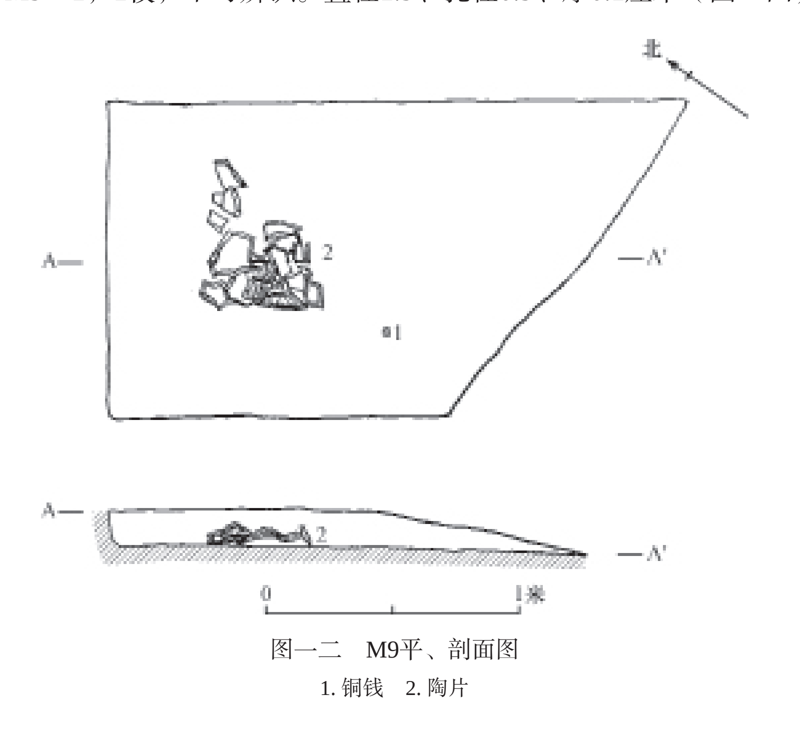
陶罐　1件。M8：1，褐陶。敞口，圆唇，束颈，圜肩，弧腹，平底。通高23.6、深23、口径13、腹径25.7、底径14.6、器壁厚0.6厘米（图二一，3）。

铜钱　M8：2，4枚，均为“半两”。直径2.3、孔径0.9、厚0.1厘米（图二四，12）。

8. M9

M9为长方形土坑墓，方向325°，且南部被M8打破。该墓已被冲刷破坏，仅剩部分墓底。墓室平面呈长方形，残长136～230、宽124、深0～14厘米。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品2件，铁器1件（残）和铜钱1枚，并出土陶片1袋。铁器未能修复（图一二）。

铜钱　M9：1，1枚，不可辨识。直径1.9、孔径0.9、厚0.1厘米（图二四，13）。



图一二　M9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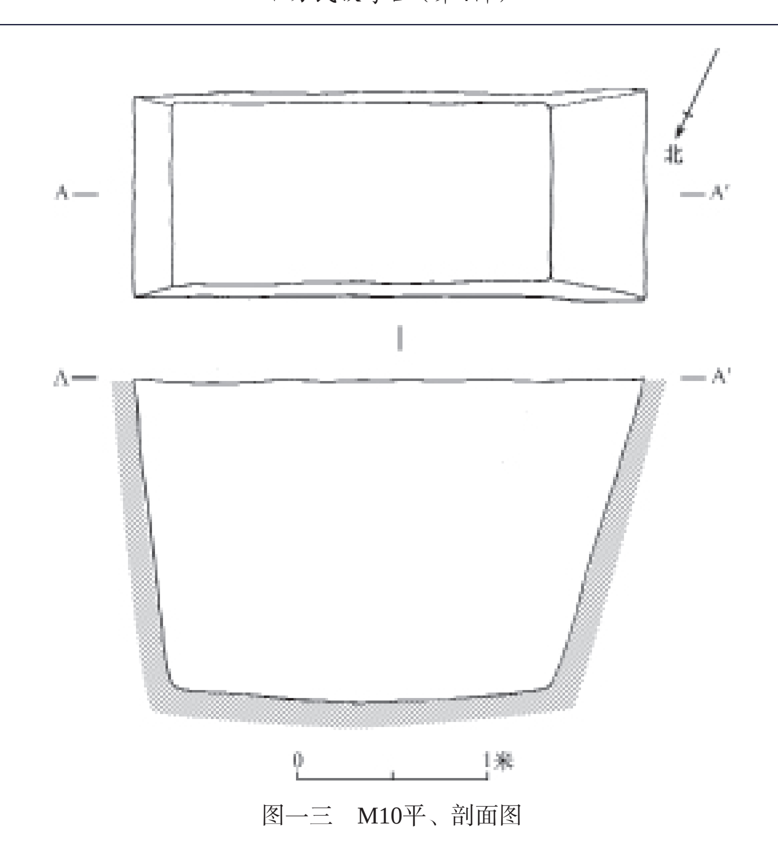
1. 铜钱　2. 陶片

9. M10

M10为长方形土坑墓，方向65°。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270、宽104～112厘米，墓底长200、宽94、深160～170厘米。不见人骨及葬具。亦无随葬品（图一三）。

10. M11

M11为长方形土坑墓，方向48°。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口长340、宽244厘米，墓底长290、宽200、深112厘米。M11葬人骨1具，残存胫、腓骨，尺、桡骨，碎裂的股骨以及头骨、肋骨碎片，为仰身直肢葬，不见葬具。随葬品共6件，其中陶钵1件，陶罐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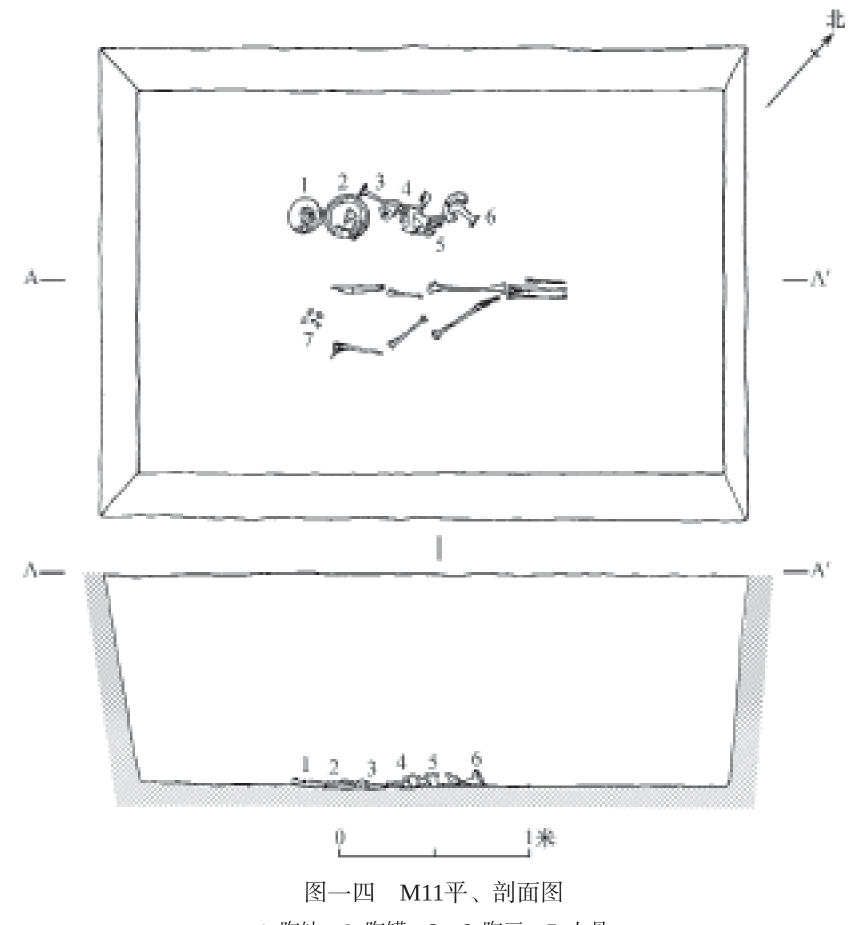
图一三　M10平、剖面图

件，陶豆4件（图一四）。

陶钵　1件。M11：1，灰陶。敞口，折沿，尖唇，束颈，圜肩，弧腹，圜底略内凹。腹部饰绳纹。通高9.2、深8.7、口径19.9、沿宽1.9、器壁厚0.6厘米（图二二，3）。

陶罐　1件。M11：2，灰陶。敞口，圆唇，圜肩，鼓腹，平底。通高16.7、深15.9、口径10.6、腹径14.8、底径9.5、器壁厚0.8厘米（图二一，15）。

陶豆　4件。M11：3，灰陶。敞口，圆唇，斜弧腹，实心柄，喇叭状圈足。通高15.5、豆盘深2.9、口径13.8、底座直径8.5、深1.4/4、器壁厚0.4厘米（图二二，12）。M11：4，灰陶。敞口，圆唇，斜弧腹，下腹部略折，实心柄，喇叭状圈足。通高15、豆盘深3.1、口径13.8、底座直径8.6、深1.2/4.2、器壁厚0.3厘米（图二二，15）。M11：5，灰陶。敞口，圆唇，斜弧腹，下腹部略折，实心柄，喇叭状圈足。通高16.4、豆盘深3.6、口径14.2、底座直径9.1、深1.8/7.8、器壁厚0.5厘米（图二二，11）。M11：6，红陶。敞口，圆唇，斜弧腹，实心柄，喇叭状底座。通高15.4、豆盘深2.8、口径13.9、底座直径8.8、深1.6/3.9、器壁厚0.4厘米（图二二，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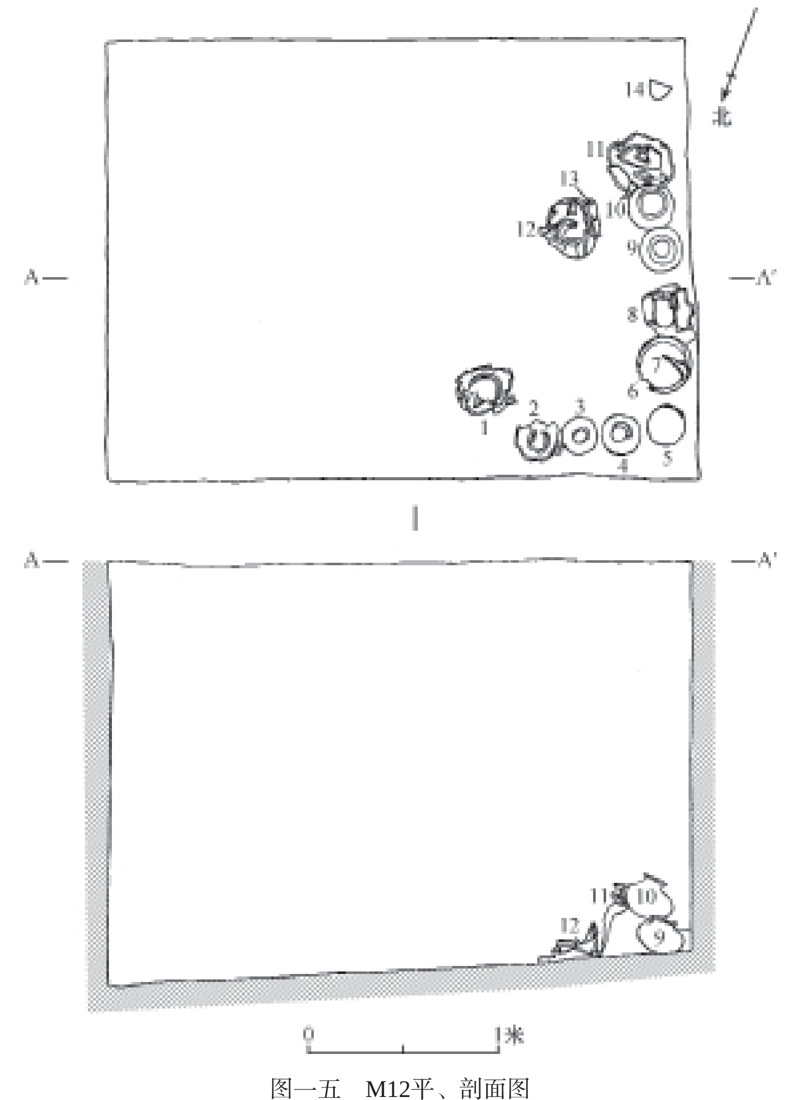
图一四　M11平、剖面图

1. 陶钵　2. 陶罐　3～6. 陶豆　7. 人骨

11. M12

M12为长方形土坑墓，方向250°。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室长306～314、宽232厘米，深206～224厘米。不见人骨及葬具。共出土随葬品14件，其中，陶罐9件，陶甑1件，陶壶1件，铁鼎1件，铁剑1件（残），铁器1件（残）。陶壶仅能复原器盖，壶身部分不可复原（图一五）。

陶罐　9件。M12：1，褐陶。敞口，折沿，方唇，唇面略凹，高领，折肩，斜弧腹，圜底。肩部饰两道凹弦纹，腹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6.6、深15、口径14.1、沿宽1.8、腹径21.3、器壁厚1厘米（图二一，4）。M12：2，灰陶。敞口，折沿，方唇，高领，折肩，斜弧腹，圜底。肩部饰一道凹弦纹，腹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6.9、深15.9、口径13.6、沿宽1.8、腹径20.6、器壁厚0.7厘米（图二一，5）。M12：3，褐陶。敞口，折沿，方唇，唇面略凹，束颈，折肩，斜弧腹，圜底略内凹。肩部及腹部饰两道凹弦纹，腹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4.9、深14.3、口径13.3、沿宽1.8、腹径19.6、器壁厚1厘米



图一五　M12平、剖面图

1～5、9～12. 陶罐　6. 铁鼎　7. 陶甑　8. 器盖　13. 铁剑　14. 铁器

（图二一，6）。M12：4，灰陶。敞口，折沿，方唇，唇面略凹，高领，圜肩，弧腹，圜底略内凹。肩部饰一道凹弦纹，腹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4.8、深13.7、口径13、沿宽2、腹径19.4、器壁厚1.1厘米（图二一，7）。M12：5，灰陶。敞口，折沿，方唇，唇面略凹，束颈，折肩，弧腹，圜底，肩部饰一道凹弦纹，腹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5.2、深14、口径13.3、口沿宽1.9、腹径18.3、器壁厚1.1厘米（图二一，8）。M12：9，灰陶。敞口，折沿，方唇，唇面略凹，高领，折肩，弧腹，圜底。颈及底部饰绳纹，肩部及腹部饰两道凹弦纹。通高15.2、深14.5、口径13、沿宽2.2、腹径19.6、器壁厚1厘米（图二一，9）。M12：10，褐陶。敞口，折沿，方唇，唇面略凹，束颈，圜肩，弧腹，圜底。肩部饰一道凹弦纹，腹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7、深16、口径15、沿宽1.7、

腹径22、器壁厚1厘米（图二一，10）。M12：11，灰陶。敞口，方唇，高领，圜肩，弧腹，平底，肩部两侧各有一环状辅首，可活动。肩部饰两道凸弦纹。通高17、深16.4、口径17.4、辅首宽2.1、环宽5.1、腹径22.8、底径12.1、器壁厚0.7厘米（图二一，11）。M12：12，灰陶。敞口，折沿，方唇，唇面略凹，束颈，圜肩，弧腹，圜底略内凹。肩部饰一道凹弦纹，腹及底部饰绳纹。通高16.5、深15.7、口径13.4、沿宽1.7、腹径20.2、器壁厚0.8厘米（图二一，12）。

陶甑　1件。M12：7，红陶。敞口，折沿，方唇，束颈，弧腹，平底。唇面饰一道凹弦纹，腹部饰间断绳纹，底部残留三个甑孔。通高17.1、深16.5、口径32.2、沿宽2.4、底径12.1、器壁厚0.9厘米（图二二，13）。

陶器盖　1件。M12：8，灰陶。子母口，盖面微鼓。通高3.8、深3.3、口径8/12.5、小口沿宽0.6、器壁厚0.4厘米（图二三，6）。

铁鼎　1件。M12：6，通高25.5～23、壁厚3、外耳长10、腹部最大径38厘米。器物锈蚀严重，难以辨认，可以推测为方唇折沿鼓腹鼎，形制略扁，腹部两侧有耳，未发现足（图二三，14）。

铁剑　1件。M12：13，残，通长14.3、宽3.3厘米（图二二，17）。

铁器　1件。M12：14，通长15.5、宽11.4、厚1.6厘米。严重残损，无法辨认（图二二，19）。

三、采　集　品

共1件，为铁锸，通长13、宽9、厚0.7厘米（图二二，20）。

四、墓葬年代探讨及相关认识

此次清理的12座墓葬，除M1外均为土坑竖穴墓。

M4、M8均为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有半两钱且不见五铢，随葬陶器较为单一，只有陶罐、网坠。M4所出圜底罐可见于涪陵镇安M14[1]，M8所出瓮形罐与涪陵黄溪M2[2]所出相近。由此推测其为西汉早中期墓葬。

M6为宽长方形土坑竖穴墓，出有两套完全相同的鼎、簋、壶仿铜陶礼器，所出陶鼎足较高且略呈蹄状，器腹底部较平，与巫山琵琶洲[3]M5所出较为接近。另出有一把青铜剑。推测应当为西汉早中期墓葬。

M11、M12为宽长方形土坑竖穴墓。随葬器物以陶钵、陶罐、陶豆等为主，不见模型明器。M12所出圜底罐可见于忠县杜家院子M1[4]，推测其年代为西汉中晚期。

M7仅出有一件器盖，与麦沱M35较为相似，可能为新莽时期墓葬[5]。

M1为凸字形砖室墓，其墓葬形制流行于东汉时期。所出圜底罐口部较小，与万州

安全M4[6]中所出相近。所出执物俑、扶耳俑头等为峡江地区东汉常见的陶俑种类，且制作较为粗糙，形体较小，可见于万州安全M12[7]等墓葬中，由此推测其应当为东汉中晚期墓葬。

M2、M3、M5、M9、M10均为长方形或近梯形土坑竖穴墓，没有或只有少量难以辨识的随葬器物，无法确定其年代。

金竹大嘴墓群

金竹大嘴墓群位于重庆市万州区新田镇谭绍村四社长江南岸一处缓坡地带，谭绍村西北380米，新田镇东北2.8千米，万州区以南4.2千米。中心坐标为108°27′E，30°42′N，海拔146～150米。2016年8月，为配合三峡工程重庆库区消落区的文物保护工作，由重庆市文化遗产研究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对其进行了清理发掘，共布正北向10×10平方米探方1个，并进行扩方，发掘面积304.5平方米（图一）。

金竹大嘴墓群分布于长江南岸的一处小台地上，因长期受江水涨退影响，在地表淤积大量泥沙，并包含有较多的植物根茎、石块、现代生产生活垃圾。且由于江水冲刷，墓葬大多被破坏严重，墓室在台地断面处均已露出，保存状况较差。此次发掘共清理5座砖室墓，出土随葬器物7件，以陶瓷器为主，另有铜钱（图三）。

现将具体发掘情况介绍如下：

一、砖　室　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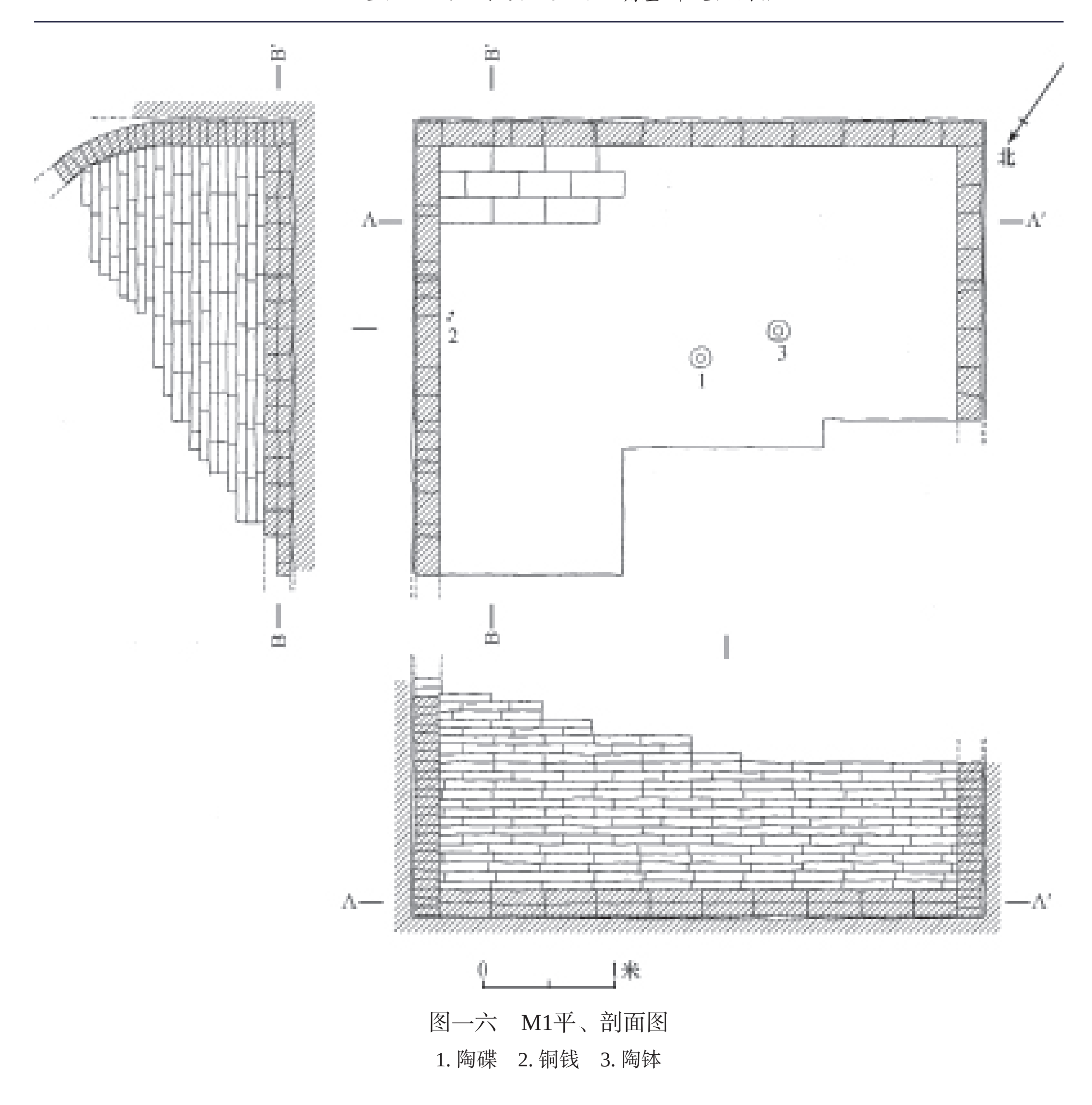
共五座，分别为M1、M2、M3、M4、M5，绕台地呈半环状分布。

1. M1

M1为长方形砖室墓，方向325°。由于江水冲刷影响，M1损坏严重，墓圹亦不明显。墓室平面呈长方形，墓室南壁11层墓砖后起券，券顶塌陷，仅保留墓室南壁部分。墓室残长348、宽420厘米。墓室为券顶，底部较平，有两层铺地砖，横向错缝平铺，墓壁平砖顺砌，残高160厘米。墓砖长38、宽18、厚7厘米；铺地砖长40、宽20、厚10厘米。铺地砖与壁砖同为长方形砖，券顶部分为楔形砖，榫卯部分长1、宽2厘米。纹饰为菱形几何纹，皆朝向墓室。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品集中分布于墓室中部，随葬品共3件，陶碟1件，陶钵1件，铜钱数枚，均残（图一六）。

陶碟　1件。M1∶1，红陶。器表内外施黄褐色釉，敞口，方唇，斜弧腹，下腹部略折，平底。通高3.1、深2.7、口径15.5、底径6.2、器壁厚0.4厘米（图二二，7）。

陶钵　1件。M1∶3，红陶。器表内外施绿褐色釉，器表外釉不及底，敞口，方唇，折腹，平底略内凹。腹部有两道凹弦纹。通高6.3、深5.7、口径16.9、底径6.4、器



图一六 M1平、剖面图
1. 陶碟 2. 铜钱 3. 陶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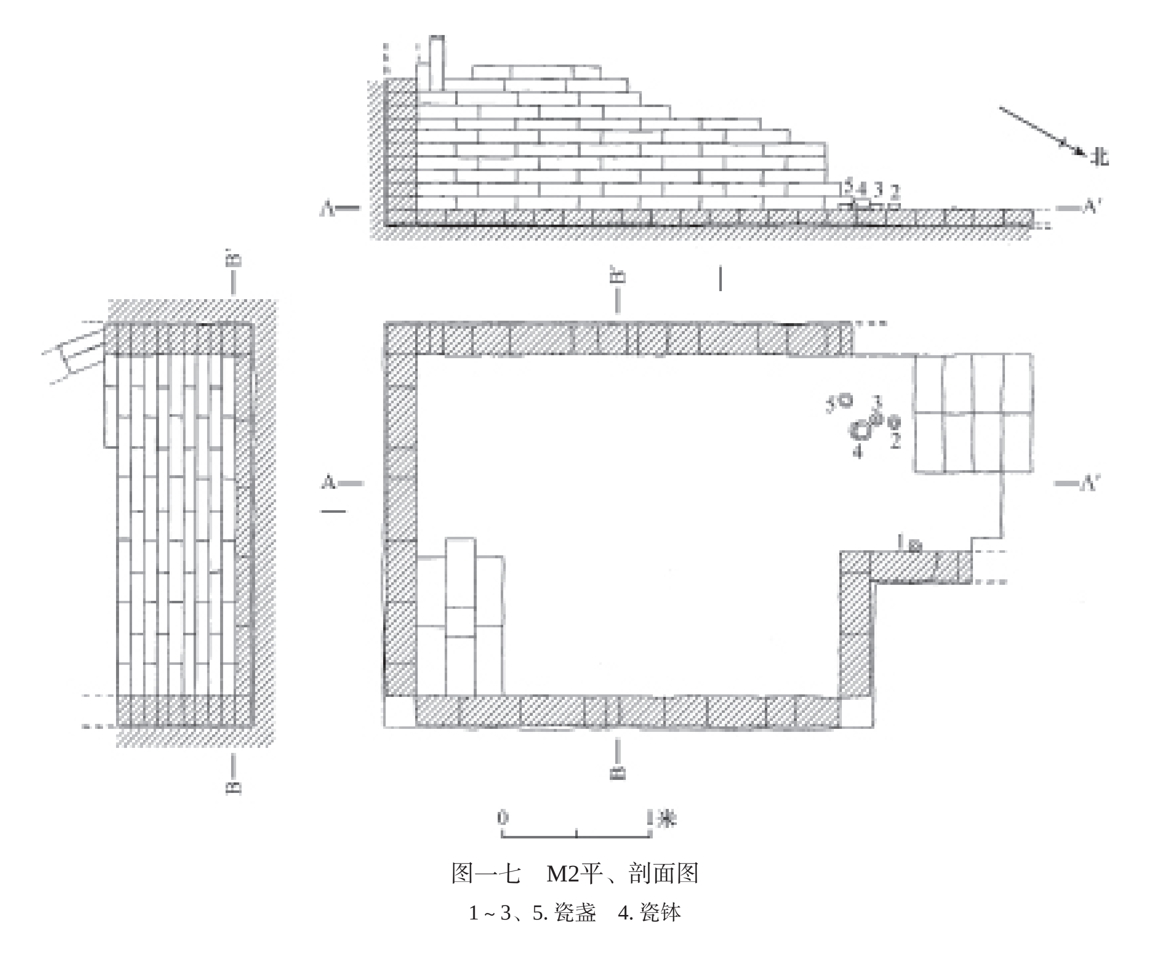
壁厚0.6厘米（图二二，1）。

铜钱 M1：2，1枚，为“五铢”。直径2.6、孔径0.9、厚0.1厘米（图二四，1）。

2. M2

M2为刀把形砖室墓，方向330°。由于江水冲刷影响，M2损坏严重，墓圹亦不明显。由甬道和墓室两部分构成。墓室平面呈长方形，长290、宽232、残高120厘米。甬道平面呈长方形，残长130、宽134、残高45厘米。墓室铺地砖为横向错缝平铺，甬道铺地砖为横向顺缝平铺，铺地砖长43、宽20、厚10厘米。墓壁为平砖错缝顺砌，券顶以下为长方形墓砖，券顶部分为楔形砖，均长42、宽20、厚9厘米。楔形砖凹槽榫卯长宽均为2厘米。纹饰为车轮纹，与万州松岭包墓葬相似，皆朝向墓室。墓顶为券顶，墓壁

10层壁砖后起券，仅剩两块墓顶砖。不见葬具及人骨。随葬品全部位于甬道西侧，共5件，其中包括4件瓷盏和1件瓷钵（图一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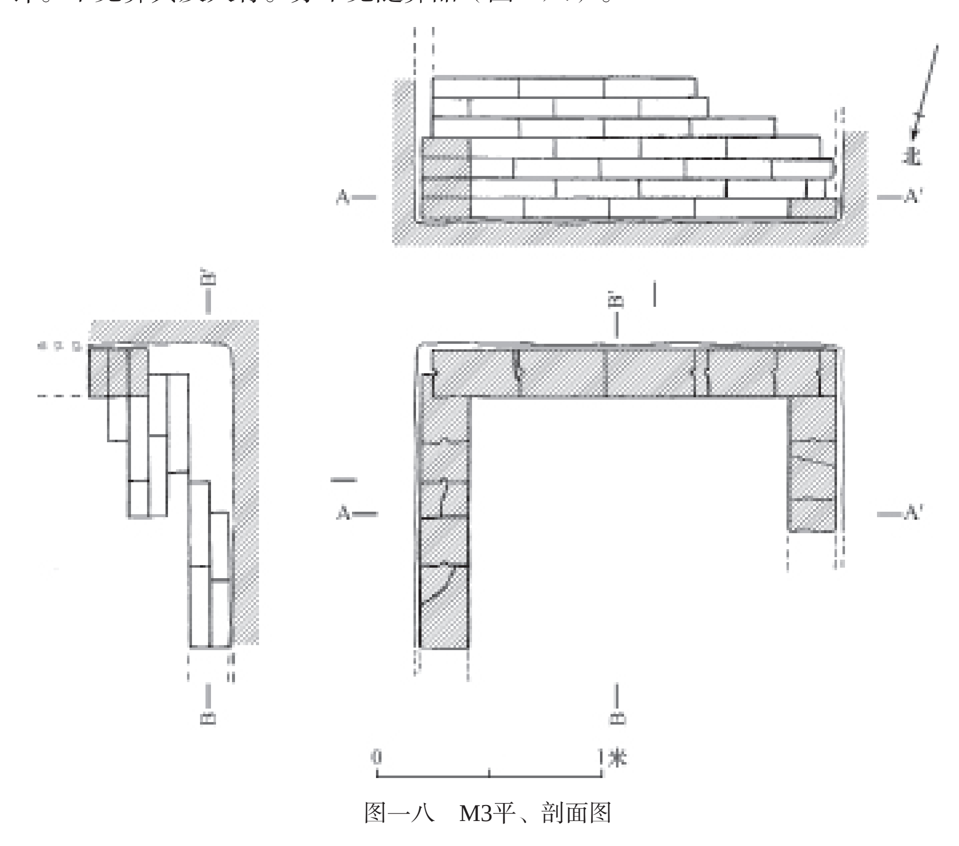
图一七　M2平、剖面图
1～3、5. 瓷盏　4. 瓷钵

瓷盏　4件。M2：1，白胎偏粉，器表施一层白色化妆土。敞口，方唇，弧腹，饼状底。口沿外饰一道凹弦纹。通高3.3、深2.9、口径8.1、底径4.5、器壁厚0.3厘米（图二二，8）。M2：2，白胎，施青釉，器表内外釉不及底。敞口，尖唇，弧腹，盏内底部较平，饼状底。通高3.8、深2.9、口径8、底径4.3、器壁厚0.4厘米（图二二，9）。M2：3，白胎，器表内外施青釉，器表外釉不及底。敞口，尖唇，弧腹，饼状底。口沿外饰一道凹弦纹，内底有3个支钉痕迹。通高3.1、深2.4、口径8.1、底径5、器壁厚0.3厘米（图二三，16）。M2：5，白胎，器表施一层化妆土。敞口，圆唇，弧腹，平底。口沿外饰一道凹弦纹。通高3、深2.6、口径9.1、底径4.6、器壁厚0.3厘米（图二二，10）。

瓷钵　1件。M2：4，白胎。敞口，尖唇，弧腹，饼状底。口沿外饰一道凹弦纹。通高4.5、深3.9、口径12.2、底径7.2、器壁厚0.5厘米（图二二，6）。

3. M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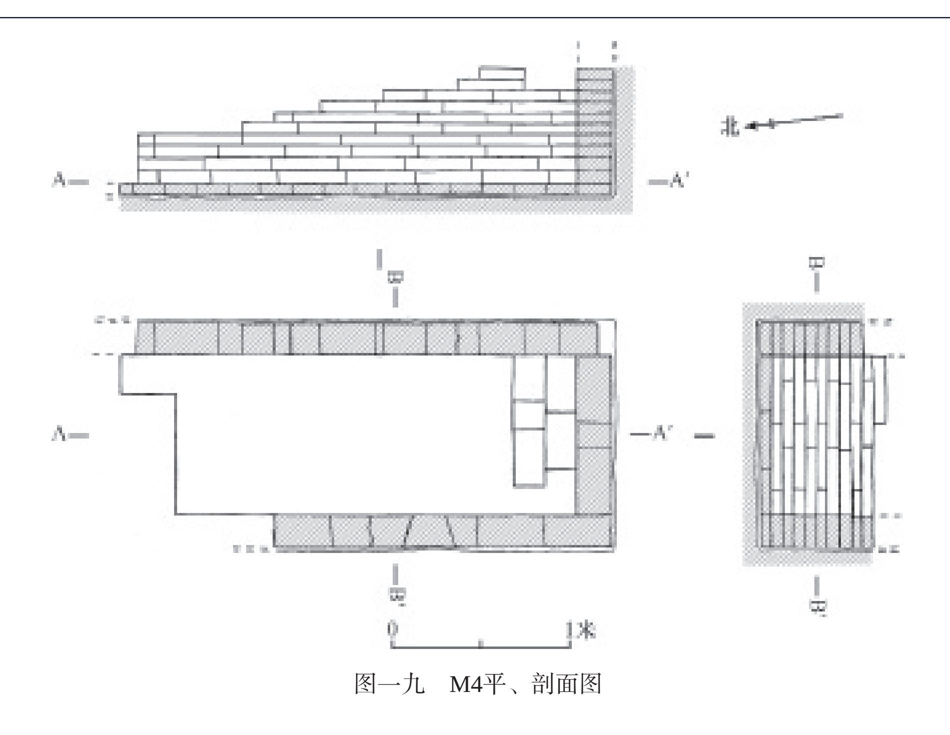
M3为长方形砖室墓，方向345°。由于江水冲刷影响，M3损坏严重，墓圹亦不明显。墓室平面近长方形，残长112、宽142、残高62厘米。墓室无铺地砖，墓壁残损严重，为平砖错缝顺砌，有长方形墓砖和楔形砖两种，纹饰皆为菱形几何纹且皆朝向墓室，长38、宽21、厚9厘米。楔形砖只见凹槽不见凸榫头，凹槽长宽均为2厘米。墓顶情况不详。不见葬具及人骨。亦不见随葬品（图一八）。



图一八　M3平、剖面图

4. M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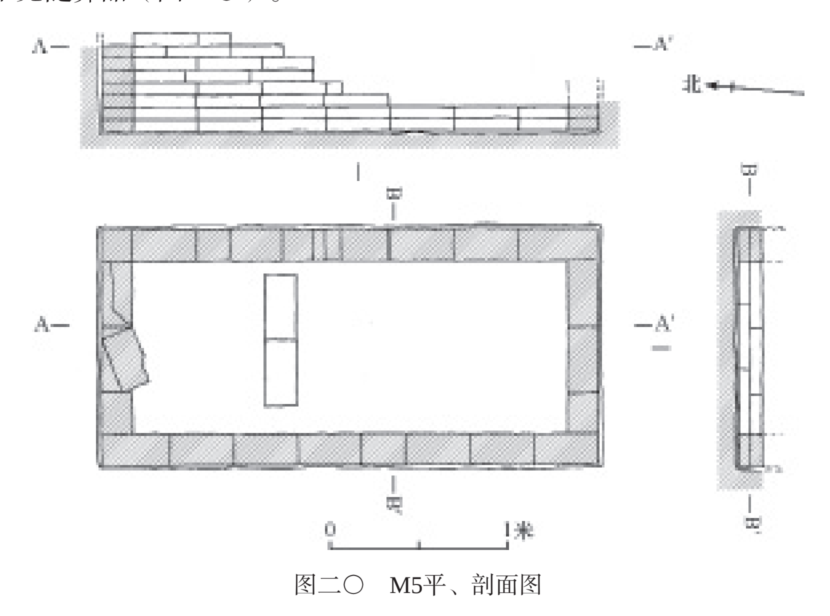
M4为长方形砖室墓，方向6°。由于江水冲刷影响，M4损坏严重，墓圹亦不明显。M4墓室部分残长250、宽90、残高70厘米，墓室地面有铺地砖，为横向错缝平铺，地砖长32、宽18、厚6厘米。墓壁为平砖错缝顺砌，长方形墓砖，长38、宽18、厚7厘米，为榫卯结构，榫卯部位长2、宽2厘米。纹饰皆为菱形几何纹，朝向墓室。墓顶情况不详。不见葬具及人骨。亦不见随葬品（图一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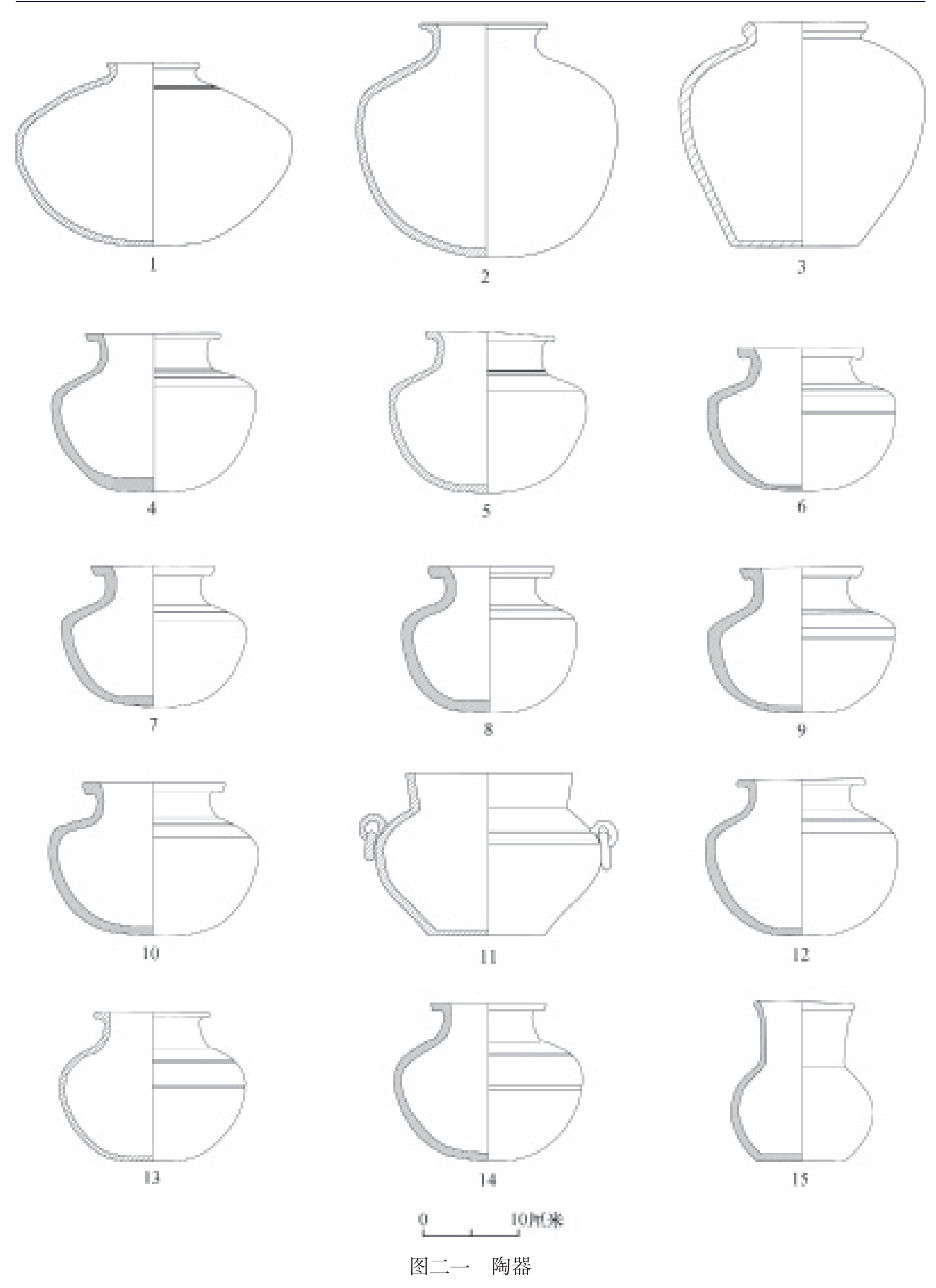
图一九　M4平、剖面图

5. M5

M5为长方形砖室墓，方向355°。由于江水冲刷影响，M5损坏严重，墓圹亦不明显。墓室长250、宽98、残高57厘米，8层墓砖。地面仅余两块铺地砖，与壁砖大小一致，初步判断为横向错缝平铺，砖长46、宽18、厚7厘米。墓壁为平砖错缝顺砌。墓砖均为长方形砖，纹饰皆为菱形几何纹，花纹朝向墓室。墓顶情况不详。不见葬具及人骨。亦不见随葬品（图二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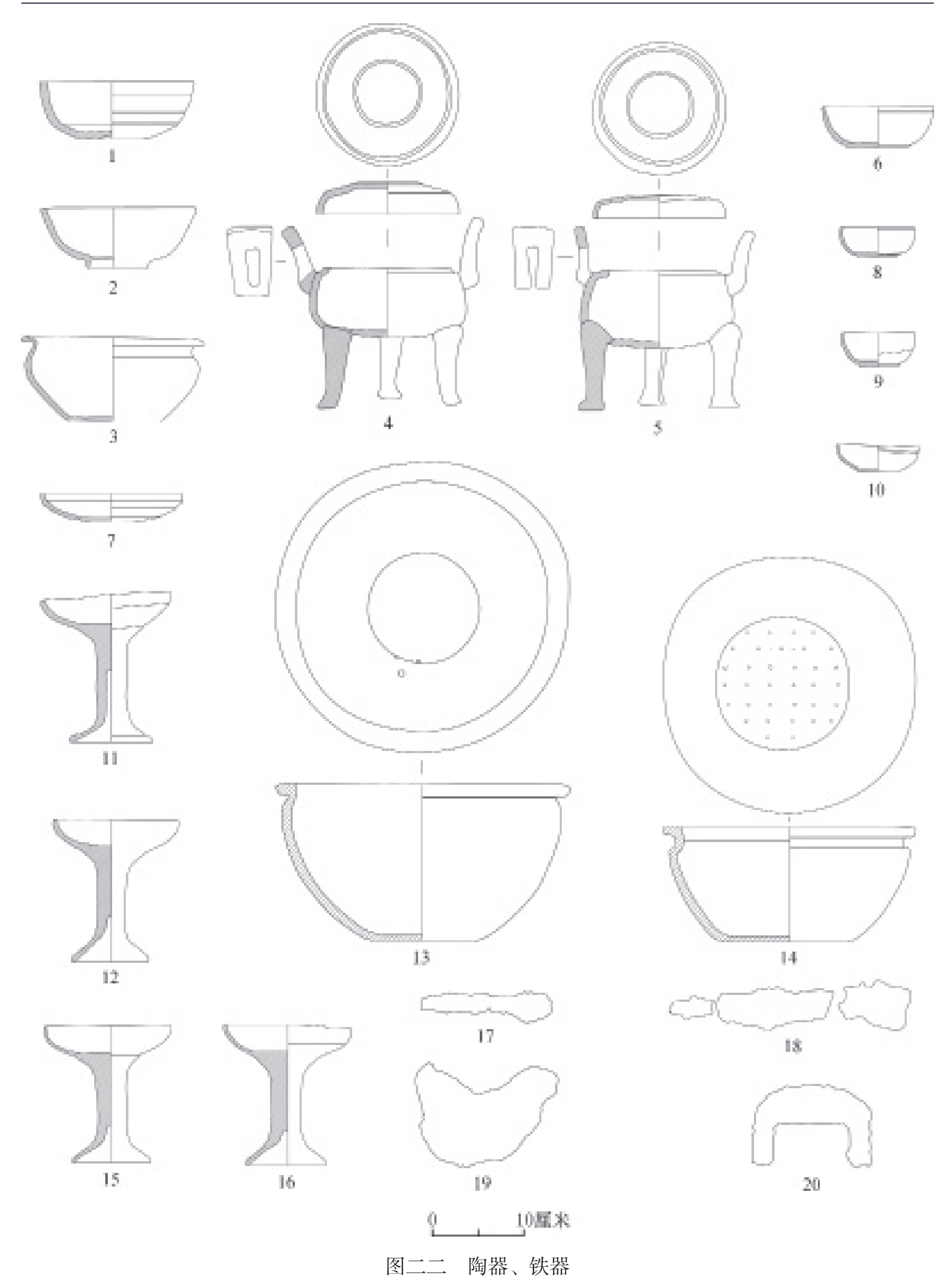


图二〇　M5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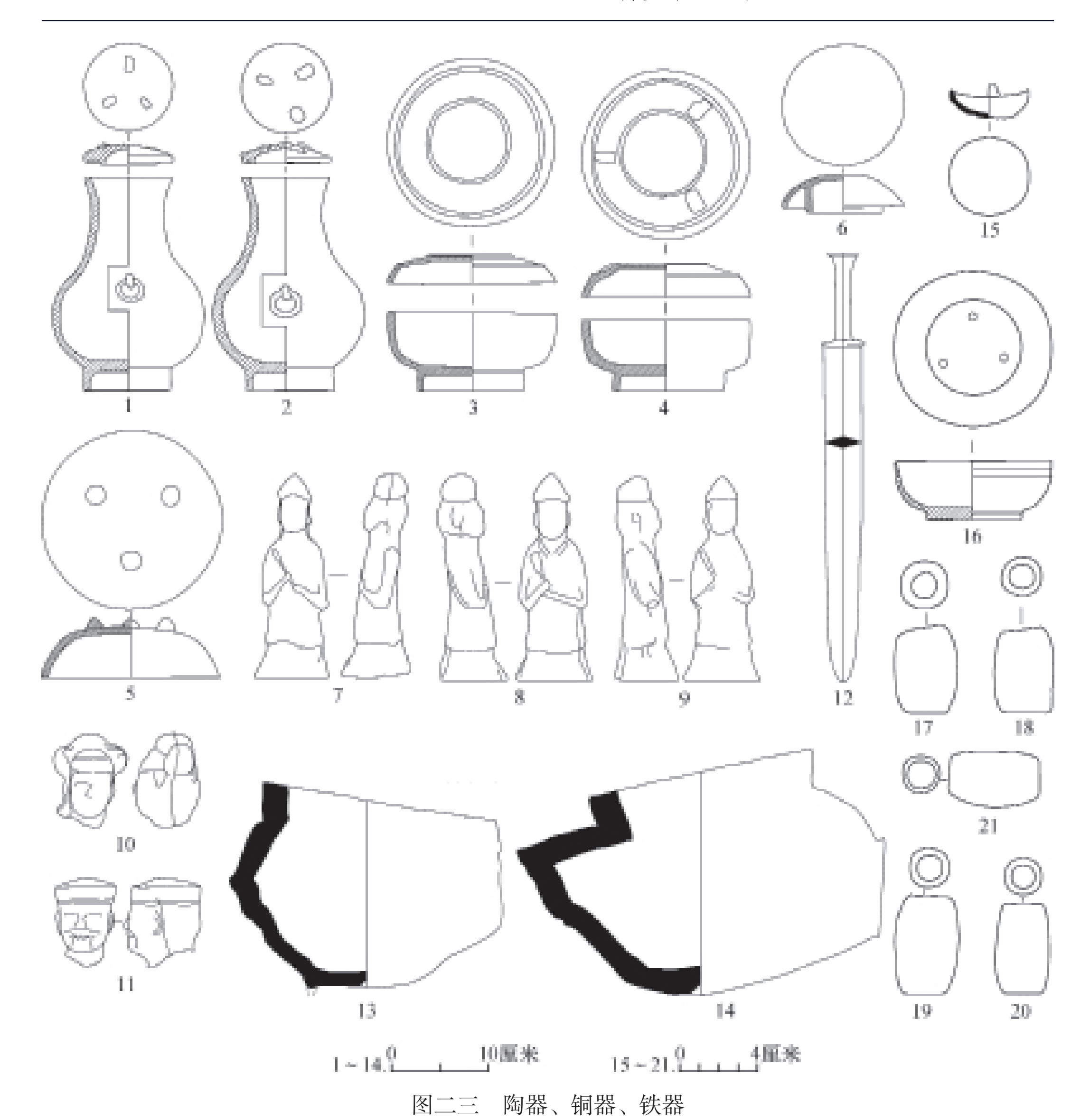
图二一 陶器

1～15. 陶罐（WWM1：5、WWM4：3、WWM8：1、WWM12：1、WWM12：2、WWM12：3、WWM12：4、WWM12：5、WWM12：9、WWM12：10、WWM12：11、WWM12：12、WWM4：1、WWM4：2、WWM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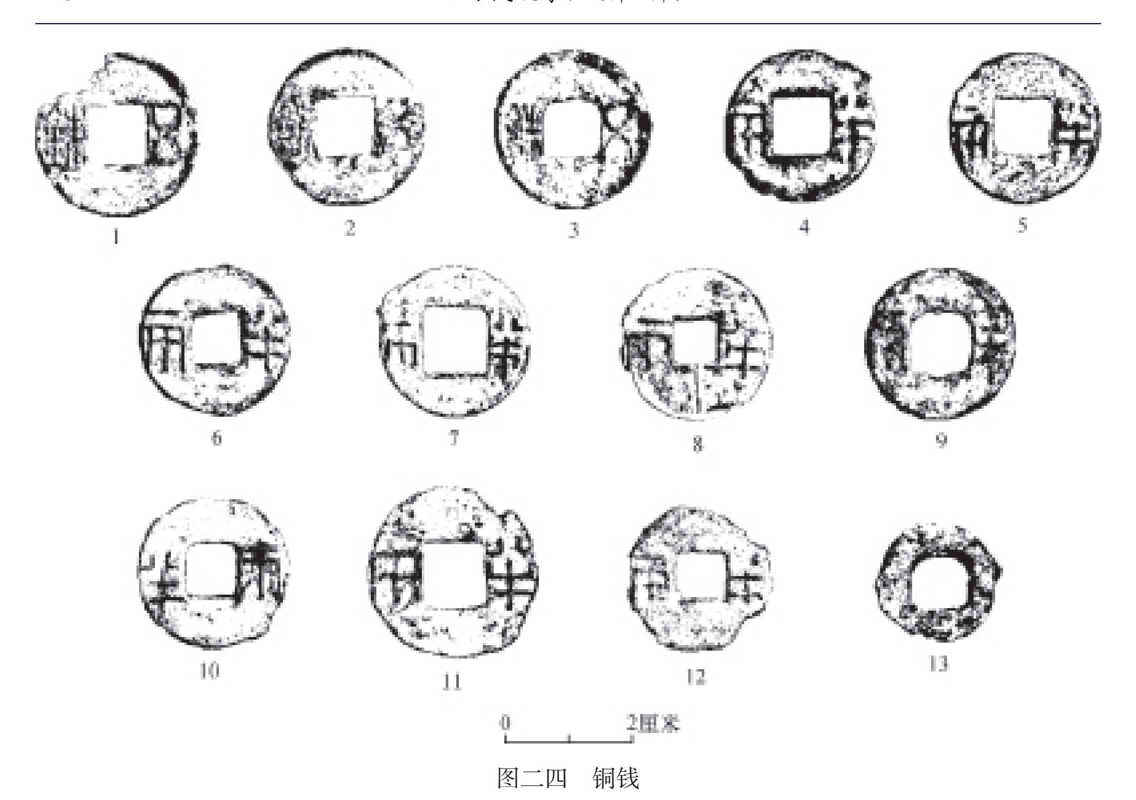
图二二　陶器、铁器

1～3、6. 陶钵（WJM1：3、WWM1：10、WWM11：1、WJM2：4）　4、5. 陶鼎（WWM6：2、WWM6：1）　7. 陶碟（WJM1：1）　8～10. 瓷盏（WJM2：1、WJM2：2、WJM2：5）　11、12、15、16. 陶豆（WWM11：5、WWM11：3、WWM11：4、WWM11：6）　13、14. 陶甑（WWM12：7、WWM4：4）　17、18. 铁剑（WWM12：13、WWM1：9）　19. 铁器（WWM12：14）　20. 铁捕（采集）



图二三 陶器、铜器、铁器

1、2. 陶壶（WWM6：3、WWM6：4） 3、4. 陶簋（WWM6：5、WWM6：6） 5、6. 陶器盖（WWM7：1、WWM12：8） 7～9. 陶俑（WWM1：1、WWM1：7、WWM1：8） 10、11. 人俑头（WWM1：3-1、2） 12. 青铜剑（WWM6：7） 13、14. 铁鼎（WWM4：5、WWM12：6） 15. 铜泡（WWM1：6） 16. 青瓷盏（WJM2：3） 17～21. 陶网坠（WWM4：6-1～5）



图二四　铜钱

1～3. 五铢（WJM1：2，WWM1：2-1、2）　4～12. 半两（WWM4：7-1～8，WWM8：2）　13. 铜钱（WWM9：1）

二、墓葬年代探讨及相关认识

此次清理的五座墓葬均为砖室墓，墓葬保存状况较差，部分墓葬前部已被江水冲毁。就现有发掘情况而言，墓葬平面以长方形或带甬道的刀把形为主，除M1、M2保留部分券顶外，其余墓葬上部结构不明。砖室墓于峡江地区于王莽时期出现，东汉时期成为主流[8]。

M1所出“五铢” 朱字圆折，其年代应当在王莽之后[9]。所出陶碟为红陶施黄褐色釉，陶钵微红陶施绿釉，均常见于峡江东汉墓葬中[10]。

M2所出青瓷盏、青瓷钵具有较为鲜明的六朝时期特点，在峡江地区的六朝墓中多有出现，如赵家湾M18[11]。

M3、M4、M5无随葬品，从菱形几何纹的花纹砖和榫卯砖推测，应当为东汉时期墓葬。

结　　语

瓦子坝墓地位于今万州区长江南岸的新乡镇，与武陵县隔江相望。西南民族大学分别于2015年和2016年在瓦子坝墓地北部的天王丘墓地进行发掘。瓦子坝墓地墓葬分布集中，受埋藏环境影响，墓葬保存状况参差不齐，随葬器物主要集中于部分墓葬。就墓葬本身及随葬品而言，其形制及组合风格相似。通过对砖室墓及土坑墓形制、随葬品特征、墓砖砌筑方式及纹饰特征等分别比对后，推测长江两岸等这些墓葬，可能为该地区居民于东汉晚期至六朝期间集中埋葬的区域。

金竹大嘴墓群位于今万州区长江南岸的新田镇。由于墓葬在江水冲刷后的沿岸断层中部分暴露，保存状况参差不齐，随葬器物集中于M1、M2中。就墓葬本身及随葬品而言，其形制及组合风格相似。通过对墓葬形制M1及M2随葬品特征、墓砖砌筑方式及纹饰等比对后，推测该墓群可能为该地区居民于六朝时期集中埋葬的区域。

其中，瓦子坝M1，金竹大嘴M1、M2保存较为完整，墓室结构较完好，随葬器物丰富，为研究长江沿岸该类砖室墓形制演化、其与土坑墓及居址的关系、随葬器物的制作工艺与商品化、墓砖砌筑方式与纹饰特征等问题均提供类可靠的资料。

附记：本次考古发掘领队为汪伟，执行领队为李梅田，参加发掘的人员有乔汉英、郭东珺、罗忠武等，本次发掘工作得到了万州市博物馆的大力支持，在此谨表谢忱。

摄影：郭东珺、陈昊雯、严秀娟
绘图：郭东珺、乔汉英、杨好
整理：乔汉英、乔峡、李增辉
执笔：郭东珺、乔峡

注　　释

［1］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三峡队，重庆市涪陵区博物馆. 涪陵镇安遗址发掘报告［A］.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9卷［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6：745～786.

［2］　四川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涪陵县文化馆. 四川涪陵西汉土坑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84（4）：340.

［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三峡工作队. 巫山琵琶洲遗址发掘报告［A］. 重庆库区考古报告集1998卷［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175～180.

［4］　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重庆市忠县文物管理所. 重庆市忠县杜家院子遗址2001年度发掘简报［A］. 成都考古发现（2001）［A］.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409.

［5］ 重庆市文化局，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巫山县文物管理所. 重庆巫山麦沱汉墓群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99（2）：168.
［6］ 重庆市文化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重庆万州安全墓地1998年汉墓发掘简报［J］. 文博，2001（4）：12.
［7］ 同［6］：18～20.
［8］ 蒋晓春. 三峡地区秦汉墓研究［M］，成都：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2010.
［9］ 洛阳区考古发掘队. 洛阳烧沟汉墓［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
［10］ 武汉大学考古及博物馆系，武汉大学科技考古中心. 重庆奉节赵家湾墓地2004年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09（1）：32～34.
［11］ 同［10］：45.

A Preliminary Report of 2016 excavation at the Waziba and Jinzhudazui cemetery, Wanzhou, Chongqing

Chongqing Cultural Heritage Research Institute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 Studies

Abstract: In August and September of 2016, an archaeological team of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excavated Waziba and Jinzhudazui Cemetery in Wanzhou County, Chongqing City. There are 11 earth-pit tombs with both rectangle and wide rectangle forms, and 6 brick-chambered tombs which are oblong, knife-shaped with a vault and “凸”-shaped with a vault. The dating of these tombs are from Han to Six =Dynasties. 56 burial goods were unearthed, include pottery, porcelain, bronze, copper coins and iron artifacts. In addition,the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rs collected 1 iron *cha* (shovel)(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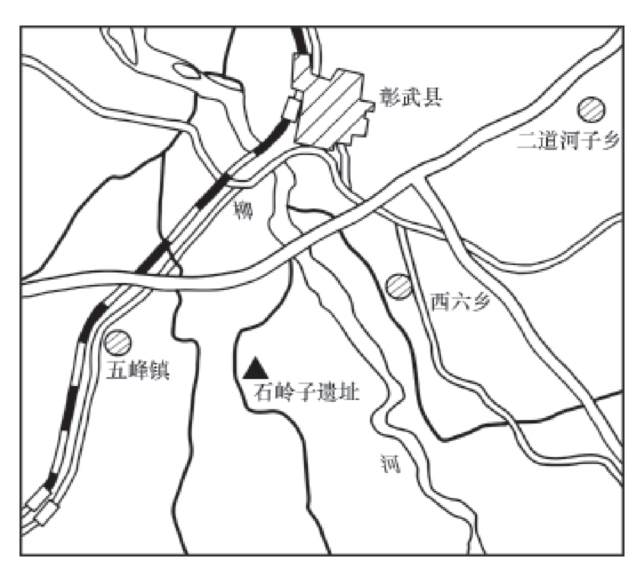
Key words: Chongqing Wanzhou Waziba Jinzhudazui; Six dynasties from Han; earth-pit tombs; brick-chambered tombs

辽宁省彰武县石岭子金代遗址发掘简报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1]　彰武县文物管理所[2]

（1.沈阳，110003；2.彰武，123200）

石岭子遗址位于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五峰镇石岭子村西700米的耕地中（图一），遗址中心点GPS坐标：42°17'16.2"N，122°30'10.1"E，海拔80米。遗址地处一平缓的小山包西南侧，南为石团线公路，地表种植有玉米、花生等。2015年为配合通辽连接京沈客专快速铁路（辽宁段）项目的实施，经我所考古调查和勘探后，确定该遗址是一处文化内涵丰富的辽金时期遗址。2016年6月中旬至7月中旬，我所联合彰武县文物管理所对石岭子遗址进行了抢救性考古发掘。此次发掘在铁路沿线内布5米×5米探方20个，发掘面积500平方米，清理出房址7座，灰坑3座，灰沟2条，室外灶1座（图二）。出土遗物有陶器、瓷器、铁器、铜器、骨器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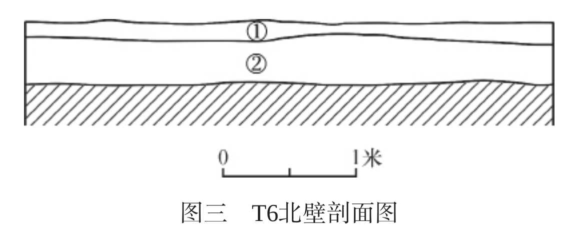
图一　石岭子遗址位置示意图

0　　4米

图二　石岭子遗址总平面图

一、地层堆积

该遗址地层堆积较为简单，可分为两层。现以T6北壁剖面为例（图三）。



图三　T6北壁剖面图

第1层：耕土层，呈灰褐色，土质疏松，植物根系发达，包含有少量的瓷片、泥质灰陶片、小砾石及现代遗物等，厚8～18厘米。

第2层：金代文化层，呈深灰色，土质较疏松，包含有大量陶瓷片，可辨器形有陶罐、陶盆、白釉瓷碗、布纹瓦等，深约8～18厘米，厚约0.3～0.5米。所有遗迹均开口于此层下。

第二层下即为生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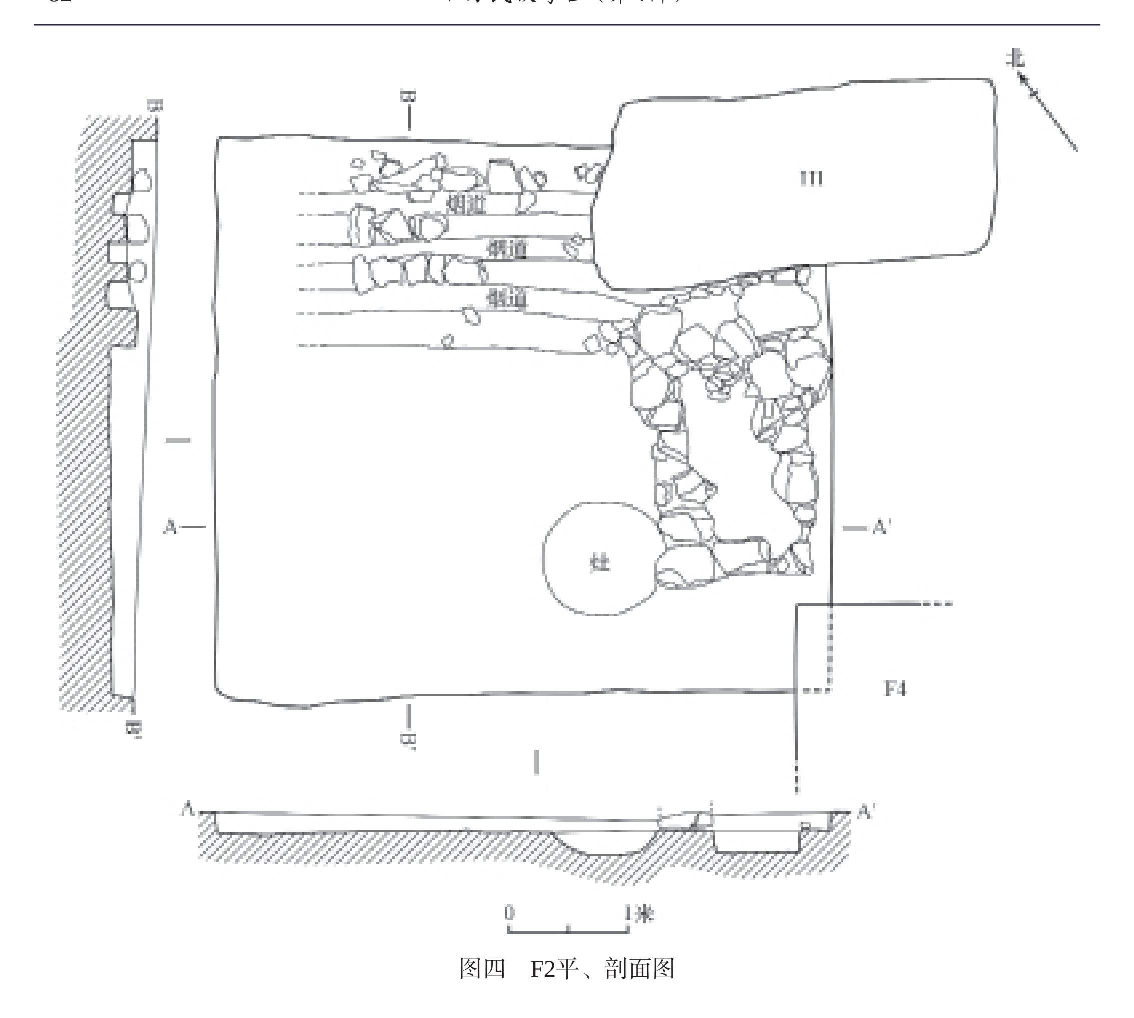
二、遗　　迹

1. 房址

此次发掘共清理房址7座，总体保存情况较差，均为半地穴式，开口于第2层下，打破生土，地上部分均已无存，仅存地下部分；室内均有灶及火炕；门道虽都不存，但依据室内火炕的位置，可知房屋均为南北向；其建造方法系在原地面向下挖掘而成，半地穴穴壁较直；居住面平坦坚硬，局部有踩踏痕迹；火炕和灶系在生土之上挖掘形成，灶均位于房址的东侧或西侧，通过火眼与火炕烟道相连。现选其保存较好者做一介绍。

F2　位于T7和T11内，东北角被H1打破，东南角被F4打破，平面呈近方形，东西长约5.1米，南北宽约4.7米，半地穴穴壁残深约0.2米。房屋方向约325°（图四、图五，1）。灶位于房址东南部，与火炕相连，现仅存灶坑。灶坑开口近似圆形，弧壁，圜底，直径约0.95米，现存深约0.2米，灶坑内部包含大量红烧土及黑灰。炕呈曲尺形，依附于房址的东壁和北壁而建，东北部被H1打破损坏，残高0.24米。东炕由南向北延伸，折而向西形成北炕。东炕炕面边缘炕板石犹存，中部炕面坍塌，其下烟道损坏，内部出土铁犁1件，南北残长2.4～2.6米，东西宽1.3～1.7米。北炕仅残存三条烟道，东西残长2.3～2.7米，南北残宽1.7米。烟道由东向西逐渐抬升，末端残，宽0.16～0.24米，深0.18～0.25米。烟道两侧的土质烟墙上残存有少量石块，宽0.2～0.32米。烟囱无存，但根据烟道走向，应位于房址西北角。房址内堆积为深灰色土，出土有瓷碗、陶罐、陶盆、铁铧、铁镞、铁刀、铁凿、铁环、石陶拍、铜钱等遗物。

F4　位于T3、T4、T7及T8内，西北角打破F2。平面近似长方形，南北长4.8米，东西宽4.4米。半地穴穴壁残深约0.2～0.3米。房屋方向约322°（图五，2、图六）。灶位于房址内西部居中，灶坑开口近似圆形，弧壁，平底，坑壁边缘垒砌石块，直径约0.5米，深0.45米；灶坑壁残存有红褐色烧结层，坑底残存大量草木灰，坑内出土陶罐1个，圆瓷饼1枚、瓷罐1个；灶北壁有三个火眼与火炕三条烟道相连，南壁有一方形灶门，边长约0.24米。灶门外为一操作坑，大小形制与灶近似，内部残存大量黑灰。炕呈曲尺形，依附房址西壁和北壁而建，仅剩三条烟道，残高0.25米。三条烟道自灶连接处开始，由南向北，继而折向东，末端汇聚连接烟囱。烟道接近灶的部分深而宽且火烧痕



图四　F2平、剖面图

迹较明显，后半部窄而浅且逐渐呈抬升趋势，其两侧有火烧烟熏痕迹，内存有大量的黑灰土。烟道深0.1～0.5米，宽0.1～0.3米。土质烟墙宽0.2～0.4米。烟囱位于房址内东北角外部，开口近似圆形，直壁、平底，直径0.26米，深0.25米。房址内倒塌堆积为深灰色土，包含有大量碎石块，出土遗物较丰富有陶罐、瓷碗、陶圆饼、陶球、铁刀、铁带扣、铁条、棋子、铜发饰、铜钱等遗物。

F6　位于T15、T16和T20内，平面呈梯形，东西长约2.8～3.7米，南北进深约3.2米，半地穴穴壁残深约0.15米。房屋方向约340°（图七）。灶位于房址东南部，仅存灶坑。灶坑开口近似圆形，弧壁，圜底，直径约0.8米，现存深约0.3米，灶坑壁面有红褐色烧结面，内部包含大量红烧土及黑灰。炕位于房址北部，仅存三条烟道，残高0.1米。烟道呈曲尺形，南端通过三个火眼与灶相接，自南向北继而折向西，末端汇聚，连接烟囱。三条烟道自灶始逐渐抬升，内存满大量黑灰，烟道宽0.1～0.3米，深0.1～0.25米，烟道两侧为黄色土质烟墙，壁面残留烟熏痕迹，宽0.1～0.3米。烟囱位于房址西北角，平面呈圆形，直壁，平底，内存少量黑灰，直径0.35米，深0.2米。房址内堆积为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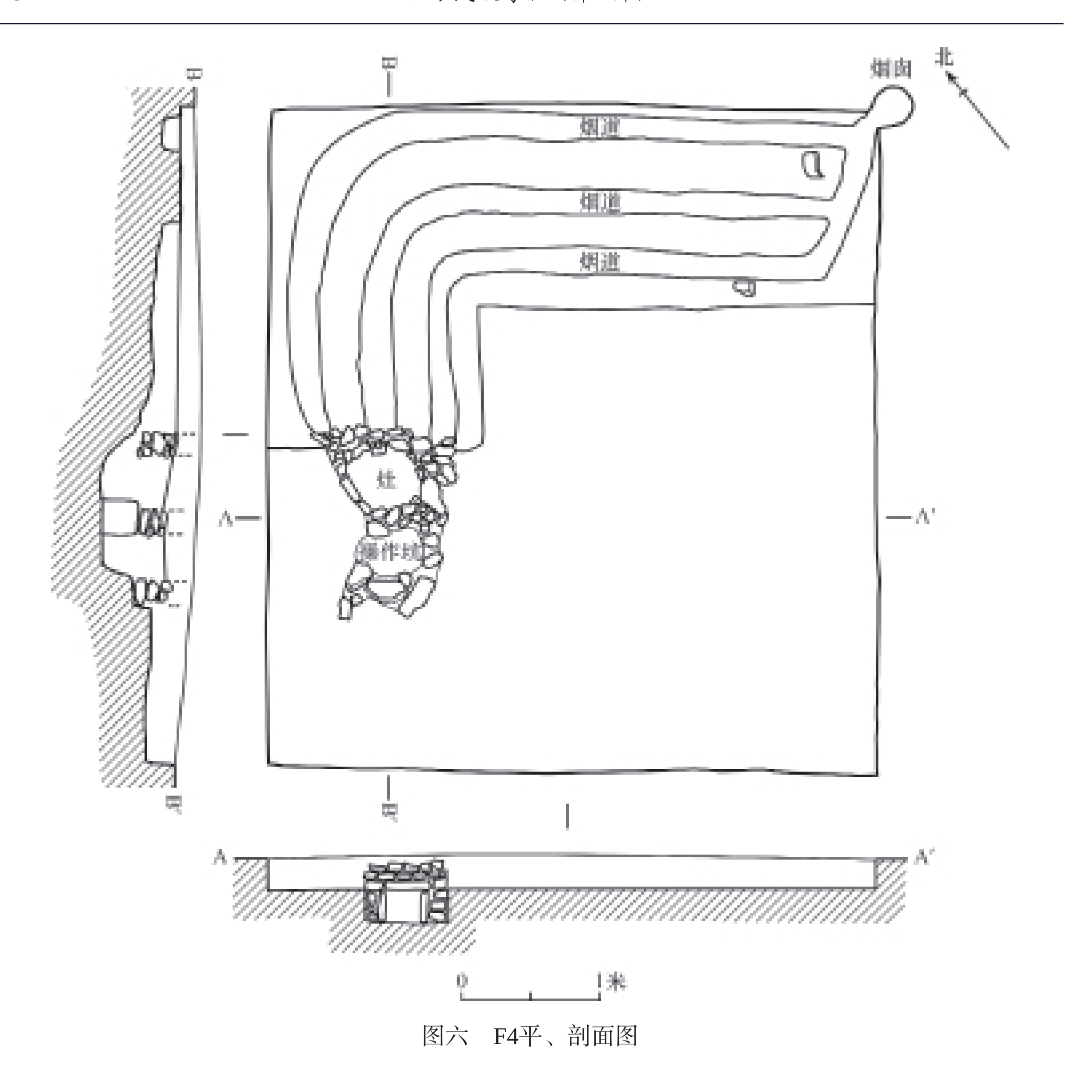
1



2

图五　现场照片

1. F2现场照片　2. F4现场照片



图六　F4平、剖面图

灰色土，出土有陶罐、陶盆、陶圆饼、陶纺轮、瓷碗、鸡腿坛、铁刀、铁马衔、铜钱等遗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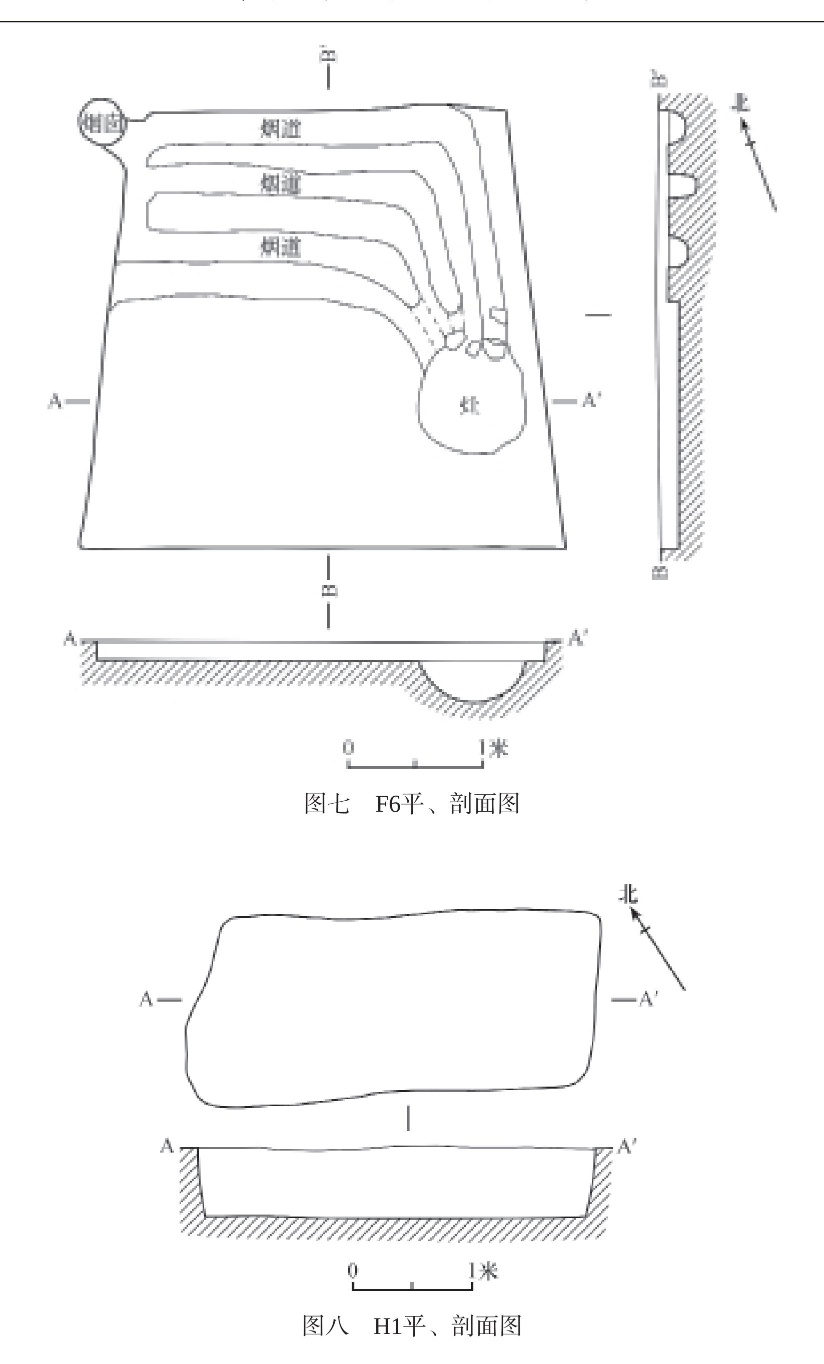
2. 灰坑

灰坑共3座，均开口于第2层下，其中H1出土遗物较多，现做一介绍。

H1　位于T7、T8、T11、T12内，开口呈不规则圆角长方形，斜直壁，平底。坑口长3.1～3.4米，宽约1.5米，坑深约0.6米（图八）。坑内堆积成黑灰色，土质松软，夹杂有草木灰、木炭屑。出土有陶瓷残片、铁钉、兽骨、铁镞、铜环、铜钱等。

3. 灰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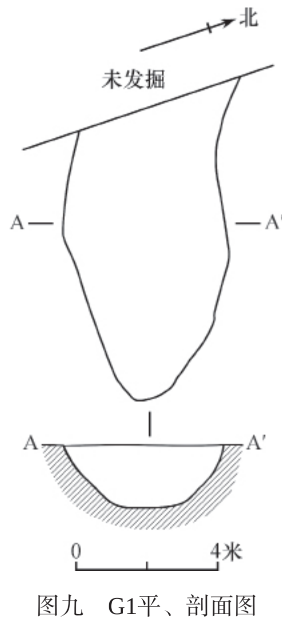
灰沟共2条，均开口于第2层下，现将G1做一介绍。



图七　F6平、剖面图

图八　H1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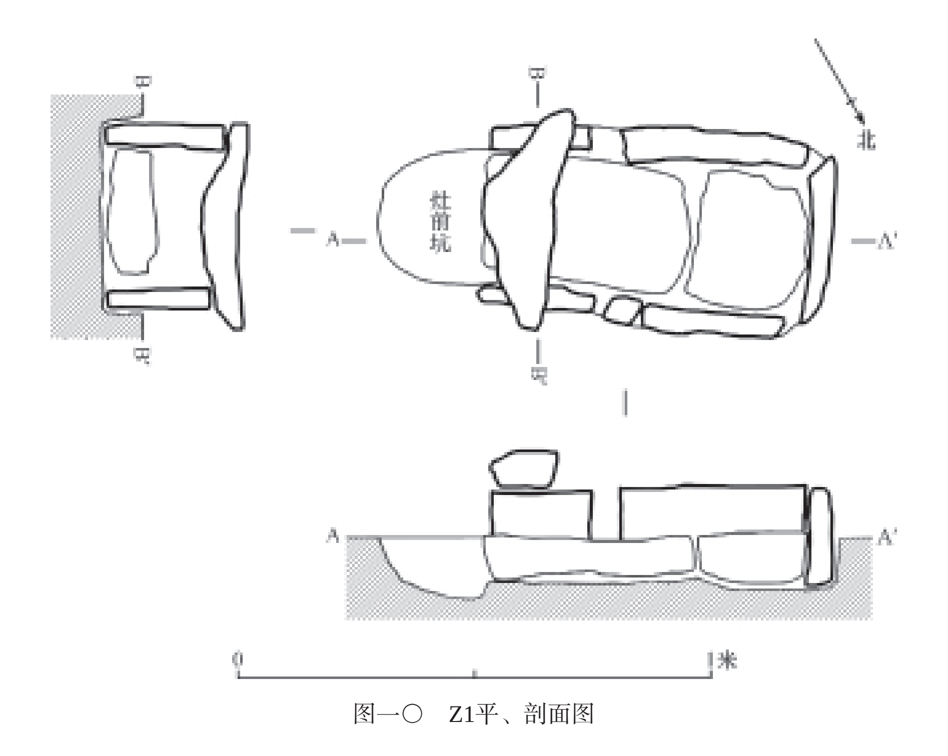
G1　位于T13、T14、T17、T18内，由东南向西北延伸，未发掘完（图九）。平面呈长条形，弧壁，平底。宽4.6米，深1.76米。坑内堆积土呈黑褐色，较松软，夹杂有红烧土颗粒，木炭屑。另外坑底似有烟道痕迹，推测此沟应是房址废弃以后所形成。出土有陶罐、陶盆、陶纺轮、陶圆饼、瓷碗、瓷盘、瓷碟、铜钱等遗物。



图九　G1平、剖面图

4. 室外灶

Z1　该灶位于F4东侧，独立存在，形制较规整。平面呈长方形，长约0.75米，宽约0.4米（图一〇），方向约150°。其建造方法为在地面挖掘一长方形浅坑，底部铺砌



图一〇　Z1平、剖面图

两块青石，边缘竖立石块，石块有红烧痕迹。前端竖立两块较规整的板石，其上搭三角形长石，形成灶门，灶门宽0.38米，高0.3米。灶门前有一半圆形浅坑，系掏灰所用，弧壁，圜底，内含大量黑灰，直径0.27米，深0.13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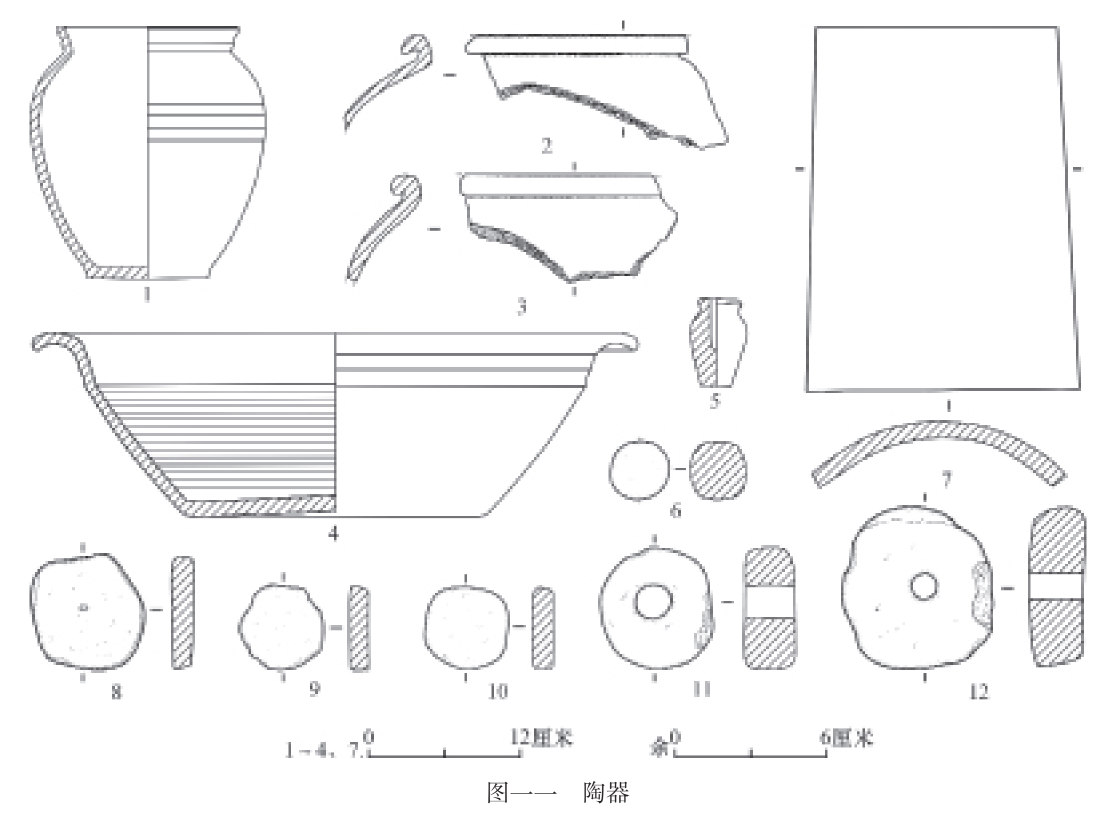
三、出土遗物

（一）陶　　器

陶器较为丰富，多为残片，主要为生活类用器，以罐、盆为主。几乎全为泥质灰陶，素面居多，少量器表磨光，纹饰有弦纹、附加堆纹、戳刺麻点纹等，均为轮制。

罐　3件。均为泥质灰陶。标本F4：6，侈口，圆唇，矮领，溜肩，弧腹，平底。颈部贴附有一周附加堆纹，上腹部饰有四周凸弦纹。口径14.3、底径9.5、高20.1厘米（图一一，1）。标本G2：1，素面，卷沿，侈口，溜肩。残高9.1厘米（图一一，2）。标本G2：2，素面，口微卷，侈口，溜肩。残高8.4厘米（图一一，3）。

陶盆　1件。 标本G1：4，泥质灰陶。素面，轮制。敞口，平沿下卷，口沿下饰两周凹槽，斜直腹，内壁饰弦纹，平底内凸。口径48.2、底径23.6、高14.7厘米（图



图一一　陶器

1～3. 罐（F4：6、G2：1、G2：2）　4. 盆（G1：4）　5. 壶（F7：1）　6. 球（F4：3）　7. 板瓦（F6：6）　8～10. 圆饼（G1：3、F6：7、F1：5）　11、12. 纺轮（F6：3、G1：13）

一一，4）。

壶　1件。标本F7：1，似非实用器，泥质灰陶。素面，器表磨光。口微侈，圆唇，矮领，溜肩，上腹部外鼓，平底。口径1.5、底径1.2、高3.5厘米（图一一，5）。

圆饼　9件。用材取于陶片，大小不一，厚薄不均，打制或磨制而成。标本G1：3，呈不规则圆形，由泥质灰陶片打制而成，单面居中钻孔，未透。直径4.7、厚0.8厘米（图一一，8）。标本F6：7，圆形，由泥质灰陶片打制而成。直径3.3、厚0.7厘米（图一一，9）。标本F1：5，圆形，由泥质灰陶片磨制而成。直径3.3、厚0.8厘米（图一一，10）。

纺轮　2件。标本F6：3，夹沙灰褐陶。圆形，中部有孔。直径4.7、孔径1.3、厚2厘米（图一一，11）。标本G1：13，由布纹瓦磨制而成，呈不规则圆形，中部有孔。直径6.2、孔径1、厚2.1厘米（图一一，12）。

球　1件。标本F4：3，夹沙灰褐陶。直径2.3厘米（图一一，6）。

板瓦　1件。标本F6：6，泥质灰陶。平面呈梯形，外面素面光滑，内面有细布纹。长28.7、厚1.3厘米（图一一，7）。

（二）瓷　　器

瓷器较为丰富，多为残片，少有完整器，基本为生活实用器，器形主要为碗，兼有碟、盘、鸡腿坛、缸、瓮、俑等。胎质坚硬，多呈黄褐色、紫黑色。釉下多施一层化妆土，釉色主要为灰白釉、黄白釉，少见茶叶末釉、青釉等，施釉多不及底，甚至是半釉，器底外侧露胎，内侧留有明显的垫渣痕或涩圈，部分器物外底部中心有乳突。

罐　1件。标本F2：8，口、底均残，细颈，溜肩，斜腹。灰白色胎，通体施白釉。肩径3.8、残高3.4厘米（图一二，18）。

碗　12件。数量虽多，但多为形制相同和相似者。依据腹部形态分为三型。

A型　1件。斜腹。标本G1：10，圆唇，敞口，腹部略弧，圈足略外撇。胎体坚硬，呈黄褐色。灰白釉下施白色化妆土，外壁半釉，内壁满釉，底部残留2个支钉痕。口径23.8、底径7.7、高8.6厘米（图一二，1、图一三，1）。

B型　6件。弧腹。标本F7：3，圆唇，敞口，下腹部饰有四周凸弦纹，圈足。通体施灰白釉，外壁施釉不均，内底有刮釉形成的涩圈，外底露胎。口径24、底径7.2、高7.5厘米（图一二，2）。标本F4：12，圆唇，敞口，下腹部饰两周细弦纹，圈足。胎体粗糙，呈黄褐色。通体施一层化妆土，其上再施黄白釉，内底部有刮釉形成的涩圈，外底部露胎。口径23.9、底径7.4、高9厘米（图一二，3）。标本F1：2，形制和施釉均与F7：3相同，胎体略厚。口径22.7、底径6.6、高7.7厘米（图一二，4）。标本F4：13，形制和施釉均与F4：12相同，胎体略厚。口径24.7、底径7、高8.9厘米（图一二，5、图一三，2）。标本F2：13，圆唇，敞口，下腹部饰有两周凸棱，圈足。胎呈淡黄色，胎

体较薄。通体施灰白釉，有开片纹，内底有刮釉形成的涩圈，外底部露胎。口径19.7、底径6.4、高7厘米（图一二，6）。标本F4：11，圆唇，敞口，圈足。胎质坚硬，呈黄褐色。灰白釉，外壁半釉且施釉不均，有流釉现象；内壁满釉，底部有刮釉形成的涩圈。口径18.7、底径5.6、高6厘米（图一二，8、图一三，3）。

C型　5件。曲腹。依据唇部形态可分二亚型。

Ca型　4件。方唇。外口沿下饰有一周凹槽，矮圈足。胎体坚硬且较厚。灰白釉下施白色化妆土，外壁半釉且有流釉现象；内壁满釉。标本G1：1，直口。胎呈紫黑色。口径23.7、底径9.7、高10厘米（图一二，7）。标本G1：2，口微侈。胎呈黄褐色。口径22.8、底径9.6、高9.2厘米（图一二，9）。标本G1：11，直口，外足底中心有一乳突。胎黄褐色。内底部残留一个支钉痕。口径20.1、底径7.8、高10.5厘米（图一二，10、图一三，4）。标本G1：12，口微侈。胎呈紫黑色内底部残留两个支钉痕。口径20.6、底径8.6、高10厘米（图一二，14）。

Cb型　1件。圆唇。标本G1：5，敞口，矮圈足。仿定窑瓷，胎体细薄，呈灰白色。通体施灰白釉，釉色均匀，内壁装饰划花。口径9.2、底径3.1、高3.9厘米（图一二，11、图一三，5）。

盘　2件。标本G1：9，尖圆唇，敞口，浅弧腹，矮圈足底部中心有一乳突。胎体较细薄，呈黄褐色。黄白釉，内外满釉，但外壁施釉不均，内底部有刮釉形成的涩圈，外底露胎。口径18.4、底径6.3、高3.5厘米（图一二，12、图一三，6）。标本H1：6，圆唇，敞口，浅折腹，上腹部有一周折棱，矮圈足。粗胎呈黄褐色。灰白釉，釉下施一层白色化妆土，外壁施半釉；内壁满釉，有开片纹，内底部残留一个支钉痕。口径18.6、底径7.8、高4.5厘米（图一二，13、图一三，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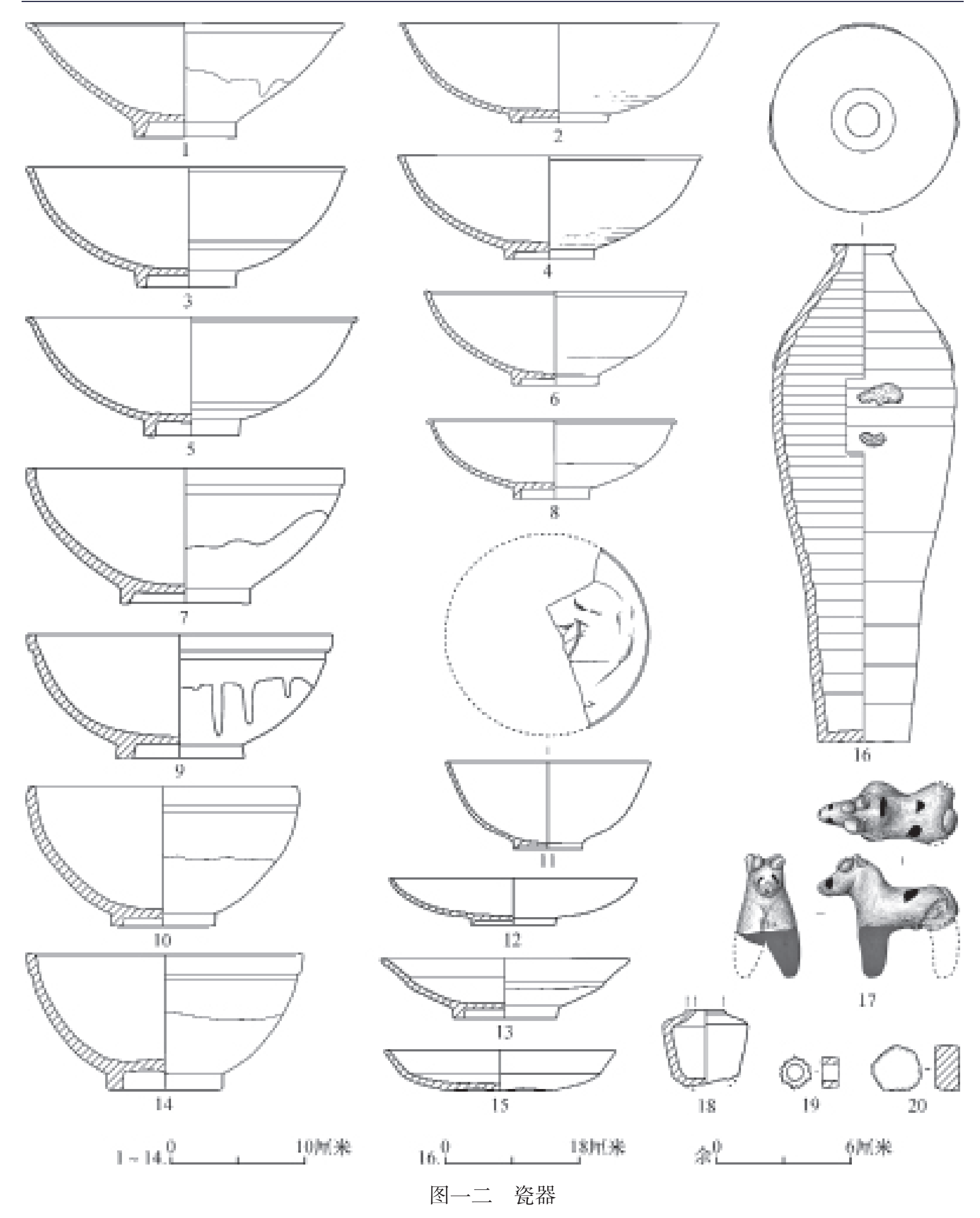
碟　1件。标本G1：8，尖圆唇，敞口，浅折腹，内底较平，外底内凹且饰有一周浅凹弦纹。胎体较粗，呈紫黑色。通体施灰白釉，有开片纹，外底部露胎。口径10.4、底径4.6、高1.8厘米（图一二，15、图一三，8）。

鸡腿坛　1件。标本F6：2，方唇，小直口，短颈，溜肩，上腹部外鼓且贴附有一竖耳，耳部残失，与其相对的肩部等距贴附三耳，均残失；下腹部瘦长，内外皆有瓦沟纹，平底。灰白色胎，粗胎较厚。通体内外皆施茶叶末釉，唯唇部和底部露胎。口径8.2、底径12.2、高67.3厘米（图一二，16、图一三，9）。

俑　1件。标本F5：3，形如一只羊，残，竖耳，羊角残失，长尖嘴，短尾，四肢仅存左前肢，呈圆锥状。胎体较粗，呈灰黑色。四肢以上施白釉，嘴部和背部点施黑釉形成花斑，四肢及腹部露胎。长6.4、高5.6厘米（图一二，1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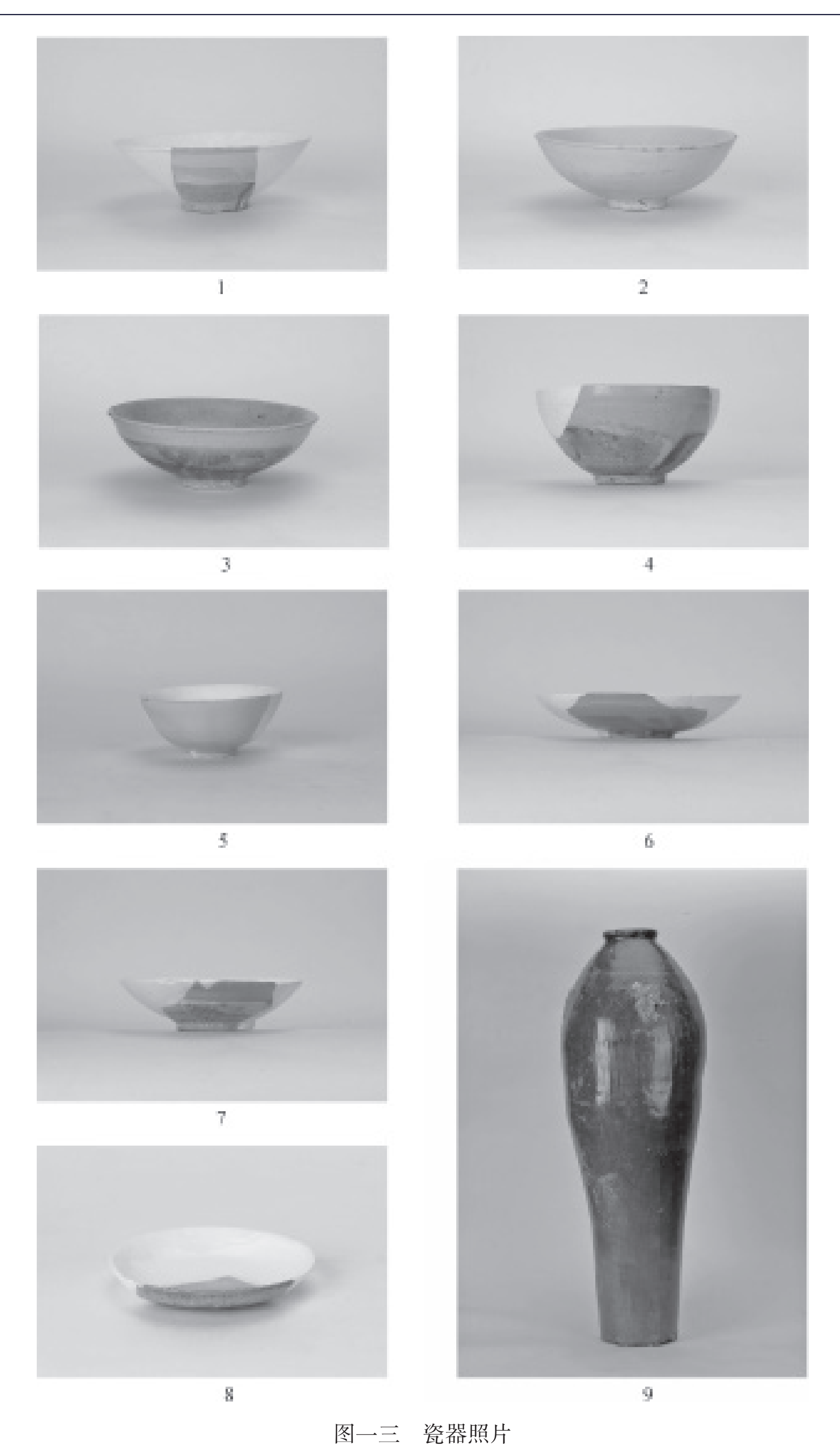
环　1件。标本F1：4，形如齿轮。白色胎，乳白釉。直径1.4厘米（图一二，19）。

圆饼　1件。标本F4：7，呈不规则圆形，由白釉瓷片打制而成，直径1.9、厚1厘米（图一二，20）。



图一二　瓷器

1. A型碗（G1：10）　2～6、8.（F7：3、F4：12、F1：2、F4：13、F2：13、F4：11）　7、9、10、14. Ca形碗（G1：1、G1：2、G1：11、G1：12）　11. Cb型碗（G1：5）　12、13. 盘（G1：9、H1：6）　15. 碟（G1：8）　16. 鸡腿坛（F6：2）　17. 俑（F5：3）　18. 罐（F2：8）　19. 环（F1：4）　20. 圆饼（F4：7）



图一三　瓷器照片

1. A型碗（G1：10）　2、3. B型碗（F4：13、F4：11）　4. Ca型碗（G1：11）　5. Cb型碗（G1：5）　6、7. 盘（G1：9、H1：6）　8. 碟（G1：8）　9. 鸡腿坛（F6：2）

（三）铁　　器

出土铁器数量和种类较多，但锈蚀严重，种类包含了农具、手工工具、家具用具、狩猎用具、车马具等。

铧　1件。标本F2：7，器身近似弧边三角形，底边及铧尖均残，前端有銎。残长29.9厘米（图一四，1）。

镰　1件。标本F3：1，弧背，弧刃，刀身前窄后宽，尖部与柄均残。残长26.2厘米（图一四，2）。

刀　5件。形制差异较大，不尽相同。标本 F7：4，直背，背部两端各跷起一小短铁柱，直刃略弧。刀身长8.4、宽3.8厘米（图一四，3）。标本F2：2，刀身短窄，刀身与刀柄分界明显，直背，直刃，尖锋，扁条状柄。通体长12.5、柄长2.3厘米（图一四，4）。标本F4：9，刀身宽短，前宽后窄，直背，斜直刃，扁条状柄，残。通体残长10.1厘米（图一四，5）。标本F6：4，直背、斜直刃，尖部稍残，扁条状柄，残断。通体残长21.4、柄残长3.3厘米（图一四，6）。标本F5：1，刀身窄长，前窄后宽，直背，斜直刃，尖部略残，刀柄为扁条状，接刀身中部。残长18.6厘米（图一四，7）。

凿　1件。标本F2：1，两端粗，中部细，顶部下折形成平顶，尖部呈楔形，刃扁平略弧。通长9.6厘米（图一四，8）。

锥　1件。标本F2：11，首部有长方形穿孔，锥身横截面为椭圆形，尖部残失。残长9.5、穿孔长1.2、宽0.4厘米（图一四，9）。

钉　3件。均锻打而成，大小略有不同，形制大致相同，长条形，截面呈长方形。标本H1：1，顶部侧弯做帽，尖部锋利。长10.7厘米（图一四，10）。标本H1：2，通长9.4厘米（图一四，11）。标本F2：17，顶端单侧锻打呈凿刃状侧弯，细尖锋利。长6.2厘米（图一四，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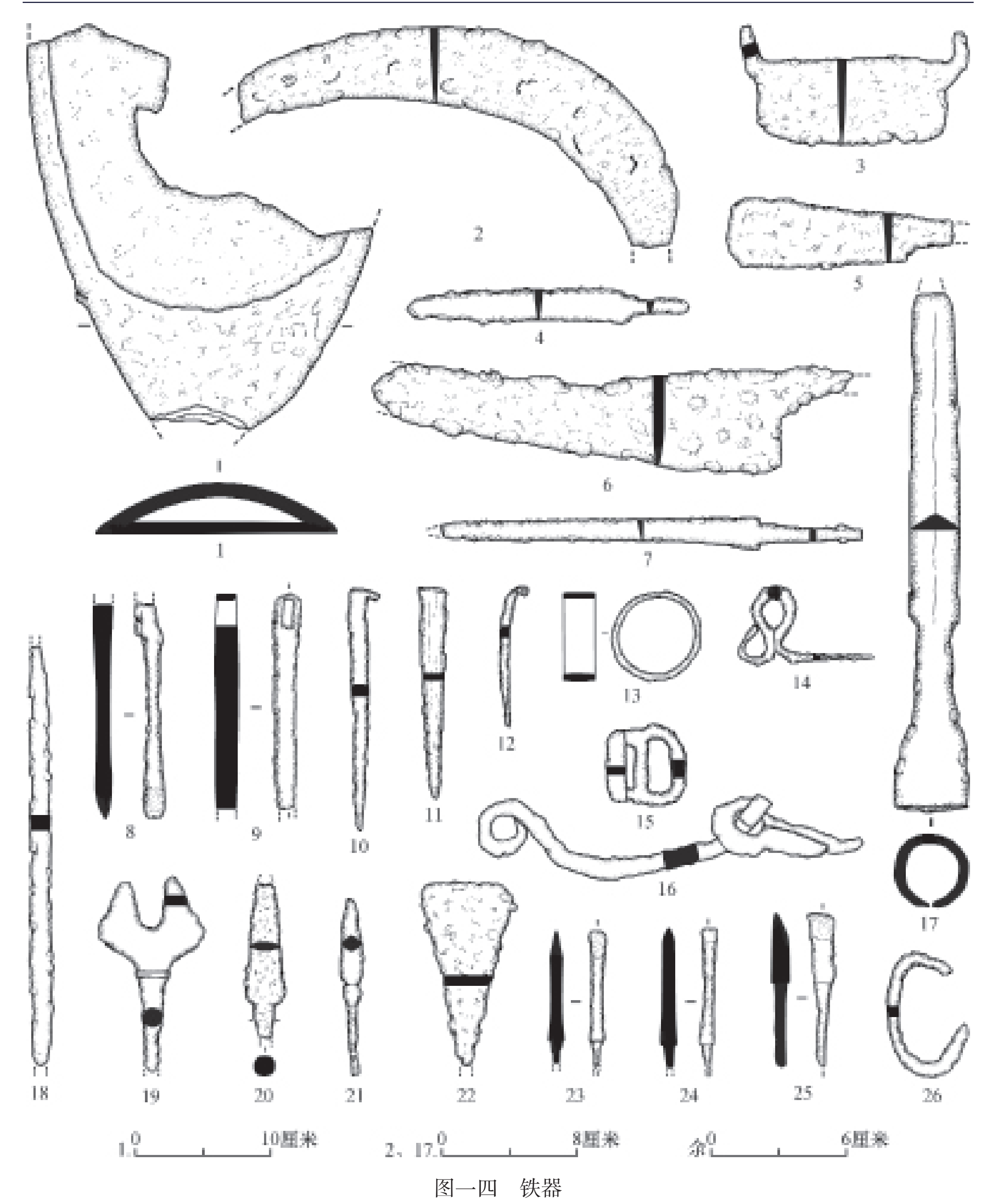
环　1件。标本F2：6，圆形，由一条薄铁片弯曲而成。直径3.9、铁片宽1.4、厚0.2厘米（图一四，13）。

环状器　1件。标本F4：8，由一根铁条弯曲锻打而成。长6、高3.6厘米（图一四，14）。

带扣　1件。标本F4：1，椭圆形扣环，后接长方形穿鼻，扣针残失。长3.6厘米（图一四，15）。

马衔　1件。标本F6：5，两节扁条式，一节完整，另一节残断，每节两端均应有环，两节之间环相套。残长17.2厘米（图一四，16）。

矛　1件。标本F1：9，矛身呈窄叶形，正面中部起脊，背部平直，两侧带刃，矛叶向前收成尖锋，锋残；銎柄。通体残长30.9、柄长11.1、矛身宽2.9厘米（图一四，17）。



图一四　铁器

1. 铧（F2：7）　2. 镰（F3：1）　3～7. 刀（F7：4、F2：2、F4：9、F6：4、F5：1）　8. 凿（F2：1）　9. 锥（F2：11）　10～12. 钉（H1：1、H1：2、F2：17）　13. 环（F2：6）　14. 环状器（F4：8）　15. 带扣（F4：1）　16. 马衔（F6：5）　17. 矛（F1：9）　18. 条（F4：2）19. A型镞（G1：6）　20、21. B型镞（F7：5、F1：10）　22. C型镞（F7：7）　23～25. D型镞（F7：2、H1：3、H1：4）　26. 箍形器（F3：2）

条　1件。标本F4：2，两端均残。长条片状，器身较直。长18.6、宽0.9、厚0.6厘米（图一四，18）。

镞　4件。依据形制形态差异可以分为四型。

A型　1件。双叉形镞。 标本G1：6，首部形似现代呆手扳头，圆柱状铤，末端渐细，首部和铤部有一圈凸起间隔。通长 8.7、首部宽4.7、铤长4.3厘米（图一四，19）。

B型　2件。柳叶形镞。标本F7：5，扁圆身，横截面为梭形，尖锋，锋残；圆柱状铤，末端残。通体残长6.9、廷残长1.5厘米（图一四，20）。标本F1：10，瘦长身，中部起脊，横截面为菱形，尖锋，镞身与镞铤之间有一圈圆凸起隔开；圆柱状短铤末端渐细。通体长7.9、铤长3.1厘米（图一四，21）。

C型　1件。铲形镞。标本F7：7，宽平刃，铤残失。残长8.3、刃宽4.1厘米（图一四，22）。

D型　3件。楔形镞。标本F7：2，刃部扁平略弧，镞身瘦长；圆柱状铤，末端残。通体残长5.9、铤残长1厘米（图一四，23）。标本H1：3，刃部扁平较直，镞身瘦长；圆柱状铤，末端残。通体残长6.2、铤残长1厘米（图一四，24）。标本H1：4，刃部斜直，镞身较短；圆柱状短铤末端渐细。长6.8、铤长3.7厘米（图一四，25）。

箍形器 1件。标本F3：2，由厚铁片弯曲成未封闭的椭圆形。高5.6、铁片宽0.5、厚0.4厘米（图一四，26）。

（四）铜　　器

发饰　1件。标本F4：4，由窄铜条对折而成，两侧折头内弯对齐，其上套一小铜圈使其紧合。通长8.6厘米（图一五，1）。

铜环　2件。形制相似。标本H1：5，圆形。外径2.5、内径1.3、厚0.3厘米（图一五，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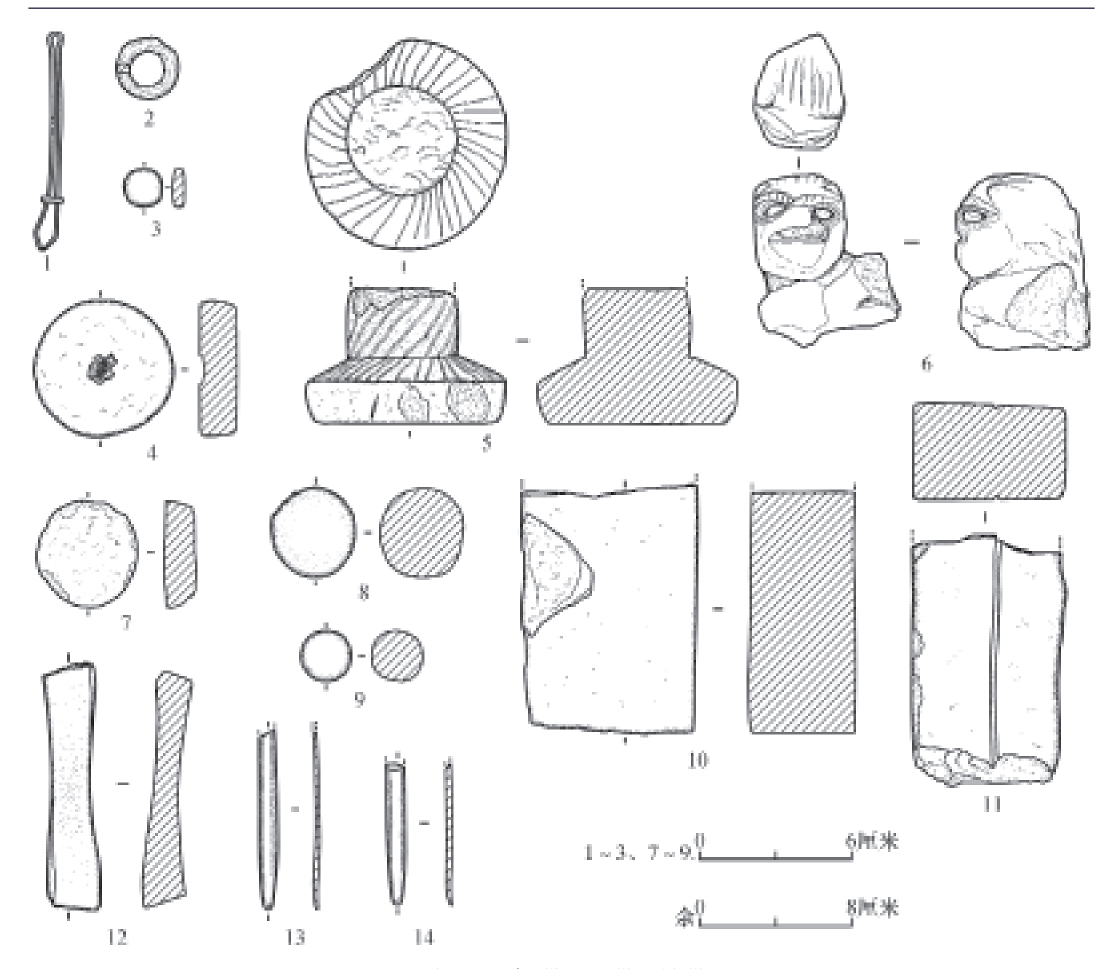
铜钱　45件。开元通宝9、淳化元宝1、景德元宝2、祥符元宝3、天圣元宝1、皇宋通宝3、元丰通宝5、元祐通宝6、崇宁通宝2、政和通宝3、正隆元宝1、面文不清和残缺者9。

（五）石　　器

围棋子　1件。标本F4：10，由石料磨制而成，白色，圆饼状。直径1.5、厚0.5厘米（图一五，3）。

陶拍　1件。标本F2：14，拍面为素面，边缘有残缺，背部及捉手刻划有条纹，捉手残断。残高7.2、拍面直径9.4厘米（图一五，5）。

石刻　1件。标本F7：6，形如一只卧趴着的狮子，狮身残断，头顶鬃毛成绺，浓



图一五　铜器、石器及骨器

1. 铜发饰（F4：4）　2. 铜环（H1：5）　3. 石围棋子（F4：10）　4、7. 石圆饼（F3：5、G1：7）　5. 石陶拍（F2：14）　6. 石刻（F7：6）　8、9. 球（F1：11、F1：12）　10、11. 石建筑构件（F2：18、F2：10）　12. 砺石（F5：2）　13、14. 骨笄（T6②：1、T6②：2）

眉，双目圆睁，嘴张开，栩栩如生。残高9.2、残宽7.6厘米（图一五，6）。

圆饼　2件。标本F3：5，由砂岩磨制而成，单面中部有一浅窝槽。直径7.2、厚1.9厘米（图一五，4）。标本G1：7，用玛瑙材质石材打磨而成。直径4、厚1.2厘米（图一五，7）。

球　2件。标本F1：11，由红色玛瑙质石料打磨而成。直径3.3厘米（图一五，8）。标本F1：12，由砂岩磨制而成。直径2厘米（图一五，9）。

建筑构件　2件。标本F2：18，由青石磨制而成，四面光滑，呈长方体状，一端残短。残长13.1、宽9.3、厚5.5厘米（图一五，10）。标本F2：10，由毛坯石磨制而成，呈长方体状，两端残断，正反两面正中各有一条浅凹槽。残长13.1、宽8、厚5.2厘米（图一五，11）。

砺石　1件。标本F5：2，长条形，束腰，一面有使用痕迹。通长12.9厘米（图一五，12）。

（六）骨　　器

骨笄　3件。均由骨片磨制而成，通体光滑，首部均缺失，尾部扁尖。标本T6②：1，残长9.4厘米（图一五，13）。标本T6②：2，残长7.5厘米（图一五，14）。

四、结　　语

石岭子遗址地层堆积简单，各单位出土遗物具有较大的相似性，应是一处同一时期单一文化堆积的遗址。遗址G1中出土“正隆元宝”铜钱一枚，其为金代海陵王正隆三年（1158年）铸造，这就表明遗址的废弃年代不早于金代正隆年间。

遗址出土了较多的瓷器，特别是瓷碗，数量多，风格较为统一，其中A型碗（G1：10）与辽阳江官屯[1]A型碗（T202⑤：1），C型碗（G1：11）与其C型碗（T403⑤：13），在形制、胎质、施釉等方面有很大的相似性；出土的盘（G1：9），与江官屯C型盘（T403⑤：5）以及抚顺千金乡唐力村金代遗址[2]III式盘（采：6）相似；B型黄白釉碗（F4：12）与铁岭歪石砬子辽金遗址[3]出土的黄白釉瓷碗（T4③：12）相似；瓷俑（F5：3）与沈阳大二台子辽金遗址[4]出土的瓷羊（T3③：1）相似；上述相似已发表标本均为金代。出土的鸡腿坛（F6：2）的最大腹径明显大于底径，流行与辽代晚期至金代[5]。因此，石岭子遗址的年代应主要为金代。

结合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最近几年在江官屯窑址发掘的材料来看（材料整理中，还未公开发表），石岭子遗址出土瓷器在江官屯窑址均能见到相似器，说明这些瓷器的来源可能来自辽阳江官窑。

前期调查表明，石岭子遗址是一处面积较大、遗存较为丰富的金代遗址。此次发掘在有限的发掘面积内，也发现较为丰富的遗迹及遗物。遗迹中房址密集，方向一致，且有打破关系；遗物中陶器以陶罐、陶盆为主，瓷器多为瓷碗，这些都为常见的生活器皿；铁器中有与农业相关的铁铧、铁镰，与日常生活相关的铁刀、铁凿、铁锥、铁钉等，这些都表明当时有相当数量的人口在此地聚集生活，从事定居农业生活；铁器中还有狩猎相关的铁镞、铁矛，表明狩猎业也在当时的生业模式中占有一定比例。关于遗址的性质，遗址中不见高等级建筑及建筑构件，遗物也都为普通平民生活、生产器具。因此，该遗址应是一处金代普通平民居住址。该遗址的发掘为研究彰武地区金代历史文化提供了宝贵材料。

附记：此次发掘的领队是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的万雄飞。参加发掘的人员有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苏军强、姚志勇，以及彰武县文物管理所的谢景林、刘宇、孙刚、王庆宇。此次发掘得到了彰武县文物管理所的大力支持，谨此致谢。

绘图：孙刚　姚志勇　苏军强
照相：图旭刚　苏军强
执笔：苏军强*　李海波**　崔嵩***

［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辽阳市江官屯窑址第一地点2013年发掘简报［J］. 考古，2016（11）.
［2］ 王维臣，温秀荣. 辽宁抚顺千金乡唐力村金代遗址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2000（4）.
［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铁岭市博物馆. 辽宁铁岭市歪石砬子辽金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2012（2）.
［4］ 沈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沈阳市大二台子辽金遗址发掘简报［A］. 辽金历史与考古（第5辑）［C］. 沈阳：沈阳教育出版社，2014：11～21.
［5］ 彭善国. 辽代陶瓷的考古学研究［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108，109.

Zhangwu County Liaoning province Shilingzi site dated to Jin Dynasty excavation presentation

Liaoning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of Pengwu County

Abstract: June to July 2016, the archaeological institute of liaoning province and Zhangwu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office excavated on Shilingzi site for one month, revealed 7 house foundations, 3 ash pits, 2 Ash trenches and 1 outdoor oven. Nearly 200 pottery, porcelain, iron, bronze, Bone artifacts and stone artifacts are found. After finishing analysis, it should be a village site dated to Jin Dynasty.

Key word: Liaoning; Shinglingzi site; Jin Dynasty; address site

* 苏军强，男，毕业于吉林大学考古学及博物馆学专业硕士，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邮编110003
** 李海波，男，毕业于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现为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邮编110003
*** 崔嵩，男，毕业于吉林大学，现为阜新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馆员，邮编123000

锡林郭勒苏尼特左旗巴日嘎图岩画调查简报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1]　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2]

（1.北京，100089；2.锡林郭勒，026000）

2016年秋冬之际，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和锡林郭勒盟文物管理站组成联合考古队，对锡林郭勒盟境内的岩画遗存进行了系统的调查，考古队在苏尼特左旗、阿巴嘎旗及锡林浩特市周围获得了一大批重要的考古资料，是近年来中国北方岩画区重要的发现之一。本文就苏尼特左旗巴日嘎图岩画的调查资料简报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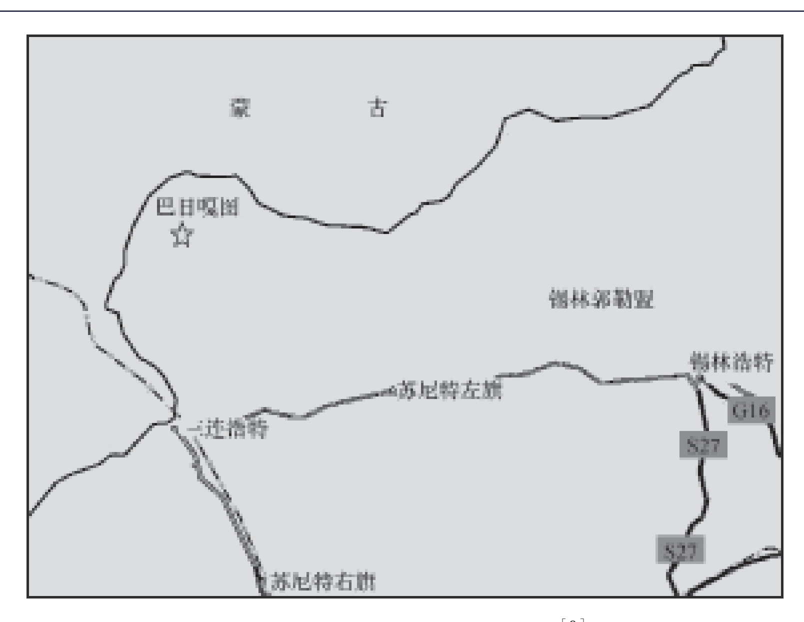
一、地理位置及自然环境

苏尼特左旗，俗称东苏旗，位于内蒙古中东部，锡林郭勒盟西北部。地理坐标为N42°58′～45°06′，E111°30′～115°12′，总面积为33469平方千米。地处蒙古高原中北部，中部和北部地形开阔，略有起伏，为坦荡高平原，浑善达克沙地横贯南端，平均海拔1163米。气候属北温带大陆性气候，年平均气温为1℃～2.5℃，年降水量209毫米，无霜期为130天。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土壤以轻壤土为主，有机质含量低，稳固性差。全旗面积的92%属于草原，植物物种主要有针茅、万年蒿、蒙古葱等。野生动物有狐狸、獾子、狼、黄羊、鹿（草原羚）、百灵、沙鸡、野鸡、野鸭、天鹅、鹰等[1]。

二、历史沿革与遗址、遗迹分布

苏尼特左旗历史悠久，其境内发现有多处古遗址、遗迹（图一）。远古时代，赛汉高毕苏木东南的通古尔哺乳动物化石区，发现了白垩纪时代的古动物化石[2]。洪格尔苏木的珠恩宝力格亦发现有木化石[3]。

发现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达来苏木境内的保力嘎遗址、勿尔图保拉格遗址、呼和陶勒盖遗址，满都拉图镇沿着毕力克河两岸发现的满都拉图遗址，昌图锡力苏木境内的昌图锡力遗址，德力格尔罕苏木境内的下玛塔拉遗址、图布新胡都嘎遗址，巴彦淖尔苏木境内的白音格遗址、巴彦苏莫北遗址、哈拉更图遗址，在这些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发现有陶片、硅石片、火灰遗迹和各种石器[4]，且有四个特点：多数遗址的地表形态为



图一　巴日嘎图岩画位置示意图[9]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第499页）

“芒哈”或“曼哈”（汉语意为沙窝子），陶器数量少、石器多为打制，磨制较少、细石器一直存在[5]。

到了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仅在巴彦淖尔苏木境内的哈拉更图遗址采集有青铜时代的三棱形铜镞、刀等[6]。据史书记载，这里先后是猃狁、獯鬻、东胡等北方古代民族活动的地方。

公元前3世纪末，秦始皇统一六国，匈奴盘踞于蒙古高原。在东乌珠穆沁旗到苏尼特左旗一线，有古墓群1500多处，据推断是汉代匈奴人或突厥人的墓葬。在德力格尔罕苏木境内的上玛塔拉汉代遗址内，采集有灰陶盆、铁器等残片[7]。

白日乌拉苏木发现有北朝的吉布胡郎图墓群，出土有陶罐、铜镞等。达来苏木发现有唐代的巴彦额尔敦墓群、海留吐沟墓群等，推测为突厥遗存。德力格尔罕苏木发现有辽代的哈拉根泰遗址，采集有灰陶片、白瓷片、铁器、铜器残片等。还发现有金界壕北线残迹[8]。

三、巴日嘎图岩画

巴日嘎图岩画位于苏尼特左旗洪格尔苏木旭日昌图（亦称“舒日昌图”）嘎查，查干敖包庙以北，中心区地理坐标为E111°33′06.22″，N44°29′35.54″，海拔1100米。地处荒漠草原，低山丘陵分布其间（图二）。岩画主要分布于低山丘陵中一些平坦的岩面上，岩体为灰褐色石灰岩，硬度为6～7，岩面多朝向南面、东面。本次调查以



图二　巴日嘎图岩画群地貌图

幅（即同一岩面）为最小单位进行测绘和记录，共发现岩画142幅，编号为XMSZD-001～XMSZD-142。岩画单体共计329个，包括动物、人物、人面像、文字、工具、符号、日月星辰、不可识别八个大类。现选取代表性岩画加以介绍。

（一）动物岩画

1. XMSZD-004（图三）

单体图像，为一狗。岩面朝南，尺寸为43厘米×28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黄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头部低下朝左，两耳竖起，嘴巴微张，脖颈前伸，体形细长，四肢迈步，尾巴上扬，尾端卷曲，作行走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图三　XMSZD-004



图四　XMSZD-045

图五　XMSZD-085

图六　XMSZD-070

2. XMSZD-045（图四）

单体图像，为一北山羊。岩面朝东北，尺寸为72厘米×56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褐色，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

北山羊头朝右，昂首提脖，两大角长而后弯，体形肥硕，一前腿弯曲迈出，一后腿蹬地，尾巴短小，自然下垂，作行走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3. XMSZD-085（图五）

单体图像，为一牛。岩面朝向天空，尺寸为40厘米×88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褐色，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

牛头朝右，垂头竖角，体格健壮，背上似乎驮着物体，四肢迈步，雄性标志明显，尾巴下垂，作缓步慢行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4. XMSZD-070（图六）

多个图像，上下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2个单体图像，为一狼、一牛。单体自上而下，编号为1～2。岩面朝南，尺寸为29厘米×40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1号单体刻痕为灰色，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2号单体刻痕为褐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中部上方，为一狼，头朝左，垂首前伸，两耳竖起，体形细长，四肢缓步慢行，尾巴较长，下垂拖地，作徐步行走状；2号单体位于1号下方，为一牛，头朝左，俯首，大角上扬，体形肥硕，前腿

弯曲，后腿蹬地，尾巴短小，作奔跑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5. XMSZD-064（图七）

多个图像，左右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2个单体图像，为二马。单体自左而右，编号为1～2。岩面朝南，尺寸为46厘米×27厘米，制作技法均为密点敲凿，刻痕为青灰色，两单体线条粗细不一，均为剪影式造型。



图七　XMSZD-064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左侧，为一马，头朝右，腿朝下，与2号单体头向、腿向相对，头部伸向2号单体，两耳竖起，双腿伫立，雄性器官明显，尾巴长而下垂；2号单体位于1号右侧，为一马，头朝左，腿朝上，身躯弯下，两耳竖起，一前腿着地，另一前腿抬起，伸向1号单体，一后腿略有弯曲，作卧地状，另一后腿因岩面风化而缺失，尾巴自然下垂，尾端向上翘起。二马玩耍嬉戏，整个画面呈动态。



图八　XMSZD-046

6. XMSZD-046（图八）

多个图像，上下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3个单体图像，为一马、一鹿、一不可识别动物。单体自上而下，编号为1～3。岩面朝东北，尺寸为35厘米×37厘米，制作技法均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色，1号单体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2、3号单体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中部，为一动物，图案因岩面风化脱落而残缺不全，不可识别动物种类；2号单体位于1号右下方，为一马，头朝右，头部高昂，两耳竖起，身躯前倾，一前腿跨出，一后腿蹬地，尾巴长而下垂，飘荡在空中，作奔跑状；3号单体位于2号下方，为一鹿，头朝左，昂首提脖，鹿角较长，体形较小，一前腿向前迈出，一后腿蹬地，尾部短小，作行走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7. XMSZD-113（图九）

多个图像，左右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3个单体图像，为一羊、二马。单体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编号为1～3。岩面朝天，尺寸为30厘米×19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褐色，1号单体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2、3号单体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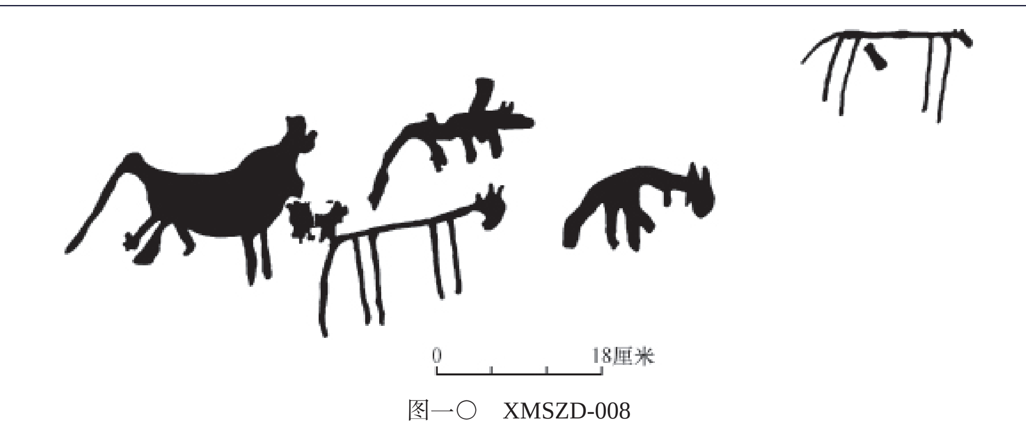


图九　XMSZD-113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左侧，为一羊，头朝右，头部前伸，两角竖起，一前腿向前迈出，一后腿蹬地，尾巴短小，作行走状；2号单体位于1号右上方，为一马，头朝左，身躯斜立，低头竖耳，两腿站立，尾巴夹紧，尾部被其后3号单体的头部顶着；3号单体位于2号右下侧，为一马，头朝上，身躯斜立，头部拱向2号单体尾部，双耳短小，两腿站立，尾巴长而下垂。整个画面呈动态。

8. XMSZD-008（图一〇）

多个图像，无打破关系，确认5个单体图像，为一牛、四马。单体自左而右，自上而下，编号为1～5。岩面朝东，尺寸为82厘米×35厘米，1～4号单体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褐色，1、2、4号单体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3号单体为半成品，已凿刻出轮廓，仅尾部扩充敲凿，线条较细，为线条式造型；5号单体为半成品，制作技法主要为划刻，刻痕为褐灰色，已划刻出轮廓，仅雄性器官为密点敲凿，线条较细，



图一〇 XMSZD-00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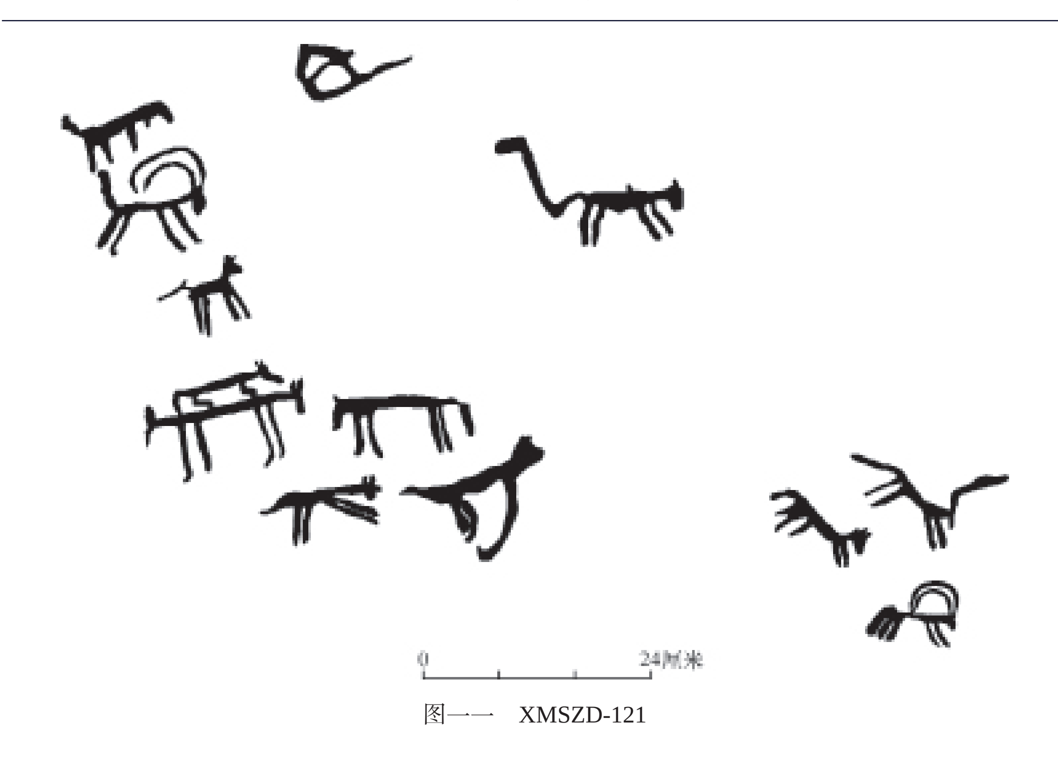
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左侧，为一牛，头朝右，头部模糊，身躯健壮，两前腿直立，两后腿蹬地，可见雄性标志，尾巴长且下垂，作行走状；2号单体位于1号右上方，为一马，图案模糊，头朝右，尾巴较长，腿部作行走状；3号单体位于2号下方，为一马，半成品，头朝右，垂头竖耳，可见颈部鬃毛，肢干、尾部由凿刻的线条构成，尾端的一部分、头部已经向粗扩充凿开，作俯首伫立状；4号单体位于3号右方，为一马，图案模糊，头朝右，低头竖耳，两腿直立，尾巴长且下垂，可见雄性标志，作俯首伫立状；5号单体位于4号右上方，为一马，头朝右，肢干、尾部由划刻的线条构成，四腿伫立，凿刻的雄性器官明显，作俯首伫立状。整个画面动静结合。

9. XMSZD-121（图一一）

多个图像，无打破关系，确认13个单体图像，为八马、二北山羊、一羚羊、一狗、一不可识别。单体编号为1～13，因岩石断裂以及行文之便，将岩画分成3组，最左面为第Ⅰ组，其上有1、2、3、4、5、6、7、8号单体；右上角为第Ⅱ组，其上有9、10号单体；右下角为第Ⅲ组，其上有11、12、13号单体。岩面朝南，尺寸为150厘米×61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第Ⅰ组画面中，1号单体位于岩面最上方，为一马，头朝右，俯首，两前腿向前迈出，两后腿向后蹬地，尾巴上扬，作行走状；2号单体位于1号下方，为一北山羊，头朝右，垂首张嘴，大角长而后弯，两前腿向前迈出，两后腿向后跃起，尾巴高翘，作奔跑状；3号单体位于2号下方，为一狗，头朝右，昂首竖耳，两前腿向前迈步，两后腿向后踏地，尾巴扬起，飘荡在空中，作行走状；4号单体位于3号下方，骑在身下的5号单体背上，为一马，头朝右，俯首前伸，两耳竖立，前后肢向前弯曲，呈匍匐状，尾巴自然下垂，作行走状；5号单体位于4号正下方，为一马，头朝右，垂首竖耳，四肢缓慢迈步，尾巴自然下垂，作缓步慢行状；6号单体位于5号右方，与5号单体相对而立，为一马，头朝左，低头，短耳，四肢迈步，尾巴飘起，作徐步行走状；7号单体位于6号左下



图一一　XMSZD-121

方，为一马，头朝右，俯首飘尾，前后肢腾跃，作飞奔状；8号单体位于7号右方，为一马，头朝右，昂首竖耳，前腿跃起，后腿腾空，尾巴飘荡，作飞奔状；

第Ⅱ组画面中，9号单体位于1号右方，因岩石断裂，图案不完整，不可识别；10号单体位于9号右下方，为一马，头朝右，垂首竖耳，两前腿向前跃起，两后腿向后蹬地，尾巴飘扬，作飞奔状；

第Ⅲ组画面中，11号单体位于8号右方，为一马，头朝右，颈首前伸，两耳竖立，前后肢跃起，尾巴飘荡，作飞奔状；12号单体位于10号右上方，为一羚羊，头朝右，长角扬起，两前腿向前迈出，两后腿向后蹬地，尾巴摇曳，作飞奔状；13号单体位于12号下方，为一北山羊，头朝右，头部下低，长角后弯，两前腿向前跃起，两后腿腾空，尾巴下垂，作奔跑状。

整个画面呈动态。

（二）人物岩画

1. XMSZD-036（图一二）

单体图像，为一人。岩面朝南，尺寸为14厘米×35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上部，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浅灰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正面全身人像，头朝上，左臂上举，五指分开，右臂下弯，右手叉腰，上身挺

直，两腿分开，似在舞蹈，整个画面呈动态。

2. XMSZD-017（图一三）

单体图像，为一人，男性。岩面朝东，尺寸为55厘米×32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上部，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青灰色，线条较细，为线条式造型。

正面全身人像，头朝左，腿朝右，两臂弯曲环绕，两手叉在胸口部位，上身直挺，两腿分开而立，左脚向上提起，可见雄性器官，屁股后有一尾巴，似是伪装者，作行走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3. XMSZD-105（图一四）

多个图像，上下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2个单体图像，为二人。单体自上而下，编号为1～2。岩面朝天，尺寸为31厘米×12厘米，制作技法为磨刻，刻痕为灰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上方，为一人，正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臂甩出，上身直立，两腿迈出；2号单体位于1号下方，为一人，正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臂张开，两腿跳跃，动感极强。两人似在舞蹈，整个画面呈动态。

4. XMSZD-052（图一五）

多个图像，上下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2个单体图像，为二人。单体自上而下，编号为1～2。岩面朝向天空，尺寸为136厘米×30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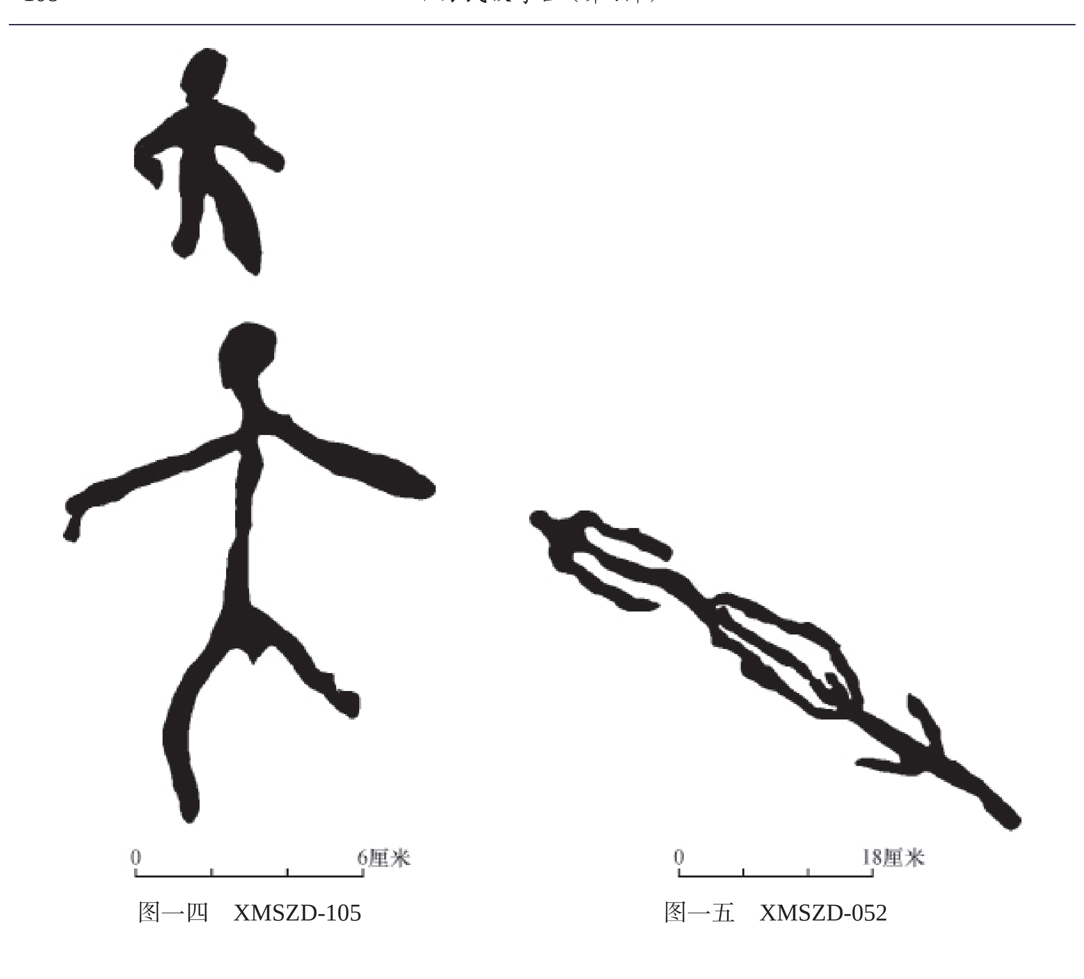
二人腿部相对而躺，两性特征明显，是一幅交媾场景。



图一二　XMSZD-036



图一三　XMSZD-017



图一四　XMSZD-105　　　　图一五　XMSZD-052

（三）人和动物组图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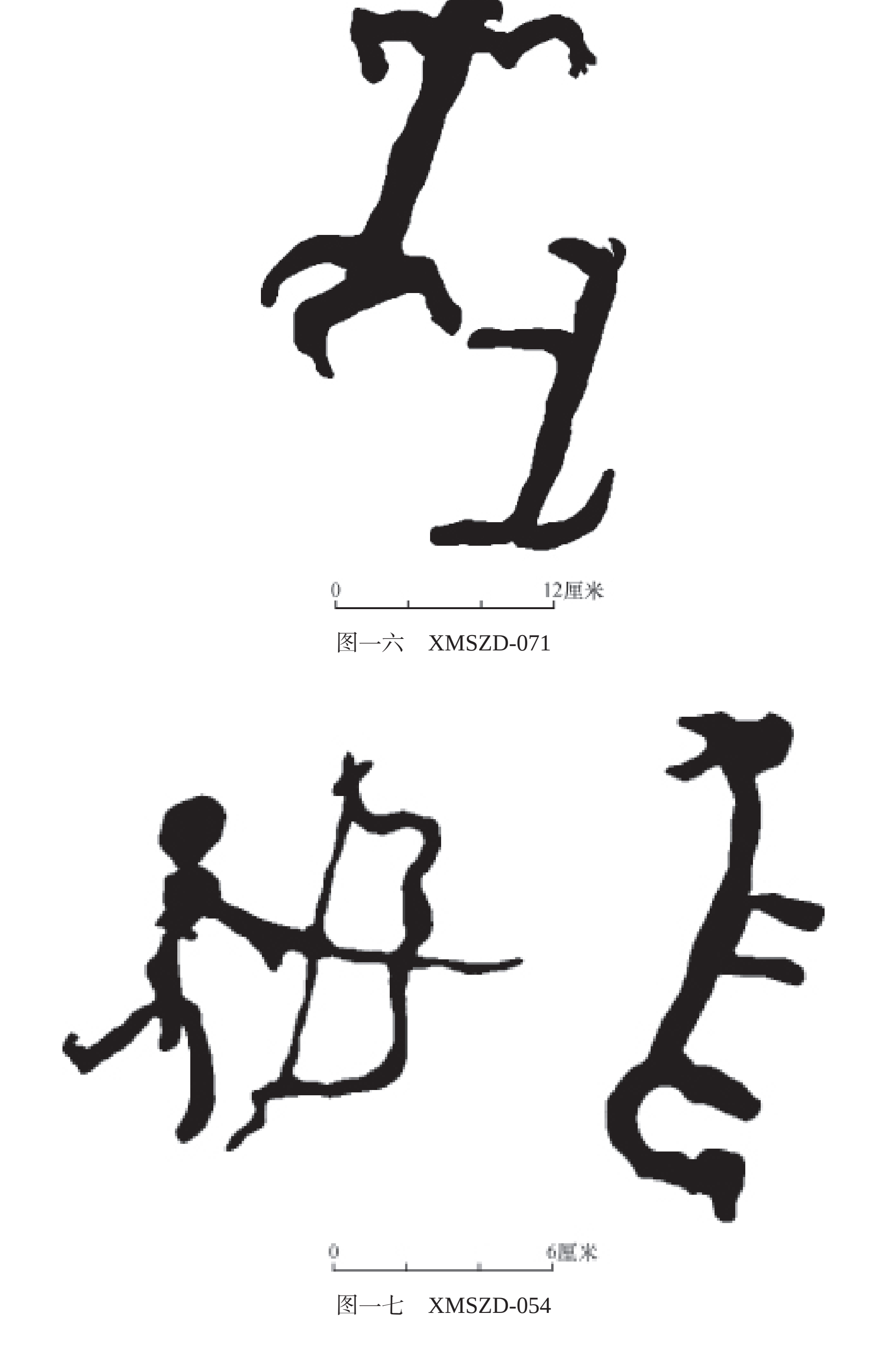
1. XMSZD-071（图一六）

多个图像，左右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2个单体图像，为一人、一狗。单体自左而右，编号为1～2。岩面朝天，尺寸为55厘米×15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左侧，为一人，侧面全身人像，头朝上，面向右侧2号单体，两臂伸出，右手似持有一物，引得其右侧2号单体跃起，两腿站立，身后可见一尾巴，似经伪装；2号单体位于1号右侧，为一狗，头朝上，腿朝左，上身跃起，前腿腾空，仅靠后腿站立，尾巴上翘。整个画面呈动态。

2. XMSZD-054（图一七）

多个图像，左右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3个单体图像，为一人、一马、一弓箭。单体自左而右，编号为1～3。岩面朝东，尺寸为54厘米×68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



图一六　XMSZD-071

图一七　XMSZD-05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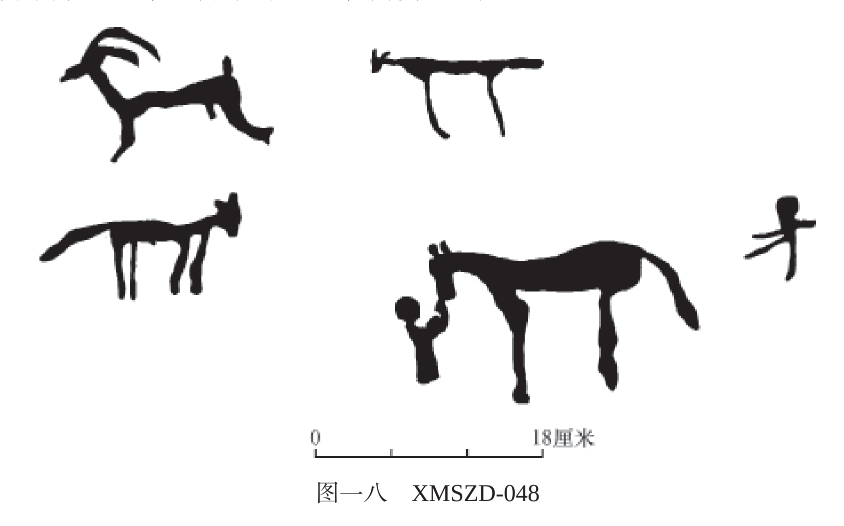
凿，刻痕为褐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左侧，为一人，男性，侧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臂伸向右侧2号单体，一手拉弓，一手持箭，箭在弦上，即将射向不远处的3号单体，两腿分开而

立，可见雄性标志；2号单体位于1号右方，为一弓箭，弓弯曲较甚，箭细长；3号单体位于2号右方，为一马，头朝上，腿朝右，体形细长，两前腿向前跨出，一后腿蹬地，尾巴长而下垂，作飞奔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3. XMSZD-048（图一八）

多个图像，无打破关系，确认6个单体图像，为二人、一北山羊、三马。单体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编号为1～6。岩面朝东北，尺寸为39厘米×58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褐色，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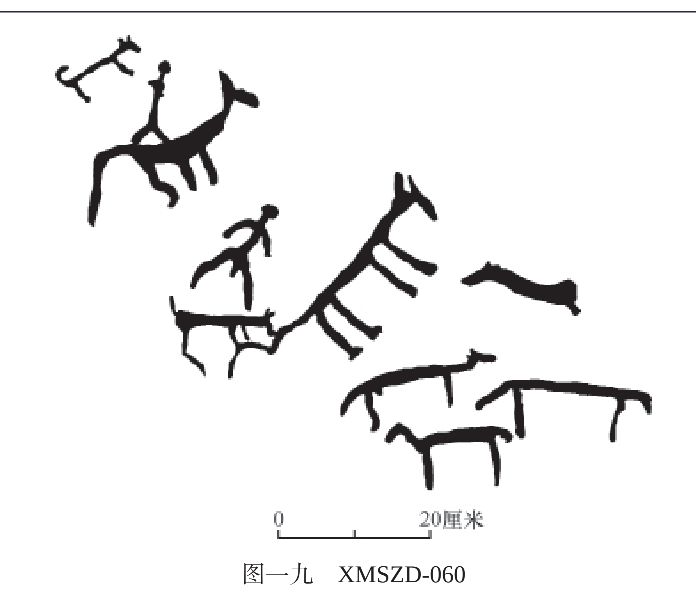


图一八　XMSZD-048

1号单体位于岩面左上方，为一北山羊，头朝左，昂首前伸，长角后弯，体形矫健，一前腿向前跨出，一后腿向后跃起，可见雄性标志，尾巴短小，向上扬起，作飞奔状；2号单体位于1号右侧，为一马，头朝左，头向前伸，两耳竖起，体形细长，一前腿弯曲迈出，一后腿蹬地，尾巴飘在空中，作奔跑状；3号单体位于1号下方，为一马，头朝右，俯首竖耳，体形较壮，两前腿向前迈出，两后腿蹬地，尾巴较长，飘荡在空中，作缓步慢行状；4号单体位于3号右方，为一人，侧面半身人像，下肢由于岩石风化而残缺，头朝上，侧身而立，面向右侧的5号单体，胳臂举起，手持缰绳，拉着右侧的5号单体；5号单体位于4号右侧，为一马，头朝左，俯首竖耳，嘴里含着缰绳，体形健硕，一前腿站立，一后腿微微抬起，身体后缩，尾巴较长；6号单体位于5号右上方，为一人，侧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臂伸出，与肩同高，一腿高抬伸出，一腿直立，因岩石风化而略显模糊。整个画面呈动态。

4. XMSZD-060（图一九）

多个图像，无打破关系，确认10个单体图像，为二人、二狗、二马、三羊、一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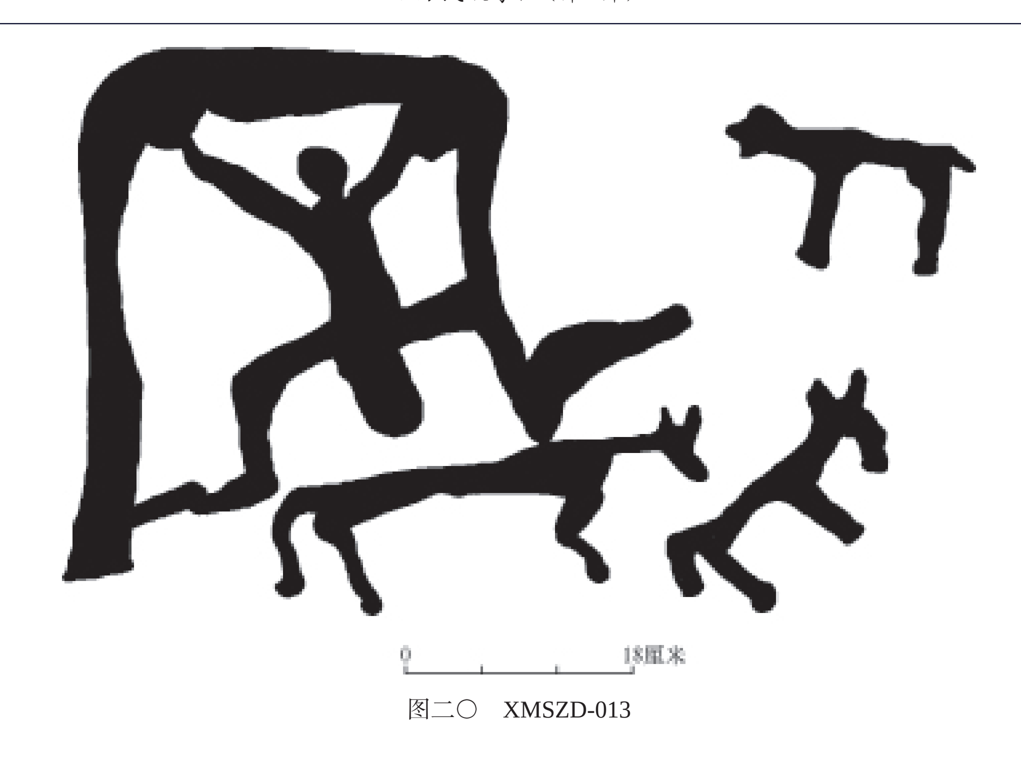
图一九　XMSZD-060

可识别动物。单体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编号为1～10。岩面朝天，尺寸为102厘米×59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褐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上方，为一狗，头朝右，垂首竖耳，体形较小，一前腿向前迈出，一后腿蹬地，尾巴翘起，尾端卷曲，作飞奔状；2号单体位于1号右下方，为一人，侧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臂因岩石风化而缺失，上躯直立，两腿分开，骑在下方3号单体上；3号单体位于2号正下方，为一马，头朝右，昂首伸颈，耳朵竖起，体形健硕，两前腿迈出，一后腿蹬地，尾巴较长，飘荡在空中，作奔跑状；4号单体位于3号下方，为一人，男性，正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臂伸出，两腿分开而立，可见雄性标志；5号单体位于4号正下方，为一狗，头朝右，头部前伸，两耳竖立，嘴巴咬向其右侧6号单体的尾巴，两前腿更是挠着其尾巴，一后腿弯曲蹬地，尾巴短小，高高翘起；6号单体位于5号右方，为一马，头朝右，身躯跃起，头向下低，两耳竖起，体形细长，两前腿跃起，两条后腿分开而立；7号单体位于6号右方，为一动物，因岩石风化而残缺不全，不可识别，只可看出头朝左；8号单体位于6号下方，为一羊，头朝右，昂首竖耳，颈部前伸，两腿迈步，可见雄性标志，尾巴短小下垂，作缓步慢行状；9号单体位于8号右方，为一羊，头朝右，头部下低，前后肢向前迈出，尾巴短小，飘荡在空中；10号单体位于8号下方，为一羊，头朝左，昂首伸颈，两腿迈出，尾巴短小，作缓步慢行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5. XMSZD-013（图二〇）

多个图像，无打破关系，确认4个单体图像，为一人、二马、一狗。单体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编号为1～4。岩面朝南，尺寸为63厘米×45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



图二〇　XMSZD-013

凿，刻痕为褐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左侧，为一人，男性，正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胳膊向上伸直，手举长条状物体，环绕到脚部，上身直挺，下身微蹲，两腿弯曲呈90°，两脚外撇，雄性器官明显；2号单体位于1号右方，为一狗，头朝左，昂首前视，前腿迈出，后腿蹬地，尾巴短小，望向1号单体；3号单体位于1号下方，为一马，头朝右，伸颈俯首，两耳竖起，体形健壮，前腿弯曲，后腿蹬地，尾巴长而下垂，作奔跑状；4号单体位于3号右方，为一马，头朝右，两耳竖立，体形矫健，前腿迈出，后腿蹬直，尾巴下垂，作行走状。整个画面呈动态。

6. XMSZD-130（图二一）



图二一　XMSZD-130

多个图像，无打破关系，确认3个单体图像，为一人、一羊、一车轮。单体自上而下，自左而右，编号为1～3。岩面朝西南，尺寸为64厘米×57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色，1号单体线条粗细不一，为剪影式造型；2、3号单体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1号单体位于岩面下方，为一人，女性，正面全身人像，头朝上，两臂叉腰，上身直立，下身着裙装，

骑在身下的2号单体上；2号单体位于1号正下方，为一羊，头朝左，向前伸，长角后弯，前腿向前迈出，后腿蹬地，尾巴上扬，尾端内卷，作行走状；3号单体位于2号尾部，为一车轮，仅用一圆圈表示轮廓，单直辕，与2号单体一条后腿绑在一起。整个画面呈动态。

（四）符号岩画

XMSZD-015（图二二）

单体图像，为一符号。岩面朝南，尺寸为67厘米×41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下方，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青灰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整体呈反转的“王”字形，整个画面呈静态。



图二二　XMSZD-015

（五）文字岩画

XMSZD-108（图二三）

单体图像，为一藏文字母。岩面朝天，尺寸为35厘米×45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灰褐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图二三　XMSZD-108

（六）工具岩画

XMSZD-092（图二四）

单体图像，为一工具。岩面朝东，尺寸为50厘米×21厘米，单体位于岩面中部，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褐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上端为倒V字形，其上覆满短刺，右侧为一长棍形，整个画面呈静态。



图二四　XMSZD-092

（七）日月星辰

XMSZD-110（图二五）

多个图像，左右布局，无打破关系，确认3个单体图像，为一人、一太阳、一工具。单体自左而右，编号为1～3。岩面朝南，尺寸为42厘米×32厘米，制作技法为密点敲凿，刻痕为褐色，线条较粗，为线条式造型。



图二五　XMSZD-110

1号单体位于岩面左方，为一太阳，可见一圆圈，周围有六条射线，象征太阳的光芒；2号单体位于1号右方，为一人，正面全身像，头朝上，双臂朝下，手持3号单体，两腿站立，左腿向上抬起；3号单体被2号手拿着，为一工具，似一长棍，且一端有一枝杈。整个画面动静结合。

四、巴日嘎图岩画特征分析

为了全面了解巴日嘎图岩画的面貌特征，我们将从岩画的分布、类型、制作技法、表现手法、造型与风格、叠压打破关系等方面，做相应的说明、数量统计和分析。

1. 分布

巴日嘎图岩画分布在低矮的小山包上，选取适宜作画岩面，多为向阳一面，以朝南、朝东居多，少量朝向天、西面、北面。单体多刻画于岩面中部及下部。

2. 类型

巴日嘎图岩画单体种类丰富，有动物、人物、人面像、文字、工具、符号、日月星辰、不可识别（表一）等。单体以动物为大宗，人物次之，其余单体数量极少。动物包括马、羊、狗、牛、鹿、鸟、狼、豹以及不可识别的动物，以马为主；羊次之；狗较多；其余均较少；不可识别的动物均为因岩石风化严重，图案残缺不全，只能识别出为动物，而无法辨别出具体种属者。可看出野生动物如鹿、狼、豹等极少。人物有59个，能明显看出是男性的16个（雄性器官较突出）。人面像有1个、1文字岩画为藏文字母、符号为1反转的“王”字形。工具有6个，包括弓箭、长条形似为鞭子、一端带刺的长条工具等。不可识别的均为因岩石风化严重，图案残缺不全，而无法辨别。

表一　巴日嘎图岩画群岩画单体数量统计表

单体类型		数量（个）	所占比例	
动物	马	117	35.60%	73.40%
	羊	35	10.60%	
	狗	34	10.30%	
	牛	5	1.40%	
	鹿	1	0.30%	
	鸟	2	0.60%	
	狼	2	0.60%	
	豹	1	0.30%	
	不可识别	45	13.70%	
人物		59	17.90%	
人面像		1	0.30%	
文字		1	0.30%	
工具		6	1.80%	
符号		1	0.30%	
日月星辰	一太阳	1	0.30%	
不可识别		18	5.70%	
总计		329	100%	

巴日嘎图岩画类型多样。按照刻画的场景可分为：动物、人物、人和动物组图、文字、符号、不可识别等（表二）。巴日嘎图岩画共有142幅，其中动物岩画幅数最多；人和动物组图岩画次之；人物岩画亦较多；其他岩画极少。因此，我们可以看出，动物在生产、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当时人类对于动物的熟悉、喜爱之情。

表二　巴日嘎图岩画群岩画类型数量统计表

岩画类型		数量（幅）	所占比例	
动物	单体动物	60	42.30%	64.80%
	动物群	32	22.50%	
人物	舞蹈或祈祷	5	3.50%	10.60%
	人物形象	9	6.40%	
	男女交媾	1	0.70%	
人和动物组图	放牧	13	9.20%	16.90%
	狩猎	4	2.80%	
	舞蹈或祈祷	6	4.20%	
	人面像	1	0.70%	
文字		1	0.70%	
符号		1	0.70%	
不可识别		9	6.30%	
总计		142	100%	

3. 制作技法

巴日嘎图岩画制作方法主要有三种：密点敲凿、划刻、磨刻，以密点敲凿法为大宗，极少数为磨刻、划刻。刻画的岩画绝大多数为成品，且只使用一种方法，极少数半成品中可看出兼用划刻和密点敲凿法。

4. 表现手法

以线条式造型为主，即用一条粗细大致相同的线条表现物体肢干；少数以剪影式造型为表现手法，即用阴影的方式描绘出物体的轮廓[10]。在粗线条式岩画中，有的已接近于剪影式。同一岩面上的岩画单体表现手法兼有线条式及阴影式两种表现手法，且单体刻痕颜色一致，推测为同一时期作品。

5. 造型与风格

巴日嘎图动物岩画、人物岩画造型写实，图形具有很强的具象性，风格粗犷，仅勾勒出轮廓，很少刻画细部，形成简洁明了的艺术风格。在刻画动物时，通常是大动物形象大些，小动物形象小些，同时突出主要特征，如马的尾巴较长；狗的尾巴翘起卷曲；北山羊的角长而后弯；等等。特别是突出动物、人物的雄性器官，可看出男性在狩猎、放牧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当时人们对生育的崇拜和对旺盛繁殖力的祈求。动物全为侧面刻画，多为四腿，少数仅刻画两腿，以动态形象为主，有的作飞奔状、有的缓步慢行、有的回首张望，等等；人物多为正面全身人像，呈现出舞蹈、拉弓射箭、放牧状，等等。

6. 图像的叠压打破关系

岩画的叠压打破现象为确定岩画刻画时间的相对早晚提供了一定的依据。绝大多数巴日嘎图岩画在同一幅岩面上的岩画单体无叠压打破关系。极个别有叠压关系的岩画，从单体的完整程度、刻痕的颜色来看，是有意为之，有的是一动物背上载有另一动物，有的是人骑在动物身上，等等，应是同时刻画。有打破关系的岩画，同一幅岩面上的岩画单体刻痕颜色一致的，为同时刻画；各别岩画单体刻痕颜色不一致的，图像不完整的，且刻痕颜色与岩石颜色几乎一致的，时间较早，反之，时间相对较晚。

五、岩画年代判断

由于岩画本身没有发掘材料做支持，因此岩画的年代判断历来是学界的难点。巴日嘎图岩画的时代判断，需要从岩画自身的类型、制作技法、表现手法、造型与风格等

方面来着手分析，大量的动物岩画、放牧岩画以及凿刻占绝大多数，放牧岩画远远多于狩猎岩画，男性在放牧与狩猎中占有绝对地位，岩画造型简单明了，突出重点特征，风格粗犷，整体风格与阴山地区青铜时代的岩画接近。参考阴山岩画狩猎专题岩画对弓箭的研究，巴日嘎图岩画出现的弓箭（见XMSZD-054），弓的弧度较大，造型较写实，其年代应在商代以后[11]。

六、与周边岩画的比较

巴日嘎图岩画与同属锡林郭勒境内的阿巴嘎旗岩画群[12]、苏尼特右旗岩画群[13]、锡林浩特岩画群[14]，均以敲凿为主要技法，以动物纹为大宗，风格写实，造型简洁，这构成了锡林郭勒岩画的总体特点之一。

大兴安岭岩画位于锡林郭勒的北部，岩画处于大兴安岭北麓原始森林中，主要集中在鄂伦春旗、额尔古纳市境内，岩画遗址多位于河岸左近，多数是彩绘岩画，用红色赭石绘就，内容多为动物、狩猎、娱乐场面，动物多为驯鹿，图案以“人物”和“符号”为主，其时代至少是在唐代以前，可能为新石器时代[15]。而巴日嘎图岩画地处荒漠草原，既无彩绘岩画，也缺乏大兴安岭岩画群的符号图案、驯鹿动物等。

赤峰岩画位于锡林郭勒的东部，赤峰岩画集中分布在克什克腾旗百岔河流域、西拉木伦河两岸、砧子山以及松山区阴河沿岸，内容以动物纹、人面像为主，动物以奔鹿居多，此外，还有天体星宿、生殖崇拜等，制作方法有凿刻、磨刻、绘制、敲砸以及金属利刃刻划，年代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到秦汉、隋唐、金元时期，跨越数千年[16]。赤峰的人面岩画整体上应当早于动物岩画，而且人面岩画多为无面部轮廓的“双目”图像，突出表现眼部，推测这种双目岩画最早开始于兴隆洼文化时期，经由红山文化，在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走向繁荣[17]，时代最晚的辽代岩画实质上已演变成佛教壁画[18]。巴日嘎图岩画缺乏赤峰岩画的群鹿图、人面像、天体星宿等图案，也没有明显属于辽代时期的作品。

阴山岩画在锡林郭勒的西南，两者共性较多，以凿刻制作为主，动物造型较多，阴山岩画中动物岩画约占全部画面的90%[19]，从内容上来看，巴日嘎图岩画群并无足印岩画，与宗教思维和信仰有关的人面像、凹坑、同心圆、圆中带点的符号也几乎不见。在舞者岩画中，连臂、生育的舞蹈形象的年代早到新石器时代，并一直发展到青铜时代[20]，对巴日嘎图岩画的年代具有借鉴意义。

与其西部的巴丹吉林岩画相比较，巴丹吉林岩画地处沙漠，岩画中野生动物种类较多，有狍子、野猪、梅花鹿、蜘蛛、蛇等，家畜的岩画数量占绝大多数，马最多，其次是羊、驼、牛，这不仅和内蒙古秦汉以前畜牧遗址发现的家畜情况相一致，而且和巴日嘎图动物岩画以马居首位，羊次之相同，只是巴日嘎图缺少骆驼岩画；巴丹吉林建筑岩画较多，手形与蹄印、斗殴与交战、符号、自然景物如花草树等岩画亦是巴日嘎图岩

画所缺乏的题材。巴丹吉林彩绘手形岩画可能早至旧石器时代晚期，人面像岩画上限为新石器时代，但多数属青铜时代，动物、帐篷与村落、符号、交媾等岩画也是青铜时代作品，早期铁器时代最流行各种骑者题材，北朝至唐代岩画中最吸引人的是带鞍具的马和骑马人岩画，后期还有西夏文字岩画、元明清蒙文岩画等[21]，巴丹吉林动物岩画为巴日嘎图岩画断代提供了参考资料。

七、小　　结

本次对苏尼特左旗岩画的调查，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系统调查，获得了极其珍贵的一手资料。调查发现，巴日嘎图岩画多朝向阳面，以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为大宗，以密点敲凿为主要制作方法，以线条式造型为主要表现手法。单体种类以马、人、羊、狗为主，岩画类型以动物岩画为主，内容题材以动态的单体动物为主，还包括放牧、狩猎、舞蹈或祈祷、交媾等。画面布局有序，有叠压打破现象者较少，图案简朴写实，风格粗犷，题材来源于生活，和古人类生产生活息息相关，岩画作者应是生活在此地的先民。

岩画所蕴含的文化内涵和宝贵信息，为我们探讨远古先民的生产、生活、文化艺术、民族风俗、思维方式以及人和环境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实物资料，特别是青铜时代至早期铁器时代岩画的发现，填补了北方草原地区文字记载之前的历史空白，对于我们研究该地区的古代文化有着重要作用。

附记：本项目得到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的支持，项目名称：中国北方岩画研究

项目负责：王晓琨、刘洪元
执笔：张倩、王晓琨、刘洪元、柏嘎力
呼和、康晓慧、陈少兰、张文静
图像处理：张文治

注　　释

[1] a. 锡林郭勒盟编纂委员会编. 锡林郭勒盟志［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6：181，182.
b. 苏尼特左旗地方编纂委员会编. 苏尼特左旗志［M］. 呼伦贝尔：内蒙古文化出版社，2004：80.
c. 内蒙古自治区地图制印院编. 中国分省系列地图册内蒙古［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16：161.

[2] 同［1］a：1383～1385.

［ 3 ］　同［ 1 ］b：432.
［ 4 ］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13：499.
［ 5 ］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23.
［ 6 ］　a. 锡林郭勒史迹编委会编. 锡林郭勒史迹［M］. 北京：新华出版社，2009：7.
b. 同［ 4 ］：499.
［ 7 ］　同［ 4 ］：499.
［ 8 ］　同［ 4 ］：499.
［ 9 ］　同［ 4 ］：499.
［10］　李永宁等. 甘肃马鬃山区考古调查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6（5）：30.
［11］　王晓琨，张文静. 阴山岩画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31.
［12］　刘洪元，程鹏飞. 阿巴嘎旗岩画群［A］.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55～59.
［13］　苏德那木旺其格. 苏尼特右旗岩画［A］.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0～63.
［14］　萨仁图雅. 锡林浩特市岩画［A］. 锡林郭勒文化遗产［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7～70.
［15］　赵艳芳，宋宝峰. 呼伦贝尔市大兴安岭岩画［A］. 呼伦贝尔文化遗产［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68～71.
［16］　a. 张红星，宋国栋. 克什克腾旗岩画群［A］. 赤峰文化遗产［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4：152～155.
b. 克什克腾旗文物志编委会编. 克什克腾旗文物志［M］.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105～124.
c. 项春松. 赤峰古代艺术［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1999：18～36.
d. 韩立新. 内蒙古克什克腾旗岩画又有新发现［A］. 岩画学论丛（第1辑）［C］.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72～82.
e. 高云库. 赤峰松山区阴河岩画调查报告［A］. 岩画学论丛（第1辑）［C］.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83～91.
［17］　张亚莎. 赤峰岩画在中国岩画研究格局中的地位与意义［A］. 岩画学论丛（第1辑）［C］.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4：122～126.
［18］　赤峰市文化局，赤峰市博物馆编. 中国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文物古迹博览［M］. 赤峰：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66～68.
［19］　盖山林. 阴山岩画［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343.
［20］　同［11］：136.
［21］　盖山林. 巴丹吉林沙漠岩画［M］.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78，157～178.

The Investigation Report of Rock Art in Barigatu, SuniteZuoqi, Inner Mongolia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School of History, Department of Archaeology and Museum Studies Department of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in XilinGol Inner Mongolia

Abstract: Rock art i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ancient culture, recording people's production, life, religious beliefs and other aspects of information. Rock art is an important archaeological remain. In recent years the archaeological community has given it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For example in July 2016, Guangxi Huashan rock group was selected as World Cultural Heritage site. XilinGol is one of the three grasslands in China, and the rock arts are rich and well preserved. In the autumn of 2016,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and the XilinGol cultural relic's management department formed a joint archaeological team and carried out the first systematic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the XilinGol's rock art. The new discovery of 22 clusters of rock art sites, 1389 groupings of rock art and more than 4000 individual images is one of the major discoveries of Chinese rock art in recent years. This article reports the rock group in Sunite Zuoqi Barigatu, focusing on the use of the chisel as the main production method, linear design elements, animal style as the main content of rock arts.The article also focuses on screen layout and order, simple patterns, and realism. Compared with neighboring areas, we can gain better understandings of its value of this region and its relationships to others areas. As a result, our investigation is efficient and adds new material to the study of the middle area of Inner Mongolia.

Key words: Barigatu; Northern Steppe ; Rock art

八面通秀池南岗地点发现的旧石器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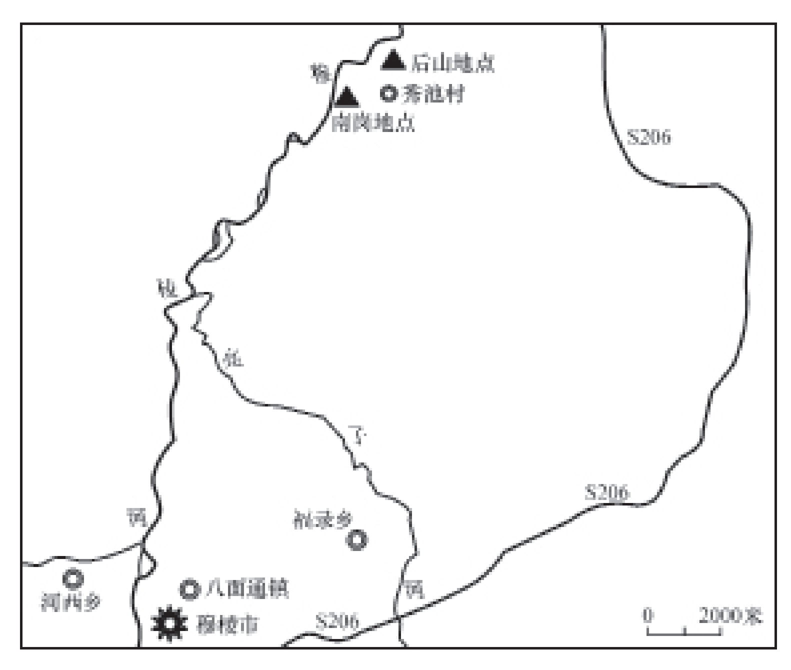
陈全家[1]　崔祚文[1]　李有骞[2]　倪春野[3]

（1.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长春，130012；2.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哈尔滨，150080；3. 穆棱市文物管理所，八面通，157599）

一、地理位置、地貌与地层

1. 地理位置

南岗地点位于黑龙江省牡丹江穆棱市八面通镇秀池村的穆棱河东岸上。西距穆棱河180米，东北距秀池村1000米，距秀池后山地点1700米。地理坐标为45°02′22.32″N，130°34′38.15″E（图一）。



图一　地理位置示意图

2. 地貌与地层

（1）地貌

穆棱河在地点西侧自南向北流过，形成河谷阶地的侵蚀地貌。穆陵河宽约80米，有发育江心滩和牛轭湖比较发育。地点周围有低矮的群山一般海拔高度约为40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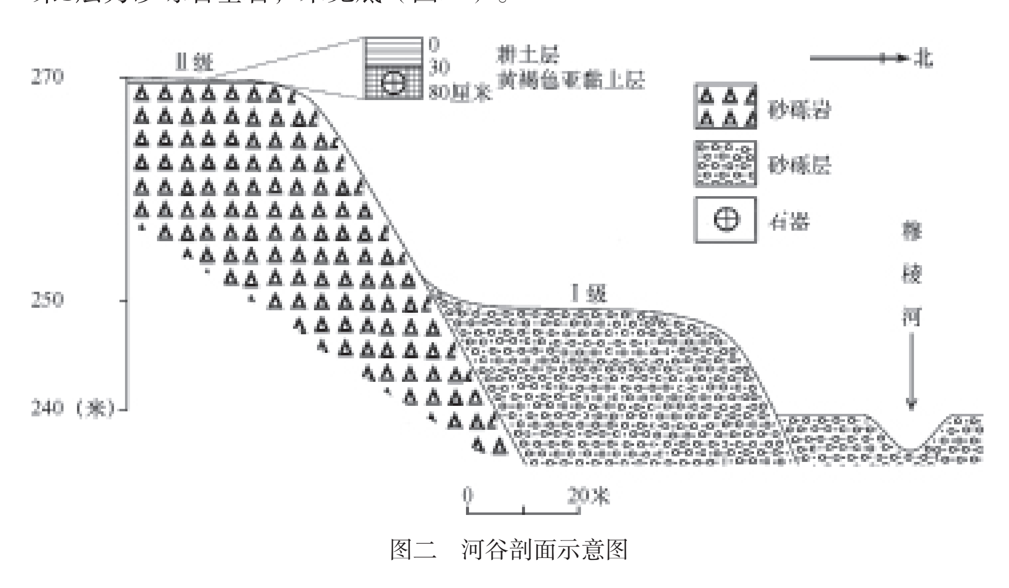
（2）地层

南岗地点坐落于穆棱河东岸的二级侵蚀阶地上，海拔为270米，面积为：南北100米×东西50米。地层堆积为：

第1层为耕土层，黑色腐殖土，厚约20～30厘米。

第2层为黄褐色亚黏土层，厚约30～50厘米，出有石器。

第3层为砂砾岩基岩，未见底（图二）。



图二　河谷剖面示意图

二、石器的分类与描述

此地点发现的石器共28件，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1]，具体分析如下：

1. 石核

共1件。双台面。标本16XCN：1，长74.9毫米，宽96.9毫米，厚28.8毫米，重206.5克。原料为砂岩，呈椭圆形。锤击石核。A台面，自然台面，台面角79.8°，有1个剥片面，1个剥片疤，长25.2毫米，宽37.8毫米。B台面，即A台面的剥片面，利用反向打法向A台面进行剥片，台面角76.2°，有1个剥片面，1个剥片疤，长11.8毫米，宽24.9毫米（图三，8）。

2. 石片

共8件。分为完整石片和断片。

（1）完整石片　3件。长9.9～26.6毫米，平均长17.4毫米；宽13.6～24.5毫米，平均宽18毫米；厚2.5～6.4毫米，平均厚4.1毫米；重0.3～3.2克，平均重1.3克。均为锤击石片，原料均为流纹岩。

标本16XCN：2，长26.6毫米，宽24.5毫米，厚6.4毫米，重3.2克。打击台面，石片角为111.7°。打击点集中，半锥体较平，无锥疤，同心波清晰，放射线不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图三，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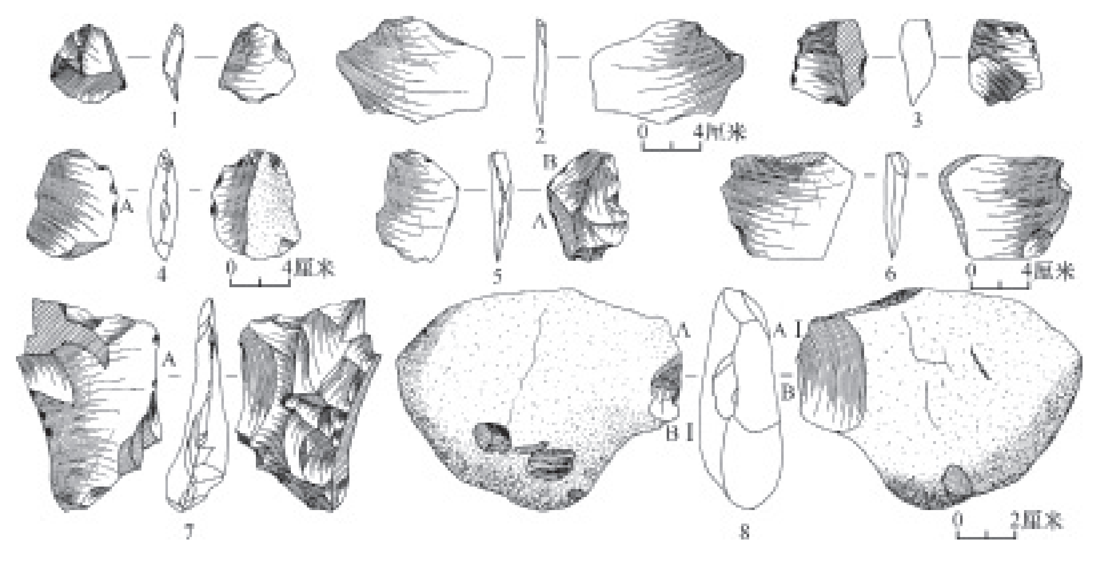
（2）断片　5件。可分为横向和纵向断片。

①横向断片　3件。又分为近端和远端断片。

近端　2件。长16.7～18.3毫米，平均长17.5毫米；宽26.2～36.1毫米，平均宽31.2毫米；厚2.1～3.1毫米，平均厚2.6毫米；重0.9～1.3克，平均重1.1克。均为锤击石片，原料为流纹岩和凝灰岩。

标本16XCN：4，残长16.7毫米，宽36.1毫米，厚2.1毫米，重0.9克。原料为流纹岩。打击台面，石片角为113°。打击点集中，半锥体微凸，无锥疤，同心波清晰，放射线不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远端折断（图三，2）。

远端　1件。标本16XCN：25，残长27.8毫米，宽25.2毫米，厚9.2毫米，重4.5克。原料为流纹岩。近端折断，半锥体较平，同心波不清晰，放射线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



图三　石核、石片和二类工具

1. 完整石片（16XCN：2）　2. 近端断片（16XCN：4）　3. 远端断片（16XCN：25）　4. 单凸刃刮削器（16XCN：8）　5. 单尖刃刮削器（16XCN：18）　6. 左断片（16XCN：11）　7. 单凹刃刮削器（16XCN：17）　8. 双台面石核（16XCN：1）

（图三，3）。

②纵向断片　2件。均为左断片。长17.9～22毫米，平均长20毫米；宽22.1～22.3毫米，平均宽22.2毫米；厚3.1～5.1毫米，平均厚4.1毫米；重1.4～1.8克，平均重1.6克。均为锤击石片，原料均为流纹岩。

标本16XCN：11，长17.9毫米，残宽22.3毫米，厚3.1毫米，重1.4克。打击台面，石片角115°。打击点集中，半锥体微凸，同心波清晰，放射线不清晰。背面均为石片疤。右侧折断（图三，6）。

总体来看，石片的背面是以均石片疤为主，占石片总数的75%；石皮+石片疤和石皮的较少，皆仅占12.5%（表一）。石片背面石皮越少说明剥片率就越高。由此可见，此地点的剥片率较高。

表一　石片背面统计表

	石皮	石皮+石片疤	石片疤
完整石片	1	0	2
近端断片	0	1	1
远端断片	0	0	1
左断片	0	0	2
总计	1	1	6
百分比	12.5%	12.5%	75%

3. 断块

2件。标本为16XCN：6和16XCN：15，形状不规整，难以划分类型。长11.8～19.5毫米，平均长15.7毫米；宽18.3～36.6毫米，平均宽27.5毫米；厚5.3～15.4毫米，平均厚10.4毫米；重1.1～8.4克，平均重4.8克。原料为燧石和流纹岩。

4. 工具

共17件。包括二类和三类工具。

（1）二类工具　5件。均为单刃刮削器。根据刃缘的形状可分为凸、凹和尖刃。

①凸刃　3件。长18.2～32.8毫米，平均长23.7毫米；宽14.5～32毫米，平均宽24.4毫米；厚4.5～14.1毫米，平均厚7.7毫米；重0.9～9.1克，平均重4.1克。原料为砂岩和安山岩。毛坯为完整石片和远端断片。刃长16.6～32.5毫米，刃角27.9°～37°。

标本16XCN：8，长22.4毫米，宽15.1毫米，厚8.6毫米，重2.7克。原料为砂岩。毛坯为远端断片，背面为石片疤和石皮。A处为刃缘，两侧留有不连续的鱼鳞状使用疤。刃长16.6毫米，刃角36.9°（图三，4）。

②凹刃　1件。标本16XCN：17，长73.3毫米，宽48.4毫米，厚14.2毫米，重33.3

克。原料为流纹岩。毛坯为完整石片，背面均为石片疤。A处为刃缘，两侧留有不连续的鱼鳞状使用疤。刃长41.6毫米，刃角38.8°（图三，7）。

③尖刃　1件。标本16XCN：18，长38.3毫米，宽27毫米，厚6.9毫米，重4.7克。原料为流纹岩。毛坯为完整石片，背面均为石片疤。A和B处为刃缘，两侧均留有不连续的鱼鳞状使用疤，刃长分别为22.8毫米和19.6毫米。A与B相较于一钝角，为123.6°（图三，5）。

（2）三类工具　12件。包括刮削器、端刮器和锯齿刃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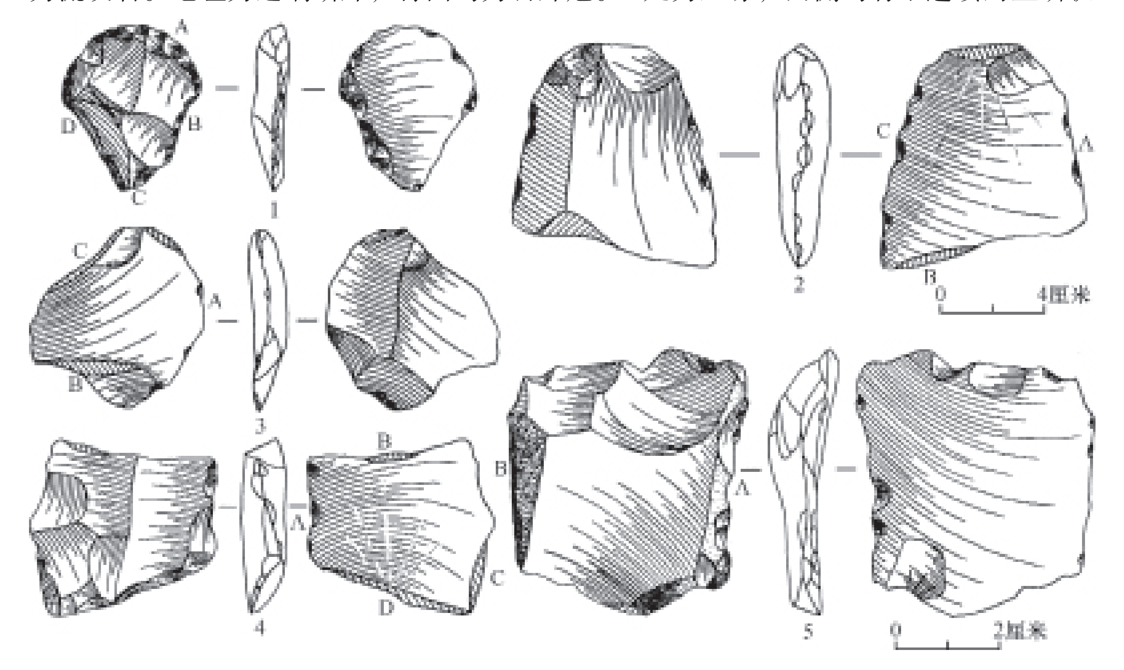
①刮削器　10件。根据刃缘的多少，分为单刃和双刃。

单刃　8件。根据刃缘的形状，又可分为凸刃和凹刃。

凸刃　7件。长16.6～62毫米，平均长32.8毫米；宽16.2～94.6毫米，平均宽40毫米；厚4.7～23.3毫米，平均厚9.5毫米；重1.6～108克，平均重20.9克。原料为流纹岩、安山岩和石英岩。毛坯为近端和远端断片和块状。刃长为19.5～53毫米，刃角为22.8°～58.8°。

标本16XCN：9，长34.3毫米，宽34.1毫米，厚7.7毫米，重5.4克。原料为流纹岩。毛坯为远端断片，背面均为石片疤。A处为刃缘，两侧均留有不连续的鱼鳞状使用疤，刃长46.5毫米，刃角27.2°。B和C处经过简单加工，是为修形（图四，3）。

凹刃　1件。标本16XCN：16，长32.8毫米，宽35毫米，厚8.5毫米，重7.7克。原料为流纹岩。毛坯为近端断片，背面均为石片疤。A处为刃缘，两侧均有不连续的鱼鳞状



图四　三类工具

1. 端刮器（16XCN：21）　2. 直凸刃刮削器（16XCN：20）　3. 单凸刃刮削器（16XCN：9）　4. 单凹刃刮削器（16XCN：16）　5. 锯齿刃器（16XCN：26）

使用疤，刃长21毫米，刃角27.5°。B和D处折断，是为修形，C处亦折断，是为了修理把手，便于执握（图四，4）。

双刃　2件。均为直凸刃。长19.8～28.7毫米，平均长24.3毫米；宽20.4～43.9毫米，平均宽32.2毫米；厚4.2～9.1毫米，平均厚6.7毫米；重1.3～6.8克，平均重4.1克。原料均为流纹岩。毛坯均为近端断片。刃长为13.2～21.5毫米，刃角为22°～38.5°。

标本16XCN：20，长19.8毫米，宽20.4毫米，厚4.2毫米，重1.3克。毛坯背面为石片疤和节里面。A处为直刃，C处为凸刃，且刃缘两侧均留有不连续的鱼鳞状使用疤，刃长分别为13.2毫米和18.6毫米，刃角31.4°和22°。B处折断是为修形（图四，2）。

②端刮器　1件。标本16XCN：21，长30.7毫米，宽25.6毫米，厚6毫米，重3.7克。原料为流纹岩。毛坯为远端断片。A处为刃缘，锤击修理，正向加工，在背侧留有双层鱼鳞状修疤，刃长40.6毫米，刃角52.5°。B、C和D处经过简单加工，是为修理把手，便于执握（图四，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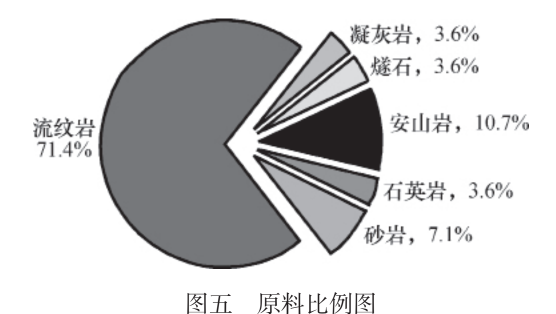
③锯齿刃器+单直刃刮削器　1件。标本16XCN：26，长50.4毫米，宽44.2毫米，厚8毫米，重14.3克。原料为流纹岩。毛坯为远端断片，背面为石片疤和石皮。A处为锯齿刃，锤击修理，正向加工，背侧留有大且深的单层鱼鳞状修疤，刃长43.7毫米，刃角34.3°。B处为直刃，锤击修理，正向加工，背侧留有单层鱼鳞状修疤，刃长30毫米，刃角42.1°（图四，5）。

三、结　　语

1. 石器工业特征分析

1）石器的原料包括流纹岩、安山岩、砂岩、石英岩、燧石和凝灰岩。其中流纹岩使用最多，占71.4%；安山岩和砂岩较少，分别占10.7%和7.1%；石英岩、燧石和凝灰岩则使用最少，仅各占3.6%（图五）。总体来看，原料以流纹岩为主的优质石料占有非常高的比重。可见当时的人类对石料的利用是有选择意识的。

2）根据石器的最大长度，将此地点的石器划分为微型（N≤20 毫米）、小型（20＜N≤50毫米）和中型（50＜N≤100毫米）的三个等级[2]。小型最多，占石器总数的



图五　原料比例图

71.4%；微型和中型较少，仅各占14.3%。由此可见，此地点的石器是以小型为主的石器工业类型。

3）石器类型较丰富，包括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工具比重最高，占石器总数的60.7%。其中三类工具最多，占工具的70.6%，又以刮削器最多，占三类工具的83.4%（又单刃最多，占80%），端刮器和锯齿刃器较少，皆仅占8.3%；二类工具（均为单刃）次之，占工具的29.4%。石片次之，占总数的28.6%。断块较少，占7.1%。石核最少，仅占3.6%（表二）。

表二　石器类型比例表

<table>
<tr><th colspan="4">类　　型</th><th>数量（N）</th><th colspan="4">百分比</th></tr>
<tr><td colspan="4">石　　核</td><td>1</td><td colspan="4">3.6</td></tr>
<tr><td rowspan="4">石片</td><td colspan="3">完整石片</td><td>3</td><td rowspan="4" colspan="4">28.6</td></tr>
<tr><td colspan="3">近端断片</td><td>2</td></tr>
<tr><td colspan="3">远端断片</td><td>1</td></tr>
<tr><td colspan="3">左断片</td><td>2</td></tr>
<tr><td colspan="4">断块</td><td>2</td><td colspan="4">7.1</td></tr>
<tr><td rowspan="5">工具</td><td>二类</td><td colspan="2">单刃</td><td>5</td><td colspan="3">29.4</td><td rowspan="5">60.7</td></tr>
<tr><td rowspan="4">三类</td><td rowspan="2">刮削器</td><td>单刃</td><td>8</td><td>80</td><td rowspan="2">83.4</td><td rowspan="4">70.6</td></tr>
<tr><td>双刃</td><td>2</td><td>20</td></tr>
<tr><td colspan="2">端刮器</td><td>1</td><td colspan="2">8.3</td></tr>
<tr><td colspan="2">锯齿刃器</td><td>1</td><td colspan="2">8.3</td></tr>
</table>

4）此地点的石核和石片均采用锤击法进行剥片。从石片背面均为石片疤的比例较高来推测此地点的剥片率较高。三类工具以片状毛坯为主，占三类工具总数的91.7%；其中近端断片较多，占片状毛坯总数的54.5%，远端占45.5%。块状非常少，仅占8.3%。工具修理均采用锤击法；修疤大且深，多为单层的鱼鳞状修疤。加工方向以复向为主，正向次之。石器加工较为简单粗糙。

5）三类工具中出现了修理刃缘或直接使用锋利的刃缘、修形以及修理把手的相互组合。以修理刃缘的类型组合为主，占三类工具总数的58.3%；直接使用锋利刃缘的类型组合次之，占总数的41.7%。其中又以修理刃缘或直接使用锋利边缘为刃缘与修理其他部位相互组合的工具最多，占91.7%；而仅修理刃缘的工具较少，仅占8.3%（表三）。从三类工具中对不同部位的加工修理可以看出，当时的人类已经有意识、有选择性的根据不同情况的毛坯，制作出更加适用于生产和生活的工具。

表三　三类工具修理部位比例表

<table>
<tr><th>刃缘</th><th>其他部分</th><th>件数</th><th colspan="2">百分比</th></tr>
<tr><td rowspan="4">修理刃缘</td><td>不修行和把手</td><td>1</td><td rowspan="4">58.3</td><td>8.3</td></tr>
<tr><td>仅修形</td><td>2</td><td rowspan="6">91.7</td></tr>
<tr><td>仅修理把手</td><td>1</td></tr>
<tr><td>修形和把手</td><td>3</td></tr>
<tr><td rowspan="3">直接使用刃缘</td><td>仅修形</td><td>3</td><td rowspan="3">41.7</td></tr>
<tr><td>仅修理把手</td><td>1</td></tr>
<tr><td>修形和把手</td><td>1</td></tr>
</table>

2. 对比分析

南岗地点的原料种类并不丰富，但均是以流纹岩为主的优质原料。石器类型比较丰富，有石核、石片、断块和工具，其中工具所占比重最高，又以三类单刃刮削器占有绝对优势，端刮器和锯齿刃器比重较少。工具毛坯以片状为主，块状较少。剥片技术为锤击法；工具修理亦用锤击法，以复向加工为主，正向次之。石器是以小型为主，中型和微型较少，不见大型和特大型的石器。整体来看，可将此地点归为东北地区以金牛山、小孤山、鸽子洞、周家油坊和阎家岗等遗址为代表的小石器工业类型[3]。

将南岗地点与辉南邵家店地点[4]相比较，具有其相似性，石器类型简单，石核以自然台面用锤击法进行剥片；工具中以片状毛坯为主，块状极少；不见一类工具，三类工具中以刮削器为主要的工具类型，工具修理以锤击法为主；加工方向为正向和复向。但又有其自身的特点：石核剥片还应用了反向打法，即：先以一台面进行剥片，再以此台面的剥片为台面，以原台面为剥片面进行剥片。工具中还发现了锯齿刃器和端刮器，这在邵家店地点并没有发现。同时在邵家店地点，砸击剥片技法以及三类工具中典型的琢背刀，在南岗地点也未发现。可见，南岗地点与邵家店地点的石器工业特征既有着相似性，又保留着其自身的特点。

3. 地点性质分析

此地点发现的石器数量不多，原料种类比较集中。石器类型较丰富，多为工具，以三类工具为最多；其中又以刮削器为最多，端刮器和锯齿刃器较少。其他类型较少。整体来看，所发现的工具组合中是以与狩猎经济相关的二类工具和三类工具中的刮削器、端刮器为主导的，而与采集经济相关的锯齿刃器较少（表二）。由此可知，古人类们在此地虽进行过短时间的生产活动，但当时此地的古人类们可能是以狩猎经济为主，采集经济为辅的生活状态。

从周围地理环境分析，此地点分布于穆棱河的Ⅱ级阶地上，水资源丰富，适合古人类在此地进行生产活动。通过对地点石器工业特征的分析，此地可能是进行生产、生

活的临时性场所。

4. 年代分析

南岗旧石器地点的石器皆出土于黑色腐殖土下的黄褐色亚黏土层中，根据黑龙江省第四纪地层的堆积年代分析，可以确定该层位属于上更新统[5]。由于该层没有发现共存的哺乳动物化石，也未出现磨制石器和陶片。因此，依据地层和石器的工业特征的对比分析，将其暂归于旧石器时代晚期。

附记：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批准号：16JJD780008）中期研究成果。参加调查人员有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李有骞主任；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的陈全家教授、李万博博士、崔祚文硕士；穆棱市文体新局原辉副局长；穆棱市文物管理所倪春野所长、张利军、张忠权和姚磊。调查期间得到黑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穆棱市政府和文物管理所等单位领导的大力支持，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注 释

［1］ 陈全家. 吉林镇赉丹岱大坎子发现的旧石器［J］. 北方文物，2001（2）. 本文的分类是依据陈全家教授的分类标准：石核、石片、断块、一类工具、二类工具（未经第二步加工而直接使用的石片）和三类工具（经第二步加工：修刃、修形或修理把手）.

［2］ 卫奇，裴树文. 石片研究［J］. 人类学学报，2013（4），第32卷.

［3］ 陈全家. 旧石器时代考古（东北）［A］. 东北古代民族·考古与疆域［M］. 长春：吉林大学出版社，1998：171～197.

［4］ 陈全家，李有骞，赵海龙，王春雪. 吉林辉南邵家店发现的旧石器［J］. 北方文物，2006（1）.

［5］ 黑龙江省区域地层表编写组. 东北地区区域地层表. 黑龙江省分册［S］. 北京：地质出版社，1979.

Paleolithic artifacts at Nangang locality from Bamiantong

Chen Quanjia Cui Zuowen Li Youqian Ni Chunye

Abstract: Nangang Paleolithic locality at Bamiantong, located at Ⅱ Grade terrace of the East bank of Muling River, was found in 2016. There are 28 stone artifacts, including cores,

flakes, shatter and tools. After analyzing the debitage, the main industrial feature manufacture technique is hammer stripping. Among the types of the stone artifacts, the tertiary tools play a significant role, especially single edged scrapers. The tertiary tools were retouched by hammer percussion. These tools are simply bifacially worked. Most artifacts are small stone artifacts, they may thus belong to the industry of small stone artifacts in the Northeast. Other evidence does not help in determining the age of the locality. According to stratum and comparing them with the stone artifacts of other sites, they are date to the broader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Key words: Muling River Basin; the industry of small stone artifacts; the Upper Paleolithic Period; Bamiantong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与研究综述

顾　佩[1]　李兴盛[2]

（1. 乌兰察布市博物馆，乌兰察布，012000；2.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文新广局，乌兰察布，012000）

乌兰察布市处于内蒙古自治区中南部，北与蒙古人民共和国接壤，东面和南面分别与河北省张家口市、山西省大同市相邻。本区域处于北纬40度线，阴山山脉东西横贯中部，黄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大黑河发源于此，境内还有岱海、黄旗海两大淡水湖。该地区是目前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发现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较为丰富的地区之一，现将本区域内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与研究情况叙述如下：

一、乌兰察布市新石器时代遗存发现情况

乌兰察布地区大量的考古发现证明，早在几十万年前的远古时期就有人类在这里生产和生活。目前为国内外学术界所公认的呼和浩特市东郊大窑村旧石器时代早期石器制-首次发现，经地质学、考古学等多学科联合研究，基本确定其年代距今约五六十万年。这类旧石器时代遗存在汪宇平先生对阴山地区旧石器时代遗存调查中，于乌兰察布境内的卓资县梨花镇后营子村、巴音锡勒镇火石窑沟村，四子王旗供济堂乡阿玛乌素村[1]等地均有发现。

进入新石器时代，在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中发现的化德县裕民遗址，距今约8400年，是内蒙古中南部迄今为止发现时代最早人类活动遗迹，填补了本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的空白。

目前，经过考古调查或发掘，这个阶段居住村落遗址年代最早的是化德县裕民遗址，距今约8400年。房屋为圆形半地穴式，从遗址中出土大量的兽骨和生产工具看，该遗址人群是以狩猎和采集为主要生产方式。

在距今约6000年（相当于中原地区后岗一期、半坡、庙底沟文化阶段），由于乌兰察布地区的气候条件十分有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来自陕、晋、冀地区的原始先民沿着南流黄河两岸，汾河谷地溯源北上，纷纷涌入乌兰察布地区，使本地区的人口有了一

个较大的增加，遗址数量有较大的增长。这个阶段经过考古发掘的居住村落遗址有凉城县六苏木乡石虎山Ⅰ遗址、石虎山Ⅱ遗址、[2]王墓山坡下遗址[3]、商都县章毛乌素遗址[4]。这一时期的遗存在考古学文化面貌上与中原地区同时代的遗存有着较大的一致性，但也存在着明显地方文化元素。这时的人们过着定居生活，居住在半地穴式房屋中，出土文物主要有陶器、骨器和石制农业生产和狩猎工具，反映其经济结构为初期农业生产和狩猎业。

时间发展到距今5500年～5000年（即仰韶文化晚期），乌兰察布地区的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逐渐发展成具有地方特色的以察右前旗乌拉哈乡庙子沟遗址[5]为代表的文化遗存。因其出土器物有别于周邻地区的踏实的考古学文化，具有鲜明的地域特征，考古学界将其面貌为“庙子沟文化”。这类遗存在乌兰察布市、呼和浩特市、包头市、鄂尔多斯市都有大量的发现。根据环境考古学研究成果得知，由于这一时期的气温和干湿度非常适宜农业生产，从而使乌兰察布地区的原始文化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其家庭形态可能已经进入偶婚制氏族家庭阶段。从出土的文物和动物标本分析，本地区的经济结构仍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狩猎、渔猎业，家庭饲养业开始出现。

从凉城县六苏木镇王墓山坡中遗址[6]发现了环壕遗迹，环壕围绕整个村落遗址一周，并在东、北两侧留有出口。反映出当时部落之间杀伐征战的缩影，军事防御体系由此产生。

距今约4500年（即龙山文化晚期），乌兰察布地区的考古学文化被以凉城县永兴镇老虎山遗址[7]为代表的“老虎山文化”所取代。环境考古学证明，由于气候变化，从5000年之后，本地区气候逐渐由暖湿向干冷转变。到距今约4500年，其气候条件呈现出较强的干冷气候，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人口开始向暖湿地区迁移，其分布范围和遗存数量较庙子沟文化有所缩减。老虎山文化的人们改变了单纯半地穴式房屋的居住方式，在有条件的乌兰察布地区南部黄土丘陵区出现了窑洞式房屋。并在房屋的地面和墙壁上抹有平整的白灰面，有效地改善了居住条件。这种窑洞式房屋是国内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窑洞式房屋，在遗址内还发现有小型陶窑，也是内蒙古中南部地区发现的最早的陶窑。老虎山文化出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是“瓮”“斝”，其中老虎山文化一期出土的“钝尖底斝”是国内目前发现最早的“斝”。老虎山文化代表性器物“瓮”和“斝”在国内同时期器物中独具特色，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曾对黄河以北广大地区的原始文化用诗做了概括：华山玫瑰燕山龙，大青山下斝与瓮，汾河岸边沁和鼓，夏商周及晋文公。足见其独特性和代表性。从遗址出土遗物分析，初期的农牧交错文化可能在老虎山文化时期开始产生萌芽。

在凉城县永兴镇老虎山遗址发现有大型石砌围墙，说明当时已经有了完整的军事防御体系，被考古学和历史学界普遍认为是城市起源的雏形，对研究城市起源有着极其重要的价值。

二、环境考古与人地关系研究

随着考古工作的不断深入，乌兰察布地区环境考古学的研究在察右前旗黄旗海地区和凉城县岱海地区具备了环境考古学研究和人地关系研究的各项条件。

1. 黄旗海盆地

黄旗海盆地在东经112°49′～113°40′、北纬40°41′～41°43′，属于中国北方温凉半干旱偏润气候区，北方季风尾闾区（年平均降水量250～450毫米的地区）[8]北京大学环境学院莫多闻教授对黄旗海地区现代环境与全新世环境演变进行了实地考察和研究[9]。对庙子沟村附近沟谷、庙子沟村西剖面、庙子沟下游沟谷剖面、提取的土壤样本中的孢子花粉进行分析。得知该地区从晚更新世末期到全新世早期，其早期黏土矿物伊利石含量较多，蒙脱石含量较低，草本、灌木花粉占优势，属于较冷的环境，气候的发展方向明显的向暖湿转变。中全新世前期，距今8000～5000年，孢粉分析和黏土矿物分析和蒙脱石伊利含量较多，黄旗海湖面在现代海拔1300～1330米波动，是全新世最为暖湿的时期。中全新世后期，距今5000～3000年，黏土矿物中的蒙脱石陡降，孢粉中乔木花粉含量大幅上升，黄旗海湖面退至现代海拔1300米之下，气候明显趋于干旱。

通过上述对黄旗海地区气候演变的研究，基本得知中全新世（距今8000～3000年）的气候变化和黄旗海水平面的海拔高度，庙子沟遗址所在区域最高点的海拔为1300米。庙子沟遗址、大坝沟遗址经过考证确定的大致年代为距今5500～5000年，是目前黄旗海地区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人类遗存。其原因正是由于该地区的气候十分适宜于农业生产与发展，人口在得到了大幅度的扩张，这一时期的村落远远多于其他阶段村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大量的半地穴房屋，说明庙子沟人已完全过着稳定的定居生活。从遗址内出土的石斧、石铲、石刀等生产工具反映出其农业生产的状况；石磨盘、石磨棒应该是初期的粮食加工的具体表现；而蚌饰、螺饰及动物骨骼、石球等渔猎工具的出土，表明当时人们已经掌握熟练的渔猎和狩猎技能。石纺轮、骨锥、石凿、石钻等纺织、生产工具的出土，说明当时已经有了简单的纺织业和手工业。

从以上对黄旗海地区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分析结果，大致可以判断出其经济形态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渔猎和狩猎业，纺织和手工业也由此得到发展。

2. 岱海盆地

岱海地区在东经112°10′～113°02′，北纬40°10′～40°50′，岱海湖面在现代海拔1230米，该区域总面积约150平方千米。属大陆性季风气候，处于中国北方季风尾闾区边缘，即东南季风、西南季风环流共同作用的地带。[10]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与北京师范大学地理系联合对岱海地区距今7000年～2000年环境气候变化做了实地考察和

研究。[11]在从老虎山全新世沉积剖面和大火地区考古学地层中提取的土样加以分析研究，基本得出以下结论。在7300年前，该地区为年均温度0°C线反复通过地区，气候和降水的变化格外敏感，气候与降水处于不稳定时期。至全新世早期，距今7300年～6600年岱海地区的气候才相对稳定下来，逐渐进入暖湿期，平均气温在2～3°C，岱海湖面高出现代海拔1250米；但在此期间曾有100年的寒冷期。在距今5800年～5000年，气候进入稳定的暖湿期，年平均温度在2～4°C，年降水量在380～580毫米，是该地区最有利于农业生产的阶段。在距今5000年～4900年，岱海地区（内蒙古中南部）气候突然降温，从岱海东岸苜花河地层剖面反映，其年平均气温在0°C以下。在距今4800年～4400年，气温又转入温湿期。距今4400年之后，岱海地区气温逐渐下降至0°C左右，降水量由多转少。经济形态由有利于农业生产向畜牧业生产转化，原始畜牧业经济形态逐渐产生。

通过对岱海地区距今7000年～4000年气候变化的分析，基本了解了该地区由于气候变化规律和对农牧业所产生的影响。再通过大量的考古发掘资料研究，使对其人地关系的探讨有了一定的依据。

岱海地区目前发现时代最早的遗存是红台坡下、石虎山Ⅰ、Ⅱ两个遗址，距今6530年～6440年。其居住方式为半地穴式房屋，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石器中石磨棒、石磨盘、石斧、石铲均为典型的农业生产和加工工具，说明当时的农业生产已经发展到一定水平。遗址内出土的细石器比例虽然不大，但表明狩猎业仍然存在。由此得知当时的经济形态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狩猎业。

王墓山坡下遗址，距今约6000年，环境考古学的研究结论是比较适宜于人类生存的环境。居住方式仍为半地穴式房屋，同时出现了用于保存火种的火种罐。但陶器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次之，少量的沙质陶；夹砂陶是当时人们的炊具，泥质陶做为容器和汲水器来使用，说明人们在自给自足的基础上，生活用品有了一定的结余。石磨盘、石磨棒、石刀出土数量较多，反映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加工达到了相应水平。石镞、刮削器、双刃刀等狩猎工具的出土，说明其狩猎业的普遍存在。纺轮、石斧、石凿代表了这一时期简单手工业和纺织业已经产生。王墓山坡下的经济形态以农业为主，兼有狩猎业，原始手工业、纺织业开始出现。

王墓山中遗址，距今5500年～5000年，本阶段的环境考古证明是最适宜于农业生产和生存的时期，人类扩张在内蒙古中南部达到了鼎盛时期；在遗址周边出现的环壕遗迹，反映出当时已经有了稳定的部落存在。半地穴式房屋反映出人们过着定居生活，房屋内出现用于专门储存物品的窖穴，应该是随着物品储存量的增加而产生的；同时出现了面积较大的房屋（比其他房屋大10～15平方米），推测其应该出现了宗教祭祀或贫富差距。陶器仍以泥质陶为主、夹砂陶和沙质陶次之。遗址内出土的石磨盘、石磨棒、代表了当时的农业生产和加工水平。砺石、石叶说明狩猎业的存在，石斧、石凿、石锛、石锉等生产工具种类的增加，应是手工业水平提高的反映。这个阶段的总体经济形态仍

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狩猎业，手工业生产水平和规模有所提高。

老虎山遗址、园子沟遗址等遗址，距今约4500年～4300年。这一时期的遗存多数出现石围墙，在环岱海遗址群的老虎山遗址、西白玉遗址、板城遗址大庙坡遗址[12]均发现石砌围墙遗迹，说明其军事防御设施进一步完善，有学者推断中国城市的起源因此开始。居住房屋由初期的半地穴式房屋，后期发展为窑洞式房屋，在窑洞式房屋前面出现小型院落，同时出现了前堂后室的前后相连房间，有了主副室之分，说明其生活条件有了较大的改善，增强了抵御自然的能力。房屋的布局呈现出成区、排、院落分布，推断其出现了家族或更大的社会组织。该阶段发现了数量较多的陶窑、储藏坑、泥坑、工作面等，折射出老虎山人的制陶业已形成相应的规模和工种间有了一定的分工。遗址内出土数量的体型硕大的三足瓮、直口罐、直口瓮和石刀、石磨盘等农业生产工具，反映出当时仍以农业为主，并有较多的剩余和储存。遗址内出土数量较多的石镞和大量的动物骨骼，说明其狩猎业也占有一定的比重。遗址内发现大量的石（陶）制纺轮、骨锥等器物，代表了手工业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从以上对黄旗海、岱海地区距今8000年～4000年的环境演变和人地关系发现，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本地区新石器时代各遗存大面积扩张时期都是在环境演变的暖湿期，从距今7000年的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狩猎业的经济形态；到距今6000年的以农业为主，兼有狩猎业，原始手工业、纺织业开始出现的经济形态；再到距今5500年～5000年其经济形态以农业生产为主，兼有渔猎和狩猎业，纺织和手工业也由此得到发展，并出现了具有军事防御性质的环壕；至距今4500年～4000年，具有城市功能的石筑围墙开始出现，生产力有了进一步提高，农业生产、制陶业、狩猎业、纺织业和手工业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三、考古学文化及谱系编年研究

考古学文化有其独特含义，专门指考古发现中可供人们观察到的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的特征的一群遗存。[13]本地区（内蒙古中南部）考古学文化及谱系编年研究，起步于20世纪70年代，自治区文物考古工作者在大量地面调查的基础上，重点对乌兰察布市凉城县王墓山遗址、红台坡遗址、西白玉遗址、面坡遗址、大庙坡遗址，[14]商都县章毛乌素遗址、[15]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大坝沟遗址[16]等进行了大面积的考古发掘，积累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为研究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和编年谱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经过考古学家多年的探索与研究，本地区的距今7000年～4000年考古学文化和编年谱系：

乌兰察布地区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的考古学文化及其编年谱系共分为段。

红台坡下组：年代约相当于后岗一期文化，距今约6500年。遗址内出土的石斧、

红顶钵及陶器中夹杂较多云母片，陶器装饰流行刺纹和指甲压印纹等，均明显具有后岗一期文化的特征。该阶段的遗存在白泥窑子遗址、西园遗址、狐子山遗址均有发现。

狐子山组：年代应属庙底沟类型阶段，距今约6200年。遗址仅见少量陶片，有黑彩宽带纹钵、夹砂罐等。

章毛乌素组：年代相当于庙底沟文化，距今约6000年。出土有双唇小口尖底瓶、黑彩宽带纹钵、彩陶盆、曲腹钵、夹砂罐、火种罐等。该阶段遗存在王墓山坡下有同类遗存存在。

庙子沟文化：年代约相当于半坡文化四期，距今约5500年～5000年。代表性器物有小口双耳罐、筒形罐、喇叭口尖底瓶折腹钵等。这类遗存在内蒙古中南部分布范围广、数量多；由于地域的原因，在文化面貌上有一定的差异，又可分为庙子沟类型、海生不浪类型和阿善三期类型。

老虎山文化：年代应在龙山文化早期，距今约4500年～4300年。以斝和三足瓮为主要代表器物，大致相当于同时代的遗存有园子沟遗址、面坡遗址、板城遗址、西白玉遗址。

从上述分析结果排列出本地区的考古学文化编年：

红台坡下组→狐子山组→章毛乌素组→庙子沟文化→老虎山文化。

四、其他相关研究

（一）庙子沟遗址人类体质学研究

在庙子沟遗址发掘中发现了一定数量的墓葬。吉林大学考古系对墓葬内出土的17例尸骨进行了体质人类学的研究。[17]17例尸骨均为成年人，其中男性8例，女性9例，年龄在17～50岁之间。研究通过获得的颅骨指数结果，与现代人种的数据进行比较，基本推断其居民种族类型属于东北蒙古人种，也有某些北亚蒙古人种的体质因素。

遗址墓葬内出土的59例尸骨年龄来看，年龄在10岁以下的14例，约占其总数的23.73%；10～20岁年龄段的13例，比例为22.03%，20～40岁的成年人29例，占比为59.16%；40岁以上的仅有3例，约占5.08%。反映出人类的寿命大多在20～40岁之间，婴幼儿和未成年人的死亡比例较大，可以活到40岁以上的人十分稀少。这些数据反映了当时人们的生存状况。

（二）对动物骨骼的相关研究

乌兰察布地区新石器时代动物骨骼研究，主要[18]集中在出土动物骨骼相对较多的狐子山遗址和庙子沟遗址[19]两处。

1. 石虎山遗址动物骨骼研究

石虎山遗址出土动物骨骼可用于鉴定研究的标本有2036例，其中以狍（866例）、马鹿（532例）、水牛（520例）、猪（171例）最多，貉（56例）、狗（39例）、棕熊（30例）、狗獾（22例）、中华鼢鼠（27例）次之，并有少量的豺、野兔、黄鼠、班鹿、黄羊等17种动物。此外，还发现少量的鲤科鱼类的咽齿、鳃盖骨、脊椎骨和河蚌、鳖及少量的禽类。这种情况同岱海地区同时期遗存中王墓山遗址出土的动物种类与比例一致，说明本地区动物种类的生存状况。从对遗址动物骨骼的全面分析得知，以野生动物占绝对多数，比例高达84.4%，家养的狗、猪数量不多，约占15.6%。家畜的死亡年龄多在6个月左右，三分之一的年龄达到成年。说明狩猎是当时人类肉食的主要来源，家畜饲养业和渔猎业属于从属地位。

2. 庙子沟遗址动物骨骼研究

庙子沟遗址共采集遗址内出土的234件动物骨骼进行鉴定和研究，以狍（65例）、猪（46例）、牛（42例）、黄羊（33例）为主，马鹿（19例）、马（12例）、狗（6例）次之，少量的貉、鼠兔、鸟、螺、珠蚌等15个种类。

随着人类对自然规律的探索和积累，庙子沟时期的家庭饲养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家养的马、牛、猪、狗4类占45.29%，野生动物类占53.45%，鱼蚌类1.26%。上述研究数据基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虽然野生动物的比例仍微占优势，但家养动物也接近半数，说明家庭饲养业在稳步提升的同时，有取代狩猎业的趋势。鱼蚌类的占比虽然很少，但从遗址内出土数量较多的蚌饰、贝饰、螺饰分析，渔猎业仍是当时的重要的经济来源。

（三）庙子沟、大坝沟遗址的石制品研究

庙子沟、大坝沟遗址出土了多达858件石器，其中庙子沟遗址558件、大坝沟遗址300件，对研究两处遗址的石制品丰富和可靠的实物依据。

庙子沟、大坝沟遗址所处的黄旗海南岸为侵蚀低山和熔岩低山，裸露出的地层依时代又远及近有太古代、元古界、古生界、中生界、新生界五个地质年代。

遗址内出土石器均用当地的岩浆岩、沉积岩、变质岩三大类岩石制成，其中岩浆岩占15.87%，火山碎屑岩22.75%，碎屑岩石占13.11%，变质岩占11.68%。从两处遗址的石制品原料选材结构分析，庙子沟遗址有明显的单重数特征，即岩浆岩占明显优势；大坝沟遗址有明显的双重数特征，以比例相近的岩浆岩和火山碎屑岩占主导。从石制品组合判断，庙子沟遗址对大坝沟遗址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主要表现在两处居民都认识到火山碎屑岩的韧性在制作石刀时体现出的优点，庙子沟遗址的人们很好的利用岩石的物

理性质来制造耐用的石器，而大坝沟遗址的石材的选择上存在一定的盲目性，体现在不适当选用片麻岩和大理岩、变质岩制作石刀、石斧、石铲、石凿等生产工具。

从以上分析得知，由大坝沟遗址到庙子沟遗址的石器文化发展历程中，既有后人对前人的继承，又体现了人类在获取和利用石材的水平日臻成熟，人们可以有计划的选取所需要的原料来制作相应的石器。

总之，乌兰察布市的新石器时代考古与研究，通过几代考古专家的艰辛努力和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但从以上综述不难看出，其中还存在许多不足之处和研究空白，仍需通过今后大量的田野考古和研究来充实。

注　释

［1］　汪宇平. 内蒙古阴山地带石器制造场［J］. 内蒙古文物考古. 创刊号，1981.

［2］　田广金，秋山进午主编. 岱海考古——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3］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岱海考古——仰韶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3.

［4］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乌兰察布博物馆，商都县文物管理所. 商都县章毛乌素遗址［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5］　魏坚. 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6］　同［3］.

［7］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岱海考古——老虎山文化遗址发掘报告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8］　张兰生，史培军，侯乐峰等. 中国北方季风尾闾区全新世不同时期降水变化及其区域分异规律的研究［A］. 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研究（一）［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9］　莫多闻，王辉，杨晓燕. 黄旗海地区现代环境与全新世环境演变及其对人类活动的影响［A］. 庙子沟与大坝沟［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2.

［10］　张兰生等. 中国北方季风尾闾区全新世不同时期降水变化及其区域分异规律的研究［A］. 中国生存环境历史演变规律的研究（一）［M］. 北京：海洋出版社，1993.

［11］　张兰生等. 我国北方农牧交错带全新世环境演变［A］. 全球变化与我国未来的生存环境［M］. 北京：气象出版社，1996.

［12］　同［7］.

［13］　夏鼐. 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卷［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14］　同［3］.

［15］　同［4］.

［16］　同［5］.

［17］ 朱泓. 内蒙古察右前旗庙子沟遗址新石器时代颅骨的人类学特征［A］. 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18］ 黄蕴平. 石虎山Ⅰ遗址动物骨骼鉴定与研究［A］. 岱海考古——中日岱海地区考察研究报告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1.

［19］ 黄蕴平. 庙子沟与大坝沟遗址动物骨骼鉴定报告［A］. 庙子沟与大坝沟——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报告［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A Summary of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Neolithic Age in Wulanchabu City Inner Mongolia

Gu Pei　Li Xingsheng

Abstract: 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collated the discovery and research of the Neolithic Age sites (from 8000 to 4000 years) discovered in Wulanchabu City, Inner Mongolia, specifically, the archaeological culture and genealogy,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and man-land relationship. These elements fully reflect the present situation and the latest research results of the Neolithic Age remains in the Wulanchabu area, and has some reference value for understanding the archaeology of this stage.

Key words: Wulanchabu City；Neolithic Age；A summary of the research

土壤微形态分析在环境考古中的应用研究*

李海群**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乌鲁木齐，830046）

土壤微形态学，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奥地利学者W.L.库比纳，他在20世纪30年代利用显微镜直接在土壤剖面上和在实验室内对土壤矿物、土壤垒结和土壤微化学等现象进行了一系列研究，并先后出版了《微土壤学》《土壤地理的微形态特征》等书，开创了土壤微形态学这一学科。随着学科的发展，土壤微形态描述和解释的方法越发成熟，Bullock[1]的《土壤薄片描述手册》成为一个国际通用的土壤薄片描述系统。

土壤微形态学是借助显微镜观察、描述土壤的微形态特征及变化，用来说明土壤形成、发育的规律。对考古学来说，土壤微形态分析的对象是遗址中的土壤堆积物。遗址中的土壤堆积物中可能会存留人类活动的证据，如使用火塘、堆积垃圾、房屋修造等活动都会留下些痕迹。有的遗址埋藏环境和气候条件不是很理想，导致遗址中的很多遗存，如动物粪便、植物硅酸体、灰烬、生活垃圾、房屋的墙基柱洞，动物碎骨或矿物颗粒等都可能保存较差，无法直观看到和获得，从我们的宏观视野中消失。但它们实际仍存在于遗址中，复杂而曲折地记录了人类活动的重要信息。因此借助显微镜运用土壤微形态分析方法可以对遗址的形成过程得出全面而生动的认识。它能使我们对考古研究中存在的一些现象和问题的认识更加深刻和全面。

一、国外学者应用土壤微形态学所作的环境考古研究

土壤微形态分析在20世纪50年代被首次用于考古研究，此后逐渐在西方学界得到了广泛应用。Cornwall[2]首次根据考古遗址中土壤微形态分析的结果重建遗址周围环境变化的历史，他解释了遗址中灰烬、居住面土壤上所能显示的当时人类可能的活动。Dalrymple[3]通过分析遗址文化层与腐殖层的关系，表明土壤微形态分析在考古研究中的意义和重要作用。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欧洲、中亚、中美洲等地的考古研究中都做

---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资助，项目号：15CKG016，项目名称：新疆巴里坤东黑沟遗址土壤微形态分析及人类活动相关性研究

** 李海群（1981～），女，汉族，江苏徐州人，新疆大学人文学院，讲师

了较多土壤微形态分析的工作。这些为认识史前时期当地的环境、农业活动、生活方式提供了有力的证据。

系统地、理论地将土壤微形态分析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则是在80年代由英国学者完成的。Courty等人[4]出版了可以作为考古学研究中土壤微形态分析应用手册的《考古学中的土壤和微形态分析》一书，该书始建了一套相对独立的方法，即如何将土壤学的研究手段应用到考古学中，它推动了地质学、土壤学等学科与考古学的结合，它标志着土壤微形态分析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到了一个新的阶段，从此称为了考古学研究的一个方向，将传统考古学的范围延伸的更广。

此外一些具体的文化遗址的微形态分析工作也在各地开展。Weiss等[5]对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北部3000多年前古文化遗址中的文化层及文化遗迹进行包括土壤微形态分析在内的环境考古研究，展示了该区域环境改变与人类文化发展之间的相互关系，即该区域在3000多年前气候恶化，伴随着气候的改变，人类文明也随之衰落。S.J. Scudder[6]等提出现代考古研究的焦点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强调将考古文化和环境信息综合成一个整体，进而解释人类生态学，对新兴学科——地质考古学做了阐释，同时文中还介绍了些具体的土壤学技术和工具。M.J.Kooistra[7]指出土壤微形态学学科的未来，认为微形态学将会被用在更多的研究方向上，如土壤中生物与非生物之间的关系、遗址当时环境和人类活动关系等。

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土壤微形态学越来越多地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Maja J.等[8]使用土壤微形态学和孢粉学分析来对遗址作综合研究，将考古遗址中所发现的零碎线索联系起来，对遗址形成因素和人类活动做进一步了解和深入。Vance. T.holliday等[9]提出磷是土壤中能敏感和持久的反映和指示人类活动的元素。由于提取和测量磷元素有多种方法，文中着重在介绍更为适合考古学和土壤学的提取测量方法。M.G.Canti[10]提出了对考古过程中所发现的植物灰烬进行微形态描述、识别，分析其与环境的关系。Richard I.Macphail[11]简要概述了土壤和考古学的历史，介绍了一些有价值的技术方法以及过去50年中土壤学和考古学取得的进展。

二、国内学者环境考古中应用土壤微形态分析的研究

经过了许多学者的艰苦努力，土壤微形态学及其研究方法被引入国内并不断得到发展。最早是1939年黄瑞采在金陵大学农学院的科学报告会上介绍了库比纳的《微土壤学》。到20世纪60年代，国内相继设立了土壤微形态研究机构，翻译了国外的一些专著和论文，之后也有很多学者做国内部分地区土壤的微形态研究。在发展相对成熟后，黄瑞采[12]系统地讲述了微土壤学的研究体系、相关知识、研究方法等，成为许多高校土壤学的教学用书。

而将土壤微形态分析引入考古学研究，在这方面国内的起步较晚，直到90年代才

有学者试着将微形态分析引入到考古学研究中来。虽然国内起步很晚，但是发展却是非常的快，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

综述性的文章有靳桂云[13]介绍了土壤微形态学原理和标本采集与分析技术，指出土壤微形态学在考古学中的优势：能分析考古遗址内各类遗存的特征及遗址中人类活动特点。徐祥明、何毓荣[14]介绍了国外土壤微形态学研究的最新进展，其中也有提到在考古学中的应用情况。 申朝瑞等[15]对土壤微形态学国内外30年来的研究成果做了一一回顾，并对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前瞻工作。龚德才、杨玉璋[16]介绍了国内外对土壤中残留物如孢粉、淀粉粒、植物残留物的研究，着重描述了国内在残留物分析上所取得的成绩。

由于土壤微形态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能为环境考古研究提供重要的信息，它能分析区域环境演化与考古遗址的形成以及考古学文化发展的关系，也能分析考古遗址内人类活动的特点，因此这方面具体的研究工作已经开展起来。

关中地区是传统农业生产区，先民很早就在那里生产、生活。关中地区的土壤微形态研究内容较多，陕西的学者以周原、泾河、渭河、关中平原等古代农业生产区域为研究对象做了些相关的研究工作。桑广书等[17]以渭北黄土台塬西部周原七星河流域为研究对象，采用实地考察、考古等多种方法定量研究了仰韶文化以来周原地貌演变状况，土壤侵蚀的过程和规律。谭志海等[18]通过野外采样及其磁化率、总有机碳、木炭屑的分析，探讨周原地区全新世时期生态环境演变及人类活动的遗迹。谭志海等[19]研究陕西周原全新世黄土剖面磁化率曲线、总有机碳曲线、木炭屑曲线和野火活动关系，结果表明全新世时期，野火活动很少发生，对环境没有太大影响。人类的活动在这时已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研究表明周人迁居到周原后，人类用火及其放火烧荒等活动致使生态环境发生重大的变化。

分析关中地区河流流经区域的古耕作土壤的文章有申朝瑞等[20]通过野外调查，应用偏光显微镜和图像处理软件等手段，结合理化分析，研究了泾河中游古耕作土壤的微形态特征。庞奖励等[21][22]比较了关中地区古耕作土壤和现代耕作土壤的土壤微形态特征，还作了关中地区不同的农业生产模式下土壤微形态特征的比对。黄春长等[23]研究了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主要考古遗址的全新世黄土—古土壤剖面，获得了较高时间分辨率的磁化率、粒度成分、总有机碳和$CaCO_3$含量等古代环境指标，结合该时期人类活动遗物分布的层位关系、考古断代、文献记录，形成了对该区域人类活动和环境演变过程的综合断代。

青海地区虽然并不是传统农业发达区域，但由于学者的努力，青海几处遗址的土壤微形态分析工作顺利开展。主要有董广辉等[24]通过对青海长宁遗址晚全新世沉积剖面Oc、P、Ba、Mn、Pb等元素的化学成分分析及磁化率分析，研究了该时期沉积物元素含量对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结果表明齐家文化时期至汉代的气候恶化及人类

活动都对沉积物元素含量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张玉柱等[25]对青海喇家遗址古耕作土壤层和现代耕作土壤层做了沉积物宏观特征、粒度成分和微形态特征分析，发现了喇家遗址在齐家文化（4200～3600a BP）时期古耕作土壤层和辛店文化时期（3400～2700a BP）古耕作土壤层，表明人类很早就在此从事旱作农业生产。董光辉等[26]也对喇家遗址土壤内土壤和遗址外的土壤分别采样作对比性研究，得出喇家遗址内土壤微结构稳定，受生物扰动较少，这可能与人类活动抑制了植物的生长有关，而遗址外的土壤由于人类干预较少，受到了生物强烈的扰动，并且经历了古水流的作用。

江汉地区如湖北、重庆地区的土壤微形态研究也被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中来。李中轩等[27]利用湖北郧县辽瓦店遗址T0709剖面地层样品的ICP-AES元素含量和XRF氧化物含量及LOI、磁化率指标恢复了遗址地层记录的环境演变和人类活动的基本特征。高华中等[28]对三峡库区忠县中坝遗址考古地层中土壤有机碳进行了分析测试，探讨了西周以来土壤有机碳在考古地层剖面中的分布特征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史威等[29][30]结合古器物推定、人类遗存遗迹和堆积物自然属性特征，重庆中坝考古遗址多剖面地层高分辨率采样的质量磁化率综合对比研究，得出中坝地区新石器末期至唐代是人类活动的活跃期，宋以后人类活动有逐渐减弱的趋势，他还分析了重庆中坝遗址地层中Hg、P、Ca、Mg和TOC等值，结合考古遗存记录对比研究4250a B.P.以来人类活动的三个不同演变阶段。

其他地区的土壤微形态研究相对来说较为零星分散，成果较少。胡金明等[31]利用野外考古资料和已有考古研究成果，系统梳理了西辽河流域文化景观的演变历史，利用土壤剖面、古土壤年代数据、文化遗址中的碳屑显微结构等证据，结合前人的研究成果，详细探讨了全新世以来这地区人地系统的耦合演变历史。李潇丽、马宁[32]对河北泥河湾盆地的许家窑遗址74093地点地层剖面的粒度、磁化率、碳氧同位素和有机碳分析，得出剖面沉积经历了由相对温暖湿润→相对稳定的干燥寒冷→波动的干燥寒冷→逐渐变暖这样的四个阶段，而古人类则在相对温暖湿润到稳定的干燥寒冷环境下。朱诚等[33]通过长江三角洲长江以北地区高邮龙虬庄和海安青墩两个新石器时代考古遗址的剖面粒度、磁化率、孢粉以及年代学测定，较为全面地分析了该区全新世以来生态环境变化与人类文明的兴衰关系。

由上可知，土壤微形态分析方法应用到考古学研究上虽然时间不长，却取得了不少成绩，利用土壤微形态研究促进了环境考古、植物考古等多方面考古研究的长足进步。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研究角度较小，主要集中在环境考古和农业考古上；研究的地域相对较窄，主要集中在几个地区如陕西、山东、江汉地区等；时间上也多有限制，多为史前时期，历史时期的研究较少；研究人员较少，由于起步较晚，大部分从事考古工作的研究人员很少涉足土壤微形态研究。这几点给土壤微形态学在考古学上应用带来很多限制。未来土壤微形态学在考古学上应用的领域和范围会进一步扩大，会有更多的科

研工作者加入到土壤微形态研究中，研究范围也将从局部地区扩展到全国，甘肃、青海、新疆、云南等边疆地区的土壤微形态研究将有所开展；研究角度不也不仅在环境考古和农业考古方面，还将拓展研究领域，如建筑考古、动物考古等；对不同时期从旧石器、新石器、史前到历史时期的考古遗址中的土壤微形态进行研究，建立起全国性的土壤微形态学研究网络，为考古学的发展提供更全面的资料和证据。

注　释

［1］ Bullock P. Fedorroff N. Jongerius A et al. Handbook for soil thin section descripition. ［C］. *Waine Research Publication*. 1985. 152.

［2］ Cornwall I W. Soil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with illustrations from some British Bronze Age monuments. ［J］. *Proceedings of Prehistoric Socitey*, 1953（2）：129 ~ 147.

［3］ Dalrymple J B. The application of soil micromorphology to fossil soils and other deposits from archaeological sites. ［J］. *Journal of Soil Science*. 1958（9）：199 ~ 209.

［4］ Courty M A. Colderg P, Macphall R. Soils and micromorphology in archaeology ［M］. *Cambrideg University Press*,1989：269 ~ 283.

［5］ Weiss H. Courty M A. Wetterstron W. et al. The genesis and collapse of Third Millennium North Mesopotamian civilization［J］. *Science*,1993（261）：995 ~ 1004.

［6］ S. J. Scudder, J. E. Foss, M. E. Collins. Soil Science and Archaeology Advances in Agronomy［J］. *Advances in Agronomy*. 1996（57）：1-36，36a，36b，37 ~ 76.

［7］ M. J. Kooistra. The Future of　Soil Micromorphology Developments in Soil［J］. *Science*,1990：（19）1 ~ 7.

［8］ Maja J. Kooistra. Laura I. Kooistra. Integrated research in archaeology using soil micromorphology and palynology［J］. *Catena*. 2003（54）：603 ~ 617.

［9］ Vance . T. holliday. William G. Gartner. Methods of soil panalysis in archaeology. . Journal of Archeological ［J］. *Science*. 2007（34）：301~333.

［10］ M. G. Canti. Aspects of the chemical and microscopic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ashes found in archaeological soils［J］. *Catena* 2003（54）：339 ~ 361.

［11］ Richard I. Macphail. Soils and archaeology［M］. *Encyclopedia of Archaeology*. 2008：2064 ~ 2072.

［12］ 黄瑞采. 土壤微形态学发展及应用［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

［13］ 靳桂云. 土壤微形态分析及其在考古学中的应用［J］. 地球科学进展，1999（14-2）：197 ~ 200.

［14］ 徐祥明，何毓荣. 国外土壤微形态学研究的进展［J］. 山地学报，2011（29-6）：721 ~ 728.

［15］ 申朝瑞，庞奖励. 土壤微型态学研究进展及前瞻［J］. 固原师专学报，2005（26-6）：34 ~ 40

［16］ 龚德才，杨玉璋. 探索未解之谜的宝库—残留物分析在考古学研究中的应用［J］. 中国文物科

学研究，2011(1)：54~58.
［17］桑广书，甘枝茂，岳大鹏. 历史时期周原地貌演变与土壤侵蚀［J］. 山地学报，2002，20（6）：695~700.
［18］谭志海，黄春长，庞奖励. 渭河流域全新世土壤剖面木炭屑记录及其古环境意义［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10（18-1）：25 ~ 29.
［19］谭志海，黄春长，庞奖励. 周原全新世土壤剖面木炭屑于野火活动的关系研究［J］. 中国生态农业学报，2005（13-2）：31 ~ 33.
［20］申朝瑞，庞奖励，黄春长. 泾河中游古耕作土壤的微形态特征研究［J］. 中国沙漠，2007（27-2）：273 ~ 277.
［21］庞奖励，黄春长，张旭. 关中地区古耕作土壤和现代耕作土壤微形态特征及意义［J］. 中国农业科学，2006（39-7）：1395 ~ 1402.
［22］庞奖励，黄春长，查小春. 关中地区两种不同农业管理方式下土壤微形态特征［J］. 中国农业科学，2007（40-11）：2518 ~ 2526.
［23］黄春长，庞奖励，陈宝群. 渭河流域先周—西周时代环境和水土资源退化及其社会影响［J］. 第四纪研究，20030（23-4）：404 ~ 413.
［24］董广辉，贾鑫，安成邦. 青海省长宁遗址沉积物元素对晚全新世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的响应［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8（28-2）：115 ~ 119.
［25］张玉柱，黄春长，庞奖励，周亚利，周强，郭永强，尚瑞清. 青海民和官亭盆地喇家遗址古耕作土壤层微形态研究［J］. 土壤学报，2015（52-5）：1002 ~ 1013.
［26］董光辉，夏正楷，刘德成. 青海喇家遗址内外的土壤微形态初步分析［J］. 水土保持研究，2005（12-4）：5，6.
［27］李中轩，朱诚，王然. 湖北辽瓦店遗址地层中多元素指标对古人类活动的记录［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8（28-6）：113 ~ 118.
［28］高华中，朱诚，孙智彬. 三峡库区中坝遗址考古地层土壤有机碳的分布及其与人类活动的关系［J］. 土壤学报，2005（42-3）：518 ~ 522.
［29］史威，朱诚，徐伟峰. 重庆中坝遗址剖面磁化率异常与人类活动的关系［J］. 地理学报，2007（62-3）：257 ~ 267.
［30］史威，朱诚，马春梅. 中坝遗址约4250aB. P. 以来古气候和人类活动记录［J］. 地理科学，2008（28-5）：703 ~ 708.
［31］胡金明，崔海平，李宜垠. 西辽河流域全新世以来人地系统演变历史的重建［J］. 地理科学，2002（22-5）：535 ~ 542.
［32］李潇丽，马宁. 泥河湾盆地许家窑遗址古人类生存环境［J］. 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14（34-4）：153 ~ 161.
［33］朱诚，张强，张芸. 长江三角洲长江以北地区全新世以来人地关系的环境考古研究［J］. 地理科学，2003（23-6）：705 ~ 712.

Soil micromorphology analysis in the application of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research

Li Haiqun

Abstract: Soil micromorphological analysis was applied to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the 1950s, in China the use begins from 80s. Foreign scholars have developed a body of theory and practice. More relevant research focused on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of archaeological sites and on the relations of human cultural development. Domestic scholars on the study of its application to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mainly concentrated in the ruins of the natural environment, the research on vegetation, water, etc. The study areas in the Guanzhong area and the Jiang-Han area are traditional agricultural areas. These studies can provide evidence of archaeological site form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egional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they also can reflect the archaeological sites in terms of human activit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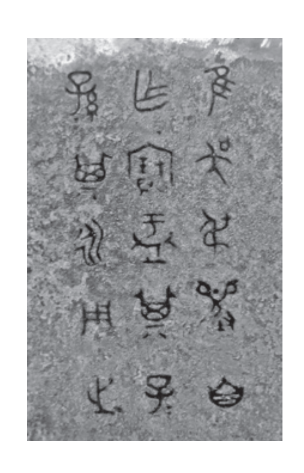
Key words: Soil micromorphology; environmental archaeology; archaeological site

从吴叔襄鼎谈到枣阳曾国墓地出土的夨、卫、郾诸器

黄锦前

（河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开封，475001）

吴镇烽《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下文简称“《续编》”）著录有一件私人收藏的吴叔襄鼎[1]，侈口方唇，浅腹圜底，附耳，三蹄足。颈部饰无目窃曲纹，两耳内面饰变形龙纹，外面饰双凹线纹，纹饰填漆（图一）。这种形式和纹饰的鼎，在湖北境内的随枣走廊一带，尤其是近年枣阳郭家庙、曹门湾等地曾国墓葬续有出土，如2001年襄阳王坡春秋墓地出土的邓公孙无忌鼎（M1：1）[2]、1966年京山苏家垄出土的曾侯仲子游父鼎[3]、1972年枣阳段营出土的曾子仲諆鼎[4]、2002年枣阳郭家庙出土的曾亘嫚鼎（M17：1、2）[5]、2014年枣阳曹门湾出土的曾子泽鼎（M10：1）[6]及2015年曹门湾出土的曾子⿱宀象鼎（M43：8）[7]等，不赘举。其时代为春秋早期前段。





图一　吴叔襄鼎及铭文

鼎内壁铸铭文作：

唯吴叔襄自作宝盂，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

铭文虽较简单，却值得细加玩味。其铭文格式及辞例与金文中下揭诸例接近：

（1）曾侯簠（叔姬霝簠）[8]：叔姬霝迮黄邦，曾侯作叔姬、江嬭媵器𬭚彝，其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春秋早期。

（2）曾子仲謱鼎[9]、甗[10]：唯曾子仲謱用其吉金，自作𬭚彝/旅甗，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春秋早期。

（3）黾壶盖[11]：口口口口弟口口口〔老〕奠口口口黾以口口〔用〕其吉〔金，自作〕宝壶，用锡眉寿，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春秋早期。

（4）旂仲𩰫履盘[12]旂仲𩰫履用其吉金，自作宝盘，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春秋早期。

（5）养伯受簠[13]：养伯受用其吉金，作其元妹叔嬴为心媵饙簠，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春秋中期。

（6）嘉仲盉[14]：嘉仲者比用其吉金，自作盉，子子孙孙其永用之。春秋晚期。

上揭诸例，有两个共同特征：一是其时代多在春秋早期，二是其地域皆在汉淮流域一带即周代的南土地区，其中以曾国器物最多（例1～4），且在同时期其他地区则不见这种特征。

结合上述此鼎同湖北境内的随枣走廊一带尤其是近年枣阳郭家庙、曹门湾等曾国墓地出土的鼎形制、纹饰近同的情况来看，大致可以确定，该鼎当与南土地区或者更明确地说即曾国可能有较密切的关系。

鼎铭曰“唯吴叔襄自作宝盂”，此“吴”当非南方的吴越之“吴”，就铜器铭文所见，南方吴越之“吴”一般多作“攻吴”或“句吴”，如攻吴大叔盘[15]“攻吴大叔𡛉女”及宋公䜌簠[16]“句吴夫人季子”等，不赘举。器物的形制纹饰也与南方吴越地区所出同时期器物不似[17]，这也更加确定此“吴”当非彼“吴”。《续编》认为该鼎系春秋早期吴国公室之物[18]，不确。

综合以上分析可知，鼎铭的“吴”当读作“虞”，所谓“吴叔襄”，应即“虞叔襄”，该鼎应系虞国之器。

《说文》：“虞……从虍吴声。”“吴”和“虞”在金文中有很多相通之例，金文中掌山泽苑囿之官的“虞人”之“虞”就常写作“吴”，如同簋[19]“王命同佐佑虞大父司场、林、虞、牧”、免簠[20]“命免作司徒，司郑还林、罘虞、罘牧”、卌三年逨鼎[21]、逨盘[22]“命汝胥荣兑总司四方虞、林”及逨钟[23]“命总司四方虞林”等，“虞”皆写作“吴”。战国楚简如郭店简《唐虞之道》篇的“虞”亦写作“吴”[24]。传世文献中也有很多“吴”和“虞”相通之例，如《诗·周颂·丝衣》“不吴不敖”，《释文》“吴”作“虞”，云“《说文》作吴”。《国语·齐语》“西服流沙西吴”，《管子·小匡》“西吴”作“西虞”。《论语·微子》之“虞仲”，《吴越春秋·太伯传》作“吴仲”。《史记·周本纪》之“虞仲”，《汉书·地理志》亦作“吴仲”。《史记·封禅书》“不吴不惊”，《孝武本纪》“吴”作“虞”，《索隐》：“此虞当为吴。此作虞者，与吴声相近，故假借也。”总之，从文字学的角度来

看，将鼎铭的“吴”当读作“虞”，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上述这种形制和纹饰的鼎，在春秋早期南土地区尤其是曾国墓葬出土较多。类似形制和纹饰的鼎，在中原地区也有一些，如陕西韩城梁带村春秋墓出土的（M18：19）虢季鼎[25]、河南登封告成镇春秋墓出土的郑噩叔子宝登鼎（M3：6）[26]、子耳鼎（M3：181）[27]及传世的戴叔朕鼎[28]等。尤其是虢、郑，与虞同为姬姓，又互相邻近。因此，从文化因素角度来看，将鼎铭的“吴”当读作“虞”，也有一定依据。

综上，结合器物形态、文化因素及铭文等方面的信息来看，将吴叔襄鼎判定为春秋早期虞国之器，当可确定无疑。

虞本夏商古国，舜之先封于虞，故城在今山西省平陆县东北。周武王克殷，封古公亶父之子虞仲后人于此，是为姬姓虞国，包括今山西南部夏县和平陆县东北一带，公元前655年为所晋灭。其事见于《左传》《史记·吴太伯世家》及《晋世家》等。

1979年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出土一件吴叔戈（M1284：14）[29]，其铭文作：

吴叔徒戈。

该戈三角锋，援面较平，中胡二穿，阑上端的援侧有一个小方穿，长方内，下角有缺，中部有一长方横穿。与河南三门峡上村岭虢国墓地出土的虢太子元戈（M1052：53、54）[30]、元戈（M1721：17）[31]及戈戈（M1747：10）[32]等形制接近，其时代为春秋早期前段。

戈铭曰“吴叔徒戈”，亦与上揭虢太子元戈作“虢太子元徒戈”格式及辞例均近似。结合其出土地点来看，该戈的“吴叔”之“吴”或亦应读作“虞”，“吴叔”即“虞叔”。从时代及称谓等方面来看，戈铭的“吴叔”，与吴叔襄鼎的“吴叔襄”或即一人，待考。

2015年湖北枣阳曹门湾墓地出土有一件矢叔匜（M43：2）[33]，匜为瓢形腹，长流槽上扬，卷尾龙形鋬，龙口衔沿，下有四夔龙形扁足。流口下饰一对分尾龙纹，器口下饰窃曲纹，腹饰瓦纹（图二）。与河南罗山高店出土的奚寬车匜[34]、确山竹沟镇出土的器歌夷匜[35]及永城轮窑厂出土的郑伯匜[36]等形制、纹饰近同，时代为春秋早期前段。

匜铭作：

唯九月初吉壬午，矢叔⿱将羊父滕孟姬元女匜盘，其永寿用之。

矢叔之⿱将羊，我在此前所作小文中指出，该字从将从羊，应隶定作“⿱将羊”，应系阳部字，具体为何字待考[37]。据铭文看，矢系姬姓，发掘简报已有说[38]，可从。本铭的“矢”，据有关金文材料来看，应系“吴”即“虞”之省。《说文》：“吴，……从矢口。”从文字学的角度来看，“吴”与“矢”相通，当无问题，有关情况我曾有小文作详细论证[39]，不赘述。因此，所谓“矢叔”，实应系“吴叔”，即“虞叔”，与吴叔襄鼎的“吴叔”系同一族属。

“矢叔⿱将羊父”之“⿱将羊”从将从羊，按照古文字构形的一般规律来讲，此字应从





图二　矢叔牂父匜及铭文

“将”声，或“羊”亦声，系双声字。“将”为精母阳部字，“羊”为喻母阳部字，“襄”为心母阳部字，三者韵部相同，精母与心母同属齿头音，喻母与心母为舌齿邻纽。总之，从“将”得声或兼从“羊”声的“牂”字与“襄”古音极近，从音理讲，可以通假。结合器物的时代及铭文的称谓、国属等因素来看，匜铭的“矢叔牂父”，应即鼎铭的“吴叔襄”，二者实系一人。“矢叔牂父”系在字后加“父”字表美称，而“吴叔襄”则不加“父”，类似者如郑庆簠[40]、郑庆壶[41]等的“郑庆”，郑庆父簋[42]、郑庆父壶[43]则作“郑庆父”。“襄”和“牂父”也可能系一名一字的关系。鼎、匜当系同人所作。

匜铭曰“矢叔牂父媵孟姬元女匜盘”，可见“孟姬”系矢叔牂父之女，此匜系其为女孟姬出嫁曾国所作。古人虽有所谓“同姓不婚”的原则，但据铜器铭文来看，春秋晚期，因楚、蔡关系恶化，蔡与同姓吴国以婚姻为纽带结盟，以联合抗楚[44]。最近公布的一批春秋初年的贾国铜器，如贾伯簋[45]、贾伯壶[46]“贾伯作邯孟姬尊簋/尊壶”，贾叔鼎[47]、贾叔簋[48]“贾叔作晋姬尊鼎/尊簋”，贾子伯⿰台犬父壶[49]、贾子伯⿰台犬父盘[50]“贾子伯⿰台犬父作孟姬尊壶/宝盘”，铭文明确表明此时同为姬姓的晋、贾二国之间有联姻。《左传》庄公二十八年“晋献公娶于贾”，亦可进一步印证晋、贾二国的联姻绝非偶然，而系常态[51]。所以发掘简报推测曹门湾M43的墓主或即矢叔匜铭所云之“孟姬”，同出的曾子⿱宀象鼎[52]的“曾子⿱宀象”或与其有关，与之相邻的M45与其系夫妻异穴合

葬墓等意见不无道理，我在上述小文中，据“同姓不婚”的原则所提出的矢叔𡐨父之女孟姬之器出于曾国墓，未必一定是婚姻关系，而可能系别的原因所致，M43的墓主也未必就是“孟姬”等怀疑是不恰当的。现在看来，“孟姬”系M43的墓主，殆无疑问。

上述吴叔襄鼎无论从器形、纹饰还是铭文来看，皆同湖北境内随枣走廊一带尤其是近年枣阳郭家庙、曹门湾等曾国墓地出土的鼎近同，该鼎可能与曾国有较为密切的关系。据发掘者云，曹门湾墓地部分曾遭盗掘，如上述与M43相邻、可能与其系夫妻异穴合葬墓的M45就被盗扰，随葬的青铜礼器被盗掘。结合上述有关分析来看，吴叔襄鼎或即出自随枣走廊一带，不排除即盗自曹门湾墓地。该鼎锈色与近年随枣走廊一带出土曾国铜器多有雷同，或亦可佐证此推断。由于该鼎系盗掘而流散，以上所说当然只不过是没有多大根据的推测，需作进一步证实，但从上文分析所得的各种证据链来看，这种推测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若果如本文所推测的那样，吴叔襄鼎出自曹门湾曾国墓地，则其出于曾国墓葬的原因，当与匜铭所反映的曾、虞之间的联姻有关。上述无论从器形、纹饰还是铭文来看，吴叔襄鼎皆同曾国或南土地区同类器物及铭文接近，而与同时期中原地区的同类器物却相似性较少，同样的情况在矢叔匜及铭文上也有反映。器形、纹饰方面上文已有分析，铭文方面，如铭末“其永寿用之”的套语，常见于春秋早期汉淮流域的铜器铭文中，如陈侯鼎[53]、陈侯簠[54]、陈侯盘[55]、陈侯簠[56]、陈侯匜[57]、𨞫公孙䛒父鈚[58]、陈伯元匜[59]、陈子匜[60]、子諆盆[61]、复公子伯舍簋[62]、原氏仲簠[63]及叔液鼎[64]等。泗水流域及邻近地区的鲁、曹、宋及徐等国也有少量例子，部分器物时代也略晚至春秋中晚期，如鲁正叔盘[65]、曹公簠[66]、曹公盘[67]、□亥鼎[68]及宜桐盂[69]等。中原地区除楷侯微逆簠[70]外，目前未见它例。可见从辞例角度来看，矢叔匜铭亦与南土地区同时期器铭有一定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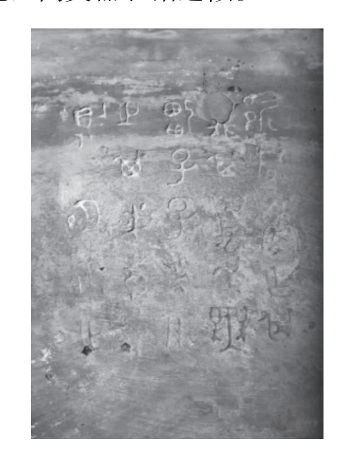
因此，无论是吴叔襄鼎，还是矢叔匜，虽系中原地区的姬姓虞国之器，其实皆具有明显的汉淮流域即南土一带的作风。这种情形在此前郭家庙出土的卫伯须鼎及曹门湾出土的𨛜君虖鼎等器形态和铭文上同样皆有不同程度地体现。

2002年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出土一件卫伯须鼎（GM01：01）[71]，敛口平折沿，浅腹圜底，双立耳，三蹄足。耳饰重环纹，颈饰变形兽体纹（无目窃曲纹），腹饰卷体夔龙纹（图三）。与湖北襄阳出土的曾仲子敔鼎[72]及随县尚店（今属随州市曾都区）出土的䣙公汤鼎[73]等形制、纹饰均近同。鼎铭作“卫伯须用吉金作宝鼎，子孙用之”，这种“（唯）XXX用（其）吉金，（自/用）作XX”类较为固定的辞例格式，以及铭末“子孙用之”类较为减省的套语，亦皆系春秋早期南土地区普遍流行的辞例格式[74]。同上述吴叔襄鼎一样，卫伯须鼎亦与中原地区同时期同类器物如虢文公子鈠鼎[75]、芮公鼎[76]及芮太子鼎[77]等形制、纹饰也比较接近。相对而言，从器形的角度来看，似乎中原的风格要比南土的要略浓厚。




图三　卫伯须鼎及铭文

2014年枣阳曹门湾墓地出土一件郈君𪊨鼎（M22：6）[78]，敞口、弧腹圜底，长方形附耳，三蹄足粗壮，内面呈弧形内凹，腹部饰一道凸弦纹，其上饰一周窃曲纹，其下饰两周垂鳞纹，耳饰重环纹（图四）。类似的鼎过去在这一地区多有出土，如前揭襄阳王城M1出土的邓公孙无忌鼎，即与之近同。上揭京山苏家龙出土的曾侯仲子斿父鼎、枣阳段营出土的曾子仲譩鼎等，形制亦与之近同。2002年及此前枣阳郭家庙也出土过一些类似的鼎，如窃曲纹鼎（M1：05、M2：1、M6：1）、曾亘嫚鼎（M17：1、2）[79]等。鼎铭作“郈君𪊨作其鼎，其万年无疆，子孙永用之，其或唯丧，则盟殛之”，其中部分文句如“XX作其XX，其万年无疆，子孙永用之”，亦系上述春秋早期南土地区常见的辞例格式。同上述吴叔襄鼎及卫伯须鼎一样，无论是器物形态还是铭文，风格均与南土地区同类器、铭近似。




图四　郈君𪊨鼎及铭文

与虞国一样，卫国亦系姬姓，地在中原。郳君虘鼎的“郳”应即《诗·邶风·泉水》“出宿于泲，饮饯于祢”的“祢”，或作“坭”“泥”，即《式微》之“泥中”，在今河南浚县一带[80]，亦属中原地区。

此前我曾指出，卫伯须鼎出自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其形制、纹饰与该墓地所出曾器多有类似，不排除其受曾文化的影响[81]。现在综合这些器、铭的材料来看，这种可能性当可进一步肯定。

卫伯须鼎及郳君虘鼎等器出自曾国墓地，其具体原因过去我们不曾确知，今佐以夨叔匜及吴叔襄鼎等器来看，与夨叔匜所反映的曾人与中原地区的虞国联姻关系类似，卫伯须鼎及郳君虘鼎等出自曾国墓地，亦系曾人与地处中原的卫、郳等国族以联姻或其他形式密切交往的产物，是这段久已湮没的历史的忠实见证和原始记录。

据以上分析来看，文献所谓“同姓不婚”的原则，应灵活看待。以往文献和出土古文字资料中虽有一些同姓联姻的例子，但总体上讲，“同姓不婚”的原则是共识，是否属特例，则需在搜集一些尽可能完整的信息后加以全面的分析和判断。在运用文献分析有关考古材料时，需将出土实物资料对文献加以检验和印证，结合具体情况作辩证地分析和全面的把握，而不能一味地死看所谓的原则和文献的记载。把这些零散的材料缀连起来，形成链条，互相发明，能够更加的清楚认识一些原来不能准确理解的考古资料，准确把握其所反映的有关史实。

综上，本文通过对新近著录的一件私人收藏的吴叔襄鼎形态、文化因素及铭文等多方面的分析，认为鼎铭的“吴叔襄”之“吴”当读作“虞”，该鼎应系春秋早期姬姓虞国之器。山西侯马上马墓地出土的吴叔戈的“吴叔”，与吴叔襄鼎的“吴叔襄”或即一人。湖北枣阳曹门湾墓地出土的夨叔匜的“夨叔䢅父”，应即鼎铭的“吴叔襄”，二者实系一人。匜系其为女“孟姬”出嫁曾国所作媵器，“孟姬”应系曹门湾M43的墓主。从器物形态、文化因素、铭文及锈色等方面来看，吴叔襄鼎或即出自随枣走廊一带，不排除即盗自曹门湾墓地。同此前出自枣阳曾国墓地的卫伯须鼎及郳君虘鼎等中原地区国族诸器一样，其器、铭皆与同时期南土地区器、铭多有类似，当系受南土地区文化影响所致，是中原文化和南土文化交融的产物。夨叔匜、卫伯须鼎及郳君虘鼎等出自曾国墓地，以实物和文字的证据，揭示了久已湮没的春秋时期南土的曾国与中原地区的虞、卫及郳等国族以联姻等形式密切交往的史实，丰富和更新了我们的相关认识，同时对如何全面准确地把握有关文献记载，正确认识和理解相关考古材料，也有一定启发。

注　释

［1］ 吴镇烽编著．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1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83，第0171号．

［2］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樊市考古队，襄阳区文物管理处．襄阳王坡东周秦汉［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彩版四，1，图版八，1，3．

［3］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曾国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7：15．

［4］ 同［3］：52

［5］ 同［3］：93～97．

［6］ 长江文明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博物馆．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40，141．

［7］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枣阳市博物馆考古队．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5）M43发掘简报［J］．江汉考古，2016（5）：40，图版二．

［8］ a.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M］．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

b.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周金文集成(修订增补本)［M］．北京：中华书局，2007：第4598号．

［9］ 同［8］b：第2620号．

［10］ 同［8］b：第943号．

［11］ 同［8］b：第9677号．该器年代、国属的重新确定及铭文改释，详参拙文：黾壶盖的年代与国别.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待刊.

［12］ 同［8］b：第10134号．

［13］ 同［8］b：第4599号．

［14］ 同［8］b：第9446号．

［15］ 南京市博物馆，六合县文教局．江苏六合程桥东周三号墓［J］．东南文化，1991（1）：207，图四，1．

［16］ 同［8］b：第4589号，第4590号．

［17］ a.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11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第151号．

b. 杨正宏，肖梦龙主编．镇江出土吴国青铜器［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

［18］ 同［1］：14．

［19］ 同［8］b：第4270号、第4271号．

［20］ 同［8］b：第4626号．

［21］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宝鸡市考古研究所，眉县文化馆．吉金铸华章——宝鸡眉县杨家村单氏青铜器窖藏［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48～127．

［22］ 同［21］：184～191.

［23］ 同［21］：285，291，295.

［24］ 荆门市博物馆．郭店楚墓竹简［M］．北京：文物出版社，1998：79，84，39～41，157～160.

［25］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渭南市文物保护考古研究所，韩城市文物旅游局．梁带村芮国墓地：二〇〇七年度发掘报告［M］．北京：文物出版社，2010：彩版一七六.

［26］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登封市文物局．河南登封告成东周墓地三号墓［J］．文物，2006（4）：7，图四，2.

［27］ a. 同［26］：7，图四，1.

b. 张莉. 登封告成春秋郑国贵族墓研究［J］. 中国历史文物,2007(5)：75，图三.

c. 吴镇烽编着．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4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480，第02253号.

［28］ 吴镇烽编着．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5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54，55，第02305号，第02306号.

［29］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上马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81，图六六，2，图版26，1.

［30］ a.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上村岭虢国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59：28，图二三，图版三五，2，3.

b. 同［8］b：第11116号，第11117号.

［31］ a. 同［30］a：35，图三一.

b. 同［8］b：第10809号.

［32］ a. 同［30］a：41，图三八，图版二〇，2.

b. 同［8］b：第10734号.

［33］ 同［7］：47，图版一九，48，图版二二，拓片四.

［34］ 信阳地区文管会，罗山县文化馆．罗山县高店公社又发现一批春秋时期青铜器［J］. 中原文物，1981（4）：图版六，2.

［35］ 夏麦陵嚣．伯匜断代与隞之地望［J］．考古，1993（1）：74，图二.

［36］ 李俊山．永城出土西周宋国铜匜［J］．中原文物，1990（1）：104，图一.

［37］ 枣阳曹门湾M43出土铜器铭文及相关问题．未刊稿.

［38］ 同［7］：36～49.

［39］ 试说青铜器铭文中的吴、夨、虞．未刊稿.

［40］ 枣庄市政协台港澳侨民族宗教委员会，枣庄市博物馆编着．小邾国遗珍［M］．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6：114～116.

［41］ 同［40］：117，118.

［42］　同［1］：13～16，第0388号，第0389号.

［43］　同［1］：122，第0837号.

［44］　详参拙作．楚系铜器铭文研究［D］. 合肥：安徽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207～213.

［45］　吴镇烽编着.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1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73～78，第05130号，第05131号，第05132号.

［46］　吴镇烽编着.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2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44～347，第12417号，第12418号.

［47］　吴镇烽编着. 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1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237～238，第0203号.

［48］　吴镇烽编着．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2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92，93，第0432号.

［49］　吴镇烽编着．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续编（第3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123，124，第0838号.

［50］　同［49］：300，第0947号.

［51］　读近刊贾国铜器．未刊稿.

［52］　同［7］：40，图版二，图五，拓片一.

［53］　同［8］b：第2650号.

［54］　同［8］b：第4603号，第4604号.

［55］　同［8］b：第0157号.

［56］　同［8］b：第4606号，第4607号.

［57］　吴镇烽编着：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像集成（第26卷）［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375，第14991号.

［58］　同［8］b：第9979号.

［59］　同［8］b：第10267号.

［60］　同［8］b：第10279号.

［61］　同［8］b：第10335号.

［62］　同［8］b：第4011～4013号.

［63］　秦永军，韩维龙、杨凤祥．河南商水县出土周代青铜器［J］．考古，1989（4）：311，图二，2～4.

［64］　同［8］b：第2669号.

［65］　同［8］b：第10124号.

［66］　同［8］b：第4593号.

［67］　同［8］b：第10144号.

［68］　同［8］b：第2588号.

［69］　同［8］b：第10320号.

［70］　同［8］b：第4521号.

［71］　a. 襄樊市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队.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188，189，187，图一四八，彩版七，1，图版四，3.

b. 同［3］：131～133.

［72］　同［3］：426.

［73］　随州市博物馆. 随州出土文物精粹［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71.

［74］　有关辞例的时代和地域性特征讨论可参看拙文：

a. 伯家父部簋国别析论——兼谈曾子仲宣丧鼎与番君赢匜. 纪念于省吾先生诞辰120周年姚孝遂先生诞辰90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待刊.

b. 黾壶盖的年代与国别. 湖南省博物馆馆刊（第十三辑），待刊.

c. 伯多父壶的年代与国别，未刊稿。

［75］　a. 故宫博物院. 故宫青铜器［M］. 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9：198.

b. 中国青铜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美术分类全集中国青铜器全集（第6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7：第140号.

［76］　同［27］c：36~38，第01879号，第01880号，第01881号.

［77］　林巳奈夫. 殷周时代青铜器の研究：殷周青铜器综览一・图版［M］. 东京：吉川弘文馆，1984：32，鼎351.

［78］　a. 长江文明馆，湖北省博物馆，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襄阳博物馆. 穆穆曾侯——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5：136～139.

b.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襄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枣阳市博物馆考古队. 湖北枣阳郭家庙墓地曹门湾墓区(2014)M10、M13、M22发掘简报［J］. 江汉考古，2016（5）：17，18，图版三，图版六，拓片一.

［79］　a. 襄樊市考古队，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湖北孝襄高速公路考古队. 枣阳郭家庙曾国墓地［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5：彩版七，2，彩版八，图版五～八.

b. 同［3］：80，81，87～89，93～97，136，137.

c. 同［78］a：40～43，74～77.

［80］　枣阳曹门湾M22出土郘君𩰫鼎及相关问题. 江汉考古. 待刊.

［81］　同［74］a.

From “shuxiang Wu” Ding Talk About Ce, Wei, Ni That Were Found in Country Zeng of Zao Yang

Huang Jinqian

Abstract: Through analyzing the artifact form, cultural factors and inscriptions, this paper thinks the “Shuxiang Wu” should be changed to“Shuxiang Yu”. This Ding belongs to the Country State of Yu, whose ruler is surnamed Ji, during the early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he owner of the “Shu Wu” dagger-axe, which was found in Shangma cemetery, should be same the owner of “Shuxiang Wu” Ding. The inscription of “Shu Ce” Spoon (*Yi*), which was found in the Caomenwan cemetery, should refer to “shuxiang Wu”. This spoon (*yi)* is part of the dowry from “Meng Ji”, who is the daughter of “Shuxiang Wu”, when she marriaged out into the State of Zeng. “Meng Ji” is buried in M43 in the Caomenwan cemetery. The “Shuxiang Wu” Ding was found in the area of the Suizao corridor. This does not rule out the possibility that it was stolen from the from Caomenwan cemetery. Artifacts from Central China, such as “Han boxu” Ding that was found in the State of Zeng attributed to Zao Yang; are similar to southern area in the respect of form and inscription. This is as a result of southern area influence and the cultural integration between Central China and southern area. These artifacts found in the State of Zeng offer the tangible and written evidence; and disclose the close communication history between southern State of Zeng and Central China, including the State of Yu and the State of Han. during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As the same time, they give us some inspiration about how to use documentary records and understand the relevant archaeology materials.

Key word: “Shuxiang Wu” Ding; State of Yu; State of Zeng; dowry; cultural integration

山西曲村秦汉墓地分析

刘汉兴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20世纪80年代，北京大学考古学系对山西省曲沃县境内的天马—曲村遗址进行了6次考古发掘，其中曲村的秦汉墓地是整个天马—曲村遗址的组成部分[1]。报告中特别指出秦墓包括了战国晚期秦人占据这一地区及以后的部分墓葬。报告把墓地分为三大区域，他们分别位于Ⅰ区（墓地中心区域）的东部（80J4、82J4、84J4）、Ⅱ区（西部）（86J3和J4、88J3、89J3）和Ⅲ区（北部偏东）（82K4、84K4)。本文在《天马—曲村》发掘报告分期的基础上，对墓地的空间布局、墓葬的方向[2]、人群结构及来源三个方面出发，探讨墓群、墓区之间所反映出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及丧葬习俗，不妥之处，敬请方家指正。

一、墓葬概况与墓地的空间布局

从地理位置看曲村秦汉墓地，其北部是塔尔山，南部是紫金山，中间是侯马盆地，位于“两山夹一盆”之间，水深土厚，地势东北高西南低，自西周以来就是埋葬的理想场地。秦汉墓葬大部分位于东西断崖土坎之上，少部分位于断崖土坎以下区域。断崖土坎以下的秦汉墓葬由于后人不断取土导致墓葬仅存底部。可知秦汉时期先民在此筑墓，是经过精心选址和安排的。在选择墓地时要择“高敞”之地。如《汉书・韩信传》载，韩信葬母“乃行营高燥地，令傍可置万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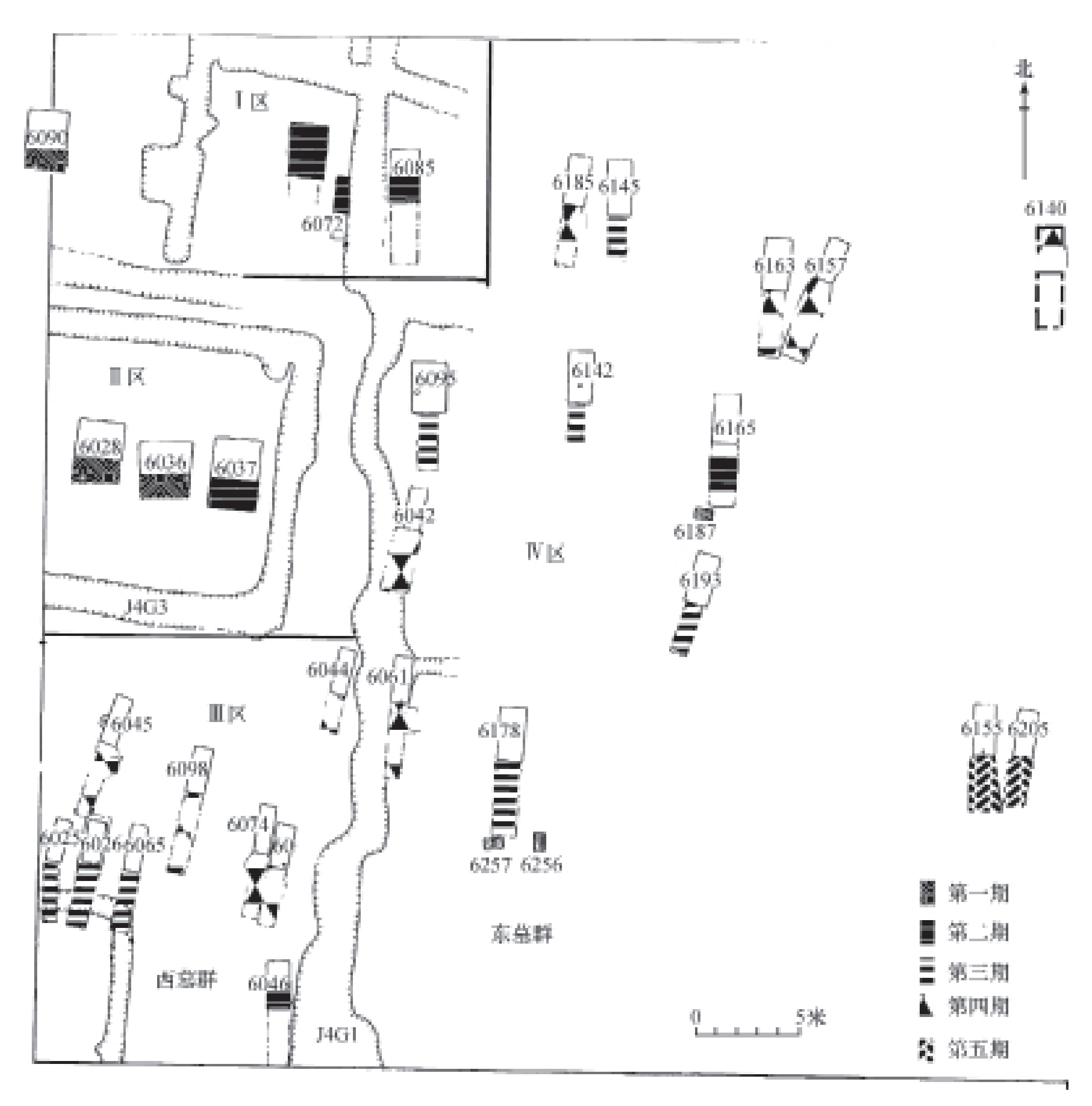
报告中除提及墓葬（包括墓标、石堆）之外还提到道路、壕沟，二者的时代大都为秦汉时期，有的甚至早于秦代，所以我们说秦汉时期的先民在对整个墓地作规划的同时也对墓地相应的道路、排水设施也作了规划，特别是壕沟不仅起到了排水的功能，间接也起到了分割墓区的作用。

对墓葬布局的空间划分应该根据其集结状况和相互间的距离远近而定，而不能以葬俗特征作为划分原则；葬俗特征是划分区、组以后要进一步考察的东西[3]，同时对墓地空间布局的观察必须在分期的基础之上进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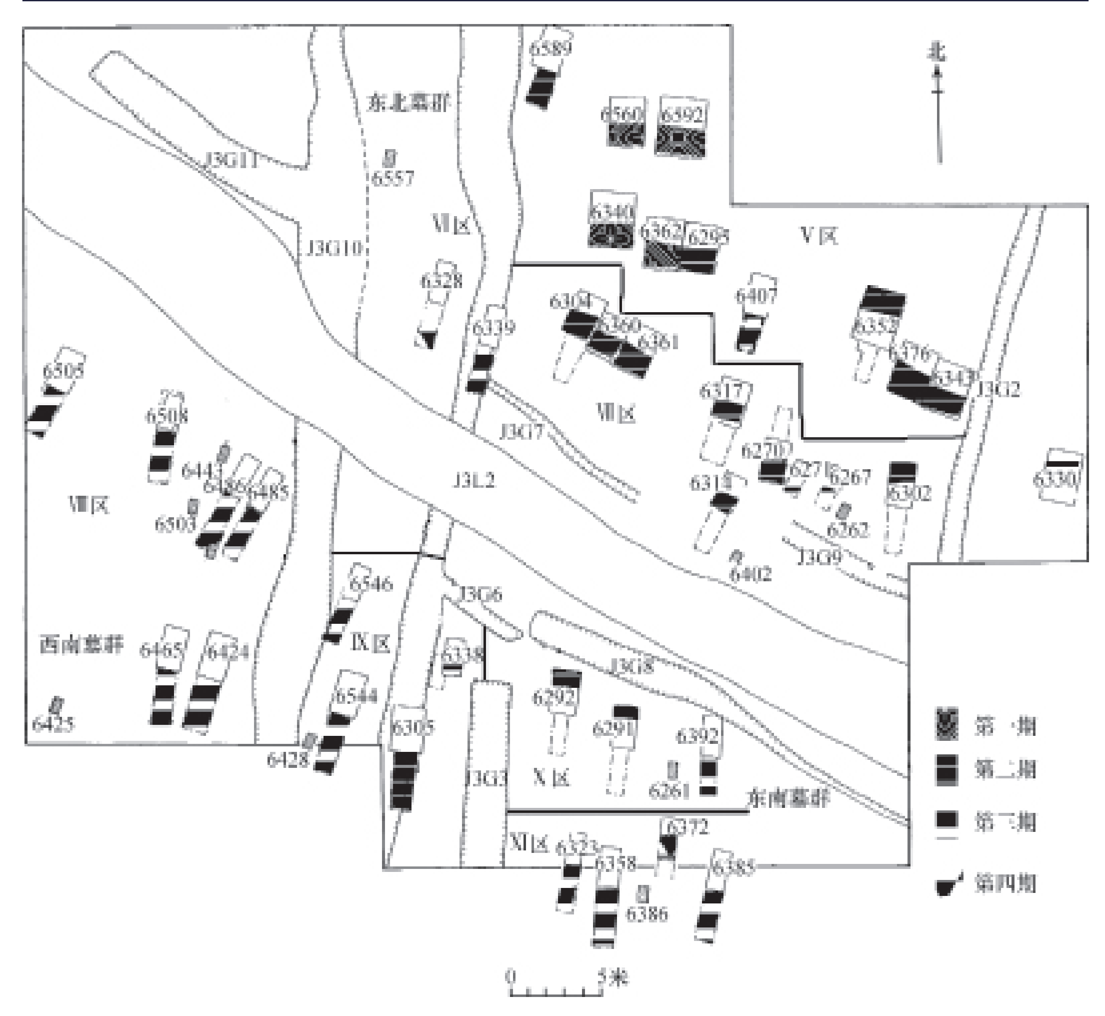
报告把96座[4]秦汉墓葬分为六期[5]，其中14座瓦棺墓（时代跨度较大），3座砖

室墓（东汉晚期），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之内。本文只对剩余的79座秦汉墓进行分析、探讨。

本文依据墓地内的墓葬空间分布的位置关系及道路、壕沟的分布，把整个墓地（Ⅰ～Ⅲ区）划分为如下六个墓群：在Ⅰ区内有南北向的壕沟（J4G1）贯穿整个发掘区，把发掘区分成东、西墓群（图一）；在Ⅱ区内有西北—东南走向的道路（J3L2）和南北向的两条壕沟（J3G4、J3G10）,贯穿整个发掘区，这样就把J3区分成了东北、西南、东南三个墓群（图二），以及Ⅲ区的西墓群（图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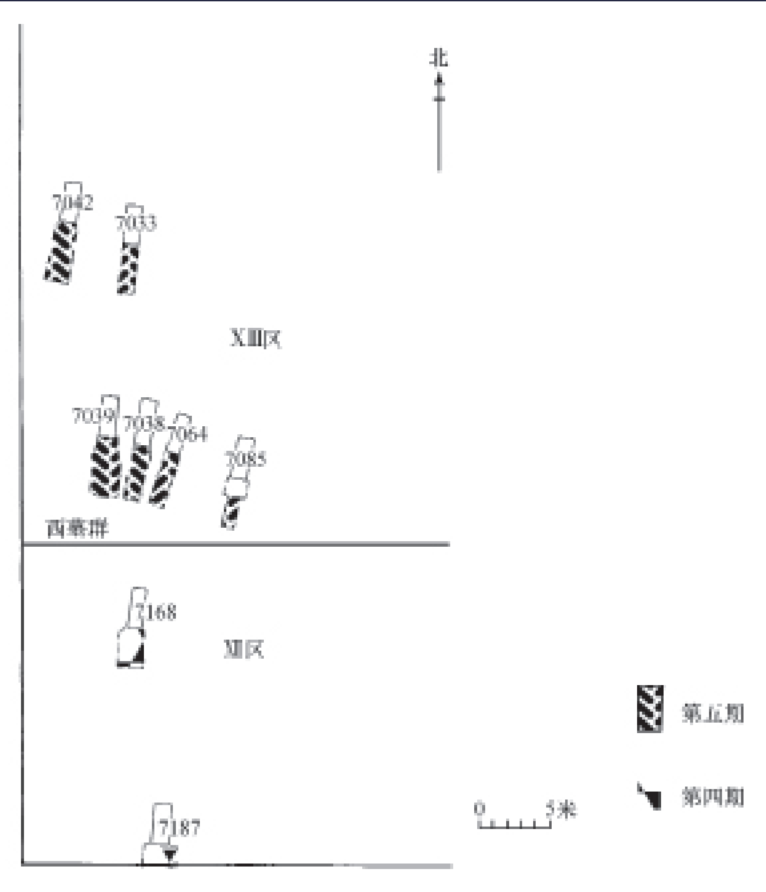
图一　Ⅰ区墓葬分群、分区、分期图



图二　Ⅱ区墓葬分群、分区、分期图

除了对墓群的划分，还应该注意到墓群内墓葬“扎堆”的分布。我们称墓群以下的这种空间划分单位为“区”，用罗马数字依次编号，共分13个墓区[6]，具体墓区如下：

Ⅰ区4座墓葬，M6090、M6048、M6072、M6085；Ⅱ区3座墓葬，M6028、M6036、M6037；Ⅲ区9座墓葬，M6046、M6025、M6026、M6065、M6045、M6098、M6074、M6057、M6044；Ⅳ区14座墓葬，M6178、M6061、M6155、M6205、M6042、M6193、M6095、M6142、M6165、M6185、M6145、M6163、M6157、M6140；Ⅴ区10座墓葬，M6589、M6560、M6592、M6340、M6362、M6295、M6407、M6352、M6376、M6343；Ⅵ区2座墓葬，M6328、M6339；Ⅶ区9座墓葬，M6304、M6360、M6361、M6317、M6314、M6279、M6271、M6267、M6302；Ⅷ区6座墓葬，M6465、M6424、M6505、M6508、M6486、M6485；Ⅸ区4座墓葬，M6546、



图三　Ⅲ区墓葬分群、分区、分期图

M6544、M6305、M6338；Ⅹ区3座墓葬，M6292、M6291、M6392；Ⅺ区4座墓葬，M6323、M6358、M6272、M6385；Ⅻ区2座墓葬，M7168、M7187；Ⅻ区6座墓葬，M7042、M7033、M7039、M7038、M7064、M7085。

在分期的基础上，墓群、墓区的安排是有规律的。

（1）在Ⅰ区，墓群的安排是自西向东的趋势，西墓群的时代总体上要早于东墓群的时代。西墓群的Ⅰ、Ⅱ墓区为一、二期，Ⅲ墓区为三、四期，东墓群的Ⅳ墓区为以三、四期为主，五期次之。

西墓群墓区的安排是自南向北。Ⅱ墓区时代（以一期为主，二期次之）在总体上早于Ⅰ墓区（以二期为主，一期次之）。Ⅲ墓区内的南部（M6046）时代最早（二期），中部三座墓葬（M6025、M6026、M6065）次之（三期），北部的五座墓葬（M6045、M6098、M6074、M6057、M6044）时代最晚（四期）。东墓群墓区内安排是以中间为圆心向南北向扩散。Ⅳ内中部三座墓葬（M6095、M6142、M6165）为二、三期，北部五座墓葬以四期为主，三期次之，南部六座墓葬以三、四、五期为主（图一）。

（2）在Ⅱ区，墓群的安排是自北向南、自东向西。东北墓群整体时代早于东南墓群，东南墓群整体时代早于西南墓群，故东北墓群时代最早、东南墓群次之、西南墓群最晚。东北墓群Ⅴ、Ⅵ、Ⅶ墓区以一、二期为主，三、四期为次之（三期墓葬1座，四期墓葬1座）。东南墓群Ⅸ、Ⅹ、Ⅺ墓区以三期为主，二、四期次之（二期墓葬3座，四期墓葬1座）。西南墓群Ⅷ墓区均为三期。

东北墓群内墓区的安排是自北向南、自东向西。Ⅴ墓区时代（以一、二期为主，三期墓葬1座）早于Ⅶ墓区（以二期为主，三期次之），Ⅶ墓区时代早于Ⅵ墓区（以三、四期为主）。东南墓群内墓区的安排是自北向南。Ⅹ墓区时代（以二期为主，三期次之）要早于Ⅺ墓区（以三期为主，四期次之）。西南墓群内墓区的安排是自东向西。Ⅸ墓区时代（三期为主，二期次之）要早于Ⅷ墓区（均为三期）（图二）。

在Ⅲ区，墓群内墓区的安排是自南向北。Ⅻ墓区的时代（均为四期）早于Ⅻ墓区（均为五期）（图三）。

从各自的区域看，各域区内墓群、墓区存在各自的总体特征并不明显。这是因为这三个区域是各自被间隔开且各区域结合部的墓葬由于各种原因无法发掘，导致各区域在总体上的规律性不强。报告中载Ⅲ区Ⅰ、Ⅱ区距离较远，区域内情况不明。Ⅰ区墓地的东界在其东部（即Ⅳ墓区的东部边缘），Ⅱ区墓地的西界在其西部，准确地说在西北部（即ⅤⅥ墓区的西部边缘）。在Ⅰ、Ⅱ区之间仅有十几米宽的间隔地带，在这个地带墓葬的分布情况与东西两边墓群类似且为墓葬密集区[7]。

我们不妨把Ⅰ、Ⅱ区联系来看，就会发现在Ⅰ、Ⅱ、Ⅲ、Ⅴ、Ⅵ、Ⅶ、Ⅸ、Ⅹ、Ⅺ墓区是墓葬密集区，墓葬的空间布局在总体上自北向南逐次安排，当墓葬达到一定密度时，向东北、西南方向扩展。报告中指出在墓群中往往可见到墓葬两两一组或三、四座多者六座墓并列一行顺排，分布整齐有序，彼此间按照墓葬南北向，东西一行顺排的现象，其墓葬形制、丧葬习俗基本一致，每组墓葬时代相近或一致。特别是有些晚期墓葬埋葬在早期墓葬旁边，如Ⅱ区M6037（二期）埋葬在M6028、M6036（一期）旁边，墓葬形制、葬俗一致。Ⅴ墓区M6407（三期），埋葬在一期墓葬与二期墓葬之间且东西一行顺排，Ⅶ区的M6271 M6267（三期），埋葬在二期墓葬之间。Ⅹ区的M6392（三期），埋葬在二期墓葬旁边，XI区的M6272（四期）埋葬在三期墓葬之间。这些晚期墓葬把墓位安排在早期墓葬旁，说明晚期墓葬与早期墓葬之间有着某种血缘或婚姻关系。在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社会组织中其成员死后的埋葬方式直接与家庭、家族或宗族相联系人们常常葬于同一茔地甚至同一墓葬。我们把这种晚期墓葬埋葬在早期墓葬旁或同时期墓葬排列有序、葬俗较一致的墓葬称之为祔葬墓。

祔葬即合葬，发源于西周，盛行于两汉。《礼记·檀弓上》："季武子曰：'周公盖祔'。"郑玄注："祔谓合葬，合葬自周公以来。"孔颖达疏："周公以来，盖始祔葬，祔即合也，言将后葬合前葬。"《汉书·哀帝纪》："建平二年，昔季武子成

寝，杜氏之殡在夕阶下，请合葬而许之，祔葬之礼，自周兴焉。”依据杨树达先生的说法：“祔葬，子孙从其父祖葬，所谓归旧莹，是也。”[8]

当这个墓地范围逐渐扩大的时候，祔葬墓逐渐成为该墓地空间分布的一种常态，如Ⅲ区南部三座墓葬（M6025、M6026、M6065），墓葬南北向、东西并列一行，墓葬形制、葬俗、时代一致，北部四座墓葬（M6045、M6098、M6074、M6057）也是如此，这就组成了一个形态较为紧密的家族墓地，囿于没有文字记载我们无法给出准确的位置关系。

二、墓葬的方向

墓葬方向是墓葬的重要文化因素，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墓主人的族属和信仰等方面的信息。在文化结构较为单一的墓地中，墓葬的方向往往保持着高度的统一性[9]。而不同的墓葬方向代表着不同的人群和丧葬信仰。如江汉地区中小型楚墓的墓葬方向绝大多数为南向，雨花台558座楚墓中，421座为南北向，其中南向（160°～200°）有369座，北向（0°～30°）仅有28座[10]。咸阳塔尔坡秦人墓地中西向墓葬达66.4%，西安邮电学院新校区秦墓中西向和西北向墓葬比例高达90.9%[11]。

本文将墓葬方向分为16个区段，351°～10°为北向，11°～35°为北偏东，36°～55°为东北向，56°～80°为东偏北，81°～100°为东向，101°～125°为东偏南，126°～145°为东南向，146°～170°为南偏东，171°～190°为南向，191°～215°为南偏西，216°～235°为西南，236°～260°为西偏南，261°～280°为西向，281°～305°为西偏北，306°～325°为西北，326°～350°为北偏西。

曲村秦汉墓共计79座墓葬，其中北向墓葬44座，占56%；北偏东34座，占43%；南向1座，占1%。一期墓葬 7座，北向6座，北偏东1座；二期墓葬 21座，北向7座，北偏东13座，南向1座；三期墓葬28座，北向14座，北偏东14座；四期墓葬15座，北向10座，北偏东5座；五期墓葬 8座，北向7座，北偏东1座。

总的来讲，该墓地以正北向为主，北偏东次之，方向都在351°～35°之间。

谢尧亭先生在其博士论文中指出，在曲村发现的西周北向墓葬代表着的人群是姬姓周人，头向尚北[12]。春秋时期以上马墓地[13]为代表的晋墓的墓向则是以东向和北向为主，长治分水岭东周墓地[14]则出现了以东向墓为主转变为北向墓为绝对优势的新特点。曲村战国墓葬共发掘42座，其中有2座头向不明者，剩余40座墓葬中，北向18座，占45%，北偏东15座，占38%，东偏南3座，占8%，东北、东南、东向、北偏西各1座。

由此可知战国时期曲村墓葬就以正北向为主，北偏东次之，同时还兼有其他方向。葬式上以仰身直肢葬为主，屈肢葬为次之。到了秦汉时期，墓葬的方向继承传统以正北向为主，北偏东次之，基本不上不见其他方向的墓葬。葬式基本上以仰身直肢葬为

主，仅见两例侧身屈肢。在春秋战国时代，以河南、山西、河北为代表的中原地区以仰身直肢葬为主要葬式，屈肢葬占一定数量[15]。这说明战国以来曲村人群结构较为单一，有着高度统一的丧葬信仰。

三、人群结构及来源

从墓地的空间布局、墓葬方向观察，曲村秦汉墓地埋葬的人群较为单一。如果我们从墓葬出土的随葬品，特别是陶器组合来观察就会发现里面的差异。一期中陶器组合以鼎、盛、壶、盘、匜为主，但是茧形壶、罐组合已经开始出现。二期中陶器组合以鼎、盛、壶、盘、罐，匜已经被盘所取代，茧形壶已经开始出现在鼎、盛、壶的陶器组合中。三期中陶器组合以鼎、盛、壶/茧形壶、甗、罐为主，盘几乎绝迹，茧形壶俨然已成为陶器组合中的一部分。四期中陶器组合以鼎、盛、壶、甗、罐和鼎、盛、壶、甗、罐、鸱鸮为主，这两套陶器组合最大的差别在于有无鸱鸮。五期陶器组合以灶、罐为主。

在关中地区秦墓陶器的组合以仿铜陶礼器（鼎、盒/盛、壶）和实用器（釜、罐、盆、瓮），同时秦器比较盛行，陶缶、陶茧形壶、陶釜、铜蒜头壶等[16]。曲村秦汉墓地一、二、三期陶器组合基本上以鼎、盛、壶为主，伴出有秦人典型器物茧形壶。在Ⅱ墓区中发现的三座墓葬被壕沟环抱其形制与侯马乔村[17]、三门峡火电厂[18]秦人围沟墓十分类似。中原地区战国时期陶器组合以鼎、豆/盒（盛）、壶为主[19]。我们或许可以说曲村秦汉墓一、二、三期墓主人群以原土著居民（魏国人）及后裔为主要群体同时也受到了秦文化的影响。据《史记・秦本纪》记载孝公十年（公元前352年），“将兵围魏安邑，降之。”《史记・魏世家》记载，“襄王六年（公元前329年），秦取我汾阴，皮氏、焦。”由此可知晋西南地区已被秦人控制。公元前290年，魏献河东四百里于秦，其后四年“魏献安邑，秦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秦从关中募民到河东，当秦王朝灭亡以后，在各地存留的文化因素与其他列国文化糅合在一起，成为汉文化形成的一个主要因素。

四期陶器组合可分两套，一套以鼎、盛、壶、甗、罐为主，另一套以鼎、盛、壶、甗、罐、鸱鸮为主。前者还是以该地区传统陶器组合为主，其人群结构应该以当地土著居民及后裔为主要群体。后者陶器组合与前者的陶器组合最大的差别是有无鸱鸮。侯马地区（汉河东郡）出现鸱鸮大概在西汉中晚期。而最早出现鸱鸮在汉河内郡（今河南新乡地区），最晚的为内蒙古磴口县（汉朔方郡）[20]。曲村汉墓出土的鸱鸮可能是受到了河内郡（今新乡地区）的影响。因为河内郡（新乡地区）的人群迁徙到朔方郡（今内蒙古磴口县）屯田戍边，河东郡（侯马地区）可能是作为迁徙路线上一个重要的人群临时居住点。《汉书・武帝纪》“（元朔二年）夏，募民徙朔方十万口。”故此期汉墓的墓主人群有可能是从河内郡迁徙而来的人群或是受到河内郡丧葬习俗影响的土著

居民。

五期陶器组合以灶、罐为主。由于这个时期汉文化已经形成，具有汉文化色彩的葬俗已经深入人心，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人群结构趋向稳定，在丧葬习俗上表现出较多的统一性。

四、结　　语

综合以上分析我们可以得出，曲村秦汉墓的空间布局总体安排是先北后南逐次安排，当墓葬达到一定密度时，向东北、西南方向扩展，在墓地的局部区域已经形成一个形态较为紧密的家族墓地。墓葬方向以正北向和北偏东向为主，说明其人群、文化结构较为单一、丧葬习俗上高度统一，人群结构主要是以当地土著居民为主，同时受到关中秦文化的影响。此后人群结构一直比较稳定，到西汉中后期时受到来自河内郡（今新乡地区）人群的影响，丧葬习俗上出现波动，但是仍以当地的丧葬习俗为主，在西汉晚期由于社会比较安定、人口没有大规模的流动和迁徙，人群结构趋向稳定，在丧葬习俗上表现出较多的统一。雷兴山先生指出，中国青铜时代考古以往研究表明，在都邑内，族群的构成往往比较复杂，在非都邑聚落或等级较低的聚落内，族群构成可能相对单纯[21]。也许曲村秦汉墓主人群结构较为单一，跟其等级较低的聚落不无关系。

曲村秦汉墓的墓室面积基本上都在3～4平方米之间，墓室的长度基本上都在3.4～2米范围之内，墓主人群等级较低。韩国河先生把西汉时期的墓葬分为四个等级，其中第四类是中小地主及庶民墓，墓室的长度在3.5米以下[22]。因此我们可以说曲村秦汉墓的墓主人群等级应该是本地土著居民群中的中小地主及庶民。

注　　释

［1］　北京大学考古系商周组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天马—曲村（1980～1989，第三册）［R］.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2］　无墓道的竖穴土坑墓中以人骨的头向所指为判断方向标准.

［3］　韩建业. 墓葬的考古学研究——理论与方法探讨［J］. 东南文化，1992（3，4）.

［4］　报告原文中墓葬数量为93座，但在墓葬统计表为96座，本文采用后者数量.

［5］　报告分期：一期战国末期；二期秦代前后，最晚不过秦汉之际或汉代初年；三期西汉高祖至武帝末年；四期汉昭帝至汉元帝；五期汉成帝至王莽始建国元年；六期东汉晚期.

［6］　由于M6085的时代、随葬品与M6072、M6048一致，故把M6085放到Ⅰ墓区。M6330处在J3G2的东侧且大部分尚未发掘，故在墓群、墓区的讨论中暂不对其讨论.

［7］　同［1］.

［8］　杨树达. 汉代婚丧礼俗考［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

［9］　张翔宇，朱连华. 西安北郊秦汉墓方向的初步考察［C］. 汉代陵墓考古与汉文化.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10］ 郭德维. 试论江汉地区楚墓、秦墓、西汉前期墓的发展与演变［J］. 考古与文物，1983（2）.
［11］ 同［9］.
［12］ 谢尧亭. 晋南地区西周墓葬研究［D］. 长春：吉林大学，2010.
［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上马墓地［R］.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4.
［14］ a.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长治市分水岭古墓的清理［J］. 考古学报，1957（1）.
b.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长治市分水岭战国墓第二次发掘［J］. 考古，1964（3）.
c.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晋东南工作组，山西省长治市博物馆. 长治分水岭269、270号东周墓［J］. 考古学报，1974（2）.
d. 边修成. 山西长治分水岭126号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4（2）.
［15］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两周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16］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中国考古学・秦汉卷［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
［17］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侯马东周殉人墓［J］. 文物，1960（8，9）.
［18］ 宁景通等. 三门峡市火电厂秦人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1993（4）.
［19］ 同［14］.
［20］ 张抒. 汉代墓葬出土鸱鸮俑（壶）浅析［J］. 考古与文物，2010（2）.
［21］ 雷兴山. 先周文化探索［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1.
［22］ 韩国河. 秦汉魏晋丧葬制度研究［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Analysis of Toms of Qin-Han Dynasties in Quvillage ShanXi

Liu Hanxing

Abstract: The basis of this paper reports about the Qin and Han dynasties tombs in the Tianma Qu village, this paper will focus on the forms of social organization and the funeral customs which are reflected in the burial group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the tombs' spatial layout, direction and the make-up of the ethnic groups. The Qu village's tombs are comprised of six big sections, and these six sections are made up of thirteen small sections. According to the analysis, there are rules reg arding the alignment and potion of the tombs. The tombs' direction provided us a key clue to the research about the origin of the ethnic groups. It can be definitely established that the ethnic groups of the Qu village were mostly natives which are made up of the landlords and farmers during the Qin-Han dynasties.

Key words: Qu village; tombs of Qin-Han dynasties; the setups of the tombs; the direction of the tombs; Population structure

辽东半岛两汉墓葬分期

张翠敏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大连，116036)

从战国晚期开始，辽东半岛出现贝墓，西汉时期普遍流行，成为这个时期主要墓葬形式，其他墓葬形式还有土坑墓、石墓、瓦墓等，但数量较少。主要流行单人葬、夫妻异穴合葬、夫妻同穴合葬。西汉中晚期至王莽时期，除了贝墓外还流行带有贝墓遗风的贝石墓、贝瓦墓、贝瓦砖墓、贝砖墓、贝砖木合筑墓等，主要流行夫妻合葬。东汉早期仍存在少量贝墓、贝砖墓，砖室墓开始流行。东汉中晚期，流行砖室墓，有单室、双室、多室墓，流行夫妻合葬。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除了普通砖室墓外，还有花纹砖墓、石板墓，流行夫妻合葬，家族葬在部分地区出现。此外，瓮棺墓作为儿童墓葬，从战国时期出现到东汉时期一直存在，基本上没有随葬品。

辽东半岛两汉墓葬规模庞大，分布广泛，数量众多，类型齐全，时代联系紧密，随葬品丰富，反映了辽东半岛两汉时期经济发达，物质文化繁荣，对研究两汉时期政治、经济、文化、丧葬习俗、思想意识等具有重要价值。

一、汉墓分布状况

两汉时期，辽东半岛属于辽东郡管辖范围，境内分布沓氏、文（汶）、平郭、安市、西安平等县。战国时期燕国特别是燕昭王锐意改革，大力发展经济，为辽东半岛经济发展打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这里物产丰富，经济发达，水陆交通便利，人口密集，城邑众多。墓葬分布广泛，墓葬形制复杂，其中不乏高规格墓葬，随葬品十分丰富，尤以大连地区和营口地区最为丰富，而且这两个地区汉墓特征相似，为辽东半岛汉墓分期提供了大量基础资料。由于营口和丹东地区公开发表的资料少，而大连地区发掘资料非常丰富，本文基础材料分析以大连地区为主，营口和丹东地区为辅。

辽东半岛两汉时期墓葬分布比较广泛，以辽南地区最为集中，也最有代表性。到目前为止，除庄河市未发现汉代遗存外，其他地区都发现了丰富的汉代遗存。大连地区汉墓分布比较集中，规模庞大，数量众多，类型齐全，有贝墓、砖室墓、瓮棺墓、花纹砖墓、石板墓，还有少量土坑墓和石圹墓、瓦墓。大连地区所辖的旅顺口区、金州新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等都发现了大量的汉代遗存（图一），长海县也有发现。这些



图一　大连地区汉城与汉墓群分布图

汉代遗存主要为城址、遗址和墓葬，以墓葬居多。目前仅大连地区已发掘汉墓数量近千座。汉墓集中分布区域如下：

（1）旅顺牧羊城、大潘家一带。这里有牧羊城和大潘家汉城，围绕这两座城附近有尹家村汉墓、刁家村汉墓[1]、鲁家村窖藏[2]、大坞崖遗址等；另外旅顺北海李家沟[3]、三涧堡韩家村[4]等地都发现了汉墓群。1912年日本人发掘了南山里刁家屯汉墓，1928年发掘了牧羊城遗址[5]，1929年发掘了南山里汉墓[6]。1964年中朝联合考古队发掘了旅顺的尹家村遗址和汉墓[7]。1965年发掘了李家沟贝墓。1992年旅顺博物馆发掘了大潘家汉墓群[8]。

（2）甘井子区营城子、沙岗子一带。2013年营城子汉墓群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这一带汉墓经过几次大规模发掘，出土了大量珍贵文物。1931年日本人在沙岗子发掘了两座汉墓，其中2号墓就是著名的营城子壁画墓[9]。1954年旅顺博物馆发掘了50座汉墓[10]。1999年发掘一座大型贝砖木合筑墓[11]。2002～2005年发掘了近200座汉墓[12]，2006年在修建大连土羊高速公路时又发掘了9座汉墓[13]。这一带几乎涵盖了汉墓所有墓葬形制。营城子、沙岗子[14]其他零散发掘资料很多，附近的郭家沟、双台沟[15]、前牧城驿[16]都曾发现和发掘过汉墓。另外在大连湾刘家屯[17]、市内劳动公园[18]等地也发掘过汉墓。

（3）金州新区董家沟、大岭村一带。这里发现和发掘汉墓比较早，20世纪30年代日本学者三宅俊成发掘董家沟汉墓和大岭屯汉城[19]。2005年对董家沟汉墓群进行了大规模发掘[20]，发掘汉墓近百座，多为东汉时期墓葬。这一带还有董家沟汉城和冷屯汉墓群。其他零散发掘资料也有发表[21]。

（4）金州新区大魏家、东马圈子一带。这一带有东马圈子汉魏城址，大魏家一带分布大量汉墓群[22]，附近的梅家、铁匠炉、华家、三十里堡等多地发现了汉墓，主要为砖室墓和花纹砖墓，还有一定数量石板墓。

（5）普兰店张店汉城一带。张店汉城为辽东郡沓氏县县城，围绕汉城分布着乔屯[23]、陈茔、姜屯[24]、西北山等汉墓群。1975～1978年和2010年集中发掘了两次，发掘汉墓200多座，涵盖了多种墓葬形式，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晚期，有土坑墓、贝墓、石墓、砖室墓、花纹砖墓。马山也发掘过贝墓[25]。张店汉城附近海滩曾发现过马蹄金[26]。普兰店汉代遗存分布比较丰富，除张店汉城外，现存的还有黄家亮子和大城山城址。

（6）瓦房店老虎屯镇马圈子、吕屯一带。主要分布砖室墓和汉魏时期石板墓，1989年在马圈子发掘了4座石板墓[27]。在吕屯一带发现很多花纹砖。

（7）瓦房店李官、齐家房一带。这里有李官汉城，汉墓群分布比较广，发现较多的花纹砖，主要为东汉时期墓葬。

（8）瓦房店陈屯一带。陈屯汉城规模比较大，1994年在附近发掘了170多座汉

墓[28]，主要为瓮棺墓和瓦棺墓，有少量砖室墓、石板墓。

（9）长兴岛北海土城子一带。这里有一座汉城，附近分布有蚊子嘴、西礓坡汉墓群等。1937年三宅俊成曾发掘过。2009年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发掘了西礓坡汉墓群[29]，主要为砖室墓和石板墓。附近还有贝墓群。

（10）长海县广鹿岛朱家村一带。这里有朱家村汉城和烽火台，附近分布汉墓。

营口地区汉代遗存分布也比较广泛，目前已发现100多处，主要集中于三个地点：大石桥汤池镇、盖州城关镇、鲅鱼圈熊岳镇。这些地点都有一座城址，围绕城址分布着汉墓群和遗址。熊岳镇温泉村汉城附近分布大量汉墓群[30]，比如1976年发掘的陈屯镇和平村汉墓群，发现花纹砖墓。1972～1973年发掘的九垄地镇东大营村汉墓群，发现较多花纹砖墓；九垄地镇三家子汉墓群以贝墓为主；九垄地村（曲茔汉墓群）也有汉墓群，1972～1973年发掘过，发现了花纹砖墓。熊岳镇汉墓群是当地最大汉墓群。鲅鱼圈也发现了多处汉墓群，比如大董屯、草房、西红梅汉墓群等，发现有贝墓、砖室墓和花纹砖墓。盖州城关镇附近分布大量汉墓[31]，从西汉早期到东汉时期。因平郭县城设在营口地区，初步考订为熊岳温泉村[32]。营口地区汉代遗存分布广，但发掘汉墓相对比较少，几乎没有大规模汉墓群发掘，所以要全面了解汉墓分布状况、年代和其他相关问题，还需要更多材料。

丹东地区汉墓分布不及辽南地区，发掘资料比较少，墓葬主要分布于东港和凤城。

从上述地区汉墓分布和发掘情况看，辽南沿海地区经济发达，商贸繁荣，交通便利，人口众多，汉代城址、居住址和汉墓群分布广泛，数量巨大。大连和营口地区墓葬形式和时代特征比较接近，类型齐全，时代衔接紧密，从战国晚期到魏晋时代没有间断，反映了这两个地区汉代经济文化比较发达。大连和营口属于辽东郡管辖范围，设有沓氏县、文县、平郭、安市等县，在平郭县设盐铁官，说明汉中央政权对辽东郡沿海地区管辖和重视。

二、汉墓类型、内涵与特征

到目前为止，辽东半岛发现两汉时期墓葬类型有土坑墓、石圹墓、瓦墓、贝墓、贝石墓、贝瓦墓、石墓、贝砖墓、砖室墓和花纹砖墓、石板墓以及瓮棺墓等，以贝墓、砖室墓、瓮棺墓居多。贝石墓、贝砖墓、贝瓦墓是贝墓遗风的延续。土坑墓、石圹墓数量较少，石圹墓见于姜屯汉墓群，开基岩为墓室。土坑墓见于旅顺南山里和普兰店姜屯以及营口地区。石墓数量也比较少，见于营城子和旅顺，一般有石片墓、卵石墓和石椁墓。贝墓分布比较广，一般都在沿海地区，从山东半岛到辽东半岛都有分布，是这一带最有地方特色的墓葬形式。在大连各县区和营口鲅鱼圈等发现了大量贝墓。贝石、贝瓦、贝石瓦砖墓多见于营城子和姜屯等地，尤以南部地区居多，营口地区尚未发表这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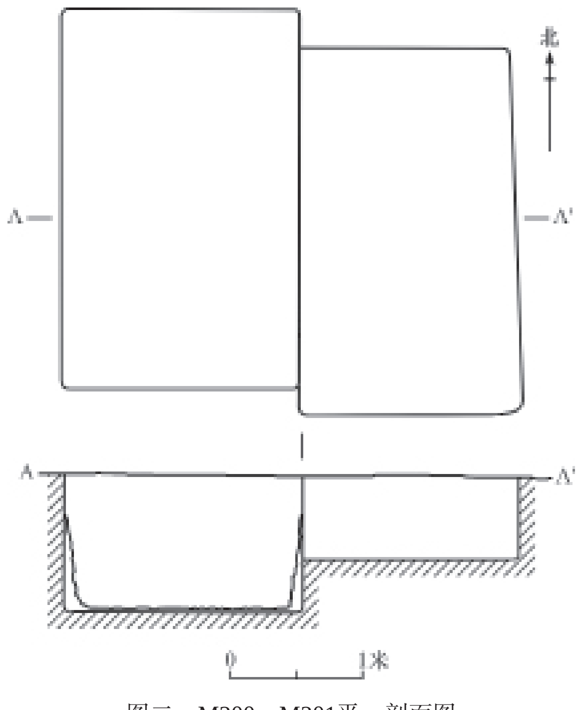
面材料。砖室墓分布比较广泛，大连和营口、丹东地区发现都很多。花纹砖墓主要见于旅顺、甘井子区、金州、普兰店、瓦房店、熊岳、盖州等地，大石桥以北未见花纹砖墓。石板墓主要分布于瓦房店老虎屯镇马圈子和吕屯一带，金州、营城子也有少量发现，营口地区未见这方面报道。瓮棺墓主要集中于瓦房店陈屯一带，其他地区也有发现，比如旅顺尹家村。

（一）土 坑 墓

数量较少。1964年发掘的尹家村M10、M11、M15～M17[33]，为土坑竖穴墓，多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发现棺木痕迹，有的墓地铺有砾石，有的还有二层台，均未发现墓道。M15出土器物组合为碗和罐，M16器物组合为碗、盆和罐，M17器物组合为盒、盆和盖壶。这些墓葬规模小，随葬器物简单且数量少，从器物形制判断为西汉早期。

（二）石 圹 贝 墓

仅在姜屯汉墓群发现9座，其他地区不见。有单室和双室之分，墓室均为长方形，不见墓道。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双室墓多为异穴合葬墓。这类墓规模小，出土器物数量少，器型简单。姜屯M199为单人单室墓[34]，规模小，长2.7、宽1.5米，随葬品5件，罐2、壶2、盆1。M200和M201为异穴并葬墓（图二），M200打破M201，M200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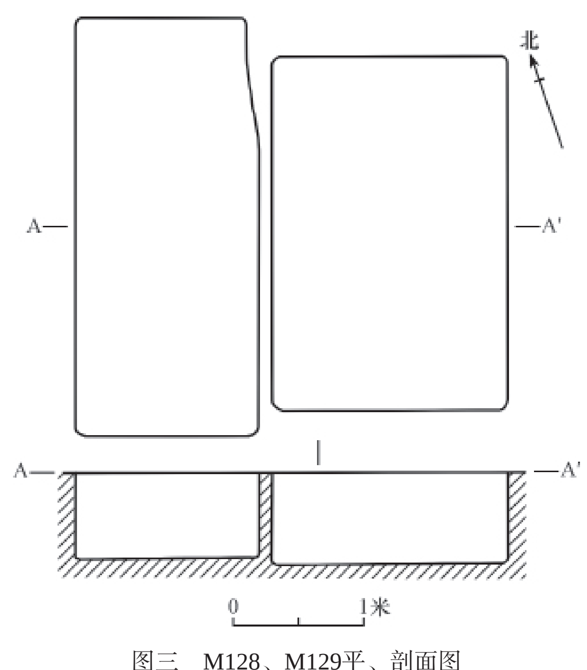


图二　M200、M201平、剖面图

壁和墓底铺有贝壳，出土器物11件套，陶器有罐3、壶2、鼎1、钵1，铜器有盆2、矛1、半两铜钱38枚，均为汉半两。M201墓底铺有贝壳。出土8件套随葬品，有罐2、壶2、盆1、钵1、蟠螭纹铜镜1枚和五铢钱等[35]，五铢钱均为西汉早期。

（三）石墓，包括积石片墓、卵石墓、石椁墓

这类墓葬数量少，墓葬规模小，随葬品简单。营城子汉墓群与姜屯汉墓都有发现。以姜屯M128、M129（图三）为例[36]，石圹墓，为单室合葬墓，墓壁周围和墓底铺小碎石块。M128出土罐1、壶2、钵3以及铜带钩和半两钱，时代为西汉早期。M129为女性单人葬，出土罐3、壶1、盆3、钵1以及五铢钱等，五铢钱有西汉晚期五铢钱，该墓为西汉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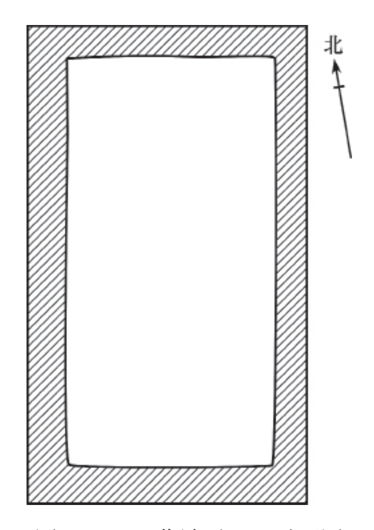
图三　M128、M129平、剖面图

（四）瓦墓（积瓦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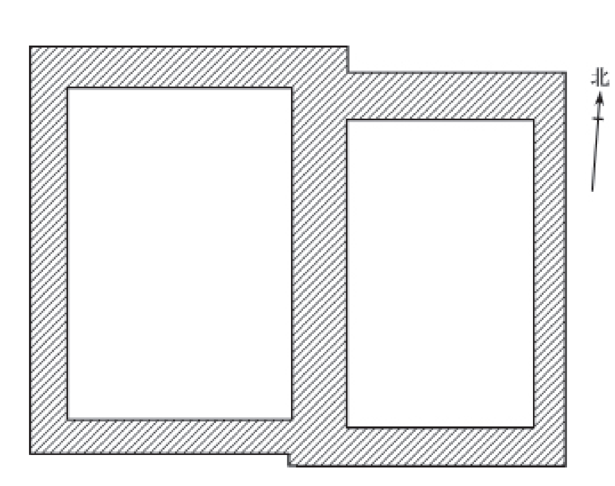
这类墓发现比较少，在营城子和姜屯汉墓群发现过几座，形制不尽一致。营城子发现瓦墓，一般是墓四壁用碎瓦片筑砌，出土云纹瓦当和“长乐未央”瓦当。姜屯发现瓦墓，一般墓底铺瓦，有的四壁也用瓦。以姜屯M74为例[37]，石圹瓦墓，规模小，单室墓，墓底铺瓦，四壁保存一圈碎瓦，单人葬，男性个体，仰身直肢葬，随葬器物有罐3、钵1、铜盆1、五铢钱，五铢钱为西汉早期。该墓年代为西汉早期。

（五）贝　　墓

贝墓特指纯贝壳墓，是辽东半岛最有特色的墓葬形式之一，从战国晚期开始出现，一直延续至东汉早期。西汉晚期开始出现贝砖墓、贝瓦墓、贝石墓等，带有贝墓遗风。贝墓分布比较广泛，数量比较多，有墓道和无墓道之分。贝墓有单室、双室之分，单室又分单人葬、夫妻合葬。双室墓包括夫妻同穴合葬、夫妻异穴合葬。贝墓均有木椁，大部分都有棺。1954年营城子地区清理了41座贝墓，形式比较复杂。其中M25为单人单室贝墓（图四），规模小，墓底、墓顶和四壁均有贝壳，长2.56、宽1.4米，没有墓道。随葬器物13件，其中陶器组合盆3、壶5、扁壶1、钵1，铜器有日光镜和半两钱，时代为西汉早期。M35为夫妻分室合葬（图五），规模不大，两次筑成，出土器物14件，陶器组合为罐4、盆3、钵2，还出土铜带钩、铜盆等[38]。时代为西汉早中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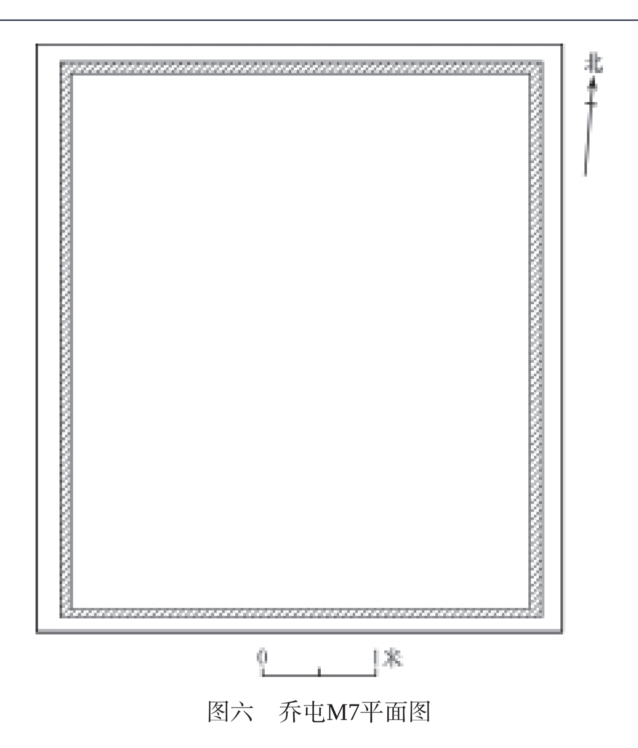

图四　1954营城子M25平面图



图五　1954营城子M35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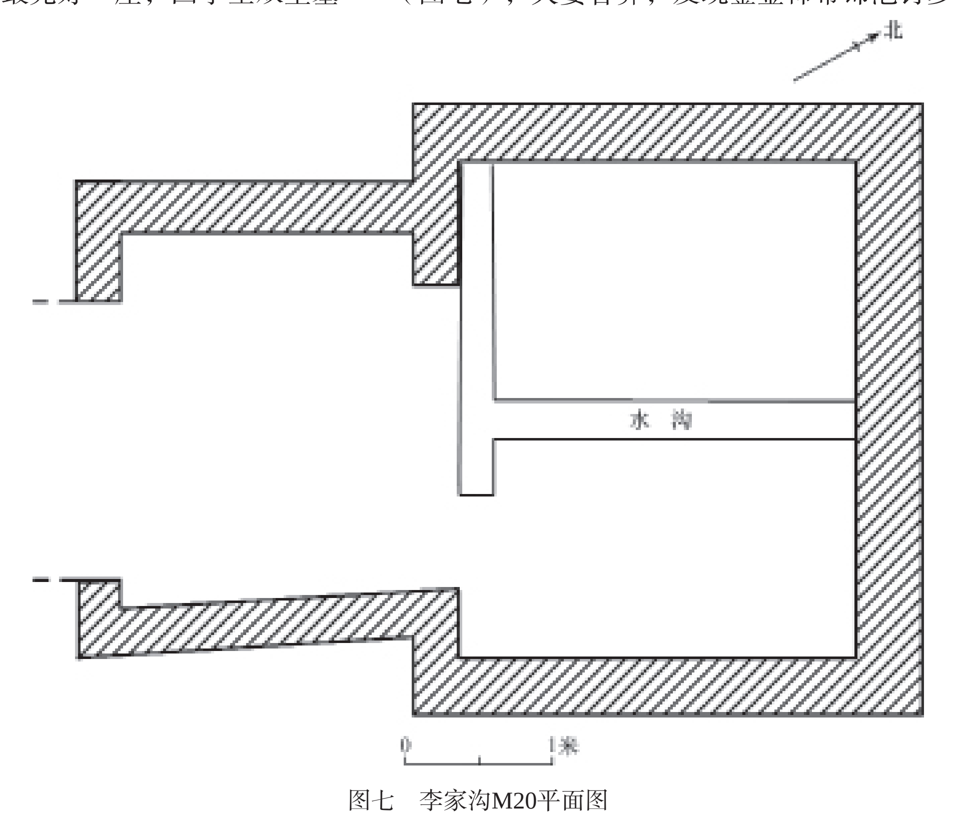
姜屯M41规模较大，平面为中字形，有墓道、前室、主室和器物台组成[39]，前室放置盛装明器铜马车木箱，主室有棺有椁，随葬大量随葬品，夫妻合葬。随葬品57件套，陶器有罐8、壶6、瓮2、鼎1、灶1、奁8、耳杯8、盆4、甑3，壶包括节颈壶。铜器有贝鹿镇、带钩、刷柄、铜车马模型、铜钱等，铜钱均为五铢钱。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1975年乔屯汉墓群发掘，发现10座贝墓，与姜屯墓地相距很近，都位于张店汉城周边，其中M7是目前发现较大的单室贝墓[40]（图六），长4.8、宽4.4米，为夫妻合葬，有棺有椁，随葬品最多。陶器多施红白彩绘，器型有壶、罐、鼎、钵、盆、盒、耳杯、魁、洗、灶、甑、釜、奁、瓮、鸱鸮壶等，还有铜贝鹿镇、铜带钩、鎏金铜车马模型、漆器附件、五铢钱等。时代为西汉晚期。



图六　乔屯M7平面图

1954、1957年在李家沟汉墓群发现30座汉墓，其中贝墓26座，砖室墓4座。M20为保存最完好一座，凸字型双室墓[41]（图七），夫妻合葬，发现鎏金柿蒂饰泡钉多枚。



图七　李家沟M20平面图

出土器物比较丰富，有壶、罐、灶、盆、洗、井、仓、博山炉、灯、奁、鐎斗（报告称盉）等，另外还出土铜洗、铜车马模型、铜印、五铢钱、石剑璏等。陶器多白彩和朱彩彩绘。时代应为西汉晚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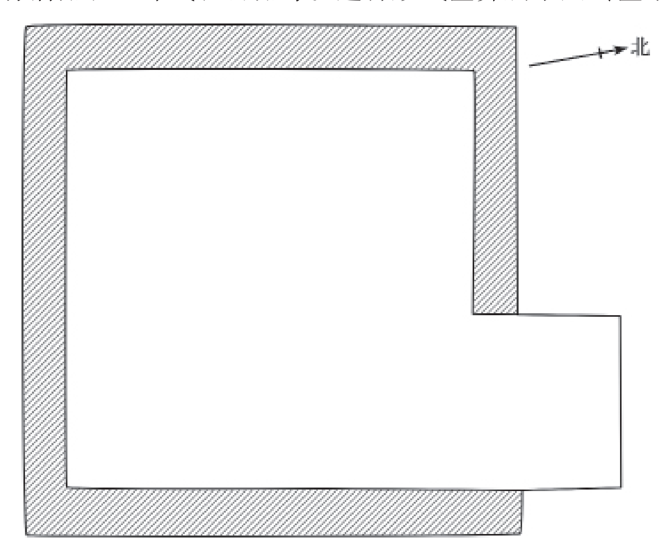
2006年发掘的大连土羊高速公路前牧城驿汉墓，M1为贝墓[42]，发现3具人骨，已辨别男女各一具，另一具因朽烂严重无法辨认。出土器物52件，其中陶器20件，有壶、洗、盆、井、尊、灶组件等，发现“大泉五十”铜钱多枚。为王莽时期墓葬。该墓主人下葬时间有早晚，尸骨朽烂严重的可能是最早埋葬的，从陶器和“大泉五十”铜钱判断，最晚下葬的应该在王莽时期。

1983年清理的盖州农民村汉墓，虽然被破坏，但出土器物多达80多件，发现了大量彩绘陶器。该墓葬为贝墓，夫妻合葬。出土陶器有鼎、豆、罐、壶、钵、鐎、盒、盘、盆、灶及组件、炉、碗、陶俑、陶房等，其他还有五铢钱和铜印、耳珰等[43]。壶、器盖、盆、盒、豆、陶房、陶俑上都饰彩绘。从出土器物组合看，出现了时代偏晚的陶俑和陶房、炉，五铢钱为西汉晚期特征，因此该墓时代应为西汉晚期到东汉早期。

（六）贝 砖 墓

贝砖墓数量较多，遗物比较丰富，是贝墓发展到一定阶段出现的新墓葬形式，既是贝墓遗风的延续，也是砖室墓的肇始。

1954年发掘的营城子汉墓群50座墓葬中有贝砖墓36座，可见贝砖墓占的比例很大。M10为方形（图八），边长5米，在贝壳壁内侧用小平砖对缝立砌，墓底和墓顶铺有贝壳，有棺有椁，发现两具人骨。出土器物百余件，陶器有壶、鼎、盆、豆、盘、灶、水斗等，还有铜器、五铢钱和石器等。这种形式墓葬属于贝砖墓早期形式，小平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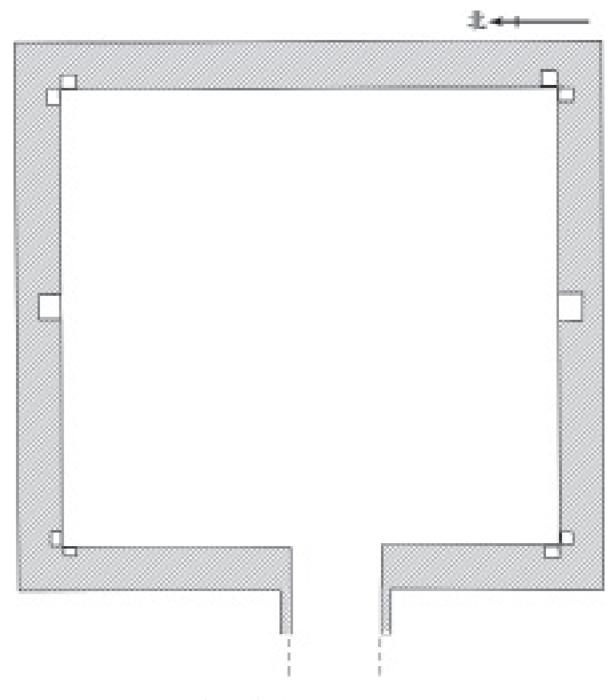


图八　营城子M10平面图

是最早出现的砖，数量比较少，所以筑墓时砖都是立砌，砌法也比较原始，还不会使用错缝砌法。还有一种是墓壁上下两端是贝壳，中间砌砖，时代为西汉晚期。

营城子M76为单室墓，该墓四壁主要为贝壳，还填瓦、碎砖、石块等，仅门垛用砖砌成，该墓为夫妻合葬，出土了一批重器，有龙纹金带扣、铜承旋、铜鼎、铜尊、玉剑璏、鎏金兽钮铜印[44]，陶器有罐、壶、盆、灶、井等，其中金带扣和铜承旋造型精美，技艺高超，比较罕见。龙纹金带扣与朝鲜乐浪古墓出土金带扣几乎一致，非一般官员所能拥有。铜承旋体硕大，雕刻精美"四神"图案和《神仙瑞兽珍禽图》，与广西合浦北插江盐堆西汉晚期M1出土的刻纹三足铜盘[45]风格十分接近。据了解，岭南地区是刻纹铜器的产地，目前已发现十多件刻纹铜器。营城子出土的铜承旋应是从广西一带运过来的，反映了当时海上交通和贸易非常发达。显示了墓主人地位相当高，时代为西汉晚期至王莽时期，最有可能是王莽时期。

营城子M192为目前发现的最大贝砖木合筑墓[46]（图九），棺上有鎏金柿蒂饰，为夫妻合葬，长6.5、宽6.1米，砌法比较原始，为干打垒摞砌，墓壁较厚，仅墓底和墓道铺有薄薄一层贝壳，出土器物60件套。陶器有壶、罐、洗、盆、灯、博山炉、灶、井、鼎、炉、器座、盉等，铜器有日光镜、昭明镜和博局镜，还有鎏金铜马车模型、铁剑、漆器等，时代为西汉晚期至东汉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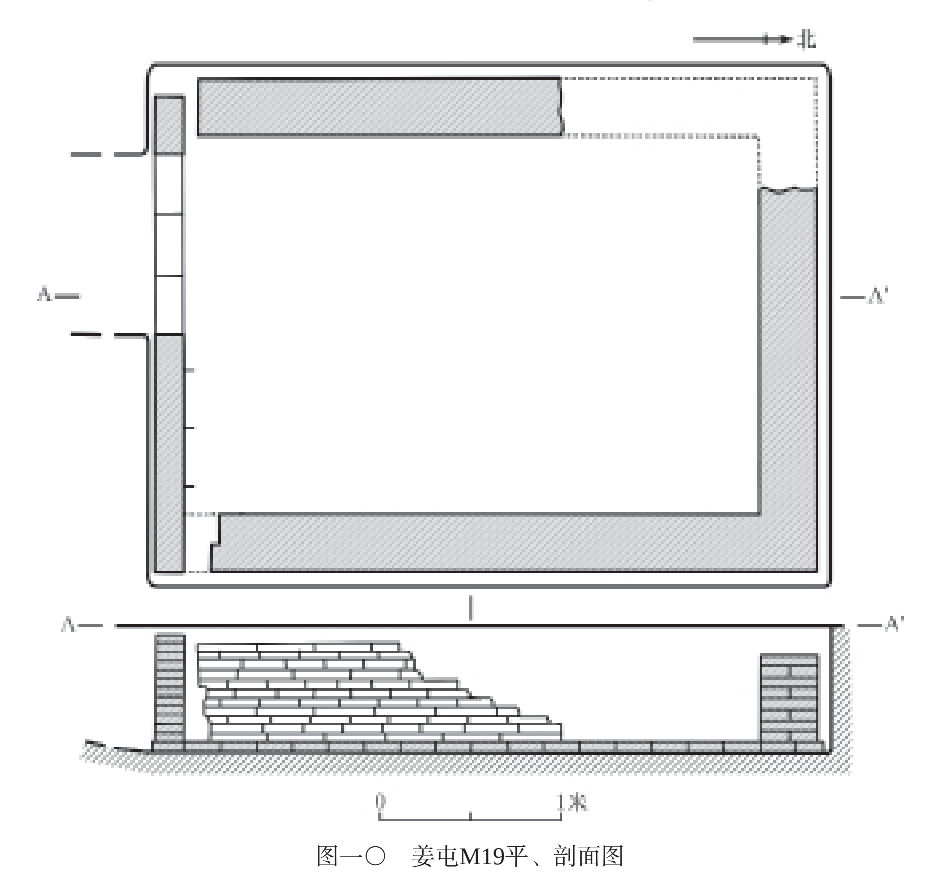


图九　营城子M192平面图

（七）砖 室 墓

目前发现的砖室墓绝大部分被盗或扰乱，因此器物组合不完整。砖室墓（包括花纹砖墓），有单室、双室、三室、四室、多室墓，墓顶多为穹隆顶，均有墓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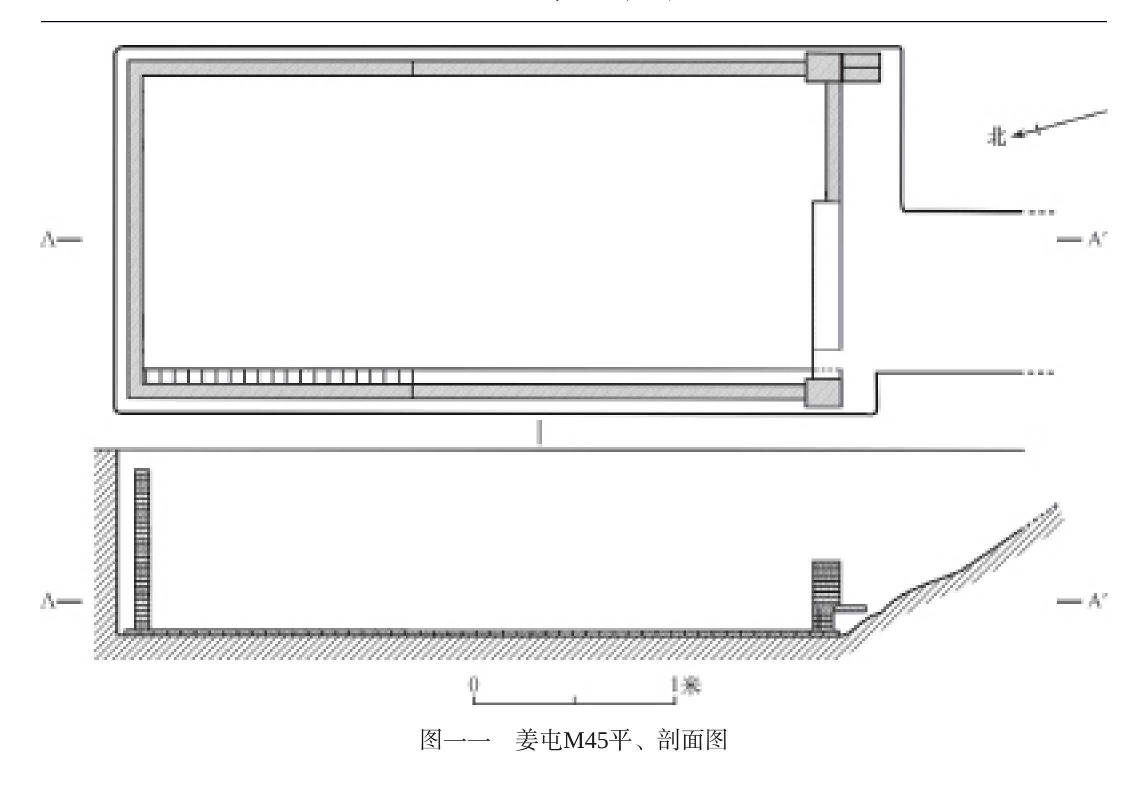
姜屯M19为单室砖墓（图一〇），长方形，发现棺痕迹，发现2具人骨，为夫妻合葬。出土器物28件，陶器有罐3、壶2、瓮1、井1、奁4、樽1、灶及组件釜、盆、甑6件，还有“四乳四虺”铜镜2、带钩1、镦1、五铢钱等[47]，为东汉早期。



图一〇　姜屯M19平、剖面图

1972年发掘的盖州九垄地7座汉墓均为砖室墓，其中M1为单室花纹砖墓，东西北三壁设有小龛（边箱），墓室内发现1椁和2棺，为夫妻合葬。由于被破坏，出土器物较少，有耳杯、盒、五铢钱、银环、琥珀珠、耳珰等，发现了文字砖特别有价值，内容是“叹曰死者魂归棺椁无妄飞扬而无忧万岁之后仍复会”，“永和五年造作竭力无余用庸数千士夫莫不护助生死之义备矣”[48]。这是盖州发现有明确纪年的墓葬。永和五年为公元140年，时代为东汉晚期。

姜屯M45为双室墓，外观看像一个墓室，较长，墓内仅以地面高低不同分为两个墓室[49]（图一一），砖砌法稍显落后，单隅平砖错缝顺砌，发现漆棺残留。夫妻合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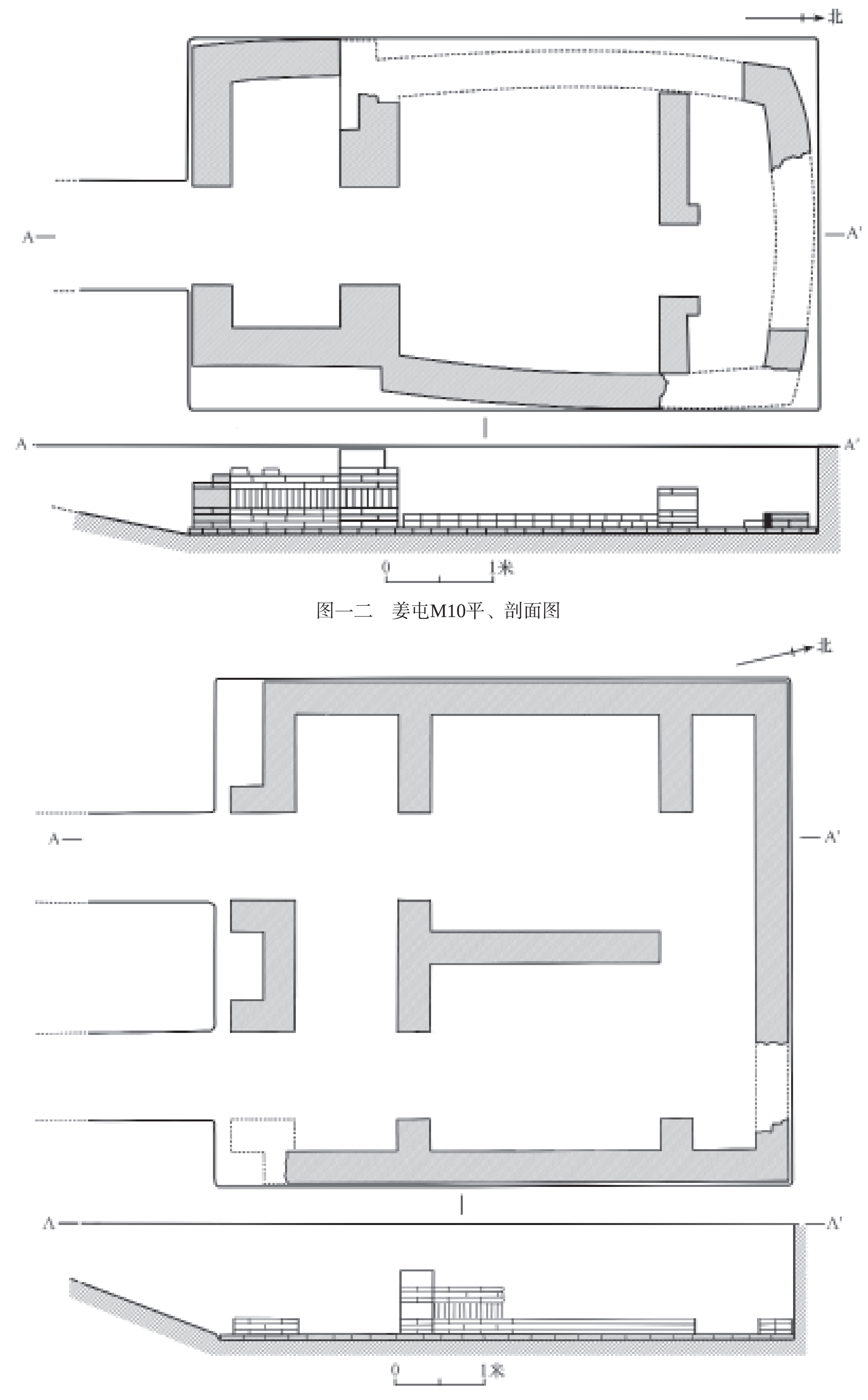
图一一　姜屯M45平、剖面图

随葬品数量较多，共92件，陶器有罐4、壶6、扁壶1、鼎1、仓1、奁5、樽7、灯1、耳杯29、盆4、炉1、博山炉1、器座1、灶组件釜、盆、甑共5件，出土铜器盆1、镜2、剑首1、铜马车模型2及漆器附件、五铢钱等，另外还出土铁器和玉覆面（有学者认为是圭璧组合）。时代为王莽至东汉早期。

姜屯M10为三室墓（图一二），被破坏严重，平面呈“吕”字型[50]，主室有棺床，夫妻合葬，出土器物18件，陶器有罐4、瓮1、井、灶及组件4、奁4、盆2，时代为东汉早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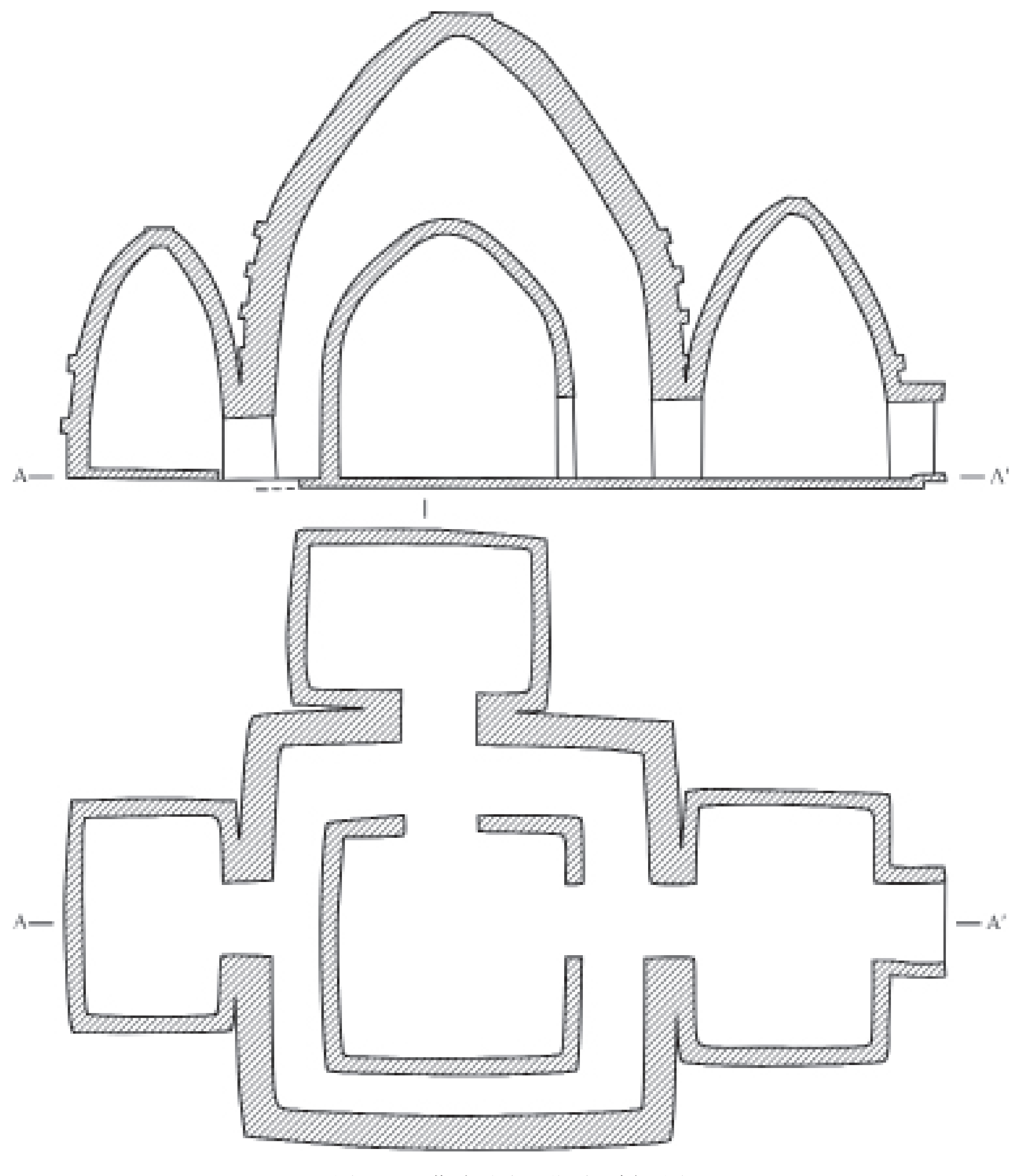
姜屯M20为四室花纹砖墓[51]（图一三），整体为长方形，间隔出四个墓室，发现5具人骨，应为家族葬。发现68件随葬品，质地有陶、金、银、铜、玛瑙、琥珀、煤精等。陶器有罐、瓮、楼、奁、耳杯、案、盆、碗、釜等，还有金指环、银指环、银手镯、铜镜、铜顶针、五铢钱等。花纹砖图案有几何纹、钱文、凤鸟栖树、鸟衔鱼、人面衔环铺首等，时代为东汉晚期。

营城子壁画墓为五室墓（图一四），包括前室、主室、套室、后室和东侧室，保存完整。建筑技术高超，套室是极少发现的墓葬形式。主室有棺床和壁画，内容为镇墓壁画和墓主人升仙壁画，是目前大连地区发现的唯一一座壁画墓，全部用花纹砖筑砌，而且套室花纹砖均施以彩绘。随葬陶器有五枝灯、樽、套盒、魁、案、盆、虎子、炉、熏炉、井、水斗、耳杯、灶组件等[52]，有的器物上有彩绘。虽然多次被盗，但出土器物可以看出当时随葬品还是比较丰富的，墓主人身份非同一般，时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



图一二　姜屯M10平、剖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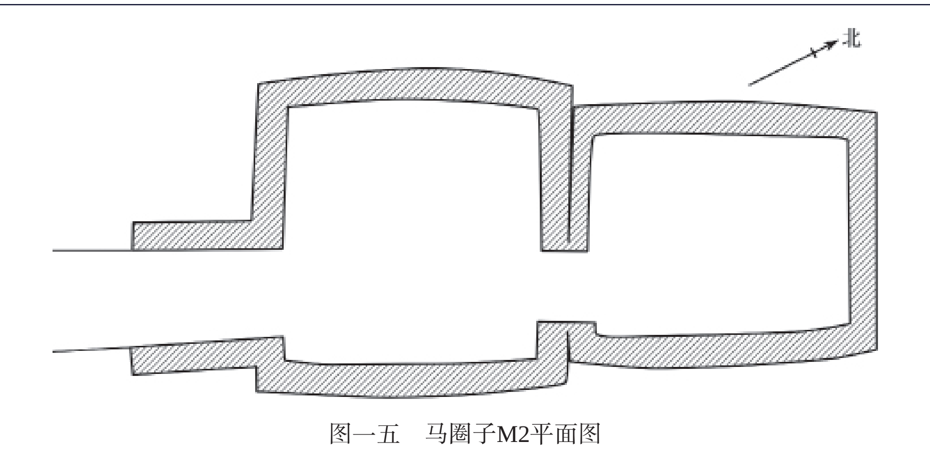
图一三　姜屯M20平、剖面图



图一四　营城子壁画墓平、剖面图

（八）石　板　墓

主要发现于瓦房店老虎屯镇马圈子和吕屯、长兴岛蚊子嘴、金州马圈子、营城子等地。1989年发掘的老虎屯镇马圈子墓地，发现了4座石板墓，全部用石板筑砌，其中一座为四室墓，其余为双室墓。M1为四室墓，被盗，无随葬品。M2为双室墓，发现3具人骨，随葬品较多，有罐、钵、盘、鼎、俎、盒、灯、灶及组件、井、水斗、耳杯、银指环、五铢钱等[53]（图一五）。石板墓多以家族葬为主，有的墓室有棺床，时代为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



图一五　马圈子M2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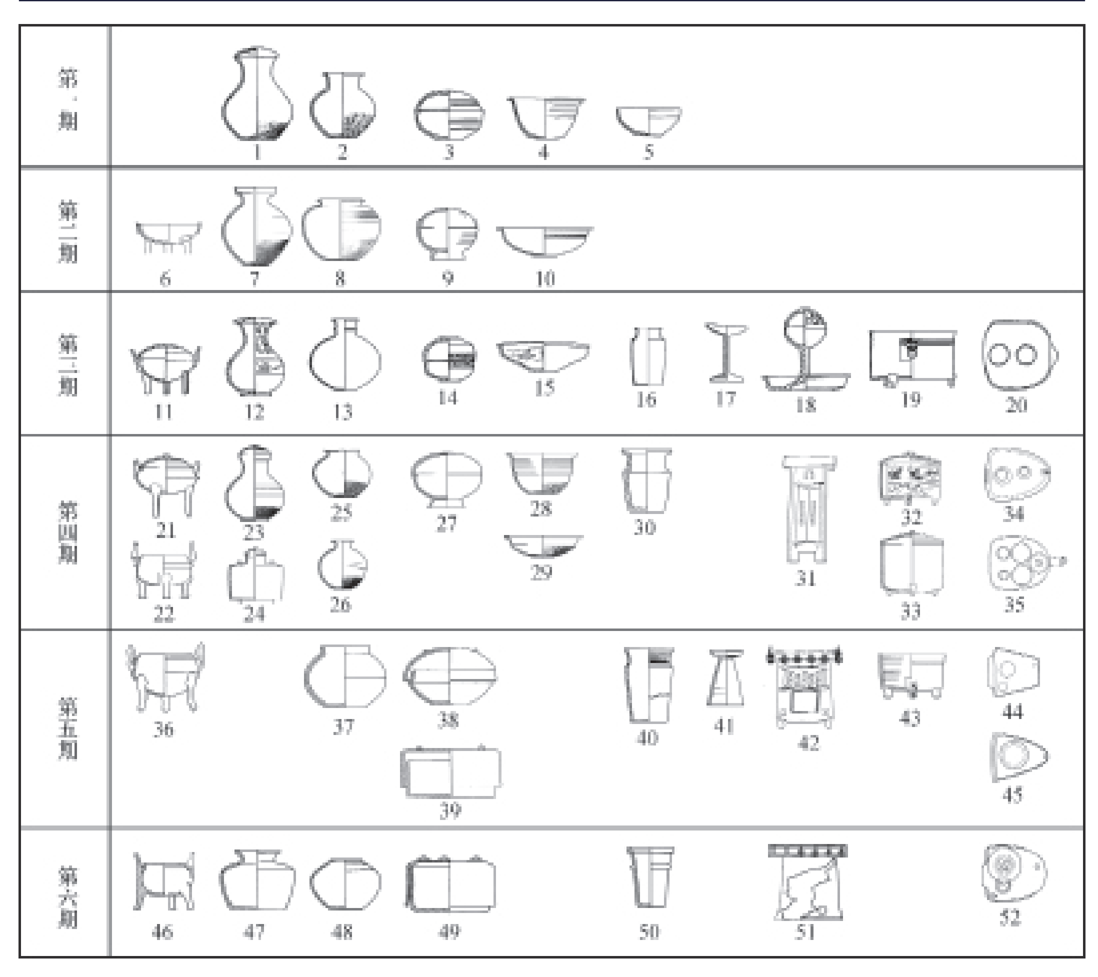
（九）瓮　棺　墓

瓮棺墓一般为儿童墓葬，基本没有随葬品，其时代只能依靠葬具判断。目前发现瓮棺墓最多的地点是瓦房店陈屯墓地。1994年发掘了170多座汉代墓葬，主要为瓮棺墓和瓦棺墓，另外还有砖室墓和石板墓，附近有陈屯汉城，规模较大。另外，瓮棺墓还见于旅顺尹家村[54]等地。时代从西汉时期到东汉都存在。瓮棺墓在我国分布比较广泛，时代有早有晚，战国至秦汉时期是主要流行期[55]。近年来在河北、北京等地还发现成年人瓮棺墓，但数量较少。

三、两汉墓葬分期

从大连、营口地区目前发现的汉墓形制和随葬品分析，时代特征和发展变化明确，脉络比较清晰，为汉墓细分期提供了依据。本文将两汉墓葬分为六期（图一六），即第一期为西汉早期，第二期为西汉中晚期，第三期为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包括王莽时期），第四期为东汉早期，第五期为东汉中晚期，第六期为东汉晚期至魏晋（表一）。不同时期随葬器物有一定变化，特别是陶器变化还是比较明显的，早晚关系比较清晰。目前大连地区还未发现关于墓葬准确纪年的器物。只有盖县九垄地发现一座有明确纪年的汉墓，为永和五年（140年），因此本文分期不能精确到具体年代。

第一期：西汉早期。墓葬规模小，均为单室，墓葬类型有土坑墓、石墓、贝墓、瓦墓等，多数没有墓道，随葬品简单，均为单人仰身直肢葬。在姜屯和营城子发现了异穴同塚合葬，合葬墓往往有打破关系，以贝墓最多。这类墓主要分布于旅顺、营城子、普兰店等地，器物组合为壶、罐、盆，或壶、盒、盆，或罐、钵，或壶、罐、盒等，有的墓葬随葬小件铜器，如铜盆、带钩、半两钱、五铢钱等，这类墓应该是一般平民的墓葬。



图一六　大连地区两汉墓葬出土陶器分期

1～5. 尹家村　6～10、21～35、40、41、43、45. 姜屯　11、12、14、15、18. 乔屯　13、16、17、19、20、36、37～39、42、44. 沙岗子　46～52. 马圈子

第二期：西汉中晚期，墓葬规模小，墓葬仍流行单室墓，单人葬，墓葬形制有贝墓、石墓、瓦墓、贝石墓、贝瓦墓等，以贝墓为主。仍流行单人葬，夫妻异穴合葬，开始出现夫妻同穴合葬。器物组合为罐、盆、钵，铜带钩、铜盆，或者壶、盆、罐、洗、盘、井、草叶纹镜、日光镜、昭明镜。墓葬规模仍比较小，但随葬品有所增加。小型墓葬没有墓道，其他墓葬都有墓道。

表一　辽东半岛汉墓分期表

<table>
<tr><th colspan="2">类型</th><th>葬式</th><th>分期</th><th>典型墓葬</th><th>出土器物</th></tr>
<tr><td colspan="2">土坑墓</td><td>单人葬</td><td rowspan="4">第一期</td><td>尹家村M17</td><td>陶盒、陶壶、陶盆</td></tr>
<tr><td colspan="2">石圹墓</td><td>单室单人葬
单室双人合葬</td><td>姜屯M207</td><td>陶罐，铜带钩</td></tr>
<tr><td colspan="2">瓦墓（贝瓦墓）</td><td>单人葬
单室双人合葬</td><td>姜屯M74</td><td>陶罐、陶钵，铜盆、五铢钱</td></tr>
<tr><td colspan="2">瓮、瓦棺墓</td><td>儿童单人葬</td><td>尹家村瓮棺墓M9</td><td>无随葬品
葬具：陶釜、陶盆，瓦</td></tr>
<tr><td colspan="2">卵石墓</td><td>单人葬
单室双人合葬</td><td rowspan="7">第二期</td><td>姜屯M81</td><td>陶壶、陶罐、陶盒</td></tr>
<tr><td rowspan="8">贝
墓</td><td rowspan="4">纯贝墓</td><td rowspan="4">单室单人葬
分室双人合葬
单室双人合葬
双室双人合葬
单室三人合葬</td><td>1954年营城子M35</td><td>陶罐、陶盆、陶钵，铜带钩、铜盆</td></tr>
<tr><td>1975年乔屯M7</td><td>陶鼎、陶壶、陶罐、陶钵、陶盒、陶盆、陶耳杯、陶魁、陶洗、陶灶、陶甑、陶釜、陶奁、陶瓮等，铜贝鹿镇、铜带钩、鎏金铜车马具、五铢钱</td></tr>
<tr><td>李家沟M20</td><td>陶壶、陶盆、陶灶、陶灯、陶博山炉、陶盘、陶洗、陶瓮、陶仓、陶勺、陶井、陶水斗，铜印、铁剑、带钩、车马具</td></tr>
<tr><td>2006年前牧城驿M1</td><td>陶壶、陶洗、陶盆、陶井、陶仓、陶灶及组件、陶尊，“大泉五十”铜钱</td></tr>
<tr><td>贝石墓</td><td>单室双人合葬</td><td>1954年营城子M1</td><td>陶壶、陶盆、陶罐、陶洗、陶盘、陶井，日光铜镜，昭明铜镜，石砚板</td></tr>
<tr><td>贝瓦墓</td><td>单室单人葬</td><td>姜屯M75</td><td>陶罐、陶壶、陶盒、陶盆</td></tr>
<tr><td>贝砖墓</td><td>单室双人合葬墓</td><td rowspan="2">第三期</td><td>营城子M76</td><td>陶壶、陶盆、陶鼎、陶仓、陶灶、陶洗，金带扣、铜尊、铜承旋、铜鍑镂，玉剑璏</td></tr>
<tr><td>砖木贝
合筑墓</td><td>单室双人合葬</td><td>营城子M192</td><td>陶壶、陶罐、陶洗、陶灯、陶博山炉、陶灶及组件、陶井、陶炉、陶器座，漆器，铜镜、玛瑙珠、鎏金铜车马模型、铁剑、石砚</td></tr>
<tr><td rowspan="2">砖
室
墓</td><td rowspan="2">素面砖
墓
绳纹砖</td><td rowspan="2">单室单人葬
单室双人合葬
双室双人合葬
多室双人合葬
多室多人合葬</td><td>第四期</td><td>1980年前牧城驿M802</td><td>陶壶、陶罐、陶鼎、陶盆、陶灶、陶瓮、陶仓、陶尊、陶耳杯、陶井、陶水斗、陶勺、陶魁、陶熏炉、陶盘、陶盒、陶房、陶俑，漆案、漆耳杯，石砚板、四乳禽兽铜镜</td></tr>
<tr><td>第五期</td><td>2006年沙岗子M1</td><td>陶罐、陶鼎、陶盆、陶盒、陶尊、陶灯、陶井、陶耳杯、陶盏、陶案、陶灶及组件、陶房、陶俑，石砚板，铁削、银指环，玻璃耳珰</td></tr>
</table>

续表

类型		葬式	分期	典型墓葬	出土器物
砖室墓	花纹砖墓	单室双人合葬	第六期	盖州九垄地M1	陶耳杯、陶盒，五铢钱、银环，琥珀珠、耳珰等，“永和五年”文字砖
	花纹砖墓	双室双人合葬 多室双人合葬		刁家村五室墓	陶甑、陶房、陶俑、陶瓶、陶水斗、陶漏斗，五铢钱、“位置三公”铜镜、铜针、铜带钩
	壁画墓	多室双人合葬		营城子壁画墓	陶案、陶炉、陶仓、陶虎子、陶套盒、陶灯、陶魁、陶猪、陶房、陶井、陶耳杯、陶灶、陶尊
石板墓		单室单人葬 单室双人合葬 双室双人合葬 多室双人合葬 双室多人合葬		1989年马圈子M2	陶壶、陶盘、陶钵、陶盘、陶罐、陶灶及组件、陶井、陶水斗、陶灯、陶耳杯、陶鼎、陶盒、陶勺、陶俎、银指环、五铢钱

第三期：西汉晚期至东汉初期，包括王莽时期。墓葬有了较大变化，纯贝墓数量减少，出现带有贝墓遗风的贝砖墓、贝砖瓦石、贝砖木合筑墓等。西汉晚期出现小平砖，墓葬用少量砖，砌法原始，贝壳仍为主要筑墓材料，墓壁填一层薄薄的贝壳，墓底也贝壳。有的墓葬筑墓材料还用碎砖、碎瓦、卵石等填筑，比如营城子贝砖墓M192用砖比较多，墓壁贝壳较薄，墓底铺一层薄薄贝壳，贝壳成为附属材料。砖的尺寸也开始加大，砌法比较原始，没有出现错缝或三顺一丁砌法。大型墓葬增加，规模比较大，有单室墓也有双室墓，流行夫妻合葬，发现过三人合葬。随葬品剧增，从早期的几件陶器到晚期上百件随葬品，随葬品有金带扣、铜尊、铜承旋、铜印、玉剑璏、陶壶、陶盆、陶鼎、陶仓、陶灶、陶洗、陶罐等，或者陶壶、陶罐、陶洗、陶灯、陶博山炉、陶灶及组件、陶井、陶炉、陶器座；漆器、铁剑、石砚板、铜镜、玛瑙珠、鎏金铜马车模型。出现了数量较多的铜马车模型，有的甚至是鎏金的，出现了博局镜、“大泉五十”铜钱等。新出现的陶器有灶及组件、耳杯、炉、灯等，彩绘陶器数量较多。

第四期：东汉早期。这时期除了极少数贝墓外，砖室墓大量增加，而且流行绳纹砖墓，有单室和双室墓，流行夫妻合葬，单人葬较少。陶随葬品与前期大致相同，井、水斗、灶数量增加，新增了陶俑、动物模型、案、陶房、套盒等。均有斜坡墓道。

第五期：东汉中晚期。这时期仍流行砖室墓，有单室、双室、三室、四室和五室墓，出现了棺床。出现了高规格大型墓葬。晚期新出现了花纹砖墓，花纹砖形制多样，有楔形、长方形、榫卯砖等，纹饰繁缛，题材广泛，有植物纹、动物纹、海洋生物纹、几何纹、人面纹、神兽、文字、钱文砖等等，流行夫妻合葬，部分地区出现了家族葬。随葬陶器有罐、鼎、盆、盒、尊、灯、井、耳杯、盏、案、灶及组件、陶房、陶俑，砚

板、铁削、银指环、玻璃耳珰等，新增陶楼、陶院落等，出现了“长宜子孙”“位至三公”铜镜。

第六期：东汉晚期至魏晋时期。这时期仍流行砖室墓、花纹砖墓，新出现了石板墓，有单室、双室、多室墓，出现了壁画墓，流行夫妻合葬和家族葬，随葬陶器案、炉、仓、虎子、套盒、灯、魁、陶猪、陶房、井、耳杯、灶、尊，或者壶、盘、钵、盘、罐、灶及组件、井、水斗、灯、耳杯、鼎、奁、勺、俎，银指环、五铢钱，新出现了陶虎子、陶魂瓶等，部分墓葬仍有棺床。均有斜坡墓道。

贝墓一般都有棺椁，墓底有排水沟，随葬品很少被盗。早期均为单室单人葬，后出现夫妻异穴合葬，贝墓一般都有打破关系，因为夫妻二人死亡时间有早有晚。后来又出现了夫妻同室合葬。贝墓中也发现过三人合葬现象，而且为一男两女，可能是妻妾关系。西汉晚期开始至东汉时期，一般都为夫妻同室合葬，从东汉时期极少发现夫妻分室合葬。砖室墓有的有葬具，有的没有，晚期出现棺床。东汉晚期又出现了家族葬。

四、结　　语

辽东半岛是两汉墓葬集中分布区，以大连和营口地区分布最多、最为广泛，墓葬形制多样，时代脉络清晰，时代特征突出，不但有平民墓葬，也有规格较高的贵族、官员、商人的墓葬。两汉时期辽东半岛特别是半岛南部沿海地区经济比较发达，商贸繁荣，交通便利，因此富商大贾云集，他们的墓葬比较讲究，随葬铜车马模型成为普遍现象。这在前朝是不允许的，说明前朝森严的车马陪葬制度已经崩坏。这里既有简单的土坑墓、石圹墓、瓦墓，也有规模较大、多墓室的砖室墓、花纹砖墓和石板墓。贝墓包括纯贝墓、贝砖、贝瓦、贝石墓等是辽东半岛沿海地区地方特色，主要流行于西汉时期，极少数延续至东汉早期。东汉时期砖室墓流行，随葬品与中原地区趋向一致，葬俗也大致相同，反映了在汉中央集权统治下天下一统的局面，也体现了汉代社会厚葬习俗和事死如生的观念。辽东半岛汉墓之所以分布广泛，与这一带经济稳定发展、商贸繁荣、交通发达、人们比较富足有密切关系。

注　　释

［1］ a. 于临祥. 旅顺尹家村发现古墓［J］. 文物参考资料，1955（7）.

b. 刘俊勇. 大连尹家村、刁家村汉墓发掘简报［J］. 大连文物，1990（2）.

［2］ 刘俊勇. 旅顺鲁家村发现一处汉代窖藏［J］. 文物资料丛刊（4），1981.

［3］ 于临祥. 旅顺李家沟西汉贝墓［J］. 考古，1965（3）.

［4］ 于临祥. 旅顺市三涧区墓葬清理简报［J］. 考古通讯，1956（2）.

［5］〔日〕东亚考古学会. 牧羊城——南满洲老铁山麓汉及以前遗迹［M］. 东方考古学丛刊（2），1931.
［6］〔日〕东亚考古学会. 南山里——南满洲老铁山麓的汉代砖墓［M］. 东方考古学丛刊（3），1933.
［7］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大连大潘家村西汉墓［J］. 考古，1995（7）.
［8］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 1996.
［9］〔日〕东亚考古学会. 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M］. 东方考古学丛刊（4），1934.
［10］于临祥. 营城子贝墓［J］. 考古学报，1958（4）.
［11］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连沙岗子农科院汉墓发掘纪略［J］. 大连文物，1999.
［12］吴青云. 营城子汉墓发掘简报［J］. 大连文物，2010.
［13］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连土羊高速公路发掘报告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14］a. 许明刚. 旅大市营城子古墓清理［J］. 考古，1959（6）.
b. 许明刚，吴青云. 辽宁大连沙岗子发现二座东汉墓［J］. 考古，1991（2）.
［15］大连市郊营城子发现贝壳墓［J］. 文物参考资料，1955（12）.
［16］旅顺博物馆. 辽宁大连前牧城驿东汉墓［J］. 考古，1986（5）.
［17］刘俊勇，刘金友. 辽宁大连刘家屯西汉贝墓［J］. 博物馆研究，1995（3）.
［18］同［1］a.
［19］〔日〕三宅俊成. 大岭屯城址的考察［J］. 考古学文化论集（4），1997.
［20］见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藏2005年董家沟发掘资料（未发表）.
［21］徐建华. 大连市金州区董家沟东汉墓葬的清理［J］. 考古，2002（6）.
［22］吕伯，晋伯. 金州马圈子汉墓发掘简报［J］. 金州博物馆（创刊号），1990.
［23］刘俊勇. 辽南新金县花儿山汉代贝墓第一次发掘［J］. 文物资料丛刊（4），1981.
［24］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姜屯汉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
［25］戴廷德. 辽宁新金县马山汉代贝墓［J］. 文物资料丛刊（4），1981.
［26］许明刚. 辽宁新金县花儿山张店出土马蹄金［J］. 考古，1984（2）.
［27］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 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J］. 考古，1993（1）.
［28］a. 宋言荣. 瓦房店发现汉魏晋墓152座［N］. 光明日报，1994-6-25.
b. 见大连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陈屯汉墓群发掘资料（未发表）.
［29］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连长兴岛西礓坡墓地发掘简报［J］. 北方文物，2011（3）.
［30］a. 许玉林. 辽宁盖县东汉墓［J］. 文物，1993（4）.
b. 崔艳茹，崔德文. 辽宁营口熊岳镇胜利村汉墓清理简报［J］. 北方文物，2002（1）.
［31］a. 万欣. 辽宁盖州发现大型汉代砖墓和贝壳墓［N］. 中国文物报，2006-7-7：2.
b. 崔艳. 盖州农民村汉墓群发掘简报［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考古文集（2）

［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c. 魏耕耘等. 盖州沙沟子汉墓发掘简报［A］.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考古文集（2）［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
［32］ 闫海. 营口历史与文物论稿［M］. 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2011：147.
［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125，133.
［34］ 同［24］：491.
［35］ 同［24］：493.
［36］ 同［24］：324.
［37］ 同［24］：230.
［38］ 于临祥. 营城子贝墓［J］. 考古学报，1958（4）：73.
［39］ 同［24］：104.
［40］ 同［23］：76.
［41］ 同［3］：154，155.
［42］ 大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大连土羊高速公路发掘报告集［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1.
［43］ 崔艳茹. 盖州农民村汉墓群发掘简报［A］. 辽宁考古文集（2）［C］.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125，128.
［44］ 同［12］.
［45］ 合浦汉代文化博物馆. 南国古郡历史辉煌—合浦馆藏文物精品图录［M］：37.
［46］ 同［11］：61.
［47］ 同［24］：40.
［48］ 许玉林. 辽宁盖县东汉墓［J］. 文物，1993（4）：57.
［49］ 同［24］：126.
［50］ 同［24］：19.
［51］ 同［24］：47.
［52］ 〔日〕东亚考古学会. 营城子——前牧城驿附近的汉代壁画砖墓［M］. 东方考古学丛刊（4），1934.
［53］ 大连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考古队. 辽宁瓦房店市马圈子汉魏晋墓地［J］. 考古，1993（1）：24.
［54］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双砣子与岗上——辽东史前文化的发现和研究. 北京：科学出版社，1996：135，136.
［55］ 白云翔. 战国秦汉时期瓮棺葬研究［J］. 考古学报，2001（3）.

The Stages of Han Tombs on Liaodong Peninsula

Zhang Cuimin

Abstract: On the Liaodong peninsula, shell mound tombs first appeared during the lat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ey became more popular during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becoming the main burial form at that time. Other contemporaneous burial forms, such as earthen pit tombs, stone tombs, and tile tombs were also found in this area; however, the quantity is relatively low. Single and double burials, placed in the tomb either in separate or different shafts, were the most popular burial customs of the Western Han Dynasty. In addition to shell mound tombs, there were some other tomb forms that retained the style of shell mound tombs during the middle-late We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Wang Mang period, including shell-stone tombs, shell-tile tombs, shell-brick tombs, and shell-brick-wood tombs. Husband and wife shared tombs were the prevailing funeral custom in this period. In the early Eastern Han Dynasty, there were still a few shell mound tombs and shell-brick tombs, but brick tombs became more popular. In the middle-late Eastern Han Dynasty, the main tomb forms were brick tombs with one room, two rooms, or multiple rooms. Husband and wife shared tombs were still the main funeral custom. From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to the Wei-Jin Dynasties, in addition to basic brick tombs, there were also patterned brick tombs and tile-stone tombs. Family graves appeared in part of this area, and husband and wife shared tombs were still the prevailing funeral custom during this period. Additionally, children were buried in urn tombs with basically no grave goods. This was a practice carried out from the Warring States Period through the Eastern Han Dynasty.

Han tombs on Liaodong peninsula were large-scale, widely distributed, and numerous, with various types, close temporal relationships, and abundant burial objects. The tombs reflect the developed economy and flourishing material culture at that time, and possess great value for researching the politics, economics, culture, burial customs, and ideology of Liaodong Peninsula during the Han Dynasty.

Key words: Han Dynasty；Shell Mound Tombs；Brick Tombs；Stages

从“门窗”到“桌椅”

——兼议宋金墓葬中“空的空间”*

丁　雨

（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北京，100875）

宋金仿木构墓葬中，后壁的装饰题材，近年来受到较多的关注。研究者们对启门、一桌二椅、墓主人夫妇对（并）坐等题材进行了热烈的探讨。本文试图梳理宋金时期中原北方地区仿木构墓葬材料，探究后壁空间题材的变化与发展，并尝试对墓葬空间部分功能的发挥予以探索。

1. 启门、门、门后的空间

宋元墓葬中的“启门图”是学者们讨论的热点。近年来，围绕启门图，学界关注的焦点是，这个门后的空间是否有具体的指代？指代什么？或者其究竟具有怎样的功能？韩小囡、易晴、李清泉、郑岩、刘未等众多学者，近年来都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不同角度的探讨。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几类，一类考虑到横向同层次墓葬装饰的情境，将之解释为寝[1]；一类联系纵向层次的装饰情境，将之解释为开阴闭阳，通向仙境之途[2]；郑岩则回归到美术史对形式的关注，从形式的角度对这种图式进行了探讨[3]；刘未认为，从假门最初的出现来看，其使用功能应是象征被省略的耳室[4]。

郑岩的研究，将问题关注点由题材内容转向了题材形式。考古学者的研究则致力于描述这一题材的发展变化和时空分布特点。这自然是对研究视角的有力开拓。然而，我们是否仍要回答最初的问题？——我们是否有可能解释这一题材？

我们似乎有必要先回归到学术史，重做审视。假如对学者们的研究稍作总结，或可发现，学界对启门图的关注重点，经历了从“妇人启门”，到“妇人”，到“启”，再到“门”的过程[5]。刘耀辉指出，妇人启门题材，门是问题的关键[6]。刘未指出，妇人启门的前身是晚唐时期开始出现的假门[7]。李雨生亦关注到假门与启门的联系[8]。“门”本身已经受到了重视，但却尚未得到充分的讨论。从图像内容与逻辑来看，在启门图中，门才是意义发生的主体。宿白指出，启门可能表明此后仍有未尽之空

*　本文受到“北京师范大学青年教师基金项目”资助

间[9]。这一观点受到了广泛的认同。而实际上，无论是妇人启门、半启门、门、锁门还是关门，只要有“门”存在，就能担当起隐喻空间的功能，而“启”仅是一个提示性动作。基于此，我们可将出现于相同、相似位置的门类题材，归为一类进行考虑。

从使用情况上看，门的使用远比“启门”频繁。笔者09年曾对中原北方地区宋代139座砖雕墓进行统计，门窗的出现比例是73%[10]。与之相比，同位置的启门图比例远低于门，仅占20%左右[11]。因此，将视角由“启门”扩展至“门”，为我们提供更多了资料基础，亦有可能为我们提供新的启发。

当我们将对“启门”的关注扩展至门之后，或许由此获得对题材内容的一种新的认识途径，即观察那些真正打开的门，究竟要营造出一种怎样的空间。在目前实际的发现中，确实也存在一些被开启的后壁之门。这些门中的情况，似乎不尽相同[12]。

第一类情况：门后空间是放置棺床的小墓室。可以山西壶关县上好牢的M1[13]、河南焦作白庄宋墓[14]等为代表。这些小墓室与白沙宋墓后室的区别在于，白沙宋墓的后室后壁仍然做出了妇人启门，而上好牢宋金墓的后室则另有装饰。同时，上好牢墓地的M3是单室墓，其东西北三面均营造出假门，基本与M1同构，相当于M1的简化。由此，我们或可以认为上好牢M1的后室，正是假门开启后的空间。上好牢宋金墓和河南焦作白庄宋墓的西侧室和后室，均做出棺床，并发现人骨（上好牢M1后室未发现人骨，李清泉认为有其他原因[15]）。且值得注意的是，上好牢的发掘者认为M1后室和侧室所绘人物，全为挂轴条幅式，“从服饰和形象来看，大多应为神仙形象”。此类墓例，似可启发我们重新审视启门图的“寝”说和“仙境”说。

第二类情况：门后空间绘出山水图。以山西闻喜下阳宋金墓[16]、山西壶关县下好牢宋墓[17]为例。闻喜下阳宋金墓的发掘者指出，此墓北壁砌有一板门，“清理时已毁坏”，“两板门原先敞开，中间绘一幅山水画”。此例似已毁无对证。不过山西壶关县下好牢宋墓可为我们提供更翔实的资料。下好牢宋墓纪年为宣和五年（1123年），其墓室结构是在北、西、东三面均有一门二窗，门后均有耳室，三个耳室内均绘制带画框的水墨山峦图。三耳室内砌有棺床。

第三类情况：门后营造出耳室，往往空无一物。此类墓例较多，代表了一种地方风格[18]。如山西壶关南村元祐二年（1087年）墓[19]，北壁两耳室，东西壁各一耳室。发掘者未对耳室壁面情况进行描述，应既无棺床亦无装饰。长治故县村M1[20]墓室四面共计七门，均挖进去形成较半米见方的耳室，不足以容纳尸骨，也无装饰。长治故县村M2纪年为元丰元年(1078年)，东、北两面开门挖成小耳室，门两侧为二窗，西面为假门二窗。河南郏县仝楼村M3为六边形单室墓，北壁正中假门半启，“门后有一龛，进深0.19米，龛内空无一物”。东南、西南壁素面，东北西北壁各有一假窗。

第四类情况：山西新绛南范庄金墓[21]，是较为特殊的情况。此墓后壁、东西壁均有耳室，主室后壁上方壁面为砖雕门楼，砌有板门和二直棂窗。后壁下方为后室门，后室门两侧有武士砖雕。东西壁上方为三合格扇门，下方靠南开耳室门。后室及左右耳室

既无仿木斗拱，也无砖雕装饰。门楼之门构成一门二窗，似是较为典型的可与“启门”对应之门，然而真正开启的门却在下方。

第五类情况：后壁门后题字“后土之神”，此例见于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元墓[22]。发掘者称“东西北三壁中下部都砌有类似于直棂窗的壁龛”，从宋金墓葬常见的图式来看，所营建者应为门。三壁龛内均有题字，北壁为“后土之神”，西壁为“西库”，东壁为“东仓”。值得注意的是，北壁壁龛两侧分别有男女主人像，端坐于椅子上。

以上几类情况，完全可以将我们引向不同的解释路径。而伴随着新的考古发现，可能还有更多可供参考的墓例提供给我们更多的可能性。这些例子的差别，与时间、空间和墓葬营建者本身的理念均有密切关系。有学者根据元墓后壁的题记和墓主人夫妇坐图的出现，来推测晚唐至宋金时期后壁门后隐喻空间的功能。然而，即便仅从以上例子来看，在晚唐、宋初乃至宋金时期的很多墓葬本身的构建中，其墓葬装饰提供的信息，并不足以使人看到明确和整齐划一的意义指向。时代、地域的差别，以及墓葬营建者、赞助人本身的阶层，都可能导致墓葬壁饰中隐喻空间的功能差别。另一方面，我们亦从元代墓葬中发现，愈到晚期，“门”后的空间指向反而愈加清晰，这种情况，竟类似于顾颉刚先生最初疑古时所面对的清晰的历史叙述。晚期墓葬中，虽有清晰的题词提示，但却或许更需要我们在推导时保持谨慎。限定时空范围，在可控范围内寻找可类比的墓例，或许是相对可靠的方法。

此外，近期刊布的山西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23]值得关注。从宿白先生起，学者们就开始思考宋金时期启门图与东汉石棺启门图的关系。最著名的例子莫过于王晖石棺前档的启门图。在最近刊布的这座金墓中，不仅在墓室北侧绘出一门二窗，在墓中的葬具木棺的前档上也绘出了板门。而这具木棺的装饰几乎和王晖石棺的完全重合，即后档饰以玄武，左右棺板分别饰以青龙、白虎，而在前档，王晖石棺刻出带有羽翼的妇人启门，此木棺则绘出朱雀，下为板门。王晖石棺的妇人作为朱雀的拟人形象获得了进一步的佐证。从形式来看，对墓室与棺材的装饰，刚好存在着相反的空间位置。笔者怀疑棺材四面装饰四神，实际是在暗示死者所在位置居中，而将门放在朱雀的位置，则恐与我国将宅门开于南侧的习俗有关。而在墓室中，不仅常常出现四面有门的情况，较为特殊的启门最初还往往出现在北壁。当然若此门打开，则其相对于被打开的空间确实是南面，但墓葬的营建者似乎并不这么认为，如山西长治故县村的M1、M2在四壁也绘出了四神，其玄武就位于北壁。由此而观，墓室中的启门和棺材上所绘的启门，虽有类似的图式，其使用最初或有互相启发的可能，但由于所在载体与空间不同，所代表的意涵可能也发生了变化。而在同一墓葬的墓室和墓棺中，同时出现了“门”这一题材，而各自与门“同层”的装饰，又大相异趣，似更暗示了我们两者意义的不同。这也许正是从整体空间结构出发，所能够带给我们的启示。

门后空间的解释趋于多元，在营建倾向各不相同的墓葬中，我们难以找到对其功

能统一的解释。然而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尽管仿木构墓葬中装饰元素存在着组合内容和组合方式的差异，但前后门对应的营建结构却在获得了广泛的采纳和流传。在笔者看来，晚唐至宋末，以河南为核心的中原北方地区，墓室后壁多用门或门窗，实质上是与墓门对应，处在同一轴线的二者，共同构成模拟现实居住空间的基本要素，在结构上为墓室空间奠定了基调。而这种结构的变异与破坏，或许意味着墓葬营建理念的重大转变。这或许是更值得我们注意的变化。事实上，宋金时期墓室后壁的装饰确实存在另一种弃用门窗的情况，即在后壁装饰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

2. 后壁：关注的焦点

目前学界一般认为，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由一桌二椅发展而来[24]。从北宋初期到北宋中晚期，仿木构砖室墓似乎存在着“人物上墙”的趋势[25]。关于这一题材的讨论，亦始于宿白先生。他将白沙宋墓M1中西壁墓主人并（对）图和东壁伎乐图结合起来，认为其应是文献中所提“开芳宴”。然而，由于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常独立出现，近年来对其又有新的解读。秦大树联系桌子上下所摆物品，和金代段楫墓“永为供养”的题词，认为从一桌二椅到墓主人夫妇对（并）坐，似是墓中灵位[26]；刘耀辉认为，一桌二椅上出现墓主人夫妇像后，才具备了灵位的意义[27]；袁泉认为，在元墓中，逝者肖像是子孙后代永恒祭祀的关键点[28]；易晴指出墓葬中图绘墓主人形象，与世俗生活中用以祖先祭祀的影堂的设置有很大关联[29]，李清泉认为桌椅即为逝者灵魂而设，表达死者对灵魂的供奉[30]。洪知希则通过观察这一题材所在位置的变化，认为这种变化强化了祭祀仪式。

从学者们的研究脉络来看，桌椅或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这一题材的发展，似存在两个值得关注的变化点：桌椅上人物的出现；桌椅或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在墓葬中位置的改变。而这两种改变，则给予我们越来越强烈的提示。到金元时期，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旁出现“永为供养”[31]“祖父之位”[32]“宗祖之位”[33]则将这一题材的内涵进一步具体化。从简单的桌椅，到带标注的墓主人夫妇图像，这一题材图像内容日益丰富而明确，这种“层累的历史”似也值得我们审慎地对待。

一桌二椅或早期的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多存在于侧壁，从北宋末期起，有一些墓葬后壁使用墓主人夫妇对坐图，取代了门窗题材。易晴观察到，河南地区后壁多用门窗，山西地区多用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她基于此将这种差别归为区域差别[34]。洪知希则强调后壁使用门（窗）和使用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的时间差别，认为应进行时空的交叉分析。他通过对建于宋哲宗时期的梁庄墓[35]和1126年宋四郎墓[36]的分析，指明了发生这一变化的最初时间。同时，他认为早期的方式（侧壁使用桌椅或墓主人夫妇题材）到12～13世纪已经相当罕见[37]。

实际上，后壁采用门窗题材，和采用墓主人夫妇对坐图这两种情况，共存了相当

长的时间。即便在后壁流行采用墓主人夫妇对坐图的山西地区，还是有相当数量的墓葬使用了门窗题材。笔者曾统计山西出现的22例启门图例，其中12例启门图出现于后壁。另外又37例带有“门”装饰的墓葬，其中21例门出现于后壁。这表明，即便在山西地区，门或门窗题材在后壁仍有相当大的“市场”。

另外，在仿木构砖室墓流行的核心地区——河南、山西等地，发现过一些后壁装饰同时糅合了门窗和墓主人对（并）坐图的情况。山西闻喜下阳宋金的墓[38]，后壁正中砌板门，门两侧各绘一桌二椅。此墓发现男女人骨各一。山西屯留金墓[39]则似闻喜下阳宋金墓的“加强版”，后壁正中砌板门，门两侧各绘一对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墓被盗扰，葬者情况不明。更具中和形态的是纪年为大定十四年（1174年）的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墓[40]，后壁仍然以门为核心，但是在门两侧却出现了分别出现了墓男主和墓女主，人物背后还各带有一扇屏风，不仅如此，在东西侧壁，墓主夫妇二人又出现了一次。结合这些墓例与上节的统计数据表明，我们或可看出，对前后门对应的墓室结构的突破，恐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漫长的传播和认同过程。

洪知希对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最初出现于西壁、后来转移至北壁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41]。他认为此与宋人影堂中，祖先面对的位置有关。据程颐的记载，当时士人所建家庙，以太祖面东。因此，在白沙宋墓中，我们看到墓主人夫妇位于西壁，面向东方。而由侧壁移至后壁之后，肖像占据了墓室中央，完全融入了专门为死者设计的空间。如前所述，不少学者认为，墓主人夫妇图具有墓主人灵位的意义，并营造出祭祀的氛围。刘未从元墓的例子出发，认为尽管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体现了供养色彩，但葬祭有别，不能将之视为祭祀的模拟[42]。然而尉氏县张氏镇元墓墓门所题“时思堂”，恰与《孝经》之中“春秋祭祀，以时思之”相对应，则墓室模拟祭祀之所的意味已经相当明显。不过，这一质疑，似可作为我们重新审视墓室空间的起点。

除皇家陵寝之外，宋金时期，民间的仿木构砖室墓一般尺寸不大，如白沙宋墓墓门虽通高3.68米，但去除掉门口部分，甬道内地面至顶仅1.5米，宽0.91米，仅容人矮身而过。而前室长1.84米，宽2.28米[43]，面积仅4平方米。事实上，墓室面积较小，是当时仿木构砖室墓中较为普遍的情况。这么小的墓室空间，几乎刚够放置尸骨，几乎不太能容纳葬礼的参加者在墓室内部进行祭祀活动。除此之外，墓室空间还具有封闭性。当其在葬礼结束之后，墓门封住，还会垒砌二至三层封门砖，从而完全封闭这一空间。另外，宿白先生在白沙宋墓中指出，这些墓和土洞墓一样[44]，是先有土洞，再在里面砌砖。有研究者指出，有些墓可能是在墓顶开天井，用作取光[45]。即便如此，在为墓顶绘图的时候，依然要封住墓顶，在黑暗中作画。因此，从这个角度来看，墓室空间近似于一个隐秘而不对外开放的空间。墓室狭小黑暗，且完全封闭。这表明墓室主要用途并非是生人开展供养或祭祀活动的场所。墓室空间的壁画在完成、验货、丧葬礼仪完成后，基本上不对生人开放。这种情况似乎表明，墓室在封住之后，就完全成为了一个和

生人隔绝的空间。虽然段楫墓预修墓记中明确提出“以为后代子孙祭祀之所”[46]，但实际的祭祀或供养，显然无法在墓室之中发生。然而，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及其所在的位置，乃至题记，又确实表现出供养或祭祀的氛围。那么，或许我们需要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封闭的空间之中，供养或祭祀的氛围，如何发挥自己的功能？

3. “空的空间”：由表演者缺位而引发的假设

“空的空间”是彼得·布鲁克的戏剧理论：“我可以选取任何一个空间，称它为空荡的舞台，一个人在别人的注视之下走过这个空间，这就足以构成一幕戏剧了。”[47]这个理论的提出，强调摆脱繁复的剧场布景，通过演员富于想象力的表演和观众富于想象力的观赏，达成的戏剧状态。

丧葬从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仪式，戏剧的某种源头也与祭祀仪式有关。两者或可类比。在晚唐宋金的仿木构墓葬中，也存在“空的空间”，但情境设置恰好相反。通过雕出微缩的桌椅、人物，形成图像逻辑，留下了丰富的“布景”，然而作为“观众”的考古者在发现墓葬时，已经不再有动态的“表演过程”——丧葬礼仪包含的种种程序，这形成了另一种“空的空间”——没有动态“演员”的空间。具体到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这一题材所营造出的供养、祭祀氛围，对比正常的祭祀过程，墓室中具备了被祭祀的对象，在不少墓例中，还具备相当齐备的祭祀设施和“布景”。唯独缺少的是，参加祭祀的孝子贤孙们。而在墓葬的砖雕壁饰之中，我们也鲜见孝子贤孙的形象。那么这些本该存在的孝子贤孙在哪里呢？为什么不在墓葬中画出祭拜孝子贤孙的形象呢？

弗雷泽通过考察世界多个民族的宗教习惯与仪式，提炼出顺势巫术的两种形式，一种为模拟律，一种为接触律[48]。前者通过模拟事物来发挥巫术的功能，而后者则通过接触。模拟巫术在我国源远流长，各朝宫廷中常常有用以陷害他人的巫蛊之术，实际就是用木头、布料等制造小人，来对目标对象进行诅咒。如易晴、洪知希等人所述，墓主人夫妇对（并）坐图与对家庙、影堂的模拟密切相关。而庶人的影堂、士人的家庙，正是孝子贤孙进行丧仪、祭祀的真正地点。笔者推测，在墓室中制造出同样的场景，其背后隐藏的逻辑，有可能是通过模拟巫术的方式，使地上与地下相似情境相同，从而达到或强化阴阳相通、祭祀祖先的效果。刘未在质疑“祭祀说”之后提出，金元战乱期间，绘制祖先画像具有承载记忆、家族重建的意义；元墓中的标识牌位的做法受此时代背景之影响[49]。然而如前文所分析，墓室空间的封闭性，实际上能够消解其承载记忆的功能。而借重于顺势巫术理论，这种标识的存在则更为合乎逻辑。因为在真正发生祭祀的场所，标识姓名和悬挂画像均能够发挥承载记忆的功能。

4. 余论

宋金仿木构墓葬所营造的墓室氛围，具有多重矛盾、多元寄托的特点。在一些墓葬中，如黑山沟宋墓[50]中，墓葬壁饰的上下层次表现出现实与理想寄托的呼应。在众多墓葬的壁饰中，我们既能看到子孙通过孝行图对长辈的“孝”，又能从东仓西库的营建看到“福荫子孙”[51]的“慈”。封门砖的垒砌，即表达了阴阳的隔绝和墓室的封闭性，墓门和假门的营造又隐喻着地下空间的开放性。丧葬仪式要用多次痛哭来表达内心的悲戚[52]，而墓葬壁画中又用伎乐杂剧来营造“乐”的氛围。即便具体到壁饰现实层次的壁画内容，我们也能看到内与外、宅与庭等种种相对的概念。这些表面看似矛盾的概念，集中出现于狭小黑暗的墓室之中，表达出时人对丧葬的多元理解和多重寄托。这使得在很多时候，我们在内容功能意义上的解释，无法达成一致的结论。

然而，假如我们全面审视宋金时期的墓葬资料，则或可在结构层面，发现一些统一的规律。门窗题材的意义，虽然在功能解释层面尚未能够达成共识，但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后壁的这类题材，在一定时期内，在以豫西、晋南为核心区域的很多墓葬中，与墓门一起，构成了墓室基本的空间结构。尽管墓葬壁饰可能根据需求，会采用不同的题材组合，但这些组合，均在前后门构成的墓室基本结构之内展开。这一情况表达了当时一些区域人群对这一结构的认可。

笔者认为，后壁题材由门窗向墓主人夫妇对（并）坐的转变，表明了时人对墓室空间理解的变化。从整体结构来看，营建者似不再着力强调墓室前后对应的结构，转而强调以墓主人夫妇画像为核心的某些功能。这种情况的发生发展，经历了漫长的过程，甚至出现了一些糅合的形态。在宋金时代，虽在一定区域内形成了一定的潮流，但并未完全替代前后门对应这一营建结构。

重新审视以墓主人夫妇为核心的墓室结构，其似乎确实如大多数学者所分析，营造出了供养、祭祀的氛围。但若考虑到墓室的封闭与黑暗，则墓室营造出祭祀氛围的原因和这种氛围发生功能的方法，则成为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笔者看来，墓室空间作为丧葬仪式的“静态断面”空间，其仅拥有单向的墓主人形象，却缺失了丧葬仪式的参与者形象，这使得墓葬壁饰营造的场景，难以构成完整的仪式画面。考虑墓主人夫妇图像为核心的壁饰系统对影堂、家庙这些真正祭祀之所的模拟，笔者推测，其背后的营建逻辑可能包含弗雷泽所提出的顺势巫术原理。

注　释

[1] 李清泉. 空间逻辑与视觉意味［J］. 美术学报，2012（2）：5～25.

[2] a. 易晴. 河南登封黑山沟北宋砖雕壁画墓图像构成研究［D］. 中央美术学院博士学位论文，2007：109.

b. 梁白泉. 墓饰“妇人启门”含义蠡测［A］. 艺术学界（6）［M］. 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2011：63～73.

［3］ 郑岩. 论“半启门”［A］. 逝者的面具［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378～419.

［4］ 刘未. 门窗、桌椅及其他［A］.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227～252.

［5］ 参见郑岩、丁雨对之前各家观点的综述. a. 同［3］. b. 丁雨. 宋墓启门图初步探讨［A］. 2011年北京大学美术学博士生国际学术论坛论文集［C］.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43～61.

［6］ 刘耀辉. 晋南地区宋金墓葬研究［D］. 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33～34.

［7］ 同［4］.

［8］ 李雨生. 北方地区中晚唐墓葬研究［D］.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3：173～177.

［9］ 宿白. 白沙宋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2：42.

［10］ 丁雨. 中原北方地区宋墓的定量视角及相关问题浅析［D］. 北京大学学士学位论文，2009：15.

［11］ 笔者较为全面地收集了2012年之前发表的宋金墓葬中出土的“启门”墓例. 在中原北方地区，宋墓33座，金墓34座，出现了启门图像. 据韩小囡统计，2006年时，共发表有宋代砖石雕壁画墓240座，排除掉南方地区，北方地区约有170座；陈章龙2010年进行北方宋墓装饰研究时，共收集墓例157座. 若将目前的考古发现情况看做是一种抽样结果，综合这些统计情况，那么启门图的出现频率占到20%左右.

［12］ 笔者在此暂时排除了如白沙宋墓M1前后室同等规模同等营造的情况，而只列举由门衍生的附属空间.

［1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等. 山西壶关县上好牢村宋金时期墓葬［J］. 考古，2012（4）：48～55.

［14］ 焦作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焦作白庄宋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博，2009（1）：18～24.

［15］ 李清泉. 墓葬与死者之间——叩问壶关上好牢1号墓的话语逻辑，未刊稿.

［16］ 闻喜县博物馆. 山西闻喜下阳宋金时期墓［J］. 文物，1990（5）：86～88.

［17］ 王进先. 山西壶关下好牢宋墓［J］. 文物，2002（5）：42～55.

［18］ 秦大树. 宋元明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44. 刘未. 门窗、桌椅及其他［A］. 古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227.

［19］ a. 王进先. 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J］. 文物，1997（2）：44～54.
b. 赵超. 山西壶关南村宋代砖雕墓砖雕题材试析［J］. 文物，1998（5）：41～50.

［20］ 朱晓芳等. 长治故县村宋代壁画墓［J］. 文物，2005（4）：51～61.

［21］ 山西考古研究所. 山西新绛南范庄、吴岭庄金元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3（1）：65～72.

［22］ 开封市文物工作队. 河南尉氏县张氏镇宋墓发掘简报［J］. 华夏考古，2006（3）：13～18. 刘未论证此墓应为元墓，笔者认同. 详见刘未. 尉氏元代壁画墓札记［J］. 故宫博物院院刊，2007（3）：40～52. 虽然本文主要讨论宋金墓葬，但将此墓列入类型，或可作为时间序列

上，后壁空间变化的一种途径作为参考.

［23］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繁峙南关村金代壁画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15（1）：3～19、61.

［24］ a. 秦大树. 宋元明考古［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145，146.
b. 张鹏. 勉世与娱情［J］. 美术研究，2010（4）：55～64.
c. 李清泉. “一堂家庆”的新意象［J］. 美术学报，2013（2）：18～30.

［25］ a. 同［24］a.
b. 丁雨. 浅议宋金墓葬中的启门图［J］. 考古与文物，2015（1）：81～91.

［26］ 同［24］a.

［27］ 同［6］：28.

［28］ 袁泉. 从墓葬中的“茶酒题材”看元代丧祭文化［J］. 边疆考古研究，2007（6）：329～349.

［29］ 易晴. 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J］. 中原文物，2011（2）：73～80.

［30］ 李清泉. “一堂家庆”的新意象［J］. 美术学报，2013（2）：18～30.

［31］ 参见袁泉. 宋金墓葬“猫雀”题材考［J］. 考古与文物，2008（4）：105～112.

［32］ 山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山西文水北峪口的一座古墓［J］. 考古，1961（3）：136～141.

［33］ 商彤流等. 山西交城县的一座元代石室墓［J］. 文物季刊，1996（4）：23～29.

［34］ 易晴. 宋金中原地区壁画墓“墓主人对（并）坐”图像探析［J］. 中原文物，2011（2）：73～80.

［35］ 洛阳文物工作队. 河南新安县梁庄北宋壁画墓［J］. 考古与文物，1996（4）：8～14.

［36］ 洛阳市文物管理局等. 洛阳古代墓葬壁画［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0：398～409.

［37］ 洪知希. “恒在”中的葬仪：宋元时期中原墓葬的仪礼时间［A］. 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196～226.

［38］ 闻喜县博物馆. 山西闻喜下阳宋金时期墓［J］. 文物，1990（5）：86～88.

［39］ 朱晓芳. 山西屯留宋村金代壁画墓［J］. 文物，2008（8）：55～62.

［40］ 朱晓芳. 山西长子县小关村金代纪年壁画墓［J］. 文物，2008（10）：60～69.

［41］ 洪知希. “恒在”中的葬仪：宋元时期中原墓葬的仪礼时间［A］. 代墓葬美术研究・第三辑［M］. 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15：196～226.

［42］ 同［4］.

［43］ 同［9］：27，28.

［44］ 同［9］：25.

［45］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侯马工作站. 山西稷山马村4号墓［J］. 文物季刊，1997（4）：41～50.

［46］ 山西省考古研究所. 山西稷山金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3（1）：45～63.

［47］ 〔英〕彼得・布鲁克. 空的空间［M］. 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3.

［48］ 〔英〕弗雷泽著，徐育新等译. 金枝［M］. 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6.

［49］ 同［4］.
［5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 河南登封黑山沟宋代壁画墓［J］. 文物，2001（10）：60～66.
［51］ 袁泉. 蒙元时期中原北方地区墓葬研究［D］. 北京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9：195～197.
［52］ 司马光. 书仪［M］. 清雍正刻本.

From "doors and windows" to "tables and chairs"

——Discussions on Song and Jin tombs "empty space"

Ding Yu

Abstract: This article mainly discusses the posterior wall of Song and Jin imitation wooden tomb. According to the current information, we can use the "Alternative comparison method" to explore the possibility of space behind doors and window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e space behind the doors and windows is difficult to obtain using a unified interpretation of at the functional and meaning level, what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is structural change of the rear walls' decorative theme, as the center of the tomb. From the structural changes from the "doors and windows" to the "tables and chairs", it may show the changes of emphasis of the tomb space. Take the "tables and chairs" (the tomb owner couple may sit on the same side or not) as the core of the tombs, emphasizing the space atmosphere of sacrifice and support. But this paper speculates that in the closed space, the effect of corresponding function may need to rely on the logic of sorcery.

Key words: Doors and windows; Tables and chairs; tomb owner couple; structure; "empty space"

关于北魏“泰常八年长城”的质疑

张文平

（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呼和浩特，010011）

以前关于北魏长城的研究，多认为北魏于泰常八年（423年）曾修筑过一条东西向的长城，命名为“泰常八年长城”。史料依据主要是《魏书·太宗纪》的一条记载：泰常八年“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 后来的调查者和研究者并没有能够确认这道长城的相关遗迹，于是认为其或沿用了战国赵北长城[1]，或沿用了阴山秦汉长城[2]。

阴山山脉自古以来是一条重要的南北分界线，其山口地带尤其是南北防御之要冲，所以山口处通过会有几个时代的防御设施。战国赵北长城主要分布于阴山南麓地带，长城墙体沿线发现的遗物以战国秦汉时期为主，个别所见北魏遗物并不能成为“泰常八年长城沿用战国赵北长城说”的主要证据。北魏太和十八年（494年），郦道元随孝文帝拓跋宏北巡，看到了绵延于今大青山蜈蚣坝山前地带的战国赵北长城墙体，“顾瞻左右，山椒之上，有垣若颓基焉。沿溪亘岭，东西无极，疑赵武灵王之所筑也。”[3]这段长城的确是战国赵武灵王时期修筑的赵北长城，郦道元当时看到的已经是作为历史陈迹的残垣了。这也从史料学方面证明，北魏并没有利用战国赵北长城。阴山秦汉长城沿线，同样不见北魏沿用遗存。

那么，北魏“泰常八年长城”究竟在哪里呢？还需要从史料中寻找答案。首先，如果北魏于泰常八年修筑了长城的话，这段长城仅限于长川之南。《魏书·太宗纪》的这段记载需要重新标点：“二月戊辰，筑长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从赤城至五原之间，北魏并没有全线修筑长城，而只是“备置戍卫”。长川为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市兴和县东洋河上游的南北向川地，在这一区域之内迄今尚未发现北魏长城，只是发现了北魏的长川城（今兴和县元山子土城子古城）[4]。重新审视这条史料，是不是前人理解有误呢？可否作如下释读：“二月戊辰，筑长（川）城于长川之南。起自赤城，西至五原，延袤二千余里，备置戍卫。”《魏书·天象志》的记载亦支持后者：泰常“八年春，筑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置守卒，以备蠕蠕。”如果泰常八年修筑的是长川城，这里讲的是长川城距离五原城二千余里。从北魏五原城（今包头市九原区孟家梁古城）到长川城，直线距离约350千米；从五原城到今河北省赤城县，直线距离约500千米。看来，“延袤二千余里”说的大致还

是五原至赤城间的距离。《魏书·天象志》记载的长城“距五原二千余里”的信息并不准确，属于误抄误记；但透露出的一个信息是，北魏并不存在赤城至五原的长城，只有“距五原二千余里”的“长（川）城”。

长川城仅见于《水经注》的记载，而不见于《魏书》。翻检《魏书》，有关“长城”的记载较多，除现代意义上的“长城”外，还有郡县名、人名等。如《魏书·地形志》中，原州有长城郡，北华州中部郡有长城县；如《魏书·穆崇列传》中，有兄弟二人，兄长名平城，弟弟名长城。上述兄弟二人是否是以城邑名作为名字呢？这是非常有可能的。北魏时期，叫“川”的地名非常普遍，通常指大范围的平原地形，如长川、牛川、云中川、大宁川等。建于川地的城邑，多以川为名，如牛川有牛都，云中川有云中镇，大宁川有大宁城。建于长川的城邑理所当然就叫长城，长川城或许只是一个后起的俗称而已。

如此看来，《魏书》关于“筑长城于长川之南”的记载是确凿的。长城作为一座城邑，修筑于泰常八年，即位于今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张家村中的元山子土城子古城。同时，北魏在燕山至阴山一线的赤城至五原之间构建了一道戍卫线，通过考古调查，结合史料记载，初步推断这道戍卫线主要由一系列戍城组成。这些戍城，在《魏书》《水经注》的记载中零散可见，考古调查亦有所发现，自东向西包括赤城、大宁城、长城、参合城、武要城、白道城、塞泉城、五原城等，形成了燕山-阴山以南的一个戍城带。

赤城位于今河北省赤城县县城之内，坐落于白河河谷宽敞处，该区域历史上一直为扼守白河谷地的军事要地。赤城最早见于《水经注·沽河》记载：“沽水又西南，迳赤城东。赵建武年，并州刺史王霸为燕所败，退保此城”。据《资治通鉴》记载，此事发生于后赵建武九年（东晋康帝建元二年，344年）[5]。北魏登国二年（387年），道武帝拓跋珪巡幸至此[6]。可见，赤城在泰常八年之前已经存在。明代宣德五年（1430年）其地又建赤城堡，清代设县一直沿袭至今[7]。北朝时期的赤城，今天全然不存。从赤城溯河北上，有著名的独石，在独石南有猫峪堡古城，经考证为北魏御夷镇旧址[8]。可见，白河河谷是北魏王朝在燕山地区南北防御的要道。在今河套地区南流黄河西岸，北魏还有一个赤城，所以东部的赤城亦称东赤城。

赤城以西有大宁城，旧址约在今河北省张家口市南郊一带，东去赤城约80千米。大宁城西北方向，《水经注·漯水》记载有小宁城，今址约在张家口市万全县县城一带。

大宁城向西为长城，为兴和县元山子土城子古城，东去大宁城约95千米。《水经注·漯水》关于于延水源头，有“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的记载[9]。于延水为今东洋河，根据实际考古调查成果，柔玄镇为今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克里孟古城。东洋河源头流经长川城南一带，但长川城在柔玄镇东，并非柔玄镇西，所以《水经注·漯水》记载的“水出塞外柔玄镇西长川城南小山”一语，正确与讹误并存，可修正为“水出塞外柔玄镇东长川城南小山”。

元山子土城子古城位于兴和县民族团结乡张家村村中，东部为山脉，南部为丘陵，城南有座小山叫元山子，西、北两侧为开阔的川地。自胜利水库下来的一条河自西北向东南流，鸳鸯河自东北向西南流，两河于古城南交汇，交汇之后的河称为后河，属于东洋河上游支流。因现代村落建于城内，城址受破坏较为严重，但四面城墙仍存。城址平面呈不规则四边形，东墙长390米，南墙长380米，西墙长330米，北墙长400米。城墙为夯筑土墙，北墙东段和东墙北段保存较好，墙体底宽6～20米，顶宽约3米，残高2～4米。门址不清。除城区西南角保留一座土筑台基址外，因村落建设，其他相关遗迹俱已消失（图一）。古城地表散布遗物较丰富，有束颈陶壶残片和饰戳印纹、水波纹、凹弦纹、网格状暗纹的陶片等，均具有典型的北魏特征。亦有部分金元时期的瓷片，如白瓷罐、碗等，表明古城中在金元时期有人类活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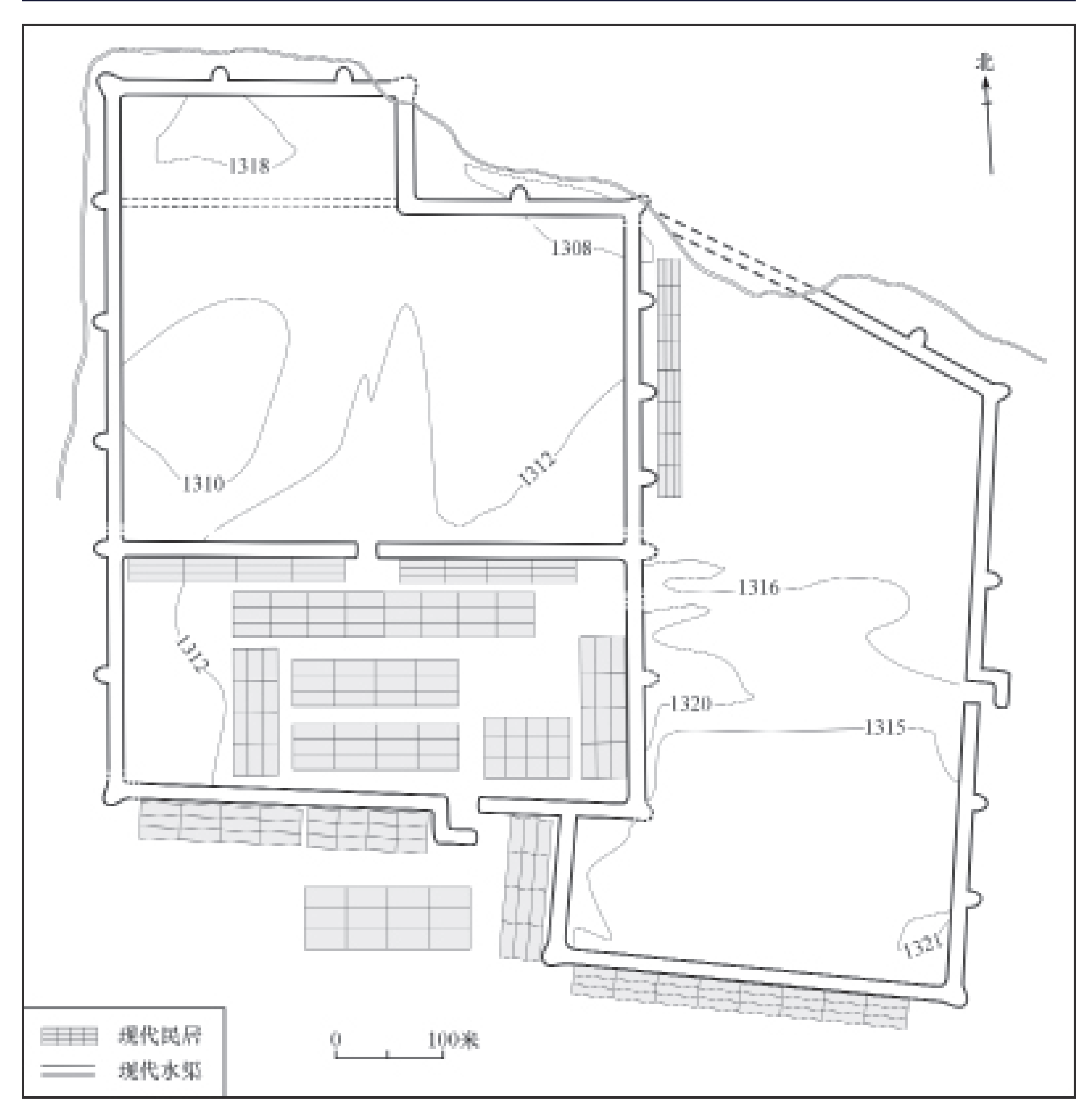
图一　元山子土城子古城平面图

元山子土城子古城北略偏东33千米处为河北省尚义县哈拉沟古城，该古城只能是柔玄镇之东的怀荒镇。长川城、怀荒镇南北一线，为《魏书》屡有记载的长川，是阴山山脉与燕山山脉之间的一个南北向平川区；从长川向南、向东进入洋河谷地，即代谷。220年，拓跋力微依附于没鹿回部，曾率部驻牧长川。北魏建立后，长川为北出漠南的重要通道之一，明元帝拓跋嗣泰常二年（417年）开始临幸长川，太武帝拓跋焘曾于长川筑马射台。

今察右前旗黄旗海为北朝参合陂，参合陂北应有一座北魏戍城，或名为参合城。在《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中，察右前旗黄旗海西北有一处北魏遗址，位于三号地乡土城子村东北约750米，名为土城东遗址[10]；土城子村西北约400米处有一处金、元时期的古城遗址，名为城卜子城址[11]。2015年秋天，笔者对这两处遗址作了复查，地表均已不见相关遗存；后向乌兰察布市察右前旗文物管理所相关业务人员问询，他们说在20世纪80年代的第二次全国文物普查中，的确在这一区域之内曾经看到过城墙遗迹。初步推断，该古城的情况与长川城类似，北魏时期的城邑为金、元沿用；土城东遗址与城卜子城址应该只是一个遗址，分布于土城子村附近，相关遗存遭村庄建设与耕地开垦破坏不存，暂名为之三号地土城子古城。参合城东去长川城约65千米。

从参合城向西，有武要城，为今卓资县三道营古城。三道营古城西城为西汉定襄郡武要县兼定襄郡东部都尉治所，东城为北魏时期新筑，并同时加筑沿用了西城（图二）。据《魏书·太祖纪》记载，道武帝拓跋珪于天赐三年（406年）八月“丙辰，西登武要北原，观九十九泉，造石亭，遂之石漠”。由此可见，北魏时期仍知三道营古城为汉代武要县，以此推断泰常八年加筑之戍城名为武要城。武要城东去参合城约60千米。

白道城为今呼和浩特市回民区坝口子古城，沿用自秦汉云中郡武泉县。白道城东去武要城约63千米。塞泉城为今包头市土默特右旗东老丈营古城，沿用自西汉五原郡蒲泽县。塞泉城位于白道城与五原城之间，五原城为今包头市九原区孟家梁古城。孟家梁古城位于包钢废钢厂院内，遗迹已破坏无存。早期的调查资料，对其形制、时代描述不一。描述较为详细的是，古城平面呈倒梯形，南北长440米，南墙宽340米，北墙宽380米；或认为是汉代古城，或认为是北朝古城，甚至或晚至隋唐[12]。从以前古城采集遗物分析，有人推测为北朝后期的军事性防御城址，有一定道理[13]。古城平面形制不规整，与北魏城址的特点有一定相似性。据《水经注》记载，“阚骃曰：五原西南六十里，今世谓之石崖城。”[14]石崖城沿用自汉代五原郡宜梁县旧址，为今达拉特旗二狗湾古城，从二狗湾古城向东北至孟家梁古城的直线距离为22千米，与北魏六十里大致相合。五原屡见于《魏书》记载，是北魏皇帝的阴山巡幸地之一，孟家梁古城应即北魏五原城。孟家梁古城地处昆都仑河西岸，北距昆都仑沟沟口9千米，东南距麻池古城（秦代九原郡郡治九原县、汉代五原郡郡治九原县）6.5千米，地扼险要。从五原城溯昆都



图二　三道营古城平面图

仑河北上，北偏东约70千米处，为北魏怀朔镇镇址白灵淖城圐圙古城。

由此可见，燕山—阴山戍卫线的各座戍城，自东向西大体均匀地分布于燕山山脉至阴山山脉山前一线。在燕山—阴山戍卫线以南，据《水经注》记载，沿着黄河两岸亦有类似戍城，如石崖城、赤城、昆新城等。赤城在今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南流黄河西岸，地处浑河入黄河口处之北的黄河对岸，昆新城在今呼和浩特市清水河县清水河汇入浑河之后的浑河北岸，与赤城隔河相望，著名的君子津或即位于二城之间。赤城、昆新城今址，均无考。

北魏迁都平城之后，为了防御漠北新兴的柔然汗国，于泰常八年（423年）在燕

山—阴山一线构筑了一道以戍城为主的戍卫线。此后，从5世纪30年代开始，于燕山—阴山以北的漠南草原陆续构筑了六镇。太平真君七年至九年（446～448年），北魏又修筑有畿上塞围。畿上塞围以两两相望的烽戍为主，分布于代谷以北、参合陂以北、今蒙晋交界处及其以北一带，与泰常八年燕山—阴山戍卫线的戍城形成了协同防御之势。

注　　释

［1］ a. 艾冲. 北朝诸国长城新考［C］. 长城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
b. 郭建中. 北魏泰常八年长城寻踪［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6（1）.

［2］ 李逸友. 中国北方长城考述［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1（1）.

［3］ （北魏）郦道元. 水经注［M］. 陈桥驿校. 北京：中华书局，2007：79.

［4］ 常谦. 北魏长川古城遗址考略［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1）.

［5］ （宋）司马光等. 资治通鉴（卷268）［M］. 北京：中华书局，1997：8769.

［6］ （北齐）魏收. 魏书・太祖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4：22.

［7］ 孙靖国. 张家口地区古城旧堡踏勘报告［J］. 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4（2）.

［8］ 成一农. 太和年间北魏御夷镇初探［C］. 北大史学（第五集）.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9］ 同［3］：319.

［10］ 国家文物局主编. 中国文物地图集・内蒙古自治区分册（下册）［M］. 西安：西安地图出版社，2003：510.

［11］ 同［10］：514.

［12］ a. 郭建中，车日格. 黄河包头段沿岸汉代古城考［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7（1）.
b. 同［10］：61.

［13］ 张郁. 中受降城址初探［C］. 包头市文物管理处编. 包头文物考古文集（下册）. 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

［14］ 同［3］：77.

The question About “the Great Wall of eight years of Tai Chang”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Zhang Wenping

Abstract: Previous studies on the Great Wall i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were based on the “Book of Wei”. It was believed that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had built a defensive the Great

Wall in eight years of Tai Chang (423 years). In the field investigation, Never found the related remains of The Great Wall. Based on the re-analysis of historical data, this paper studies “长城” which was built at south of the Chang Chuan in eight years of Tai Chang. It is not the modern sense of the the Great Wall, but a city name of Chang City, That is Chang Chuan city recorded in “shuijingzhu”. From then on, the Northern Wei Dynasty in eight years of Tai Chang, except built Chang Chuan city, but also along the Yanshan and Yinshan lines, set up a garrison city based defense line.

Key words: the Great Wall in eight years of Tai Chang; Chang Chuan; Chang City; Chang Chuan city

丝绸之路中亚段古代城市之考察

刘　未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考古文博系，北京，100872）

2014年11～12月，随敦煌吐鲁番学会丝绸之路专业委员会赴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考察丝绸之路中亚段古代城市遗迹。归来选择所经之尼萨、木鹿、片治肯特、半制、碎叶、怛逻斯，及未能成行之阿弗拉西阿卜，共计7城，综合考古及文献资料，对其概况作以简要考察。

一、尼　　萨

尼萨（Nisa）城址位于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阿什哈巴德市西偏北12千米处，背倚科佩特达格（Kopet Dag）山脉，面朝卡拉库姆（Qara Qum）沙漠。城分新旧二所，旧尼萨（Staraia Nisa）在东南，为宫庙区；新尼萨（Novaia Nisa）在西北，为居住区，两者相距1.5千米，中隔现代村落巴吉尔（Bagyr）。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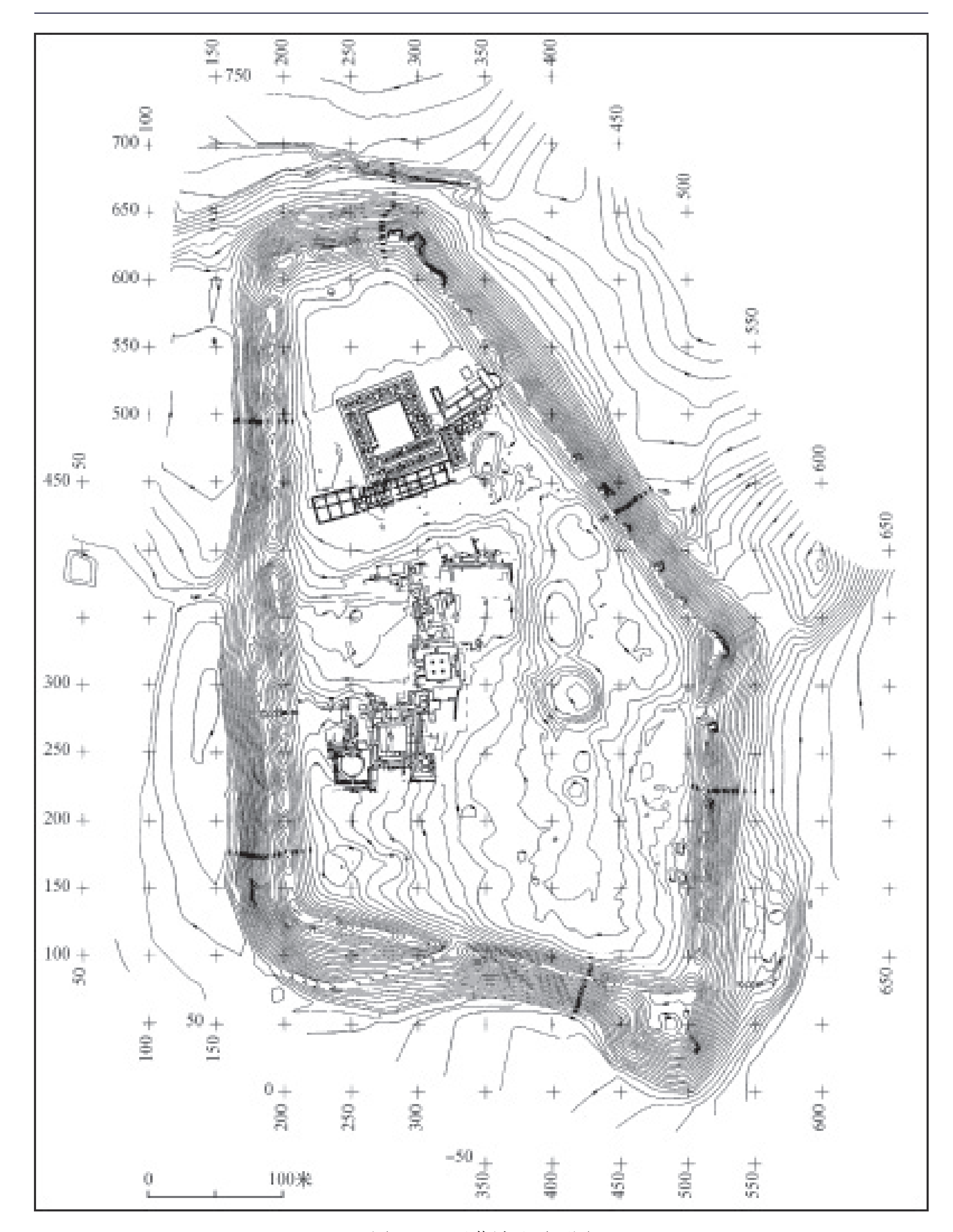
尼萨为公元前3世纪中期所兴起安息（帕提亚）帝国都城之一，控遏汉与罗马间陆上丝绸之路。《汉书·西域传》云[1]：

> 安息国，王治番兜城，去长安万一千六百里。不属都护。北与康居、东与乌弋山离、西与条支接。土地风气，物类所有，民俗与乌弋、罽宾同。亦以银为钱，文独为王面，幕为夫人面。王死辄更铸钱。有大马爵。其属小大数百城，地方数千里，最大国也。临妫水，商贾车船行旁国。

此所谓番兜城，应即指尼萨[2]。

旧尼萨考古工作始于1930年代。分为1930～1931年、1934～1936年两个阶段，由马鲁先科（A. A. Marushchenko）主持。1946～1967年，马松（M. E. Masson）领导南土库曼斯坦考古队发掘。1979年起，皮利普科（V. N. Pilipko）组织土库曼帕提亚考古队重新开展工作。随后，小马松（V. M. Masson）和科舍伦科（G. A. Koshelenko）的两支考古队也参与其中[3]。1990年起，因维尼奇（Antonio Invernizzi）和利波利斯（Carlo Lippolis）所率意大利都灵考古队加入发掘并持续至今[4]。

城址平面作五边形，南北长约500米，东西宽约300米（图一）。城垣外设43座塔



图一　旧尼萨城址平面图

（*Sculture di metallo da Nisa: Cultura greca e cultura iranica in Partia*，第3页）

楼，城门数目及位置不甚清楚，较为肯定一门位于西垣北段。城内建筑群整体靠近西半部，又可分为北、中、南三组（彩版二，1）。北组核心为一规模较大方形建筑（Big Square Building），中为天井，四周绕以房间，每面三间，另有附属建筑。此组建筑出土大量精品文物，包括爱神阿芙洛狄特（Aphrodite）石像[5]，其子厄洛斯（Eros）及雅典娜（Athena）、斯芬克斯（Sphinx）、塞壬（Siren）、格里芬（Griffin）等金属像[6]，雕有奥林匹斯山十二神、酒神狄俄尼索斯（Dionysus）祭典等题材的象牙来通（rithon）等[7]。南组与北组形制、规模接近，边长约50米，亦为中设天井、四面环绕房间之较大方形建筑[8]。中组形态较为复杂，由五个部分构成：塔楼式建筑（Tower Building），偏南主体部分残存巨大方形底座，边长约20米，四面绕以回廊；偏北另有柱厅及半开放式柱廊；以上两部分建筑之外东南西三面再绕以回廊。圆厅（Round Hall），外方内圆，直径约17米，留有三门，壁面原应布置一周半露砖柱及黏土塑像，上设穹顶，似具祠庙性质（或以为陵墓）[9]。红房（Red Building），偏南主体部分为一长方形厅堂，南北长17、东西宽15米，配有四只石础木柱，东北西三面绕以房间；偏北有一东西宽约20米横长方形半开放式柱廊，两侧配有房间；两部分以外东南西三面绕以回廊。方厅（Square Hall），规模较红房柱厅稍大，以四只砖柱支撑屋顶，出土有戎装人物黏土塑像等[10]（彩版二，2）。另有东北部建筑，可能属宫殿性质（图二）。

新尼萨平面作不规则五边形，南北长约600米，东西宽约400米，规模较旧尼萨稍大[11]（图三）。东南部高地有内城，南北长约170米，东西宽约250米。旧尼萨在阿萨希斯王朝灭亡后毁废，而新尼萨则沿用时间较长，9～12世纪还一度繁盛，虽经蒙古入侵，仍未摧毁，乃至出土有15、16世纪之交中国景德镇舶来精美青花瓷器[12]。

二、木　　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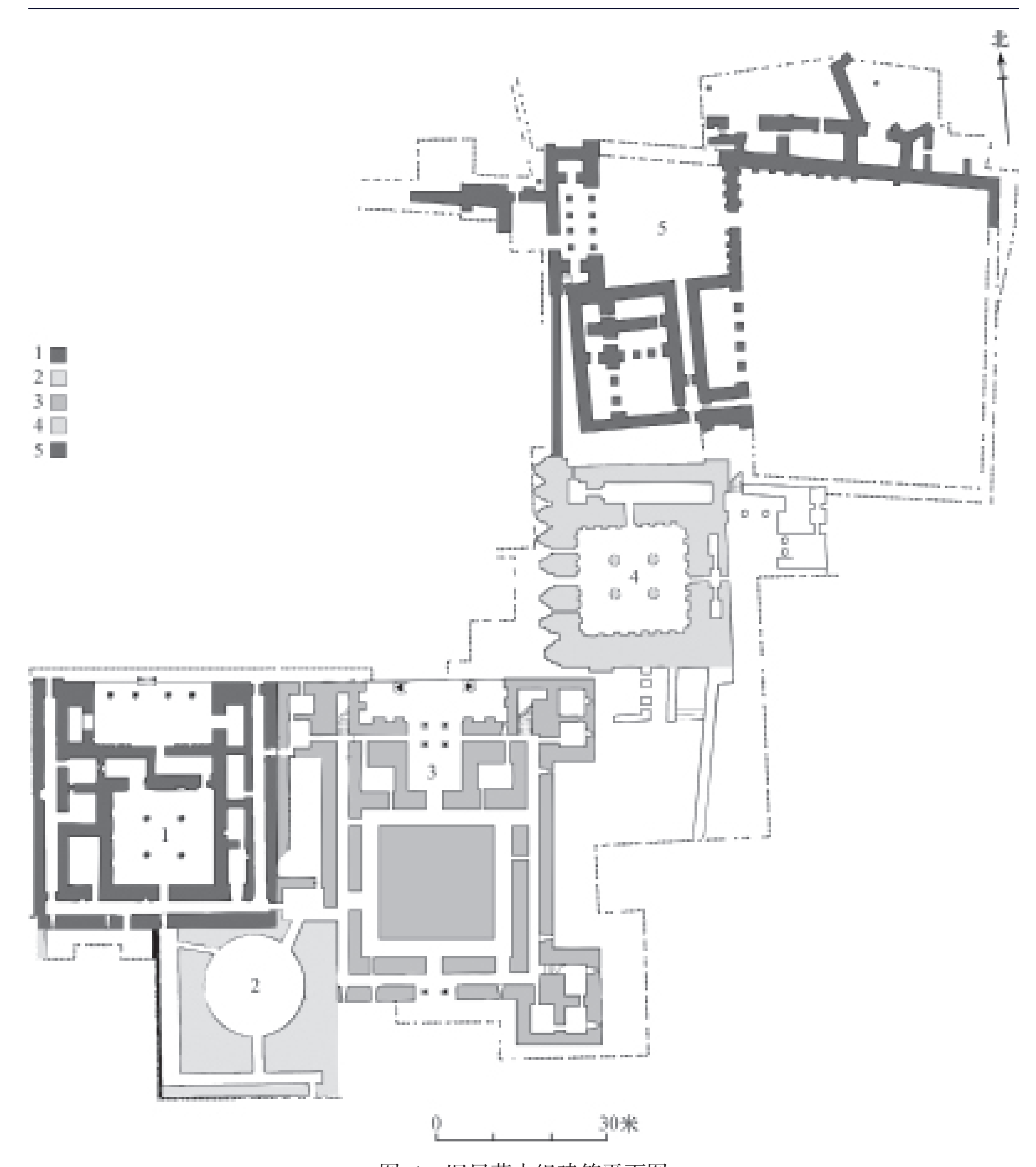
木鹿（Merv），今译梅尔夫，在土库曼斯坦共和国马雷市（Mary）以东25千米处。其地属于穆尔加布（Murgab）河下游三角洲，古称马尔吉亚那（Margiana）。历史上木鹿作为呼罗珊重镇，是连接河中地区与伊朗高原的关键节点。

其名在中国古代文献中始见于《后汉书・西域传》[13]：

> 安息国居和椟城，去洛阳二万五千里。北与康居接，南与乌弋山离接。地方数千里，小城数百，户口胜兵最为殷盛。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去洛阳二万里。

唐与大食怛逻斯之战后，杜环被俘逗留其地，于所著《经行记》中记录见闻较详[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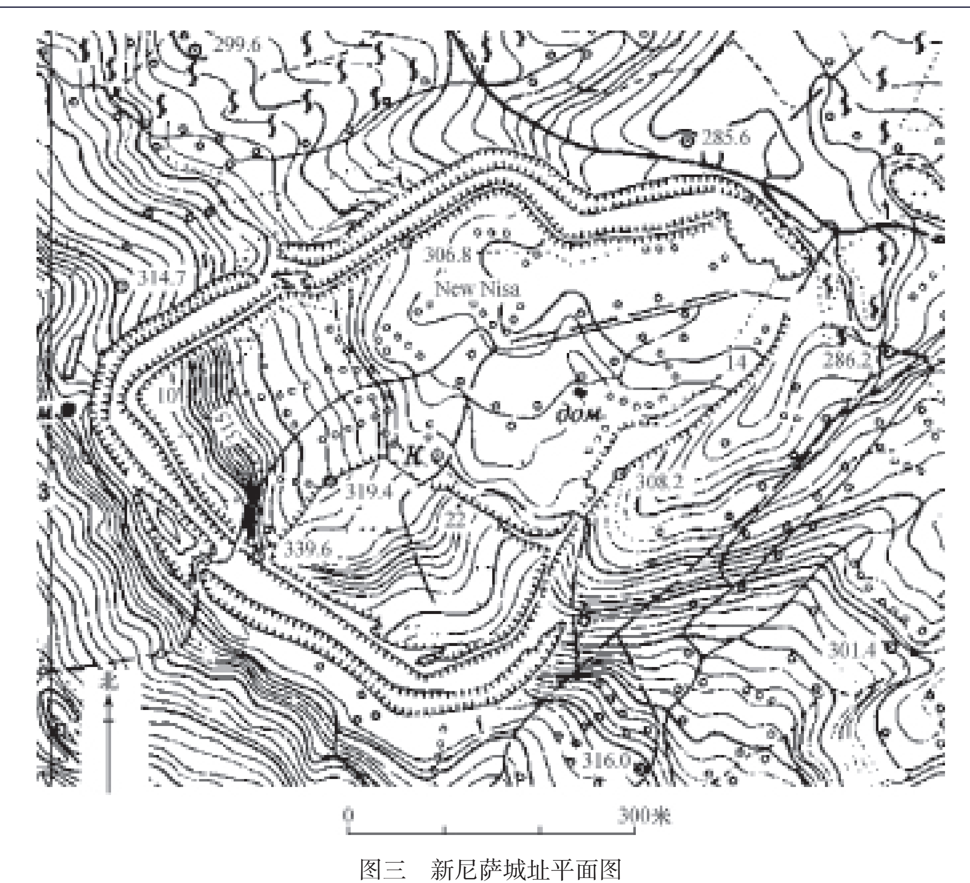
> 末禄国，在亚梅国西南七百余里。胡姓末者，兹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用铁为城门。城中有盐池，又有两所佛寺。其境东西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栅连接，树木交映，四面合匝，总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数百，溉灌一州。其土沃饶，其人净洁。墙宇高厚，市鄽平正。木



图二　旧尼萨中组建筑平面图

（“Old Nisa: The Turkmen–Italian Archaeological Project”，第291页）

既雕刻，土亦绘画。又有细软迭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值银钱数百。果有红桃、白□、遏白、黄李。瓜大者名寻支，十余人飡一颗辄足。越瓜长四尺以上。菜有蔓菁、萝卜、长葱、颗葱、芸台、胡芹、葛蓝、军达、茴香、茇薤、瓠芦，尤多蒲陶。又有黄牛、野马、水鸭、石鸡。其俗以五月为岁，每岁以画缸相献。有打球节、秋千节。其大食东道使镇于此。从此至西海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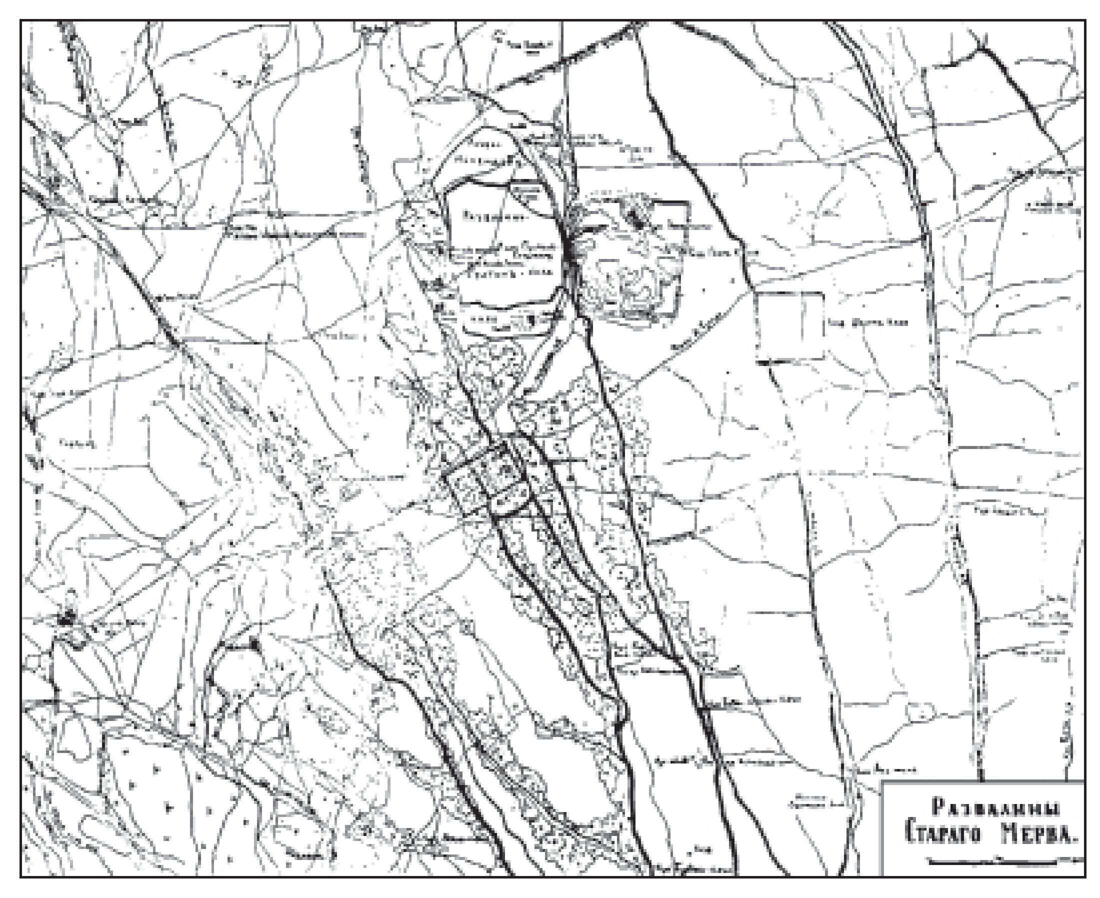
图三　新尼萨城址平面图

（*The Pathian Fortresses of Nisa, Turkmenistan*，第17页）

来，大食波斯，参杂居止。其俗礼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涂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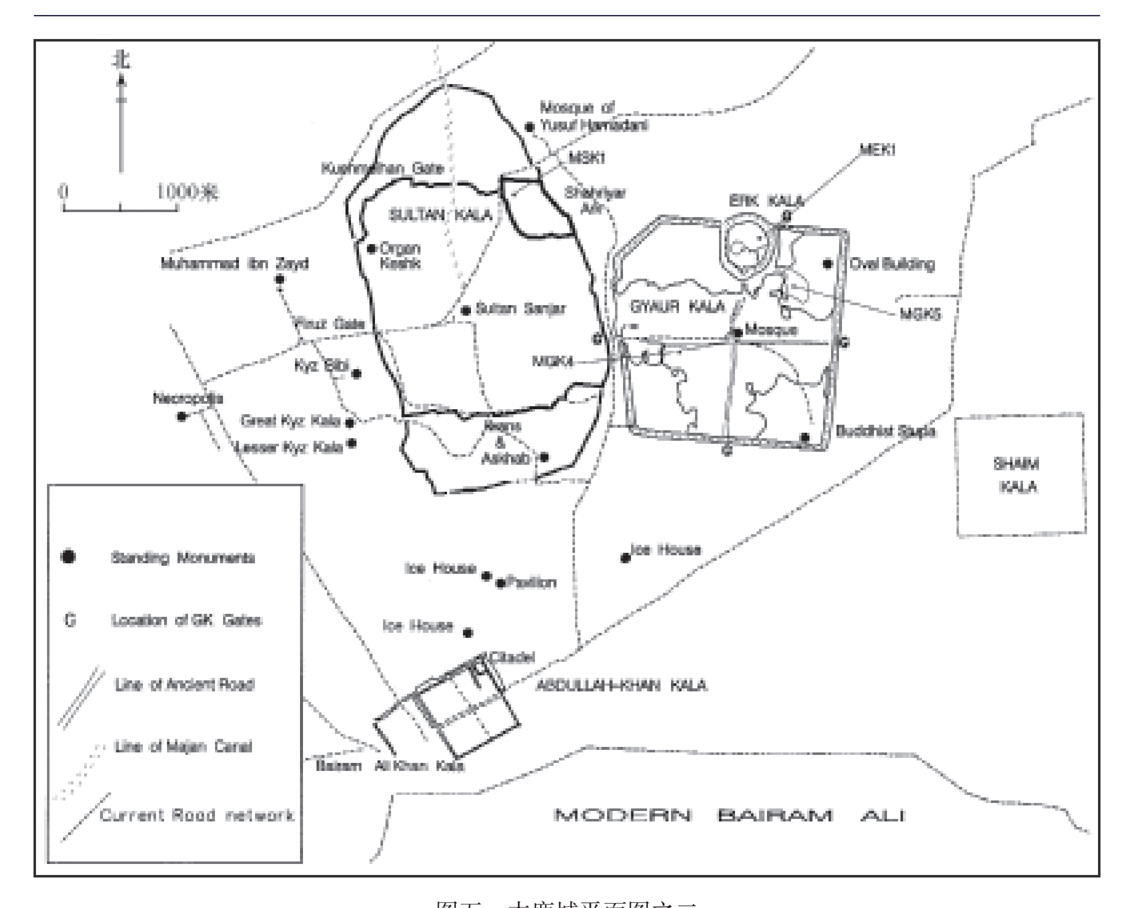
1890年，沙俄学者朱可夫斯基（V. A. Zhukovsky）调查木鹿古城，拍摄遗迹、测绘地图[15]（图四）。1904年，美国地质学家庞佩利（Raphael Pumpelly）与德国考古学家施密特（Hubert Schmidt）合作发掘[16]。1946年，南土库曼斯坦考古队组建后，由马松（M. E. Masson）领导继续开展考古工作。1992～2000年，赫尔曼（Georgina Herrman）和辛普森（St John Simpson）分别代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大英博物馆与土方合作进行合作发掘[17]（图五）。2001年起，威廉姆斯（Tim Williams）代表伦敦大学学院又启动新一轮合作[18]。

木鹿城创始部分为埃尔克卡拉（Erk Kala），公元前5世纪阿契美尼德王朝所建。平面似椭圆形，南北近500米，东西约400米，城垣局部存高30余米，仅南面设一门（图六）。在此基础上，公元前3世纪塞琉古王朝安条克一世（Antiochus I）时期大肆扩张，将埃尔克卡拉作为内城（citadel），拓建外城贾乌尔卡拉（Gyaur Kala/Ghiaur Kala）。平面近方形，西北隅抹角，周长约7400米，与杜环所记“城方十五里”正相吻合。城垣局部存高18米，外侧原有80余座塔楼。四面各设一门，东南西



图四　木鹿城平面图之一
（Развалины старого Мерва，图5）

三门居中，北门偏东，内交十字街。街口东北有清真寺遗址，城东南隅有佛寺遗址，著名彩绘双系陶罐（Merv vase）即出于此[19]。据西南隅城墙解剖结果，其修建可分为7个时期，大夏、帕提亚、萨珊诸朝陆续为之[20]（彩版三，1）。7世纪阿拉伯人东侵，木鹿成为倭马亚王朝呼罗珊行省首府，在贾乌尔卡拉东南兴建新城沙依姆卡拉（Shaim Kala）以容纳殖民。平面方形，周长4000余米，惜近代以来遭到破坏，遗迹泯灭。8世纪阿巴斯王朝呼罗珊总督阿布·穆斯里姆（Abu Muslim）占据木鹿，在城西修建清真寺，随后以此为中心建立新城苏丹卡拉（Sultan Kala），于是旧城衰落，仅作为新城郊外手工业区存在。此后历经塔希尔、萨法尔、萨曼、哥疾宁诸朝，至11世纪塞尔柱王朝占据并定都木鹿，并在苏丹马利克沙（Sultan Malik Shah）时期修建苏丹卡拉城墙。12世纪苏丹桑贾尔（Sultan Sanjar）时期在东北隅建立内城沙里亚亚克（Shahriyar Ark），用以防护宫殿、官署和贵族住宅，周长1800余米，外置塔楼近80座（图七）。同时城区也向南北两侧拓展。平面整体近椭圆形，南北约3700米、东西近2000米[21]，成为当时中亚地区首屈一指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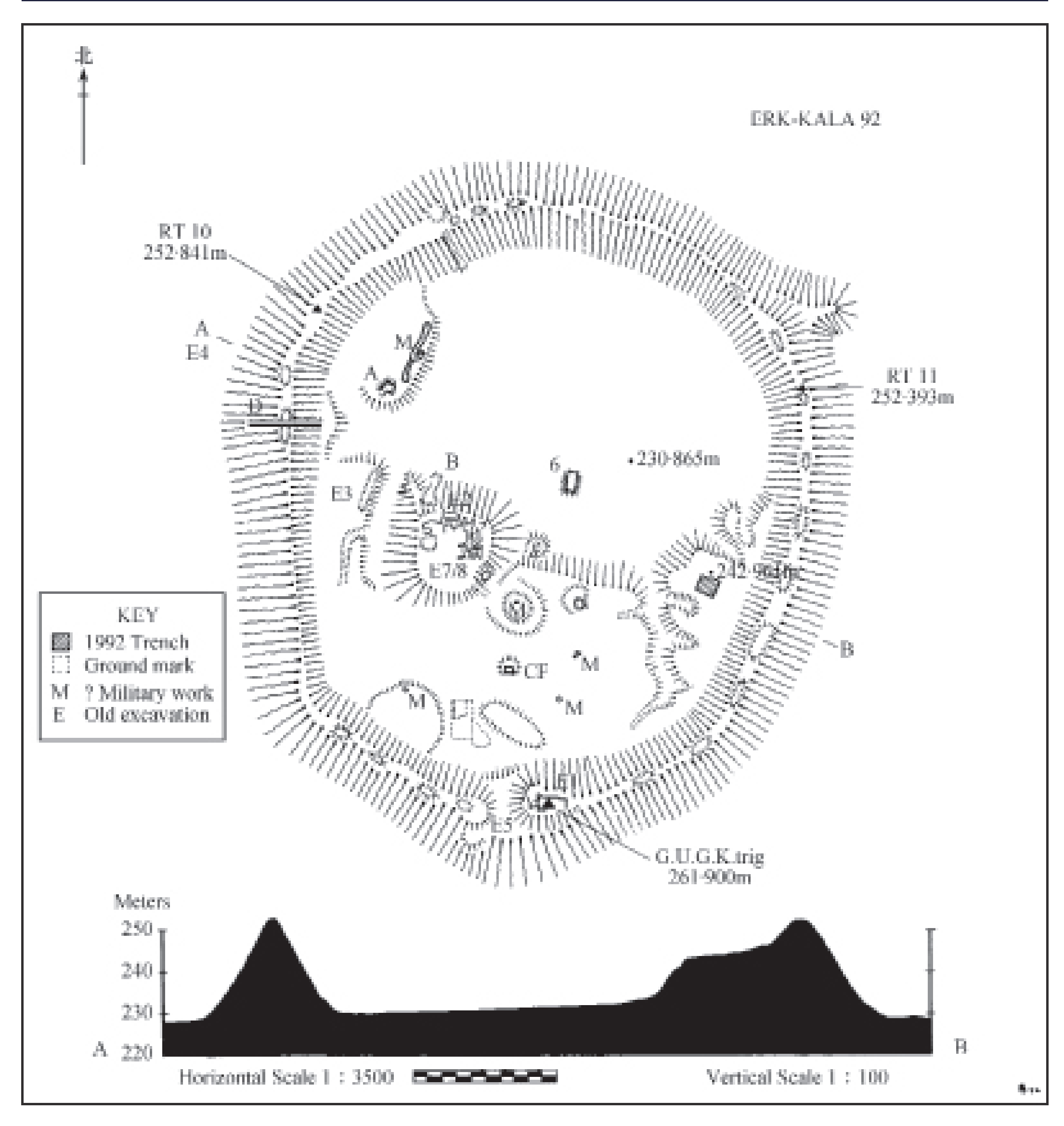


图五　木鹿城平面图之二

（“The 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fth Season”，第3页）

城[22]。13世纪蒙古人入侵重创木鹿[23]，后来稍有恢复。至15世纪帖木儿王朝终究放弃旧城，在其以南地段新建阿卜杜拉汗卡拉（Abdullah Khan Kala），18世纪又毗邻其西扩建拜拉姆阿里汗卡拉（Bairam Ali Khan Kala）。前者方形，边长约700米；后者长方形，东西近500米。两城均于19世纪晚期沙俄占领之际废置。

木鹿城内外仍保存十余处中世纪以来地面建筑，主要是城堡（*köshk*）、宫殿与陵墓。位于苏丹卡拉西南方的大吉兹卡拉（Greater Kyz Kala）是诸城堡规模最大且保存较好者，约建于9世纪。平面近方形，边长约40米，存高约12米。下部为4米高台座，上部外壁贴砌一周半八棱柱，北壁设门。堡内为双层结构，中置天井，四周绕以房间（图八）。沙里亚亚克中部有一处塞尔柱王朝宫殿，尚存残迹，平面近方形，边长约40米，东侧开门，中部偏南设天井，四周围绕大小房间二十余所[24]（图九）。苏丹卡拉中部则有苏丹桑贾尔陵墓，穹顶直壁，上圆下方，边长27米，西侧开门，内部三壁三龛，中庭置有墓顶石（彩版三，2）。中国河北沽源梳妆楼元墓建筑形制与其正相类似。



图六　埃尔克卡拉平面图

［“The 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1992)”，第47页］

三、阿弗拉西阿卜

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城址位于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干市北部，作为索格底亚那之重镇，控扼河中，为东西往来枢纽，亦即中国古代文献所记之康国（飒秣建）所在。《隋书·西域传》云[25]：

（康国）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城多众居。……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迭。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



图七 沙里亚亚克平面图
（*Monuments of Merv: Traditional Buildings of the Karakum*，第9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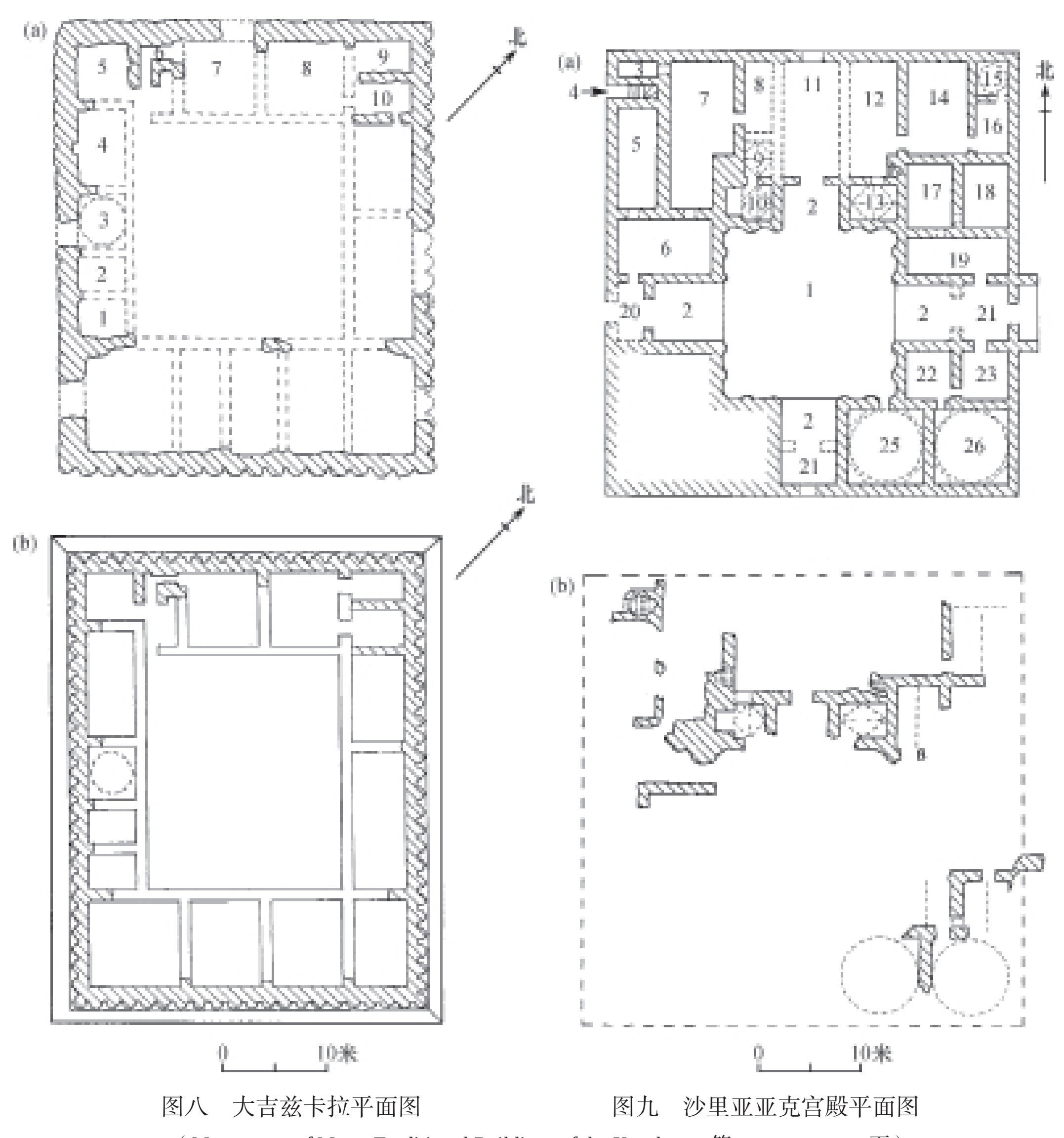
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来助祭。

玄奘《大唐西域记》云[26]：

（飒秣建）国大都城周二十余里，极险固，多居人。异方宝货，多聚此国。

该城考古活动始自19世纪晚期，以1965年所发现厅堂壁画最为重要[27]。1989年以来，葛勒耐（Frantz Grenet）领导法乌联合考古队持续进行发掘工作，清理阿契美尼德王朝及希腊化时期城墙、倭马亚及阿巴斯王朝时期宫殿和大清真寺、喀喇汗王朝时期厅堂和壁画等重要遗迹[28]。

城址平面作不规则倒三角形，宫堡（citadel）位居北部一隅，由此向南依次有三道城墙围绕构成内城，第四道城墙则为外城。城设四门，北为布哈拉门（Bukhara），东为中国门（China），南为碣石门（Kesh），西为诺巴赫门（Naubekhar）（图一〇、图一一）。在二、三道内城之间有23号遗址，其1号房间因壁画内容而得名为客使厅（ambassadors hall）。该厅方形，边长11米，残高2米，满绘壁画。



图八　大吉兹卡拉平面图　　　　图九　沙里亚亚克宫殿平面图

（*Monuments of Merv: Traditional Buildings of the Karakum*，第142、143、171页）

西壁表现诸国使节朝觐献礼场景，画面分为三组。南侧一组残存三位使节，队列朝北，着白地锦袍，饰以联珠圈、野猪、鸟衔绶带、森莫夫（senmurv）等图案，属于中亚诸国。中间一组可见四位使节，队列朝西，黑幞头、着黄衫，来自唐朝东土。北侧一组则有五位使节，队列朝南，前三位披兽皮、扎绑腿，似山地部族（吐蕃人？），后两位袖手而立、头戴羽冠，乃高句丽人。每组使节均有红黄服色披发突厥官员两名赞引、白衣通事一人传译，另外各有突厥武士数名或坐或立环侍其侧。高句丽使节右侧绘有旗鼓一组，中亚使节右上方残存旗杆一束（图一二）。

北壁表现唐朝人物活动，画面分为两组。西侧一组由左右两船组成，左船似一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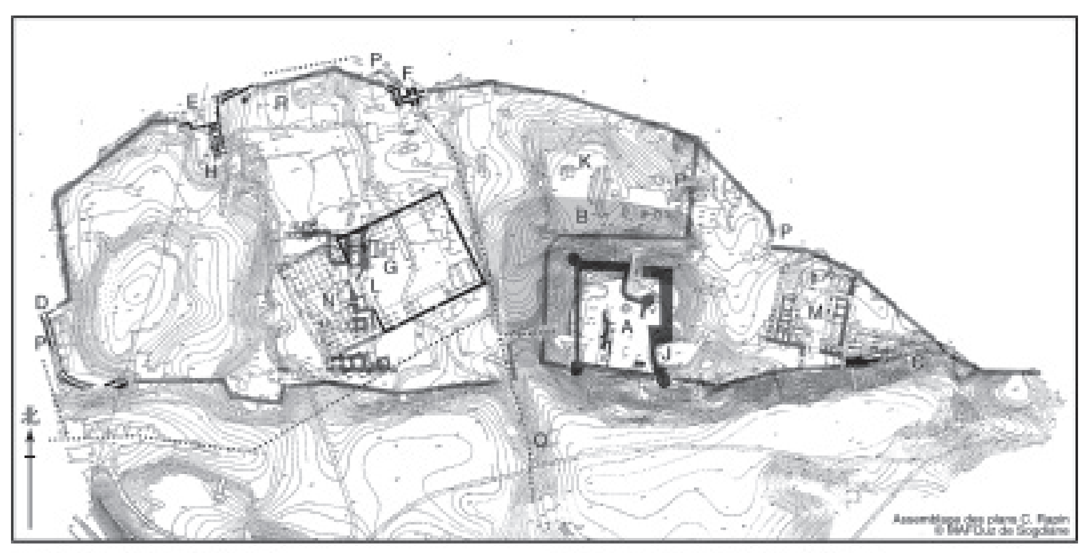


图一〇　阿弗拉西阿卜城址平面图

（http://claude.rapin.free.fr/）

舟，黄首红身，船上一位贵妇形象稍大，左右女侍九人略小，人物衣衫外蓝内红，披肩、领袖、头饰均作黄色，船下绘有莲荷、游鱼、水禽等。东侧一组为骑马狩猎场景，一人形象高大，其余五人较小，或张弓搭箭，或刺杀斑豹，均黑幞头、着黄衫、悬胡禄、佩旗纛（图一三）。

南壁表现中亚人物队列。画面左首似一建筑，该处三个人物仅存下部，向右迎谒，身着锦袍，有联珠圈、鸟衔绶带、翼马等图案。队列前段一白象居首，骑坐人物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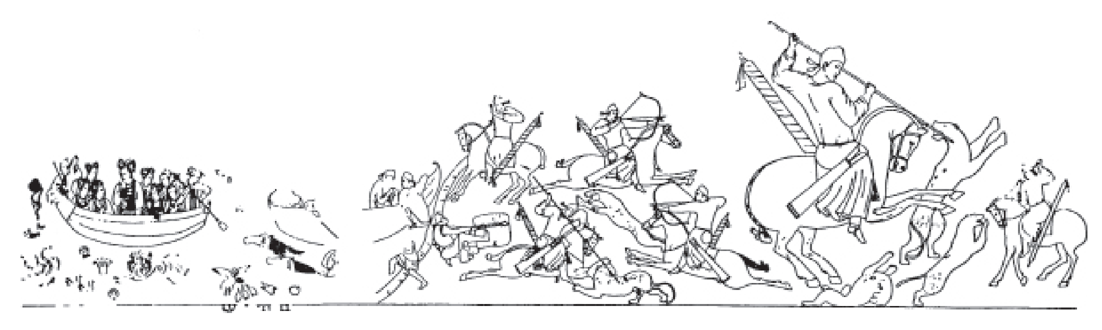
图一一　阿弗拉西阿卜城址北部遗迹分布图

（http://claude.rapin.free.fr/）



图一二　客使厅西壁壁画

（《古代サマルカンドの壁画》，第67页）



图一三　客使厅北壁壁画

（《古代サマルカンドの壁画》，第101页）

缺，稍后三马并行，各坐红白锦衣妇人一名。中段下栏红白锦衣男子两名，并肩骑驼，各持一杖，后有步行白衣祭司一位，头戴面罩（padam），牵马一匹，鞍辔俱全；中栏四只白鹅鱼贯而行，后有一名白衣祭司尾随，亦戴面罩；上栏有马数匹，仅存下部。后段现一骑马王者，形象高大，佩弓挂剑，红地锦袍，可见鸟衔绶带图案，后随骑士两名，佩弓持杖，红白锦袍，有联珠圈、鸟衔绶带、山羊等图案，其后又有马队（图一四）。



图一四　客使厅南壁壁画

（《古代サマルカンドの壁画》，第85页）

关于客使厅壁画布局形式，论者均指出其与中国文献所记何国（Kushaniya）壁画颇有相通之处。《通典》云[2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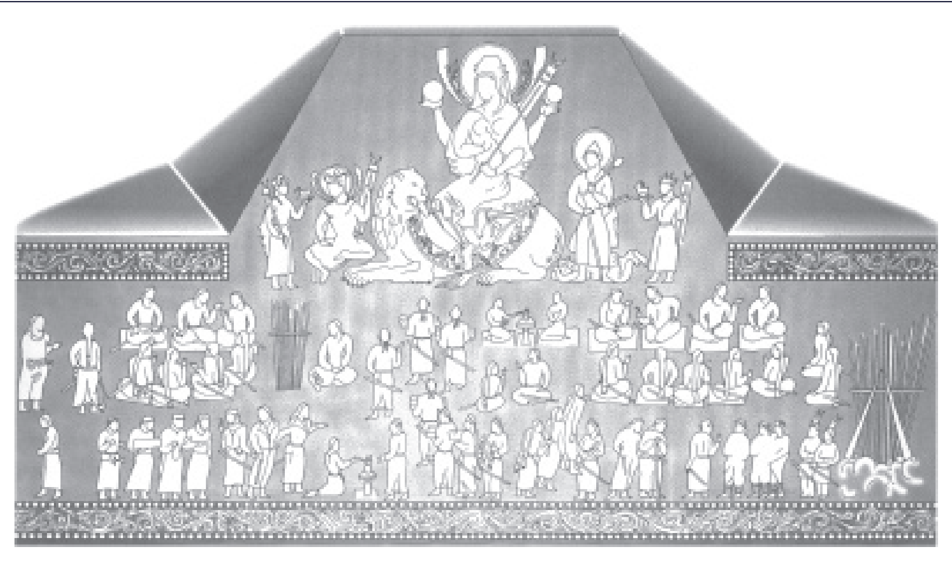
> 何国，隋时亦都那密水南数里，亦旧康居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之族类。国城楼北壁画华夏天子，西壁则画波斯、拂菻诸国王，东壁则画突厥、婆罗门诸国王。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风俗与康国同。

《新唐书·西域传》云[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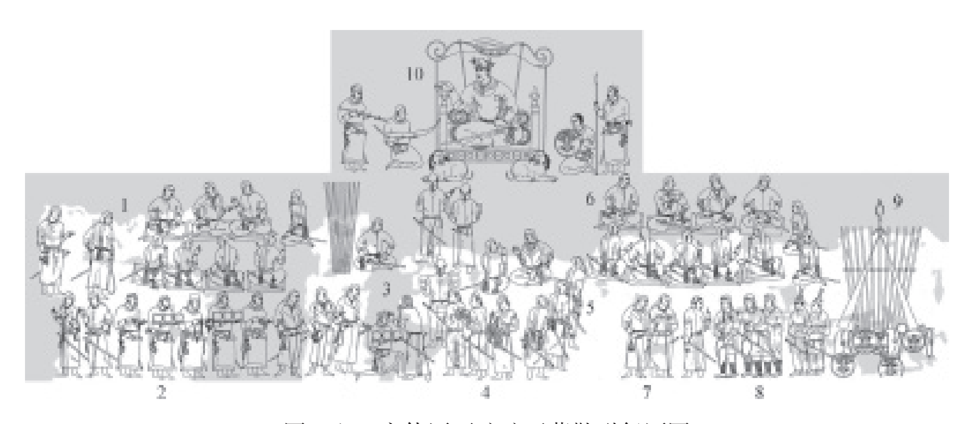
> 何，或曰屈霜你迦，曰贵霜匿，即康居小王附墨城故地。城左有重楼，北绘中华古帝，东突厥、婆罗门，西波斯、拂菻等诸王，其君旦诣拜则退。

又据西壁左侧人物粟特语题记，系描述支汗那（Chaganian）、石国（Chach）使节与拂呼缦王（Varkhuman）会话[31]，从而推断此厅壁画内容当与中国史书所记高宗显庆三年（658年）封为康居都督府都督之康国王拂呼缦[32]有关。但因壁画颇有残损，故诸家复原方案及相应图像阐释颇有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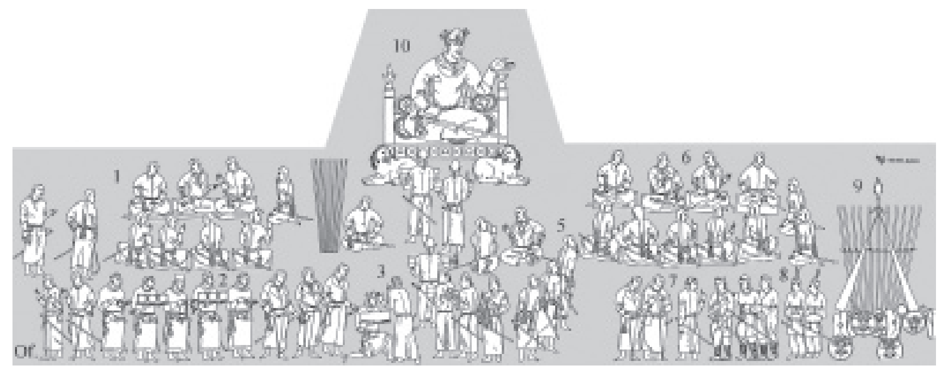
关于西壁残缺主像，马尔萨克（B.I. Marshak）指为娜娜女神（Nana）[33]（图一五）；葛勒耐[34]（图一六）和奥利（François Ory）[35]（图一七）指为康国王拂呼缦；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则指为西突厥可汗[36]（图一八）；而莫德（Markus Mode）复原形式略为复杂，西壁两侧中上位置康国王拂呼缦与西突厥叶护可汗射匮左右对坐，中间上部另有一对神像并坐[37]（图一九）。南壁人物队列马尔萨克、魏义天根据《隋书》关于石国风俗的记载[38]，推断为新年诺鲁兹节（Nouruz）祭祀祖先。北壁骑马乘舟王者葛勒耐认为是唐高宗和武则天，体现唐人之勇武与闲适；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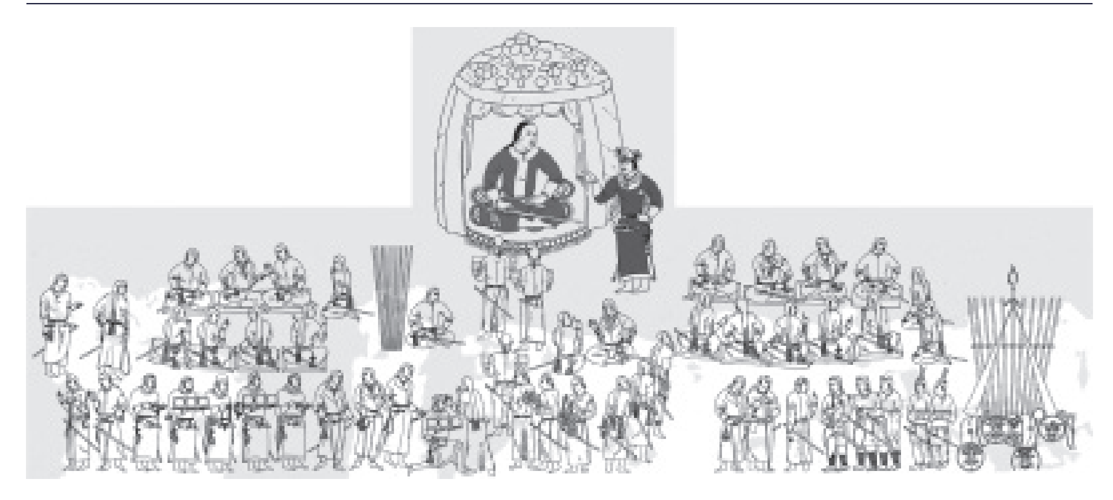
图一五　客使厅西壁壁画马尔萨克复原图
（《世界美術大全集》，第213页）



图一六　客使厅西壁壁画葛勒耐复原图
（“Maracanda/Samarkand, une métropole pré-mongole: Sources écrites et archéologie”，第1066页）



图一七　客使厅西壁壁画奥利复原图
（http://frantz.grenet.free.fr/）



图一八　客使厅西壁壁画魏义天复原图

（“Les Turcs, rois du monde à Samarcande”，第158页）



图一九　客使厅西壁壁画莫德复原图

（http://www.orientarch.uni-halle.de/ca/afras/index.htm）

马泰（Matteo Compareti）则进一步将泛舟场景推测为端午节活动[39]。东壁画面残损严重，阿尔鲍姆（L. I. Al’ baum）认为或与印度有关，葛勒耐等予以认同并补充依据。

阿弗拉西阿卜古城从公元前7世纪建城沿用至13世纪早期蒙古入侵。宫堡所处内城兴建于阿契美尼德王朝乃至更早，希腊化时期加以增筑。宫堡之西原有粟特时期神庙，8世纪中期偏早被倭马亚王朝纳斯尔・伊本・塞雅尔（Naṣr ibn Sayyār）宫殿所覆盖，后者于8世纪晚期又被改建为大清真寺并在9世纪早期扩建。宫堡之东有8世纪中期偏晚阿

巴斯王朝阿布·穆斯里姆（Abu Muslim）宫殿[40]，至喀喇汗王朝重建成数座厅堂，并保留有12世纪后半至13世纪初所绘制人物壁画[41]（图二〇）。1220年该城为蒙古军所破，次年长春真人丘处机西行至此，得睹晚期景象："其城因沟岸为之，秋夏常无雨，国人疏二河入城，分绕巷陌，比户得用。方算端氏之未败也，城中常十万余户。国破而来，存者四之一。其中大率多回纥人，田园不能自主，须附汉人及契丹、河西等。其官长亦以诸色人为之。汉人工匠杂处。城中有岗，高十余丈，算端氏之新宫据焉"[42]



图二〇　阿弗拉西阿卜城址喀喇汗王朝壁画

（"From Tents to City: The Royal Court of the Western Qarakhanids between Bukhara and Samarqand"，第114页）

四、片治肯特

片治肯特（Panjikent / Panjakent）城址位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片治肯特市泽拉夫善

河南岸一处高地，北望突厥斯坦山，南倚泽拉夫善山，西距撒马尔干约60千米。适处索格底亚那腹地经泽拉夫尚河谷通往乌什鲁沙那之孔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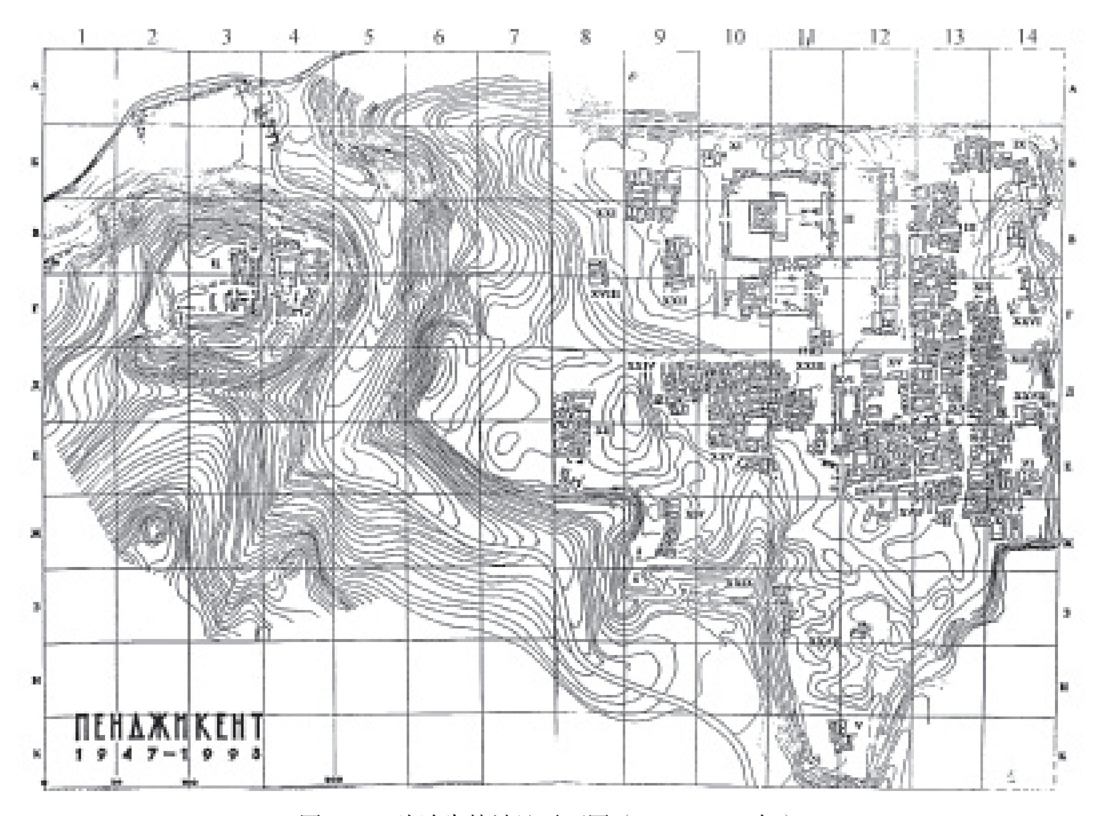
一般认为，片治肯特应即文献中所记昭武九姓米国治所钵息德城[43]。《隋书·西域传》云[44]：

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业中，频贡方物。

《新唐书·西域传》云[45]：

米，或曰弥末，曰弥秣贺。北百里距康。其君治钵息德城，永徽时为大食所破。显庆三年，以其地为南谧州，授其君昭武开拙为刺史，自是朝贡不绝。开元时，献璧、舞筵、师子、胡旋女。十八年，大首领末野门来朝。天宝初，封其君为恭顺王，母可敦郡夫人。

1946年起，雅库博夫斯基（A. Y. Yakubovsky）、迪亚科诺夫（M. M. Dyakonov）[46]、别列尼茨基（A. M. Belenitsky）[47]、马尔萨克[48]、卢湃沙（P. B. Lurje）[49]先后领导考古队对片治肯特城址持续不断进行系统性发掘工作，城内建筑遗迹得到全面揭露（图二一～图二三；彩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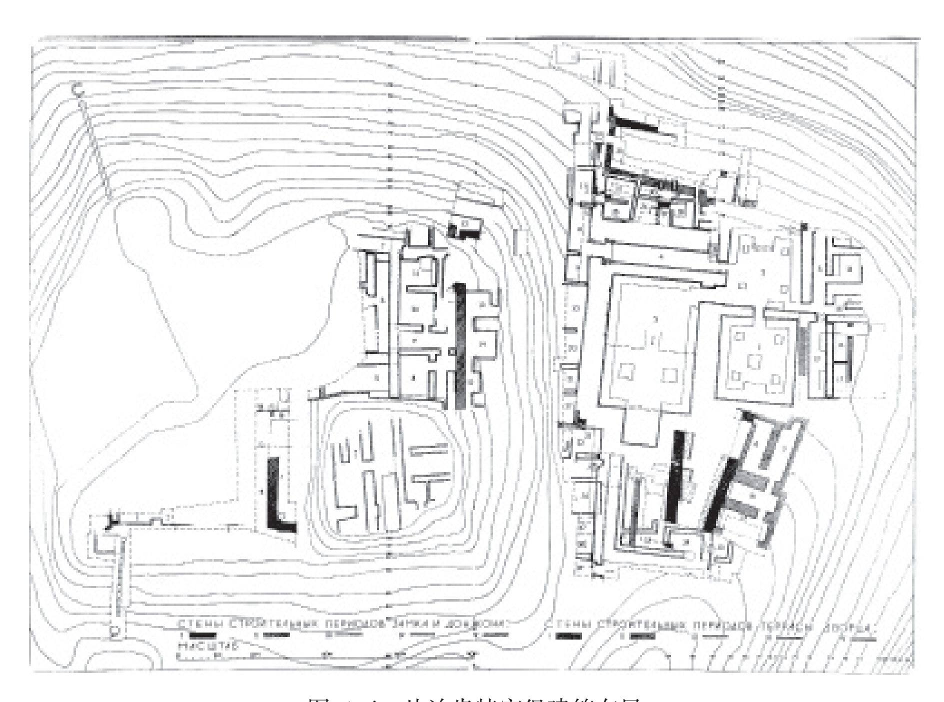
图二一　片治肯特城址平面图（1947～1995年）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第4、5页）



图二二　片治肯特城址平面图（1947 ~ 2014年）

（Материалы Пенджикент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ыпуск XVIII，第56 ~ 57页）



图二三　片治肯特宫堡建筑布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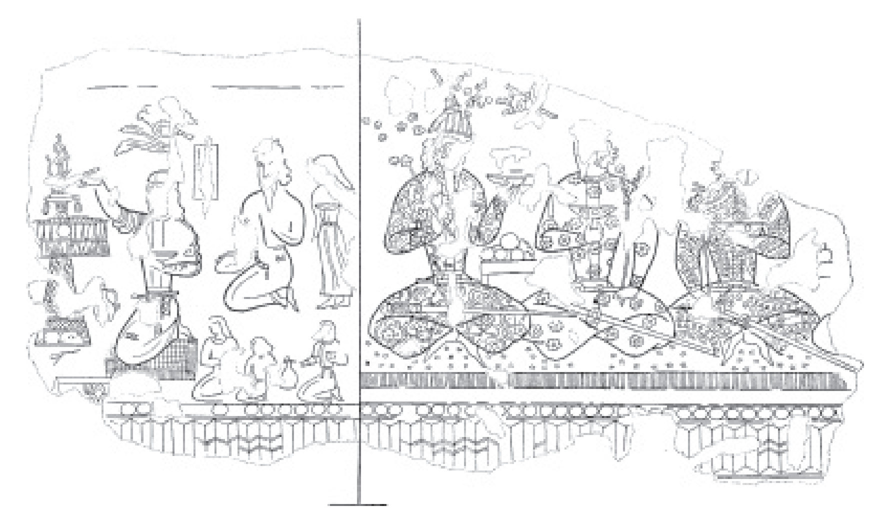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第6页）

城址分为两个部分，宫堡位西，主体（shakhristan）居东，中隔沟壑。主体部分城墙北垣沿台地边缘，东垣与之垂直，西、南两垣随形就势，不甚规则。城内建筑均为土坯墙、木天井。其核心为北部居中之两所神庙，即Ⅰ号、Ⅱ号建筑群。南北毗邻，形制与布局类似，均坐西面东，两进院落，内院居中为主殿。二者均有壁画，惜残缺较甚，Ⅱ号神庙主殿厅堂（1号房间）南壁有柩车举哀情景（图二四），Ⅰ号神庙二进院落北侧偏厅（10号房间）北壁及东壁有贵族端坐宴饮及袄教火坛祭祀场面（图二五）。



图二四　片治肯特Ⅱ号建筑群1号房间南壁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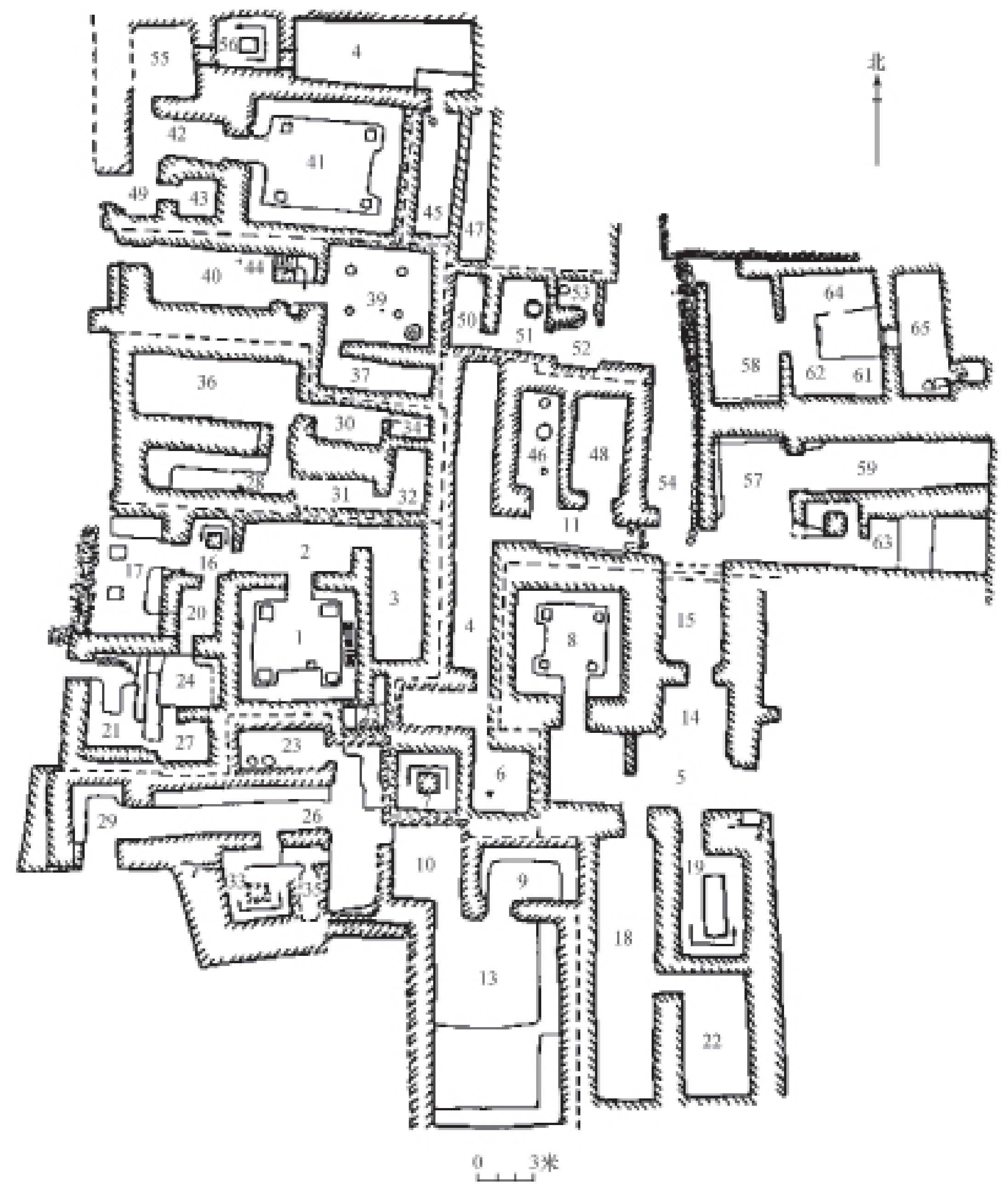
（Живопись древнего Пянджикента，图19）



图二五　片治肯特Ⅰ号建筑群10号房间北壁东段及东壁壁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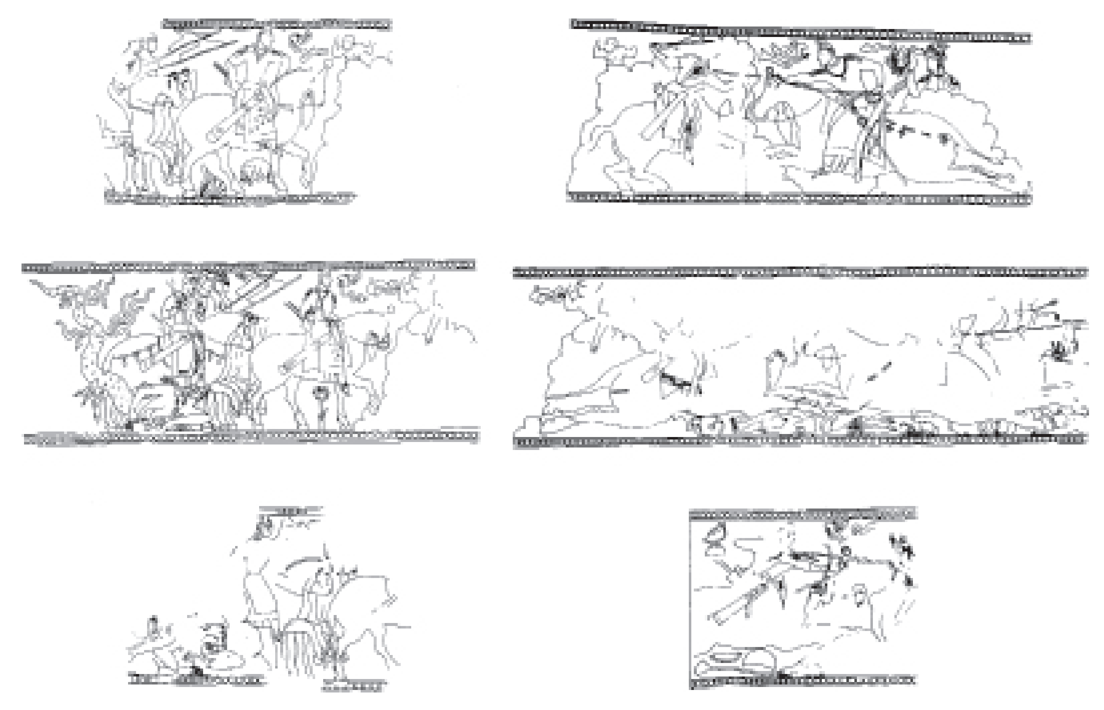
（Живопись древнего Пянджикента，图7）

城内东部有南北两列排布密集之住宅，其中Ⅵ号建筑群1号、41号两房间均有较大面积壁画存留，尤以后者最为著名（图二六）。41号房间又称鲁斯塔姆厅（Rustam room），平面近方形，约60平方米，坐东面西，内设四柱，贴近四壁有一周矮台（*suffa*），墙面满绘壁画，以联珠纹带分为上下四栏，所存部分集中于西壁北段、北壁及东壁北段，其中上部两栏仅存西北隅局部，下部两栏保存完整。第二栏壁画所绘为波



图二六　片治肯特Ⅵ号建筑群平面图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第8页）



图二七　片治肯特Ⅵ号建筑群41号房间壁画
左上：西壁北段；左中：北壁中段；左下：南壁西段；
右上：西北隅；右中：东北隅；右下：东壁北段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第33、36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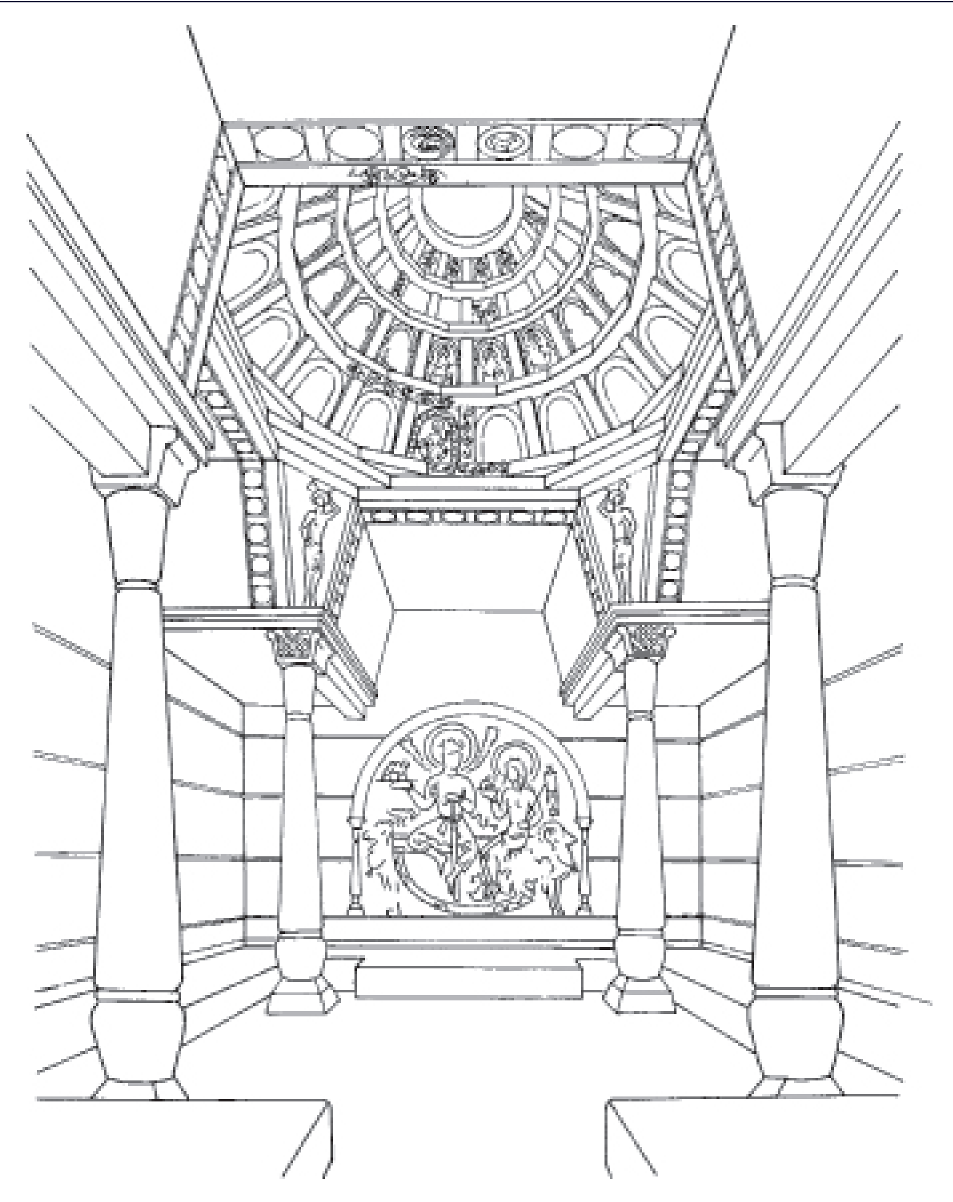
斯史诗英雄人物鲁斯塔姆勇斗恶魔题材，画面自西壁门之北侧开始顺时针展开表现叙事结构，出征或胜利场面即勒马缓行，双方交战场面则跃马飞驰，图像形式动静交叉、错落有致。此厅壁画年代约在740年前后，属片治肯特艺术晚期作品[50]。

片治肯特厅堂建筑正壁中央常于通壁圆拱内绘画女神娜娜（Nana）等神祇高大形象，虽大多残缺不完，然因其程式化特点，尚可推测复原。此外，Ⅵ号建筑群42号房间，即鲁斯塔姆厅门外，竟可见标准唐人形象壁画，颇为讨论中西文化交流者所关注。

根据阿拉伯史书及穆格山（Mug）文书记载，722年阿拉伯人俘片治肯特君主迪瓦什梯奇（Dewashtich）于其东60千米许穆格山城堡，遂攻陷并部分焚毁片治肯特，至770年前后该城彻底毁弃[51]。

五、半　　制

半制（Bunjikat）城址位于塔吉克斯坦共和国伊斯特拉夫善市（Istaravshan），旧名乌拉秋别（Ura-Tyube），西南20千米沙赫里斯坦镇（Shakhristan）河之西岸台地，处突厥斯坦山北麓，当索格底亚那（Sogdiana）腹地与费尔干纳（Fergana）之间。



图二八　片治肯特厅堂内景复原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第16页）

中国古代文献称半制城所在之乌什鲁沙那（Ustrushana）为东曹。《新唐书·西域传》云[52]：

东曹，或曰率都沙那，苏对沙那，劫布呾那，苏都识匿，凡四名。居波悉山之阴，汉贰师城地也。东北距俱战提二百里，北至石，西至康，东北宁远，皆四百里许，南至吐火罗五百里。有野叉城，城有巨窟，严以关钥，岁再祭，人向窟立，中即烟出，先触者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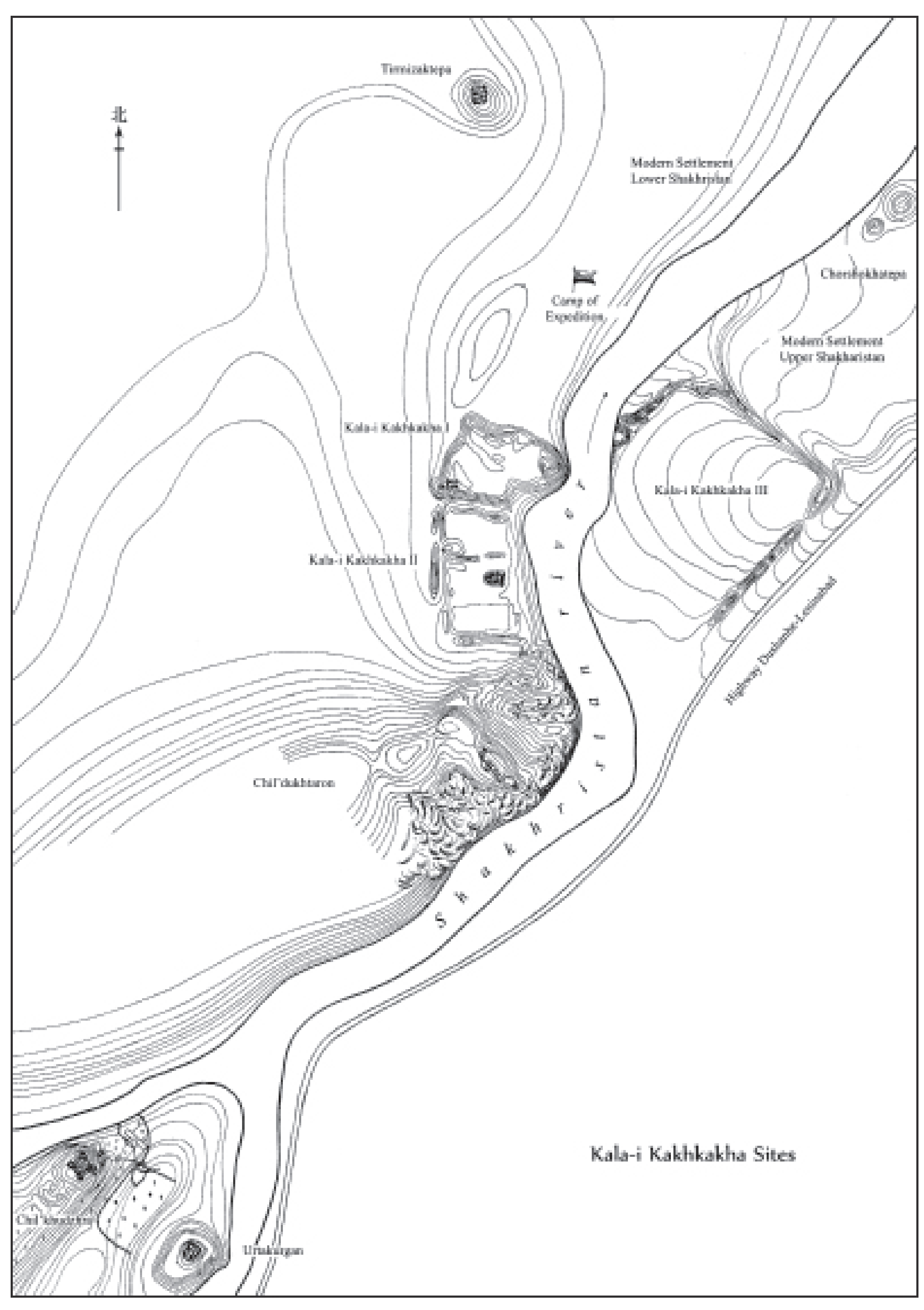
图二九　片治肯特VI号建筑群42号房间壁画
［“L'art de Piandjikent à la lumière des dernièresfouilles (1958 ~ 1968)”，第33页］

玄奘《大唐西域记》云[53]：

窣堵利瑟那国，周千四五百里，东临叶河。叶河出葱岭北原，西北而流，浩汗浑浊，汩淴漂急。土宜风俗，同赭时国。自有王，附突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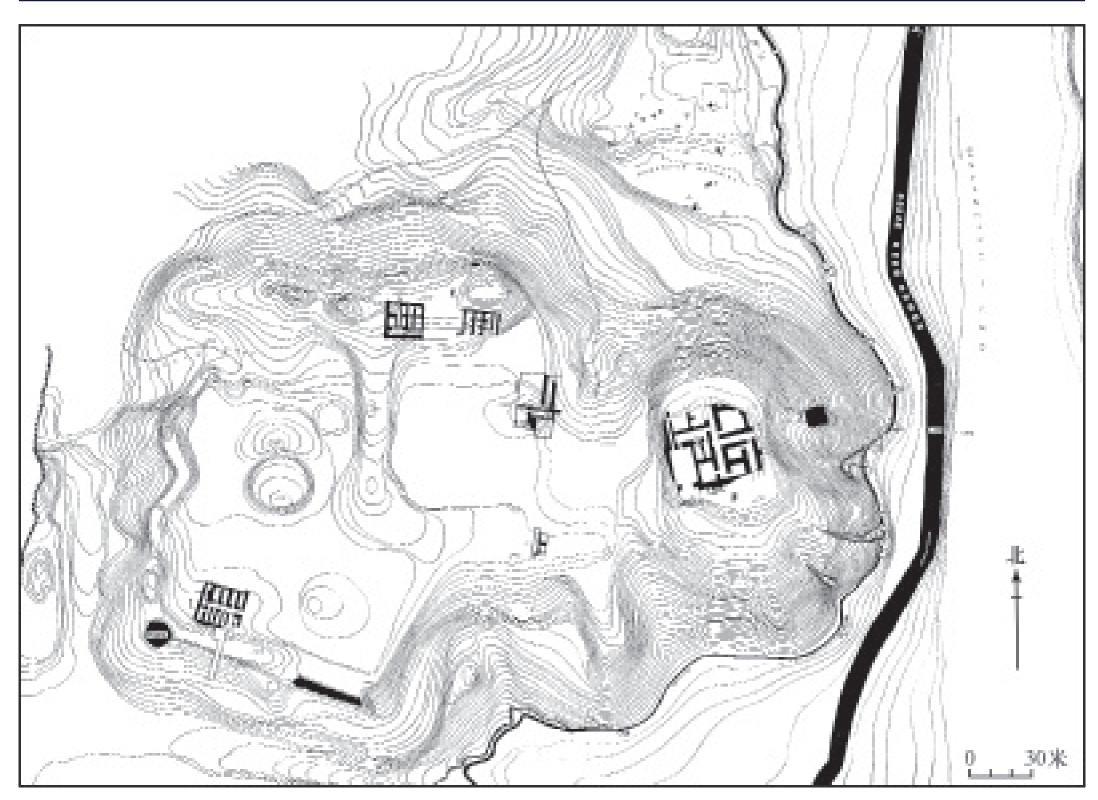
半制城址主要由南北毗邻两城组成，间距约50米，中为冲沟。居北者名为卡拉-伊・卡赫卡哈Ⅰ（Kara-i Kahkaha Ⅰ），周长约800米，形状不规则，东部一隅有近方形宫堡。南偏西者名为卡拉-伊・卡赫卡哈Ⅱ（Kara-i Kahkaha Ⅱ），周长约900米，近日字形结构，分为南北两个部分，中间共用一垣，北半部近梯形，南半部近方形，周长均约600米，南半部之东北隅有近方形宫堡。两城外侧边角均建有马面式塔楼作为城防设施，并沿山坡突出之脊部向下方增修一字城，以便扩大防御纵深。在此西南上游2千米处，夹河高地矗立两座小城堡，西北者名为奇尔胡吉拉（Chilhujra），东南者名为乌尔塔-库尔干（Urta-Kurgan），均近梯形，周长200米上下，外面亦设塔楼，两堡对半制城起拱卫作用（图三〇、图三一）。

半制城考古工作自1955年起由苏联考古学家内格马托夫（N. N. Negmatov）主持进行[54]，其中1965 ~ 1972年发掘了卡拉-伊・卡赫卡哈Ⅰ的宫堡[55]（图三二）。其宫殿建筑由大约20座房间组成，最重要的发现来自7号房间（走廊）、4号房间（礼拜厅）和



图三〇　半制城址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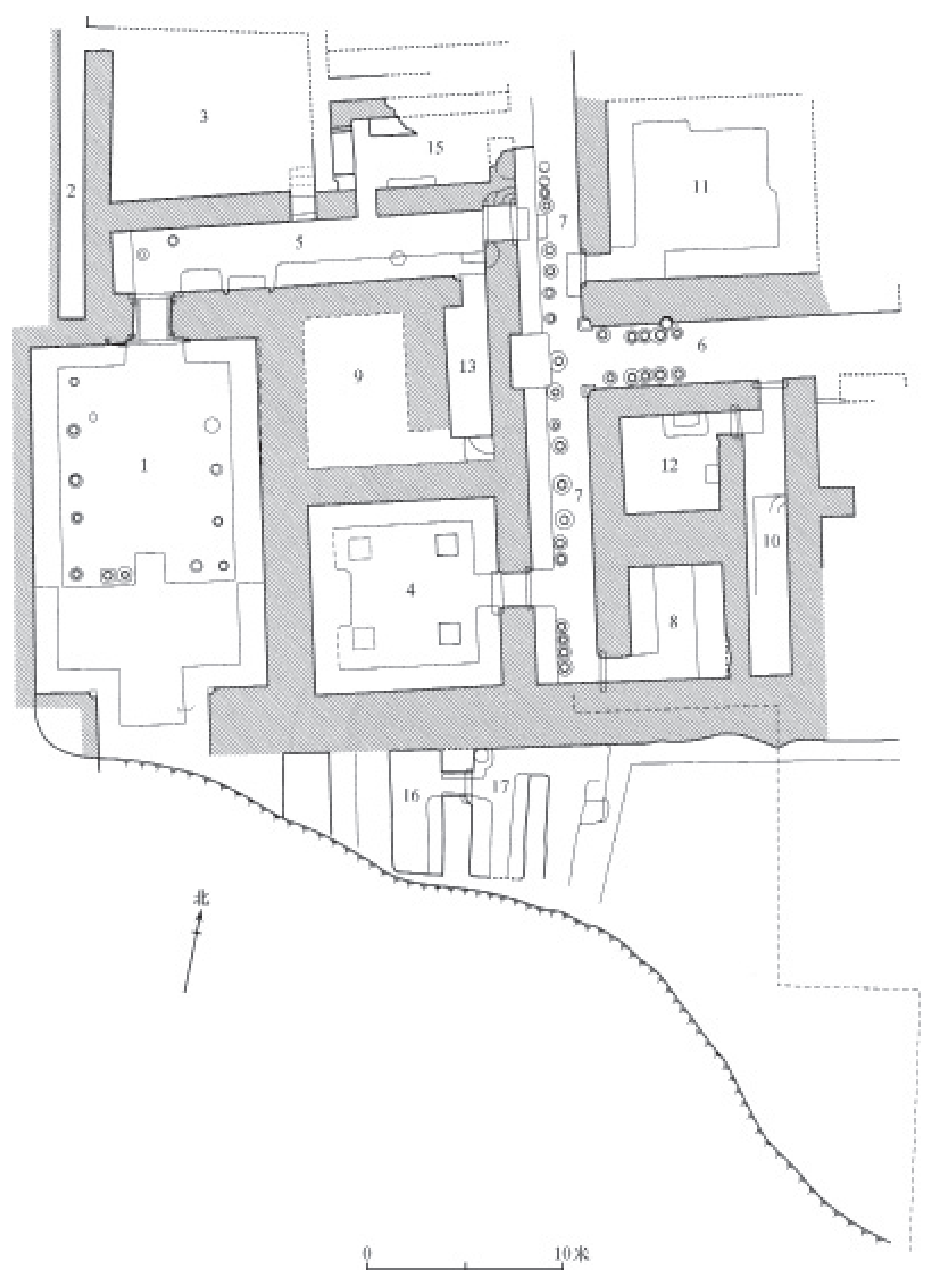
（《カフカハ遺跡群出土壁画》，第21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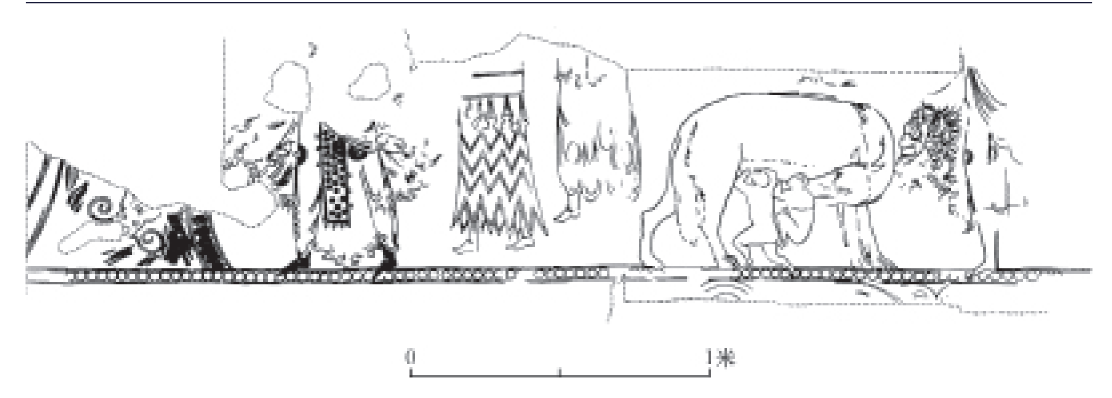
图三一　卡拉-伊・卡赫卡哈I城址平面图
（《カフカハ遺跡群の図面と出土品（土器と木彫）》，第10页）

1号房间（王座厅），主要是精美的壁画和木雕。7号房间西壁所绘壁画中有一母狼哺乳两弃儿场景，或与古罗马罗慕路斯（Romulus）、雷穆斯（Remus）传说有关[56]（图三三）。4号房间近方形，90余平方米，内设四柱，贴近四壁有一周矮台（*suffa*），墙面满绘壁画，各分三栏。西壁中间圆拱之内高大主尊纵贯整壁，衣着华丽，倚坐双马宝座，两侧各有弹箜篌侍女，其像似为日神密特拉（Mithra）（图三四）。东壁中为门洞，北侧下栏有骑狮四臂女神娜娜，其中两手分持日月，南侧下栏有三头四臂风神韦施帕卡（Veshparkar）弯弓骑射，上栏有正面娜娜女神及三眼妖魔形象。其余壁面各栏另有骑射攻战及端坐宴饮场面。1号房间为纵长方形，约200余平方米，南部凸出类龛，设有王座，北面开门，其上原有半圆形雕饰木板，宽近3米，高近1.5米。中间分上下栏各自表现波斯神话故事，外侧由两条植物纹带夹以半周毗邻圆环，内雕场景相似，均为两人跃马相战，蹄下另踏一人，构图与萨珊[57]或萨珊式粟特银器[58]类同（图三五）。

半制城主要营建于7至8世纪，9世纪末当乌什鲁沙那被萨曼王朝吞并时毁废。因该地区伊斯兰化进程相对较晚，故于8世纪后半叶至9世纪初壁画、木雕等遗存中仍然保持已不见于索格底亚那诸城之文化传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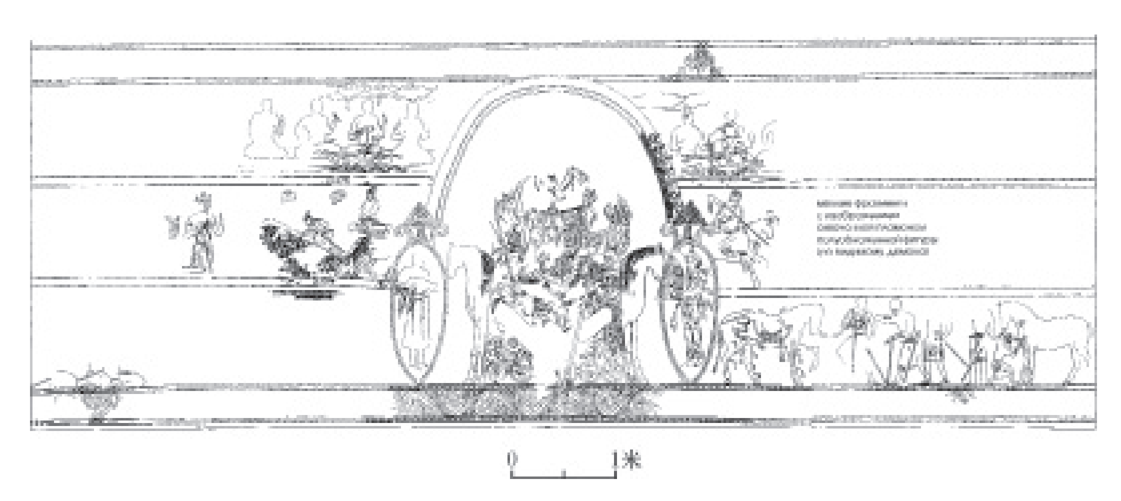


图三二　卡拉-伊・卡赫卡哈Ⅰ宫殿平面图
（《カフカハ遺跡群出土壁画》，第22页）



图三三　卡拉-伊・卡赫卡哈Ⅰ宫殿7号房间西壁壁画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ая живопись Ⅷ - начала Ⅸ века дворц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Бунджиката, столицы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Уструшаны，图6）



图三四　卡拉-伊・卡赫卡哈Ⅰ宫殿4号房间西壁壁画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ая живопись Ⅷ - начала Ⅸ века дворц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Бунджиката, столицы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Уструшаны，图19）



图三五　卡拉-伊・卡赫卡哈Ⅰ宫殿1号房间出土木雕纹饰

（《カフカハ遺跡群の図面と出土品（土器と木彫）》，第143页）

六、碎　　叶

碎叶城即吉尔吉斯共和国托克马克市（Tokmok）西南5千米楚河南岸阿克·贝希姆（Ak-Beshim）城址，南倚吉尔吉斯山，北临外伊犁阿拉套，东趣伊塞克湖，西通塔拉兹河谷，是丝绸之路天山廊道重镇。

该城因河得名，中国古代文献称之为碎叶或素叶[59]。玄奘《大唐西域记》云[60]：

清池西北行五百余里，至素叶水城。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糜、麦、蒲萄，林树稀踈。气序风寒，人衣毡褐。

《新唐书·地理志》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61]：

出谷至碎叶川口，八十里至裴罗将军城。又西二十里至碎叶城，城北有碎叶水，水北四十里有羯丹山，十姓可汗每立君长于此。

隋唐之际，碎叶为西突厥统叶护可汗所掌控。贞观初，西突厥分为十部，碎叶为左厢五咄六部落和右厢五弩失毕部落东西分界处[62]。显庆二年（657年）唐平阿史那贺鲁后，置濛池都护府，以阿史那步真为继往绝可汗统五弩失毕部落[63]。调露元年（679年）吏部侍裴行俭平阿史那都支、李遮匐之叛，立纪功碑[64]，令检校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以碎叶、龟兹、于阗、疏勒为四镇”[65]。张说《夏州都督太原王公神道碑》云[66]：

裴吏部（行俭）名立波斯，实取遮匐，伟公威厉，飞书荐请。诏公为波斯军副使、兼安西都护、上柱国，以安西都护（杜）怀宝为庭州刺史。大城碎叶，街郭迴互，夷夏纵视，莫究端倪。

《旧唐书·王方翼传》云[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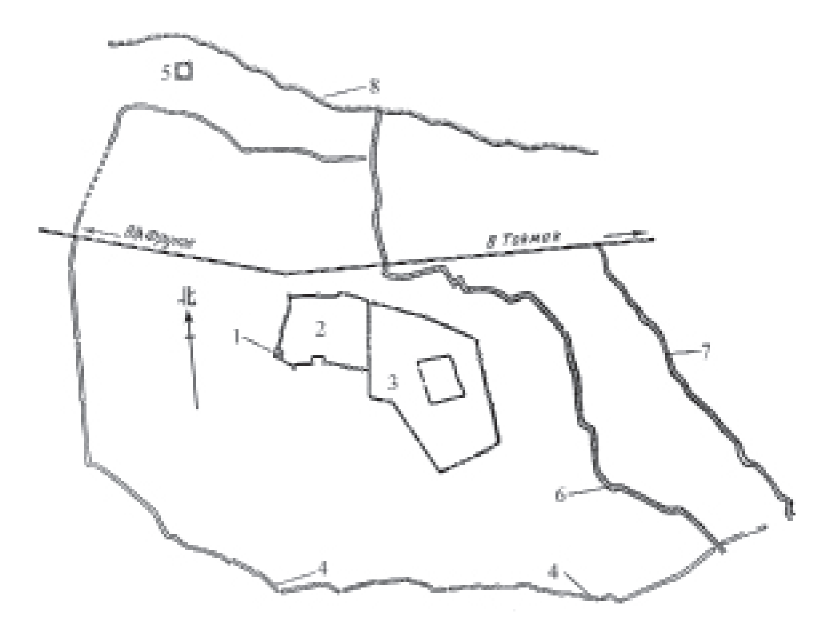
会吏部侍郎裴行俭讨遮匐，奏方翼为副，兼检校安西都护。又筑碎叶镇城，立四面十二门，皆屈曲作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西域诸胡竞来观之，因献方物。

然碎叶为唐军占领时间不长即告失陷，其后除数次短暂恢复驻守外，主要由西突厥和突骑施顺次实际控制。圣历三年（700年）唐廷先以“司礼卿兼池州大都护竭忠事上可汗阿史那斛瑟罗为左卫大将军，仍充平西军大总管，镇抚碎叶。”[68]随即“突骑施酋长乌质勒与西突厥诸部相攻。”[69]乌质勒初隶斛瑟罗，“尝屯聚碎叶西北界，后渐攻陷碎叶，徙其牙帐居之。东北与突厥为邻，西南与诸胡相接，东南至西、庭州。斛瑟罗以部众削弱，自则天时入朝，不敢还蕃，其地并为乌质勒所并。”[70]开元初，突骑施别种苏禄迅速崛起，七年（719年）“十姓可汗请居碎叶，安西节度使汤嘉惠表以焉耆备四镇。”[71]十年“以十姓可汗阿史那怀道女为交河公主，嫁突骑施可汗苏禄”[72]以怀柔之。苏禄晚年为部下袭杀，其子“骨啜为吐火仙可汗……与都摩度据

碎叶城，黑姓可汗尔微特勒据怛逻斯城，相与连兵以拒唐。”[73]开元二十七年（739年）“北庭都护盖嘉运以轻骑袭破突骑施于碎叶城。”[74]至天宝七年（748年）北庭节度使王正见再破碎叶，“城壁摧毁，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处，建大云寺犹存。”[75]天宝十年，大食败安西节度使高仙芝于怛逻斯，唐朝势力退出中亚。然突骑施亦趋衰落，至德以后，葛逻禄“部众渐盛，与回鹘为敌国，仍移居十姓可汗之故地。今碎叶、怛逻斯诸城，尽为所踞。”[76]

碎叶城的考古工作缘于1893～1894年俄国学者巴托尔德（V. V. Batold）的考察活动[77]。1939～1940年，苏联考古学家伯恩施塔姆（A. N. Bernshtam）发掘东城佛寺遗迹[78]。1953～1954年，苏联考古学家科兹拉索夫（L. R. Kyzlasov）发掘西城内Ⅱ号地点、西城外Ⅰ、Ⅲ、Ⅴ号地点、东城内Ⅳ号地点，发现街区、佛寺、摩尼教墓地、祆教墓地、景教堂遗迹[79]。1955～1958年，苏联考古学家兹亚布林（L. P. Zyablin）发掘西城外Ⅵ号地点，发现佛寺遗迹[80]。1996～1998年，俄罗斯考古学家谢苗诺夫（G. L. Semyonov）与吉尔吉斯合作发掘西城西南角Ⅶ号地点、东南角Ⅷ号地点，发现宫堡、景教堂遗迹[81]。2006～2008年，日本有明教育艺术短期大学与吉尔吉斯合作发掘西城东南部建筑遗迹[82]。2011～2013年，日本东京国立文化财研究所与吉尔吉斯合作发掘西城南部十字街区遗迹[83]（图三六、图三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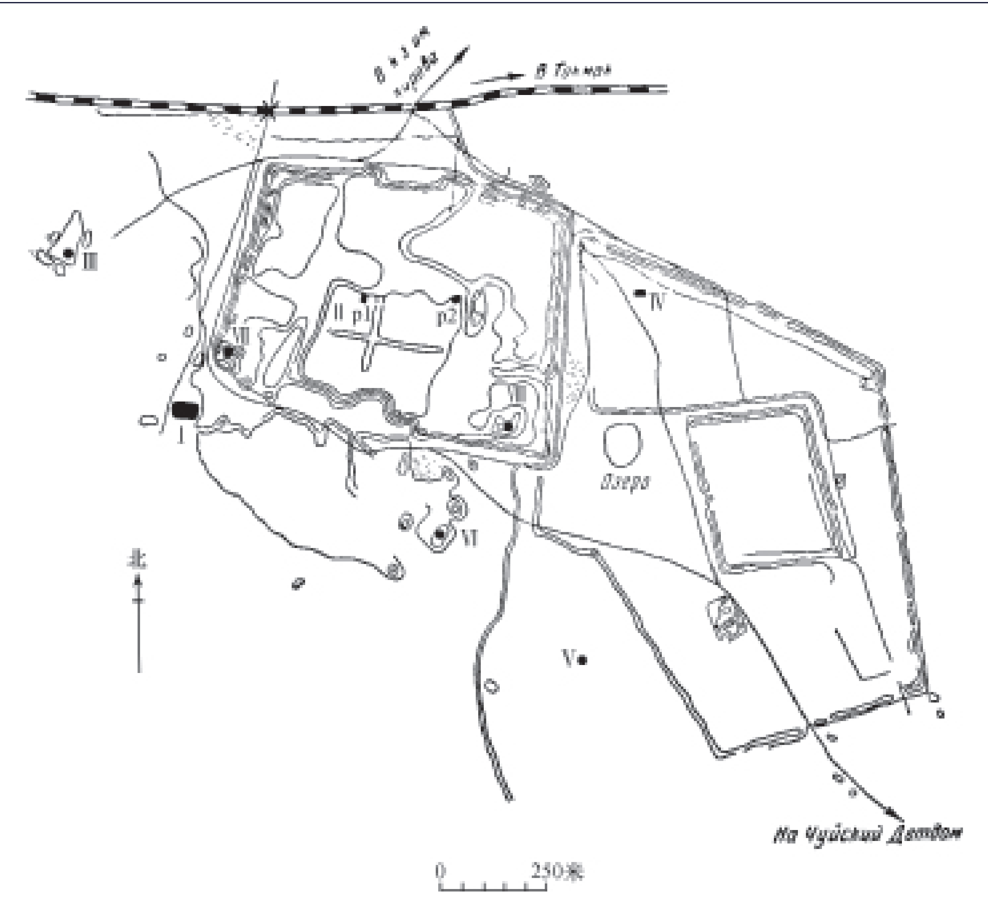
碎叶城主要由西城、东城（Shakhristan）、外城（Rabad）三个主要部分构成。西城近方形，城垣保存较好，北垣约650米，东垣约510米，南垣约750米，西垣约430米。东城倚西城东垣而建，近五边形，东南城垣保存尚好，北垣约820米，东垣约800米，南



图三六　碎叶城址平面图之一

1. 宫堡　2. 西城　3. 东城　4. 外城　5. 小阿克·贝希姆　6. 西壕沟　7. 东壕沟　8. 楚河河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в 1953-1954 гг，图1）



图三七　碎叶城址平面图之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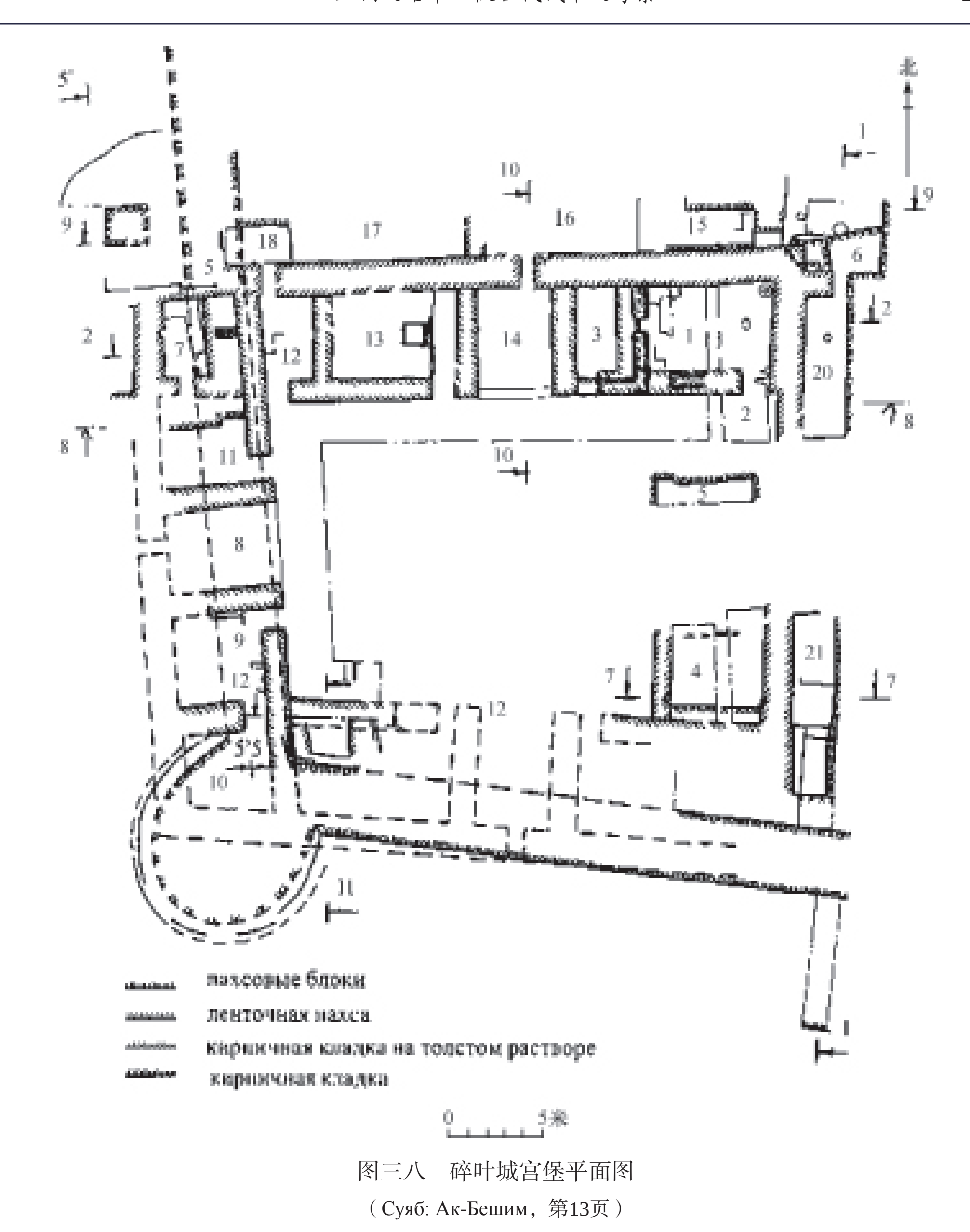
Ⅰ.第一佛寺　Ⅱ.街区　Ⅲ.摩尼教墓地　Ⅳ.第一景教堂

Ⅴ.寂静之塔　Ⅵ.第二佛寺　Ⅶ.宫堡　Ⅷ.第二景教堂

（据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в 1953-1954 гг.图2和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еверной Киргизии，图29改绘）

垣约500米，西南垣约950米。外城绕西东两城之北、西、南三面，东面与壕沟相接，形状不规则，城垣保存不佳、难于辨识，总长近10000米。

西城四角各设角楼，四垣外侧均有马面，间距约60余米。城内南部偏西有一边长近300米的方形台地，类子城状，内有十字街，出台地向北、东、西三面延伸，直抵西城三座城门，其余位置是否另有城门，尚难判定[84]。城西南角的Ⅶ号地点为宫堡所在，系一底边长60米、顶边长30米，高8米的方形高台，上有院落。7、8世纪建于城垣基础之上，10世纪改建（图三八）。城东南角的Ⅷ号地点为第二景教堂，由三座东西向长方形教堂并列而成，发掘范围长60米，宽46米。每座教堂东部居中为圣堂，作十字折角形，三壁三龛，南北两侧均有附属建筑。南面一座教堂西部为厅堂，南北两侧有廊道，中间、北面两座教堂西部各有一大一小院落，中隔廊道。教堂约建于10世纪（图三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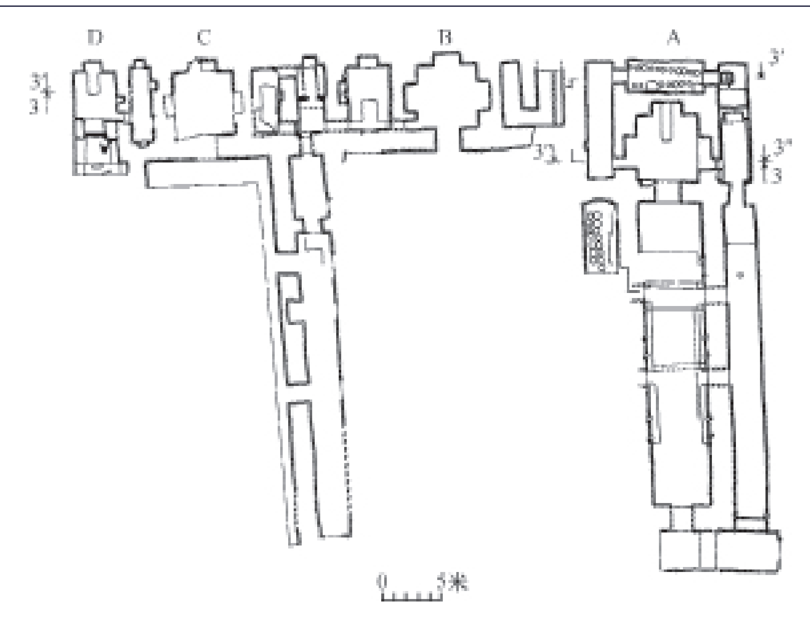


图三八　碎叶城宫堡平面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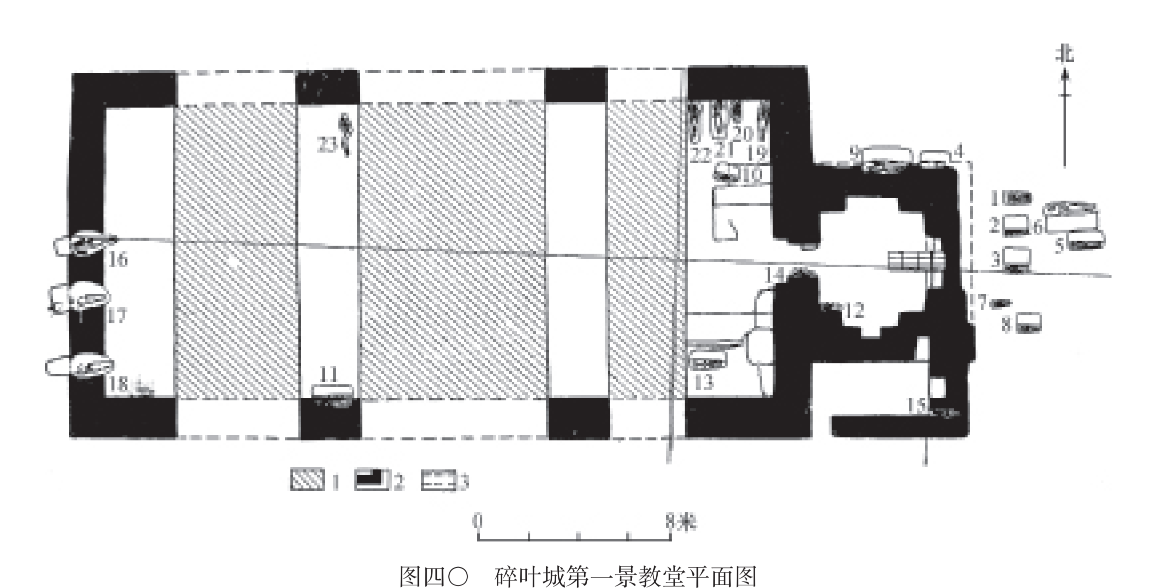
（Суяб: Ак-Бешим，第13页）

东城修建时间晚于西城，城垣外侧亦有马面，间距与西城相仿，城门位置现已难以确指。城西北部踞西垣165米的Ⅳ号地点为第一景教堂，系一东西向近长方形院落，长36米，宽15米。西部为庭院，南北两侧有廊。东部居中为圣堂，作十字折角形，三壁三龛。圣堂以南另有一附属建筑。教堂外及垣墙下、庭院内另有教徒墓葬，与教堂均为8世纪遗存（图四〇）。城西南部有伯恩施塔姆发掘的佛寺等遗迹，系一南北向长方形院落，长113米，宽64米，发现僧房、佛堂等，年代约为7、8世纪。

两城外附近亦有宗教遗迹分布。西城西南的Ⅰ号地点为第一佛寺，系一坐西朝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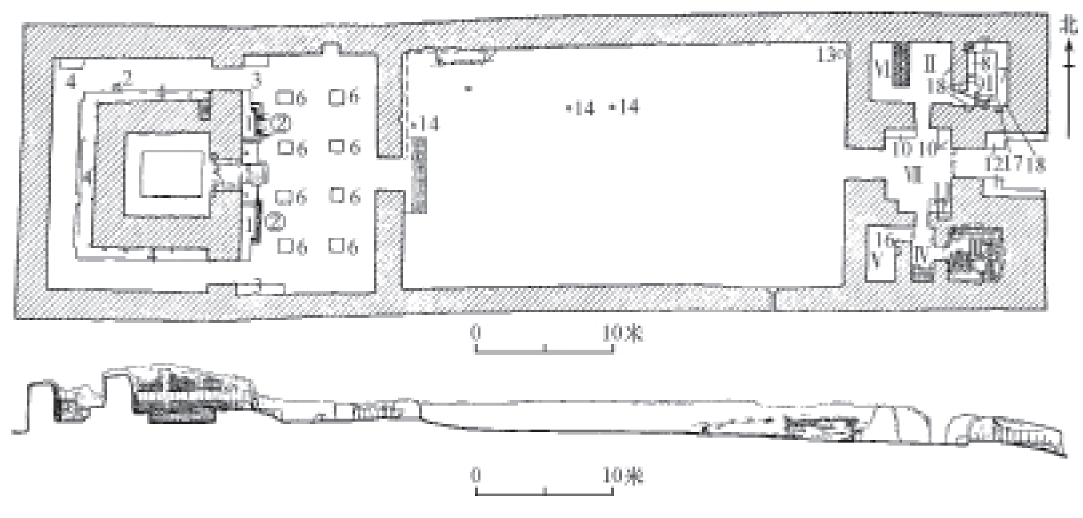


图三九　碎叶城第二景教堂平面图
（Суяб: Ак-Бешим，第45页）



图四〇　碎叶城第一景教堂平面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в 1953，1954 гг.图5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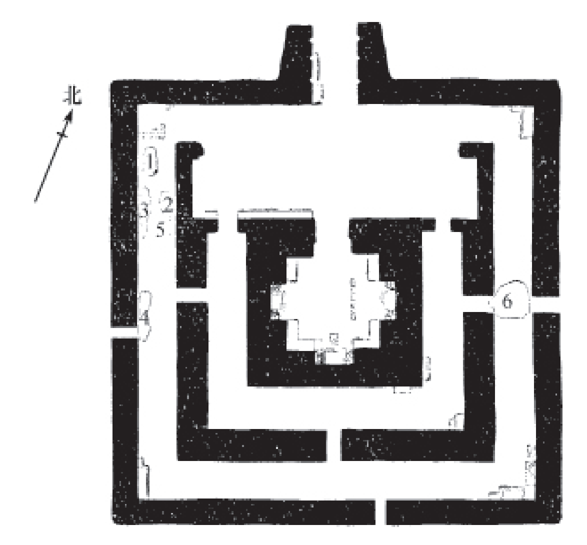
长方形院落，长76米，宽22米，主要由僧房、庭院、佛堂三部分构成。僧房在门厅两侧，各有三个房间。庭院中为通道，南北两侧有廊。佛堂又分为前殿、中堂、回廊。前殿横长方形，设8个立柱，作面阔5间、进深3间状。中堂方形，入口外南北两侧各塑释迦牟尼结跏趺坐像和弥勒垂脚倚坐像。回廊三面环绕中堂，内壁原有塑像。此寺即杜环所谓大云寺，约创建于7世纪末，8世纪初，至8世纪后半毁废（图四一）。西城东南的



图四一　碎叶城第一佛寺平面图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в 1953-1954 гг.图10）

Ⅵ号地点为第二佛寺[85]，系一坐南朝北方形建筑，边长38米，主要由前庭、中堂、内外回廊构成。中堂平面较为特殊，作十字折角形，东西南三壁三龛，各设像座。回廊内外两重，壁面原有彩画及塑像。该寺约建于7世纪，至7世纪末、8世纪初毁废（图四二）。西城之西的Ⅲ号地点为7、8世纪摩尼教墓地。东城西南的Ⅴ号地点为6、7世纪摩尼教或祆教墓地寂静之塔[86]。



图四二　碎叶城第二佛寺平面图

（Второй буддийский храм Ак-Бешимского городища，第6页）

除上述遗迹外，碎叶城还曾发现唐安西副都护、碎叶镇压十姓使杜怀宝造像碑座、一佛二菩萨造像碑、螭首碑额、汉文残碑、开元通宝、乾元重宝、大历通宝、建中通宝等唐代遗物[87]。

根据考古材料及历史文献，碎叶城约5、6世纪由粟特人创建，7世纪后期至8世纪前期由突厥、唐、突骑施交替控制达于繁盛，8世纪中期以后陆续为葛逻禄、喀喇汗所占据，11世纪以后随着毗邻新都八剌沙衮的兴起而渐趋衰废。

七、怛　逻　斯

怛逻斯城位于今哈萨克斯坦斯坦共和国塔拉兹市（Taraz）塔拉斯河（Taras）西岸，故城在市区地下，古今重迭，近代以来曾名奥列阿塔（Aulie-ata）和江布尔（Zhambyl）。该城位居东西交通要冲，天山余脉至此而尽，沿山之北麓有大路东往碎叶（唐之玄奘、金元之丘处机、耶律楚材、常德），顺山南塔拉斯河谷亦有小径可达伊塞克湖（明之陈诚），西南经赛兰（Sairam）可通塔什干（Tashkent）或讹答剌（Otrar），西北则可径趋里海北岸。

玄奘《大唐西域记》云："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呾逻私城。城周八九里，诸国商胡杂居也。土宜气序，大同素叶。"[88]《通典》引杜环《经行记》云："（碎叶）川西头有城名曰怛逻斯，石国人镇，即天宝十年高仙芝军败之地。"[89]《新唐书》引贾耽《皇华四达记》云，自碎叶而西，"十里至米国城，又三十里至新城，又六十里至顿建城，又五十里至阿史不来城，又七十里至俱兰城，又十里至税建城，又五十里至怛罗斯城。"[90]

怛逻斯城考古工作以1936～1938年伯恩施塔姆所作发掘为早[91]（图四三），后续工作20世纪40至60年代由帕特舍维奇（G. I. Patsevich）、阿戈耶娃（E. I. Ageeva）、莫什谢耶夫（M. S. Mershchiev）等主持[92]，20世纪80至90年代由拜巴科夫（K. N. Baipakov）领导[93]，2011年以来为配合考古公园建设，连续进行较大规模发掘[94]。

城之格局由宫堡、内城、外城三部分组成。内城类方形，边长近400米；宫堡位于内城北部偏东，作长方形，东西约170米，南北约120米；外城推测系从东南西三面围绕内城，且由东至西经过不同时期渐次拓展，故而作扁长方形（图四四、图四五）。玄奘所记"城周八九里"者，当指外城而言。通过发掘，怛逻斯城自公元1世纪以迄18世纪遗存可将区分为四期十段，即：康居-乌孙期、突厥-葛逻禄期、喀喇汗-西辽期、钦察-哈萨克斯坦期。其中宫堡范围新近发现之9～10世纪琐罗亚斯德教拜火坛及11～12世纪伊斯兰教浴室（hammam）较为重要。

怛逻斯城附近交通在线另有数座中古小城存在，9～10世纪阿拉伯地理学著作留有详细里程记录，其中即包括西南方向之别克托别（Bektobe / Dzhuvikat）及东北方向之托克库尔托别（Tortkultobe / Lower Barskhan）和科斯托别（Kostobe / Dzhamukat）。城之边长多在300米上下，与怛逻斯内城相若，亦属楚河-塔拉斯河流域古城常见之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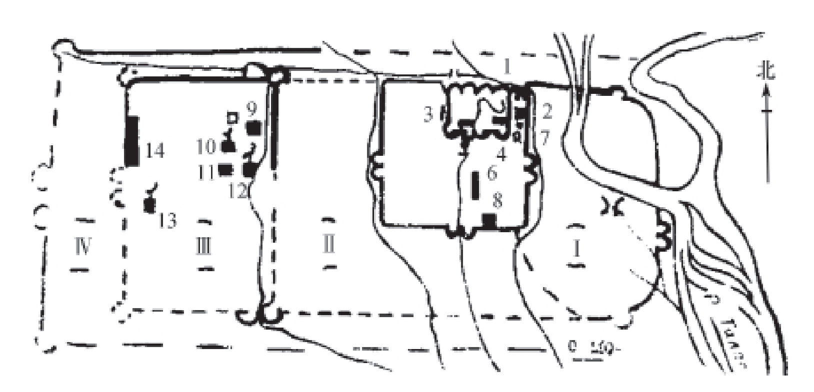
附记：本文为中国人民大学亚洲研究中心项目"丝绸之路中亚段古代城市的调查与研究"（15YYA06）研究成果。

ПЛАН ГОРОДИЩА ТАРАЗА

0 50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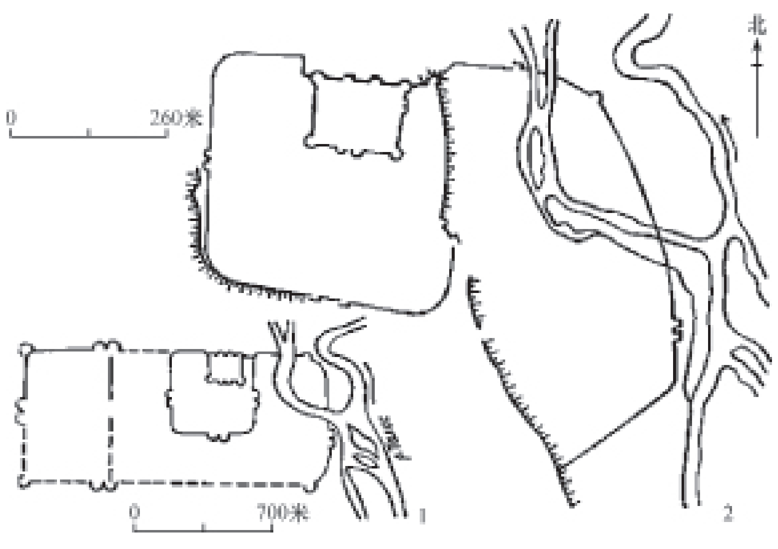
图四三　怛逻斯城址平面图

（Памятники старины Таласской долины: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附图）



图四四　怛逻斯城平面示意图之一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Тараз，第25页）



图四五　怛逻斯城平面示意图之二
（Археолог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第277页）

注　释

［1］ 班固．汉书·卷九六上·西域传上［M］. 北京：中华书局，1962：3889，3890.

［2］ a. 余太山. 塞种史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175.
b. 杨巨平. 帕提亚王朝的“爱希腊”情结［J］. 中国社会科学，2013（11）：187，188.

［3］ a. V. N. Pilipko. Excavations of Staraia Nisa［J］. *Bulletin of the Asia Institute*, New Series, Vol. 8. The Archaeology and Art of Central Asia Studies From the Former Soviet Union, 1994: 101-116.
b. В. Н. Пилипко. Старая Ниса: Основные итог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го изучения в советский период［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2001.

［4］ a. Carlo Lippolis. Old Nisa: The Turkmen–Italian Archaeological Project［A］. *Monuments of History and Culture of Turkmenistan: Discoveries, Researches and Restoration for 20 years of Independence*［R］, 2011: 286-301.
b. Lucinda Dirven. Italian Studies on Parthian Nisa (Mithradatkert)［J］. *Bibliotheca Orientalis*, 2013: 632-642.

［5］ 或以为是帕提亚米特里达梯二世（Mitridat II）之女罗多古娜（Rodoguna）.

［6］ Antonio Invernizzi. *Sculture di metallo da Nisa: Cultura greca e cultura iranica in Partia*［M］. Louvain: Peeters, 1999.

［7］ Antonio Invernizzi. A Note on the Nisa Rhytons［J］. *Μνεμεṣον: Scritti in memoria di Paolo Fiorina.* Alessandria: Edizioni dell’Orso, 2013: 87-100.

［8］ C. Lippolis. Note on Parthian Nisa on the Light of New Research［J］. Проблемы истории, филологии, культуры, 1(21), 2010: 36-45.

［9］ Antonio Invernizzi. Thoughts on Parthian Nisa［J］. *Parthica*, 2004(6): 137-140.

［10］ В. Н. Пилипко. Старая Ниса: Здание с квадратным залом［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кая фирма “Восточ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РАН, 1996.

［11］ *The Pathian Fortresses of Nisa*［M］. *Turkmenistan.* Government of Turkmenistan, 2005.

［12］ 土库曼斯坦国家博物馆藏，2014年11月参观目验.

［13］ 范晔. 后汉书・卷八八・西域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88：2918.

［14］ 杜佑.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大食》［M］. 北京：中华书局，1988：528.

［15］ В. А. Жуковского, Развалины старого Мерва. Материалы по археологии России No. 16, Древности Закаспийского Края,［M］С. -Петербург: Типография Глав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Уделов, 1894.（朱可夫斯基《旧木鹿废墟》）同年，法国摄影家纳达尔（Paul Nadar）也拍摄了一组木鹿城遗迹照片.

［16］ Hubert Schmidt. The Excavations in Ghiaur Kala (Old Merv), Raphael Pumpelly ed. *Explorations in Turkestan: Expedition of 1904*［C］, Chap. 10. Washington, D. C. : Carnegie Institution of Washington, 1908: 187-210.

［17］ a. Georgina Herrmann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1992)［J］. *Iran*, Vol. 31, 1993: 39-62.

b. Georgina Herrmann et al. The International Merv Project: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Ninth Year (2000)［J］. *Iran*, Vol. 39, 2001: 1-52. 案：IMP连续九个年度简报均发表于*Iran*杂志，在此仅列出首尾两篇，其余从略.

［18］ a. Tim Williams et al. The Ancient Merv Project, Turkmenista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First Season (2001)［J］. *Iran*, Vol. 40, 2002: 15-41.

b. Tim Williams et al. The Ancient Merv Project, Turkmenistan: Preliminary Report on the Second Season (2002)［J］. *Iran*, Vol. 41, 2003: 139-170.

［19］ Gabriele Puschnigg. *Ceramics of the Merv Oasis: Recycling the City*［M］. Walnut Greek, California: Left Coast Press, 2006: Plate 14.

［20］ V. A. Zavyalov. The Fortifications of the City of Gyaur Kala, Merv. Joe Cribb & Georgina Herrmann eds. *After Alexander: Central Asia before Islam*［M］. Proceedings of the British Academy 133,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313-329.

［21］ Tim Williams. The City of Sultan Kala, Merv, Turkmenistan: Communities, Neighbourhoods and Urban Planning from the Eighth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C］. Amira K. Bennison & Alison L. Gascoigne eds. *Cities in the Pre-Modern Islamic World: The Urban Impact of Religion, State and Society*［M］.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42-62.

［22］ 阿拉伯地理学家对木鹿城多有描述，如雅库比（Al-Ya’qubi）《列国志》、佚名《世界境域志》、伊斯塔赫里（Al-Istakhri）《省道志》、穆卡达西（Al-Muqaddasi）《地域知识》、雅古特（Yaqut）《地理词典》等. Some Ancient and Medieval texts about Merv［C］. in Georgina

Herrmann. *Monuments of Merv: Traditional Buildings of the Karakum*. 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1999: 122-126.

［23］ 志费尼著，何高济译. 马鲁及其命运［A］. 世界征服者史［C］. 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172 ~ 188.

［24］ Georgina Herrmann. *Monuments of Merv: Traditional Buildings of the Karakum*［M］. London: The Society of Antiquaries of London, 1999.

［25］ 魏徵，令狐德棻.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48，1849.

［26］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飒秣建国［M］. 北京：中华书局，1985：87.

［27］ a. Л. И. Альбаум. Живопись Афрасиаба［M］. Ташкент: Фан, 1975.

b. L. I. アリバウム著. 加藤九祚訳古代サマルカンドの壁画［M］. 東京：文化出版局，1980.

［28］ 法兰兹・格瑞内著，阿米娜译. 法国-乌兹比克考古队在古代撒马尔干遗址阿弗拉西阿卜（Afrasiab）发掘的主要成果［A］. 法国汉学第8辑（教育史专号）［C］. 北京：中华书局，2003：510~531.

［29］ 杜佑.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M］. 北京：中华书局，1988：5257.

［30］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247.

［31］ “当拂呼缦・乌纳什王走过来时，（使者）张口（说到）：‘我乃Pukarzate，支汗那之臣. 我从支汗那之王Turantash处来到康国王处. 我在此向国王致敬. 关于康国的神以及康国的文字我都很清楚，没有任何疑问. 我也没做任何有损于大王之事. 愿您吉祥如意. ’然后拂呼缦离他而去. （然后）石国使臣张口. ” Vladimir Livšic. The Sogdian Wall Inscriptions on the Site of Afrasiab. in Matteo Comparet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s. *Royal Naurūz in Samark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in Venice on the Pre-Islamic Paintings at Afrasiab*, Supplemento No. 1,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Vol 78,［J］. Rom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6: 59-74. 中译文据芮乐伟・韩森著，张湛译. 丝绸之路新史［M］.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5：162.

［32］ 王溥. 唐会要・卷九九［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105.

［33］ a. Boris Marshak. Le programme iconographique des peintures de la ‘Salle des ambassadeurs’ à Afrasiab (Samarkand)［J］. *Arts Asiatiques*, 1994（49）: 5-20.

b. ボーリス・マルシャック《ソグドの美術》，田辺勝美，前田耕作編《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編15（中央アジア）. 東京：小学館，1999：213.

c. Boris Marshak. Remarks on the Murals of the Ambassadors Hall. in Matteo Comparet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s. *Royal Naurūz in Samark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in Venice on the Pre-Islamic Paintings at Afrasiab*, Supplemento No. 1.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Vol. 78［J］. Rom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6: 5-85.

［34］ a. Frantz Grenet. Maracanda/Samarkand, une métropole pré-mongole: Sources écrites et archéologie.

Annales. Histoire, Sciences Sociales［C］, 2004: 1043-1067.

b. Frantz Grenet. The Self-image of the Sogdians. in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Éric Trombert eds. , *Les Sogdiens en Chine*［C］, Paris: É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 2005: 123-140.

c. Frantz Grenet. What was the Afrasiab Painting about . in Matteo Comparet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s. , *Royal Naurūz in Samark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in Venice on the Pre-Islamic Paintings at Afrasiab*, Supplemento No. 1,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Vol. 78［J］, Rom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6: 43-58.

d. Frantz Grenet. The 7th-century AD ‘Ambassadors’ Painting’ at Samarkand. *Mural Paintings of the Silk Road: Cultural Exchanges between East and West*［C］. London: Archetype Publications Ltd. , 2007: 9-19.

［35］ François Ory. Essai de restitution des parties maquantes de la peinture d’Afrasiab. in Matteo Comparet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s. , *Royal Naurūz in Samark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in Venice on the Pre-Islamic Paintings at Afrasiab*, Supplemento No. 1,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Vol 78［J］. Rom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6：87-105.（奥利《阿弗拉西阿卜壁画复原试探》）葛勒耐在其个人网站上提供了奥利所绘另一版本复原图：http://frantz. grenet. free. fr/index. php?choix=ambassadeurs.

［36］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Les Turcs, rois du monde à Samarcande. in Matteo Comparet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s. *Royal Naurūz in Samark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in Venice on the Pre-Islamic Paintings at Afrasiab*. Supplemento No. 1.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Vol. 78［J］. Rom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6：147-162.

［37］ Markus Mode. Court Art of Sogdian Samarqand in the 7th century AD. website, 2002-05-13, http://www. orientarch. uni-halle. de/ca/afras/index. htm. Markus Mode. Reading the Afrasiab Murals: Some Comments on Reconstructions and Details. in Matteo Comparet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s. *Royal Naurūz in Samark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in Venice on the Pre-Islamic Paintings at Afrasiab*. *Supplemento* No. 1.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J］. *Nuova Serie*, Vol. 78［J］. Rom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6: 107-128.

［38］ 魏徵，令狐德棻.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石国［M］：“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瓮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 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50.

［39］ a. Matteo Compareti & Simone Cristoforetti. Proposal for a New Interpretation of the Northern wall of the ‘Hall of the Ambassadors’ at Afrasyab. *Central Asia from the Achaemenids to the Timurids: Archaeology, History, Ethnology, Culture, Materials of an International Scientific Conference dedicated to the Centenary of Aleksandr Markovich Belenitsky*［C］. St. Petersburg, 2005: 215-220.

b. Matteo Compareti. A Reading of the Royal Hunt at Afrasyab Based on Chinese Sources. in Matteo

Compareti,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s. *Royal Naurūz in Samarkand: Proceedings of the Conference Held in Venice on the Pre-Islamic Paintings at Afrasiab*, Supplemento No. 1, *Rivista degli studi orientali*. Nuova Serie, Vol. 78［J］. Roma: Istituti Editoriali e Poligrafici Internazionali, 2006: 173–184.

c. Matteo Compareti, Simone Cristoforetti. New Elements on the Chinese Scene in the “Hall of the Ambassadors” at Afrāsyāb along with a Reconsideration of “Zoroastrian” Calendar. *Eurasiatica: Quaderni del Dipartimento di Studi Eurasiatici*, 78［J］. Venice: Università Ca’ Foscari Venezia, 2007.

［40］ Frantz Grenet. Le palais de Nasr Ibn Sayyar à Samarkand (années 740). in 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 ed. . *Islamisation de l'Asie centrale, Processus locaux d'acculturation du VIIe au XIe siècle*, *Studia Iranica*［J］. Cahier 39, 2008: 11-28.

［41］ a. Yury Karev. Qarakhanid Wall Paintings in the Citadel of Samarqand: First Report and Preliminary Observations. *Muqarnas: An Annual on the Visual Culture of the Islamic World*［J］, 2005(22): 45-84.

b. Yury Karev. From Tents to City: The Royal Court of the Western Qarakhanids between Bukhara and Samarqand. David Durand-Guédy ed. *Turko-Mongol Rulers, Cities and City Life*［C］. Leiden & Boston: Brill, 2013: 99-147, Chapter 3.

［42］ 李志常. 长春真人西游记. 陈正祥. 中国游记选注（第1集）［C］. 香港：香港商务印书馆，1979：82.

［43］ 马小鹤. 米国钵息德城考. 中亚学刊（第2辑）［J］. 北京：中华书局，1987：65~75.

［44］ 魏徵，令狐德棻. 隋书・卷八三・西域传・米国［M］. 北京：中华书局，1973：1854.

［45］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247.

［46］ А. Ю. Якубовский, А. М. Беленицкий, М. М. Дьяконов, П. И. Костров. Живопись древнего Пянджикент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4.

［47］ a. А. М. Беленицкий, В. Л. Воронина, П. И. Костров, Скульптура и живопись древнего Пянджикента［M］. Москв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59.

b. A. M. Belenitski, B. I. Marshak. L'art de Piandjikent à la lumière des dernièresfouilles (1958-1968)［J］. *Arts Asiatiques*, 1971(23-1): 3-39.

c. А. М. Беленицкий,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Пенджикента. Живопись. Скульптура［M］.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73.

d. A. M. Belenitskii, B. I. Marshak. The Painting of Sogdiana. in Guitty Azarpay, *Sogdian Painting: The Pictorial Epic in Oriental Art*［M］.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1: 11-77.

［48］ a. Boris I. Marshak, Les fouilles de Pendjikent［J］. *Comptes rendus des séances de l'Académie des Inscriptions et Belles-Lettres*, 1990(134-1): 286-313.

b. Boris I. Marshak.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M］. New York:

Bibliotheca Persica Press, 2002.

c. Boris I. Marshak. Panjikant. *EncyclopædiaIranica*［M］. 2002.

［49］ Материалы Пенджикент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ыпуск I-XVIII,Отчет о Полевых Работах Экспедиция В 1998–2014 гг. ,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99-2015.

［50］ Boris I. Marshak, *Legends, Tales, and Fables in the Art of Sogdiana*［M］. New York: Bibliotheca Persica Press, 2002.

［51］ a. 马小鹤. 公元八世纪初年的粟特——若干穆格山文书的研究. 中亚研究（第3辑）［J］. 北京：中华书局，1990：109~138.

b. 同［48］c.

［52］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二二一下・西域传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6245.

［53］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窣堵利瑟那国［M］. 北京：中华书局，1985：85.

［54］ a. Н. Н. Негматов, С. Г. Хмельницкий.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Шахристан［M］. Душанбе: Дониш, 1966.

b. N. N. Negmatov, Ustrushana, Fergana, Chach and Ilak, in B. A. Litvinsky ed. *History of Civilizations of Central Asia*［M］. Vol. III, Paris: UNESCO Publishing, 1996: 262-281.

［55］ a. Н. Н. Негматов. О живописи дворца афшннов Уструшаны (Предварителъное сообщение)［J］.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ология, 1973(3): 183-202.

b. В. М.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О живописи «малого» зала дворц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городища Калаи Кахкаха I［J］. Сообщен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1974(XXXIX): 48-52.

c. Соколовский. Монументальная живопись VIII - начала IX века дворцов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Бунджиката, столицы средневеков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Уструшаны［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Изд-воГос. Эрмитажа, 2009.

d. サイドムロド. ボボムロエフ、山内和也編. カフカハ遺跡群出土壁画（中央アジア文化遺産保護報告集第6巻)［M］. タジキスタン共和国アカデミー歴史・考古・民族研究所・東京文化財研究所，2010.

e. 山内和也、サイドムロド. ボボムロエフ編. カフカハ遺跡群の図面と出土品（土器と木彫）（中央アジア文化遺産保護報告集第9巻）［M］. タジキスタン共和国科学アカデミー・東京文化財研究所，2011.

［56］ a. Burchard Brentjes. Romulus und Remus mit der Wölfin aus Nordtadshikistan［J］.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1971(15): 183-185.

b. Guitty Azarpay. The Roman Twins in Near Eastern Art［J］. *Iranica Aniqua*, 1988(23): 349-360.

c. Burchard Brentjes. Zur Kunst und Religion der Afshinen der Ustrushana. Serie Orientale Roma［J］. *Orientalia Iosephi Tucci Memoriae Dicata*, 1985(56): 191-197.

［57］ К. В. Тревер, В. Г. Луконин. Сасанидское Серебро: Собра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Эрмитажа

［M］. Москва: Искусство, 1987.

［58］ Б. Н. Маршак. Согдийское Серебро［M］.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1971.

［59］ a. 阿克・贝希姆古城为碎叶城之考证参：Gerard Clauson. Ak Beshim-Suyab［J］.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of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1961(1/2): 1-13.

b. 张广达. 碎叶城今地考［J］. 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1979（5）：70～82.

［60］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素叶水城［M］. 北京：中华书局，1985：71.

［61］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149, 1150.

［62］ 刘昫等. 旧唐书・卷一九四下・突厥传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56：5183，5184.

［63］ 同［62］：5188.

［64］ a. 张说. 赠太尉裴公神道碑. 张说之文集・卷一四［M］. 四部丛刊初编影印明嘉靖十六年伍氏龙池草堂刻本：叶9a.

b. 刘昫等. 旧唐书・卷八四・裴行俭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2803.

［65］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卷九六七・外臣部一二・继袭二［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200.

［66］ 李昉等编. 文苑英华・卷九一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56：4804.

［67］ 刘昫等. 旧唐书・卷一八五上・王方翼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4802，4803.

［68］ 王钦若等编. 册府元龟・卷九六四・外臣部九・封册二［M］. 南京：凤凰出版社，2006：11171.

［69］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〇七［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562.

［70］ 同［62］：5190.

［71］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二二一上・焉耆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5：6230. 案：此十姓可汗实指突骑施可汗苏禄而言。

［72］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一二［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754.

［73］ 司马光. 资治通鉴・卷二一四［M］. 北京：中华书局，1956：6834，6835.

［74］ 刘昫等. 旧唐书・卷九・玄宗纪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56：211.

［75］ 杜佑. 通典・卷一九三・边防九・西戎五・石国条引杜环・经行记［M］. 北京：中华书局，1988：5275.

［76］ 王溥. 唐会要・卷一〇〇・葛逻禄国［M］.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2124.

［77］ В. В. Бартольд. Отчет о поездке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с научною целью. 1893-1894 гг［A］. В. В. Бартольд Сочинения［C］. Т. 4. Москва, 1966.

［78］ a. А. Н. Бернштам.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 северной Киргизии［C］. Фрунзе, 1941.

b. А. Н. Бернштам. Труды Семирече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Чуйская долина［C］. Москва–Ленинград, 1950.

［79］ a. Л. Р. Кызласов.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 на городище Ак-Бешим в 1953-1954 гг［A］.

Труды Киргиз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о-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C］. Т. 2. Москва, 1959.

b. Л. Р. Кызласов. Городская цивилизация Срединной и Северной Азии: 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C］. Москва, 2006.

c. Leonid R. Kyzlasov. *The Urban Civilization of Northern and Innermost Asia: Historical and Archaeological Research*［C］. Bucureşti & Brăila, 2010.

［80］ Л. П. Зяблин. Второй буддийский храм Ак-Бешимского городища［M］. Фрунзе, 1961.

［81］ Г. Л. Семёнов. Раскопки 1996-1998［A］. Суяб: Ак-Бешим［M］.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2002.

［82］ L. M. Vedutova, Shinichiro Kurimoto. *Paradigm of Early Middle Age Turkic Culture: Ak-Besim Settlement*［C］. Bishkek, 2014. 案：此次发掘区编号为X号地点，据谷歌地球卫星照片，此前在西城西南部另有一发掘区，疑为IX号地点.

［83］ Masashi Abe. Results of the Archaeological Project at Ak Beshim (Suyab), Kyrgyz Republic from 2011 to 2013 and a Note on the Site`s Abandonment［J］. *Intercultural Understanding*, 2014(4): 11-16.

［84］ 关于王方翼筑碎叶城，张广达认为西城“城垣的形制完全符合王方翼筑城的屈曲隐伏之状。如果王方翼此次筑城是在玄奘所见城垣基础上增筑，则五旬而毕自然完全可能. ”参前揭张氏文第78页.

［85］ a 科兹拉索夫将Ⅵ号地点第二佛寺标记在西城正南，然据1960年代航片显示，该地点标记有误，兹据以改正.

b. В. А. Кольченко. Новое Втором Буддийском Храме Городища Ак-Бешим. Материалы Пенджикент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Экспедиции. Выпуск XX［C］. Тезисы докладов научной конференции «Аспекты Согд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к 70-летию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работ в Пенджикенте, 2016.

［86］ 努尔兰・肯加哈买提. 碎叶考古与唐代中西文化交流［D］. 北京：北京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7：173.

［87］ 杜怀宝造像碑、汉文残碑于志勇摹本参：

a. 周伟洲.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唐杜怀宝造像碑题铭考［A］. 唐研究（第6卷）［C］.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384.

b. 周伟洲. 吉尔吉斯斯坦阿克别希姆遗址出土残碑考［A］. 边疆民族历史与文物考论［C］.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0：313.

c. 一佛二菩萨造像碑现藏吉尔吉斯国家博物馆，螭首碑额现藏布拉纳古城陈列室，2014年11月参观目验.

［88］ 玄奘，辩机著，季羡林等校注. 大唐西域记校注・卷一・呾逻私城［M］. 北京：中华书局，1985：77.

［89］ 杜佑. 通典・卷一九・边防九・西戎五・石国［M］. 北京：中华书局，1988：5276.

［90］ 欧阳修，宋祁. 新唐书・卷四三下・地理志七下［M］. 北京：中华书局，1975：1150.

［91］ А. Н. Бернштам. Памятники старины Таласской долины: Историко-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й очерк［C］. Алма-Ата: 1941.

［92］ Т. Н. Сенигова, Средневековый Тараз［M］. Алма-Ата: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1972.

［93］ a. К. М. Байпаков, Ж. К. Таймагамбетов. Археология Казахстана［M］. Алматы: Казақ университеті, 2006.

b. К. М. Байпақов. Локализация городов казахского ханства, Извес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J］. Се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2014(5): 75-133.

［94］ a. Giles Dawkes. Excavating a Silk Road City: The Medieval Citadel of Taraz, Kazakhstan［J］. *Archaeology International*, 2012-2013(16): 110-119.

b. Giles Dawkes, Gaygysyz Jorayev. A Case Study of an Early Islamic City in Transoxiana: Excavations at the Medieval Citadel in Taraz［J］. Kazakhstan.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in Asia*, 2015(4): 17-24.

c. Д. А. Воякин, С. Ш. Акылбек. Р. Н. Буранбаев. Итоги археологически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на городище Тараз в 2013 г. Извест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Республики Казахстан［J］. Сер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и гуманитарных наук, 2014(5): 175-187.

A Review of Ancient Urban Sit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Central Asia

Liu Wei

Abstract: The author went to Turkmenistan, Kazakhstan, Kyrgyzstan and Tajikistan to investigate the ancient urban sites along the Silk Road in Central Asia in 2014. This article reviews 7 urban sites, Nisa, Merv, Afrasiab, Panjikent, Bunjikat, Ak-Beshim, Taraz, based on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archaeological materials.

Key words: urban site; urban archaeology; Silk Road; Central Asia

唐代鎏金铜腰带具探析

刘荣贵

（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台中，407）

一、前　　言

唐代文献上关于腰带具材质种类的记载颇多，略有：金、金玉、玉、银、鍮石、[1]铜、铁等，其使用与佩戴者官等身份之间均具有必然的对应关系，[2]基本上铜带具系八品以下官员至庶人所佩戴，而实务上唐代墓葬中亦以铜带具出土的数量最多，[3]但是一种非属体制内的鎏金铜腰带具其出土则格外引人关注。[4]

唐代的金、银价值不菲，[5]举凡官员进奉、帝王犒赏、皇家供佛等器物均以金、银（银胎鎏金）为之，金质腰带具自然在舆服制度中成为高阶品第身份代表之器。目前唐代出土金质腰带具略有：1986年宁夏固原（关内道）史道德墓出土金带扣、带銙等、[6]1986年宁夏固原（关内道）史诃耽夫妇墓出土金铊尾、[7]1986年宁夏固原（关内道）史铁棒墓出土金铊尾、[8]1971年吉林（河北道）和龙县八家子公社渤海墓群1号及2号墓出土各式金质带具 1 批、[9]1975年内蒙赤峰敖汉旗李家营子墓葬出土各式金质带具99件、[10]1979年山西省（河东道）平鲁县平鲁公社夯土建筑台基窖藏出土金质带銙82件、[11]1981年内蒙古锡林郭勒布图木吉苏木征集被盗扰文物之各式金质带具 1 批等。[12]

“鎏金”铜腰带具虽然具有“似金”的外貌，然“铜”胎的本质不变，其经济价值及身份表征性无法与“黄金”等同视之，因此“鎏金”铜腰带的出现在使用及功能上必有其特殊之考虑与目的，本文搜集并汇整鎏金铜腰带具出土资料，初步探析唐代这种特殊材质腰带具的相关问题。

二、鎏金铜腰带具出土概况

依据笔者目前搜集的出土资料统计，唐代鎏金铜腰带具总计出土23处（表一、表二），其中，长安京畿道9处：西安郊区墓、陕西礼泉李绩墓、陕西礼泉尉迟敬德墓、西安李文贞墓、陕西韦泂墓、西安温绰夫妇墓、西安三桥镇硫酸厂墓、西安殷仲容夫妇

墓、西安丈八乡傅村墓。关内道2处：宁夏固原史诃耽夫妇墓、史铁棒墓。河东道1处：山西大同城西墓。河北道（含忽汗州渤海国）合计11处：河北临城赵天水夫妇墓、北京史思明墓、北京邢台旅馆基建工地墓、北京宣武区甘石桥墓、黑龙江海林市山嘴子渤海墓葬、吉林前甸子渤海古墓、吉林和龙北大渤海王室墓、黑龙江林羊草沟渤海墓、吉林六顶山渤海墓、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黑龙江东宁大城子渤海古城遗址等（图一）。



图一　唐代鎏金铜腰带具出土地区分布图
（《中国历史地图大图鉴·上册·原始时代～唐代》第9页）

（一）出土地区分布

由目前出土分布状态可以发现：唐代鎏金铜腰带具出土以长安京畿及其以北、东北地区为密集分布地区（京畿道9处、河北道含忽汗州渤海国11处，共计20处）。

表一　唐代鎏金铜腰带具出土统计表

序号	出土时间、地点	墓主身份	墓葬型式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
01	1971年，陕西（京畿道）礼泉昭陵陪葬墓	尉迟敬德（盛唐658年）	双室砖墓	鎏金铜奔兽纹长方銙1件；长方銙未穿孔	昭陵文物管理所. 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8（3）：20～25
02	1971年，陕西（京畿道）礼泉昭陵陪葬墓	李绩（盛唐669年）	长斜坡土洞墓	鎏金铜兽纹腰带具，含带扣1件、带环1件、兽面纹长方銙2件、扣眼5件、蔓草花纹铊尾1件，共10件；长方銙均穿孔（缺图）	昭陵博物馆. 唐昭陵李绩（徐懋功）墓清理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0（3）：3～14
03	1986年，宁夏（关内道）固原小马庄村墓	史诃耽夫妇（盛唐669年）	土洞室墓	鎏金铜带扣、铜环各1件	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55～77
04	1986年，宁夏（关内道）固原小马庄村墓	史铁棒（盛唐670年）	土洞室墓	鎏金铜无纹带銙1件；带銙中有椭圆穿孔	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78～86
05	2000年，西安（京畿道）东郊纺正街M2墓	温绰夫妇（盛唐670年）	单室土洞墓	鎏金铜带扣1件、桃形无纹带銙5件、椭圆无纹带銙1件、铊尾1件，共8件；带銙中间均有穿孔；出于棺床东侧人骨架上，为女墓主用具	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东郊唐温绰、温思暕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2（12）：37～49
06	1987年，陕西（京畿道）长安县南里王村墓地	韦泂（盛唐692年）	砖砌洞室墓	鎏金铜团花纹带銙7件、铊尾1件，共8件；带銙均未穿孔	负安志.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J］. 考古与文物，1993（1）：5～52
07	1955～1961年，西安（京畿道）郊区隋唐墓	不详（盛唐650～755年或中晚唐756～904年）	土洞墓	鎏金铜无纹腰带具1副，含：弓形带扣、有孔花形铜饰与长方形套环组成之带銙、龟背铊尾、圆角长形带环等；实际数量未刊载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郊区隋唐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79～81
08	2004年，西安（京畿道）西北大学长安校区墓葬	殷仲容夫妇（盛唐703年）	单室土洞墓	鎏金铜无纹带銙1枚；带銙偏下方有长方形穿孔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7（5）：19～30

续表

序号	出土时间、地点	墓主身份	墓葬型式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
09	1981年，北京（河北道）丰台区墓葬	史思明（中唐761年）	仿帝陵墓	鎏金铜带扣17件、鎏金铜无纹铊尾18件、鎏金铜带环10件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J］. 文物，1991（9）：28～39
10	2000年，西安（京畿道）三桥镇硫酸厂工地M8墓	不详（中晚唐756～904年）	土洞墓	鎏金铜双狮宝珠纹带扣1件、雄狮暨金翅鸟纹带饰1件、双狮宝珠纹方銙4件、宝相花纹圆銙6件、扣眼4件、素面无纹铊尾1件，共 17件； 带銙均无穿孔	孙铁山等. 西安硫酸厂唐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1（5）：9～23
11	2002年，河北（河北道）邢台旅馆基建工地M4墓	不详（中晚唐756～904年）	土洞室墓	正面鎏金无纹青铜带扣2件、方形銙4件、拱形銙7件，共13件； 方形銙及拱形銙中下部均有长方形穿孔； 出于墓主腰部	李军. 邢台旅馆唐、金墓葬［J］. 文物春秋，2006（6）：36～42
12	2004年，山西（河东道）大同市城西04M3墓	不详（中晚唐756～904年）	斜坡土洞偏室墓	鎏金铜长方形鹿纹带銙8件、心形无纹圆孔带銙2件、圭形鹿纹带銙1件、带扣及束带各2件，共16件； 带銙均未穿孔	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新发现4座唐墓［J］. 文物，2006（4）：35～46
13	2005年，西安（京畿道）雁塔丈八乡傅村M8墓	不详（中晚唐756～904年）	弧背刀型土洞墓	鎏金铜无纹带銙3枚； 带銙偏下有长方形穿孔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南郊傅村隋唐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10（3）：7～21
14	1980年，西安（京畿道）东郊M2墓	陇西李文贞（晚唐819年）	刀型土洞墓	鎏金铜无纹带銙2件（方形、圭形各1件），带銙均穿孔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东郊3座唐墓清理记［J］. 考古与文物，1981（2）：25～31
15	1976～1987年，河北（河北道）临城唐87LHM1墓	赵天水夫妇（晚唐870年）	土坑墓	鎏金铜无纹带扣1件、圭形带銙5件、方形带銙4件、铊尾1件，共10件； 带銙中央均有矩形穿孔	李振奇等. 河北临城唐墓［J］.考古与文物，1981（2）：21～27
16	2008年，北京（河北道）宣武区甘石桥08XGM1墓	不详（晚唐805～904年）	砖室墓	鎏金铜腰带具1批（含带扣、铊尾等，数量未刊载）	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市宣武区甘石桥唐墓发掘简报［J/OL］. 北京：北京市文物局，2017.03.28. http：//www.bjww.gov.cn

续表

序号	出土时间、地点	墓主身份	墓葬型式	出土内容	资料来源
17	1987年，吉林（河北道）永吉查里巴靺鞨M19墓地	初唐～中唐（618～804年）	土坑竖穴墓	鎏金铜缠枝莲花纹圭形带銙2件； 鎏金铜莲花纹云头形带銙11件； 带銙均穿孔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J］. 文物，1995（9）：29～47
18	1966～1967年，黑龙江（河北道）海林市山嘴子渤海M16墓	不详（渤海时期女性墓葬698～926年）	石室封土墓	M16出土莲瓣形鎏金铜带銙2件、莲瓣形鎏金桥状铜带銙2件，共4件； 带銙均未穿孔； 带銙出于墓主左侧骨盆边； 另于墓区采集：鎏金铜方形带銙7件、鎏金铜半月形带銙5件，共12件； 带銙均穿孔	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海林市山嘴子渤海墓葬［J］. 北方文物，2012（1）：11～26
19	1977年，吉林（河北道）抚松县前甸子渤海M1墓	不详（渤海时期698～926年）	石室封土墓	鎏金铜带扣1件、无纹带銙、铊尾各1件，共2件； 带銙均穿孔	庞志国等. 吉林抚松县前甸子渤海古墓清理简报［A］.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两晋至隋唐（三）［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523～525
20	1988年，吉林（河北道）和龙北大渤海王室墓（88HBM9）	不详（渤海时期698～926年）	石室封土墓	鎏金铜带扣1件、方形无纹带銙4件、拱形无纹带銙7件，共12件；带銙中央均有穿孔	延边博物馆. 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J］. 文物，1994（1）：41～49
21	1996年，黑龙江（河北道）海林羊草沟渤海墓地（征集）	不详（渤海时期698～926年）	石室封土墓	鎏金铜无纹带銙2件； 带銙中间均穿孔	陈璐. 海林羊草沟征集的几件渤海时期文物［J］. 北方文物，2003（2）：33
22	2004年，吉林（河北道）六顶山渤海04DLIM5墓	不详（渤海时期698～926年）	石室封土墓	鎏金铜腰带扣1件、椭圆带环1件、长方形缠枝花卉纹带銙1件、双菱纹带銙1件，共4件； 带銙均未穿孔	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等. 吉林敦化市六顶山墓群2004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9（6）：483～494
23	1972年，黑龙江（河北道）东宁大城子渤海古城遗址	不详（渤海时期698～926年）		鎏金铜花瓣形带銙3件、莲花型带銙7件、莲花带銙垫5件，共12件； 带銙均未穿孔	张泰湘. 东北亚研究——东北亚考古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185～190

表二　唐代出土鎏金铜腰带具图例说明

序号	图例	序号	图例
01	陕西礼泉尉迟敬德墓出土鎏金铜奔兽纹长方銙1件，图片来源：昭陵文物管理所.唐尉迟敬德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78（3）：21	02	陕西礼泉昭陵李绩墓出土带扣1件、带环1件、兽面纹长方銙2件、扣眼5件、蔓草花纹铊尾1件，共10件（缺图）
03	宁夏固原史诃耽夫妇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55 ~ 77	04	宁夏固原史铁棒夫妇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78 ~ 86
05	西安东郊纺正街温绰夫妇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东郊唐温绰、温思暕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2（12）：45	06	陕西长安县南里王村韦洵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笔者自拍于陕西博物馆展厅，2015.05.27
07	西安西郊隋唐墓出土腰带具，图片来源：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西安郊区隋唐墓［M］. 北京：科学出版社，1966：80	08	西安西北大学校工地殷仲容夫妇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唐殷仲容夫妇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7（5）：25

续表

序号	图例	序号	图例
09	北京丰台区史思明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丰台唐史思明墓［J］. 文物，1991（9）：33	10	三桥镇硫酸厂工地墓葬出土带具，图片来源：孙铁山. 西安出土唐代鎏金铜腰带具［J］. 收藏家，2000（2）：37～41 带扣、方銙 带坠饰方銙、圆銙 扣环、铊尾 带饰
11	河北邢台旅馆基建工地墓葬出土带具，图片来源：李军. 邢台旅馆唐、金墓葬［J］. 文物春秋，2006（6）：40	12	山西大同市城西墓葬出土带具，图片来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新发现4座唐墓［J］. 文物，2006（4）：35～46
13	西安雁塔丈八乡傅村墓出土带銙，图片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南郊傅村隋唐墓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10（3）：20 0 2厘米	14	西安东郊陇西李文贞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西安东郊3座唐墓清理记［J］. 考古与文物，1981（2）：26

续表

序号	图例	序号	图例
15	河北临城赵天水夫妇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李振奇等. 河北临城唐墓［J］. 考古与文物，1981（2）：23	16	北京市宣武区甘石桥墓葬出土带扣铊尾等（数量未刊载），图片来源：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市宣武区甘石桥唐墓发掘简报［J/OL］. 北京：北京市文物局，2017-03-28
17	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出土带具、带銙，图片来源：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J］. 文物，1995（9）：40～42	18	黑龙江山嘴子M16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黑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黑龙江海林市山嘴子渤海墓葬［J］. 北方文物，2012（1）：11～26
19	吉林抚松县前甸子渤海古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庞志国等. 吉林抚松县前甸子渤海古墓清理简报［A］.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两晋至隋唐（三）［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524	20	吉林和龙北大渤海王室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延边博物馆. 吉林省和龙县北大渤海墓葬［J］. 文物，1994（1）：41～49
21	黑龙江海林羊草沟渤海墓地出土带具，图片来源：陈璐. 海林羊草沟征集的几件渤海时期文物［J］. 北方文物，2003（2）：33	22	吉林六顶山渤海墓群出土带具，图片来源：吉林省考古研究所等. 吉林敦化市六顶山墓群2004发掘简报［J］. 考古与文物，2009（6）：489

续表

序号	图例	序号	图例
23	黑龙江东宁大城子渤海古城遗址带具，图片来源：张泰湘. 东北亚研究——东北亚考古研究［M］.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18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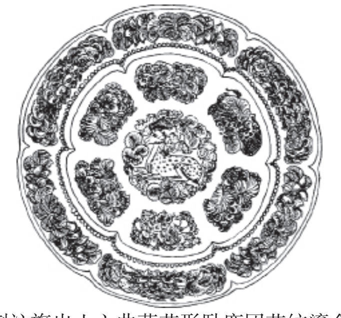
（二）纹饰探讨

总计23处出土鎏金铜腰带墓葬中，带銙或铊尾上錾刻纹饰者计有7处：李绩墓（兽纹、蔓草花纹）、尉迟敬德墓（奔兽纹）、韦洵墓（团花纹）、西安三桥镇硫酸厂工地墓（双狮宝珠纹等）、山西大同市城西墓（肉芝顶鹿纹）、吉林六顶山渤海墓（缠枝花卉纹、双菱形纹）、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缠枝花卉纹）。另有15处为光素无纹（宁夏固原小马庄村史诃耽夫妇墓，因为仅出土带扣、环，无法列入纹饰统计中）。

就纹饰而言：唐代的动物纹、植物纹系金属器物上常见的装饰纹样，其多出于现实生活所见之题材，已经逐渐摆脱自南北朝以降浓郁的宗教氛围，鎏金铜腰带具上纹饰如狮纹、鹿纹、缠枝纹等，多数都取材自西方外来的纹样风格，但是并非原封不动的挪用而系积极溶入中土的精神思维，使其蜕变成为唐代文化的部分内涵。[13]西安三桥镇硫酸厂工地墓出土鎏金铜带具所錾刻之忍冬纹（益寿）、狮子（护佛、镇邪）、金翅鸟（护法神）、花冠宝珠等纹饰，则均与西方传入佛教思想之盛行有关。

比较特别的是山西大同城西墓所出土的肉芝顶鹿纹鎏金铜腰带具，目前带具上相同纹饰仅见于1978年浙江窖藏出土肉芝顶鹿纹铜制带銙，[14]其带銙上的肉芝顶鹿纹（芝角鹿纹）正面突出似浮雕的三维效果，应采金银工艺中锤揲成型后再錾刻修饰的二段式工法（西安三桥镇硫酸厂工地出土带具上之双狮宝珠纹亦同），唐代出土各类鎏金盘、罐、壶器底或器壁上亦履见这种纹饰工法。[15]肉芝顶鹿纹可能是唐代金银工匠模仿自西方分叉单角鹿所创新的“中国化”鹿纹，其间亦曾透过“遣唐史”的转运进入日本，并成为奈良时期（710～794年）正仓院的珍藏（镀金六曲葵花形鹿纹三足银盘），积极印证了唐代与日本在文化上的密切交流。[16]此外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唐代传世品“青玉卧鹿”，也是属于肉芝顶鹿纹（表三）。[17]

表三　肉芝顶鹿纹（芝角鹿纹）出土器物比较图例

 山西大同城西墓出土肉芝顶鹿纹鎏金铜带来銙，图片来源：大同市考古研究所. 山西大同新发现4座唐墓［J］. 文物，2006（4）：35～46	 浙江嵊泗出土唐代窖藏铜质鹿纹带饰，图片来源：舟山地区文化局. 浙江嵊泗出土唐代窖藏铜质鹿纹带饰［J］. 文物，1990（3）：71
 辽宁喀喇沁旗出土六曲葵花形卧鹿团花纹鎏金银盘，图片来源：王维坤. 从考古学看中日文化交流［J］. 考古，1988（4）：47～62	 日本正仓院镀金六曲葵花形鹿纹三足银盘，图片来源：王维坤. 从考古学看中日文化交流［J］. 考古，1988（4）：47～62
 河北宽城大野峪村出土六曲菱形立鹿纹银盘，图片来源：宽城县文物保护管理所. 河北宽城出土两件唐代银器［J］. 考古，1985（9）：857，858	 北京故宫博物院典藏唐代传世品“青玉卧鹿”，图片来源：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玉器全集—隋唐［M］. 河北：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图39

（三）结构功能探讨

由《旧唐书·卷四十二·志第二十五·舆服》记载中可以发现，至少在玄宗开元初年（713年）以前，文武官员所佩带之蹀躞带上强制规定要悬挂“七事”物件，[18]显见唐代腰带具带銙结构上的穿孔设计当以穿系物件之功能为主。除渤海地区7座墓葬、遗址以外，其他15处墓葬中9处均出土具有可供穿系物件的穿孔（未錾刻纹饰）之

带銙，其他6处的鎏金带銙只錾刻纹饰而均未穿孔。

就此实际检视出土报告中关于带銙面积之说明，一般都仅介于4厘米×3厘米之间，在如此有限面积上若同时錾刻纹饰和穿孔，势必强烈限缩纹饰的表现空间，所以墓葬中出土具有錾刻纹饰之带銙及铊尾，或在刻意保留创作艺术性与视觉完整性的考虑下不再径行穿孔，这种现象颇似于目前出土玉制腰带具带銙及铊尾纹饰设计之概念。[19]

渤海地区7座墓葬、遗址中，5座出土之带銙均有穿孔（无錾刻纹饰），仅吉林六顶山渤海墓群出土之带銙只錾刻纹饰无穿孔、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出土之云头形带銙则兼具纹饰与穿孔，显见渤海地区带具之功能设计亦以实用为主。[20]就吉林永吉查里巴靺鞨墓地出土之云头形带銙而言，其花卉纹饰系点缀性的錾刻于穿孔处周边，显然在纹饰设计上受限于中间偏下方之穿孔，所以在带銙有限面积上要兼顾穿孔实用和纹样装饰两种功能，纹饰之选择与设计势必受到挤压而无法尽情挥洒，这种设计上之考虑亦与渤海以外的其他地区如出一辙。

三、唐代鎏金铜腰带具之溯源、发展与问题探讨

中国传统束系服饰所使用的带钩，自西晋以降开始逐渐过渡到由北方草原民族传入，组合鞓带、带扣、铊尾、銙块所共构形成之蹀躞式套装腰带具。[21]此际腰带具的材质呈现多样发展趋势（金、玉、银、铜、铁等），而“鎏金”铜腰带具亦已陆续出现在各时期的墓葬之中，例如：1991年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三国东吴时期（238年）威远将军孙邻墓（M1），出土，鎏金铜带扣、鎏金铜环等。[22]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M9001墓，出土曹魏（220～266年）到前燕（337～370年）时期鎏金铜带具一副。[23]1984年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出土西晋时期（265～316年）鎏金铜带饰。[24]1953～1955年洛阳西晋墓（265～316年），出土鎏金铜带扣。[25]1987年湖北汉阳东晋墓（317～420年），出土鎏金铜带具一副。[26]1973年辽宁北票西沟村前燕古墓（337～370年），征集鎏金铜带具。[27]1998年辽宁省朝阳县土城子前燕（337～370年）M1墓，出土鎏金铜带扣、銙环。[28]1979年朝阳十二台乡砖厂前燕（337～370年）88M1墓，出土鎏金铜镂空带扣。[29]1998年辽宁北票喇嘛洞前燕（337～370年）M196墓，出土鎏金铜镂孔缀叶带具。[30]辽宁北票喇嘛洞前燕（337～370年）M275墓，出土鎏金铜镂孔缀叶带具。[31]辽宁北票腰而营子前燕（337～370年）M9001墓，出土鎏金铜带具。[32]1984年朝阳前燕（337～370年）奉车都尉墓，出土鎏金铜带具。[33]1982年辽宁朝阳北燕墓（407～436年），出土鎏金铜銙带具。[34]1973年辽宁朝阳北燕（407～436年）八宝村1号墓，出土鎏金铜带扣。[35]2000年西安北周（557～581年）安伽墓，出土鎏金铜带具一副。[36]1983年宁夏固原北周（557～581年）李贤夫妇墓，出土鎏金铜带具等。[37]

三国至两晋南北朝时期，中土地区因为黄金和白银产量减少以及佛教兴盛耗费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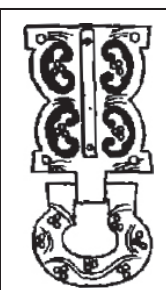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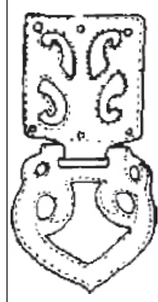
量金银等因素，致使器物使用金银材料之制作受到一定限制，此时的北方鲜卑民族正盛行金器文化。[38]慕容鲜卑所创立的辽西三燕金器文化中，以黄金锤揲制成的各种牌饰、面具耳坠、戒指、指环等金质饰件琳琅满目，显见这个时期黄金的使用偏重于各种装饰对象之制作。[39]

辽宁田草沟M1鲜卑墓、辽宁北票房身村2号鲜卑贵族墓等均曾出土金质带饰及大量的黄金饰件，但未发现鎏金铜腰带具。[40]辽宁北票西官营子村北燕辽西公冯素弗墓，墓中虽未出土金质或鎏金铜腰带具，但有大量的金质饰件（如：金冠饰、各式金管、饰片等），以及鎏金器物（如龟纽铜章、钩状竿头、[41]带钩、铜炉、盏、盘等），文献记载冯素弗系北燕（407～436年）天王冯跋之弟，不仅功高权重还穷奢极欲。[4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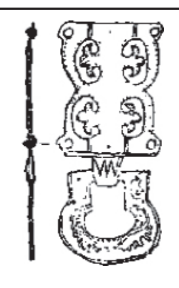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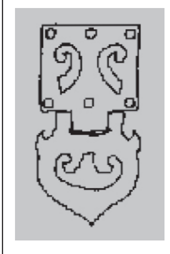
从鎏金铜腰带具之出土统计显示以辽西三燕时期（前燕、后燕、北燕，337～436年）的墓葬占大多数，但是墓葬中出土金质或鎏金器物种类上之差异性，除与墓主生前喜好、身份地位有关之外，财力状况应是其中一项关键的考虑因素。这些三燕时期墓葬虽然多属于非纪年墓，墓主之身份也难以确认，但检视各种鎏金器物常与黄金饰物并出之状况，具有“似金”外貌的鎏金铜腰带具系墓主生前身份表征之器当无疑义。

辽西地区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曾经扮演中原、辽东朝鲜半岛高句丽、甚至是日本列岛诸国等地，在文化交流上中介和传递的重要角色，这种文化交流的现象从高句丽、日本等国墓葬中，均曾出土孙机所称具有圆角方牌下悬心形或马蹄形带銙的鎏金铜腰带具（晋式带具）可以获得证实，不过这种流行于两晋南北朝时期辽西及东北地区，带銙上悬以如步摇、步摇冠上装饰用金属摇叶的风潮，检视相关出土报告则未见其延续至唐代。[43]

表四　唐代以前出土鎏金铜腰带具比较图例

 朝阳王子坟山腰M9001墓出土曹魏（220～266年）到前燕（337～370年）时期鎏金铜腰带具，图片来源：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J］. 文物，1997（11）：15，图32	 洛阳西晋（265～316年）24号墓出土鎏金带銙，图片来源：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 洛阳晋墓的发掘［J］. 考古学报，1957（1）：180. 图11-5
 辽宁北票喇叭洞前燕（337～370年）M275墓出土鎏金镂空铜带具，图片来源：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燕文物精粹［M］. 沈阳：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2002：图版71，72	 集安洞沟高丽墓（M330）出土鎏金铜带具，图片来源：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1976年集安洞沟高丽墓清理［J］. 考古，1984（1）：75. 图8

续表

	吉安洞沟高句丽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JYM3520墓出土鎏金铜带具，图片来源：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A］. 集安博物馆高句丽研究文集［C］. 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66～68，图26，19		日本宫山古坟第二主体出土带具，图片来源：孙机. 中国古代的带具［A］.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C］.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74，图18-21-3

唐代出土鎏金铜腰带具主要以长安京畿及其以北、东北地区，并以京畿道和河北道（含忽汗州渤海国）为密集分布地区，此处也正是往返于中西亚丝绸之路，进行贸易与文化交流互动最为频繁的枢纽位置。

河北道以北忽汗州渤海国（698～926年），在文化上系融合靺鞨、高句丽及汉族文化所形成的一种文化综合体，[44]其中并以来自中原的大唐文化影响最深，不论是政治体制、儒学思想、文字、文学艺术、王宫建筑（素有小长安称号）等，基本上就是大唐文化之缩影与翻版。[45]而在舆服制度上亦积极仿效唐制建立起阶级品第的规范制度，《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渤海》记载："……以品为秩，三秩以上服紫，牙笏、金鱼。五秩以上服绯，牙笏、银鱼。六秩、七秩浅绯衣，八秩绿衣，皆木笏……。"唯其中并没有唐律中以腰带具材质定品第之记载。

渤海国经常派遣使臣至唐代长安朝贡，大唐帝国为表示安抚往往对来使厚礼回应，其中晋赐官位则"视在本国官秩为高下授官""皆给告以折冲果毅二阶为多（折冲都尉正四品到正五品、果毅都尉从五品到从六品，皆武散官）"，甚至再加码厚赏"赐金鱼袋者二品以上服也，紫袍金带三品以上服也，绯袍银带五品以下服也。"就此上述"金带""银带"这种来自上国的荣誉象征，其身份表征性似已超越渤海国本身的"绯服、牙笏、银鱼"。[46]

东宁大城子渤海古城遗址中，曾出土圆柱状铜锭和铜渣，表明当时已有冶铜作坊的存在。[47]而其他各类出土铜制小型工具、器皿、饰件等对象（如带具、铃、锁、铺首、镜等），也多以铜与其他金属所合成，可见渤海工匠业已充分掌握了铜合金的制作技术。[48]除了铜合金之外上京、吉林和龙和敦化六顶山遗址，亦出土大量的金银器和鎏金器物。[49]在炼铜和冶金技术的搭配下，鎏金器物的制造和使用在渤海地区应相当普遍。[50]

目前渤海地区出土"鎏金"铜腰带具的墓葬，多属于官吏或一般贵族使用的石室封土墓（非王室使用砖室墓等级），[51]并且均属非纪年墓无法辨识墓主身份，在这些墓葬中出土"鎏金"铜腰带具，除了证实渤海国鎏金技术之发达和普遍之外，基于腰带具在渤海国具有明显的政治身份表征性，墓主使用这种"似金"外观的"鎏金"铜腰带

具作为墓葬中陪葬品，应有借以间接提升自己身份地位的作用。

其他非渤海地区出土鎏金铜腰带具的纪年墓可以判别墓主官衔者计有：京畿道长安地区（从一品英国公李绩、从一品鄂国忠武公尉迟敬德、从一品汝南郡王韦洵、正二品上柱国殷仲容、四品至五品宣化府统军温绰等5人）。关内道宁夏地区（从三品虢州刺史粟特人史诃耽、五品至六品司驭寺右十七监监正粟特人史铁棒等2人）。河北道北京地区［突厥人史思明，曾于唐肃宗干元二年（759年）僭称应天皇帝，墓葬则仿帝陵形制］等。其他非纪年墓检视其墓葬结构多为土洞墓，应属五品以下官员或庶人之墓葬。[52]

若依唐律五品以上高阶官员应可佩戴金、玉等材质腰带具，为何墓葬中却仅出土“鎏金”铜腰带具？[53]究其原因除与历代盗扰、消弭奢侈厚葬风气之帝王禁令有关之外，[54]笔者认为：唐律中对于五品以上官员使用金、玉材质腰带具之规定，或基于当代金、玉价质昂贵（玉料短缺）之考虑，而徒具形式成为例示性、宣示性之规定，这从文献上关于帝王素以官员之实际军功或特殊贡献，作为犒赏“金带”“玉带”标准之记载可以略窥一二。因此符合律令依品第佩戴金、玉质腰带具之官员，可能无法实际取得对应的“金质”或“玉质”腰带具，就此上述高阶官员墓葬中所出土的“鎏金”铜腰带具，或作为对墓主身份表彰的一种补偿性权宜作法。[55]

其他如西安硫酸厂等属于五品以下低阶官员或庶人之土洞墓也出土鎏金铜腰带具，这种现象颇似唐代许多低阶官吏或其亲属之中小型墓葬中，经常出现以石（或称珉玉、滑石、汉白石）代玉型陪葬器物（罐、盘、杯、盒、长杯、香熏、握猪等）的作法。[56]因此“鎏金”铜腰带具除了技术性的运用“似金”的外貌借以自我提升身份之外，似亦隐含一种当代下层阶级追寻、模仿上层社会所形塑身份装饰风潮之现象。[57]

比较特殊的是在本文统计出土鎏金铜腰带具墓葬中，也包括2处属于女性之墓葬。京畿道温绰夫妇墓中，鎏金铜腰带具出于棺床东侧人骨架上，出土报告认为应为温绰夫人赵氏之用具。河北道忽汗州渤海国黑龙江海林市山嘴子M16墓，鎏金铜腰带具则出于女性墓主左侧骨盆边。

就唐代女性系腰带“女着男装”这个议题，若检视目前出土的文物可以略分为两种样态：

（一）墓室壁画、陶俑上低阶女性之“女着男装”

第一种状态系指依墓室壁画或陶俑上显示“女着男装”的现象。孙机曾指出在唐代出土文物（壁画、陶俑）中，经常会发现着胡服或男装，或穿翻领袍露髻、或穿圆领袍裹幞头、身系蹀躞带的女性“裹头宫人”，但其往往手持器物并随侍于身着裙衫贵妇之后，显系身份低微的婢女，这些执杂役的女性宫人其“女着男装”可能是为了服勤之便捷。[58]笔者认为除了便捷因素之外，女性宫人以“男装”姿态随侍在侧，应有间接提升女性主人心理层面上安全保障之寓意。

（二）高阶女性束系腰带具之“女着男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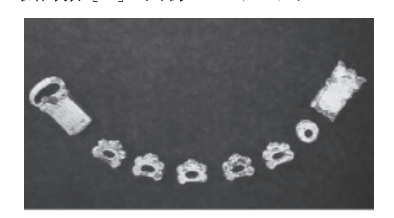
第二种状态系指由实际出土腰带具辨识“女着男装”的现象。本文所统计温绰（四至五品官）夫妇墓中（温绰棺床在西侧、温绰夫人棺床在东侧），鎏金铜腰带具出于棺床东侧，应属温绰夫人陈氏（外命妇之郡君或县君）之陪葬品。[59]

温绰夫人棺床上所出鎏金铜桃形带銙，除未錾刻纹饰以外在器形及穿孔位置等特征上，均相当类似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2号墓、内蒙古锡林郭勒布图木吉墓葬征集，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卡通河畔的施罗斯特基第1地点3号墓、库赖第4地点3号墓等墓葬所出土的各类纹饰金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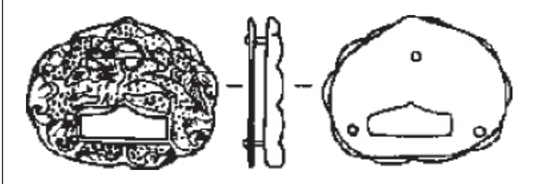
孙机考据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墓出土金质腰带具充满突厥色彩，应属8世纪唐代突厥墓葬，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卡通河畔的施罗斯特基第1地点3号墓及库赖第4地点3号墓则均为8世纪突厥墓。[60]内蒙古锡林郭勒布图木吉征集出土狩猎卷草纹拱形金銙，出土报告亦认为系8～9世纪唐代中晚期北方与突厥有关之文物。[61]因此温绰夫人棺床上所出鎏金铜桃形无纹带銙，在结构特征上具有北方突厥腰带具之风格和特色（表五）。

另在东侧淤土中还发现许多玻璃饰物（玻璃器碎片，碗形、花形、管形饰，玻璃球，花结等），唐代中、西亚地区透过丝路大量输入玻璃器物并广为唐人所钟爱，这些串联玻璃材质的饰物，一度成为妇女追求时尚装扮的指标，[62]温绰夫人墓中同时出土具有西来外域文化特色的玻璃饰物与鎏金铜腰带具，证实她对于西域胡风之向往和热爱，因此温绰夫人除了缀以玻璃饰物之娇媚女妆外，亦曾展现束系腰带“女着男装”之英姿。温绰夫人高氏卒于高宗咸亨元年（670年），墓中所出土的鎏金铜腰带具，应为目前唐代高阶女性使用腰带具“女着男装”实际的出土文物证明。

表五　温绰夫人墓出土鎏金带銙与其他突厥墓出土金銙比较图

温绰夫人棺床上所出桃形无纹鎏金带銙，图片来源：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 西安东郊唐温绰. 温思暕墓发掘简报［J］. 文物2002（12）：37～49	内蒙古敖汉旗李家营子2号墓出土拱形金銙，图片来源：敖汉旗文化馆. 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J］. 考古，1978（2）：5～46，图版9
 	 

续表

<table>
<tr>
<td>俄罗斯阿尔泰地区卡通河畔的施罗斯特基第1地点3号墓及库赖第4地点3号突厥墓出土金带銙，图片来源：孙机. 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J］. 文物，1993（8）：53，图8
 
左：施罗斯特基第1地点3号墓出土金带銙
右：库赖第4地点3号墓出土金带銙</td>
<td>内蒙古锡林郭勒布图木吉征集出土狩猎卷草纹拱形金銙，图片来源：丁学芸. 布图木吉金带饰及其研究［A］.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C］.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64，图2，2
</td>
</tr>
</table>

《新唐书·卷三十四·志二十四·五行一》曾记载："高宗尝内宴，太平公主紫衫、玉带、皂罗折上巾，具纷砺七事，歌舞于帝前。"帝与武后笑曰："女子不可为武官，何为此装束？近服妖也。"[63]太平公主以视正一品皇女身份系腰带"女着男装"之描述，[64]仅止于文献记载而未经相关出土文物之证实。1960～1962年西安干陵永泰公主与驸马都尉武延基合葬墓（卒于武后大足元年，701年），曾出土带具构件31件及1块玉质表框、2枚玉偏心孔环。

以墓内所出玉质表框与玉偏心孔环，实际比对于西安窦皦墓出土之"玉梁金筐宝钿真珠装蹀躞带"（亦称起梁带或玉梁带），二者在带具构件上显然相同（起梁带中带銙上亦有玉筐、玉偏心孔环），[65]由于永泰公主夫妇墓履遭盗扰且人骨遗迹也保存不完整，实难辨识陪葬品究系归属于永泰公主或其驸马所有，但就驸马都尉仅为从五品官衔分析，墓内出土之玉质腰带具构件应属于视正一品身份的永泰公主，就此若永泰公主拥有与窦皦墓出土相同之玉梁带，则永泰公主应曾束系腰带而"女着男装"，就此或可为唐代高阶女性束系腰带"女着男装"，提供另一起出土文物之佐证资料。

初唐到盛唐玄宗执政前期，因为中西贸易与文化交流互动频繁，胡夷辨识之观念相当淡薄，遂成就了女性以胡服"女着男装"之风尚，并且不论身份贵贱的广泛流行于女性族群之间，这种社会风气一直延续到安史之乱以后方才休止，上述温绰夫人与永泰公主墓腰带具文物出土的案例，将与文献记载共同验证唐代女性束系腰带具"女着男装"的特殊历史印记。

至于黑龙江海林市山嘴子M16女性墓葬亦出土鎏金腰带具部分，出土报告曾说明蹀躞型腰带具本系渤海靺鞨人惯用的束系用具，其女性使用腰带具的状况应有别于中土地区"女着男装"之形态，但是目前渤海地区女性墓葬出土腰带具的个案不多难以实际验证，然M16墓中除鎏金铜质腰带具外，还出土鎏金铜腕饰1组20件，就此比较海林市山嘴子墓群其他28座墓葬，多仅出土一般陶器、铜器、铁器等陪墓器物之状况，足证墓主的社会身份不低，鎏金铜腰带具系其身份表征之器亦无疑义。

四、结　　语

唐代鎏金铜腰带具这种非属体制内特殊材质的服饰配件，其出土地域、纹饰风格明显已跨越民族藩篱，进而呈现出中西合并式的文化特色。结构功能上除实用与对应的身份表征效用外，并间接发展出转换及提升社会位阶之另类用法。少数女性墓葬出土鎏金铜腰带具之珍贵个案，对于研究初、盛唐时期，中原女性流行“女着男装”的特殊社会风气，提供了重要而具体的出土文物证明。上述关于鎏金铜腰带具出土资料之统整与问题之初步探析，期能对于唐代各类材质腰带具的研究有所裨益。

注　　释

[1] 孙机指出“鍮石”就是今日所称的“黄铜”，如宋・崔昉《外丹本草》载：“铜一斤、炉甘石一斤，炼之即成鍮石一斤半.”孙机. 中国古代的带具.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49，450.

[2] 《通典・卷六十三・礼二十三・沿革二十三・嘉礼八》记载：“……上元元年（674年）八月，敕文武官三品以上，金玉带，十二銙；四品，金带，十一銙；五品，金带，十銙；六品、七品，并银带，九銙；八品. 九品、服并鍮石带，八銙；庶人服黄铜铁带，六銙.……玄宗开元二年（714年）七月……三品以上饰以玉，四品以上饰以金，五品以上饰以银者，宜于腰带及马镫、酒杯杓依式，自外悉禁断……”. 此外《旧唐书》《新唐书》《唐会要》等文献均对腰带具材质之使用有相关记载，虽内容不一但略以：金、金玉、玉、银、鍮石（黄铜）、铜、铁等为主.（唐）杜佑. 通典［M］. 台北：新兴书局，1964：359；而关于上述三品以上“饰”以玉、金、银者，孙机指出“饰”系腰带之饰，特指带銙. 孙机. 两唐书舆（车）服志校释稿. 中国古舆服论丛增订本［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448.

[3] 宁夏回族自治区中部的吴忠市西郊曾发掘出土120座唐墓，其中30座墓葬中均出土了铜、铁质腰带具之饰銙、铊尾等构件共计135件. 宁夏文物考古研究所等. 吴忠西郊唐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298，299，表六.

[4] 将鎏金施于铜胎器物表面者称之为鎏金铜。齐东方指出若将纯金和汞约按金1汞7的比例调合成金汞泥，再涂抹于器物胎体之上并加热烘烤，汞遇热挥发而所剩下的金即可附着于器物表层，其成品在外观上无异于纯金器物，又可达到保护器胎锈蚀的作用，这种金属表面加工技术称为鎏金（涂金、火镀金、烧金或汞镀金），春秋时期绍兴狮子山墓出土一件春秋晚期“鎏金嵌玉扣饰”，应是目前现存最早出土的鎏金器物。齐东方. 中国早期金银工艺初论［J］. 文物季刊，1998（2）：67.

[5] 〔日〕加藤繁研究指出：唐代金价 1 两平常时期约在5000～6000文，中、晚唐时期或因战乱而涨至约8000文. 银价则依唐末金价与宋初银价推测 1 两恐在600～800文之间.〔日〕加藤繁. 唐宋时期金银之研究——以金银货币机能为中心［M］. 北京：中华书局，2006：373～375；

另刘海峰研究文献记载关于唐代官员俸钱变动状况，依玄宗开元（713～741年）时期（官员俸钱与物价均偏高），米价平均每斗约20文，而一品官官职田、禄米所得折成现钱加上一品月俸31000文，合计月俸约为49860文. 刘海峰. 论唐代官员俸料钱的变动［J］. 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2）：18～29.

［6］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史道德墓清理简报［J］. 文物，1985（11）：21～30.

［7］ 罗丰. 固原南郊隋唐墓地［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55～77.

［8］ 同［6］：78～86.

［9］ 郭文魁. 和龙渤海古墓出土的几件金饰［J］. 文物，1978（8）：45，46.

［10］ 敖汉旗文化馆. 敖汉旗李家营子出土的金银器［J］. 考古，1978（2）：5～46. 出土报告认为出土这批金带具墓葬应属于辽代早期墓葬. 孙机则以出土99件各式金带均有明显突厥风格，分析应为8世纪前之唐代突厥墓（齐东方另以1号墓出土5件银器中3件具有明显粟特风格，认为可能是粟特人墓葬）. 孙机. 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J］. 文物，1993（8）：48～58.

［11］ 陶正刚. 山西平鲁出土一批唐代金铤文物［J］. 1981（4）：117，118.

［12］ 丁学芸. 布图木吉金带饰及其研究.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辑［M］. 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463～473.

［13］ 齐东方. 唐代金银器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130.

［14］ 出土报告依带銙系盛装于具有唐代风革的四系陶罐内，分析其窖藏时间应在晚唐时期. 舟山地区文化局. 浙江嵊泗出土唐代窖藏铜质鹿纹带饰［J］. 文物，1990（3）：71.

［15］ 这种纹饰经锤鍱其正面突出似浮雕的现象亦称为隐起效果，早在商周时期中国即已发展金属锤鍱技术，但唐代的金银锤鍱工法并非直接引自商周，其中许多技术可能来自于波斯、中亚或拜占庭. 在何家村遗宝中如：伎乐纹八棱金鎏金杯（推测为铜胎或铜合金）、鎏金双狮银碗、鎏金双狐纹双桃形银盘等，均属锤鍱与錾刻两道工法精雕的珍贵遗宝. 韩建武等. 巧夺天工——何家村金银器的制作工艺与作坊［A］. 陕西历史博物馆. 花舞大唐村——何家村遗宝精粹［C］.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03：11～16. 此外笔者观察本文统计具有纹饰的其他鎏金带具，除兼采锤鍱与錾刻工法形成隐地立体效果之纹饰外，其他纹饰之制作亦采金银工艺中的錾刻工法.

［16］ 王维坤曾就目前中国境内出土的金银器物，如：1976年辽宁喀喇沁旗哈达沟门出土六曲葵花形卧鹿团花纹鎏金银盘（鹿纹后上方刻有德宗时期刘赞进奉字样）、1984年河北宽城出土六曲菱形立鹿纹银盘、辽宁喀喇沁旗出土银罐、西安唐代大明宫三清殿遗址出土方砖、西安何家村出土鎏金翼鹿凤鸟纹银盒、内蒙古赤峰郊区城子公社发现镀金鸡冠壶等，比对日本正仓院收藏的红绿牙拨镂尺与镀金六曲葵花形鹿纹三足银盘上的肉芝顶鹿纹，说明唐代与日本在文化交流上的密切关系. 王维坤. 试论日正仓院珍藏的镀金鹿纹三足银盘［J］. 考古与文物，1996（5）：47～62. 杨泓亦比对正仓院镀金六曲葵花形鹿纹三足银盘与河北宽城出土六曲菱形立鹿纹银盘，以唐代葵形和菱形的盘缘系同时流行的样式，证实正仓院镀金六曲葵花形鹿

纹三足银盘，是带有明显盛唐风格装饰花纹的唐代制品. 王维坤. 从考古学看中日文化交流［J］. 考古，1988（4）：362. 孙机则称这种鹿角像有茎有盖的灵芝纹饰为芝角鹿纹，其原由粟特工艺中的扁角鹿纹演化而成，唐代工艺师将扁角改成芝形角. 孙机. 关于一支唐镂牙尺［A］. 孙机谈文物［C］. 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2005：409～415.

［17］ 中国玉器全集编辑委员会. 中国玉器全集——隋唐［M］. 石家庄：河北美术出版社，1993：图39.

［18］ 《旧唐书・卷四十二・志第二十五・舆服》记载：“……睿宗景云（710～712年）中又制，令依上元故事，一品已下带手巾、算袋，其刀子、砺石等许不佩. 武官五品以上佩秥韘七事，七事谓佩刀、刀子、砺石、契苾真、哕厥针筒、火石袋等也. 至开元初（713年）复罢之……”. 杨家络. 新较本旧唐书附索引三［M］. 台北：鼎文书局，1979：1953.

［19］ 刘荣贵. 方寸间的律动—析论唐代玉制腰带具文化功能的变革［D］. 台中：逢甲大学历史与文物研究所硕士论文，2016.

［20］ 徐英研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器物之造型艺术，认为其工艺品之生产多属生活中实用器物，显以实用为主要诉求，即使带有装饰创造性的美化倾向，也是一种物化之美，虽然在重视实用性的同时对于物化审美也多有关注，但其前提是审美总是伴随工艺品的应用而体现。徐英. 中国北方游牧民族器物造型艺术［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119.

［21］ 孙机对于主要流行在晋代具有圆角方牌下悬心形或马蹄形带銙的腰带具，称之为“晋式带具”，其后进入南北朝以后装有活动扣舌小带扣的蹀躞型带具，正式取代了晋式带具并积极影响朝鲜和日本腰带具的制作和生产，文中附图18-21-2朝鲜庆州皇南里第82号坟东冢出土带具、18-21-3日本宫山古坟第2主体出土带具等，即可说明上述文化交流之实际状态. 同［1］：253～292.

［22］ 鄂州博物馆. 湖北鄂州鄂钢饮料厂一号墓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1998（1）：104～131.

［23］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王子坟山墓群1987、1990年度考古发掘的主要收获［J］. 文物，1997（11）：1～18.

［24］ 张柏忠. 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J］. 考古，1989（5）：430～443.

［25］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第二队. 洛阳晋墓的发掘［J］. 考古学报，1957（1）：169～185.

［26］ 刘森淼. 湖北汉阳出土的晋代鎏金铜带具［J］. 考古，1994（10）：954～956.

［27］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燕文物精粹［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图版136. 田利坤. 朝阳发现的三燕文化遗物及相关问题［J］. 文物，1994（11）：20～32.

［28］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省朝阳县土城子两座前燕墓［J］. 北方文物，2015（2）：14～19.

［29］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朝阳十二台乡砖厂88M1发掘简报［J］. 文物，1997（11）：19～32.

［30］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北票喇嘛洞墓地1998年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2004（2）：209～241.

［31］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三燕文物精粹［M］.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2：图版136.

［32］　同［31］：图版137.

［33］　田立坤. 朝阳前燕奉车都尉墓［J］. 文物，1994（11）：1～12.

［34］　辽宁省地方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 辽宁朝阳两晋十六国时期墓葬清理简报［A］. 辽宁省志・文物志・下［C］. 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1：468.

［35］　朝阳地区博物馆. 辽宁朝阳发现北燕、北魏墓［J］. 考古，1985（10）：916～929.

［36］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 西安北周安伽墓［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63，64.

［37］　宁夏回族自治区博物馆. 宁夏固原北周李贤夫妇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85（11）：1～20.

［38］　齐东方.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J］. 北方文物，2000（1）：21～26.

［39］　张静，齐东方. 古代金银器［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8：59.

［40］　1989年辽宁田草沟M1鲜卑墓出土由金片锤倮中间有半月形穿孔的半圆形带具牌饰，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辽宁朝阳田草沟晋墓［J］. 文物，1997（11）：33～41. 1957年辽宁北票房身村2号鲜卑贵族墓亦出土龙凤透雕金质带銙，陈大为. 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J］. 考古，1960（1）：24，25. 另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并出鎏金铜腰带具与4件黄金牌饰，但其共属约30座已被破坏的墓葬难以分辨文物之归属，其黄金牌饰上端左右两边各有穿孔，其中1件金马形牌饰在穿孔上尚有1环，环上并穿有金链，应不属于腰带具之构件，而朝阳王子坟山墓群台M8713、台M9022墓亦出土如上述左右两边穿孔的金质牌饰.

［41］　钩状竿头或称帐首、帐钩，推测用于一种便于单手擎握之长竿顶端以钩悬幡旌之类丝布织品，这种在北方地区一些较大型墓葬经常出现之钩状竿头，材质略分为鎏金铜、铜、铁等，其材质之选用应与墓主生前身份地位之高低有关. 同［35］.

［42］　黎瑶渤. 辽宁北票县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墓［J］. 文物，1973（3）：2～19.

［43］　高句丽墓出土之鎏金铜镂空腰带具（晋式带具）略有：集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JYM3520墓，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吉安洞沟古墓群禹山墓区集锡公路墓葬发掘. 集安博物馆高句丽研究文集［M］. 延边：延边大学出版社，1993：66～68. 图26，19；集安高句丽M152墓，吉安县文物保管所. 集安高句丽墓葬发掘简报［J］. 考古，1983（4）：305. 图7；集安洞沟高丽M330墓，吉林省文物工作队. 1976年集安洞沟高丽墓清理［J］. 考古，1984（1）：75. 图8. 孙机指出将源自西亚步摇、步摇冠上缀饰用镂空金属摇叶，组装在马具、腰带具带銙上应该是中国本土性的创意作法，其后透过三燕鲜卑文化传播到高句丽、日本. 到了唐代可能因为唐人不尚步摇冠而急剧衰微. 孙机. 步摇・步摇冠・摇叶饰片［A］. 中国圣火——中国古文物与东西方文化交流的若干问题［C］. 沈阳：辽宁教育出版社，1996：87～106.

［44］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九下・列传第一百四十九下・靺鞨》称："……大祚荣者，本高丽别种也……."另《新唐书・卷二百一十九・列传第一百四十四・渤海传》亦称："……渤海，本粟末靺鞨附高丽者，姓大氏……."学者对于粟末靺鞨"本高丽别种"的记载曾提出不同见解，认为大祚荣及其属虽曾附属过"高丽"并呈现某种程度的"高句丽化"，但伴随高句丽的灭亡及迁居营州，这种有限程度的"高句丽化"也随之终止，因此渤海靺鞨即"高句丽

族”“靺鞨系的高句丽人”“具有靺鞨血统的高句丽人”此等说法显然过于武断. 魏国忠等. 渤海国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25～41.

［45］ 张高等. 渤海国管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135，136.

［46］ 资料出于黄维翰纂辑《渤海国记・中篇・职官》《渤海国记・下篇・朝贡中国》. 此外关于渤海朝贡大唐帝国携回金、银腰带具的记载略有：玄宗开元十三年（725年），渤海武王遣大首领乌借芝蒙朝唐贺正，黑水遣其将五郎子也一同朝唐贺正并献方物，唐授其将军，赐紫袍、金鱼带. 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渤海武王大武艺遣其弟大胡雅朝唐. 唐廷授其游击将军，并赐紫袍、金带. 玄宗开元十八年（730年）渤海武王遣使智蒙朝唐，献方物，以及马三十匹，唐廷授其中郎将，赐绢二十匹，绯袍、银带等. 梁玉多. 渤海国编年史［M］.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0～25.

［47］ 张泰湘. 东宁大城子古城调查记［A］. 东北亚研究——东北亚考古研究［C］. 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187.

［48］ 魏国忠等. 渤海国史［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368，369.

［49］ 学者指出渤海国出土的器物常施以鎏金，表明其黄金用量不在少数，不过在文献上并未发现金矿开采的资料，因而推测渤海北方应有少量的采金活动，但主要应透过贸易、或由中原、日本等输入. 张高等. 渤海国管窥［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96，97.

［50］ 渤海故都上京龙泉府遗址曾出土千余件佛像，通高在5至20厘米之间，其材质多样但在铜质中又以鎏金铜佛数量最多. 陈显昌. 渤海国的佛像［A］. 中国考古集成・东北卷・两晋至隋唐（三）［C］. 北京：北京出版社，1997：68.

［51］ 郑永振. 渤海墓葬研究［A］. 梁玉多. 渤海国编年史［C］. 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4：133～140.

［52］ 宿白统计唐代西安地区出土的各型土洞墓，指出多数属于五品已下官员及庶人之墓葬. 宿白. 西安地区的唐墓形制［J］. 文物，1995（12）：41～49；牛志平研究指出唐代各型土洞墓，在唐初仍作为多数高及官僚墓葬使用，其后达官贵人改用砖室墓，土洞墓已降为低阶官员和平民之墓，而陕西关中和豫西洛阳、陕县一带多为此种土洞墓，如陕县发现的116座唐墓均属于南北向的土圹单室墓. 牛志平. 论唐代墓葬的型制［J］. 干陵文化研究，2015：11～21. 唯2008年山西（河东道）大同市城西出土04M1墓系属砖室墓，出土报告仅依墓中出土鎏金铜腰带具系属《旧唐书》所载“庶人并铜、铁带”，遂推定其为晚唐时期平民墓葬，此种说法似欠周详.

［53］ 粟特人史诃耽、史铁棒叔侄2人墓中除鎏金铜腰带扣之外，又各自出土了1件金铊尾。史铁棒死后谥为五品至六品官，依律不如叔父史诃耽从三品官可以配戴金带具，这种似已僭越礼制的状况与宁夏固原另1处同为粟特人史道德（兰池监监正. 八品马政官）墓中出土金带扣、带饰的状况如出一辙，唐代律定腰带具使用之身份对应关系与实务上墓葬出土文物之比对有些落差，其系出于盗扰？僭越礼制？或如笔者所推论因带具材质昂贵或短缺，由帝王依军功或贡献权衡发给？尚有相当的研讨和厘清之余地. 宁夏固原博物馆. 宁夏固原唐史道德墓清理简

报［J］. 文物，1985：21～30.

［54］《旧唐书・卷八・玄宗上》记载："开元二年（713年）九月戊甲……宜令所司据品第高下，明为节制……凡诸送终之具，并不得以金银为饰. 如有违者，先决杖一百. 州县长官不能举察，并贬授远官……". 杨家络. 新较本旧唐书附索引一［M］. 台北：鼎文书局，1979：174；然西安韩森寨唐苏三夫人墓（卒于玄宗开元十七年，729年）亦出土金头饰2件. 王长启. 唐苏三夫人墓出土文物［J］. 文博，2001（3）：42～46；1989年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卒于玄宗开元二十年，732）亦出土数量不详金饰. 忽林贵等. 西安东郊唐韦美美墓发掘记［J］. 考古与文物，1992（5）：58～63；伊川鸦岭唐齐国太夫人墓（卒于穆宗长庆四年，824）、唐李倕墓（卒于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等均出土数量不等之玉器. 上述墓主均卒于玄宗所颁禁令之后，显见律令之拘束力恐力有未逮. 李明. 隋唐组玉佩争议［J］. 考古与文物，2016（3）：82～88.

［55］玉价在唐代的价值难以估算，然从唐代小说《太平广记》中窦义、裴度两人传记，载明一副玉带价质高达数百到数千贯（缗），一贯（缗）为1000文，可以略以推估玉带价值之高昂. 同［19］. 另齐东方研究唐代丧葬与礼仪制度，认为制度系属政治范畴，不论是遵守、僭越或特例，都表明其基本作用并为社会生活之写照. 其墓室形制、丧葬用品等与官等之对应关系，帝王对于若干具有特殊功勋者往往加以厚赏，致使出现墓葬型制不符官等规格或丧葬用品"其别敕优厚官供者，准本品数十分加三等"似为僭越礼制之情况，因此唯有结合当代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综合判断，方能获得较贴近于历史真实之原貌. 齐东方. 唐代的丧葬观念习俗与礼仪制度［J］. 考古学报，2006（1）：59～82.

［56］赵青研究唐代以石代玉的特殊现象，指出真玉在短缺的状况下，唐代许多朝廷祭祀用礼器如圭、璧、玉册等都曾发生石代玉的窘状，甚至《册府元龟・帝王部・崇祭祀》中亦记载玄宗对于过去礼神六器及宗庙奠玉以珉代玉表示悔恨。另外许多属于低阶官吏或其亲属之中小型墓葬，也经常出土珉玉型（或称滑石、汉白石）陪葬器物，以这种外观与质感似玉的美石替代只有皇室贵族和高级官僚才可使用之珍贵玉器，在一定程度上确实可以满足许多生前无法拥有这些奢侈品的墓主的缺憾. 赵青. 浅谈唐代以石代玉现象［J］. 文博，2008（4）：88～91.

［57］李建纬师指出从社会角度观察古代上层贵族透过身体使用金银饰物的技术，除了营造出上、下位者之间的阶级差异性之外，其所形塑的金银装饰风潮也间接成为下阶者模仿和追随的目标. 李建纬. 中国金银器的时尚、表征与技艺［M］. 台中：杰太出版社，2013：211，212.

［58］孙机认为这种玄宗时期所流行女性着胡服、男装的现象，在安史之乱后华夷之辨更被强调之时即渐趋没落，其既非女性意识抬头或对男权社会的挑战，更非唐代传统上层妇女追求"髻簇珠翠"装扮的女装主流形态. 孙机. 唐代之女子着男装与胡服［J］. 艺术设计与研究，2013（4）：26，27；荣新江亦曾列表统计近30则考古发现有关女扮男装的图像数据，认为其形成原因与唐代贞观初期着男性胡服的粟特女人大量进入中土中，进而被唐代妇女当作时髦装束有关；盛唐时期某些社会选择的性别区分并不严格等因素有关，而到了唐代中晚期传世图

像和考古数据中女扮男装的形象即不复存在. 荣新江. 隋唐长安：性别、记忆及其他［M］. 香港：三联书店，2009：38 ~ 70.

［59］ 《新唐书・卷四十六・志三十六・百官一》记载“……凡外命妇有六：王、嗣王、郡王之母、妻为妃，文武官一品、国公之母、妻为国夫人，三品以上母、妻为郡夫人，四品母、妻为郡君，五品母、妻为县君……”，温绰为四品至五品官，其夫人陈氏可封为郡君或县君. 黄永年. 新唐书［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955.

［60］ 孙机推测李家营子2号墓出土部分金质带銙背后刻有“匠郭俱造”汉族工匠之名，可能系朝廷敕令中土工匠制造后赏赐突厥之物或突厥另觅汉族工匠所自行制作. 孙机. 论近年内蒙古出土的突厥与突厥式金银器［J］. 文物，1993（8）：48 ~ 58. 笔者认为温绰夫人墓中所出带有突厥风格鎏金带銙之状态或亦与上列因素有关.

［61］ 同［12］.

［62］ 马建春指出：唐代外来的玻璃制品常以进贡方式输入，除深受王宫贵族喜爱并充作供佛用品（法门寺地宫即出土二十余件多来自西方之玻璃器物），其后风尚自京都贵族阶级（李寿墓、金乡县主墓、李凤墓等都曾出土）漫延至庶民社会，文献中对于这风气亦多有记载如《新唐书・卷三十四・车服志》即载：“庶人女嫁有花钗，以金银琉璃涂饰之.”马建春等. 古代西域玻璃器物及工艺的输入与影响［J］. 回族研究，2011（1）：45 ~ 52. 安家瑶研究中国自产玻璃器皿（铅玻璃）之出现应不晚于西汉中期，吹制玻璃则不晚于北魏时期，不过西亚玻璃（纳钙玻璃）透过丝绸之路东传至中国，并对中国玻璃之制造与风格产生重大影响. 安家瑶. 中国早期的玻璃器皿［J］. 考古学报， 1984（4）：413 ~ 448.

［63］ “服妖”一词在新、旧唐书中均有记载，如两书均曾载关于安乐公主着百鸟裙之事，《旧唐书》记载：“……自安乐公主作毛裙，百官之家多效之. 江岭奇禽异兽毛羽，采之殆尽…….”玄宗认为其严重奢侈并残害鸟兽及破坏自然乃下令禁止. 《新唐书》称之“服妖”并与唐代社会一些特殊的服饰现象如“女着男装”等并同视为社会灾难之预兆，这种差异性或与两书编着之时代背景、社会风俗以及服饰制度的不同有关. 姜爱萍. 唐代“服妖”研究［D］. 青岛：青岛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6；另《新唐书・卷三十四・志二十四・五行一》复载：“……又世俗尚以琉璃为钗钏. 近服妖也. 抛家、流离，皆播迁之兆云…….”乃取“琉璃”与“流离”之音同遂视为“播迁之兆”之“服妖”. 史家璐等. 二十四史全译［M］. 上海：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4：698.

［64］ 《新唐书・卷四十六・志三十六・百官一》记载“……皇姑为大长公主，正一品；姊妹为长公主，女为公主，皆视一品；皇太子女为郡主，从一品；亲王女为县主，从二品……”. 同［58］.

［65］ 出土数据来自：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 唐永泰公主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64（1）：7 ~ 33. 关于起梁带（玉梁带）记载于《旧唐书・舆服》：“……起梁带，五品以上，金玉杂钿. 六品以下、金饰隐起，靴，武官及卫官陪立大仗则服之. 若文官乘马，亦通服之……”. 《新唐书・车服》复载：“……起梁带之制：三品以上，玉梁宝钿，五品以上，

金梁宝钿……”. 陕西长安县南王里村窦皦墓出土的“玉梁金筐宝钿真珠装蹀躞带”即属三品以上官员佩戴之“玉梁带”. 负安志. 陕西长安县南王里村与咸阳飞机场出土大量隋唐珍贵文物［J］. 考古与文物，1993（1）：45 ~ 52.

Analysis of the Tang Dynasty gilt-copper belt

Liu Ronggui

Abstract: Gilt-copper belts are characterized as a unique type among all the unearthed belts of Tang Dynasty. This essay will primarily investigate the Tang Dynasty gilt-copper belt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Tang society usage and social function via the analysis and statistics for the gilt copper belts from previous literature.

Key words: Tang-Dynasty; belts gilding; gilt-copper belts

内蒙古宝山辽壁画墓《寄锦图》人物身份研究

李 慧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文博系，南京，210000）

1993年冬，内蒙古赤峰市宝山发现两座大型壁画墓。据简报称，两座墓内都满绘精美壁画，其中1号墓内有“天赞二年”（923年）题记，是迄今发现的纪年辽墓中最早的契丹贵族墓。[1]2013年出版的《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这本书中提供了相关的彩图，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更好的契机[2]。而本文着重讨论2号墓石房内南壁带有榜题的一幅壁画，定名为《寄锦图》[3]。据简报认为，《寄锦图》画中六个女子，只有“画面中央位置”的女子才是主人公[4]。而依笔者浅见，画中有三个女子为女主人公。

下面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将画中六位女子按照从右往左的顺序加以编号，以下直接指称代号（图一）。如果按照报告中所说，则5号女子是画面中唯一的苏若兰，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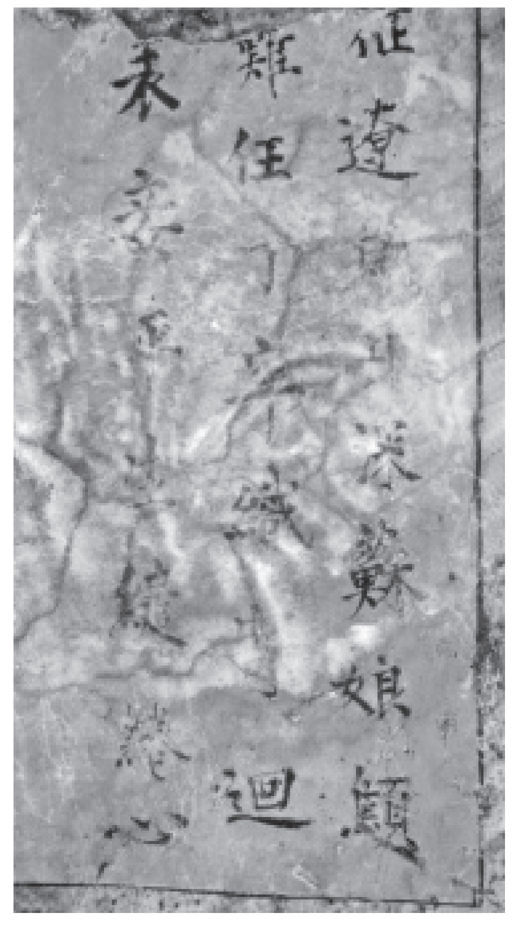


图一 寄锦图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55，第192页）

笔者认为画面中的2号女子、4号女子也都是苏若兰，其余女子才是侍女。简报判断画中只有5号女子为女主人苏若兰，主要依据如下：第一，位置居中，“画面共七人交错排开。中央位置的贵妇为画中主要人物。”第二，尺寸最大，“在诸女簇拥下，显得雍容华贵。”[5]笔者将从以下四个方面试图讨论出《寄锦图》女主人人物身份问题。

一、从“丁宁”二字推断画中执笔女子（4号女子）为苏若兰



图二　《寄锦图》榜题诗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58，第193页）

宝山辽墓2号墓石房内的《寄锦图》左上角有一个黄地竖框，内有墨书题诗（图二），诗云：

□□征辽岁月深，
苏娘憔［悴］□难任。
丁宁织寄回［文］［锦］，
表妾平生缱绻心。

虽然略有阙文，但是“苏娘”“织寄”几个字可以结合传世文献大概推测其意思，其内容记载了苏蕙编织回文锦的故事[6]：苏娘（即苏蕙，字若兰）的夫君（窦涛）远行“征辽”[7]，因天涯相隔使得苏娘憔悴难忍，于是织造锦衣，并在锦衣上书写寄托相思之情的回文诗，寄向远方的丈夫，以表达“缱绻心”。

在笔者看来，对于全诗理解的关键在于“丁宁”二字。古代汉语中，“丁宁”主要有以下两种意思：

（1）亦作“叮咛”。一再嘱咐。《北史·刘旷传》：“人有诤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8]陆龟蒙《五歌·水鸟》：“鸥闲鹤散两自遂，意思不受人丁宁。”[9]韩愈《奉和虢州刘给事使君三堂新题·花源》：“丁宁红与紫，慎莫一时开。”[10]

（2）古乐器名。也叫“钲”“镯”。似钟而小，军中用以节鼓。《楚宝》：“著于丁宁。”[11]按，“丁宁”与“令丁”都是拟声词。陆龟蒙《奉

和太湖诗·练渎》：“平川盛丁宁，绝岛分储胥。”[12]

很明显，这里指的不是古代乐器丁宁。而如果按照“叮嘱”的意思来看，则应该解读为苏若兰叮嘱下人纺织、寄送回文锦，简报虽然没有提这重依据，但是可能也是如此想的。

但是，根据《唐代诗词语词典故词典》中的解释，“丁宁”有第三种意思，即“恳切地”，其例如下：

青女丁宁结夜霜，义和辛苦送朝阳。[13]

——李商隐《丹丘》

铅钝丁宁淬，芜荒展转耕。[14]

——元稹《答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

那么结合《寄锦图》的榜题诗与文献来看，这里的丁宁译作“恳切地”是完全可以的。这首榜题诗体现了诗典型的绝句诗歌题材，即为一首七言绝句，而第三四句语意连贯，第三句与第四句共用一个主语“苏娘”，因此理解为“（苏娘）恳切地织、寄回文锦，以表达她（妾）的缱绻心”。

那么笔者更加倾向于认为是苏若兰亲自书写回文锦。原因主要有两点：首先，寄给丈夫的回文诗，涉及夫妻之间的梯己话，不宜让侍女代劳；其次，回文诗结构复杂，侍女即使有一定文化修养，也难以完成创作。因“其锦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古迈今，名曰璇玑图，然读者不能尽通。苏氏笑而谓人曰：徘徊宛转，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15]可见，作为普通女子且“非我佳人”的侍女，代替才女苏若兰去写回文诗是极不现实的。画面中执笔女子倒持毛笔，凝神思考，明显就是在创作酝酿，绝对不是一般侍女可以做到。那么我们就基本能够明白，画中执笔的女子既然是“丁宁（恳切地）”书写回文诗，那么这个执笔女子应该就是苏若兰（图三）。



图三　4号执笔女子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63，第198页）

二、从墓中《降真图》推定画中另外四个女子中可能还有苏若兰

据简报，1号墓石房的东壁上绘有《降真图》（图四）。



图四　降真图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31，第179页[16]）

“画面局部漫漶，左上部有菊黄色竖框，框内楷体墨书‘降真图’。图中绘五人，皆标榜题，所绘为汉武帝谒见西王母的情景。”[17]画中左下方坐于榻面的男子有榜题写明为“汉武帝”。右侧分别有四位仙女，为首者榜题为“西王母”，后三位仙女因榜题漫漶，简报未能证明其身份，但也可以依稀从榜题辨明她们各自的身份。西王母身后的仙女，榜题第一字为“董”，因此推测其身份应为名叫“董双成”的仙女。西王母与其侍女的神话故事有相关的传世文献记载：

> 于坐上酒觞数过，王母乃命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酥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鍾，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簧，侍女阮凌华拊五灵之石，侍女范成君击洞庭之磬，侍女段安香作九天之钧。于是众声澈朗，灵音骇空。又命侍女安法婴歌玄灵之曲。[18]

另外也有其他文献可佐证：

王母乃命诸侍女，王子登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19]

由上文可知，董双成向来以吹笙的形象出现，而画面中仙女头部、手部虽全部漫漶不清，但从其体态推测，似乎有前倾的趋势，应当是在吹笙。所以第二个女子应该就为吹笙的董双成。

那么剩下的两个仙女也应该是西王母的侍女。根据上文《汉武帝内传》记载，西王母侍女有王子登（弹八琅之璈）、董双成（吹云和之笙）、石公子（击昆庭之金)、许飞琼（鼓震灵之簧）、婉凌华（拊五灵之石）、范成君（击湘阴之磬）、段安香（作九天之钧）、安法婴（歌玄灵之曲）等八人。除此之外，另有传世文献记载有一个九人的侍女群体，名字大致和上文重合：

西王母为茅盈作乐，命侍女王上华弹八琅之璈，又命侍女董双成吹云和之笙，又命侍女石公子击昆庭之金，又命侍女许飞琼鼓震灵之璜，又命侍女琬绝青拊吾陵之石，又命侍女范成君拍洞子阴之磬，又命侍女段安香作缠便之钧，于是众声彻合，灵音骇空。王母命侍女于善宾、李龙孙歌玄雲之曲。[20]

根据以上两段文献中所提仙女，一共提到有12人。其中有5人同名同姓，而有7人的姓名具有差异性，特此对比两文献中所提仙女的同异做表格进行说明[21]（表一）：

表一 《汉武帝内传》与《无上秘要》所提仙女对比表

文献	所提姓名相同的仙女					所提姓名不同的仙女			
《汉武帝内传》	董双成	石公子	范成君	许飞琼	段安香	王子登	婉凌华	安法婴	
《无上秘要》	董双成	石公子	范成君	许飞琼	段安香	王上华	琬绝青	于善宾	李龙孙

画面剩余两个仙女的榜题模糊，但还可以看见一些部首和笔划，基本都是一个“口”和一个捺划。根据以上表格罗列出的仙女姓名，再对比榜题，以“口”作为名字结尾的应该是“范成君”和“石公子”的可能性最大。首先，“公子”这类称呼在古代常常可以前置，例如春秋战国时候的“公子光”“王孙满”。而古代女性也可以被称为公子[22]。所以“石公子”也可以被称之为“公子石”。其次，如果加以细致观察，就会发现两个“口”的大小略有不同，而榜题基本都是由等大的楷书写成，按照汉字的习惯“石”字的“口”部应该大于“君”字的“口”部。所以画面中第三个女子为“石公子”，第四个则是“范成君”。因此除西王母外，这三位女子都是侍女身份。

画面中的西王母和三个侍女的身份尊卑分明，但是大小近乎一致。由此可知至少在宝山辽墓的壁画中存在一种绘画传统，即不以画面人物的大小来定尊卑。而这种绘画传统又不同于唐代以《步辇图》为典型的，根据人物大小来定尊卑的传统。在《步辇

图》中，“唐太宗以尊贵者的形象大于他人，群女环绕以使其突出；吐鲁番使者禄东赞造型上小于唐太宗，但较之其他形象略大，同样也是造型上的一种尊卑关系。”[23]

所以，根据同期《降真图》的绘画习惯，应是不能用人物大小来确定《寄锦图》内其余几人身份的。诚如前文中证明的4号女子为苏若兰，而1、2、3、6号女子的大小都与4号女子相似，所以她们之中可能还有苏若兰，而不是简报所认为的都是侍女。

三、无法从发型发饰、服饰、面相等因素来区分画中人物身份

除了形象的大小，我国古代绘画也惯常以人物的服装、发饰等区别不同人物的等级。据简报描述，中央位置的贵妇“梳蝶形双鬟髻，满插金钗，柳眉凤目，樱桃小嘴，脸庞丰盈。穿红花蓝地交领窄袖衣，红色曳地长裙外套蓝腰裙，垂蝶结丝带，肩披淡黄色回纹披帛。”侍女“皆衣饰华美”，“仪容娇美，亭亭玉立，其发型、装束与主人相似。”[24]笔者认为正是简报中对“侍女”外形的一笔带过而让人笃定画中的确只有一个女主人公的观点，因此笔者觉得应该详细从画中每个女子的发型发饰、服饰、面相等因素来分析，这样更为妥当。

在发型和发饰上，画面中有五名女子为正面像，一名为侧面像，但都能确认均梳单鬟蝶形双髻，发鬟均由正面显示为红色花纹式样的宝钿做装饰，且在头发的各处都粘有方片形或长条形金箔制作成的钿片[25]。黄金是比较贵重的物品，其数量的多寡可以决定妇女地位的高低，但是画中六位女子头上的金钿也几乎是一样多，所以难以区别身份的高低。同时，笔者还观察到画中女子都带上了假鬟，此为唐代妇女装饰鬟发的一种修饰点缀。

在服饰上，这六名女子均著裙和衫，系垂蝶结丝带，每个人服饰的材质难以辨别，其用色虽有主次之分，基本上都是包含青、红、黑、蓝四色。衣衫上的花纹各不相同，主要是花卉纹、几何纹和云纹相间，这三类纹饰反映到人物等级上似乎并没有高低之分。如果从表二的数量统计来看，已经明确为女主人的4号女子和5号女子的服饰因素有所差异，那么说明这些服饰上的小差异和人物的等级高低并没有必然联系（表二）。

表二　《寄锦图》中六女子服饰因素统计

	青色	红色	蓝色	黑色	花卉纹	几何纹	云纹
1号女子	●	●			●		
2号女子		●	●	●	●	●	
3号女子		●		●	●		●
4号女子	●	●	●	●	●		●
5号女子	●	●	●			●	
6号女子	●	●	●	●	●	●	

且据简报描述，贵妇“肩披黄色回文披帛”[26]，但据笔者观察，此女子披帛上的图案既不是写有诗句的璇玑图，也没有“回纹”图样，而是花朵图案。同时传世文献也可佐证5号女子所披的不是回文锦，“因织锦回文，五采相宣，莹心耀目。其锦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27]可见回文锦上不仅题有回文诗，且“五采相宣，莹心耀目”，而画中5号女子所披的披帛在着色上并没有很出彩，只显示为“黄色”（图五），这与文献记载的回文锦不相符。



图五　《寄锦图》中5号女子著披帛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57局部，第193页）

从面相来看，除了3号女子部分面容看不清外，六位女子都是脸庞丰盈，脖颈间略有余肉，皮肤白净，双颊点有腮红，朱红小巧双唇，眉如远山，眼似卧蚕。画工精巧，长相相似，几乎就如同一人，当时的画匠应该是使用了相似的唐代人物粉本[28]。

由上可知，画面上的五个女子几乎无法从发型发饰、服饰、面相上来确认出尊卑关系，那么也就难以从这几个方面展开进一步识别画中人物的工作。

四、画面中的三组人物对应的情节应分别是“备锦”“诗锦”“寄锦”

如果不能从人物的大小、发型发饰、服饰、面相来识别人物的身份，则可以考虑从图像本身所对应的情节加以分析。纵观整幅《寄锦图》，画面基本是按照诗歌本身的情节展开，有学者称之为“横向叙事性的构图”[29]，笔者深以为然。为了搞清楚画面中的人物身份，必须确认各组画面所表示的情节。而传世文献《苏若兰・璇玑图诗》，对苏若兰的故事有详细记载：

> 前秦苻坚时，秦州刺史扶民窦滔妻苏氏，陈留令武功苏道质第三女也，名蕙，字若兰。识知精明，仪容秀丽，谦默自守，不求显扬。年十六，归于窦氏，滔甚敬之。然性近于急，颇伤嫉妒。滔字连波，右将军于真之孙，朗

之第二子也。风神秀伟，该通经史，允文允武，时论高之。苻坚委以心膂之任，备历显职，皆有政闻，迁秦州刺史，以忤旨谪戍敦煌。会坚寇晋襄阳，虑有危逼，藉滔才略，诏拜安南将军，留镇襄阳焉。初滔有宠姬赵阳台，歌舞之妙，无出其右。滔置之别所。苏氏知之，求而获焉，苦加棰辱，滔深以为憾。阳台又专形苏氏之短，谗毁交至，滔益忿恨。苏氏时年二十一，及滔将镇襄阳，邀其同往，苏氏忿之，不与偕行。滔遂携阳台之任，断其音问。苏氏悔恨自伤，因织锦回文，五采相宣，莹心耀目。其锦纵横八寸，题诗二百余首，计八百余言。纵横反复，皆成章句。其文点画无缺，才情之妙，超古迈今，名曰璇玑图，然读者不能尽通。苏氏笑而谓人曰：徘徊宛转，自成文章，非我佳人，莫之能解。遂发苍头，赍至襄阳焉。滔省览锦字，感其妙绝，因送阳台之关中，而具车徒盛礼邀迎。苏氏归于汉南，恩好愈重。苏氏著文词五千余言，属隋季丧乱，文字散落，追求不获，而锦字回文，盛见传写，是近代闺怨之宗，旨属文士咸龟镜焉。朕听政之暇，留心坟典，散帙之次，偶见斯图。因述若兰之才，复美连波之悔过，遂制此记，聊以示将来也。如意元年五月一日，大周天册金轮皇帝御制。[30]

通过榜题诗的内容来看，整个壁画应该至少有“备锦”“诗锦”“寄锦”三个主要情节组成。而上文提到的4号女子执笔的画面应该对应的是“诗锦”的情节。那么画面最右侧两个女子分别手捧盒子的画面应该对应的情节就是“织锦（备锦）”；最左侧女子对着挑夫的画面显然就是托付仆人寄送回文锦的“寄锦”情节。

与《寄锦图》情节相似的绘画作品虽然没有传世，但是类似题材的“横向叙事性构图”结构的画作，在文献中也有所记载：

右三为若兰所居重楼复屋。户牖间各作著思，练丝织锦，遣使处。左三为窦滔归第。外为车马相迎，次女伎坐大氍毹合乐其间，楼阁对饮处。又图中近上作远水红桥，窦临高列骑，拥旌旄以望，桥之西毡车从数骑排引见，滔盛礼迎苏。图中近下左书武后序，右为诗图。[31]

按照其描述，《织锦回文图》的格制采用的是“左三、右三的对称布局”[32]（表三）。

表三　（宋）李公麟所见之《织锦回文图》屏风画示意图

（据罗世平：《织锦回文：宝山辽墓壁画与唐画的对读》整理）

窦涛归第			苏氏织锦		
车马相迎	女伎合乐	楼阁对决	遣使	织锦	著思

与《寄锦图》略有区别的是，《织锦回文图》最先发生的情节是“著思”，意将相思之情化为回文诗的形式，这样的安排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因为从故事的发生顺序上

来看，到底是先有回文诗，然后想到利用锦绣寄给丈夫，还是纺织锦绣之后再想到附带写诗寄给丈夫，逻辑上都是说得过去的。至于将“织锦”的画面在实际表达中换成“备锦”，只是不同作家对于创作同一题材绘画时的构思方法不同罢了，并不影响理解。

除《织锦回文图》和《寄锦图》外，苏轼也曾为以苏若兰故事为背景绘成的《织锦图》题写过诗句：

题织锦图回文三首

其一

春晚落花余碧草，夜凉低月半枯桐。

人随远雁边城暮，雨映疏帘绣阁空。

其二

红手素丝千字锦，故人新曲九回肠。

风吹絮雪愁萦骨，泪洒缣书恨见郎。

其三

羞看一首回文锦，锦似文君别恨深。

头白自吟悲赋客，断肠愁是断弦琴。

又诗注云：回文诗起于窦滔妻苏氏，于锦上织成之，盖顺读与倒读皆成诗句也。诗中所谓千字锦回文锦，皆用此事也。[33]

从诗题来看，此诗应为榜题诗，即先有图画再题诗词。再从诗句内容来看，共分为三首绝句，对应的应该就是这幅画中相应的内容。在“其一”中，描绘了苏娘因丈夫远行而独自织锦的孤独寂寥的场景；在“其二”里，苏娘用诗锦来表达内心的思念与郁愤；在“其三”中，描绘的应是苏娘的丈夫收到饱含“别恨”的回文锦后悲痛弹琴的场景。《织锦图》虽没有传世，但据苏轼的三首诗可见，这幅图也同样是按照“横向叙事性构图”的技法来绘制的，即根据不同情节一一展开描绘。据上述三幅图以及相应文献记载，可以总结苏若兰故事情节的脉络大致如下（表四）：

表四

图名	情节			情节分布方式
织锦回文图	著思	织锦	遣使	单幅呈现
寄锦图	备锦	诗锦	寄锦	用树木作为间隔
织锦图	著思	诗锦	夫悔	未知

由上文的榜题诗、传世文献以及画面本身来看，基本可以确认整个《寄锦图》画面犹如连环画一样，从右至左是由备锦、著思（诗锦）、遣使（寄锦）三大横向性情节构成（图六）。


1


2


3

图六　寄锦图

1.寄锦　2. 诗锦　3. 备锦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55，第192页）

既然已经通过上文确认了三大情节，那么就要从每个情节中确认出其中的苏若兰。由上文可知，画中的三大情节是“备锦”“诗锦”“寄锦”，这不仅体现了“横向叙事性构图”技法，也运用了“连续式构图法”模式，即“画家利用一连串的场景，把一个故事从头到尾完整地表现出来。而时间进展的迹象是由故事中重要角色的重复出现来显示的。”[34]例如东晋画家顾恺之的《洛神赋图》，全卷分为三个部分，表现了主人公曹植与洛神相遇、相视、相交融的三个主题，而主人公曹植与洛神在画中反复出现。又如敦煌257北魏《沙弥守戒自杀缘》，这幅壁画包含了9个场景，分别为：“沙弥落发”“沙弥听遣”“沙弥拒诱”“女子告官”“女子皈依”“沙弥火化”“供奉沙弥”。而沙弥作为主人公反复出现于与他相关的场景之中。又如五代南唐画家顾闳中的《韩熙载夜宴图》，此画分为五段以连环长卷的方式描摹了南唐巨宦韩熙载家开宴行乐的场景：悉听琵琶、击鼓观舞、欣赏王屋山跳六么舞、更衣暂歇、清吹合奏、曲终人散。每段画面中，韩熙载作为画中的主角连续出境，串起了整幅图的六段场景。

那么对于《寄锦图》来说，同样也是采用了三大情节，因此在不同情节中主人公的重复出现也是在情理之中的。因此，在“备锦”中，1号和2号女子之中有一人便是女主人公苏若兰。

在“备锦”的场景来看，2号女子应该是苏若兰。首先主仆两人一起走，正常来说应该是主人走在前面。这样的例子在《降真图》中也能见到（图七）。同时，细心观察2号和1号女子在表现形式上也如“诗锦”中表现的4号与3号女子一样主次分明。因此可以推测2号女子为苏若兰。

从“诗锦”的场景来看，前文已经证明4号女子是苏若兰，而且此处也是主人处在仆从之前。

从“寄锦”的场景来看，5号女子是苏若兰。画面最左侧跪拜在地上的男仆人明显是跪向她，而不是侧身回首望向5号女子的6号女子。

至于为何5号女子的形象最为高大，仔细观察画面就会发现，整个画面基本是按照“两人一树”的节奏展开的（图八）。如图



图七 《降真图》西王母走在董双成前面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32，第179页）


1


2


3


4

图八 寄锦图
（《宝山辽墓：材料与试读》彩色图版55，第192页）

八中1，一主一仆走在一棵点叶树之前；而图八中2则是一主一仆隔着一棵修竹顾盼凝视；图八中4跪着的男仆和站着的侍女中间同样隔着一棵竹子。而且以上三个画面全部都占到了整个画面的近乎四分之三，而剩余的图八中3从大小上看和前面提到的三段差不多，但是只安排了“一人一树”，为了与“两人一树”所占的空间等大，只能把图八中3的人像处理的更大。

五、结　　语

综上所述，宝山辽墓2号墓石房内的《寄锦图》无论从其墨书题诗的内容、人物外形外貌，还是从勾画情节和技巧来看，都说明画面中不止一个苏若兰，而是有三个女主人公，其余的为苏若兰的仆从。同时《寄锦图》和《降真图》中所反映的主人与仆从等大的现象，与唐代主仆以不等大来显示尊卑的人物画传统相悖，那么这两种现象并存的绘画风格是否体现了契丹社会的某种风尚，还有待进一步研究。

注　　释

［1］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阿鲁科尔沁旗文物管理所.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壁画墓发掘简报［J］. 文物，1998（1）：73～95.

［2］　巫鸿，李清泉. 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

［3］　同［1］.

［4］　同［1］.

［5］　同［1］.

［6］　详见吴玉贵.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J］. 文物，2001（3）.

［7］　此“征辽”与史籍记载不符的原因，应为身在辽地制作这幅画的中原画家，借用苏若兰的历史故事来影射当下的现实，其可能的含义有四：①可能指阿保机建国后对这个地区用兵的举动；②指某一中原政权与“大辽”国的武装冲突；③用来形容中原与契丹或其他北方政权之间持续的军事冲突；④唐诗中的惯用词. 详见巫鸿. 宝山辽墓的试读与启示. 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41.

［8］　北史・卷八六・刘旷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757.

［9］　陆龟蒙. 甫里集・卷十七［M］.

［10］　韩愈. 东雅堂昌黎集注・卷九・律诗［M］.

［11］　周圣楷. 楚宝・卷二十五・忠义・斗克黄［M］.

［12］　陆龟蒙. 甫里集・卷二・练渎一云吴王开以练兵［M］.

［13］　李商隐. 李义山诗集・卷中・丹丘［M］.

［14］　元稹. 元氏长庆集・卷第十一・荅姨兄胡灵之见寄五十韵［M］.

［15］　逯钦立校.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卷十五・全晋诗［M］. 北京：中华书局，1983：955.

［16］ 画面中黑色榜题为笔者根据内容所加，具体考证请见下文.

［17］ 同［2］.

［18］ 班固. 汉武帝内传. 丛书集成初编. 3436［M］. 北京：中华书局，1985：1～3.

［19］ 李昉. 太平广记・卷三・神仙三・汉武帝［M］.

［20］ 此版本中有九仙女，虽与《汉武帝内传》有所出入，但根据《北堂书钞》《编珠》等史籍记载，与《汉武帝内传》中的仙女记载相一致，此段文献虽有出入，但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详见周武帝. 无上秘要・卷二十・右出真诰［M］.

［21］ 笔者查阅了历代文献，所列仙女的姓名在此已囊括在本文所举的文献中，应无遗漏.

［22］ 详见郑慧生. “公子”考［J］. 史学月刊，2002（3）. 例如“《公羊・庄公元年》：‘群公子之舍，则卑矣’，汉何休注：‘谓女公子也.’《左传》桓公三年：‘凡公女嫁于敌国，姊妹则上卿送之，以礼于先君;公子则下卿送之.’杜预注：‘公子，公女.’《公羊・昭公三十一年》：‘颜淫九公子于宫中，因以纳贼. 则未知其为鲁公子与?邾娄公子与?’徐彦疏：‘解云：谓颜公一人，不应并淫九人.’九公子被颜公并淫，说明她们是女公子无疑.”

［23］ 韩玮. 中国画构图艺术［M］. 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11：10.

［24］ 同［1］.

［25］ 《宝山辽墓》称之为“满插金钗”，笔者以为不妥，簪、钗为长条形，一般深插入发髻之中，在壁画中常显示为头部或尾部，且钗头常悬有垂饰、鸟形图案和花形饰片. 此处明显为贴塑于头发如表面的金箔. 详见孙机. 中国古舆服论丛［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245，246. 孟晖. 潘金莲的发型［M］.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14：14.

［26］ 同［1］.

［27］ 同［14］：955.

［28］ 吴玉贵. 内蒙古赤峰宝山辽墓壁画<寄锦图>考［J］. 文物，2001（3）：92～96.

［29］ 罗世平. 织锦回文：宝山辽墓壁画与唐画的对读. 宝山辽墓：材料与释读［M］. 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3：153.

［30］ 同［14］：955.

［31］ 桑世昌. 回文类聚・卷一［M］.

［32］ 同［27］：153.

［33］ 蔡正孙. 诗林广记・后集卷之三［M］. 北京：中华书局，1982：254. 此诗蔡正孙的《诗林广记》中有收录，而中华书局出版《苏轼文选》和《苏轼诗选》中未收此诗，疑非苏轼所作. 然其创作年代大致可信，作者身份则与本文分析关联不大，故本文对此不作详考.

［34］ 这种构图需要故事中的重要角色的重复出现来如表现情节的推动. 例如洛阳61号汉墓的《二桃杀三士》以及和林格尔汉墓的《汉吏出行图》，这两幅壁画都是利用了“连续性构图法”，利用主要人物的反复出现于不同场景的画法，来推动故事情节的发展. 《二桃杀三士》画面共分为三段：第一段中矮小的晏子置身于两个高大威猛的勇士之间，遭到了勇士的羞辱；第二段中矮小的晏子在向齐景公献计，画中还有两个手持鸠杖的老者；第三段则是三

个勇士分别自杀的情节. 而《汉吏出行图》如表现了某位汉官六个出行的场面，同样也是主人公汉官反复出现在不同场景中. 详见陈葆真. <洛神赋图>与中国古代故事画［M］. 浙江：浙江大学出版社，2012：76～80.

Character Identity of Jijin Tu Baoshan Liao Dynasty Tombs in the Inner Mongolian Autonomous Region

Li Hui

Abstract: There are seven figures in the picture of “Jijin tu” in the Tomb Two of Baoshan Liao Dynasty that is located in the Inner Mongolia Autonomous Region, including one man and six women, and only one of whom is believed to be the heroine of the picture called Su Ruolan. According to the poem on the picture, it can be proven that the lady holding the writing brush is definitely Su Ruolan; while it can be deduced that there is no definite connection between the “figure sizes” and “social status” from the picture of “Jiangzhen Tu” in the Tomb One; the clothes, hairstyles and appearance of the women figures in the picture are so similar that they can be hardly identified; so the only way left to identify them is using the principle of “lateral narrative structure”, which means the character can be seen repeatedly in the different scenes. According to this there are three Su Ruolan in the picture.

Key words: Jijin Tu; Su Ruolan; Jiangzhen Tu; Lateral Narrative Structure

云石堡考

——明长城史地札记之一

翟　禹

（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呼和浩特，010010）

有明一代，明朝政府在北方与北元—蒙古诸部对峙的地方逐步建立了一整套长城防御体系，分为九个军镇管辖，“其边陲要地称重镇者凡九：曰辽东，曰蓟州，曰宣府，曰大同，曰榆林，曰宁夏，曰甘肃，曰太原，曰固原。皆分统卫所关堡，环列兵戎。纲维布置，可谓深且故矣”。[1]九边军镇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自明初开始在北边构筑防御体系，直至中后期才逐渐完备成型。明代中后期，基于北边防御体系的建设，出现了大量的边防图籍，记录了有关长城防御体系中的各种军事设施的地理信息，对于我们今天认识长城地带的历史问题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对于以长城墙体所串联起来的防御体系地带中的各类防御设施的考察，是认知长城地带历史的一项基础性研究工作。笔者拟从其中最为关键的军事聚落——城堡为考察核心，首先对大同镇、山西镇、宣府镇等所属诸城堡及其所关涉的史地问题进行系列考证，主要研究方法是采用文献史料和田野考察资料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文献资料主要是边防图籍和有关其他文献。有关这个方面，笔者曾在此前作过一些零散的研究[2]，计划今后在此基础上继续开展相关研究，本文围绕大同镇云石堡展开的研究便是其中的一篇。

城堡是指用夯土或砖石围筑起来的用来居住或屯驻的封闭型聚落形式，其作用是为了配合长城墙体，具有军事防御和屯兵驻扎等功能，本文对与云石堡有关的几个问题进行了考订，以此对明长城防御体系提出了一些新的认识。

一、云石堡地理及文献概况

云石堡隶属于大同镇左卫道威远路管辖，有新、旧两座城堡，新堡的地理位置为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丁家窑乡云石堡村所在地，地理坐标：东经112°09′55.90″，北纬40°02′53.80″，海拔1580米。旧堡位于新堡东南直线距离7千米处，地理坐标：东经112°13′58.58″，北纬39°59′47.24″，海拔1589米。有关云石新堡、旧堡及周边烽火台、马市遗迹现状，可参见《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3]，此外在2007年内蒙古开展明

长城资源调查工作时，也已作了详细调查。[4]

文献中专门记载云石堡最为详尽的便是《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和《三云筹俎考》：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本堡设自嘉靖三十八年，故土筑也。万历十年因山高无水，离边尚远，不便市场，故改建于王石匠河，砖包焉。周一里七分，高四丈一尺。设守备官一员，所领旗军五百四十三名，马二十七匹。分边十四里三分零，市场一处，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十四座，内镇墙等墩极冲。边外马耳山、长沟一带，多罗土蛮等部落驻牧。本堡旧堡凭山为险，缓急可守，今改建新堡，密迩市口，防御抚处虽视旧为便，但地势平旷，险非所据。且距威远四十里而遥，孤悬一隅，道路崎岖，转输不便，有警似为可患。议者谓旧堡亦当存留以便应援，不为无见云。[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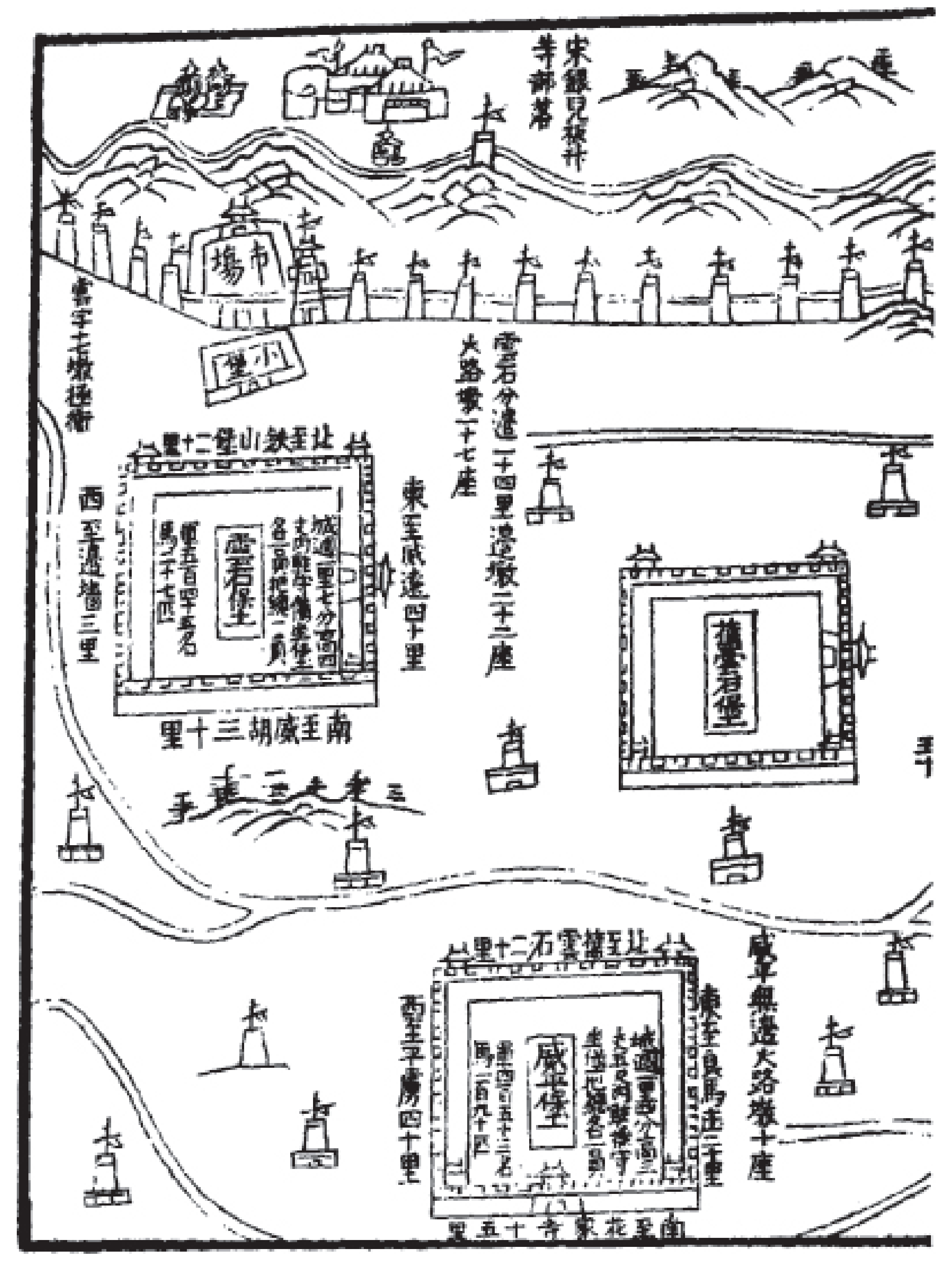
《三云筹俎考》：

嘉靖三十八年土筑，万历十年改建砖包。本堡旧据山为险，缓急可恃，后缘山高无水，防守为难，且离边太远，不便市场。改建于王石匠河，密迩市口，但地势平旷，险非所凭。且东南北三面近山，虏登之，我虚实悉见。虽藉本路援兵，而相（拒）［距］颇遥，道路崎岖，转输未易。边外虏酋宋银儿、板升等部落住牧，有警殊可寒心。议者欲于堡外东南高冈之处，添筑一台为孤堡一臂之助。又堡外居人无关可恃，增筑关厢以备趋避之所，即今承平亦弭盗之一策矣。[6]

《三云筹俎考》“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之云石堡、威平堡”图（图一）标注文字：

北至铁山堡二十里，东至威远四十里，南至威胡三十里，西至边墙三里。城周一里七分，高四丈，内驻守备、坐堡各一员，把总一员。军五百四十五名，马二十七匹。云石分边一十四里，边墩二十二座，火路墩一十七座。[7]

据上引资料可知，云石堡始建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始建城堡当是旧堡，直至万历十年（1582年）改建于王石匠河南岸，即新堡，也就是现在的云石堡村所在地。前文已提，云石新、旧二堡及周边遗存的地理位置经过考古调查已经确认。



图一　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之云石新、旧堡

（《三云筹俎考》）

表一　云石新堡古今数据对照表

数据来源	城墙		地理位置	分边管理
	长度	高度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周一里七分	高四丈一尺	距威远四十里	分边十四里三分零，市场一处，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十四座，内镇墙等墩极冲
《三云筹俎考》	周一里七分	高四丈	北至铁山堡二十里，东至威远四十里，南至威胡三十里，西至边墙三里	分边一十四里，边墩二十二座，火路墩一十七座；云字十七墩极冲
《山西文物地图册》	平面呈方形，边长约200米	基宽5～7米，顶宽1～3米，残高3～9米	丁家窑乡云石堡村中，位于长城东侧约500米	
《内蒙古明长城报告》	东西长180米，南北长170米，周长700米	现高约11米，底宽6米，顶宽2米	位于右玉县丁家窑乡云石堡村[8]、长城墙体东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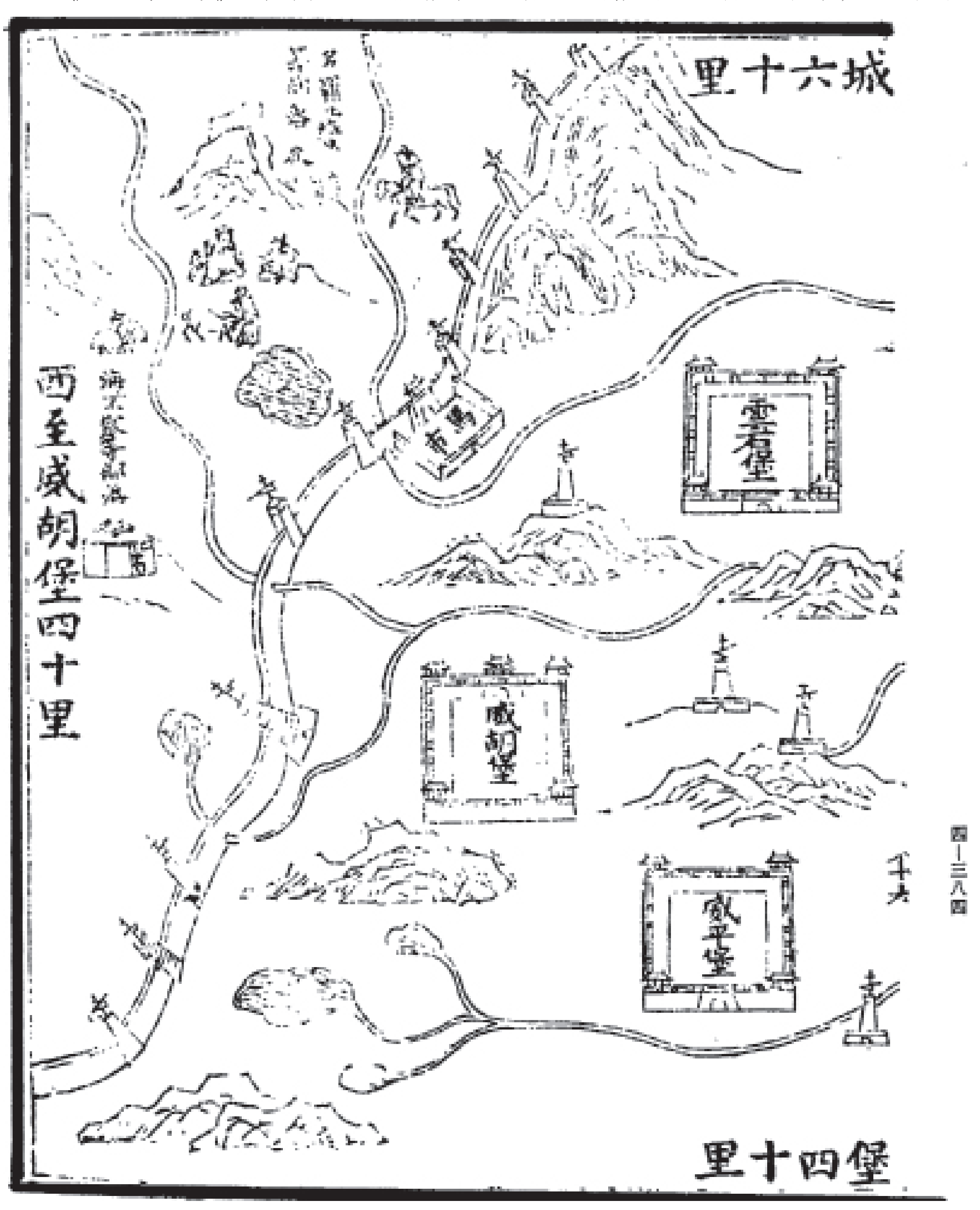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均为明代中期重要的边防图籍，在认识明长城防御体系方面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作者杨时宁（1537～1609年）历任宁夏巡抚，宣大、山西总督，官至兵部尚书。万历二十九年（1601年），杨时宁任宣大山西总督，三十三年（1605年），在宣大总督任上致仕。杨时宁在任宣大总督期间，组织麾下官员搜集宣府、大同和山西三镇边防资料，最后由他汇总整理剪裁而成此书，基本上反映了万历三十年前后宣大山西三镇的边防和蒙古诸部的情况。《三云筹俎考》作者王士琦（1551～1618年），其于万历四十四年至四十五年（1616～1617年）任大同巡抚，任内撰成此书，“三云”指的是云中、云东、云西，即大同镇全境。这两部书的最大特点是图文并茂，二者一一对应，紧密结合，并且都十分丰富详细，反映了17世纪初期三镇沿边地区明蒙双方的情况，为研究当时明朝北部边防和蒙古提供了十分宝贵的资料。[9]本文主要依据这两部文献所记载的文字、附图和考古调查，对云石堡有关的几个问题展开研究。

二、云石堡马市遗迹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大同左卫道辖威远路总图”（图二）中，在长城墙体内侧紧贴墙体标注有“马市”，且马市所附着的长城墙体上绘制有出入通道。在单独绘制

的“云石堡”图（图三）中，在长城墙体内外分别标注有一座“马市”。其中内侧的“马市”并未与长城墙体相连，而是保持了一段距离，这一点与“大同左卫道辖威远路总图”（图二）中并不一致，也就是说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一书中，同一处城堡的设施在不同绘图中的标注和绘制方式，存在着不一致的情况。

《三云筹俎考》“大同左卫道所辖中北西威远三路总图”（图四）中，云石堡长



图二　大同左卫道辖威远路总图（部分）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图三　云石堡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



图四　大同左卫道所辖中北西威远三路总图（部分）
（《三云筹俎考》）

城墙体附近并未标注马市。由于这幅总图中所绘制的主要是大同镇所属中、北西和威远三路下辖的主要城堡，表现的是这三路城堡总体的分布形势图，篇幅所限难以详尽标注城堡以外的所有设施，因此可能未标注“马市”也不为过。而在“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之云石新、旧堡”图中，在长城墙体外侧紧贴墙体的围院中标注了“市场”，在长城墙体内侧一处独立的小城堡中标注“小堡”，两者之间的长城墙体上标注有出入通道，通道东侧标注一座体量高大的墩台（图一）。

《山西文物地图册》第183页的“云石堡马市遗迹”条，对其地理位置描述为“位于丁家窑乡云石堡村西约500米，位于长城东南约50米”，在实地调查和google地图上查看，在云石堡村（也就是云石堡遗址）周围500米范围之内并未再有任何城堡，可见其描述不准确。不过根据《山西文物地图册》的描述看来，其所指的马市遗迹应当就是位于云石堡西北方直线距离约1.2千米、紧挨长城墙体东侧的那座城堡，《内蒙古明长城报告》将其命名为“韭菜沟堡”。[10]根据实地测量，这座城堡基本现状如下：“该堡位于长城墙体东侧10米处，平面略呈矩形，设东门，有瓮城。东、南、西、北墙分别长245、184、240、145米。”[11]《山西文物地图册》的描述与此相差较大，应系当时测量工作出现误差所致。[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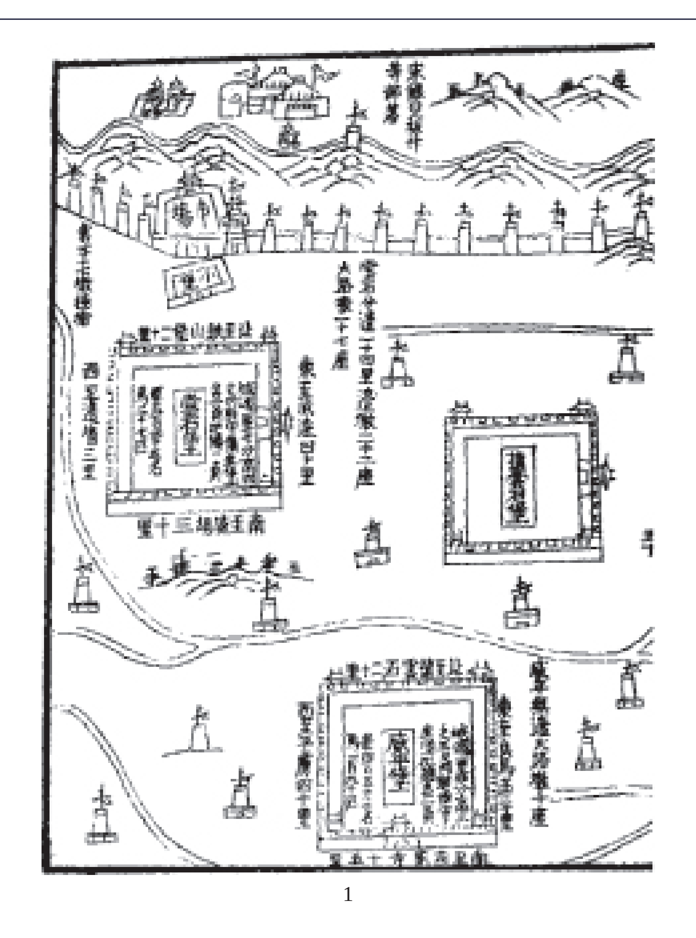
云石堡“密迩市口”，即非常接近马市，且马市往往均位于长城墙体的口子附近。因此，这就从地理位置上将马市锁定在了这一带，此已无疑义，以下作具体分析。

第一，《三云筹俎考》“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之云石新、旧堡”图所标注的“市场”和“小堡”非常接近实地现状（图一、图五），从实地来看，地处市场和小堡东北侧长城墙体上有一座墩台，保存较差，坍塌严重，《内蒙古明长城报告》将其命名为“韭菜沟6号敌台”，但报告并未将市场和小堡遗迹记录在内。[13]此外据附图所示，市场所在长城墙体上应当有一处出入通道，但在实地调查中，由于墙体坍塌严重，墙体两侧坍土均形成较大斜坡，是否存在通道尚需进一步考古勘探确认。

第二，根据实地测量，韭菜沟堡与云石新堡的规格相差无几，因此韭菜沟堡必非图四中所标注的小堡，而图三又未标注马市，可知《三云筹俎考》诸图中并未标注韭菜沟堡。

第三，图一中所标注的“马市”，据图观察其与云石堡的比例和实际基本相符，因此它应当是韭菜沟堡。但是其与长城墙体的关系绘制有误，因为无论是韭菜沟堡还是西南侧的“小堡”，均未与长城墙体相接。图二的标注表明长城墙体内外均存有用作马市的小城堡，但内侧只标注了一处，从图上也未能判断是韭菜沟堡还是图四标注的“小堡”。

第四，尽管这两部图籍的绘制与标注内容均不甚一致，甚至同一部书中的标注都存在差异，但结合实地调查情况来看，图籍的标注基本上大同小异。因此，综合考量文献图籍和实地现状分析，要作出最终判断还应以实地状况为基准，那么我们可以得出如



1



2

图五　云石堡附近小堡、市场《三云筹俎考》图与google图

1.《三云筹俎考》图　2. google图

下结论：

在云石堡处所开马市位于云石新堡西北方直线距离约1.2千米处的长城墙体内外两侧、王石匠河的北岸，长城墙体内侧有两处地点，一处为韭菜沟堡，一处为《三云筹俎考》所标注的“小堡”；墙体外侧为标注“市场”的马市。“小堡”“市场”与韭菜沟堡相距130米（图一）。

“市场”基本形制：整体呈矩形，倚在长城墙体上，西墙（呈东北—西南走向）长约50米，北墙、南墙（呈西北—东南走向）长约60米。墙体上未见门的痕迹，推测在东墙（即长城墙体）底部设有出入通道，因坍塌严重，无法确认。“小堡”基本形制：整体呈正方形，四面墙体均长约40米，西墙有豁口，推测可能为城门。

至于三处马市的修建时间，从现存构筑形式来看，韭菜沟堡建于紧挨长城墙体之处，与云石堡相比，韭菜沟堡墙体底矮且单薄。一般而言，一座城堡地处极边却构筑单薄，其防御性是非常差的，可见明显是专门作为马市而修建，因此其始建时间应不早于云石新堡的建成时间，即万历十年（1582年），否则在没有专门军事据点防御的前提下，于长城墙体处修建一座防御性极差的城堡，无异于将自己彻底暴露给敌人。至于“小堡”和“市场”，从现存程度来看无任何防御设施，不太可能在开辟市场之前就已存在，多半为云石堡开马市之时始建，因此其时间大概为隆庆五年（1571年）前后。

三、云石堡分管长城墙体、烽火台、极冲与关厢考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云石新堡“分边十四里三分零，市场一处，边墩二十一座，火路墩一十四座，内镇墙等墩极冲。”《三云筹俎考》“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之云石堡、威平堡”图标注文字：“云石分边一十四里，边墩二十二座，火路墩一十七座。”两书记载稍有不同（图一）。

1. 分管的长城墙体

每一座城堡都负责分管一定长度的长城墙体。在云石新堡以北直线距离4.5千米处，树立着两座界碑，便是云石堡与隶属于中路的铁山堡之间分管长城墙体的界限。那么，自“大同威远路分属东界”碑以南的长城墙体，均应属于云石堡分管。[14]但由于云石堡与威胡堡分管长城墙体之间的界限不清楚，因此只能根据界碑所在地向南大致经过当时“十四里三分”（或“一十四里”）的距离。推测云石堡与威胡堡之间的界限应当在井沟村一带。

2. 烽火台

明代九边防御体系中的城堡，不论大小均会在周边设置烽火台，作为城堡的附属





图六　云石堡及其马市位置图

设施，起到瞭望、警示和传递军情的作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载，云石堡分管“火路墩一十四座”，这里面应当包括位于云石堡分管长城墙体附近的烽火台和位于云石堡周边的烽火台。根据实地调查，云石新堡周边现存有多座烽火台（图九）。但是由于分管长城墙体的起止点和云石堡腹里分管烽火台的地理范畴无法准确界定，同时又存在保存程度问题，不排除部分烽火台遗迹消失的可能，因此这“一十四座”烽火台目前不能全部确认。但根据文献图籍和实地调查，仍能够作如下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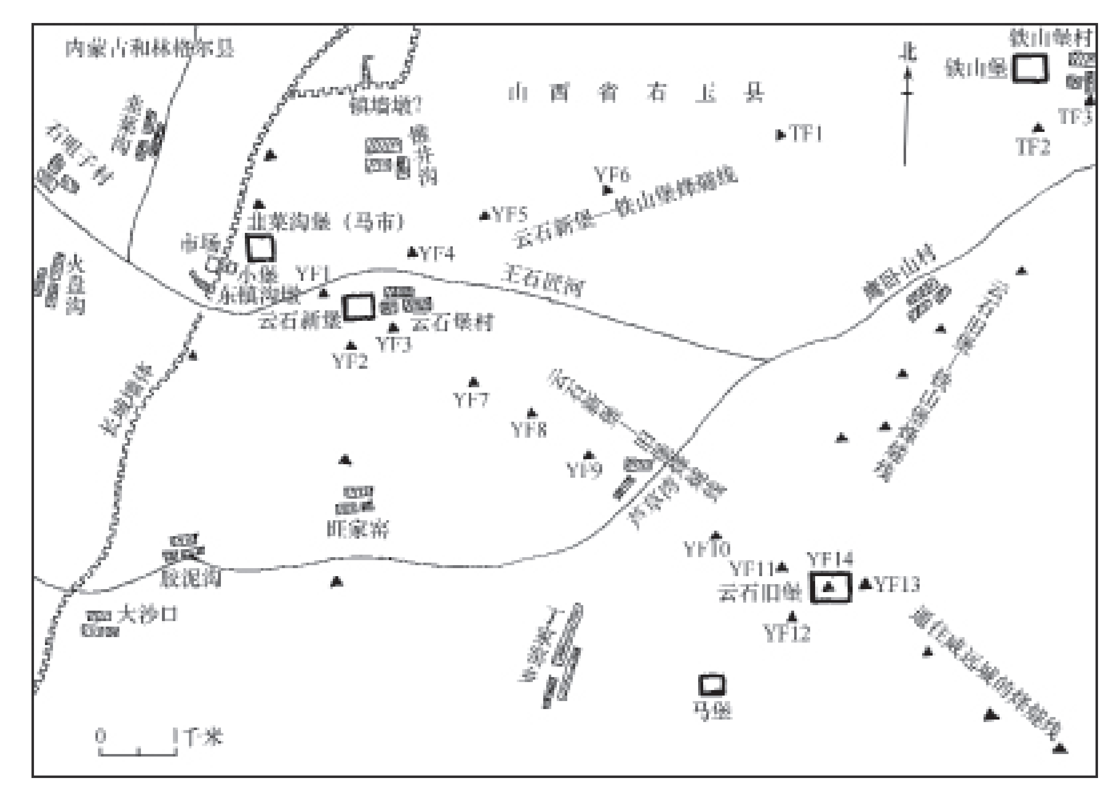
首先，据目前调查所得可知，距离云石堡最近的烽火台有四座，分别位于云石堡的正西160米，正南320米，东南300米以及东北500米（均为直线距离），编号为YF1、YF2、YF3和YF4（图九）。

一般来说，城堡周边的烽火台必然是在城堡分管范畴之内。但上述四座烽火台中，可能有一座并非是《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载“一十四座”之内。《三云筹俎考》记载：“议者欲于堡外东南高冈之处，添筑一台为孤堡一臂之助。”因《三云筹俎考》成书晚于《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故《三云筹俎考》所载这座“欲于堡外东南高冈之处”添筑的烽火台，必不在《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载之“一十四座”之内。那么，议者关于添筑烽火台的这个想法最终是否付诸实施了呢？从云石新堡周边现存烽火台遗迹分析，添筑烽火台计划很可能已经实施。因为烽火台体量不大，《三云筹俎考》的作者王士琦作为大同巡抚如有此想法，应当不难实施。且“议者”已经提出“于堡外东南高冈之处”这样非常具体的地理位置，想来思虑周全，添筑工程亦不为难。云石新堡的正南320米和东南300米处，各遗留有一座烽火台，编号为YF2和YF3。

从文献记载的字面上来看，这座增筑的烽火台位于云石堡的“东南高冈”，那么位于城堡东南300米处的YF3作为增筑烽火台的可能性是最大的，但位于正南320米的YF2也并非全无可能。其原因有三：①从“高冈”一词来看，YF3所在“高冈”海拔1600米，YF2海拔1625米，而且YF2位于YF3西南方，两者之间的直线距离400米，相较之下YF2比YF3更靠近西边的长城墙体，从防御性看YF2的位置更适于瞭望侦察、传递军情，从而更好地发挥作为云石堡“孤堡一臂之助”的作用；②从烽火台构筑形制上来看，两者形制均为覆斗形，平面呈矩形，均建立在一座平台之上，外有方形围墙。但是YF2在方形围墙之外，还建有一圈圆形壕沟。可见YF2在军事防御上的构筑要比YF3更加复杂且完善。按照一般逻辑，后期增筑设施往往要在形制上比前期完备，如此则YF2作为增筑烽火台是有可能的；③从云石新堡到旧堡之间的防御体系来看，在两堡相隔7千米的距离内有一条烽燧线，这条线上一共有六座烽火台，YF3也在其列，下文将要谈到云石旧堡的问题，据此推断如果YF3是连接两堡烽燧线上的一座烽火台，那么其修建时间很可能与新堡同时，自然非后来增筑的烽火台。因此，YF2和YF3均有可能为后期增筑烽火台。

其次，云石新、旧堡之间存在着一条烽燧线，这条线上经调查发现了五座烽火台

（自西北—东南编号YF7、YF8、YF9、YF10、YF11，如图七）。云石新堡建于万历十年（1582年），这条烽燧线应于此时建立。据此可知，旧堡在新堡建立以后并未放弃使用，仍然被用作防御体系中的一个军事据点。既然这条烽燧线是沟通新旧堡之间的防御体系，那么这五座烽火台应当也是“一十四座”之内。



图七　云石堡及周边形势图

第三，再来看云石新堡的东北方。上文已提在云石新堡东北方500米处有一座烽火台（编号YF4），经过调查发现沿着YF4继续向东北方延伸至铁山堡，也是一条烽燧线，云石新堡与铁山堡之间共发现有五座烽火台（自西南—东北顺序编号YF4、YF5、YF6、TF1、TF2）。根据云石堡、铁山堡及其和这些烽火台的分布位置来推断，YF4、YF5分别距离云石堡500米和1千米，应当为云石堡分管烽火台，而其他三座，TF1与TF2距离铁山堡分别为3千米和900米，应当为铁山堡分管烽火台，YF6位置居中，无法确定所属。

第四，云石旧堡周边及城堡内部，现留存有三座烽火台（编号YF12、YF13、YF14）。其中，YF12位于旧堡西南直线距离160米，YF13位于旧堡东60米，YF14位于城堡内部正中心。如若旧堡在新堡建成以后仍未放弃使用，那么这三座烽火台自然也在分管之列。

经以上分析，则已大体“凑足”一十四座之数，如果再加上长城墙体附近的几座烽火台，则可“凑足”一十七座之数，但这仅是初步推测。其中，编号YF1～YF14的烽火台基本上都位于新、旧两堡的周边及连接两堡的烽燧线上，因此它们在分管之列当无异议。当然，绝不应完全排除云石新、旧两堡与长城墙体和其他城堡相连的烽燧线，比如云石旧堡向东北与铁山堡之间、向东南与威远城之间，均有烽燧线相接。

由此作延伸分析，九边防御体系之中的军事城堡作为点，点之间的烽燧连缀成线，构成一面网格状军事防御带，长城墙体就是这条防御带最外围的边线。可见烽火台作为单体建筑，尽管构筑形制简单，但多个单体组合在一起，就会构成一条条快捷有效的通讯示警线，从而将整个防御体系调动起来，其作用不容忽视。

3. 极冲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云石堡图中标注了“镇墙极冲”“东镇沟极冲”（图三）。其中“镇墙极冲”标注在长城墙体内侧马市的北边，“东镇沟极冲”标注在马市的西边。《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图中绘制的长城墙体呈南—北走向，根据实地测量，长城墙体应当为东北—西南走向，因此两处极冲位置的准确方位表述应当是“马市的东北方和西南方”。在《三云筹俎考》“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中，在“小堡”与“马市”的西边标注了“云字十七墩极冲”（图一）。两书图中有关极冲的标注名称虽然不一样，但从标注位置来看，“云字十七墩极冲”指的应当就是“东镇沟极冲”，因此东镇沟墩应当是云石堡分管长城墙体上的第十七座墩台。[15]

关于东镇沟极冲的位置，根据《宣大山西三镇图说》所绘制图与实地调查，推测其位置应为“市场”和“小堡”以西临河的那座墩台，《内蒙古明长城报告》将这座墩台命名为“韭菜沟7号敌台”[16]，理由如下：①“东镇沟”一词，从字面意思来讲大意应为“镇守东边的沟谷”。而在这座墩台的西边便为王石匠河，是一处地势开阔、平坦的河谷。②从《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三云筹俎考》两书有关云石堡的文字记载“改建于王石匠河，密迩市口，但地势平旷，险非所凭”来看，云石堡所处地势确实如此，即其所分管的长城墙体为一处平坦宽阔的河谷穿过，河谷呈东—西流向，在云石堡北穿过，极易成为北元—蒙古骑兵进攻的一处突破口。因此，这条沟谷将天然地成为极冲之地，在其两侧设置构筑复杂的墩台防御设施就成为必然。③从构筑上来说，这座墩台与其他墩台相比虽然保存较差，但其设施较为完备，主要是带有围院，且横跨长城墙体，墩台位于围院的中间，因坍塌严重，无法窥见内中构造。

至于“镇墙墩极冲”，虽在图中标注，但由于实地调查中所考察的墩台很难与文献准确对应，因此暂不可考。在距离云石堡北直线距离2千米处，长城墙体呈复线，这段复线墙体起自“万历二十七年界碑”处，两道墙体延伸长达3～5千米，从构筑方式和保存程度来看，外侧支线修筑时间早于内侧主线。支线上的附属设施基本为马面，没有

墩台，而主线上墩台和马面相间分布。因此，如果镇墙墩极冲在这一带，也应当是位于主线墙体上。

此外，《宣大山西三镇图说》与《三云筹俎考》对王石匠河的绘制并不相同。杨书“大同左卫道辖威远路图”中的绘制基本上与实地相符（图二）。河流自西向东在“市场”南侧穿过长城墙体，并在云石堡北边向东流走。在《三云筹俎考》所标注的云石堡图中，南、北两边各有一条东—西向的河流，但是否哪一条穿过长城墙体，图上没有明示。可见，文献中附图的绘制并非精确，更多情况下只是示意。

4. 关厢

《三云筹俎考》载：“又堡外居人无关可恃，增筑关厢以备趋避之所，即今承平亦弭盗之一策矣。”根据文献有关关厢的记载，总结其作用有三，一是储存草料等物资；二是为居住在军事型城堡外的百姓提供趋避之所；三是在承平之际用作加强城堡防御的功能，而且主要是防盗。例如：

在《三云筹俎考》中，“破胡堡”条记载：“议建关厢一座，改设草场于内。”[17]

“保安堡”条记载：“近因堡窄人稠，无可居址，于堡东筑关厢一座，军民从集，防御有资云。”[18]

“马堡”条记载：“堡狭人稠，民居四野，且草场亦设堡外。近于堡南增建关厢一座，以资防守云。”[19]

“残胡堡”条记载：“且土田沃饶，军士乐业，关厢添设，草场无患，而人亦得所栖止焉。”[20]

《内蒙古明长城报告》中未记载云石新堡的关厢遗迹。[21]根据实地调查，在云石堡东墙中部城门瓮城以东，现留存有一道东—西向长约130米的城墙遗迹，推测很可能为后来新筑关厢的北墙。因在瓮城东现有大量现代民居建筑，因此关厢遗迹已不是很清晰。但通过鸟瞰瓮城东一带可以发现，民居聚落群基本上呈矩形分布，推测极可能是由于分布在当时关厢内部所致，后由于关厢墙体逐渐剥落坍塌，大部分消失。期待日后能够在关厢遗迹可能分布区进行考古勘探，以期确定其位置（图八、图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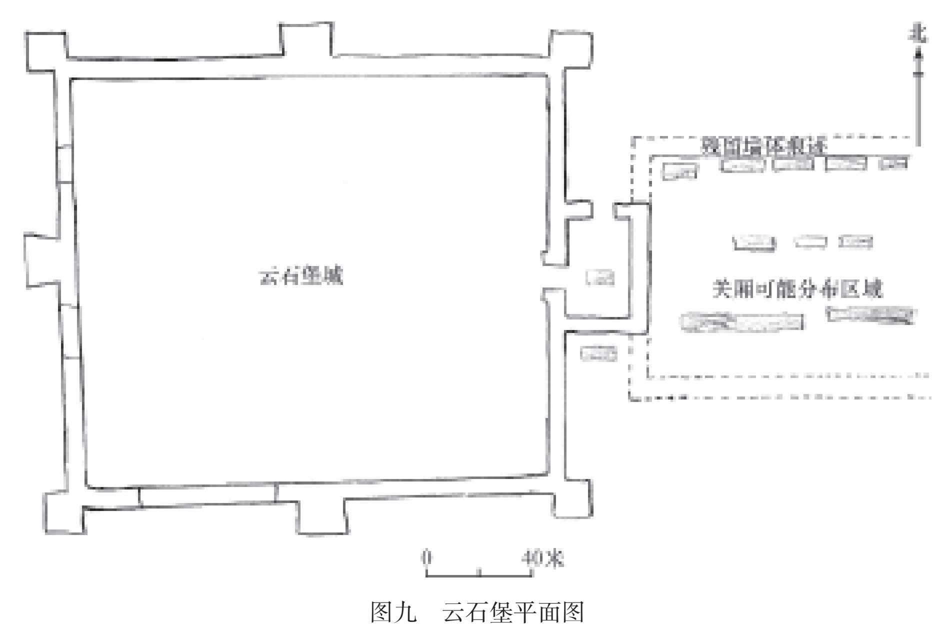
四、云石旧堡考

据调查，云石旧堡地理坐标：东经112°13′58.58″，北纬39°59′47.24″，海拔1589米（于堡内中心烽火台处测得数据）。旧堡位于新堡东南方，两堡相距直线距离7千米。旧堡内有1座烽火台（YF14），周边还有3座烽火台（编号YF11、YF12、YF13），这在《山西文物地图册》第184页中已有记载。

在旧堡的西南方直线距离约1.6千米处，还有一座较小的城堡，当地称其为马堡，



图八　关厢可能分布地带/google地图



图九　云石堡平面图

（在《内蒙古明长城调查报告》基础上改绘）

《山西文物地图册》与边防文献中均失载。马堡周边没有烽火台，仅在南边1.5千米处的山脊上有1座烽火台。从马堡周边的地形分析，这座烽火台不属于马堡的附属防御设施，当然也不排除马堡周边烽火台因历经岁久而消失的可能性，但从总体现状上看，其军事防御性明显不如云石堡等在文献中有记载的城堡。从此堡与云石堡的位置、距离与

堡名推测，马堡有可能是云石旧堡的马市，使用时间大概在隆庆五年至万历十年之间。

云石堡的战略位置在大同镇是非常重要的，所处之地被称为“极冲”。《九边图说》载“极冲地方”有“云石堡守备一员”。[22]《三云筹俎考》“威远路”载：“本路原非旧设，其设而裁，裁而复者屡矣。后因王石匠河败绩，各城堡卒难应援，复画地置将而设本路于此。”[23]云石堡地处沟通蒙古与明朝的要道上，隆庆四年（1570年）十月发生把汉那吉投明事件，经过双方多次磋商，俺答汗与明朝大臣达成协议，愿“执叛易孙，请封输贡”，于是他命令“其麾下哈台吉、伍奴柱袭捕众贼。二人固俺答嬖幸，自全等用事，二人者日见疏，遂擒赵全与其弟赵龙，及李自馨、六四儿、猛谷王、吕西川、吕老十、马西川之属，凡八人，面缚械系抵边城外。是日入云石堡，十九日送大同左卫。”[24]此处所经过的云石堡，应当是旧堡，因为新堡是在万历十年新建于王石匠河。

明代时期，横亘在北疆的长城防御体系规模庞大、内涵复杂，需要从多角度展开研究才能逐渐深化认知。军堡是这个防御体系中的最基层单位，其承载着驻兵防御、分管长城墙体及相关设施、通贡互市、组织生产等多重任务，结合文献史料和考古调查成果对军堡展开个案研究，对于认识长城防御体系是一个重要的突破点。

附记：本文承蒙南京大学杨晓春教授提出诸多有益教示，特此致谢！

注　释

[1]　（清）张廷玉·明史·卷四〇·地理志·第一［M］. 北京：中华书局，1974：882.

[2]　a. 翟禹，薄音湖. 明代大同镇之败虎堡考略——兼论败虎堡石碑题字“永宁”所体现的蒙汉关系［J］. 内蒙古文物考古，2009（1）.

b. 翟禹. 明代万历年间山西镇<创修滑石涧堡砖城记>考释［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2（3）.

c. 翟禹. 明开平卫置迁考述［J］. 内蒙古社会科学，2013（5）.

d. 翟禹. 晋蒙交界地带明长城军堡研究——基于滑石涧堡的个案考察［J］. 呼和浩特市塞北文化研究会，内蒙古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朔方论丛（第四辑）［C］.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

[3]　山西省文物局. 中国文物地图集·山西分册（中册）［M］. 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2006：182～183.

云石旧堡位于“丁家窑乡沙家沟村东北约1千米，位于长城东侧约3. 5千米. 平面呈长方形、东西长约200米，南北宽约150米. 堡墙保存基本完整，基宽6～7米，顶宽1. 5～3米，残高2～7米. 墙体夯筑，包砖不存. 西墙南侧设1门，距南墙约50米，现为豁口，宽约6米，深约8米. 西门外侧有正方形瓮城遗迹，边长约30米. 城墙基宽约5米，顶宽0. 5～1米，残高4～6米. 瓮城门在南墙，现为豁口，宽约6米，深约5米. 瓮城外侧有一周护墙，边长约50米. 瓮城北墙

与北段护墙相连. 南段护墙有一个豁口. 西段护墙外约10米处有1道土墙，长约50米. 堡址有角台4座，西南角台基部突出墙体约7米，宽约11米，高约7米. 该角台外侧有一周围墙，与堡南墙和瓮城南墙相接. 南围墙南侧约10米处有1道土墙，长约10米. 存马面4座，包括瓮城西墙的1座马面. 南墙马面基部突出墙体约8米，宽约11米，高约7米. 堡内正中有1座烽火台遗迹. 此为改建前堡址. ”

云石新堡位于“丁家窑乡云石堡村中，位于长城东侧约500米. 平面呈方形，边长约200米. 堡墙保存基本完整，基宽5～7米，顶宽1～3米，残高3～9米. 墙体夯筑，尚存包砖和包石. 东门1座，现不存. 东门外侧有瓮城遗迹，南北长约48米，东西宽约33米. 瓮城门在北墙，现为豁口，宽约6米. 存角台4座，西南角台基部突出墙体约10米，宽约13米，高约10米. 存马面3座，西墙马面基部突出墙体约13米，宽约15米，高约9米. 此为改建后堡址. 堡内现为民居. ”

云石堡马市遗址“位于丁家窑乡云石堡村西约500米，位于长城东南约50米. 平面呈方形，边长约200米. 东墙残长约80米，西墙残长约70米，南墙残长约100米，北墙残长约50米. 堡墙基宽约3米，顶宽0. 5～1. 5米，残高0. 5～2米. 墙体夯筑，包砖不存遗迹未见门的遗迹. 遗址内现为荒地. ”

第184页：云石堡旧堡烽火台遗址“共有4座. 一座位于云石堡旧堡正中部. 筑于底径约37米的圆形土台上. 夯筑圆锥形台体，底径约25米，顶部直径约22米，残高约8米，夯层厚0. 1～0. 2米. 一座位于云石堡旧堡东墙外约80米，形制与堡内烽火台相近. 另外2座分别位于云石堡旧堡西北约250米，西南约150米. 前者为夯筑方锥形台体，底边长约10米，顶边长约6米，残高约7米，夯层厚0. 1～0. 2米. 四周有方形围墙，边长约25米，基宽约2米，残高0. 5～1. 5米. 后者形制与前者相同. ”

［4］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明长城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27～229.

《内蒙古明长城报告》对云石堡的描述存在部分失误之处，此处予以更正：第227页第一句“位于右玉县丁家窑乡云石堡村西1千米”之语不确，应为“云石堡为山西省朔州市右玉县丁家窑乡云石堡村所在地. ”《内蒙古明长城报告》与《山西文物地图册》所记载的调查数据稍有差异，如堡墙长度，前者记为东西长180米，南北长170米；后者均记为200米. 更有瓮城、城门等数据均稍有差异. 导致此差异的原因，或为调查测量工作失误，或为调查时间相隔十多年，遗址保存状况不同等. 特别一提的是，堡城墙的长度，往往会因为是否将四座角台的数据算在内而产生不同数据，这需要在具体调查工作中特别说明.

［5］　（明）杨时宁. 宣大山西三镇图说・卷二・大同镇图说. 薄音湖.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15：146.

［6］　（明） 王士琦. 三云筹俎考・卷三・险隘考.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六辑）［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9：346.

［7］　同［6］：142.

［8］　按，云石新堡所在地即为今天的云石堡村，《内蒙古明长城调查报告》写作“云石堡村西1

千米”，“西1千米”为笔误.

［9］ 薄音湖，王雄.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十二辑）［M］. 内蒙古：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6：8.

［10］ 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自治区长城资源调查报告·明长城卷［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13：227，228.

［11］ 同［10］：227.

［12］ 国家文物局. 山西文物地图册［M］. 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183.

云石堡马市遗址“位于丁家窑乡云石堡村西约500米，位于长城东南约50米. 平面呈方形，边长约200米. 东墙残长约80米，西墙残长约70米，南墙残长约100米，北墙残长约50米. 堡墙基宽约3米，顶宽0. 5～1. 5米，残高0. 5～2米. 墙体夯筑，包砖不存. 未见门的遗迹. 遗址内现为荒地. ”

［13］ 同［10］：137.

此墩台整体分为上、下两部分，下半部高约4米，系黄土加石头夯筑而成，石块较大，夯层较为明显；上半部长、宽略小于下半部，以下半部为基台，建于下半部之上，高约1. 3米，系黄土夯筑而成. 这座敌台从构筑方式上看，明显系二次修筑，这见证了长城墙体及其附属设施的多次维修，其第二次维修可能就是在下半部分基础上，加高加厚修筑了现存的上半部分，由两部分的材质和构筑方式均不相同可以判断. 这座墩台紧靠长城墙体内外的马市市场，因此对其进行增筑或许与开马市、加强防御有关.《三云筹俎考》的“大同左卫道所辖中北西威远三路总图”（图三）、“威远路参将分属图之云石新、旧堡”（图四）中，均在长城墙体上绘制有一座体量较大的墩台，可能就是这座墩台，其中尤以图四中所绘墩台的位置与实地现状最为相符.

［14］ 翟禹. 明代“万历二十七年”界碑考［J］. 中国长城博物馆，2010（4）.

［15］ 通览《三云筹俎考》图中有关诸城堡极冲的标注，多使用“××墩极冲”或“某堡××墩极冲”等字样，其中“××”指的是数字，意为“某座城堡分管长城墙体附近的第×座墩台是极冲之地”.

［16］ 同［10］：137.

这座墩台整体保存极差，坍塌严重，从现存遗迹来看，并无明显特别之处，唯独因其临河的地理位置，才可将其与“东镇沟”这一地名联系起来. 另外，观察这座墩台周边应有围院遗迹，但《内蒙古明长城报告》中并未提及，有待以后开展复查工作再予以确认.

［17］ 同［6］：344.

［18］ 同［6］：341.

［19］ 同［6］：344.

［20］ 同［6］：344.

［21］ 同［10］：227.

［22］ （明）霍冀. 九边图说·大同镇图说.《玄览堂丛书》本. 薄音湖、王雄.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

编（第二辑）［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38.
［23］ 同［6］：345，346.
［24］ （明）焦竑. 通贡传.《国朝献徵录》明万历刻本. 薄音湖，王雄. 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二辑）［M］. 呼和浩特：内蒙古大学出版社，2000：443，444.

On Yunshi Fort——The First Note on History and Geography of the Ming Dynasty Great Wall

Zhai Yu

Abstract: The Ming Dynasty is responsible for building a Great Wall defensive system. The dynasty formed 9 military towns in the northern frontier region of confrontation between Ming and the northern Yuan/Mongolian tribes. As the core of defense system, fort installations play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Great Wall defensive system, which were composed by the Great Wall, kinds of forts and beacon towers. Datong Military Town was an important one of these defensive owns, and Yunshi fort belongs to it.This fort witnessed the historical processes of the Ming-Mongolia relationship by being located in a strategic area. By combining documents, maps and archaeological surveys we can research many problems related to the Yunshi fort, such as the neighborhood outside Yunshi fort, the role of The Great Wall, watch-towers (dun tai) and beacon-towers belonging Yunshi fort, key points (ji chong) “zhen qiang” and “dong zhen gou”, and horse markets. Additionally, the alignments of the Yunshi new fort and Yunshi old fort will promote understanding of the defense system.

Key words: Ming Dynasty; Mongolia; the Great Wall; the defense system; Yunshi fort

从阴山岩画看我国杂技体育的起源

赵占魁

（内蒙古河套文化博物院，巴彦淖尔，015000）

我国杂技及体育运动可以说与中华文化一脉相承，丰富多彩，绚丽多姿，具有悠久的历史和鲜明民族特色。但其中每个项目起源于何时何地？又是如何发展演变的？这些问题今天仅从文献上已无法考证。笔者通过多年对阴山岩画的考古调查，特别是2007年至2009年，由巴彦淖尔市组织的阴山岩画大型抢救性普查取得了重要成果，尤其是先后在磴口县狼山西段的默勒赫图沟（图一）、格尔敖包沟、托林沟（图二）、阿贵沟、乌斯台沟发现了多幅反映杂技表演和体育运动的岩画作品，令人激动不已，耳目一新。这不仅更加丰富了阴山岩画宝库题材内容，也为进一步探索我国体育和杂技的起源提供了形象而真实的物证。本文拟对其中一些富有代表性的岩画作品，试作重点研究与探索，并以此阐明我国杂技及体育运动中的若干项目，可能起源于青铜时代或更早的阴山河套地区。错误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一、杂技体育运动岩画的发现及所处地理位置与环境

早在20世纪70～80年代，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对阴山岩画进行考古调查时，即发现了很多幅较原始而广义的体育运动类岩画，如骑马、拉弓射箭、狩猎（包括射猎、投掷标枪）、舞蹈（包括双人舞、单人舞等）、武士表演、角抵图等。同时也发现了少量的杂技表演岩画，即盖山林先生在《阴山岩画》一书中提到了一幅“弄丸图”。

之后，笔者又多次对阴山岩画进行考古调查，特别是2007年至2009年，由巴彦淖尔市组织的阴山岩画大型抢救性普查，取得了重要成果，先后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前旗境内的阴山山脉狼山、乌拉山新发现了许多岩画点和大量岩画作品，尤其是在磴口县狼山西段的默勒赫图沟、格尔敖包沟、托林沟、阿贵沟、乌斯台沟、布敦毛德沟发现了多幅反映杂技表演和体育运动的岩画作品。另外，在乌拉特中旗的几公海勒斯太山也发现一幅。

默勒赫提沟岩画区，位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磴口县西北约60千米的阴山山脉狼山西段，地处乌兰布和沙漠东部边缘，系格尔敖包沟的一条大支沟。从格尔敖包沟东南口进入，行约13千米即到达默勒赫提沟所在的岩画区。这里山势险峻，奇峰耸峙，多悬崖

峭壁，景色优美壮观。山上岩石嶙峋裸露，植被稀疏；山下沟谷宽阔平坦，千回百转，越野汽车可达其中段。谷底清泉甘洌，流水潺潺（图一）；两边绿草成茵，山榆、山杏、酸枣树等也有成片分布。常有野兔、石羊、山鸡、野狐等野生动物出没其间；也可看到当地牧民赶着成群的山羊、绵羊放牧。古老而神奇的岩画，较集中分布在此沟中段、大约东西5千米的两岸及附近地区山崖立壁、沟壑缓坡的黑色石面上。



图一　阴山默勒赫提沟岩画生成环境



图二　阴山托林沟山顶黑石岩画带

乌斯台沟及支沟岩画区，位于默勒赫图沟岩画区西南，翻过几座大山即到。也可乘越野车自格尔敖包沟口沿公路向南行约10千米，即可到达乌斯台沟口（中间隔阿贵沟）。这也是一条有名的大山沟，地形和环境气候与默勒赫提沟大致相同。顺沟向里行进在其两岸缓坡崖壁上即可看到一幅幅岩画。在其两条支沟——通苦沟、格和达瓦查得沟又分别发现1幅体育运动岩画和1幅杂技表演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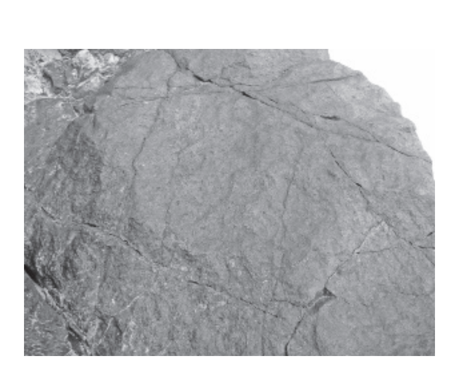
二、阴山发现的重要杂技体育岩画具体内容与制作年代

1. 双手举弄连体“8”字圈

画面横35厘米，纵40厘米。凿刻在磴口县狼山默勒赫图沟第五地点第一山头近顶端崖壁上。

画面迎东北，为一人站立，左手举弄着两个相接的“8”字形物体，右手举着一个“8”字物体，正在进行杂技表演，动作稳健，大方优美，演技精湛高超。刻画细致，富于动感，生动传神。

岩画所在石面为黑褐色，凸凹不平；制法为凿刻兼磨刻，刻痕较浅，色泽与石面相近。从制法、色泽和题材内容及风格，应为青铜时代早期作品（图三、图四）。



图三　双手举“8”字形物图



图四　双手举“8”字形物图

2. 双手并举三连圈点物体图

画面横12厘米，纵20厘米。位于磴口县狼山西段默勒赫图沟第二地点所在山头的东面半山腰立石上，画面迎东。单从此幅岩画的结构看，上为四个相连的圈中点组合图案；下相连一粗斜线，宽1.5厘米，其上又分出一粗曲线。然而，经反复细致观察后发现，原来上部四连圈点图案的最下一个圈点为一人的头部和上肢，下部为一人的躯干和两腿。左腿向左弯曲，脚着地；右腿呈斜立状。从构图上看，作者的艺术构思不能不说



图五　双手举三连圈点物体图

是别出心裁，十分巧妙。但生活在阴山狼山地区的远古猎牧人，他们的全部作品都是现实主义的，尽管后期有一些程式化、图案化的作品，而如果不是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已经产生的双手举物这种杂技运动项目，他们是不可能凭空想象出来的。因此，这幅岩画的正确解读应为一人双手并举三连圈点物体图，边举边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进行杂技或运动表演。不难看出，其所举物体大而重，远远超过人体，这需要掌握并熟练运用平衡原理。其技艺高超，姿势优美，形象生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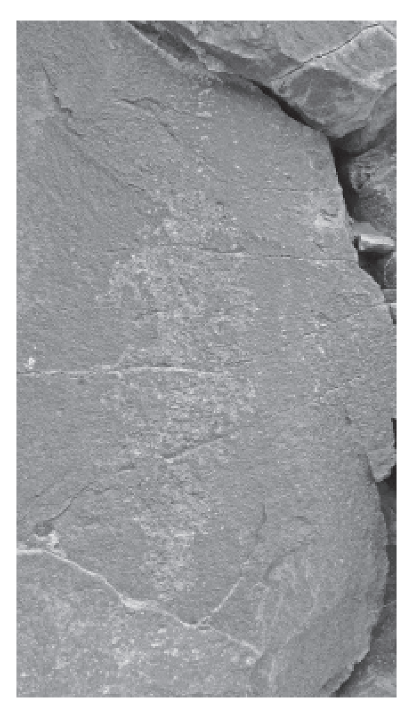
此幅岩画的制作方法为凿刻，刻痕呈麻点状，约为青铜时代早期的作品（图五）。

3. 叠立人形图

画面横15厘米，纵28厘米。凿刻在磴口县狼山西段默勒赫图沟第五地点东段崖壁上。

画面为一人头上顶着另一个人，正进行杂技表演的形象，十分生动。上面一人头上扎着发辫，似为女性，坐在下面另一人的头顶上，似乎在做着各种动作；下面的一人两腿并直，挺胸站立，双臂张开，好像在憋足了劲撑着头上的这位表演者。在这里平衡术运用自如，两人配合得又是那样协调、到位。

此幅岩画的制作方法属减地刻法，风格粗狂简约。石面为青灰色，刻痕为黄褐色，属于青铜时代中期作品（图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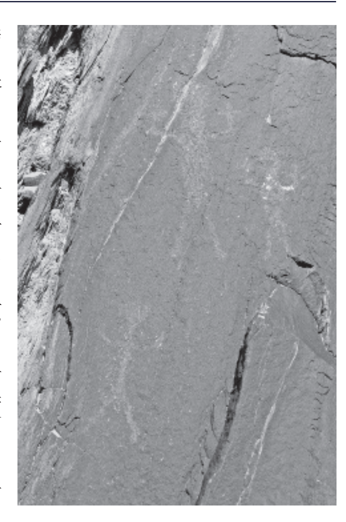


图六　叠立人形图

4. 双手并举（托）小人儿图

画面横35厘米，纵70厘米。刻于磴口县狼山默勒赫图沟第六地点所在山头西端半山腰、一长方形立壁石面上。画面迎南，石面黑青色，属于页岩玢石类，硬度约6°。制法为凿刻兼磨刻，图像清晰。其下接很高的沙丘，约距沟底30米，估计还有部分岩画埋在流沙下面。而往上走，再也找不到岩画的踪影。此山共发现岩画50余幅，该岩画为其最西端的一幅（图七）。

画面上下为三位成年人，分别双腿叉开站立,各自双臂向两侧水平伸展，每人每只手中托举着一个小人儿，共托举着六个小人儿。六个小人儿分别在三人的手掌之中，亭亭玉立，各自双臂向两侧平直伸展，姿态优美，形象生动。左上一位成年人，身材高大，生殖器下垂，为一男性；右上侧一位成年人身材矮小，似为女性。这两人在制法、风格、新旧程度上一致，特别是上身较粗胖，造型似蛙人，有头饰，不辨五官。下面的一位成年人，虽身材较高，但属瘦干型，上身细长，男性特征明显，有头饰。其造型、风格及新旧程度与上面的有些不同，似为后刻上去的。


图七　双手托举小人儿图

此幅岩画的上半部分，应为青铜时代中期的作品；其下半部分时代可能稍晚一些。

通过这幅岩画，让我们穿越时空隧道，有幸看到了三千多年前我国北方最原始的杂技表演艺术活动。那双手并举小人儿的优美姿势、娴熟的动作，可以肯定这种高超的杂技表演艺术已经产生，是当时现实生活中存在的。先民们已经认识并掌握、运用了平衡、对称的原理。

另观此岩画所处的地理环境位置，应为古代一重要祭祀场所。山体坐北向南，高峻陡峭，多悬崖立壁，山下沟谷宽阔平坦，沟底清溪涓涓，常年不涸。每当夏秋之季，山洪轰鸣，响彻云霄。在山脚下至半山腰崖壁上，先民刻有众多的人面像，可能经常在此举行重要祭祀活动。故，此幅岩画也可能包含有生殖崇拜、祭拜神灵之意，向上苍祈求多生多育，人畜两旺。

5. 弄丸图

位于乌拉特中旗阴山山脉的几公海勒斯太山。这是岩画专家盖山林先生以前发现的一幅杂技岩画。原画面系一大型放牧场面，高120厘米，宽135厘米，包含的内容很多，其杂技表演图像为整个大型画面的内容之一。其画面为一人站立，两臂平伸，正在手持弄丸器具表演，“在手周围刻有许多飞舞的圆形石子”[1]。其身后是两只动物（图八、图九）。


图八　杂技弄丸图
（《阴山岩画》）

此幅岩画的制作方法为凿刻兼磨刻，系青铜时代中期的作品。

图九　杂技弄丸图（原图）
（《阴山岩画》）

6. 骑“木马”表演图



图一〇　骑木马表演图
（《阴山岩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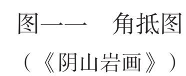
画面横13厘米，纵25厘米。位于磴口县狼山乌斯台沟支沟——格和达瓦查得沟中段石面上，附近只有这一幅岩画，距沟底约5米。画面为一人骑在一立柱支起的似木马身上，双手上举，其中一只手上还托着一物体，正在做着各种高难度动作。木马下连着立柱，立柱下端连着很简约的底座，人骑在上面表演，只要重心稍微偏离，连人带所骑木马就会摔到地上，真是扣人心弦，让人捏着一把汗。这幅岩画让我们看到了先民的高超技艺和智慧的光芒（图一〇）。此幅岩画属于青铜时代中期作品。

7. 角抵图

位于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狼山西段的布敦毛德沟，原画面很大，高2.5米，宽达14米。所包含的内容非常丰富，其中的内容之一即“角抵图”。除此还有飞翔的凤鸟、飞禽、老虎、马、牛、羊骆驼等十几种动物，还有骑者和日月星辰等。角抵图画面“为两人面对面的角斗场面”[2]，其上为一只动物（图一一、图一二）。

此幅岩画的制作方法为凿刻兼磨刻，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作品。





图一一　角抵图

（《阴山岩画》）

8. 骑术表演赛

横90厘米；纵70厘米。岩画刻于磴口县狼山西段乌斯台沟支沟——通苦沟北岸一快屋檐形巨石上，画面迎南，距沟底约7米。画面为一支浩浩荡荡的骑队，有的骑马，有的骑驼，多数向左面方向行进，只有两骑向右方向行进，似乎正在进行着一场骑术表演赛。特别令人瞩目的是右上角一骑



图一二　角抵图（原图）

（《阴山岩画》）

者，不是骑在马上，而是四肢朝下扶在马背之上。头向后方，在做着各种杂技动作，显示了广大猎牧民族的娴熟骑术（图一三、图一四）。



图一三　骑术表演赛图



图一四　骑术表演赛图

此幅岩画的制作方法为凿刻兼磨刻，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作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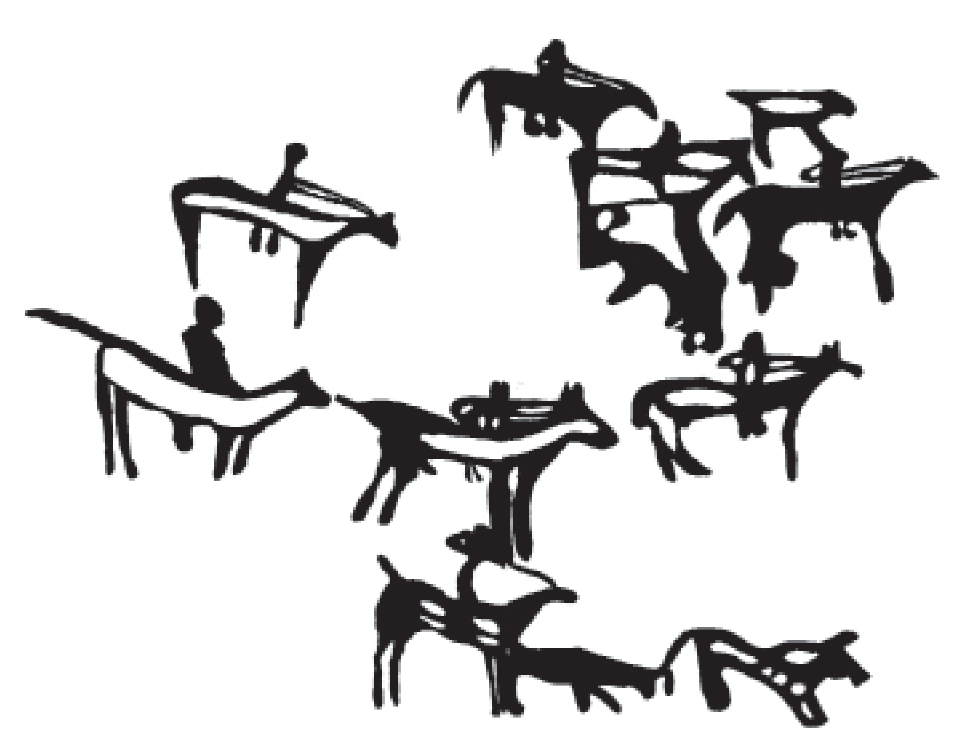
9. 多骑赛马图（画面之上叠压藏文）

画面横 160 厘米，纵 85厘米。位于磴口县狼山西段默勒赫图沟第五岩画点第二山头东400余米，在此沟南侧山脚下一从山上滚下来的大石面上。画面迎上，向北斜。画面上层有藏文16个；下层大约有17个图像，包括动物和人骑。其中能识别的就有8个骑马者，似正在进行一场激烈的骑马比赛，场面宏大，造型生动。

此幅岩画的制作方法为凿刻兼磨刻，应属于青铜时代晚期的作品。大约到明清时期，后人又在早期的动物和人骑图像上，刻上了藏文，破坏了原来的画面（图一五、图一六）。



图一五　多骑赛马图与藏文



图一六　多骑赛马图

三、阴山发现杂技体育岩画的重要意义

大量杂技体育运动岩画在阴山发现，具有重大意义和价值，特别是为探索和研究我国杂技和体育运动若干项目的起源提供了实物依据。

经过对上述阴山发现的这些重要杂技体育岩画的研究分析，发现其有以下几个共同特点：

（1）均刻在山体崖壁的顶端或半山腰，来衬托体育运动和杂技动作的惊险及表演者的高超技艺，可谓独具匠心，意境深远。

（2）其制作方法几乎都是凿刻兼磨刻。

（3）皆为青铜时代的作品，包括青铜时代的早、中、晚三个阶段。也就是说先民在阴山凿刻这些杂技体育岩画时，这些杂技和体育项目本身已经存在甚至已相当成熟了。那么据此可以进一步推断，这些杂技和体育项目的起源最迟可追溯到青铜时代或更早的新石器时代。

阴山中体育运动和杂技类岩画的发现，反映了我国北方阴山河套远古先民最迟在青铜时代或在新石器时代，“就掌握了身体重心的移位、力与美的结合及支撑点的关系等。并能自如运用平衡技术原理和运动力学知识”[3]。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艺术紧密地反映着生活。远古出现的杂技、运动表演动作，绝不是偶然的。人类起初为了生存和获得必需的生活食物，一方面，必然要与自然界野兽以及部落间战争中作生死搏斗；另一方面，要经常跋山涉水，攀援悬崖峭壁，上树采摘野果以及进行各种巫术、舞蹈活动。在长期的搏斗和生产劳动以及巫术、舞蹈活动过程中，必然学会躲闪、厮打、跳跃、翻滚、攀援、叠立、托举、抛掷等动作诀窍，掌握平衡原理和运动力学知识，从而进一步发展为具有现代意义的各种体育运动项目和杂技表演艺术。

据盖山林先生《中国岩画学》记：“在贺兰山晓西峰沟有一幅马术杂技岩画；新疆库鲁克塔格山兴地有一人头倒立岩画；而云南沧源岩画中发现的杂技表演图像和种类更多，有踩高跷、弄盘、叠立人形、抛球（弄丸）、顶竿”等。

关于早期古文献中对杂技、体育运动表演的记载，较早的有战国时期《庄子・徐无鬼》“市南宜僚弄丸，而两家之难解。”宜僚是当时楚国的勇士，隐居市南，擅长弄丸，技艺高超，竟通过弄丸排解了两家的纷争，使两家和好。但这种“弄丸”杂技起源于何时何地，从文献上已无法考究。阴山中“弄丸”岩画的发现，说明我国北方的阴山河套地区，早在西周至春秋时期猎牧民族中曾流行过“弄丸”之技。

关于“弄丸”项目的起源，大概当初可能是猎人在狩猎时从“手中抛掷的武器或牧人牧羊时打羊的石子”[4]。熟能生巧，后来才慢慢发展为一杂技项目。据此，可以推断，“弄丸”之技很可能起源于北方阴山河套的猎牧人。

《后汉书・西南夷传》：“永宁元年（120年），掸国王雍由调遣使者诣阙朝贡，

献乐及幻人，能变幻吐火，自支解，易牛马头；又善跳丸，数乃至千。”记述了我国云南滇西地区的杂技和魔术自古闻名。

还有，东汉张衡《西京赋》：“乌获扛鼎，都卢寻橦。”“寻橦”即指顶竿表演。《汉书·西域传》：“……作巴俞、都卢、海中砀极、漫、角觝之戏，以观视之。”晋代傅玄《正都赋》“都卢捷足，缘修竿而上下。”古掸国和都卢在今缅甸及我国云南一带，也是古代杂技流行之地。

由此观之，我国古代体育运动和杂技表演艺术，虽在古文献中有些记载，但较零乱，缺乏系统性。特别是对每一个杂技、体育运动项目起源于何时何地？其来龙去脉，均没有作详细的描述或考证。尤其是对古代北方游牧民族体育运动和杂技表演艺术的记述，更加罕见。那么，据此是不是说，在我国古代北方游牧民族、部落中，始终就没有产生或流行过体育运动和杂技表演艺术呢？笔者认为恰恰相反，通过阴山岩画中体育运动和杂技表演图像的不断发现，不仅印证了体育运动和杂技艺术在古代北方猎牧民族中十分盛行，而且其中有许多项目很可能是先从阴山河套地区发明（起源），而后传到中原及南方各地。

阴山河套客观的自然环境，造就了北方历代游牧部落民族好动、强悍、刚毅、自信的性格，个个练就了一身本领，其中不乏身怀绝技者。至今在阴山以北广阔的乌拉特蒙古草原上，还流传和盛行着摔跤（角抵）、赛马、射箭、驼球比赛等古老体育运动和杂技表演项目，并作为每年的那达慕大会主要表演项目。这些都有力地说明了我国北方的体育运动和杂技表演艺术源远流长，特别是阴山河套地区是中华民族体育运动和杂技表演艺术的发祥地之一。

注　释

［1］ 盖山林. 阴山岩画［M］. 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2］ 同［1］.

［3］ 崔凤祥. 从贺兰山与北山岩画看宁夏原始体育文化及其特征［J］. 岩画研究，2004.

［4］ 盖山林. 中国岩画学［M］. 北京：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

On the Origin of Acrobatic Sports i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Yinshan Rock Painting

Zhao Zhankui

Abstract: Chinese sports and acrobatics are very rich and colorful. They have long history and

distinct national features, which also are firmly connected with Chinese culture. But do you know where and when did these acrobatics originate? And how did they develop? We cannot find out from historical documents. However, during doing many years of research about Yinshan rock paintings, the author finds many rock paintings are related to Chinese sports and acrobatics, for example, the horse racing paintings, images of ball playing, wrestling paintings, and stacked portrait painting motifs. These rock paintings can not only enrich the content of Yinshan rock paintings, but also provide the real and specific material evidence for doing further research about the origin of Chinese sports and acrobatics. From the evidence, the author deduced that some sports and acrobatics activities may also originate from Yinshan Hetao region.

Key words: Yinshan rock paintings; acrobatics; sports; origin

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民间故事题材壁画研究

董　艺
（烟台市博物馆，烟台，264000）

傣族地区大多数村寨都有佛寺，佛寺是傣族群众从事宗教活动、集会社交的主要场所，也是傣族青年接受佛教教育和本民族传统文化教育的地方。佛寺壁画是随着佛寺的修建而逐渐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一种宗教艺术形式，是宣传佛教的手段之一。曼宰竜佛寺位于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遮镇曼宰竜三自然村，是曼宰竜一村、二村和三村三个自然村共同的宗教活动场所。根据佛寺院内位于主殿和僧舍之间所立寺碑碑文显示：勐遮曼宰竜佛寺建于1748年，曾修复三次，其中最大一次复修是在1987年。根据《勐海县志》记载："勐遮曼宰竜佛寺壁画绘于傣历1230年（1868年），寺内的造像、绘画艺术集中反映了佛寺艺术的独特风格，尤其是佛寺的壁画，绘画艺术精湛，成为宝贵的遗产，是西双版纳州内保存完整具有代表性的壁画。"[1]

曼宰竜佛寺老壁画位于主殿以及僧舍外墙，笔者于2010年8月在对曼宰竜佛寺进行调查中发现，新主殿已于2007年重新修建完工，原主殿的老壁画已不复存在，已被由从泰国请来的画师绘制的境外风格壁画所代替。僧舍仍然保留，其外墙壁画于1987年在原画的基础上重新描绘，比较接近原画的艺术水平，并且保存完整，这在如今早期壁画大量消失的情况下已实属不易。据当地管理曼宰竜佛寺的老人介绍，现存的这八幅壁画，只有第一幅与原画内容不一样外，其余七幅均与原画差别不大。根据笔者对壁画内容的考证，发现其中有三幅壁画均出自当地的民间传说故事，它们分别是第四幅《召树屯》、第五幅《召烘帕罕》以及第八幅《松帕敏》。这三幅壁画以传统的平面整体式构图方式展现在大众面前，整个画面按情节内容的发展分为若干部分，每一部分都用几条起伏的波浪式曲线作为分割线，虽然省略了大量的故事情节内容，但提炼出了佛经故事中主要情节及精彩画面内容。

一、民间故事出现在佛寺壁画中的原因

佛寺壁画作为一种宣传佛教教义的手段，其壁画的题材内容均出自佛经。而为什么南传上座部佛教的经书中会掺杂着大量的民间传说故事？世俗气息过于浓重，貌似与

佛教毫不相干，甚至与佛教教义相背离。关于这一现象，季羡林先生讲得最为明白。季老在《佛本生故事・代序》中说："它们（指佛教搜集起来的民间传说故事）绝大部分都与佛教毫不相干，有的甚至尘俗十足。但是，佛教教徒却不管这些，它们把现成的故事拿过来，只需按照固定的形式，把故事中的一个人、一个神仙和一个动物指定为菩萨，一篇佛本生故事就算是制造成了。"[2] 最初，佛经只是记录释迦牟尼传教的思想言论以及他的弟子对这些言论的解释，大都是一些枯燥的哲理和神秘的教条，人们很难接受。释迦牟尼和他的弟子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一点，于是就借助于民间传说故事的力量来解决这一难题。因此，佛教门徒们不论到什么地方都要先搜集与当地风土人情相关的民间故事，经过删改之后编纂到佛经中，使得佛经中融入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内容。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壁画中的《召树屯》《松帕敏》以及《召烘帕罕》均取自融入民间传说故事的佛经，世俗气息浓厚。但仔细品味，故事中深受人们喜爱的主人公所拥有的精神，很多都是佛教所宣扬的精神，佛教教义寓于民间传说故事之中。

二、民间故事题材壁画内容考释

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的这三幅民间故事题材的壁画内容既是寓于佛教教义的民间故事，又是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根据《傣族文学史》将傣族文学分为桑木底时代、勐泐王时代、帕雅真时代、思可法时代和刀安仁五个时代的分法，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壁画中的第四、五、八幅壁画所绘的内容大都来源于帕雅真时代民间文学作品。

（一）《召树屯》

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的第四幅壁画是《召树屯》的故事，西双版纳大部分地区称其为《召树屯与楠木诺娜》或《孔雀公主》，勐海县部分地区称其为《召树塔努》，德宏地区称其为《婻俔罕》。《召树屯》脱胎于《树屯本生经》，其题材源于印度，已发现在印度的梵文本《玛哈瓦斯特・鸟》（公元1～2世纪）、《明度无极章》（公元1～4世纪）、基利基特的萨尔瓦斯吉瓦金教派《戒律》文集中之《树屯和曼诺拉》、梵文本《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13、14卷）、梵文本《狮子师本鬘・诺桑》、梵文本《菩萨本生如意藤》第64卷。西藏佛典《素吞阿波陀那》、汉译佛典如三国康僧会译《六度集经・明度无极章》、唐义净译《根本说一切有部毗奈耶药事》13、14卷，由兰纳僧人于15～16世纪间用兰那文编著的巴利语佛典《班雅萨阇陀迦》（即"五十本生集经"），以及老挝、缅甸、柬埔寨等国的佛典中均存在与傣族《召树屯》故事情节相类似的故事。[3] 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第四幅壁画对上述故事内容取舍得当，并且打破了时间、空间的顺序，根据《傣族文学史》中对《召树屯》的记载，笔者认为其画面内容

大致可以分为四组：

第一组位于整幅画面中心偏上位置。根据《傣族文学史》的记载，其大致内容是："勐板加的王子召树屯，为了追寻一只金鹿，来到湖边看到勐董板孔雀国的七个公主在洗澡，召树屯一见便爱上了最小的七公主楠木诺娜。便在湖边搭起竹棚，等孔雀公主再次飞到湖边洗澡时，取走了楠木诺娜的孔雀衣，以表达爱慕之情，并将楠木诺娜带回勐板加宫殿，举办了最隆重的婚礼。"[4]壁画只简略地绘制了召树屯带着孔雀公主楠木诺娜一起骑马来到勐板加（图一），对于《傣族文学史》中描绘的王子看到孔雀公主洗澡以及盗取孔雀衣的内容没有施以任何笔墨。



图一　召树屯与楠木诺娜建立爱情

第二组画面位于整幅壁画的左三分之一处。据《傣族文学史》的描述，其大致内容是："由于边境战争爆发，召树屯不得不告别新婚妻子，带领将士到前线去抗击入侵的敌人。不幸的是，召树屯一离开妻子身旁，负责勐板加祭礼的摩古拉在国王面前诬陷会飞的孔雀公主楠木诺娜是'妖女'，会给勐板加带来灾难。勐板加国王误信谗言，决心处死自己的儿媳。楠木诺娜面对着突来的灾难唯一的要求就是把在受火刑之前让她再穿上孔雀衣最后跳一次孔雀舞，楠木诺娜穿上孔雀衣之后立刻翩翩起舞、飞离地面，在天空向勐板加的百姓告别之后，便飞回自己的家乡——勐董板孔雀国去了。"[5]与故事内容不符的是，画面画的是勐板加国王令人将楠木诺娜赶出了王宫（图二），与《傣族文学史》中描绘的楠木诺娜穿上孔雀衣在火刑场上跳孔雀舞，飞回勐董板孔雀国的故事情节不符。



图二　楠木诺娜被赶出宫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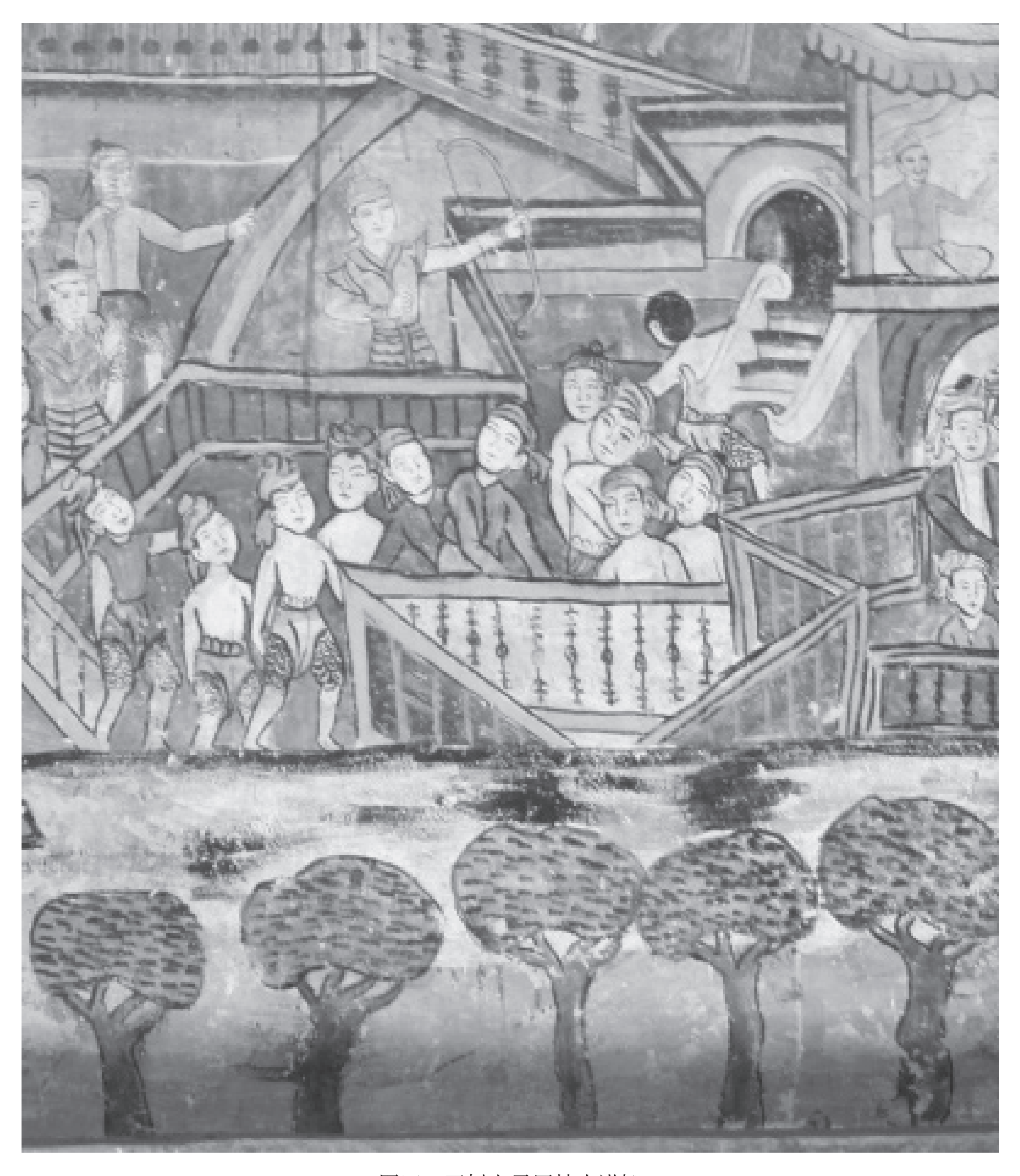
第三组画面位于整幅画面的右面三分之一处。根据《傣族傣族文学史》的内容记载，其壁画内容本应该是："战争结束后，召树屯凯旋归来，听到消息后十分悲愤，国王把全勐漂亮的姑娘都召来，任由他挑选一个妻子。但召树屯心里只有楠木诺娜，他下决心一定要找回楠木诺娜。他离开宫殿，历尽千难万险，终于到了孔雀公主楠木诺娜的家乡——勐董板。"[6]笔者在调查中了解到，此处画面展现的却是召树屯在遇见孔雀公主楠木诺娜之前夜里偷溜出宫的情景（图三），可见此组画面纯属当时本地画师想象出来的故事情节。



图三　召树屯偷溜出宫

第四组画面位于整幅壁画的中心部分。根据《傣族文学史》的描述，其内容是："孔雀国王想要试一试女婿的本领，用巨石砌成三层石墙，钉上铁钉，让召树屯把墙打开。召树屯骑上马拉满弓，射出箭如雷鸣电闪，三道石墙全都崩开了。国王十分高兴，让他们夫妻团圆，召树屯带着楠木诺娜告别岳父岳母和孔雀国的臣民回到了勐板加，做了勐板加的国王，使得百姓丰衣足

食、安居乐业。”[7]壁画中的此组画面只简单地描绘了国王和楠木诺娜得知召树屯到来后，派人出城试探召树屯的本领的故事情节（图四）。与《傣族文学史》中描绘的召树屯王子骑马射箭不同，此处的王子没有骑马，并且没有描绘射出的箭如雷鸣电闪以及三道石墙全部打开的壮观景象。



图四　召树屯寻回楠木诺娜

（二）《召烘帕罕》

傣族学者认为，傣族叙事长诗不少是根据佛经故事编写的，属于改编性质的叙事诗都是从三藏佛经中改编而来。所依据的佛经主要有两类：一是佛传类，一是杂传类[8]。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的第五幅壁画是《召烘帕罕》的故事。《召烘帕罕》是根据杂传类经书《金凤经》改编的，又名《金石王子》《金岩之歌》《金凤凰》。“召”是指王子，“烘”是凤凰，“帕罕”是金石，“召烘帕罕”就是“金石凤凰王子”的意思。根据与《西双版纳民间故事集成》中讲述的《召烘帕罕》对比研究，笔者认为这幅壁画内容可以分为四组画面：

第一组是位于画面左半部分二分之一处和画面右边中间部位的一角。《西双版纳民间故事集成》中《召烘帕罕》对此组故事情节的描绘是：“古老的勐巴拉纳西王国的国王帕雅巴连达巴帝的三个妾妃由于嫉妒王后南尖达玛腊生下一个男孩，用小狗偷换了刚出生的小王子，并将小王子扔下宫楼（图五）。国王知道王后生了小狗后将王后赶出宫楼，王后悲痛流泪地抱着小狗崽离开了宫楼（图六），来到离城很远的山脚下，与住在这里守花果树的园丁夫妇相依为命、安度日月（图七）。”[9]与上述记



图五　三妾妃弃婴



图六　南尖达玛腊王后被赶出宫

载的故事内容有所出入的是，该壁画中只绘制了三个妾妃，没有将七个妾妃都画在画面中。

第二组画面位于整幅画面右下角。《西双版纳民间故事集成》中《召烘帕罕》对此故事的描述是："帕雅英投下一片浮云，迅速将男孩接住，带到了达娃丁沙天宫里并抚养长大成人。王子长大成人，天神帕雅英告诉了王子他身世，让金石凤凰带着王子飞下人间去找寻自己的母亲。王子独自来到守园老人的竹楼前，找到了自己的母亲，并把他们的遭遇告诉了自己的母亲。南尖达玛腊王后听了召烘帕罕的叙述，心里悲喜交加，母子团圆。"[10]与上述记载的内容有所出入的是，壁画中画的是天神用盆将被抛掉宫楼下的王子接住而并非一片浮云。壁画中没有表现小王子被收养在天宫、在天宫长大的

情节以及召烘帕罕回到人间与母亲相认的情节，只描绘了金石凤凰带着召烘帕罕来到人间后，王子命金石凤凰化为岩石的情景（图八）。

第三组画面位于壁画中部偏右的位置。《西双版纳民间故事集成》之《召烘帕罕》中对此故事内容的描述是："勐巴拉纳西王国的国王帕雅巴连达巴帝的六个妾妃也分别为国王生下了六个王子。几年过去后，六个兄弟也都已经长大，召烘帕罕在一次玩耍中赢了六个王子手中的六块金子，在回去的路上用宝剑杀死了妖魔。召烘帕罕的六个兄弟以为他被妖魔吃掉了，想去寻回他们输掉的金子，却惊奇地发现召烘帕罕昨天早已把妖魔杀死。六位王子高兴之极，回城禀报父王说是给勐巴拉纳西带来灾难的恶妖魔已被他们杀死了。国王高兴之余，派六个儿子去寻回多年前被妖魔掠走的他们的祖母。六个王子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来找召烘帕罕，召烘帕罕为了救自己的祖母就同意了六个兄弟的请求。"[11]壁画仅描绘了召烘帕罕同六个兄弟玩麻嘎里罕的情节（图九），以及六个兄弟跪求召烘帕罕前去营救他们的奶奶的情节（图一〇）。对召烘帕罕路上遇到妖魔并将其杀害以及六个兄弟用妖血前去邀功的情节没有展现。



图七　王后与园丁夫妇

第四组画面是位于整个壁画顶部以及上部偏右的地方。《西双版纳民间故事集



图八　召烘帕罕人间寻母



图九　召烘帕罕赢六兄弟



图一〇　六兄弟跪求召烘帕罕

成》之《召烘帕罕》中对此内容的描述为："召烘帕罕骑着金石凤凰和六位王子日夜兼程来到大海岸边，召烘帕罕让六个兄弟在海边安营扎寨，独自前去寻回奶奶。召烘帕罕骑着金石凤凰独自越过大海，来到到处都是野兽和鬼怪的森林。在此三日期间他先后被三个魔王看重，并娶了三位魔王的女儿为妻，并得到了三位魔王的指点，最后找到了掠走他奶奶的魔王住的鬼国。召烘帕罕与奶奶相认，并打败了八万魔军，带着奶奶和三位魔王的女儿回到了大海边，准备返程。六位王子看到召烘帕罕救回了奶奶，就趁召烘帕罕不备之时将他用乱棍打死，带着奶奶回到了勐巴拉纳西，禀报父王说是他们六个把奶奶救回来的。被打死的召烘帕罕再次被小时候收养他的天神帕雅英所救并使他恢复了生命。召烘帕罕回到了勐巴拉纳西，在奶奶的帮助下与国王父子相认，国王又亲自接回了南尖达玛腊王后，召烘帕罕也接回三个魔王的女儿，一家团圆。六个邪恶的王妃和她们的儿子，被开裂的大地吞没，掉进了可怕的地狱。"[12]此处壁画只绘制了魔王把他们的奶奶掠走（图一一），召烘帕罕骑着金石凤凰在森林里寻找奶奶以及与魔王大战的情景（图一二）。对于召烘帕罕迎娶三位魔王的女儿，六位王子打死召烘帕罕，召烘帕罕被天神帕雅英再次救回以及后来召烘帕罕一家团圆、六个王妃及六个王子悲惨的下场没有表现。

图一一　祖母被魔鬼了掠走



图一二　召烘帕罕前去营救祖母

（三）《松帕敏》

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的第八幅壁画是《松帕敏》的故事。《松帕敏》又名《松帕敏与嘎西娜》，也是一首叙事长诗，是根据佛传类经书《松帕敏本生经》编写而成的。

该故事情节并不复杂，根据《傣族文学史》的记载，大致内容是：“勐藏巴是个

富裕的国家，在老国王统治时期，地方安定，百姓安居乐业。老国王死后，由长子松帕敏继承王位，治理国家。可是，松帕敏的亲弟弟，二王子召刚不服，妄想夺取政权，于是召集忠于他的一些官员，暗地招兵买马，等到时机成熟时，发兵攻打京城，要以武力篡夺哥哥松帕敏的王位。在此紧要关头，忠于松帕敏的臣民和士兵，要求国王率领大伙保卫京城，跟残暴的召刚决一死战。可是，松帕敏认为，两只雁打架，会伤害田里的秧苗；两兄弟相争，死伤的是无辜的百姓。他不忍心兄弟间相互残杀，不忍心让战火烧毁百姓的村庄，让战刀夺取百姓的生命。所以，松帕敏选择了忍让的道路，自愿舍弃王位，只身领着妻儿逃出宫廷，负辱远游。这样，他的弟弟未经战斗便夺取了政权，成了勐藏巴的国王。而他却因失去政权后，到处逃难，遭受了妻离子散的无限痛苦。十年之后，由于召刚昏庸残暴，引起了百姓的愤怒反抗，无数个寨子联合起来推翻了召刚的政权，赶走了召刚，并接回了松帕敏，又让他当了勐藏巴的国王（图一三）。”[13]

这幅壁画由于受屋檐斜角墙面的限制，画面呈三角形，尺寸比前七幅的长方形画面略减一半多。并且由于受到顺着屋檐留下的雨水的冲泡，墙体已经起皮，画面部分地方已经发白，随时面临着脱落的危险。但整幅画面表现的内容还基本可见，其所表现的是一个征战的情景，描述的正是百姓们揭竿而起赶走召刚，接回松帕敏的情节。



图一三　《松帕敏》全景

三、民间故事题材壁画的历史价值

僧舍外墙壁画是特定历史时期历史事实的真实写照。壁画内容虽然总体来看出自古老的佛经故事，但亦不乏西双版纳当地历史的影子。元朝置云南行省后，于南部设彻里军民总管府，辖西双版纳等地；西部设金齿宣抚司，辖德宏等地，委以金齿百夷大小首领（召片领、召勐）为世袭土司土官，地方政权首领与朝廷命官合为一体。其中，在西双版纳一带，根据傣文史籍《车里宣慰世袭简史》等记载，从第一世召片领帕雅真到第六世召片领刀补瓦这段时期，由于执政者接受佛教"以善治国"的思想，执行了一系列比较缓和的政策，因而社会稳定，生产发展，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和动乱。这一时期的作品大都以歌颂明君主与佛教功德为主，代表作品有长篇叙事诗《召树屯》。[14]至1286年第八世召片领召爱登基之后，宫廷矛盾逐渐显现，统治集团内部便出现分裂，除了形成"大车里、小车里"之分外，在"大车里、小车里"内部，以及各勐的小宫廷内部，也不断出现大老婆小老婆为其儿子争夺权力的现象，《召烘帕罕》所描写的宫廷斗争，便是这一社会现象的反映。[15]至1463年，勐龙召勐与勐混召勐联合出兵攻打景洪最高领主召片领，标志着"景陇金殿国"封建领主政权从兴盛走向衰落。从此，领主政权越来越昏庸，宫廷内讧四起，百姓苦难深重。[16]壁画中的《松帕敏与嘎西娜》集中反映了领主内部的矛盾以及衰微的景象。

帕雅真时代是傣族封建领主兴起并建立了封建领主政权的时代，这一时代的民间故事主要表达了四方面的内容：一是揭露统治阶级的残暴，歌颂人民的反抗精神；二是赞美勤劳勇敢的美德，表达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三是赞美坚贞的爱情和真挚的友谊，谴责欺诈行为和各种邪恶的现象；四是支持正义战争，反对非正义战争[17]。三幅壁画内容分别反映了帕雅真时代三个不同历史时期封建领主的宫廷生活。

四、民间故事题材壁画的教育意义

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壁画不仅是一种有形的历史文化遗产，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在全民信教的傣族地区，南传上座部佛教与傣族人们日常生产、生活休戚相关，密不可分。僧舍外墙的这三幅民间故事题材的壁画，作为一种可视性的宣传南传上座部佛教教义的艺术方式，以其独特的精神文化内涵感染着广大信众。

一方面，这三幅壁画奉劝人们要有忍的精神，忍就是善，善就是美。佛教提倡忍辱求全，逃避现实，与世无争，求得自我净化，才能脱离苦海。这一点，在壁画内容上也有明显的反映。壁画中的《召树屯》中的女主人公孔雀公主楠木诺娜善良温柔的性格源自傣族人民，是傣族人民心目中美的标准。她在恶势力面前忍让，不与之争斗，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正是佛教衡量美的核心尺寸。壁画中的《松帕敏》中所塑造的松

帕敏为了百姓不愿跟召刚厮杀，决心忍让出走这一人物形象无疑是佛教赞赏的理想人物，它所体现的正是佛教所宣扬的“忍即善，善即美”的思想。然而，经过长期而广泛的民间流传，经过人民群众的集体加工，其主题思想超出了佛教的思想范畴，演变成了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愿望和理想这一主题，“松帕敏”这一艺术形象也演变成为傣族先民所崇拜的理想人物。松帕敏面对其弟的残暴统治，下决心打回家乡与百姓一起赶走召刚，可见松帕敏的“忍让”并不是逆来顺受、一味地对恶势力妥协，而只是善者宽广胸襟，善者走到哪里都会得到百姓的拥护，体现了“善良”终究会战胜“邪恶”。

另一方面，这三幅壁画教育人们在爱情道德观念上要保持高尚的情操。壁画中的《召树屯》中描绘的孔雀公主南穆诺娜在即将遭受火刑、生命的最后一刻仍惦念着自己的丈夫，召树屯在胜利凯旋后得知了这一不幸的消息悲痛欲绝，他父王为了安慰他，为他找来了全勐最漂亮的姑娘，让她任意挑选一个妻子。但召树屯本着誓死不变的决心，经历千辛万苦来到勐董板，找回了失去的美好爱情。壁画中的《召烘帕罕》中也描绘了一段感人肺腑的情节，召烘帕罕在完成了营救祖母的使命，携带三个魔女在回国的路上，被早已等候在大江边的六个兄弟暗杀身亡。此时，三个魔女悲痛欲绝、寸步不离地守在丈夫的身边哭泣。天神坤西迦想先考验一下魔女们的真诚，扮作丑恶的魔鬼恫吓她们又变成英俊的王子引诱她们，结果她们都没有改变半点心意，不管是死是活都不会离开自己的丈夫。壁画中的《松帕敏》中松帕敏的妻子嘎西娜王后原本在宫廷里享尽了荣华富贵，内讧刚起时，她劝丈夫不要出走，留下来与召刚决一死战。可是，当丈夫再三表示“不愿意与弟弟相争，不想永远做国王，如果弟弟有本事治理国家，他愿把王位让给弟弟”时，她却愿意跟丈夫出走，并且不管遇到什么灾难都不离不弃。出走之后，夫妻俩受尽了妻离子散的痛苦，然而，即使是在最痛苦绝望的时候，嘎西娜也依然忠于自己的爱情，思念自己的丈夫。壁画中这些美好的夫妻形象以浪漫主义的形式，教育当地人夫妻双方都要忠实于爱情，互敬互爱、白头偕老。

曼宰竜佛寺僧舍外墙民间故事题材壁画是古老民间故事与佛经故事关系的见证。对壁画内容的研究，不仅可以使当地人对壁画内容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更有助于人们理解壁画的价值和教育意义之所在。对当地人们珍视和保护民族文化遗产，以及构建和谐社会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注　释

［1］　云南省勐海县地方志编纂委员会. 勐海县志［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7.

［2］　季羡林. 佛本生故事［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3］　郑筱筠. 佛教故事与傣族《召树屯》故事源流［J］. 云南社会科学，2001（2）.

［4］　岩峰，王松，刀保尧. 傣族文学史［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

［5］　同［4］.

［6］　同［4］.

[7] 同［4］.

[8] 王国祥. 傣族长篇叙事诗与佛教［A］. 傣族文学讨论会论文集［C］. 北京：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2.

[9] 勐腊县民委，西双版纳州民委. 西双版纳傣族民间故事集成［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3.

[10] 同［9］.

[11] 同［9］.

[12] 同［9］.

[13] 同［4］.

[14] 云南省民族学会傣学研究委员会，德宏州傣学学会. 云南傣族土司文化研究论文集［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

[15] 同［4］.

[16] 同［4］.

[17] 同［4］.

A study of folklore theme murals outside the walls of the Buddhist House in Manzailong Buddhist Temple

Dongyi

Abstract: The murals outside of the walls of the Buddhist House in Manzailong Buddhist Temple is one of the few old ones preserved in the Qing Dynasty, of which the folklore theme murals are rich in content.They are both folklore stories contained in Buddhist teachings and true portrayal of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particular historical periods. As a visible art form for introducing Theravada Buddhism, it plays the role of educating the faithful.

Key words: Manzailong; folktale; historicalvalue; pedagogical meaning

大遗址保护条件下考古遗址公园的三个相关问题

安　乐

（朝阳市博物馆，朝阳，122000）

“大遗址”是近年来随着我国文化遗产保护要求不断迫切的情况下深化而成的概念。“大遗址”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60年代，苏秉琦先生于20世纪80年代讨论“古城、古文化、古国”时提及亦有提及[1]；1997年国务院在《关于加强和改善文物工作的通知》中，正式使用了“古文化遗址特别是大型遗址”的概念[2]；2002年11月，国家文物局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向国务院提交了《“大遗址”保护“十一五”计划》[3]，从此大遗址保护工作在我国各地纷纷开展起来。2008年，张忠培先生对“大遗址”做了明确的界定：“大遗址是各个考古学文化、各个王朝或皇朝和各个历史民族政权遗留下来的代表性遗址、城址、手工业作坊、采矿及冶炼遗址、墓地及陵墓、宗教性地面及地下遗存和水陆交通遗址等；它还包括历史上据有某种信仰或传说而保存某种记忆或仅具有纪念性的某些故址和陵墓。”[4]财政部、国家文物局在编制“十一五”大遗址保护规划中是这样表述的：大遗址主要包括反映中国古代历史各个发展阶段涉及政治、宗教、军事、科技、工业、农业、建筑、交通、水利等方面历史文化信息，具有规模宏大、价值重大、影响深远特点的大型聚落、城址、宫室、陵寝墓葬等遗址、遗址群[5]。由此可见，大遗址的内涵广泛，囊括了单体文物的载体及相关环境、文化景观。上述有关大遗址概念的形成和解读，反映了我国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研究的深化和重心的转移，同时也带来了若干可以思考的问题。

大遗址具有价值高、数量多、分布广、面积大的特点，是我国重要的文化资源、教育资源、旅游资源。多年来文物工作部门和文物工作者们在大遗址保护方面进行了不懈努力。《国家文物博物馆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指出“基本形成以西安、洛阳、荆州、成都、曲阜、郑州6个大遗址片区，长城、大运河、丝绸之路、茶马古道4条文化线路，环国境线分布的重要大遗址为重点，150处大遗址为支撑的大遗址保护格局”，并要“推进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建设”。目前我国已经有了一批示范性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其中包括高句丽遗址、殷墟遗址、金沙遗址、鸿山遗址、大明宫遗址、隋唐洛阳城遗址、良渚遗址、牛河梁遗址和临安城遗址等大遗址。考古遗址公园已经成

为了大遗址保护的一种极具优势和代表性并在被不断推广的一种保护模式。本文拟结合对大遗址保护条件下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三个相关问题，即与考古发掘、遗址博物馆、城市建设的关系进行讨论。

一、考古遗址公园与考古发掘的关系

2009年，《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管理办法（试行）》规定：“本办法所称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指以重要考古遗址及其背景环境为主体，具有科研、教育、游憩等功能，在考古遗址保护和展示方面具有全国性示范意义的特定公共空间。”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认为考古遗址公园与我国现有的公园体系中那一类以不同自然地带的典型自然、生态系统形态为主题的公园相类似，是指“基于考古遗址本体及其环境的保护与展示，融合了教育、科研、游览、休闲等多项功能的城市公共文化空间和遗址类的文化景观，是对考古类文化遗产资源的一种保护、展示与利用方式”[6]。从以上两个对考古遗址公园的界定办法可以看出，考古遗址公园包含两重内涵，一是对考古遗址本体及其背景环境的展示和保护，二是实现科研、教育、游憩等社会功能。其中，前者是后者的前提和基础，后者是前者的应用、延伸和升华。由于有了前一方面的限制，使得考古遗址公园与一般公园体系中的公园有了巨大的差异，它的首要目的是对遗址的保护，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谈展示、科研、教育等内容。另外，这一特性也决定了公园的展示及开展相关的活动也要受到“保护遗址”这个条件的制约。张忠培先生在2009年的良渚论坛中谈到：“公园的形式得服从、服务和表现国家考古遗址这个内容，突出其自身的历史、科学、艺术和文化的特性，要依据这个特性，创造不同形式的公园来表现不同国家考古遗址自在的特性，切忌简单、类同的公园化建设。”[7]

考古发掘是提供考古遗址的原始动力，考古遗址要经过科学细致的考古发掘才能揭示出来；考古发掘也是提供考古遗址原始资料的可靠来源，每一次的考古发掘都要进行详细的记录、绘图、照相等程序，保留了丰富的遗址相关的信息资料；考古发掘也是对考古遗址的一种保护形式，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建设发达的城市地区，发掘者通过对遗址的抢救性发掘使得遗址的面貌能够在破坏前充分揭露出来，从而实现了对遗址的保护；同时，考古发掘工作者也是对考古遗址的后期研究工作最为深入和活跃的人员之一。由于考古发掘在遗址公园的建设中的这种种重要作用，使得考古发掘与考古遗址公园之间形成了一种前提与结果，基础与应用的关系。

另一方面，考古遗址公园也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一个相对较好的生长环境和研究环境。具体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第一，考古遗址公园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研究平台。一般考古发掘完成之后即进行了回填处理，有的保留为后续研究方便也仅保留了关键柱。后期研究主要依靠发掘时的信息记录。然而由于发掘者的水平参差不齐的现状和研究目的的不同以及现阶段认识水平的限制，对遗址信息的提取往往是不全面

的，有时甚至是扭曲的。这样就造成在后期研究中出现的难题难以解决，而又无法补救的尴尬情况。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在不同程度上保留了相关信息，也就具有了一定的可逆性和重复研究的可能。而且，考古遗址公园所保护的遗址往往是文化堆积十分复杂，包含的历史信息也十分丰富，这样的条件为研究者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深入研究的条件。第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为考古事业和考古工作者为公众所理解创造了一个良好的条件。长期以来，考古被人们视作“神秘”“宝物”“盗墓”等的代名词，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为公众了解考古工作的性质和意义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平台，对于促进公众考古学的发展也具有重要意义。并且，它也可以通过开展各种活动和开办各种有关文物政策法令等内容的展览，宣传文物相关知识和文物法令政策，使得文物保护思想深入人心，从而有利于打击文物的非法销售和盗墓等非法行径。这些活动从近期和长远来看都将有利于未来考古工作的开展。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遗址公园又为考古发掘工作提供了良好的研究平台和开展工作的群众基础。

总体而言，考古发掘和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是互惠互利的事情，科学的考古发掘为考古遗址公园提供良好可信的原始材料，并通过深入研究使展示内容更加充实；考古遗址公园通过向公众展示，使得研究成果为公众所了解。同时也使得考古工作变得更加科学。这二者之间可以形成一个长久的良性循环。

要将考古发掘应用于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中，就必须将考古发掘工作贯穿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保护、研究、展示的全过程。正如杜金鹏先生所论及的：“考古学家不仅应该是考古遗址公园建设的参与者，还应是考古遗址公园管理的参与者。”[8]

二、考古遗址公园与遗址博物馆的关系

“国家考古遗址公园在作为‘公园’的同时还需要在适当的地方建设一座与遗址相关的博物馆，以收藏、保存、保护、研究、展示相关的遗址考古所积累的文字、图纸、照片及实物等资料，并将之作为档案予以永久保存。这个博物馆应有面向公众的展览，同时，也应向同行开放，方便他们对考古所积累的资料进行再研究。”[9]这里所说的“博物馆”，应该就是指遗址博物馆。它的主要作用就在于对考古遗址公园相关的档案资料进行保存，并提供展示、研究。

遗址博物馆的出现比考古遗址公园要早，1958年建立的陕西半坡博物馆被认为是第一座建立在考古发掘原址上的遗址博物馆。现今全国各地已有了数百家遗址博物馆，这类博物馆是我国博物馆体系中的一种重要类型。有学者界定的遗址博物馆的是指“在古文化遗址上建立针对该遗址文化进行发掘、保护、研究、陈列的专门性博物馆。”[10]以此定义为标准，我们可以看出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有着十分紧密的联系，但也存在着显著的差别。首先，遗址博物馆和考古遗址公园均是对遗址进行保护、研究、展示的机构，均需要以遗址为依托，并为保护遗址而服务。但考古遗址公园

的“遗址”仅限定在考古发掘的遗址上，而不包括非考古发掘出土的遗址的概念，但遗址博物馆中遗址的内涵和外延却都发生了变化，不但考古发掘的遗址，同时也包括了非考古发掘出土的史迹或石窟寺，如故宫博物院等，有的学者将近现代旧址博物馆也算在遗址博物馆的范畴内[11]。其次，遗址博物馆是属于博物馆体系的，必然具有博物馆的特征，有非营利性特征，需要承担收藏、展览、研究等任务，而考古遗址公园则更加偏重公园的特征，是一处公共文化休闲场所，两者的内涵和外延的不同使得他们的特征和任务上也有了不同。

在考古遗址中的建立的遗址博物馆与其他场所建立的博物馆，由于在大遗址保护背景下产生和与考古遗址公园相结合的条件，也具有了和其他遗址博物馆不同的特征。首先，在藏品和陈列方面，一般遗址博物馆最主要的藏品就是本馆所在的遗址及与遗址相关的实物和档案资料，在展览上主要着眼于对本馆所在遗址的展示介绍与宣传研究等；而考古遗址公园中的遗址博物馆由于有遗址公园作为大环境背景，其自身也成了遗址公园中的一个因素，其展示的藏品和举办的展览主要是追求与考古遗址公园主题密切相关，注重对考古遗址公园的主题内容进行丰富与深化的展示，使公众通过对遗址博物馆的参观对考古遗址公园展示设置的意义有更深的理解。其次，在宣传与传播方面，一般遗址博物馆主要需要依靠自我传播，通过具有重大价值的遗址、丰富精美的藏品、优质的陈列展览或声势浩大的宣传来吸引观众，从而使本馆的价值得到体现；而考古遗址公园中的遗址博物馆则主要是以考古遗址公园为依托进行宣传，利用考古遗址公园的吸引力和辐射圈来扩大自己的受众范围，从而扩大自身的影响力。

当然，这并不是说遗址博物馆不需要精美的藏品或优质的陈列，正相反，作为考古遗址公园中的一个重要展示因素，遗址博物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一个考古遗址公园的名片，代表了这个公园的公众形象，代表了这个公园的工作水平和研究能力。因此，只有遗址博物馆实现了自身的不断提升与优化，才能为考古遗址公园吸引更为广泛的观众，使得考古遗址公园更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最终也实现自身的不断发展。因此，从这个层面上说，考古遗址公园和遗址博物馆之间也可以通过互惠互利的发展，来形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三、考古遗址公园与城市建设的关系

考古遗址公园的目的在于对考古发掘出土的遗迹和文物标本等进行保护，而城市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常常要以破坏为基础，这一对保护与建设的矛盾长久以来存在着。考古遗址公园的建立无疑也要面临这样的问题，但由于它独特的公园的性质，使得它能够有效地调和保护与建设之间的矛盾，有时甚至能够实现双赢。

以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12]为例：金沙遗址地处成都市区，发现之时周边房地产开发已如火如荼，这一片土地已变成寸土寸金的城市发展集中区，数以万计的居民刚刚

拆迁，等待新居建设；城市片区规划早已完成，街道网络正迅速形成，重要文化遗存的保护与高速的城市发展推进在这里激烈碰撞，成了整个社会必须面对并加以解决的巨大难题。成都市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遗址的保护，金沙遗址发现后，暂停了遗址周边的所有建设项目，并对流经金沙考古遗址公园内摸底河段进行了大规模的整治清理。而今，金沙遗址公园自开放以来已接待海内外游客300余万人次，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收入逾6000万元，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金沙考古遗址公园已成为了成都的城市文化会客厅，是造访成都的客人必往之处。同时，金沙考古遗址公园的保护、规划和建设带动了城市社会经济的协调发展，依托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金沙片区成为成都市最具活力的区域之一，据估算，周边土地价格增值效应达数十亿元，有力推进了周边社区经济、产业的繁荣，实现了大遗址保护与本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有效结合，成为历史文化与现代文明交相辉映的典范。

从金沙考古遗址公园的例子可以看出，对考古遗址公园的合理建设，从长远来看，不仅在保护文物的同时做到了促进经济的发展，而且有利于提升城市形象，激发城市活力，促进社会建设的发展；同时，对海内外游客的接待，一方面对本地区或本国内辉煌的古代文明进行了宣传，提升了文化软实力，另一方面通过多样的展示活动或展览给予了参观者以精神上的享受和满足。因此，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也是一件实现自身发展和促进城市建设，提升城市文化底蕴和文化内涵的互利双赢的事情，也可以实现两者之间的良性循环。

四、综　　述

以上论述分别对大遗址保护环境下的考古遗址公园与考古发掘的关系、与遗址博物馆的关系、与城市建设的关系进行了简要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只要通过对考古遗址公园进行合理的规划与经营，考古遗址公园与另外三者都能形成良性循环。考古遗址公园不仅只是一种对大遗址的保护形式，它同时还能做到为大遗址保护提供更为良好广阔的研究平台，获取对大遗址保护研究资金的来源，促进博物馆事业尤其是遗址博物馆的提升与发展，促进经济建设，提升城市形象，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合理的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毫无疑问是一件一举多得的事情。

注　　释

[1] 张忠培. 中国大遗址保护的问题［J］. 考古，2008（1）.

[2] 肖莉. 让城市守护历史，让历史守望未来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J］. 中国文化遗产，2010（1）.

[3] 官信，闫亚林. 浅议当前大遗址保护问题［J］. 江汉考古，2008（1）.

[4] 单霁翔. 大型遗址考古公园的探索与实践［J］. 中国文物科学研究，2010（1）.

［5］ 张忠培. 关于建设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一些意见［J］. 东南文化，2010（1）.
［6］ 杜金鹏. 大遗址保护与考古遗址公园建设［J］. 东南文化，2010（1）.
［7］ 同［3］.
［8］ 吴永琪等. 遗址博物馆学概论［M］. 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6.
［9］ 张行. 遗址博物馆的发展与保护问题的探讨［J］. 中国博物馆，1990（1）.
［10］ 金沙国家考古遗址公园［J］. 中国文物报，2010-11-26：010，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特刊.
［11］ 同［9］.
［12］ 同［10］.

Three Related Questions of Archaeology Site Park under the Condition of The Great Site Protection

An Le

Abstract: The Great Sites are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s, educational resources and tourism resources in China. At present, with the support of 150 Great Sites, a number of Demonstrative National Archaeology Site Parks have been established. These Archaeology Site Parks become a kind of protective model with superiority and representation. Through the discussion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rchaeology Site Park and the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the site museum,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city,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Park and the other three could form a virtuous circle only by reasonable planning and operation. Thus could also promote economic construction, enhance the image of the city, and then meet people's spiritual needs as well.

Key words: The Great Site; Archaeology Site Park; archaeological excavation

苏联考古学家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岩画研究学术史回顾*

肖　波

（广西民族博物馆，南宁，530028）

阿力克谢・巴甫洛维奇・奥克拉德尼科夫（А.П.Окладников），苏联著名考古学家、历史学家、民族学家和岩画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学和哲学研究所创始人之一。俄历1908年9月20日（公历10月3日）[1]出生于伊尔库茨克省的康斯坦季诺夫卡村的一个乡村教师家庭。1981年11月18日卒于新西伯利亚。其一生出版著作60部，发表文章近千篇[2]，其中许多都被译为英语、德语、法语、西班牙语、日语和汉语。范围涵盖原始社会和原始文化、旧石器和新石器时代文化、西伯利亚史、远东史以及远古至18世纪的极北地区史，他的许多结论都被当代考古学家的研究成果所证实。鉴于其在考古学和历史学，以及在培养科研人才方面的巨大贡献，1978年，A.П.奥克拉德尼科夫被授予苏联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同时还被授予列宁勋章和“镰刀锤子”金质奖章。为了纪念他，戈尔诺—阿尔泰的一个洞穴被以其名字命名，另外，还设立了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奖金以奖励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的年轻学者以及新西伯利亚大学的学生。

一、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岩画研究历史回顾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是苏联时期最负盛名的岩画研究专家。他主持调查、记录、出版了安加拉河、勒拿河、托姆河、黑龙江下游、阿尔丹河、因迪吉尔卡河、科雷马河、阿尔泰、贝加尔和外贝加尔等地的岩画遗址。需要指出的是，除了叶尼塞河流域之外，整个东西伯利亚和远东的岩画分布区他几乎均有涉足。除了西伯利亚之外，他还在蒙古、朝鲜和中亚开展过岩画调查和研究工作，并且对阿拉斯加和阿留申群岛的古代文化研究也报以极大的热情，出版了相当数量的与上述地区岩画有关的文章和书籍。可以说，A.П.奥克拉的尼科夫一生著述极丰，除了作为西伯利亚考古学派奠基者之一而享

* 本课题研究得到“广西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八桂学者项目的资助

誉世界之外，他同时还是一位杰出的岩画研究专家，对亚洲北部和中部地区原始艺术的研究作出过突出的贡献。

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对西伯利亚古代文化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俄罗斯安加村接受中学教育期间，他就积极参加当地的乡土研究小组，并表现出对西伯利亚文化的极大热情。17岁那年他完成了自己的首次科学探险，并于次年发表了第一篇学术论文。在伊尔库茨克师范学院学习期间，他跟随导师Б.Э.别特利从事古代遗迹的研究，而正是在这段时期，他的科研兴趣最终形成。1929年，苏联地理协会组织了西伯利亚考察团，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作为考察团成员之一，在乘火车前往勒拿河流域考察的途中初次接触到了岩画。这时，他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希什金诺岩画上。这个岩画点在18世纪时就已经被俄罗斯科学院西伯利亚考察团发现过，但后来逐渐被世人遗忘，而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又重新发现了它。1941年，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再次对勒拿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并在希什金诺岩面上发现了最古老的岩画，即用颜料涂绘的，具有西欧旧石器洞穴岩画类似风格的马和公牛图像（图一）。他注意到，这些岩画褪色和变暗淡到与岩石的底色融为一体，没有明显的轮廓线，表明其年代相当古老[3]。自此以后，岩画始终是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这些岩画的发现和研究历史被记录在《金角鹿》一书中，该书的副标题为《关于岩画中狩猎的故事》[4]。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在西伯利亚地区的岩画研究工作，是一项特别具有挑战性的任务，因为该地区自然环境恶劣，并且地域广大，需要持之以恒地付出努力，除了一些特殊情况外，他的研究从未中断过。在西伯利亚旅行时，他的妻子兼艺术史教授В.Д.扎波罗日斯卡娅通常陪伴在身边，成为他寻找岩画的最好搭档。他们一起穿越草原、苔原和泰加森林地区，并沿着汹涌的西伯利亚河流行走了数千千米。他们一起赴中亚地区考察并合作出版了一系列关于亚洲北部和中部地区岩画的著作[5]。



图一　希什金诺岩画中属于旧石器时代的马和公牛图像

1. 马图像　2. 公牛图像

（图片引自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Шишкинские писаницы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Прибайкалья*. Иркутск. 1959：30，37）

1960年代，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同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学和哲学研究所的各路考察队在阿尔丹河流域临摹岩画。1961年，他开始组织专门的岩画考察队，之后，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吸收В.Д.库巴列夫参与其调查研究工作。从1968年开

始，В.Д.库巴列夫率领的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历史、语文学和哲学研究所东阿尔泰考察队发现并记录了大量的岩画点。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女儿叶琳娜・阿列克谢耶夫娜・奥克拉德尼科娃（Е.А.奥克拉德尼科娃）也逐渐被吸收参与到岩画的调查、临摹和出版工作中来，而之所以取名为叶琳娜，正是为了纪念西伯利亚著名的大河勒拿河，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正是从这里开启了他的岩画科学研究之旅。1979年，他们对戈尔诺—阿尔泰叶兰加什河流域的岩画进行了研究，并于次年对整个戈尔诺—阿尔泰地区的岩画进行了更为系统的研究；而1985年，上述两位作者又对同样位于该地区的另一岩画点克孜尔—基奥里亚进行了研究[6]。这一时期，除了对本地区的岩画进行研究之外，Е.А.奥克拉德尼科娃在其父亲的指导和影响之下，还尝试着将视野投向域外，试图通过对某个特定主题的探讨，来研究该类型岩画在某个地区的分布特点，并试图追溯其整个起源和流变的过程。最典型的例子是其1979年所著的《神秘的亚洲和美洲人面》一书，对西伯利亚东部的人面像岩画情况进行了梳理，并将其放在亚洲与美洲文化交流的背景下进行考察，以期厘清人面像岩画背后所蕴含的文化传播问题[7]。该书明显受到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阿穆尔河[8]的古代圣象》以及《阿穆尔河下游岩画》等书的影响。这些影响不仅表现在岩画图像的使用上，也表现在对相关考古学文化以及民族学材料的使用上[9]。

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具有非常敏锐的学术直觉力，这来自于他丰富的实践经验。关于这种学术直觉力在А.П.奥克拉的尼科夫科学创作中的作用，他的学生Д.Л.布罗江斯基非常准确地说道："学术直觉力是最重要和最精细的认知工具。它从来没有使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陷入过窘境。与Л.Д.兰达乌在物理学方面类似，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萌生想法，有时好像不太关心严格的论证，以及论据的条理和论证的方法。他在所有方面的结论几乎总是对的。科学生活对假设的合理性进行审查，并毫不留情地挑出其毛病所在，但是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众多见解却可靠地进入到世界考古知识库中，并且得到肯定和认可。"[10]简言之，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很多结论最初仅仅构建在本身的直觉力之上，但后来在他本人及其学生的著作中完全得到证实。

概而要之，其发表的岩画类专著主要有：《阿穆尔河下游岩画》《阿穆尔河的古代圣象》《戈尔诺—阿尔泰岩画》《安加拉河岩画》《贝加尔湖岩画——西伯利亚居民的古代文化遗迹》《贝加尔湖沿岸和外贝加尔湖地区新发现的岩画》《外贝加尔岩画》《奥廖克马河和阿穆尔河上游地区的岩画》《托木斯克岩画宝藏》《金角鹿——岩画中的狩猎故事》《阿穆尔河下游卡里诺夫卡岩画》《希什金诺岩画——贝加尔地区古代文化遗存》《勒拿河岩画》《勒拿河上游的岩画》《勒拿河中游岩画》《蒙古岩画》《丘鲁丁——戈拉岩画（蒙古）》《叶兰加什河流域岩画（戈尔诺——阿尔泰南部）》《昌克尔——基奥里亚岩画》《萨尔——萨塔克岩画》《克孜尔——基奥里亚古代绘画》《阿尔丹河流域岩画》《奥廖克马河和阿穆尔河上游岩画》《中亚岩画》《中亚原始艺

术的发祥地》等。在评定这些研究工作时，一位著名的原始艺术专家叶夫罗普·格尔贝尔特·屈恩写信给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你的工作将我带进一个令人吃惊的有关古代文化的新领域。无论如何都想不到，在遥远寒冷的西伯利亚会有如此原始和富有表达力的艺术"[11]。在体例安排上，他的每本专著都首先介绍该处岩画的研究历史，然后对单独岩画点的情况分别进行介绍，接着是对岩画年代进行断定，以及对岩画所包含的历史、文化以及宗教观念等进行分析。

经过这一时期的研究，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基本上弄清楚了西伯利亚岩画的分布情况，如岩画点的数量、类型、年代、内容、制作方法及风格特征等。此外，作者还搭建起了一个完整的架构，为后来者的进一步深入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但是，必须注意到，作者的研究还主要集中于单个地区岩画的总体性研究，一些专题性的研究还较少；另外，对西伯利亚普遍存在的跨区域、跨文化的岩画现象，作者也未能深入涉及。这都是我们下一步工作中需要着力解决的问题。

二、关于西伯利亚岩画的分期与断代

岩画年代问题是岩画研究中最重要、最核心的问题，只有确定了岩画的年代，我们才能进一步探讨其作者族属、经济形态、文化内涵等诸多方面的内容。但岩画大多裸露于地表，不可能按照考古地层学的方法对其进行断代，只能通过与考古出土文物以及民族志材料进行广泛比较，对其年代进行大致判定，同时结合叠压和打破关系对不同岩画之间的相对年代进行判定。而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在岩画的分期和断代工作中基本上也遵循这一原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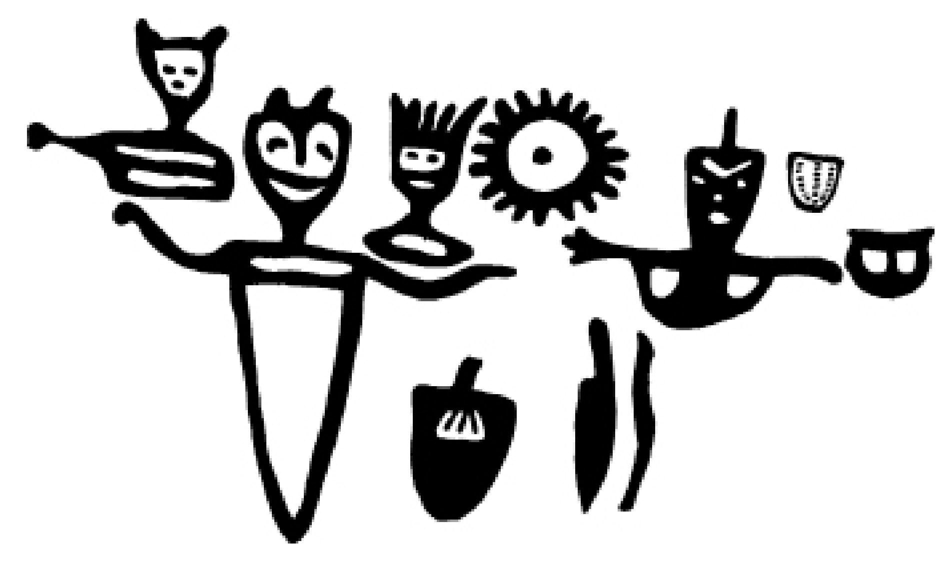
他将勒拿河上游的岩画划分为9期："第一期最早的为塔尔玛的一个类似犀牛的巨大残片，它与希什金诺的马和野牛同属于猛犸象的时代；第二期为一幅巨大的、写实主义的红色鹿，年代为中石器时代或者新时期时代早期；第三期为一队行进的鹿，属于新石器时代；第四期为头部涂红的通体磨光的麋鹿，年代为公元前4世纪或者前3世纪初；第五期为用黑、红两色绘制的类人型图像，被认为属于格拉兹科沃或奥库涅夫时期；第六期为刻制的类人型图像、动物图像和符号，年代为公元前9世纪之后；第七期为勒拿河上游一些常见的组合，年代为6至9世纪；第八期为马、骑士和狩猎场景，年代为12至13世纪；最后一期（第九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典型图像是通古斯鹿和通古斯民族服装，表明作者属于17～18世纪居住于此的通古斯人。此外，还包括装备有带穗的头盔和盔甲的战士、穿着彼得一世时期礼岩画》一服大衣的士兵以及带有十字架和其他标志的教堂"[12]（图二）；对于托姆河岩画，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和A.И.马丁诺夫则认为是由"居住在森林地带的史前猎人创作的，他们在新石器时代晚期、青铜时代和铁器时代居住在西伯利亚北部。最早的岩画创作于公元前第五千年，而最晚的则创作于公元第一千年"[13]；在《阿尔丹河流域的书中他们又根据主题不同将阿尔丹河岩



图二　勒拿河岩画局部

（图片引自Окладников.А.П.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Д. *Ленские писаницы*. Л.: АН СССР. 1959. Табл.XXIV.）

画分为“公元前4000至前3000年、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以及晚期岩画三个时期，第一期岩画的特点是图像主要是写实主义的驼鹿；第二期岩画的特点是人的形象占据首要地位，野兽形象退居次位；第三期岩画的特点是类人型和兽形图像均占据主要地位”[14]（图三）。对于外贝加尔的岩画，包括红色颜料绘制和敲凿两种制作方式。对前者而



图三　阿尔丹河岩画局部

（图片引自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Мазин А.И. *Писаницы бассейна реки Алдан*.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79. Табл.52.）



图四　外贝加尔地区的红色涂绘岩画
（图片引自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Д. *Петроглифы Забайкалья*. Часть 1. Л. 1969.）

言，最典型的形象为飞行的鸟类和成组的斑点等（图四）。这类图像被断在公元前2000年末，主要是与出土青铜刀和短剑上的动物以及鸟类图像类比而得。外贝加尔岩画中的敲凿类型，与图瓦和蒙古地区的斯基泰—西伯利亚“野兽风格”的动物图像类似，属于早期铁器时代，该类型的岩画在欧亚大陆上具有广泛的分布，其年代在公元前1000年之后[15]。

至于黑龙江下游及其支流乌苏里江地区的岩画，其主要类型为磨刻类的人面像（图五、图六）。根据当地的考古学文化，以及与出土文物的比较研究，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认为：“在距今约1万至1.2万年以前，阿穆尔河下游地区还没有产生制造陶器的技术，此时的岩画图像是动物和鸟类。其主要证据是在奥西波夫卡文化层中发现的一个燧石石鸟，他将之断代为距今1万至1.2万年，其风格与玄武岩上绘制的鸟儿图像相似，看



图五　黑龙江下游的人面像岩画
（图片引自A.P. Okladnikov. *Art of the Amur: ancient art of the Russian Far East*. Aurora Art Publishers. 1981）



图六　黑龙江下游的人面像岩画
（图片引自Окладников А.П. *Л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Амура*.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е книж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68：216，217.）

起来像山鹑或者雄黑琴鸡。与其年代相近的还有驼鹿、马和公牛图像。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在黑龙江支流古尔河河口的沃兹涅先诺夫卡村的墓葬中发现了一些陶器，其中一些陶器上带有浮雕人面像。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据此将内部空间带有复杂的几何纹饰的人面像岩画年代断为沃兹涅先诺夫卡文化的繁荣期，即公元前4000～前3000年末期。而在距今5000～6000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面像岩画开始出现”[16]。随后，他又进一步修正了自己的观点，将人面像岩画出现年代提前到中石器时代或者新石器时代早期，绝对年代应该在公元前5000～前4000年左右[17]。应当指出，在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所在的那个年代，这种对岩画尤其是人面像岩画年代的认识是有相当充分的考古学证据的，但随着新考古材料的出现，学者们在其年代基础上又有了新的认识。

20世纪70年代，在孔东文化居址发现了带有浮雕式人面像的陶器。1980年，梅德韦杰夫在萨卡齐—阿连岩画下方发现了带有与沃兹涅先诺夫卡人面像相似的容器片段。20世纪80年代末，在发掘新石器时代的小加万居址时A.K.科诺帕茨基又发现2个残片，但是其中一个损坏严重而且人面像很难辨认。同时，在马雷舍沃文化的陶器上也发现了一些人面像。马雷舍沃文化于公元前5000～前4000年分布于黑龙江下游地区，其陶器上的人面像不仅某些单独的元素，甚至整幅人面像都与岩画非常相似。其次，根据最新的研究成果，沃兹涅先诺夫卡文化本身也被分为早晚两期，分别为格林期和伍德尔期。根据^{14}C测年，“格林期年代校准后为4200±35～4820±90，即公元前3000年上半叶”[18]，而“伍德尔期年代校准后为为4410±20～3725±95，即公元前3000年下半叶”[19]。И.A.波洛马列娃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该地区的人面像岩画划分为“颅骨形”和“心形”两个类型，并根据最新考古出土资料，将颅骨形人面像岩画年代断在马雷舍沃文化和沃兹涅先诺夫卡文化格林期，即公元前4000年至公元前3000年上半期，而数量不多的心形人面像岩画则属于沃兹涅先诺夫卡文化格林期，即公元前3000年上半期[20]。而布罗江斯基则将仅有圆圈轮廓，并且用三个凹穴来表示眼睛和嘴巴的人面像岩画与当地新石器时代的博伊斯曼文化对应起来，并认为其年代大致为距今6500～5000年[21]。

此外，在其他相关著作中，A.П.奥克拉德尼科夫也都对所研究的岩画点年代进行了探讨，并将其与相应的考古学文化或者古代民族对应起来。由于作者本身是一位著名的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兼民族学家，对西伯利亚地区的古代文化非常熟悉，他在岩画研究中综合运用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神话学、宗教学等各学科的知识，得出了比较令人信服的结论，将人们对西伯利亚古代文化的认识大大向前推进一步。为苏联远东、西伯利亚和中亚的岩画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必须指出，关于A.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岩画断代工作，俄国学术界也存在不少争议，其中最大的争议就在于对西伯利亚地区是否有旧石器时代岩画的判断上。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曾根据图像本身的辨识、风格类比以及保存状况等将西伯利亚希

什金诺岩画中的部分马和公牛图像断为旧石器时代晚期。而他在苏联科学院的同事，另一位著名考古学家兼岩画研究专家A.A.福尔莫佐夫却从岩画作画环境着眼，并进而指出："所有欧洲的旧石器时代岩画，以及所有苏联境内最古老的艺术遗迹都与洞穴有关。例如苏联境内的姆格维梅威洞穴和卡波娃洞穴，科贝斯坦和石墓的早期雕刻，以及扎拉乌特卡马尔洞穴等。而希什金诺岩画制作在露天的垂直崖面上，这些图像所处的地形显然与西伯利亚和中亚的众多晚期岩画是一样的。"[22]随后，他进一步认为，西伯利亚露天崖壁上创作的马和公牛等图像只不过是西欧旧石器时代类似图像的一种遗型，其年代要比后者晚得多[23]。不得不承认，A.A.福尔莫佐夫的研究视角有其独到之处，并将A.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观点置于一个非常尴尬的位置，关于西伯利亚旧石器时代的岩画还需要进一步坚实的证据。随后，A.И.马金在东西伯利亚的黑龙江左支流博尔贾河开阔地带发现了一处岩画点，该岩画点被称为"贝尔卡"。在其岩壁上发现了用红色颜料绘制而成的犀牛和公牛（或北美野牛）图像。岩画下方发现一遗址，在其第五层出土了红色颜料块、被涂成红色的工具、猛犸象牙刀以及动物雕像。该层属于更新世时期，为整个遗址的年代最早层[24]。不论从图像本身来看，还是从考古学文化来看，均表明这些图像很可能属于旧石器时代晚期。随后，A.И.马金在东西伯利亚的托科河又发现了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公牛和马的图像[25]。这些发现表明，仅仅根据作画环境来判断岩画的年代是极不可靠的，旧石器时代的岩画既有可能制作在洞穴中，同时也可能制作在露天的岩壁上，需要根据具体情况来判断。1999年，B.И.马罗金和Д.B.切列米辛出版的《乌考克高原的古代岩画》一书，对上述争论进行了全面的总结，进而证明了A.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观点是正确的[26]。

三、关于西伯利亚岩画的起源及性质

关于西伯利亚岩画的起源，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坚持岩画图像的同源性或同一性观点，持类似的观点的还有其学生Г.И.别里赫；而以Ю.A.萨瓦捷耶夫和A.A.福尔莫佐夫为代表的学者则认为岩画图像是按照各自的传统平行发展。简而言之，可以归纳为岩画的单线起源论和多线起源论两种观点。

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在研究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太阳与船组合的岩画时认为"其与广泛分布于埃及和前亚的太阳船图像一样都是太阳神话的反映"[27]；而作为A.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追随者，Г.И.别里赫提倡"科学的普遍化"原则，认为原始艺术的同源性和岩画发展路径的同一性。她试图"在整个世界历史范围内发现岩画发展的一般趋势"[28]；随后，她进一步指出，"根据风格、制作技术和内容来寻找西伯利亚岩画的起源合乎原始艺术发展的一般性规律"[29]；作为多线起源论的代表，Ю.A.萨瓦杰耶夫指出，"根据对欧亚大陆森林地带岩画的研究，所有证据都非常明显地显示出岩画是多线进化的，它们按照不同的风格和制作技术平行地发展。不同地方的岩画中包

含着不同的内容，很明显，它们的功能也各不相同”[30]；А.А.福尔莫佐夫的观点则稍有不同，与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一样，他也认为欧亚大陆北部和中部的“太阳船”岩画是太阳神话的反映[31]，但同时他又写到，“在承认艺术发展一般性规律的同时，我们并不能将所有各种各样的岩画归为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地中海沿岸或者前亚的艺术并不是像西伯利亚森林地区那样发展起来的”[32]；Ю.А.萨瓦捷耶夫则进一步认为，“在当代开展的对古代造型艺术遗迹‘婴儿期’的研究中，在世界历史的范围内进行岩画研究唯一正确的方针是认清岩画自身的观念以及对单个遗迹和部分具体问题的比较研究”[33]；类似的争论还体现在А.П.奥克拉德尼科夫和А.А.福尔莫佐夫之间，前者“设想大多数西伯利亚岩画反映的是森林地带猎人部落的历史文化世界，在这里驼鹿的形象处于中心地位”[34]，А.А.福尔莫佐夫则认为，如果“接受这种驼鹿的图像作为主要特征的观点，则这种特征不仅属于西伯利亚，还应包括乌拉尔和卡累利阿等，但是毫无疑问，卡累利阿、乌拉尔和西伯利亚在各自的历史发展中具有独立性”[35]，随后，他提出按照制作方法和风格特征来进一步区分。二者的争论体现了缺少一种详尽的、大家都能接受的岩画图像的比较方法，前者主要强调类似岩画主题风格上的共性；后者在承认共性的同时，更强调地区间的差异性。但总体而言，二者均未对岩画系统作出合理分类，均存在不少弱点。

一般来说，岩画的比较应该是基于地理环境、文化属性、作画技术、分布特点和风格特征等的综合比较，即建立一套尽可能涵盖所有要素的分类系统，在这个基础上对某个具体类型的岩画图像进一步分解，然后寻找岩画的文化基质，所谓的基质即岩画图像本身具有传播功能的那部分要素，它与特定的文化意义相联系，如果这套系统的众多要素都是相关的，那么我们应该大致可以判定这两个岩画点之间存在着传播学上的关系，这可能是解决岩画传播问题的一个较好方法。也唯有如此，才能逐步解决岩画究竟是单线起源抑或是多线起源的问题。

关于西伯利亚岩画的性质，主要集中在岩画与萨满教关系的讨论上。西伯利亚是萨满教的故乡，有着非常丰富的萨满教民族学资源，作为本地区最为丰富的原始艺术形式，岩画自然而然地进入了研究者的视野。关于岩画与萨满教关系的探讨也吸引了众多专家的参与。

早在20世纪初，А.А.斯皮金就写道：“在鄂毕河毗邻额尔齐斯河以及卡马河毗邻维切格达河和伯朝拉河的广大区域分布着众多的萨满图像。这个区域属于乌拉尔—阿尔泰人群。”[36]这里所涉及的区域主要是西西伯利亚和部分欧俄地区，所讨论的对象主要是一些传世或出土的人形或人面形文物。随后，岩画进入了学者的视野。М.Н.杭加洛夫提出“贝加尔湖岩画起源于萨满教”[37]；并且认为“类人型图像带角的头部与萨满带角的冠冕类似”[38]；И.В.阿谢耶夫认为，“贝加尔湖查干扎巴岩画的许多内容都具有萨满教特征，属于贝加尔湖的某支土著居民”[39]；А.И.马金对“阿穆尔河沿

岸森林地区岩画与萨满教的关系进行了详细的论述，重点对岩画所体现的萨满教三界宇宙观进行了阐释”[40]；王强林和A.П.扎比亚克也指出，“雅库特地区一些岩画主题与萨满形象有关。另外，外贝加尔沿岸地区有一座新石器时代的被称为萨满山的圣殿，山上有大量的岩画”[41]；M.A.杰夫列特则注意到，“图瓦岩画中头上带角的人面像与民族学材料中具体的萨满教特征具有某种继承关系”[42]，随后，她进一步将这种图像称之为“人脸面具”，“因为它们本身并不代表具象的人，而是表示曾经存在过的面具，萨满和巫师能够戴着这些面具完成某种宗教仪式”[43]；B.Д.库巴列夫对“阿尔泰地区岩画中的萨满诸形象进行了探讨，并从萨满教神话学的角度对岩画的内涵进行了解读”[44]；E.Г.杰夫列特通过对西伯利亚岩画中“X射线风格”的人形图像、持鼓的人形图像以及带有射线状头饰的人形图像的微观分析，并与萨满教装饰及用具进行比较，指出“萨满教的世界观是西伯利亚人复杂的象征体系中的基本组成部分……岩画主题为探寻萨满教概念的早期根源提供了一个特殊的机会”[45]；伯查得・布伦特杰斯则认为“沿阿穆尔河定居的部落创作的人面像和‘骨骼’风格的岩画都是萨满教的反映”[46]，而“骨架风格”与“X射线风格”是同一种风格的不同表述；E.Г.杰夫列特和M.A.杰夫列特在《岩石中的神话：俄罗斯的岩画世界》中对“萨满教宇宙观和西伯利亚岩画与萨满教的关系作了全面的阐释”[47]。

受时代和条件所限，A.A.斯皮金认为，在叶尼塞河及其以东地区并没有与萨满教相关的作品。但A.П.奥克拉德尼科夫却根据新发现资料对其观点进行了修正。在1948年《苏联考古学》刊登的《东西伯利亚的古代萨满图像》一文中，他论证了从俄罗斯东部地区直到鄂毕河流域广泛存在着与萨满教有关的图像。这些图像主要是一些金属类人面像和人像，其年代约为公元前3～前2世纪，属于斯基泰时期的作品[48]。此外还有一些图像年代要晚的多，显示了一个连续发展的时间序列。作者认为这些图像均是对萨满形象的刻画。关于西伯利亚岩画，他也指出，“侧身带尾巴的人像和头上带角的人像与萨满教具有密切的关系”[49]；在《贝加尔湖岩画——西伯利亚人民古代文化遗存》中他进一步写到，“在类人型岩画（贝加尔湖的青铜时代岩画——笔者注）中，清楚地展现出了一种广泛的与萨满形象以及获得萨满技能相关的思想综合体……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各部落的岩画就其基本内容来说，具有萨满教的性质”[50]；而萨满教开始出现于乌拉尔河和鄂毕河地区则大约在公元前1000年[51]；关于西伯利亚岩画中的“X”射线风格，A.П.奥克拉德尼科夫肯定了他的萨满教性质，并进一步指出：“这种‘骨架’风格起源于公元前2000年末至前1000年初叶的泰加森林部落艺术传统，与萨满教意识形态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52]总之，在其著作中，A.П.奥克拉德尼科夫总是力图去论证这些岩画图像和萨满教的关系，并试图对萨满教的起源问题进行合理性的解释。

四、结　论

综观A.П.奥克拉德尼科夫的岩画研究方法，主要是将其视为一种文物实体，在断代的基础上，充分利用民族学、考古学材料来揭露岩画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英文中岩画被称为Rock Art，是指“岩石艺术”，说明其主要与艺术史产生密切关系，这从早期西方国家从事岩画研究学者的学术背景可以窥测一二，虽然在后期人类学派以及自然科学的方法大量介入，使这一倾向似乎有所弱化，但艺术史的研究方法始终在西方岩画研究中占有一席之地。在俄国，与Rock Art对应的一词是Наск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但这个词并不常用，通常使用的是Петрогли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后者与汉语中的“岩画”一词意思比较接近，更强调的是一种文物实体，这就决定了其与考古学关系密切，这从上述两个国家岩画研究者的学术背景同样可以看出。这种对岩画定义的差异源于二者学术传统的不同，同时也决定了其研究路径及方法上的差异性。虽然对中俄两国学术界而言，均将岩画视为文物实体，但细微之处也有所区别。具体来说，俄国岩画主要集中在西伯利亚以及欧俄的极北地区，这些地方文献材料比较匮乏，而民族学资料却极为丰富，不少地区可以视为民族文化的活化石，如被众多学者视为最古老宗教形式的萨满教最初就是在这里被发现并被介绍到全世界。而中国的情况可以说基本相反，一方面，除了极少数地区外（如云南某些地区的岩画点），并没有能与岩画关联起来的民族学资料，另一方面，中国有着悠久的治史传统，因此产生了浩瀚的文献资料，故岩画虽然与考古学关系密切，但更主要的是作为一种地上文物用来证史[53]。

注　释

［1］　十月革命后，俄国历法发生改变，前后相差13天.

［2］　其发表成果数量引自维基百科https://ru. wikipedia. org/wiki/Окладников,_Алексей_Павлович.

［3］　a.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Шишкинские писаницы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Прибайкалья［М］. Иркутск, 1959: 86-90.

b.［苏联］А. П. 奥克拉德尼科夫. 希什金诺岩画——贝加尔湖沿岸地区古代文化遗存（节译）［A］. 欧亚草原岩画艺术论集［C］.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63 ~ 69.

［4］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Олень золотые рога. Расказы об охоте за наскальными Рисунками［М］. Л., М. ,1964.

［5］　a.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Ленские писаницы［М］. М, 1959.

b.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Петроглифы Забайкалья［М］. Часть 1. Л., 1969.

c.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Петроглифы Забайкалья［М］. Часть 2. Л.,1969

d.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Петроглифы Средней Лены［М］. Л., 1972.

e.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и др. Петроглифы долины реки

Елангаш (юг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9.

f.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 Скорынина Э.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0.

g.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 Скорынина Э.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Чанкыр-кёля. Алтай. Елангаш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1.

h.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 Скорынина Э.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урочища Сары-Сатак (долина р. Елангаш)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2.

［6］ a.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и др. Петроглифы долины реки Елангаш (юг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79.

b.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и др. Петроглифы Горного Алтая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0.

c.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Древние рисунки Кызыл-Кёля［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5.

［7］ Окладникова Е. А. Загадочные личины Азии и Америки［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79.

［8］ “阿穆尔河”即中国境内的“黑龙江”，除了著作中相关的特定称谓以及转引作者的话使用“阿穆尔河”之外，本文均使用“黑龙江”一词.

［9］ a.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Лики Древнего Амура［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68.

b.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верхней Лены［M］. Л. , Наука, 1977.

［10］ Дэвлет Е. Г. , Дэвлет М. А. Сокровища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Северной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M］. М. : ИА РАН, 2011: 59.

［11］ Медведев В. Е. , Скобелев С. Г. Наскальные рисунки Евразии. Первобыт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M］. Наука. Сиб. Отд-ние, 1992: 6.

［12］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верхней Лены［M］. Л. , Наука, 1977: 120.

［13］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Мартынов А. И. Сокровища Томских писаниц. Наскальные рисунки эпохи неолита и бронзы［M］. М: Искусство, 1972: 250.

［14］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Мазин А. И. Писаницы бассейна реки Алдан ［M］.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79: 33 ~ 76.

［15］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Фролов Б. А. Древнейшее искусство Северной Азии Петроглифы, орнаменты, мифы ［M］. М. , 1980: 342.

［16］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M］. Ленинград. Наука, 1971.

［17］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Взаимодействие древних культур Тихого океана. (на материалахпет роглифов). // Проблемы археологии Евразии и Северной Америки［C］. М. , 1977: 49.

［18］ a. Шевкомуд И. Я. Поздний неолит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M］. Владивосток: ДВО РАН, 2004.

b. Из Пономарева И. А. Личины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 (вопросы хронологии)［J］. Омск, 2012: 159.

［19］ Пономарева И. А. Личины Нижнего Амура (вопросы хронологии)［J］. Омск. , 2012: 159.

［20］ 同［19］: 159，160.

［21］ Заика А. Л. Личины Нижней Ангары［М］. Красноярск, 2013: 133.

［22］ Формозов А. А. Очерк по истории рус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J］. Москва，1969（165）: 100，101.

［23］ 同［22］: 101.

［24］ Мазин А. И. Таежные писаницы Приамурья［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86: 103.

［25］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 Мазин А. И. Писаницы р. Олекмы и Верхнего Приамурья. Новосибирск［М］, 1976: 82 ~ 85.

［26］ Молодин В. И. , Черемисин Д. В. Древнейшие наскальны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плоскогорья Укок［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1999.

［27］ А. П. Окладников. Олень-золотые рога［М］. М. ,1964.

［28］ Пелих. Г. И. О Методике научной классификации Сибирских петроглифов［J］. Сов.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8(3): 71.

［29］ 同［28］.

［30］ Савватеев. Ю.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Карелии и наск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лесной полосы Евразия［J］. Сов.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9(1): 93.

［31］ А. А. 福尔莫佐夫著，路远译. 苏联境内的原始艺术遗存［M］. 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 41 ~ 44.

［32］ Формозов. А. А. Всемир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масштаб или анализ конкретных источников［J］. 1969(4): 103.

［33］ Савватеев. Ю.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Карелии и наскаль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 лесной полосы Евразии［М］. Сов.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9(1): 90.

［34］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Ангары［М］. М. - Л. ,1966: 4.

［35］ Формозов. А. А. О наскальных изображениях эпохи камня и бронзы в Прибаигалье и на Енисее［J］. Сов. Этнография, 1967(3): 69.

［36］ Спицын А. А. Шамански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J］. Записки Отделения русской и славянской археологии. т. VIII. вып. 1, 1906: 29.

［37］ Окла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Байкала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М］. Наука, 1974: 80.

［38］ Асеев. И. В. Шаманская символика на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в бухте Саган-Заба на Байкале и 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ие Параллели//История и культура Востока Азии［М］. Том 2. Новосибирск, 2002.

［39］ 同［38］.

［40］ Мазин. А. И. Таежные писаницы Приамурья［М］. Новосибирск. Наука, 1986: 122 ~ 150.

［41］ Ван Цзяньлинь,. Забияко. Петроглифы Северо-Восточного Китая в Контакте Социальной и Релилиозной Истории Региона//Религиоветение ［J］, 2012(4): 6 ~ 8.

［42］　Дэвлет М. А. Петроглифы Мугур-Саргола［M］. M. Наука, 1980: 248 ~ 250.

［43］　Чадамба. Л. д, Памятники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яноском каньоне Енисея (Республика Тыва)［J］.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 И. Герцена, 2008(3): 321.

［44］　Кубарев В. д. Шаманистские сюжеты в петроглифах и погребальных росписях Алтая［M］. древности Алтая. Известия лаборатории археологии Горно-Алтайского гос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1(6): 82 ~ 98.

［45］　Neil S. Price. Archaeology of Shamannism ［M］, Routledge, 2001: 43 ~ 51.

［46］　Burchard Brentjes. Rock Art in Russian Far East and in Siberia, sited from http://www. rupestre. net/tracce/?p=2065.

［47］　Дэвлет. Е. Г. , дэвлет. М. А. Мифы в камне : Мир наскального искусства России［M］. Москва: Алетейа, 2005: 385 ~ 395.

［48］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Древние шаманские изображения из Восточной Сибири［J］. Советская Археология. М. -Л. :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1948(10): 128.

［49］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Запорожская В. Д. Ленские писаницы［M］. M. - Л. : АН СССР, 1959: 102.

［50］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Байкала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M］. Наука, 1974: 84.

［51］　〔匈牙利〕米哈伊·霍珀尔著，户晓辉译. 萨满教的起源与西伯利亚的岩画［J］. 西域研究，1996（2）.

［52］　Окладников. А. П. Петроглифы Байкала -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й культуры народов Сибири［M］. Наука, 1974: 149 ~ 153.

［53］　这里的“证史”主要体现的是将图像与文献记载互证以揭露史实的一种方式，并非说中国学者就不用民族学材料，或俄国学者就不用文献资料，只是说明不同地区根据材料不同而产生的一些研究方式上的差异，而实际上，中俄学者尤其是早期岩画学者之间的共性远大于差异性.

Review of Soviet Union Archaeologist A.P. Okladnikov 's Academic History of Rock Art Research

Xiao Bo

Abstract: Based on the review of A.P. Okladnikov 's rock art research history in the past half century,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achievements from the aspects of rock art's content, staging and dating, origin and characteristics, and research method. In light of the irrational situation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in his rock art research, the paper puts forward that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classification system which covers all the elements as far as possible, including th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cultural attributes, techniques,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s and style characteristics, on the basis of which to find the culture matrix of a specific type of rock art, and then determine the transmission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rock arts of different areas.

Key words: A.P. Okladnikov; Rock Art Research; Academic History; Review

北魏《郁久闾肱墓志》考释

王　萌

（内蒙古大学历史与旅游文化学院，呼和浩特，010070）

最近研读胡海帆、汤燕《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1996～2012年）》所收《郁久闾肱墓志》拓片。虽然志文略显简略，但从内容看，该墓志较详尽保存了北魏时期的职官制度、北疆民族附魏等信息，对于进一步认识北魏优待异国归降王室政策、北魏的胡汉官制及爵制与胡族姓氏改革、北魏所实行之赠官制度等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本文对志文中所见信息进行考释，希望能进一步深入对相关问题的研究。

《郁久闾肱墓志》，额题《夏州闾史君墓志》，出土地点不可考，2008年，北京大学图书馆购得该志拓本，并收藏。《郁久闾肱墓志》，正书，22行，行22字；额正书，横题，1行7字；拓片1张，58.5厘米×53.5厘米[1]。结合《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1996～2012年）》所收该墓志拓本与王连龙《新见北朝墓志集释》对该志所作之释文并进行对比，将《郁久闾肱墓志》志文抄录如下（图一）：

郁久闾肱者，茹茹国人也。伯父大比，茹茹国主。父讳琼，字处升环。远慕圣化，丹诚归国。初至之日，造次未立，蒙赐青州历城官口八十人，库帛一千匹，田地屋宅悉蒙烝给。又以邻国子弟，封爵河间王，授职东宫度卢、殿中尚书、内行阿干、太仆卿，后除使持节平北将军、云州刺史。息肱，仰承父祖之资，蒙袭父王品至，高祖孝文皇帝例改封为益都侯，除伏波将军、代名太守。在任公勤，民心愿乐。宜享遐寿，为国之干。何啚不幸，早辞明世。以去正始四年岁在乙卯十月甲子朔十日癸酉薨于家馆。时朝以肱父祖世为国主，诚心归报，及抚名郡，清勤著称，掌德录勤，蒙赠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冠军将军、夏州刺史。其为人也，夙禀端嶷之姿，长怀韶亮之气。天聪慧頴，生而知之。神悟幽通，不教而达。又恭俭节用，清心节行。善与人交，言而有信。薨背之日，时朝叹惜，行路增酸。又德器宽美，不可具载，为略申之耳，其辞曰：

赫矣贵胄，世踵贤明。诞生懿哲，郎悟通灵。不教而达，不肃而成。恭俭节用，禀性忠贞。惟德可遵，有道可庆。历任朝，匡辅时政。清勤著称，芳音早令。行为时标，流风垂詠。岳茂良才，永抚无疆。一朝殒世，痛惜三



图一　郁久闾肱墓志拓片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1996～2012年）》）

良。岂伊酸楚，于何不藏。玉折兰摧，奄就夜光。君子百行，君实兼有。军国两须，非子谁取。宜任梁栋，荷重是负。使终名绩，千载不朽。

兴和三年岁在辛酉七月辛未朔十二日壬午刊记。

一、墓志所涉郁久闾肱先祖

1. 郁久闾肱之伯父

郁久闾肱墓志载郁久闾肱伯父郁久闾大比“茹茹国主”，按《魏书》卷一〇三《蠕蠕传》，与北魏并立存在的柔然可汗未见名为郁久闾大比者。有学者认为此乃“音译之不同”[2]。墓志记载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郁久闾肱卒于洛阳，志文又谓其“早辞明世”，墓志虽然没有记载郁久闾肱卒时享年，但按其英年早逝，本文审慎认为其生于北魏孝文帝在位前期，在此基础上，大致可以看出郁久闾肱之父郁久闾琼生活于北魏文成帝至孝文帝时期，由此可知郁久闾肱伯父即“茹茹国主”郁久闾大比约相

当于北魏明元帝至太武帝时在位。考之《魏书》，北魏明元帝至太武帝时，柔然可汗为郁久闾大檀，然郁久闾大比是否为郁久闾大檀，尚需旁证。

2. 郁久闾肱之父

郁久闾肱父郁久闾琼，字处升环。

郁久闾琼附魏原因，墓志载“远慕圣化，丹诚归国”。稽核《魏书》，北魏前期，北魏对柔然展开大规模军事进攻，对柔然给予了决定打击；同时由于太武帝时，北魏统一北方，北魏国力逐渐强盛，对边疆民族形成威慑之势。在此背景下，部分柔然贵族出于自身生计考虑，降附于北魏；但也不排除部分柔然贵族钦慕北魏文化而归附之。

正由于郁久闾琼为柔然贵胄，身份显赫，所以，对以郁久闾琼为代表的柔然王室归附者的安抚，事关北魏对其劲敌柔然攻势的展开与分化瓦解策略的实施。因此，郁久闾琼入魏后，得到北魏统治者的重视与礼遇。按志文，郁久闾琼在降附北魏后，未立功勋，但北魏统治者却给予其 “青州历城官口八十人”“帛一千匹”“田地屋宅”等优厚赏赐以作为安身立命之资。

除物质赏赐之外，北魏统治者又给予郁久闾琼仕宦方面的诸多优渥。墓志载，郁久闾琼降附北魏后，直接被封授河间王。按《魏书》，北魏前期被封授王爵者规模有限，尤其是直接被封授王爵者。北魏统治者将不轻易授予人的“王”级爵位授予郁久闾琼，更体现出对其的尊崇。

在任官方面，郁久闾琼先出任中央系统职官东宫度卢、殿中尚书、内行阿干、太仆卿；后外出地方任职，被授予使持节、加平北将军、云州刺史。由郁久闾肱所任之官，可以看出：首先，至北魏孝文帝改革官制，北魏前期职官制度中存在胡汉官制杂糅的局面，如《郁久闾肱墓志》所载郁久闾琼所任之东宫度卢、内行阿干明显属于胡族系统职官，而郁久闾肱所任职殿中尚书、太仆卿属于中原汉族系统职官。其次，关于郁久闾琼所任职官之职掌，①东宫度卢，太子东宫属官，具体执掌已不可考。《郁久闾琼墓志》所载东宫度卢，《魏书》无载，志文可补史阙。②殿中尚书，属于尚书省属官。据《南齐书》卷五七《魏虏传》所载“殿中尚书，知殿内兵马仓库”可知北魏殿中尚书职掌皇宫兵马、仓库事务，职责甚为重要。③太仆卿，参照北魏《前职令》，位列第二品上，属于高品级职官，职掌皇家舆马事务。④内行阿干，此职官职掌，由《魏书》卷一五《昭成子孙 · 常山王遵传附拓跋可悉陵传》所载“（拓跋）可悉陵，年十七，从世祖猎，遇一猛虎，陵遂空手搏之以献。世祖曰：‘汝才力绝人，当为国立事，勿如此也。’即拜内行阿干”来看，内行阿干应为皇帝的近卫侍从人员。⑤使持节、平北将军、云州刺史。北魏的持节制度，继承晋制，据《晋书》卷二四《职官志》所载“使持节为上，持节次之，假节为下。使持节得杀二千石以下；持节杀无官位人，若军事，得与使持节同；假节唯军事得杀犯军令者”，三种持节中，使持节权力最大。平北将军，

参照北魏《前职令》，属于从第二品上，品级甚高，起到提高被授予者身份之作用。云州，为北魏北方重州，其稳定与否事关北魏北方、乃至京畿的稳定。云州刺史掌管云州行政事务。据此，本文认为郁久闾肱外出云州任职，不仅掌管云州行政事务，还应涉及云州军事事务，可谓权重一方。纵观郁久闾琼仕宦，职官颇为显赫，三次任职中央，一次出镇外藩；并且在任职中央期间，郁久闾琼就供职于禁卫系统，接近权力核心。

二、郁久闾肱仕宦

1. 郁久闾肱生前仕宦

墓志载郁久闾肱“蒙袭父王品至”，指郁久闾肱继承其父郁久闾琼河间王爵位。志文又载“高祖孝文皇帝例改封为益都侯”，与太和十六年孝文帝改革爵位继承制度有关，即《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所载“（孝文帝）制诸远属非太祖子孙及异姓为王，皆降为公，公为侯，侯为伯，子男仍旧，皆除将军之号。”据此，郁久闾肱所获得之爵位河间王、益都侯，经历了袭封、降封与改封三种形式。袭封，即郁久闾肱继承其父爵位河间王；降封，就是指由于孝文帝改革爵位继承制度，郁久闾肱爵位等级降低，由王降为侯，但是按照《魏书》所载孝文帝有关非道武帝子孙及异姓贵族继承其先祖爵位之逐级递减规定，孝文帝改革爵位制度后，郁久闾肱所得爵位等级应为公，而非志文所载之侯；改封，则为封地的变更，即由河间公变为益都公。

墓志载北魏孝文帝后期，郁久闾肱任职代名太守，加伏波将军。伏波将军，参照北魏《后职令》，为从第五品。按《魏书》卷一〇六下《地形志下》，代名郡，隶属于夏州，文成帝太安二年（456年）设置。《魏书》没有记载北魏时期任职代名太守者，因此，《郁久闾肱墓志》可补《魏书》之阙。按北魏后职令定上郡太守第四品、中郡太守第五品、下郡太守第六品，郁久闾肱所任之代名太守，至少为六品。志文载郁久闾肱任职代名太守期间“在任公勤，民心乐愿”“清勤著称”，从以上可知，由于郁久闾肱管理有方，其得到代名当地民众的拥护，有利于当地的稳定，进而巩固北魏在代名地方的统治秩序。

2. 郁久闾肱逝世后所得赠官

北魏时期，统治者通常会赠与逝世官员职官，以示对官员生前事迹的奖赏。墓志载郁久闾肱逝世后，北魏宣武帝赠其持节、都督夏州诸军事、夏州刺史。

按志文，郁久闾肱外出任职地方时，未被授予持节。而其逝世后，北魏宣武帝赠其持节，可视为宣武帝给予郁久闾肱的特殊荣宠。

郁久闾肱所获赠之都督夏州诸军事，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其为从第二品下。

郁久闾肱所获赠之冠军将军，按北魏《后职令》，为从第三品，品级明显高于伏波将军。

夏州刺史，按《魏书》卷一一三《官氏志》所载《后职令》，上州刺史第三品，中州刺史从第三品，下州刺史第四品，则夏州刺史至少为第四品。由此可见其逝世后所获赠之夏州刺史品级明显高于代名太守。

三、郁久闾琼与郁久闾肱姓氏与籍贯之变迁

1. 郁久闾琼与郁久闾肱姓氏之变迁

郁久闾琼与郁久闾肱，出身柔然贵胄，本姓郁久闾。入魏后，至孝文帝改革北族姓氏之前，生活于中原的柔然王室成员保持原来姓氏；孝文帝迁都洛阳、改革北族姓氏，至此，入魏的柔然王室成员姓氏由郁久闾氏改为闾氏。按前所述，约生活于北魏文成帝至孝文帝前期的郁久闾琼应保持原有柔然王室姓氏。生活于孝文帝前期至宣武帝时期的郁久闾肱，以孝文帝改革北族姓氏为时间界限，之前，亦应保持原有柔然王室姓氏；之后，其姓氏应为闾氏。而《郁久闾肱墓志》却载郁久闾肱之姓氏始终为郁久闾，明显与北魏孝文帝改革北族姓氏不符。

2. 郁久闾琼与郁久闾肱籍贯之变迁

《郁久闾肱墓志》并没有明确记载郁久闾琼与郁久闾肱籍贯之变迁，但上述二人生活于北魏孝文帝实行大规模汉化改革的时代，所以，有必要对上述二人籍贯之变迁进行探讨。

归附北魏的柔然王室成员，其祖先来自于漠北草原，籍贯本应为漠北柔然之地。按《魏书》有关记载，孝文帝迁都洛阳之前，代郡为北族籍贯所在。所以，入魏后的郁久闾琼籍贯为代郡。而郁久闾肱之籍贯，则经历了由代郡至洛阳的变化。由《魏书》卷七下《孝文帝纪下》所载太和十九年孝文帝下诏规定“代人南迁者，悉为河南洛阳人”与《隋书》卷三三《经籍志二》所载“后魏迁洛，有八氏十姓，咸出帝族。又有三十六族，则诸国之从魏者；九十二姓，世为部落大人者，并为河南洛阳人”来看，以太和十九年为界，此前，代郡平城为郁久闾肱之籍贯；此后，河南洛阳成为郁久闾肱之新籍贯。

四、郁久闾肱墓志所涉之北魏后期客馆制度

墓志中郁久闾肱之“家馆”，应位于《洛阳伽蓝记》所载北魏迁都洛阳后为安置柔然降附者所置之归德里。

北魏迁都洛阳后，在洛阳城规划、设置客馆与里坊，用以安置周边民族归附者，《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载“永桥以南，圜丘以北，伊、洛之间，夹御道有四夷馆。道东有四馆。一名金陵，二名燕然，三名扶桑，四名崦嵫。道西有四馆（里）：一曰归正，二曰归德，三曰慕化，四曰慕义。吴人投国者处金陵馆，三年已后，赐宅归正里……北夷来附者处燕然馆，三年已后，赐宅归德里……东夷来附者处扶桑馆，赐宅慕化里……西夷来附者处崦嵫馆，赐宅慕义里”。根据以上史料，本文认为：首先，北魏按照归附者所属政权与民族之异，分别设置客馆、里坊用以安置。其次，北魏迁都洛阳后所置之客馆、里坊，已有鲜明的等级之分，即安置江南归附者的金陵馆与归正里居首位，之后依次是安置北族归附者的燕然馆与归德里、东夷归附者的扶桑馆与慕化里、西夷归附者的崦嵫馆与慕义里；北魏后期统治者对周边归附者所居之客馆与里坊等级作出上述规定，一方面是鉴于周边政权、民族实力之别，另一方面是出于与周边政权之争尤其是与江南政权的正统之争。终北魏时期，以军事实力而言，北魏北疆地区的柔然为其最大威胁；但若以中原传统正统观念而论，江南政权自诩为中原正统所在，江南政权的正统观为江南汉族士人甚至部分北方汉族士人所认同，因此，对于出身北方胡族、积极进行汉化改革、以中原正统自居、标榜自己所建之胡族政权为中原王朝的北魏中期与后期统治者来说，江南政权为其最大威胁。所以，北魏中后期统治者在所置之客馆、里坊中，将安置江南归附者的金陵馆与归正里视为首要，通过在此馆、里坊中安置与优待江南归附者，达到拉拢江南士人、与江南争夺正统的目的；而在众多馆、里中位居第二的燕然馆、归德里安置、厚待北疆降附者尤其是柔然人，旨在对其笼络、利用，以对柔然上层进行分化、瓦解。

关于北魏后期所置之客馆与里坊之规模与作用，由《洛阳伽蓝记》卷三《城南》所载“乐中国土风，因而宅者，不可胜数。是以附化之民，万有余家。门巷修整，阊阖填列，青槐荫陌，绿树垂庭，天下难得之货，咸悉在焉”来看，首先，包括安置北疆柔然在内的客馆与里坊，其规模是非常庞大的，并且有完善的规划；其次，客馆与里坊为居住于此的众多民族进行物质交流提供了有利场所，有利于促进四方风俗及民族融合进程。即学者所谓“四夷馆及四夷里的设置”，不仅积极促进民族融合，而且，“增加了洛阳人口，繁荣了洛阳”；同时北魏对客馆与里坊的有序管理，也是其开放性与包容性民族政策的体现[3]。

五、郁久闾肱逝世时间及墓志刊刻时间

1. 郁久闾肱逝世时间

志文云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郁久闾肱卒于洛阳家中，由志文所载“早辞明世”，郁久闾肱为英年早逝。

志文载正始四年干支为乙卯，但稽之方诗铭《中国历史纪年表》，正始四年干支应为丁亥。

2. 郁久闾肱墓志刊刻时间

北魏宣武帝正始四年（507年），郁久闾肱卒于洛阳；但郁久闾肱墓志却刊刻于东魏孝静帝兴和三年（541年），可见郁久闾肱卒年距其墓志刊刻之年达34年。参照赵超所著《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魏晋南北朝时期，墓志刊刻时间即墓主之卒年；而墓志刊刻距墓主卒时长达数十年之久的情况甚为罕见。郁久闾肱墓志刊刻距其卒年长达数十年的情况，应和东魏交好柔然有关[4]。即东魏借厚待逝世的柔然王室成员以示对漠北草原再次强盛的柔然的亲善之意，以拉拢柔然、使其成为自己的盟友。进而言之，北魏后期至北魏分裂之际，郁久闾阿那瑰采用中原典章制度、改革柔然内政，使柔然再次强盛，巩固了在漠北草原的霸主地位；534年，北魏分裂为西魏与东魏，东西魏之间连年征战，东西魏双方都想拉拢漠北柔然为己所用以制衡对方。而当时柔然趁“（西魏）与东魏争衡，戎马不息”之际，“屡为（西魏）边患”[5]，同时较频繁遣使于东魏、大部分时间内保持和东魏的往来。由此可见，边疆环境对东魏来说是相对有利的。所以，为进一步巩固与柔然的关系，厚待逝世的柔然王室成员、为其刊刻墓志成为东魏统治者示好于柔然的重要方式。

六、结　　语

郁久闾琼由于柔然贵胄的显赫出身，其附魏后，得到北魏统治者的尊崇与礼遇，仕宦颇显，被封授高等级爵位与重要职官，特别是进入禁卫系统供职，跻身统治集团核心。郁久闾琼之子郁久闾肱，虽然仕宦不显，但其任职地方，勤于职守，御民有方，对稳定地方秩序而言功不可没；其逝世后，获得高品级赠官，对于郁久闾肱所属房支而言，北魏统治者对其赠官之举是褒奖其生前仕宦功绩、提升其所属房支地位的重要举措。东魏统治者刊刻郁久闾肱墓志即厚待逝世的柔然王成员，成为示好于柔然、使柔然成为自己盟友的一种重要外交手段。

注　　释

［1］ 胡海帆，汤燕. 北京大学图书馆新藏金石拓本菁华（1996～2012）［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

［2］ 王连龙. 新见北朝墓志集释［M］. 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3.

［3］ 王静. 中国古代中央客馆制度研究［M］. 哈尔滨：黑龙江教育出版社，2002.

［4］ 同［2］.

［5］ 周书 · 卷三三 · 库狄峙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1.

Research on〈Epitaph of Yvjiulvgong〉of Northern Wei

Wang Meng

Abstract: From the early days of Northern Wei, members of Rouran nobles surrendered to Northern Wei one after another. However,〈WeiShu〉had a few records of members of Yujiulv, and entered into middle Northern Wei. Overall, members of Yjiulv hadn't been recorded in historical books but for a few cases. The newly discovered 〈Epitaph of Yujiulvgong〉gives a faithful reflection of the life of the members of Yujiulv who hadn't been recorded by historical documents, and calls attention to weakness of documents. This epitaph provides important historical data in discussing the ancestry of Yujiulvgong and their official careers.

Key words: Epitaph of Yvjiulvgong; Northern Wei; Eastern Wei; System of Officers

北齐尧峻墓出土吐谷浑静媚墓志考

李鹏为

（河北邯郸市文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室，邯郸，056002）

一

1974年，磁县发现并发掘尧峻墓[1]，出土墓志三盒。其中一盒志盖中心篆书“齐故尧公妻吐谷浑墓志之铭”十二字。志盖四角有铁环。该盒墓志边长63.5、宽64厘米。志文共27行，满行28字，全文共737字。据墓志文字可知，拓跋静媚卒于天统元年（565年）六月，墓志铭刊刻于天统三年（567年）其夫尧峻下葬之前。墓志文已先后见于《魏晋南北朝墓志汇编》[2]及《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3]，兹参酌其释文，择各家训释之长，将其志文移录于下，以便研讨（图一）。

夫人讳静媚，河南洛阳人也。盖其长原带地，崇基极天，共削成而争高，与」回复而竞远。虽年代逾往，声德终传，载籍垂芳，风流不坠。高祖柴，所谓吐」谷浑国主也。既以雄俊开王西蕃。曾祖头，汶山公，复以英机建侯东魏。祖」豊，宁西将军长安镇将洛州刺史南中郎将汶山公；父仲宝，员外散骑侍」郎；并道茂当时，德流后胤。夫人禀柔和以诞质，资淑善以抽英。风貌若神，」信无惭于洛浦；仪形似画，亦何媿于巫山。行乃楷模，德唯师范。故幽闲贞」一之操，无俦类以能方；织纴组紃之功，岂言辞所可喻。于是窈窕之望转」隆，葛簟之德弥绍。加以艺尚形文，才兼清绮，遒辞超宝钗之作，美韵掩团」扇之篇。及百两来迎，移天往配，言嫔君子，庑美斯属。年十七，言适尧氏。时」公勋业既隆，门开黄阁，出蕃入辅，家称击钟。宾客赴之若云屯，士庶倾之」如风凑。而夫人竭忠言以奉上，尽仁恕以接下，不以富贵而憍，宁以豪华」兴傲。莫不慕义忘生，感恩效死，遂使时有五袴之歌，世致攀辕之恋。斯皆」阴德仰助，岂无功焉。兼以天情俭素，立性谦虚，亲执中馈，躬劳纺绩。肃肃」虔恭，晨敬于姑姊；恂恂逮下，尽忻于娣侄。何止六姻重其德迹，乃实四海」钦其景行。虽伯姬之称妇礼，敬姜之号母仪，以此言之，讵有惭色。方当陵」戾霄汉，从游太阶，享彼遐龄，穷兹宠贵。岂谓福善无验，祸仁奄及。春秋卌」有七，以天统元年六月三日薨于京师永福里第。粤以三年岁次丁亥二」月壬寅朔廿日辛酉合葬于邺

图一　吐谷浑静媚墓志

西漳北，负郭七里。惧市朝之易改，冀丹青」以难灭，故述徽猷，传之泉壤。其词曰：」洪流淼淼，层构昂昂，既贤既哲，唯公唯王。千年不替，百世其昌，互握金紫，」迭映银黄。余祉所钟，诞兹英淑，四德其举，六行咸肃。内外用和，闺门以睦，」垂美葛覃，流芳灌木。上德阙配，妙简良嫔，谁将偕老，言归若人。习礼无斁，」摛掞日新，如何不吊，奄逐徂轮。锦衾夜设，绣帐晨开，形既不在，神徒往来。」镜终委匣，衣会流埃，一言及此，呜呼哀哉。云徂始尔，儵已三年，辞彼白日，」既此玄泉。儿女号慕，亲御流连，百身靡赎，空嗟昊天。天长地久，事促华浮，」如日西逝，若水东流。宿草萦垄，拱木交丘，千春不署，徒勒芳猷。

二

夫人讳静媚，河南洛阳人也。

据志文知志主为吐谷浑静媚。吐谷浑是姓。吐谷浑部系东北鲜卑一支，公元3世纪末期，开始西迁。吐谷浑之名由来，见《宋书·鲜卑吐谷浑传》：“（叶延）自谓曾祖奕洛韩始封昌黎公，曰：‘吾为公孙之子，案礼，得氏王父字。’命姓为吐谷浑氏。”[4]罗新认为，吐谷浑是“暾欲谷”之音转，“暾欲谷”是中古北族官号[5]。其说可从。吐谷浑部发展至叶延时，已经经历了由阴山一带（即今鄂尔多斯盆地北端）移动至枹罕（今甘肃临夏一带），再游牧至白兰（今青海玉树果洛地区）的发展过程。叶延实际上是吐谷浑的建国者[6]，是以我们知道在叶延（329～351年）时代吐谷浑部落已经以官号因袭而来的部落名为姓。至北齐时，吐谷浑作为姓氏已被使用两百多年。

盖其长原带地，崇基极天，共削成而争高，与」回复而竞远。虽年代逾往，声德终传，载籍垂芳，风流不坠。

此段为墓志习语。“长原”，即长源，亦作“深源”“冲源”“宗源”“鸿源”“洪源”，多指源头长远，喻基业开端。“崇基”，指高坛。《文选》潘岳《籍田赋》：“结崇基之灵趾兮，启四途之广阼。”李善《注》：“谓坛也。”

高祖柴，所谓吐」谷浑国主也。既以雄俊开王西蕃。曾祖头，汶山公，复以英机建侯东魏。祖」豊，宁西将军、长安镇将、洛州刺史、南中郎将、汶山公；父仲宝，员外散骑侍」郎；并道茂当时，德流后胤。

志文追述了吐谷浑静媚的世系。高祖柴，周伟洲先生考即吐谷浑第九代主阿柴[7]，是。阿柴，一作阿豺。阿豺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卒，谥号威王。曾祖头入仕北魏，被封为汶山公。1929年洛阳姚凹村出土北魏吐谷浑玑墓志[8]载吐谷浑玑是阿豺之曾孙，“祖头颓，率众归朝，蒙赐公爵。”知吐谷浑静媚曾祖“头”即吐谷浑玑之祖父“头颓”，此处志文阙略。吐谷浑玑墓志志文载吐谷浑头颓“率众入朝”，是知人数众多，于其时当属比较大的外交事件。《魏书·吐谷浑传》载吐谷浑国主慕利延侄玮代惧祸谋奔北魏事泄被诛，其弟叱力延等八人逃至平城之事[9]。周伟洲先生考证，吐谷浑头颓或系玮代之弟[10]，入附时间在444年。马卓娅认为吐谷浑头颓是吐谷浑国主拾寅之子度易侯[11]。李文学认为吐谷浑头颓入附很有可能在460年北魏袭击吐谷浑之际[12]。我们认为，事实上根据现有材料目前还很难对吐谷浑头颓入附时间做出判断。

吐谷浑静媚生于518年，其父吐谷浑仲宝，其祖父吐谷浑丰都长期在北魏、东魏、北齐政权中任职。《吐谷浑玑墓志》与《吐谷浑静媚墓志》对吐谷浑丰所任官职略异。《吐谷浑玑墓志》称吐谷浑丰“除宁西将军，长安镇将，又迁使持节平南将军、洛州刺史。”未提及其曾任南中郎将，又言其曾任平南将军。吐谷浑丰所担任的宁西将军一职

十六国前赵、后赵时期始置，北魏前期续置，太和十七年（493年）《职员令》中已无此职。北魏时期先后担任长安镇将的有拓跋范（433年在职）、窦瑾（436～443年左右在职）、陆俟、万振（450年左右在职）、元道符（467年在职）、陆真（467～472年在职）、陈提（479年在职）、陆思礼（5世纪末在职）等。吐谷浑丰如果做过长安镇将，恐时间较短，很有可能在陆真之后，旋即回京，被孝文帝任命为南中郎将。南中郎将一职置于北魏孝文帝迁都之际，分设洛阳四面以拱卫京师[13]。南中郎将之秩是正三品中，是知吐谷浑丰在孝文帝迁都之际任职，所任长安镇将、南中郎将等职务都比较重要，诚如墓志所言，“显著魏邦”。平南将军、洛州刺史很有可能是赠官。北魏时期有二洛州，一为京都洛阳所属之州，一为改上洛荆州之洛州。洛阳于太和十七年（493年）改为司州，司州刺史品秩为正三品中，属于上州。平南将军之秩为从二品上。符合赠官之例。

此外，《吐谷浑玑墓志》明确提到，吐谷浑玑是“河南洛阳人”，“年廿，袭父爵，宣武皇帝简拔英奇，抽引内侍。”吐谷浑玑479年出生，至少在洛阳生长，499年前后袭爵受官。是知499年前后吐谷浑丰已卒。因此可以肯定，吐谷浑丰主要活动于孝文帝在位期间。因墓志所言，吐谷浑丰袭爵吐谷浑头颓，墓志中未提及吐谷浑头颓曾出任北魏职官，比较可能的事实是吐谷浑头颓入附之后，北魏政权给予了头颓较为优渥的政治地位，但并未授官。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吐谷浑丰随其父在平城生活，吐谷浑丰本人后跟随孝文帝南迁，可能在孝文帝南迁之前就已经先至洛阳。至于吐谷浑头颓何时入附，史料阙如，但不会晚于460年。

吐谷浑静媚是吐谷浑玑的侄女，其父吐谷浑仲宝是吐谷浑玑的长兄。吐谷浑玑于516年去世。吐谷浑静媚并未见过其叔父。

年十七，言适尧氏。时」公勋业既隆，门开黄阁，出蕃入辅，家称击钟。吐谷浑静媚17岁嫁给尧峻，其时尧峻已经有元配独孤思男。尧峻（505～566年），字难宗，上党长子人，北魏相州刺史尧暄之孙，员外散骑侍郎尧荣第三子，《魏书·尧暄传》有载。“时公勋业既隆，门开黄阁，出蕃入辅”，吐谷浑静媚入嫁之时为东魏天平二年（535年）。据《尧峻墓志》载，尧峻曾于正光末年出击茹茹，当是随尚书令李崇出击，事见《北史·李崇传》[14]。墓志载其永安二年方“释褐开府参军事”，是知其彼时尚未授官。后尧峻又于永安三年（530年）“破野头俟豆陵步蕃等”，“野头俟豆陵步蕃”即河西费也头纥豆陵步蕃。当时纥豆陵步蕃是由尔朱兆和高欢联合击破，尧峻兄弟当时应在高欢部。尧氏籍贯上党，尧峻高祖尧僧赖于十六国时期在后燕政权中任职，北魏太祖拓跋珪破后燕中山后，尧僧赖与吕舍归附北魏，事见《魏书·尧暄传》[15]。尧僧赖孙尧暄卒于太和十九年（495年），赠安北将军、相州刺史。尧氏自尧僧赖渐起于河北，逐步成为河北豪族之一。尽管尧僧赖归附北魏，并且卒于平城，但是尧氏自后燕以来一直在定州发展。永安元年（528年，是年多次改元，先是武泰，继而建义，再而永元）尔朱荣平定葛荣之乱，控制朝政。是时尧峻虽已在朝任职，但其时河北大乱，

尧峻很有可能居定州自保，是以免于河阴之变。随着尔朱荣为孝庄帝所诛，高欢力量崛起，尧氏开始进行第二次政治抉择。《尧峻墓志》“（普泰年中）其年与兄共举定州，来相攀附。”是为其证。高欢与尧氏关系密切，尧峻之母《尧赵氏墓志》有“大丞相中外诸军事渤海王高，地居戚重，位望尊崇，亲慕夫人慈训，躬展诚敬”之语可征。吐谷浑静媚入嫁之时，正是尧峻建立军功之后加入高欢阵营之际，尧氏一族政治地位得到了显著提高。吐谷浑静媚本是洛阳人，之所以葬在邺城，与高欢迁东魏孝静帝元善见于邺城有关。正是在迁都之际，吐谷浑静媚嫁与尧峻为妾，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吐谷浑入附家族政治地位随着拓跋王朝的行将终结而日益衰落。

三

北魏曾经四次征讨吐谷浑，时间发生在444年、445年、460年、470年。这几次讨伐都发生于北魏国力较强时期。所经路线也比较清楚[16]。470年以后，北魏与吐谷浑和平往来为主，交往密切。六镇起义以后，北魏政局动荡，吐谷浑与北魏往来中断。直至东西魏分立、政局稳定之后，吐谷浑才恢复与东魏的往来。东魏的实际执政者高欢与柔然、吐谷浑先后建立往来。在此之前吐谷浑朝贡都是前往平城及洛阳，东魏以后转为前往邺城入贡。其中朝贡东魏、北齐约有10次[17]。有关路线学者曾有讨论[18]，本文于此略作补苴。

吐谷浑这种名曰“朝贡”的行为，实为贸易往来。东西魏分立以后，吐谷浑欲抵邺城，路线较为困难。但就在这种较为困难的局面下，吐谷浑仍然通过传统交通道路，疏通出了一条联系中西与南北朝的贸易路线——“吐谷浑道”。同时，这也是由当时的东亚政治环境所决定的。我们知道，“吐谷浑道”由黄文弼先生命名[19]，又称“青海道”“河南道”，徐兆奎先生谓此道早由月氏人开辟，应称“月氏道”“羌中道”[20]。实际上，这条道路虽然在月氏人时期即已存在，但是利用此道进行大规模的商贸往来，却是由吐谷浑人所完成的。这条道路向南通往益州路段，向西通往西域、波斯等地，向北通往柔然，向东经临夏由鄂尔多斯南麓可进入中原。而吐谷浑与东魏、北齐保持联系所经之路，就是这条“吐谷浑道”的东段。

由于西魏阻断，“吐谷浑道”东行受阻。由“吐谷浑道”自西东行的商贾不得不绕道柔然，进入洛阳、晋阳与邺城等地。这在史料中有记载。《北史・吐谷浑传》：“兴和中，齐神武作相，招怀荒远，蠕蠕既附于国，夸吕遣使致敬。神武喻以大义，征其朝贡，夸吕乃遣使人赵吐骨真假道蠕蠕，频来东魏。”是知借道是吐谷浑与东魏保持联系的唯一办法。吐谷浑入柔然主要有高昌路和凉州路两条路线，周伟洲、周松先生推断吐谷浑人走凉州路，横断河西走廊进入柔然，然后到达东魏北齐的可能性较大[21]，可从。545～548年，吐谷浑朝贡东魏中断。或据《虞弘墓墓志》[22]推断柔然与吐谷浑发生冲突[23]。《虞弘墓墓志》：“茹茹国王，邻情未协，志崇通药，□□□芥，年

十三，任莫贺弗，衔命波斯、吐谷浑。”“邻情未协”，指的是柔然派虞弘赴波斯、吐谷浑诸国修好关系。此时柔然国力渐衰，但“未协”至何种程度，史料依旧阙如。我们认为，很有可能是柔然与波斯方面出现了不协的情况。因为如果柔然与吐谷浑发生较大冲突，不会仅经历两年就恢复如初。另外，此时东西魏争战正酣，是否受此影响？目前尚不得而知。

而在进入东魏后，吐谷浑朝贡队伍主要要抵至洛阳、晋阳、邺城三地。无疑，从柔然进入东魏，经山西一线最为便捷。《太平寰宇记》[24]中就记载了出塞的三条道路：

> 引入塞三道，自周、秦、汉、魏以来，前后出师北伐唯有三道：其中道正北发太原，经雁门、马邑、云中，出五原塞，直向龙城，即匈奴单于十月大会祭天之所也。一道东北发，向中山，经北平、渔阳，向白檀、辽西，历平冈，出卢龙塞，直向匈奴左地，即左贤王所理之处。一道西北发，自陇西，经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历伊吾塞，直向匈奴右地，即右贤王所理之处。

其中中道基本上就是吐谷浑经柔然入境东魏的主要通道之一，即草原丝绸之路。由五原塞外、沃野镇以北东行，进入托克托，南行抵达朔县，再经雁门关进入忻县，最终抵达晋阳。然后利用晋阳交通，奔赴洛阳和邺城。东魏时期，高欢父子在晋阳设立霸府，晋阳是当时实际意义上的政治中心，并与长安、邺城一并成为丝绸之路的东端[25]。而从晋阳至邺城，则主要经襄垣、壶口、滏口陉这一路线。这是草原丝绸之路向南延伸的重要路线，也是吐谷浑朝贡的最主要路线。此外，如果不经晋阳，吐谷浑还有平城—中山—邺城这一路线，396年，后燕慕容垂凿通恒山道，之后北魏道武帝拓跋珪灭后燕，再度治道，“发卒万人治直道，自望都铁关凿恒山岭至代五百余里。”[26]其后又多次治道，更增灵丘道[27]。经由这几条主要的路线，由西域而来的商贾在吐谷浑“朝贡”名义的引导下，终于抵达邺城，实现了中西交流的深度繁荣。

注　释

［1］ 磁县文化馆．河北磁县东陈村北齐尧峻墓［J］. 文物，1984（4）.

［2］ 赵超．魏晋南北朝出土墓志汇编［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

［3］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新中国出土墓志・河北卷［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23.

［4］ 宋书・鲜卑吐谷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371.

［5］ 罗新．再说暾欲谷其人［J］. 文史，2006（3）.

［6］ 周伟洲．吐谷浑史［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15.

［7］ 周伟洲．河北磁县出土的有关柔然、吐谷浑等族文物考释［J］. 文物，1985（5）.

［8］ 马卓娅．吐谷浑玑墓志考略［J］. 中原文物，2002（4）.

［9］ 魏书・吐谷浑传［M］．北京：中华书局，1974：2237.

［10］ 同［7］.
［11］ 同［8］.
［12］ 李文学. 吐谷浑研究［D］. 兰州大学博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02：164.
［13］ 俞鹿年. 北魏职官制度考［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159.
［14］ 北史·李崇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1598.
［15］ 魏书·尧暄传［M］. 北京：中华书局，1974：954。
［16］ 周伟洲. 吐谷浑史［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34～37.
［17］ 先后发生于540年、542年、543年、544年、545年、548年、549年、550年、551年、553年，基本上每年一次.
［18］ 周松. 吐谷浑遣使东魏路线考［J］. 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3）.
［19］ 黄文弼. 罗布淖尔考古记［M］. 北平：研究院史学研究所和中国西北考察团理事会印行，1948年：44.
［20］ 徐兆奎. 青海南疆间的古代间道［J］. 自然科学史研究，1987（1）.
［21］ 同［18］. 另见周伟洲. 古青海路考［J］. 西北大学学报，1982（1）.
［22］ 张庆捷. 虞弘墓中的几个问题［J］. 文物，2001（1）.
［23］ 同［12］.
［24］ 太平寰宇记·卷四十九·河东道［M］. 北京：中华书局，2007：1036.
［25］ 张庆捷. 丝绸之路与北朝晋阳. 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十届年后暨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 太原：北岳文艺出版社，2013.
［26］ 魏书·太祖纪［M］. 北京：中华书局，1974：31.
［27］ 魏振国. 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上的山西［D］. 山西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2015.

Study on the epitaph of Mrs. Tuyuhun Jingmei(a concubine of Yao Jun, Qi Prince)

Li Pengwei

Abstract: In 1974, Hebei Cixian archaeology institute excavated the tomb of Yao Jun,a Northern Qi prince three epitaphs were unearthed, one of the epitaphs belonged to Mrs. Tuyuhun Jingmei. The epitaph refl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uyuhun and the Northern regime. In addition, this epitaph can also reflect the exchange information about Ye City, Tuyuhun and Western countries. The exchange between them is through the Steppe Silk Road, this road is located in the southern margin of the Ordos Plateau.

Key words: Yao Jun tomb; Ye City; Tuyuhun Jingmei; Steppe Silk Road

元代“天地日月国王父母”考

赵立波[1]　李冀洁[2]

（1. 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北京，100084；2. 北京雍和宫管理处，北京，100007）

元代出现了一种刻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字样的石（陶）碑。目前考古发现有4件“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小型石（陶）碑，其中3件出土于内蒙古自治区，1件出土于山东省菏泽市，高度均在十几厘米左右。传世金石碑刻和木质牌位亦有发现，形制大小不一，年代亦多为元代。此类遗物均出现在元代或稍晚，其背后的成因和消亡过程未见有进行深入研究者[1]。本文将着力对这一问题进行探讨，不当之处，有待方家指正。

一、考古发现的“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

2010年10月至2011年1月，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菏泽市文物事业管理处联合在山东省菏泽市牡丹区中华东路与和平路交叉口西南约250米处发掘了一只沉船。沉船为木质内河船。沉船内及周围区域出土的器物有100余件，包括瓷器、陶器、漆器、玉器、石器、铁器、铜器、金器等。从出土器物及沉船的制作技术看，此船沉没的年代为元代或元代晚期。[2]沉船的尾封板和1号舱壁之间为尾空舱，出土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香炉、石罗汉等。发掘简报未发表石碑的数据和图片，但据发掘者孙明所著《元代沉船遗物现菏泽》[3]一文可知石碑情况如下：

牌首为浅浮雕的二龙，牌阳面的“圭”形牌额上阴刻篆书“寿”字，牌身阴刻楷书八字两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左、右、下三边线刻缠枝花卉；阴面的牌额上线刻梅花纹，牌身线刻龙纹。龟趺座。石碑通高17厘米，宽5.1厘米，厚1.1厘米（图一）。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曾发现2件元代“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分别出土于察哈尔右翼前旗集宁路古城和察哈尔右翼中旗广益隆古城，现藏于乌兰察布博物馆。集宁路古城出土的石碑为石质，螭首，碑身正面阴刻楷书八字两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左、右、下三边饰卷草纹，残高14厘米，宽6.8厘米，厚2厘米（图二）。

广益隆古城出土的石碑为陶质，笏首，碑身正面阴刻楷书八字两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上部阴刻莲纹，周身阴刻卷草纹。高10.7厘米，宽5.3厘米，厚1.5厘米（图三）。

1957年前后，内蒙古文物工作者在云内州古城（今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西白塔古城）进行了两次考古调查，在古城南门外的塔基南侧发现了一件小型螭首石碑，“圭”形碑额，碑阳刻楷书八字两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左、右、下三边饰卷草纹，高11.4厘米，宽3.7厘米，厚1.4厘米[4]（图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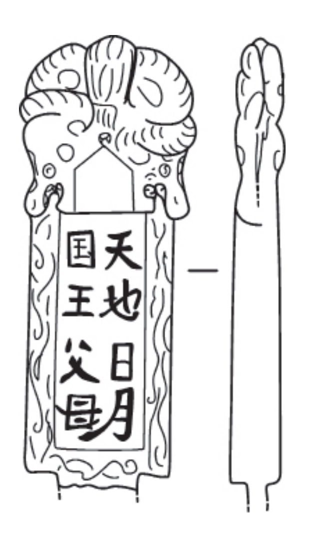
图一　山东省菏泽市元代沉船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



图二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



图三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广益隆古城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陶碑



图四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云内州古城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

云内州自辽代晚期建立，金元沿袭，明代宣德初年置官兵戍守，正统后废弃[5]。

石碑的形制与纹饰均和菏泽沉船出土元代石碑相类，均为浮雕螭首、圭额，饰卷草纹/缠枝花卉纹，可断定为元代遗存。

二、传世的“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和牌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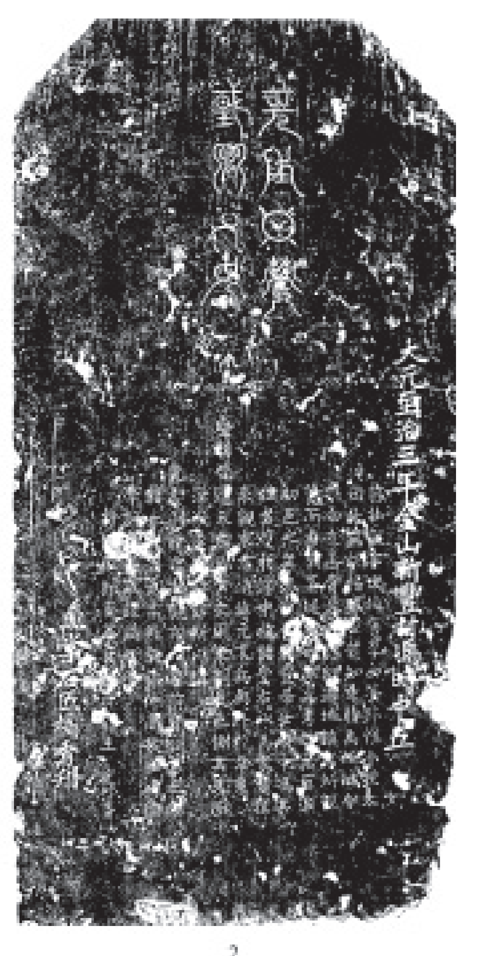
传世的“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和牌位目前已知的有4件，详述如下：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博物馆藏有一件“壮观”碑，碑阴上部刻有篆书八字两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图五）。此碑石质，圭首，碑身高138厘米，宽84厘米，厚14.5厘米。原树于文庙，1965年拆除文庙时移至县文化馆。1987年5月，加底座予以保护。1996年1月，金乡县博物馆开馆，移至文渊阁展览。

碑文：碑阳书“壮观”二大字，左下有“太白”二小字。碑阴上部有一些小字，惜已漫漶不清，碑额刻篆书八字两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右上角刻“正统九年”。下部为铭文主体，分两部分，左右两侧分别有一列大字，右侧书“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



1



2

图五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壮观”碑（金乡县山阳书院藏拓）

1. 碑阳　2. 碑阴

丰村冯时中立”，左侧书“鱼棠石匠杨秀刊”。最下部左侧有一行横字“宣和元年王□”。碑阴中部铭文落款处有“洪武柔兆执徐仲商”字样，为星岁纪年法，据考证为丙辰年八月，即洪武八年（1375年）八月[6]。中部铭文录于下并试加标点（脱字之处，用□表示。标“/”号者，为原碑文一行之末）：

01前壮观字，世传唐李白笔迹，惟小注太/02白，他无所据。或云贺知章时为任城令，/03与白友善，尝来□访，经过城镇有所观/04览而书焉。事疑□也，亦无考。□元至治/05初，邑之巽有□曰新丰居士时中，冯其/06姓者，获于沛中，植诸堂右，以为家宝。往/07来观求者众。值元末兵兴，仆于草莱。/08圣朝启运，天台邵公文用来判是邑，恻其久而湮没，/09遂□于兹，斯以称/10先圣庙貌之壮观，亦以著前贤心，书之端/12楷也。□洪武柔兆执徐仲商哉！生明儒学训导张敬谨识后。/13将□佐郎济宁府金乡县主簿邵文用。

据碑阴铭文“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丰村冯时中立”，可知此碑为元至治三年（1323年）冯时中所立。清人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志》对此碑亦有描述：

摹刻李太白壮观二大字碑

至治三年立并阴俱正书阴额篆书碑高五尺广二尺六寸在金乡县学右碑刻壮观二字径二尺下有太白二小字碑阴额题天地日月天地父母篆书二行径三寸其上空处隐隐有感敬等字右角有正统九年字左角有李孟字俱正书中间首行刻大元至治三年金山新丰村冯时立正书字径二寸次刻明洪武间张敬记文此据朱朗斋所录载之未见拓本[7]

河南省安阳市亦有一件“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高约60多厘米，事见《安阳县志·金石录》卷八《秦城起宅记碑》：

秦城起宅记碑存正书元贞二年四月在治西北观音堂塔上案碑石二尺余阳面书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八大字阴面有秦城起宅记后书元贞二年四月日吴渊刊魏齐闻造像石多以师僧与君亲并列此独不蹈其习碑既云宅记宜置之宅中未稔何时转移塔上殆土人便附于此赖以不致残毁亦一幸也[8]

据碑文，此碑建于元成宗元贞二年（1296年）。此碑阳面书“天地日月国王父母”，阴面刻“秦城起宅记”，说明此碑应置于宅中，后被移至观音堂塔上。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安氏翠微亭旧址曾出土一通“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尺寸较小，碑高约26厘米，宽约19厘米，厚约8厘米。碑阳刻楷书八字两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阴刻七绝诗一首，落款为“延佑三年四月日安宅立”，延佑三年为1316年，“安宅立”，说明此碑具有安宅、镇宅之用。碑身两侧亦分别刻有一首五言绝句，见毕沅、阮元《山左金石录》：

翠微亭安仁甫詩刻

延佑三年四月立，正书。石高八寸广六寸厚二寸五分，在邹平县安氏翠

微亭旧址。

天地日月国王父母

右二行字径一寸四分在碑之正面。

翠微遐景对云峯，花木成蹊锦绣丛。看取田园子孙计，安公端不让龎公。

延佑三年四月　日安宅立。

右七绝诗一首并年月，凡五行字，径七分，在碑阴。

云山三面尽，花木四时春。若问幽居处，斯亭远世尘。

□水拖青练，遥山列画屏。幽人深有意，此地结茅亭。

右五言绝句诗二首，分刻于碑之两侧，诗各二行，字径七分。

案《邹平县志》遐景亭、翠微亭俱在黄山，并安处士所构。处士名安，字仁甫，尝自制小碑，高可盈尺，螭头龟座，极精工。久湮土中，康熙三十年裔孙安士禄得于废亭故址。[9]

据毕沅、阮元案语，元人安仁甫于延佑间自制小碑，高约一尺，螭首，龟趺座，制作极为精美，后湮于土中。清康熙年间，其裔孙安士禄于废亭故址发现此碑。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盘谷乡墘头村方氏宗祠现藏有一块“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牌位，木质，暗红朱漆，分碑身和碑座两部分，碑身高约50厘米，宽约20厘米，四周镂花，正中书金色楷书八字一行“天地日月国王父母”[10]（图六）。



图六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方氏宗祠“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牌位

据记载，方氏祠堂始建于清乾隆二十年，所供奉之“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牌位系始迁祖到盘谷开基创业时所奉。始迁祖方隆公，原籍南京，明武举，洪武中以功升任福州府中卫左千户所百户，于永乐二年（1404年）奉红牌事例到永泰县盘谷乡屯田。与牌位共同迁来的还有白马尊王及夫人神位。白马尊王是福建和台湾地区民间广为信仰的道教神灵。汉高祖分封无诸为汉闽越王，传说闽越王郢时有大鳝为害百姓，郢第三子驺寅（人称“白马三郎”）与大鳝搏斗，同归于尽。后人建鳝溪广应白马王庙奉祀纪念，尊为鳝溪冲济广应灵显孚佑王。

以上4件“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和牌位均为元代或不晚于明永乐时期。为更直观地比较分析考古发现和传世的“天地日月国王父母”遗物，兹列表于下：

表一　考古发现及传世“天地日月国王父母”遗物一览表

名称	质地	形制	纹饰	尺寸（厘米）	年代	地点	备注	图片
1. 菏泽元代沉船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	石	螭首，“圭”形牌额，龟趺座	缠枝花卉纹	17×5.1×1.1	元	山东省菏泽市	“天地日月国王父母”楷书八字两行，刻于碑阳，碑额处刻有“寿”字；与香炉、寿山石罗汉2尊同出	
2.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集宁路古城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	石	螭首	卷草纹	14×6.8×2	元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前旗	残，座佚；“天地日月国王父母”楷书八字两行，刻于碑阳	
3.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广益隆古城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	陶	笏首	上部阴刻莲纹，周身阴刻卷草纹	10.7×5.3×1.5	元	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中旗	座佚，“天地日月国王父母”楷书八字两行，刻于碑阳	
4.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白塔古城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	石	螭首，“圭”形碑额	卷草纹	11.4×3.7×1.4	元	内蒙古呼和浩特市托克托县	座佚，“天地日月国王父母”楷书八字两行刻于碑阳	
5.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壮观”碑	石	圭首		138×84×14.5	元至治三年（1323年）	山东省济宁市金乡县	座佚，“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篆书八字两行，刻于碑阴	
6. 河南省安阳市《秦城起宅记》碑	石			高约60多厘米	元元贞二年（1296年）	河南省安阳市	“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八字刻于碑阳	
7. 山东省滨州市安氏翠微亭“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	石	螭首，龟趺座		26×19×8	元延祐三年（1316年）	山东省滨州市邹平县	“天地日月国王父母”楷书八字两行，刻于碑阳，碑阴及侧面刻诗	
8. 福建省福州市方氏宗祠“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牌位	木	带木座	暗红朱漆，镂雕花卉纹	高约50厘米，宽约20厘米	不晚于明永乐二年（1404年）	福建省福州市永泰县盘谷乡垅头村	“天地日月国王父母”金色楷书八字一行，刻于正面	

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牌位的产生与消失

中国传统文化中，儒、释、道三家并立，互融互补，构成了传统文化的根基与核心。三家虽有过矛盾冲突，但融合是其主流。“大约从东晋开始至隋唐时期，中国文化逐渐确立了以儒家为主体，儒释道三家既各自独标旗帜，同时又合力互补以应用于社会的基本格局。中国文化的这一基本格局，一直延续到了19世纪末，乃至20世纪初，历时1600年左右。所以，可以这样说，中国传统文化是儒释道三家鼎足而立、互融互补的文化。”[11]三教合一，“在南北朝后期渐露端倪，在北宋大致成型，到了明清社会则已登峰造极。”[12]

儒家敬奉的“天地君亲师”，是“中国传统社会中最重要的精神信仰和象征符号”[13]，“天地君亲师五字，始见荀子书中。此下两千年，五字深入人心，常挂口头。其在中国文化、中国人生中之意义价值之重大，自可想象。”[14]其思想“发端于《国语》，形成于《荀子》，在西汉思想界和学术界颇为流行。……北宋初期，‘天地君亲师’的表达方式已经正式出现。”[15]

佛经中有“天地日月父母灵神”之称，见北凉法盛译《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天地日月父母灵神，若我有罪，今悉忏悔，愿与我丈夫早得相见。”[16]东魏“比丘僧纂造释迦多宝碑”碑阳发愿文曰：“愿像主、国王、父母及一切众生舍此秽形，长之妙乐法音，以为慧湌，灵向以充诸识法界，□形六度，身力永越烦尘，长辞八极，导化□（万）方，同之妙无!”[17]盖佛教素有“四恩”之说，即佛弟子应回报四种恩德：“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18]

迨至南宋，高僧普庵印肃禅师提出报“国王水土、天地日月、父母祖宗”之恩：“何为可报国王水土。天地日月。护惜临照之德。何为可答父母祖宗。令佗一念。承我出家功德。悉得解脱。”[19]

蒙古国发现的《释迦院碑》（又称《蒙哥汗碑》）碑文有如下记载：

> 01外剌随营居奉/02佛驸马八立托公主一悉基投丹悃者切念生居浊世幸遇/03明君爰处爰居长安长乐赖/04天地覆载之德叨/05国王水土之恩中心藏之追酬罔及。

该碑立于元宪宗七年（1257年），以回鹘式蒙文和汉文镌刻，系斡亦剌惕部（即碑文中之“外剌”）“奉佛驸马八立托”与公主为庆祝蒙哥汗五十大寿而勒立的，旨在酬谢皇恩，祈佛保佑，使“国泰民安，法轮常转”。上引碑文，为汉地禅宗僧人撰述。[20]说明在蒙哥汗时期，蒙古贵族对于“天地覆载之德”“国王水土之恩”之说就已经有所接纳。

据以上材料，笔者认为“天地日月国王父母”说受到了儒家所尊崇之“天地君亲师”和佛教“四恩”说的影响，但是儒、释典籍中并未将此八字连用。道家典籍中，东

汉顺帝时出现的《太平经》“继承了儒家的旨趣，极力宣扬天、地、君、父、师的重要……最早将天地君父师五个字连在一起，整齐地排序，构成了后世敬奉‘天地君亲师’牌位的雏形”[21]。北宋道人贾善翔《太上出家传度仪》提出“四恩”说：“当上报四恩：一天地恩，二国王恩，三生身父母恩，四师长恩。”[22]南宋金丹派南宗创始人白玉蟾道长在《道法九要》中告诫学道之人“当知感天地阴阳生育之恩，国王父母劬劳抚养之德，度师传道度法之惠。则天地国王父母师友不可不敬，稍有违慢，则真道不成，神明不佑。”[23]以上材料虽然对“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均有不同程度论述，但是仍未将其连用。考诸史料，首次将“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八字连用的是元初全真道人黄道盈：

云岩观　在金水河西，与高□寺邻。有《记略》曰：君讳道盈，号天佑道人，混成子，姓黄氏。父喜，母吕氏，乐善好施。真人生于至元九年癸酉三月廿有七日，有红光照空，□即颖悟。闻胶州即墨县鳌山刘真人有道术，往师之，数年归。适关西云游，至缅历诸方。在途旅中，而以饮食制情魔战睡为务，心目开明。遇道术者张公带黄教习书细字。每芝麻一粒，书“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八字。至于方尺扇中，取方，写《孝经》一十八章，四畔写胡曾咏史诗一百二十首。至元三十一年，又还至鳌山，刘真人大赏异之。大德元年，云游至大都集庆里，得地二亩，建云岩观，起三清殿，殿之后建一室，为供老人之计。至治元年三月，敬受完者台皇后懿旨，特赐金冠法服，法号葆崇素圆明贞静真人。又奉旨赍御香往鳌山祝厘。事毕，奉掌教大真人法旨，充益都路道门都提点。至正四年春，奉特进神仙法旨，充大都大长春宫诣诸路道教所详议提点事。至正十二年三月三日，于云岩观寝室，命门人诸侄孙具汤沐衣冠，端坐而逝。享年八十。黄益都东关人。黄真人则师刘云岩真人，云岩真人则师郭真人，郭师王真人，真人所师，则丘真人也。[24]

据上文，黄道盈师从另一道人张带黄学习写“细字”，即极微小的字，在芝麻上书“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在方尺扇上写《孝经》。黄道盈师承清晰有序，为丘处机所开创之全真教龙门派一脉。

全真教开宗祖师王中孚，道号重阳子，金大定年间出关赴山东传教。招收马钰、谭处端、刘处玄、丘处机、王处一、郝大通、孙不二等七大弟子，世称全真七子。王重阳文化素养较高，提倡“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25]，“释道从来是一家，两般形貌理无差”[26]，常劝人诵《般若心经》《道德经》《清静经》及《孝经》。《王重阳集》中，没有对“天地日月国王父母”进行集中阐述，但是其敬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的思想却是非常明确的：

天地日月，感二气而化成也。此二气互运于天地之间，周流不已，化生万类。然人之生也，禀父精母血，天之阳气，地之阴气，日之阳魂，月之阴魄，火之阳神，水之阴精。人之一身造化，与天地同一气也，天地乃人之大父母。悟之者，超乎天地阴阳之外;迷之者，罹乎苦海万象之中。[27]

天地唯尊人亦贵，日月与星临。道释儒经理最深，精气助神情。四个二般都晓彻，丹结变成金。衮上明堂透玉岑，空外得知音。[28]

夫人之一身，皆其天地之理。天地所以含养万物，万物所以盈大地间。其天地之高明广大，未尝为万物所蔽。修行之人，凡应万事，亦当体之。[29]

问曰：如何是五行之法？诀曰：第一先须持戒，清静忍辱，慈悲实善，断除十恶，行方便，救度一切众生，忠君王，孝敬父母师资，此是修行之法。然后习真功。[30]

元代全真道人彭致中所编文学总集《鸣鹤馀音》中有一首无名氏《水龙吟》：

玉炉百和发虔心，信香一炷，氤氲缭绕。来往盘旋，结成华盖。报天地恩覆载。报日月照临之德。报国王水土，丰荣快乐，报父母恩怜爱。上谢祖师圣教，丹阳师父传派。红尘普度，全真大教，丘王长在。太古居宁海。共三人暗合法界。愿皇王万岁，千秋臣宰。请门人拜。[31]

词上片表达了天地有覆载恩，日月有照临之德，国王水土带来丰荣快乐，父母有怜爱恩之意；下片“祖师”指王重阳，“丹阳师父”指王重阳弟子马钰，王重阳去世后，马钰接掌全真教，担起弘教的重任，故后世弟子尊称其为“丹阳师父”。“丘王”当指丘处机。可知作者为全真教弟子，并与丘处机有密切关系，很可能是丘处机的弟子。

丘处机及其弟子对蒙元统治者影响巨大，曾有“一言止杀”之佳话。成吉思汗称丘处机为“丘神仙”，亲自下圣旨免除全真弟子的赋税，并令丘处机“掌管天下出家人”。

元代大一统后，全真教获得了迅速的发展。王重阳三教合一的思想对长江以北地区产生了尤为深远的影响。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敬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的行为在全真教的推动下，在长江以北地区广为流行开来。这与“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多出在内蒙古、河南、山东地区的事实相印证。而敬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者，不必是修道之人，山东省滨州市安氏翠微亭“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的主人是“处士”，即隐居不仕之人；山东菏泽元代沉船出土“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与一对寿山石罗汉同出，则知其主人有明确的佛教信仰，广益隆古城出土的“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上刻有莲纹，亦属佛教因素，其主人的信仰也颇值得玩味。唯有福建永泰县方氏宗祠“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牌位是与道教神灵“白马尊王及夫人”一起供奉的，说明供奉者应具有道教信仰。正是因为全真教三教合一的态度，才使得“天地日月国王父母”说减小了在全社会传播的阻力，受众群体也不仅仅是全真教弟子。元代畏兀儿农学家鲁明善《农桑衣食撮要》劝导大众拜谢“天地、日月星辰、国王水土、祖宗父母、社稷六神”，可看作是“天地日月国王父母”说影响广泛的一个证据：

正月 元旦酬恩 宜斋戒，焚香点烛，拜谢天地、日月星辰、国王、水土、祖宗父母、社稷六神，勿兴恶念。每月若遇朔望之日，依上焚香拜谢，福德必厚。[32]

然而盛极必衰，元代晚期，全真教内部活力下降，道士平时除为皇室建斋祈福外，便是往来于富贵豪门，教务随之退步，人才济济的现象不再，全真教开始呈现衰败的气象。迨至明代，太祖朱元璋及大部分明帝重视正一道、轻视全真教，对全真教有所抑制，使得全真教“主要活动于宫观内部和山泽江湖之远”[33]。随着全真教的萎缩及其影响力的减弱，其所提倡的敬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的行为也在民间渐渐难觅踪影了。

四、结　　语

“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石碑/牌位均出现于元代或稍晚，地域集中在内蒙古、河南、山东等北方地区。此类遗物的出现，有着深层次的历史原因和社会背景。中国古代儒家素来崇敬“天地君亲师”，佛家亦有回报“父母恩、众生恩、国王恩、三宝恩”之“四恩”说。宋元时期，在三教融合的大趋势下，王重阳、丘处机等全真教道人明确倡导三教合一，在传承道教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容纳儒家和佛家思想，首次提出了回报“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的说法。

随着元廷对全真教的推崇以及全真教的迅猛发展，回报“天地日月国王父母”恩德之说在长江以北地区流行开来。民众多于家宅中安置“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碑，除了寄希望于镇宅外，亦必有拜谢、祭祀之意，以提醒自己不忘回报上述四恩，并希望由此获福。目前发现的这些石碑有的与石罗汉和香炉同出，有的刻有莲花，说明供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的群体比较复杂，不唯全真教徒，亦含有佛教徒在内。明代全真教式微，“天地日月国王父母”遗物开始退出历史舞台。明代小说《西游记》《东渡记》中“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四恩说的描述[34]，或可看作元时余绪，但是旧时王谢堂前燕，再也难以飞入寻常百姓家，民间敬奉“天地日月国王父母”的行为较之前朝大大减少，直至彻底消失。明后期，家堂之中供奉“天地君亲师”变得流行，并影响至今。

注　　释

［1］　潘建荣、牛鹏认为“天地日月”本是中国道教崇信的自然神；“国王父母”一词连用，是佛家教义接受儒家文化以后在宗教方面的反映，应属佛家的信仰. 见潘建荣、牛鹏《元代沉船初探》［N］菏泽日报/2010 年/12 月/15 日/第S01版. 刘未认为“天地日月国王父母”四恩之说或起自元代，此类器物均应属镇宅之物，与后土神位相类. 见刘未微信公众号“鸡冠壶”，2016年5月16日，http://mp. weixin. qq. com/s/zt_Sx0IAPqeci3uKX878XA.

［2］　王守功，张启龙，马法玉，李罡，吴双成，李胜利，孙明，马静，宫衍军，郅同林，朱来劲，张玉民，房成来，张胜宪，林雪川，徐姗. 山东菏泽元代沉船发掘简报［J］. 文物，2016（2）.

［3］　孙明. 大朝余晖：泥沼下的菏泽元代沉船［J］. 东方收藏，2011（11）.

[4] 张郁. 呼和浩特西白塔古城［J］. 内蒙古文物考古，1984（3）：98～103.

[5] 同［4］.

[6] 李英渠. 金乡史话（下）［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481.

[7] （清）毕沅，阮元撰. 山左金石志·元石［M］. 网络版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四编. 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97. 总页号：18539.

[8] 贵泰武，穆淳等纂. 安阳县志·金石录卷八［M］. 中国地方志丛书·华北地方·第一〇八号. 影印清嘉庆二十四年刊本，民国二十二年铅字重印本. 台湾：成文出版社，1968：949.

[9] （清）毕沅，阮元撰. 山左金石志·元石［M］. 网络版中国历代石刻史料汇编第四编. 北京书同文数字化技术有限公司：79. 总页号：18521.

[10] 方为民. 中华方氏全族统谱（下部）［M］. 北京：中国新闻出版社，2007：2079.

[11] 楼宇烈. 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J］. 中华文化论坛，1994（3）.

[12] 李四龙. 论儒释道“三教合流”的类型［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2）.

[13] 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4] 钱穆. 晚学盲言［ M］.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转引自徐梓. “天地君亲师”源流考［J］.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

[15] 同［13］.

[16] （北凉）法盛译，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编. 佛说菩萨投身饴饿虎起塔因缘经［Z］. 中华大藏经第二四册. 北京：中华书局，1987：341.

[17] 秦艳兰. “比丘僧篡造释迦多宝碑”考释［J］. 文物世界，2009（6）.

[18] 罗国杰，于本源主编. 中国伦理学百科全书11宗教伦理学卷［M］. 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3：66.

[19] （宋）普敬. 普通. 了心. 普礼. 法孜. 普岩. 普觉. 光祖. 一见录，普庵印肃禅师语录·卷一［M］. 续藏经第120册［Z］. 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1994：0546. 普庵印肃禅师（1115～1169年），又称普庵禅师、普庵祖师等，临济宗高僧，生于宋徽宗政和五年（1115年），袁州宜春人（今江西省宜春市袁州区）. 宋高宗绍兴四年（1134年）出家.

[20] 胡思振，白翠琴. 1257年释迦院碑考释［A］. 蒙古史研究第一辑［C］. 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

[21] 同［13］.

[22] （宋）贾善翔. 太上出家传度仪［M］. 正统道藏·正一部［Z］. 转引自任宗权著. 道教戒律学下［M］.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08：239.

[23] （南宋）白玉蟾著，盖建民辑校. 白玉蟾文集新编［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75.

[24] （元）熊梦祥著，北京图书馆善本组辑. 析津志辑佚［M］. 北京：北京古籍出版社，1983：90，91.

[25] （金）王重阳著，白如祥辑校. 王重阳集［M］. 济南：齐鲁书社，2005：9.

［26］　同［24］：4.

［27］　同［24］：302.

［28］　同［24］：69.

［29］　同［24］：280.

［30］　同［24］：280.

［31］　（元）彭致中编. 鸣鹤馀音［Z］. 道藏24册［Z］. 北京：文物出版社，上海：上海书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286.

［32］　（元）鲁明善著，王毓瑚校注. 农桑衣食撮要［M］. 北京：农业出版社，1962：25.

［33］　周德全. 道教与封建王权政治交流研究［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569.

［34］　（明）吴承恩. 西游记［M］. 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16：300. 第三十七回：“感天地盖载之恩，日月照临之恩，国王水土之恩，父母养育之恩。”《东渡记》第七十六回中亦有类似桥段，兹不赘述.

Study of Yuan Dynasty “Heaven Earth Sun Moon King Parents”

Zhao Libo　Li Jijie

Abstract: “Heaven Earth Sun Moon King Parents” tablets appeared in the Yuan Dynasty or later, which were mainly found in Inner Mongolia, Henan, Shandong and other northern regions. The emergence of such relics in the Jin and Yuan dynasty were based on Quanzhen Taoists’ ideology after they were impacted by Confucianism’s “heaven-earth-sovereign-parent-teacher” ideology, and the Buddha’s repaying “grace of the parents, grace of the living, grace of the sovereign, grace of the three treasures” ideology. Quanzhen Taoist of Yuan Dynasty taught people for the first time to repay the grace of “Heaven Earth Sun Moon King Parents”, having a profound impact on the people. Many people erected the “Heaven Earth Sun Moon King Parents” tablets at home, aiming to bless the safety of the house and paying worship. As the declining of Quanzhen Taoism in Ming Dynasty, Quanzhen Taoists’ ideology of repaying “Heaven Earth Sun Moon King Parents” faded out of the stage of history.

Key words: Yuan Dynasty; “Heaven Earth Sun Moon King Parents”; Quanzhen Taoism

征 稿 启 事

《北方民族考古》是由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中国人民大学考古文博系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古学科创建十周年之际创办的学术刊物。本刊本着加强学科建设，增进学术交流，普及考古文博知识的宗旨，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要特色，同时兼及中原和长江流域的考古学研究。

为及时反映最新考古学研究成果及田野考古新材料，本刊拟每年出版一辑，目前拟设置的栏目包括：①考古新发现；②研究与探索；③考古新视野；④考古与科技；⑤书评等。稿件内容以北方民族考古为主，同时欢迎其他方面的优秀成果投稿。

稿件具体要求：①论文不超过15000字，考古发掘报告字数可适度增加；②来稿请附中、英文摘要（300字左右）、关键词（3～6个）及作者简介；③注释统一采用文后注，注释格式请参考《北方民族考古》第一辑的样式；④译文需取得原作者的授权，以免发生版权纠纷。

《北方民族考古》实行双向匿名审稿，刊用意见将在收稿后3个月内通知作者。本刊不收取任何版面费，一经刊用，即奉样刊五本。

联系人：李梅田

电子邮件投稿地址：limeitian@hotmail.com（如邮件超过20M，请发至578134457@qq.com）

编辑部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59号中国人民大学北方民族考古研究所

邮编：100872



1. 陶鼎（M6：1）



2. 陶壶（M6：4）



3. 陶簋（M6：6）



4. M6器物组合

瓦子坝M6出土器物



1. 西南部



2. 方厅

旧尼萨城址



1. 西南隅城墙断面



2. 苏丹桑贾尔陵墓



1. 东北部



2. XXⅥ号发掘区

(K-2664.31)

www.sciencep.com



定 价: 168.00 元